

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SEYMOUR MARTIN LIPSET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张绍宗 译 沈澄如 张华青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SEYMOUR MARTIN LIPSET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张绍宗 译 沈澄如 张华青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美)李普塞特
(Lipset, S. M.)著;张绍宗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ISBN 978-7-208-10031-2

I. ①政…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政治社会学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1757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政 治 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张绍宗 译

沈澄如 张华青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8.75 插页 4 字数 431,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031-2/D·1900

定价 56.00 元

导读：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政治之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同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要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写点什么。我感到应当为之，一方面是因为李普塞特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家，在政治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人》是一本流行国际政治学界的著作，是当代政治学发展中一本学术上受到推崇的著作。在各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中，《政治人》一书都要被列为必读的书目。根据美国一家机构做的统计，李普塞特曾经是美国政治学者中被引用得最多的学者，这就足以看出他在政治学界的影响。当然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当代政治学的状况。

我是见过李普塞特的，但是不敢说他就认识我。1985年7月，国际政治学会（IPSA）在巴黎举行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前往，我有幸成为这个规模很小的代表团的一分子，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报告。会议期间，美国政治学会有意与中国政治学者们交流一次，以叙旧为目的，因为前不久美国政治学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政治系统论的提出者戴维·伊斯顿为团长。那天，美国政治学会在会场附近（巴黎政治学院）的一家法国餐馆订了席位，请了我们与会的几位中国学者去。我记得有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云坤教授等人。进入餐馆的时候，看见几名美国学者正在等我们，经介绍，我知道其中一位高大而略有点粗壮的人就是李普塞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天谈得很轻松和愉快，大家最后分手时拍了照片留念。我

的印象是李普塞特平易近人，为人谦虚，有大家风度。我当时是毛头小伙子，对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他对我所提的问题，回答得具体而认真。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似乎没有机会再见面。我曾到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去过几回，也没有见过他。这两年，我们系一直想请他来讲学，他来信说是有兴趣的，也向往中国，但是就是不能脱身，无法成行，看来只好等待将来的哪一天了。

关于李普塞特的经历和身世，所知不多。原来邀请他来的时候，他曾寄来一份个人情况简介，不过也只是一页纸，不像有些学者，名气不大，但自我介绍厚厚一叠。这里根据一些材料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和著述。他于1922年3月18日出生在纽约，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美国著名的学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等学校任教，在哈佛大学任乔治·D. 马克汉政府和社会学讲座教授。1975年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任卡洛林·G. 芒罗政治学讲座教授、社会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自1978年以来参与《公共舆论》杂志的编辑。主攻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

由于李普塞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在国际学术界和美国的学术界遐迩闻名，他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他是美国全国科学院的成员、美国哲学学会成员、全国教育学院成员、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成员，1974—1978年出任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副主席。他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会员，并于1975—1976年担任社会与经济科学部主任。他还是芬兰科学院和西班牙政治研究院的外籍会员。他曾担任过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曾是世界公共舆论研究学会的主席、国际政治学会的副主席，1979—1980年出任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1981—1982年出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84—1985年担任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

李普塞特得过很多奖。《政治人》得过普利策奖，《非理性的政治》得过缪尔达尔奖。他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古根海默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组织的资助，研究行为科学。

李普塞特单独撰写、合作撰写的著作和书籍20余部。他的著作被翻译成18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另外，他还编辑了20本书，发表过300多篇学术论文。

李普塞特在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方面也是很活跃的，曾参加过美国

国外奖学金委员会，任全国人文科学捐款委员会顾问，参加全国人文学院、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77—1981年，任美国促进中东和平委员会主席等。

《政治人》一书的特色在于打开了当代政治学研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是把政治学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继往开来，现代化了。这种方法就是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所以他的书的副标题叫“政治的社会基础”。李普塞特在本书的开始引用了西方政治研究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的几段名言，不仅因为他相信它们是至理名言，对人类政治现象的分析和观察鞭辟入里，效力经久不灭，更因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亚氏的话正确性如何，还可以深究，但渗透着一种精神，就是对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解释，要到一定的社会中去探究根源，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确立恰当的解释。亚氏开创了西方政治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李普塞特引用他的话是想表明，他本人所做的研究是一种有传统基础、推陈出新的尝试，也就是他在《序言》中所表白的：“从社会学一词首次用于社会关系的系统研究时起，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就是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把全书分析的主要问题确定为“作为社会系统之特征的民主”。这个规定鲜明地表明了他分析政治问题的方法论，从社会的角度来解剖政治的构成和演变。他设计了全书的基本的论题：(1)在社会和组织中实施民主的必要条件；(2)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3)支持或威胁民主制度的价值和运动的根源。这些论题，与他在前面引用的亚氏的语录十分吻合。

李普塞特把他的方法论称为“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是当代政治学的一支主干，在二战以后有长足的进展。李普塞特可以说是为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的人物。他相信政治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而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又有一个重点，这就是社会形成分歧和共识的根源，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条件。分歧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统一，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就构成威胁。共识有利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但是社会往往不是那么容易达成共识。分歧如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共识如何形成，是政治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久有传统,在政治研究史上也不乏前人。近代西方社会以降,社会的广阔视角开始步入政治学研究领域。起点大约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社会革故鼎新,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级分化加速,分歧加深,危机加剧,人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可以说,当时许多政治学家和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均基于社会景观。如法国古典主义的法学家让·布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对政治的推理均沉入到社会层面。19世纪,社会学方法大显身手,形成“社会学世界观”取代“法学世界观”的趋势。孔德、斯宾塞被认为是奠基现代社会学的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蒲鲁东、米尔、托克维尔等人均在这个透视点下考察政治问题。在20世纪,政治社会学异军突起,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都独霸一方。其中佼佼者不乏其人,如社会系统理论的提出人塔尔科特·帕森斯、马克斯·韦伯、米歇尔斯、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赫伯特·马尔库塞、阿尔杜塞等人,尽管他们的理论不尽相同,但在方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和演化有几个显著的趋向,其中之一就是方法论的推陈出新。可以说,当代政治学的发展以方法论的更新为中轴,方法论的探索主导着当代政治学,或者现代以来的政治学的发展。《政治人》就是以方法论的特殊性而引人注目的。把这个方法集中到一句话,就是本文的标题: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政治人》的命题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用李普塞特自己的话来讲是:“本书关心的是,使民主秩序得以存在的条件明确起来,这或许反映我的一种过于理性主义的信念:更充分地理解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可能有助于人们在尚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地方建立和发展它。虽然我们断定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假设——民主与一种向中产阶级伸展的阶级结构有关——仍然是成立的,但是这并不鼓励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因为它意味着政治活动主要应按保障经济发展来取向。”与这个问题相关的领域众多,主要的有:政治民主研究、政治参与研究、政治运动研究、民间组织的内部分析、社会一体化结构研究。为了说明他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命题,《政治人》一书广泛涉及了这些领域。《政治人》一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有十个方面:(1)经济发展与民主;(2)社会冲突;(3)工人阶级和

集权主义；(4)法西斯主义；(5)选举行为研究；(6)阶级和政党关系研究；(7)美国的知识分子；(8)民间机构的政治；(9)意识形态的终结；(10)补充。他十分强调所有这些方面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能单独地考察。在篇幅有限的这份序言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介绍上述全部的内容，这里择其要端作一评论。

(1) 经济发展与民主。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均肯定民主政治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民主政治才具备必要的条件。一般的理论相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李普塞特基本上同意这种论点。他在自己的论述中，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这个论点。他统计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教育机构、医疗发展、通讯发展、大众媒介发展的有关指数，然后得出结论：民主政治要求较高的财富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李普塞特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比较了众多的国家，有欧洲的国家、美洲的国家、非洲的国家和亚洲的国家。他还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或者是阶层冲突的问题。他比较后表示：人均财富的低水平足以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的不满情绪和积累。但是这一结论又不是绝对的：如果人们看不到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稳定的贫困会导致保守主义。李普塞特论述的潜在对象是“二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从某种角度讲是为人们认识这些运动的发展提供认识论的基础，当然也可以成为决策者制定政策的基础。李普塞特这里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的指标，对政治学研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有作用，为人所津津乐道。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察觉李普塞特价值观上的局限性：他设立的民主政治的坐标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切分析均以此作为判断标准。但是民主政治本身不能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为蓝本，今天已经是一个不辩自明的道理。关于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联的论点，后来受到很多批评。

(2) 社会冲突。除经济发展之外，民主的稳定性还决定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有效性指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地完成其基本功能，合法性指人们对一种政治体系的信仰程度。他提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合法

性危机往往发生于两种情况下，一是现有体制结构在社会变革中受到挑战，二是成长的社会团体在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体系。从这个角度观之，西方社会在近代以来主要遇到的问题是：教会和各种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承认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的“公民身份”，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为合法性和有效性找到了新的结构。有效性与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有效性发生问题时，其合法性也会削弱。合法性的危机也会影响其有效性。这个课题是当代众多的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难题，当然西方国家的发展起步要早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初级一点。但是，如果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化解了这个难题，那就是太理想化了。《政治人》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答复。

(3) 工人阶级和集权主义。这是《政治人》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部分。这里研究的是权力关系与工人阶级，或者说，社会权力与社会下层人们的关系。一个社会下层阶级的基本状况是，教育水平低，对各种政治或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低，阅读少，职业封闭，经济上不稳定和权力主义的家庭模式，等等。他的基本结论是：下层阶级相对更富有权力主义的倾向，极端主义的运动比温和的民主运动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下层阶级一旦被缺乏民主的组织吸引，就会亲近这种组织，而这种组织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会倾向于离开。在经济问题上，下层阶级比较“开明”，即比较左，愿意采纳激进的措施，而在非经济领域中，较富裕的阶层较为“开明”，支持公民自由和国际主义等。下层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支持远不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他提出的命题是：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安全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下层阶级的权力主义倾向还来自于下层阶级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能从童年起就面对处罚，缺乏爱，环境中充满紧张和敌视。实际上这里还是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只是具体化了。这个分析是带有偏见的，主要的分析背景是20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分析基于大量的资料，但其中夹杂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抗药性”。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4) 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中，战争机器前所未有地开动，枪林弹雨之中，成千上万生灵涂

炭，大片美好河山被破坏，人类文明遭受到严峻挑战。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会发生法西斯主义这样残暴的政治运动？为什么这么多现代文明国家会卷进血流成河的厮杀？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当和平终于来临时，人们没有忘记过去的噩梦，许多人仍然在探讨这个问题。《政治人》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支持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也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的论点，称之为一种“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他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法国的布热德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逐个进行了分析，以说明他的论点。他认为，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体现了左、中、右三个领域，它们的政治倾向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政治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略嫌简单化，虽然李普塞特在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成分上花了不少笔墨，但是对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把握显得浅淡和简单。

(5) 选举行为研究。当代政治学开发的一个市场最大的研究领域，就是对选举或投票行为的研究。《政治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深度。《政治人》确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假说：在政治生活中，一个社会统治集团企图引进的社会或组织的变革越大，领导层就越可能渴望甚至需要其公民或成员高水平的参与。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参加政治性选举。《政治人》清理了影响投票行为的因素，如政府的政策、接近信息的程度、群体的压力、交叉压力等。《政治人》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即选举是“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李普塞特强调，政党不论怎样，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在现代社会中，政党的作用是“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影响人们选举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阶级地位、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工作性质、政党组织、工作条件、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社区格局、世代传递、年龄结构、心理爱好、宗教信仰、种族成分、经济地位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在分析人们的选举行为时均不能偏废。

(6) 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十分重要。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日益上升。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经

常对社会发展提出批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现存社会提出批评;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提出挑战,批评得太过了。李普塞特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他提出,美国的知识分子有左翼的传统,其实也是美国意义上的“左”,而非欧洲意义上的“左”,即美国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别。美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哪里?李普塞特认为美国独有的特性,就是美国的国家和历史,其中最紧要的是两个因素,一是《独立宣言》体现的平等主义的信条,二是知识分子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不如欧洲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地位低下的一个群体。从实际上说,原因还有美国知识分子缺乏与政治权力的接触,他们的收入明显低于商业经理和专业人员。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实际上从一个角度刻画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政治人》所以抓住知识分子做文章,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 工会中的政治过程。现代政治的发展日益使人们明确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过程和民主政治的生活,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规范,而且要看这个社会各种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只有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在民主程序下运行,社会的民主政治才具备充分的条件。李普塞特着力研究了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工会的考察上。他认为,研究这些民间机构可以使人们对全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有更多了解。他对工会的分析得出一些有启发的结论:如认为美国工会像任何大型组织一样,必然会导致官僚结构,这既是内部的需要,也是外部的需要。在资方和社会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工会往往变得集中化了。美国工会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中的组织,重要的是美国工会领导层慢慢控制了管理的权力,控制了沟通的权力,也控制了“政治技巧”,如领导人的地位,领导人的生活方式、会员的参与、时间的限制、领导的继承、领导人的品格、会员的价值体系等。通过对工会的分析,李普塞特得出几个核心观点:社会大型组织结构有产生官僚行为模式的内在要求;大型组织的结构使领导层拥有极大的权力和优势;寡头集团控制大型组织的难度在于组织成员参与的程度;大型组织民主的基本前提是领导层有没有轮换的可能性。民主要求的基本条件,大多数美国工

会在大多数时间不能满足，但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工会又有利于维护民主政治，因为它集中和管理着相当多的人的利益，使他们能有组织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8) 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一些人士提出来的观念。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引起了激烈争论，同意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构成西方理论界和思想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论题。1955年9月，150位人士在意大利的米兰召开会议，讨论“自由的未来”，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各方，左、中、右都有，可以说是“群雄云集”。这次会议提出了颇有点哗众取宠的论点——“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微弱，工业革命引起的基本矛盾和冲突已经大体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李普塞特当时有一点同意的倾向性，但是没有一面倒。他在这本书中就提出，在西方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正在终结，而与经济发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处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有关的意识形态冲突仍将存在，“其持续的时间远不是我们的寿命可企及”。后来这个论点受到多方面的批判，“新左派”尤其首先发难。在“新补”的篇章中，李普塞特又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从恩格斯、曼海姆等谈起，历数加缪、以赛亚·伯林、斯图亚特·休斯、泰奥多尔·阿尔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博托莫尔、肯尼思·凯尼斯顿、小施莱辛格、雷蒙·阿隆、赖特·米尔斯、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等人的观点，旁征博引。在这里，李普塞特再次强调了他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意义，是指：“一统制革命信条与工人阶级反体制斗争运动的狂热感情的联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运动反对者与反革命信条的联系——正在衰落。”而不是“一统制政治概念体系的终结，乌托邦思想的终结，阶级冲突的终结，以及它们与不同阶级或其他政治利益集团之代表所拥护的政治立场的相互关系的终结。”从这点上说，李普塞特虽然多少有点修正他的立场，但是他对政治冲突和阶级冲突的确定是明确的。当时，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背景的。事实上，世界上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终结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口号今天看来站不住，即便是李普塞特这样部分接受这个论点的人，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

《政治人》一书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每个方面李普塞特均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往往别出心裁，这使他这本书得

到西方政治学界高度评价。他的基本点是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视为“政治人”，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生活在政治关联中的。另一方面，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又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与错综复杂、斑驳陆离的社会生活水乳交融，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选择均是社会条件总体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政治人》的独特性之一就是在当代政治学五光十色的方法论中，坚持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来研究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当代政治学领域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如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政治控制论、政治心理学、计算机模拟、多变量分析等等，令人目不暇接。但是李普塞特似乎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方法。同时他又采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政治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数据性，从大量的统计数字中得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和结论，而不是空洞的谈论政治。这是《政治人》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讲到政治研究的方法，应该谈一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普塞特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是矛盾的。作为一名学者，他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理论的合理性。他在书中写道：马克思“对冲突的原因有许多远见卓识”。同时，他也表明他“接收了”“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指“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假设，而不承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也有人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就认为，《政治人》的出发点是“一个非教条的马克思的参照系”。他的分析方法在很多方面受到马克思方法的启示，他也不回避这一点。所以他曾受右翼的冷嘲热讽。在“二战”后冷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形势下，他能这样做实属不易。但是，他同时又打了折扣，而且是一个关键的折扣。所谓的“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掏走了马克思主义中至关重要的灵魂。质言之，他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阅读他的著作时须当注意的。

在基本政治态度上，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下思维的学者，特别是在“二战”后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他的思想和价值选择又不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在很多方面是不全面的，或者说依然没有摆脱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许多问题上都反映出他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

受上述局限性的影响，他的方法论也非十全十美。李普塞特力图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马克思的方法中引申出来的观点：“政治制度的不同及其内部冲突必须根据制度的社会阶级结构加以分析。”他对政治问题的分析也尽量在这个向度下进行，每每总是把一个对象与社会的不同阶级或者阶层联系起来。然而，真正考量起来，还是有些火候不够。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和社会阶级，形式分析较多，实证分析较多，而不追根寻源，浅尝辄止。马克思的观点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李普塞特的问题所在是离开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的最重要的坐标系是朦胧的。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政治人》一书的论题今天看来有些“老化”，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59年。当时这些课题是新鲜的和热门的。时过多年以后来看，论题自然不能切合今天的政治精神和政治认识。从方法上来说，虽然是当时的独特方法，但在社会科学新方法层出不穷的时代里，显得有些“古老”。从概念框架上来说，也有人批评他使用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概念时没有统一的界定，前后不一致。至于书中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表格，人们对统计方法也有非议，对抽样的设计也有怀疑，在此不论。

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两个方面：一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西方文化优越的意识，主要体现在确定参照系时的选择上；二是整个分析对历史和文化的“忽略”，比较多地分析集中在对统计数字和文字资料的解释和发挥，集中在共时性的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上，不太注意历时性的材料和条件。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证明，历史和文化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深入研究都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尽管如此，《政治人》是一部学术上有研究价值的政治学著作，以上几点，可作

为阅读评价时的参考。

政治学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年代。中国古代有着十分丰富的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方面的材料,西方古代也有浩瀚的政治研究的典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即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意义上的政治研究,却不能说有非常长久的历史。19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在美国开始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相关。20世纪是人类政治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格局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在进行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推进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社会的政治也在蓬勃的发展进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作科学和合理的分析。移译国外学者的学术著作,使我们能够借用邻壁之光,更好地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1993年3月1日于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1年版序

本书第一版过后 20 年再版需要有某些理由。主要理由是当其在 1960 年出版后已为读者所完全接受,而且现在似乎仍有相当多读者存在。虽然书中提到的某些研究文献已经过时,但比较政治行为研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于那些对 80 年代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仍没有失去其意义。

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开始建议出版本书新版时,我起初的反应是作一次全面修订,或者最好是写一本新书来讨论原书已论述过的许多问题。然而我所承担的更重要的责任和义务排除了这种可能,至少是在未来几年。不过,如果不对最近的研究与本书内容的关系以及人们对本书的批评作一些讨论,就让它照原样付梓,似乎又太专横了。

因此,我增加了两章,即这一版中的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第十四章对原来已探讨过的四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即:“经济发展与民主”(第二章)、“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第四章)、“法西斯主义”(第五章)、“阶级政治”(第七、八、九章)。第十五章,即最后一章,扩充了对“意识形态终结了吗?”(第十三章)这一问题的讨论;这部分内容是由以前发表的一篇综合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增订改写而成。¹

有些问题,如第三章论到的“社会冲突、合法性和民主”,或第十二章论到的“工会中的政治过程”,之所以在新增两章中未作进一步讨论,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很多内容可增加。第六章论述的政治参与有所不同,这是过去 20 年做了大量工作的一个领域,不过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发现基本上已纳入本书提出的结论。²

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第十章)是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我做了大量工

作的一个领域。无奈,只好请读者参见我这方面的著作。³

在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的20年中,我一直在研究比较背景和美国背景下的政治发展,并从事这方面的写作。这一成果已以各种书和论文的形式发表。第六篇的内容部分引用了这方面的成果。

在此,我要对这段时间与我合作的如下学者的帮助和深邃的见识表示感谢:斯坦·罗坎(Stein Rokkan)、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Irving Louis Horowitz)、埃弗雷特·莱德(Everett Ladd)、厄尔·拉布(Earl Raab)和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这里特别要提到斯坦·罗坎,他在1979年过早去世以前,一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社会学家。我还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加里·马克斯(Gary Marks)和史蒂夫·斯特德曼(Steve Stedman)这三位研究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是他们帮助我表述了写入第六篇中的思想。布伦达·麦克莱恩(Brenda Mclean)也为准备这一版作了相当多贡献。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因为该社允许我把1977年收入约瑟夫·本戴德(Joseph Ben-Daid)和特里·N.克拉克(Terry N. Clark)所编《文化及其创造者》一书的一篇文章,纳入本书的第十五章。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1981年1月

注 释*

1. 这里论及的许多问题,我另有详细论述,见我的论文集, Seymour Martin Lipse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Social Structure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Anchor Books, 1968), 特别见 Part 3,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Politics” 和 Part 4, “Political Cleavag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另见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Dialogue o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一书中我写作的部分。

2. William H. Flanigan,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2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1972); Bruno S. Frey, “Why Do High Income Peo-

* 王庆洲、王留栓两先生参与了本书注释部分的翻译。谨此致谢! ——编者

ple Participate More in Politics?" *Public Choice* 11(Fall 1971):101—105; Norval D. Glenn and Michael Grimes, "Aging, Voting, and Political Inter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August 1968):563—575; Lester W. Milbrath and M. L. Goe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2d ed.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Raymond E. Wolfinger and Steven J. Rosenstone, *Who Vo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hn F. Zipp and Joel Smith, "The Structure of Electo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July 1979):167—177; Jurg Steiner, *Bürger und Politik: Empirisch-theoretische Befunde über die 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der Bürger in Demokrati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chweiz u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l. 4 of *Politik und Wähler* (Meisenbeim am Glan: Verlag Anton Hain, 1969).

3.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Politics of Academia," in David C. Nichols, ed., *Perspectives on Campus Tension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70), pp. 85—188; Lipset, "Academia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in T. J. Nossiter et al., eds., *Imagination and Precis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72), pp. 211—289; Lipset and Richard Dobson, "The Intellectual Rebel: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aedalus* 101(Summer 1972):137—197; Lipset, *Rebellion in the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hoenix edition, 1976); Lipset,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at Harvard, 1636—1974," in Lipset and David Riesma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t Harvard*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75), pp. 2—278; Everett C. Ladd, Jr., and Lipset,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s," *PS* 4(Spring 1971):135—149; Lipset and Everett C. Ladd, Jr.,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Sociolog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July 1972):67—104; Everett C. Ladd, Jr., and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76).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人和民主秩序*

“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p. 1129)

“一切人本性上都嵌有社会本能,但第一个提炼出这一点的人,是最伟大的施主。人,当其向善向美时,是最好的动物,而当其背离法和正义时,则是最坏的动物;鉴于有武装的非正义是最危险的,而人一生下来就装备有武器,意指通过智力和善德使用的武器,所以他有可能用这些武器于最坏的目的。因此,倘若人没有善德,他就是最邪恶、最野蛮的动物,最富色欲和食欲的动物。然而,正义是国家之中人与人之间的黏合剂,因为实施正义,即确定什么是正义的,乃是政治社会中秩序的本原。”(p. 1130)

“那时,对聪明人来说,参加这次单独举行的集会的任何成员,肯定都是卑微的人。但是,国家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由于全体宾客出力办的宴会比单独一个人办的宴会要好,所以对许多事情作判断,多数人胜于任何个人。再者,多数人比少数人不容易受腐蚀;这就犹如水,多量的水比少量的水不容易变质。”(p. 1200)

“因此,显而易见,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的公民构成,而这样的国家很可能管理有方;在那里,中产阶级是大的……因而,一个公民拥有适中而充足财产的国家,其好运是长久的;在一些人占有极多,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的场合,可能出现一种极端的民主,或一种纯粹的寡头统治;在这两个极端——即最不能控制的民主和寡头政治——之外,还可能

* 引文据“*Politica*”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i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Richard Meke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出现暴政；不过，这不太可能由中产阶级政体及与之相近的政体产生……与寡头统治相比，民主政体比较安全，也比较长久，因为它有人数较多的中产阶级，而且中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没有中产阶级，而穷人大大过量的场合，麻烦出现了，国家很快会走到尽头。”(pp. 1221—1222)

“……在以法为准绳的民主政体中，最好的公民占据头等的位置，没有蛊惑人心的政客；而在法没有至上地位的场合，蛊惑煽动者不胫而走。倘若人民成为最高统治者，则多数人合为一体；而多数人手握权力，不是作为个人，而是集体地……无论如何，这种民主政体现已成为一种君主制，不再受控于法，它寻求行使君主的统治，造就暴君；阿谀奉承者得享显荣。”(p. 1212)

“存在多种政体的原因在于，每个国家都包含多种成分。首先，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都由家庭组成，而在公民中，一定有的富，有的穷，有的中等……普通的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匠人。达官显贵也有财富的不同，还有等级和荣誉的差别……显然，必然存在性质上不同的多种政体，因为组成政体的成分在性质上互不相同。政体是一种官职的编制，所有公民都把这些官职在自己人当中分配，或者根据不同阶级如富人或穷人所拥有的权力，或者根据包括穷富在内的某种平等原则。”(p. 1208)

“……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自己的其他人是相同的；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pp. 1236—1237)

1959年版序

从“社会学”一词首次用于社会关系的系统研究时起，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就是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没有社会学家能设想社会研究不把政治系统作为分析的主要内容。而且有些政治学家还认为，特别是近些年，有时与其他学者一道也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说，仅仅研究较一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关系的特例，不可能研究政治过程。那些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后三个学科的每个学科现在都是研究政治学的公认的分支学科）领域研究政治行为的人，日益加强合作，以及采用共同的概念和方法，是社会科学基本统一性的新证。而按照实际上关心的问题，则不能富有成果地把对社会中人的研究划分成几部分。

本书是为下列读者写的：对政治有广泛兴趣的人、学术研究者、大学生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有些读者可能主要对政治行为的起因和结果感兴趣，另一些读者可能关心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我相信本书的处理方法会使这两部分读者都感到满意：把某些方法论的讨论放在有关章的附录中（见第二章和第十二章），便于那些不感兴趣的读者跳过去。

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作为社会系统之特征的民主。探讨的主要论题是：在社会和组织中实施民主的必要条件；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特别是他们作为选举人的行为；支持或威胁民主制度之价值和运动的力量源。

这些政治社会学问题的研究，本来并不想把我偶尔写的文章汇集出版，相反，我曾试图从我的各种文章中，选出那些最能说明社会学家对理解民主政治系统所作贡献的东西。这样做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仅从已

有的文章编一本书,会给读者带来困难,因为它省去了许多逻辑上应当探讨的问题。我设法通过专门为这本书写一些文章和全面改写另一些文章来弥补这个不足。在作了这些修改增补之后,我打算写一本完整的书。

由于这本书比我以前发表的东西更能说明我的基本理性关注和个人价值,所以我想在此向几位给我重大帮助的人表示感谢是适宜的。这些人当中特别要提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位老师和前同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我受惠于罗伯特·林德的是,他使我巩固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有社会意义的信念。罗伯特·默顿是使我和其他许多人懂得了社会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真正力量,以及社会学激动人心的理性前沿。从社会科学领域最卓越的逻辑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那里,我学到了分析与实证说明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如此基本、如此重要,以致要写许多书去阐发它,幸而这样的书,拉扎斯菲尔德已在写,或鼓励别人写。我还想在此向我的另一些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在不同时间对于激励我的兴趣也起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胡安·林茨(Juan Linz)对我的帮助,或许更多是在理论方面,我们一起工作多年,比其他任何人时间都长。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在许多问题,包括如何组织本书内容这个决非不重要的问题上,给了我明智的忠告。我的同事和前学生罗伯特·奥尔福德(Robert Alford)在修改校对方面帮了大忙。道布尔戴出版社的安妮·弗里德古德(Anne Freedgood)在本书的条理和风格上为我作了很多工作。此外,给我帮助的还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内森·格拉策(Nathan Glazer)、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威廉·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利奥·洛温撒尔(Leo Lowenthal)、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马丁·特罗(Martin Trow)和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

六、七、八这三章值得特别提一下,因为它们之写成,原始材料部分得自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保罗·拉扎斯菲尔德、艾伦·巴顿(Allen Barton)和胡安·林茨合写的一篇题为《投票心理学》的文章;这篇文章已收入加德纳·林赛(Gardner Lindzey)编的《社会心理学手册》第2卷

(Cambridge: Addison-Wesley, 1954)。不过,我对这篇文章作了重大改动,既删去了一些内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不认为让他们为出于我的兴趣和本书需要而与他们无关的改动承担责任是合适的。然而,重要的是,这三章的主要理论框架和资料收集是我们合作的结果。

本书提到的许多经验概括是基于不同国家一些研究组织所作的民意调查分析。有一些这样的机构满足了我的兴趣,让我能够复制记录它们研究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数据卡,或向我提供它们档案中未发表的数据表。我要向如下给我这种帮助的个人和机构表示深深的谢意:赫尔辛基大学埃里克·阿拉特(Erik Allardt)教授和芬兰盖洛普民意测验;P. 卢扎托·费吉斯(P. Luzzatto Fegiz)教授和意大利米兰“DOXA”研究所;阿兰·吉拉尔(Alain Girard)博士和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法国民意研究所的让·斯托佐尔(Jean Stoetzel)和路易斯·安吉尔比(Louis Angelby);澳大利亚民意测验的罗伊·摩根(Roy Morgan);埃里希·赖格罗斯基(Erich Reigrotzki)博士和设在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隆研究所;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博士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的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荷兰民意研究所的简·斯塔佩尔(Jan Stapel)博士。

关于可供利用的材料,本书只提到了一小部分。更多的材料见我与胡安·林茨合写的《西方民主中内部分歧的社会基础》(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1956 年油印稿)。修改这份手稿涉及大量不同政治行为的比较。

本书大部分内容以前以论文形式见于各种期刊和论文集。感谢这些期刊和论文集的出版者和编者允许我为本书照原样或修改使用这些文章。它们是:

“Political Sociology,” in *Sociology Today*, Robert K. Merton, Leonard Broom, and Leonard Cottrell, ed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pp. 81—114.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pp. 69—105.

“American Intellectuals: 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Daedalus*, 88

(Summer 1959), pp. 460—486.

“Democracy and Working-Class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1959), pp. 482—502.

“Socialism-Left and Right-East and West,” *Confluence*, 7(Summer 1958), pp. 173—192.

“The American Voter,” *Encounter*, 7(August 1956), pp. 55—62.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anadian Forum*, 35(1955) 170—171.

(With Paul F. Lazarsfeld, Allen Barton, and Juan Linz) “The Psychology of Voting: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G. Lindzey, ed., Vol. II (Cambridge: Addison-Wesley, 1954), pp. 1124—1170.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rade Unions: A Theoretical Statement,” in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y*, Morroe Berger, Charles Page, and Theodore Abel, eds.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 1954), pp. 82—124.

我先后工作的两个研究机构为我提供了研究和行政帮助,以及令人鼓舞的研究环境,对我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起初是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我在那里时该所由查尔斯·Y.格洛克(Charles Y. Glock)教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领导;最近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业关系研究所,该所分别由阿瑟·罗斯(Arthur Ross)教授和玛格丽特·戈登博士担任正、副所长。前一机构特别对整理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感兴趣,本书第一、六、七、八、九章中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它支持下,用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列入政治行为类研究项目表的资助完成的。¹(这项资助是向一个学科间小组提供的,成员包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赫伯特·海曼、戴维·杜鲁门,由我任组长。)

伯克利工业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工业化和各种分层系统对不同国家的劳工运动、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状况和职业阶层政治行为的影响。本书其余各章原始论文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这个所发起,利用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资助完成的。此外,我还要感谢我1955年至1956年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当

研究员度过的一年；这一年使我摆脱了各种责任，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本书提出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是出自我的研究助理之手，他们是：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艾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里纳·卡茨内尔逊(Rena Katznelson)和卡洛斯·克鲁特博希(Carlos Kruytbosch)。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1959年5月15日

注 释

1. 除我的著作外,这个项目的另两部论著:Herbert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目 录

导读：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 I 公治之
1981年版序 / XIII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人和民主秩序 / XVII
1959年版序 / XIX

第一章 政治社会学 /1
 学术背景 /2
 阶级冲突与共识：马克思与托克维尔 /3
 官僚政治与民主：韦伯与米歇尔斯 /6
 当代的研究 /8

第一篇

民主秩序的条件

第二章 经济发展与民主 /21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23
 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 /30
 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的政治问题 /34
 方法论附录 /36

第三章 社会冲突、合法性和民主 /47
 合法性和有效性 /47

合法性与冲突 /51

政体 /56

当代的挑战：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57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 /64

民主与下层阶级 /67

极端主义宗教与下层阶级 /69

下层阶级的社会状况 /71

下层阶级的视野 /75

集权主义者的塑造 /78

集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假设的检验 /79

历史模式和民主行动 /82

第五章 “法西斯主义”——左、中、右 /95

“法西斯主义”与中产阶级 /97

德国 /101

奥地利 /109

法国 /111

意大利 /118

美国：麦卡锡主义——人民党极端主义 /120

庇隆主义——下层阶级的“法西斯主义” /123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125

第二篇

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

第六章 选举：谁投票，谁不投票？ /139

政府政策对投票的影响 /143

接近信息对投票的影响 /146

群体压力对投票的影响 /151

交叉压力对投票的影响 /153

结论 /161

- 第七章 选举：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 /174**
投票支持左翼：对群体要求的响应 /181
影响投票支持左翼的社会条件 /191

- 第八章 选举：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
——连续性和变化 /209
世代与政治行为 /209
投票模式的历史背景 /213
结论 /219

第三篇

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

- 第九章 美国政治中的阶级和政党 /229**
党的支持者决定党的政策 /235
上层阶级的自由主义 /237
一党州的影响 /240
政治的国家化 /241
- 第十章 美国的知识分子：政治态度与地位 /251**
美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 /253
自由主义的根源 /256
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 /259
知识分子与知识界 /261
人数问题 /264
政坛上的知识分子 /266
反知识主义与美国的价值 /267
向右转 /270

第十一章 一党南方的出现
——1860年选举 /282

第四篇 民间机构中的政治:个案研究

- 第十二章 工会中的政治过程 /293
- 官僚政治的必要性 /294
 - 工会内部的沟通 /297
 - 政治技巧的垄断 /299
 - 工会领导人的社会地位 /301
 - 会员参与 /305
 - 时限因素 /308
 - 价值体系 /317
 - 结论 /320
 - 方法论附录 /323

第五篇 结束语

-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终结了吗? /331

第六篇 《政治人》1981年增订

- 第十四章 反思和最近的发现 /347
- 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 /347
 - 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 /353
 - 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 /357
 - 法西斯主义和对现代性的反叛 /364
 - 投票行为和后工业社会中的民主式阶级斗争 /373
 - 结论 /384

第十五章 意识形态的终结：概念及其历史 /395

出处 /396

最近的表述 /398

对学生造反的态度 /402

肯尼迪的表述 /406

对新政治的预测 /408

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 /413

经验分析 /416

结论 /418

第一章

政治社会学¹

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听起来或许令人感到惊奇,稳定的民主要求冲突或分歧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维护“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力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民主。因此,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歧和共识的根源上。

分歧,在其合法的场合,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统一。例如,工会有助于在较大的主体政治中使会员统一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效忠国家制度的基础。把工会和工人政党作为对革命力量的推动因素加以强调,是不正确的。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阐明的,明确地说,在那些工人可以建立强大的工会,政治上可以发言的国家,瓦解性的政治分歧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各种研究表明,那些承认合法的内部反对派的工会比那些独裁的、看上去统一的组织,拥有更多的来自其成员的忠诚。对社会或组织所承认的宽容准则达成共识,常常是基本冲突发展的结果,支撑这种共识需要冲突的继续。

本书力图通过对一些领域的探讨,为理解民主的政治制度作出贡献。这些领域是:美国和其他民主社会中民主制度和不同类型政治冲突的社会必要条件,特别是选举分歧;反民主趋势的一些具体原因;政治参与的渊源;美国和其他国家党派合作的社会基础,以及决定工会政治生命的条件。为了对研究这些题目所依据的社会学基本原理有所了解,首先考察一下对于现代社会认识的演变是必要的。

学术背景

预示现代社会来临的16—18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危机也带来了政治社会学。传统社会的瓦解第一次公开暴露了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如何才能面对它的成员和团体中不断出现的冲突,继续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17世纪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与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分裂,使人与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一目了然。这些区别既是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有些人开始对这种合法性表示怀疑,也有些人对其完全加以否定。在17世纪,博丁(Bodin)第一次系统表述了国家对境内其他机构拥有统治权的原则,以证明国家至上的合理,特别是在一个宗教冲突的时代。许多哲学家,其中包括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卢梭(Rousseau),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达成能够替代中世纪宗教解释和沟通社会与国家之间鸿沟的世俗共识的必要性。

19世纪政治社会学的前辈接过了这个论题。圣西门(Saint-Simon)、蒲鲁东(Proudhon)和马克思等人站在社会一方:在他们看来,社会是必须加以强化和巩固的组织,而国家必须给予限制,受社会控制,或者加以废除。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洛伦茨·冯·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等人站在另一方,他们认为答案在于,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要从属于国家的统治权。

政治社会学似乎超越了这种争论,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两难推理的解答,像其他同样多的解答一样,似乎也是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错误在于把国家和社会视为两种独立的组织,问哪一个更重要或更可取。政治社会学家现证明,国家只是多种政治机构中的一种,而政治机构也只是多种社会机构群中的一种;机构与机构群之间的关系是一般社会学的课题;政治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的特殊领域。在与政治学家辩论政治社会学范畴时,社会学家认为,孤立地研究国家和其他政治机构毫无理论意义。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或许是当代主要的社会学理论家——曾指出,政治学的研究不能“用特别专门的概念框架来处理……严格地说,社会系统的政治问题,重点是把该系统分析上区分的所有成分加以综合,而不是对这些成分的某种特别分出的类加以综合”²。

从社会学观点看,国家的支持论者与社会的支持论者之间的争论可以结束。然而,虽然这方面的争论不再提“国家”和“社会”,但一个更基本的两难推理,即冲突和共识之间的平衡问题,又在继续。这正是本书探讨的中心问题。

直到最近,社会学家一直偏重于研究分歧产生的条件,而不注重研究决定政治共识所必需的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考虑到四位伟大的欧洲人,马克思、托克维尔(Tocqueville)、韦伯(Weber)和米歇尔斯(Michels),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构成了政治社会学的基础,就会比较清楚了。

阶级冲突与共识:马克思与托克维尔

法国大革命以后,冲突和共识的问题成了焦点。革命党人自然首先关心推进冲突,而保守党人意欲保持社会的稳定。但多年来几乎没有人分析冲突和共识一度或可能保持平衡的条件。

把冲突视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旨趣的最雄辩的发言人是卡尔·马克思,正如本书后面大量分析所指出,他对冲突的原因有许多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则是民主政治涉及冲突力与共识力之间平衡这一思想的第一个主要阐释者。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以不断的冲突为特征(即使受到压制),或者以保持共识为特征,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他把冲突和共识与其说视为两种可能平衡的相悖的趋势,不如说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方面,他设想共识、和谐和一体化将出现在共产主义的未来(某种程度上也曾出现在共产主义的往昔);另一方面,他把冲突和专制主义看作是古代原始共产主义与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对未来和谐社会的看法与他的社会学观有显著关系。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就经济生活领域角色的差别消失而论,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³

这段话不仅仅是马克思对于乌托邦未来的幻想。就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抗真正解决而言……”⁴它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就是产生差别的一切社会根源的消失,甚至包括城乡差别。⁵

因为在一个由剥削阶级统治的分层社会,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不能设想前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团结一致的理由。他的主要兴趣是分析相互冲突力强度的因素。不过,他从来不真正对理解心理作用过程感兴趣,而个人利益正是通过这种作用过程加以约束的,即使对增强阶级实力来说。马克思在他年轻时写的一段有趣文字中,以黑尔格式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

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⁶

但是,马克思从未试图回答这个问题。⁷他基本上不关心扶持增进稳定性和凝聚力的机构和价值观的社会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约束不是履行社会的必要功能,而是支撑阶级统治。

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为共产主义下的民主政治留有余地。只存在两种互相排斥的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第一种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本来就是对人类尊严的破坏,必须予以摧毁。第二种类型消灭了冲突的根源,所以不需要民主制度,如免遭国家权力侵害的各种防范措施、权力的分割、对司法保障、宪法或“权利法案”的保护。⁸俄国革命的历

史已经证实运用某种只涉及不存在之理想型——亦即完全和谐的社会和不断冲突的社会——的理论，所带来的某些可悲后果。

乍看起来，托克维尔的理论似乎类似于马克思，因为两人都强调社会单元的相关性和单元之间冲突的必然性（对马克思来说，单元是阶级；对托克维尔来说，单元是地方社团和民间组织）。然而，与马克思不同，托克维尔有意选择社会单元的那些能同时维持政治分歧和政治共识的方面加以强调。他不设想和谐社会出现在未来，同时也不急于把社会一体化的根源和分歧的根源分开来。同样的单元，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议会和总统，其功能是互相独立的，所以在紧急状态也互相依赖，由政党加以维系。民间团体对政府有约束作用，也是人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简言之，它们是产生和维持民主社会所必需之共识的途径。

托克维尔对多元政治体制的关注是出自他对现代社会趋势的解释。工业化、官僚主义化和民族主义，使下层阶级卷入政治，也损害了较小的地方权力中心，同时集权于国家有权势者。托克维尔担心社会冲突可能消失，因为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国家，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⁹因为没有支撑竞争的社会基础，不再有政治竞争者。他还担心共识在大众社会也可能受到损害。如果不参加政治上重要的社会团体，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也不会有足够的兴趣参与政治，甚或完全接受统治。政治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冷漠损害了共识，冷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态度；托克维尔把这种国家视为工业官僚社会的结果。

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研究使他想到了两种组织形式可以抵御新的有权势者：地方自治组织和民办组织。在他看来，个人参加这样的组织似乎是民主制度稳定的条件。由于在本组织成员中传播思想和确立共识，这两种组织可以成为某一组织与另一组织间冲突的基础。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限制了中央的权力，并造就了与中央权力相抗争的新的自主的权力中心，还有助于培养潜在的反对派领导人的政治技巧。¹⁰

尽管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有不同的评价，但他俩的思路并没有产生矛盾的分歧。马克思说宗教是“民众的鸦片”，这是对宗教的整合功能的承认。托克维尔也承认宗教的“麻醉”性：“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另一种形式。”¹¹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下层民众幻觉的根源，是使他们适应生活中的命运，阻止他们认识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的工

具。与之相反,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信仰的需求与政治自由正好成正比。对一个社会来说,政治组织的强制性和独裁性越小,要促进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行动的限制,就越需要宗教信仰系统。

官僚政治与民主:韦伯与米歇尔斯

如果把一个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分歧和共识的人与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名字相联系,那么另一个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官僚政治的人就要被认同于马克斯·韦伯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工作。当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官僚政治是确立和维护共识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破坏一体化的主要力源之一。

强调共识和阶级冲突的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与关注官僚机构恪守或扬弃价值标准的韦伯和米歇尔斯之间的区别,代表着对工业革命后期社会思潮的调整。许多19世纪的社会哲学家忧虑工业革命对社会的破坏作用,怀疑实现民主政治结构的可能性。像马克思一样,有些人相信或希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本来就不可能在以经济竞争和追逐利润为特征的城市工业社会中出现,他们要寻求一种新的、比较稳定、比较道德的制度。相反,一些20世纪的思想家——在他们中间韦伯和米歇尔斯是值得注意的——撇开了经济制度(以所有制和占有生产资料为界定)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再是改造或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变革,而是出现官僚化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由于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退回到小生产者的公社是可行的,所以问题变为:在官僚化社会中何种制度上的安排是合理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反对者很早以前就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结束它所抨击的许多罪恶。然而,韦伯和米歇尔斯在这第一批反对者当中却是以此为基本前提进行研究:现代政治问题不在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官僚政治与民主的关系。韦伯把官僚化视为所有现代社会固有的制度形式。¹²而在米歇尔斯看来,寡头统治——由一小撮钦定自己接班人的人进行统治——是所有大组织共同的管理方式。他俩都试图证明

社会主义的组织和社会,已经或必将像资本主义的组织和社会一样,成为官僚的、寡头的。

韦伯对官僚政治的兴趣主要不在政治上。他认为官僚机构的出现是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必要条件,这导致他把官僚化视为制度变革的极重要原因,因而也是对现存凝聚力的威胁。如帕森斯所指出:“粗略地看,官僚政治所起的作用之于韦伯,一如阶级斗争之于马克思,竞争之于桑巴特。”¹³不过,韦伯对民主社会中官僚政治的一体化方面给予了极大重视;例如,官僚政治先于法,先于权把一视同仁的标准传给全社会,而且对于选拔和升迁采用成就标准。

在分析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时,韦伯认为,控制法律的实施是获得选民信任的政治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官僚政治掌握日常的权力行使,甚至在选举斗争以及议会辩论和决策中也能发挥作用,但是倘若不把这种权力转变为对行政实施的有效控制,权力就会不起作用。”¹⁴对于官僚化日益发展对民主和自由的最终影响,韦伯是比较悲观的。像托克维尔一样,他也担心超国家的出现最终会导致正当法律程序和法治的失落。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官僚的权力延伸到全社会,导致“官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将是一个“到处都是匍匐在小事上,努力向上爬的小配角、小人物的”世界。“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推进和促进它(官僚统治状态),而是我们能对这部机器作些什么反抗,以使人类的一部分免遭它对灵魂的肢解,摆脱官僚生活方式的最高主宰。”¹⁵

同样,米歇尔斯也对维护或削弱民主的因素感兴趣。在剖析政党和工会时,他注意到大型组织中有一些固有的因素,它们使这种组织由其全体成员加以控制在技术上几乎成为不可能。¹⁶他论述了任期制领导人控制组织的优点,普通成员的政治能力,他们持冷漠态度的原因,以及终身制领导人承受的压力。另外,他还看到在官僚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寡头统治模式已扩展到被这类政党所控制的社会。第十二章关于工会内部政治活动的论述,主要是试图把米歇尔斯的某些思想系统化。

韦伯和米歇尔斯关于官僚政治和民主的理论,以及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关于冲突和共识的理论,构成了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本章第二部分将讨论由这些基本问题引出的某些当代工作。

当代的研究

投票

投票是民主社会中达成共识的关键机制。然而，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中的选举研究一直很少被看成是共识研究。选举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是关心冲突双方两种形式——一方的形式是政党，另一方的形式是阶级、职业、宗教、种族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些因素主要在作用上看作是政治冲突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政治共识的社会基础。

这里所说的有关选举行为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我们在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制度时的一些重要空白。因为从这个角度考虑，诸如保守的工人或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现象不仅是偏离了阶级模式，而且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¹⁷ 稳定的民主政治要有一种条件，即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有来自多种居民层次的支持者。如果在一种制度中，对不同政党的支持与基本社会分层的对应关系过于分明，这种制度就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运行，因为它反映的冲突状态是如此强烈，如此明确，以致不能实现妥协和解。在政党得不到主要阶层支持的场合，它们丧失了要求妥协的主要根据。此外，重要的还在于，政党有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以便象征性地表现他们与多种团体的关系，即使他们几乎没有来自其中某些团体的支持。一些拥护共和党的组织，虽然其大多数成员近年投民主党的票，但还是提名黑人和犹太人为候选人，这一事实无疑有重要的整合作用，同时也减少了政党沿袭种族隔阂或宗教隔阂界限永久化的可能性。同样，某位哈里曼或迪尔沃斯出现在民主党领导层中，或某位克里普斯或肖克罗斯出现在英国工党领导层中，也会导致保守的上层阶级接受下层阶级政党执政的政府（见本书第三章）。米歇尔斯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时指出，党内缺乏上层阶级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不承认它是合法的反对党的原因。¹⁸

通过组织途径对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和党内分歧的问题，也值得研究。

关于投票行为研究的成果将在第七章论述。这种研究表明,多组织联盟的关系或对多组织的忠诚可以导致交叉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大大“偏离”某一组织主模式的情况。受到压力被迫表现不同政治倾向的个人,或者逸出常轨,或者“陷入冷漠”。多组织的自居心理有削弱政治选择情感的作用。另外,在美国和英国,虽然投共和党或保守党票的体力劳动者在经济问题上不比支持民主党或工党的工人心胸开阔,但却比各党的中产阶级支持者要开明。¹⁹每个主要政党都有相当部分的选民认同于其他党的价值标准,这一事实迫使每个党的领导人当其执政时向另一党作出让步,而在其在野时,则向其支持者提出希望得到急需的支持。

同样,政治参与问题也可以从不同角度看,这取决于你是关心分歧,还是关心共识。相信高度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²⁰正如德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事件所证实的(见第五章),参与水平的提高也许反映了社会凝聚力的衰退和民主程序的崩溃,而稳定的民主或许靠的是普遍相信选举结果不会造成社会的太大分歧。民主制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社会可以有维护民主制的“充分的”参与,而不引入削弱社会凝聚力的分歧根源?²¹

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要指出,民主制越有凝聚力,越稳定,社会各阶层越可能以同一态度对主要刺激因素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形势有利于左翼意见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会在生活富裕的人和工人这两部分人中得到选票,尽管他们的力量在社会上层仍然比较弱。同样,在右翼居统治地位的时期,保守派的得票数在比较穷的阶层中将会增加。相反,共识水平较低说明,主导政治势力只在它起初依靠的社会阶层中扩展——如左派在工人中,而反对势力则在其他阶层中,即右派在中产阶级中不断增长。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革命的那种情况,如第五章所指出,这种情况曾出现在 1933 年前的德国以及 1917 年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²²研究美国投票行为的历史变迁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州在变,国家也在变。”美国社会的基本凝聚力证实了这一点。²³因此,通过分析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选举行为沿同一方向发生的变化,有可能研究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一段时期政治凝聚力的大小。

曼宁·多尔(Manning Dauer)的《亚当斯联邦主义者》²⁴是最近论及

共识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该书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了1800年前后选举中联邦党的衰败和杰斐逊的胜利。虽然多尔论证了两派当时的分歧，但这些不是他关切的中心。确切地说，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当时两党制会失败。如第九章所述，他指出联邦党之所以会衰败，是因为汉密尔顿和该党的右翼不理解民主政治的竞赛规则，即为了保持大党的地位，必须呼吁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联邦党人过于看重城市商人的要求，疏远了他们的乡村支持者，这在一个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必然导致大党地位的丧失。

在调查1948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选民的分歧和社会差别时，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个社会学家²⁵注意到两党的选民对一些问题有一致意见。例如，他们在什么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上一致；对其中某些问题，特别是国际主义和公民权问题有一致看法；对战争和萧条一类重要事件有共同的预期；对评价候选人的合理标准、选举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指导民主程序的竞赛规则有一致认识。²⁶

政治运动

研究改革运动和极端主义运动是美国政治社会学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领域，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将介绍我们关于其中某些运动组织的知识。这看起来似乎是多余的，但美国社会科学家像欧洲社会科学家一样，对改革运动和极端主义运动的兴趣一直比对传统的保守党派兴趣大得多。²⁷在图书馆的书目中，“英国工党”的条目比“保守党”的条目多得多。许多美国人研究过英联邦各部分的工党，但几乎无人写过关于保守党的书或文章。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合作社已证明是美国学者大有兴趣的所在，然而却几乎无人——即使有也极少——过问那里的非社会主义党派。保守运动、保守力量、保守的政治哲学家如伯克(Burke)、博纳尔德(Bonald)和德梅斯特(De Maistre)，以及一体化和凝聚力的问题，实际上在不久以前一直受到冷落，无人问津。

同样，对法西斯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大多强调产生和支持极端主义的因素，而不是强调那些在稳定的民主制中抵制极端主义的因素。在美国，我们对威胁公民自由的根源进行研究，对产生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根源进行研究，也对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组织和50年代麦卡锡所使用

的信条和口号进行研究,还对威胁人民党意识形态固有的“正当程序”进行研究。²⁸然而,对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抵制左、右两种极端的原因,却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可是就过去的经济情况而论,这次萧条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比对德国以外的任何西方国家都大。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提供的材料详细论及了这些问题。

官僚机构的政治

韦伯对官僚机构和权力作为大型正规组织的要素的强调,以及他对官僚组织固有的基本特性的系统分析,在大量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²⁹但是,政治社会学几乎不注意他对集中制官僚国家权力的产生与民主的丧失这两者关系的分析,甚至连他关于官僚和民主的基本著作也几乎没有翻译过来。信奉韦伯假说的学者,无论明的,还是暗的,在术语的特定意义上,都把官僚机构的研究与政治组织的研究分开,而把其他各种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如医院、商业公司、工厂、教会和工会等。如韦伯本人所承认,这些研究表明,官僚组织内存在导致背离官僚统治理想——“合理的效率”、“等级制”和“中立性”——的、由系统本身决定的、无休止的张力和冲突。换言之,权力要求与官僚化之间的张力不仅存在于政治组织与社会之间,而且存在于一切组织自身之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医生与医院管理人员的冲突、撰稿人与报刊编辑的冲突、教授与大学管理人员的冲突、企业和政府的职员与第一线人员的冲突。事实上,在目标和程序上发生冲突是一切组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美国国务院、红十字会、苏联共产党,还是公司的销售部。

韦伯对官僚机构政治中立性的分析,即官僚机构的成员是公正的专家,而不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准则,是得自对民主政治制度必备特性的精心考察。这个准则使执政者变更期间民主政府的延续成为可能。由于允许政府的工作人员独立于暂时在位的政治家的人格和政策,所以政府的官僚性质减少了党派冲突的紧张情势。从政治领域到行政管理领域,减少冲突的功能是官僚机构固有的。解决冲突必须以一些客观标准为基础,对这种必要性的不断强调使得官僚机构有可能扮演调停的主角。³⁰因此,在许多方面,要求推行官僚准则和官僚惯例的压力有助于强化民主共识。³¹

民间组织的内部管理

与韦伯不同,米歇尔斯对后来的研究几乎没起过什么鼓舞作用。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被用于叙述意义,或用于论战,指斥一些组织是反民主的。美国社会学家认为,根据政党生活的差别——比如说,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生活与米歇尔斯在《政党》一书中所述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生活的差别——考察他的寡头政治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是不值得去花时间的。这是因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美国的政党显然以不断的派别斗争、频繁的领导人更替和缺少中央权力结构为特征。在美国,只有工会或职业协会一类利益组织具有类似于米歇尔斯视为政党必备之结构的内部结构。³²

大型组织中寡头统治的存在提出了一个问题:各种民间团体是否民主的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它们作为社会政治凝聚力之媒介的有效性?托克维尔论述过各种由少数人组织起来并由他们控制的团体对维护民主政治的张力和共识的贡献,后来也有些人论证没有内部民主并不要紧,因为民间组织为了生存必须受到约束以履行一种本质上具代表性的职责。例如,人们曾指出,联合矿业工会领导人约翰·刘易斯,虽然他在自己的组织中是位独裁者,政治上是共和党人,但他领导工会采取罢工和集体谈判策略,像世界其他地区的左派劳工领导人所进行的那些斗争一样富于战斗性。另一方面,有大量证据表明,民间团体的成员往往绝少反对他们痛恨的政策。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中是如此,在英国医学联合会中也是如此,虽然1944年对该联合会成员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支持其领导人强烈反对的公费医疗制度的不同方面。³³

为民间组织中的寡头统治进行辩解的主要理由是:(1)它能使组织在与其他团体发生一般性的社会冲突时更好地发挥其特有的战斗作用,或更有助于得到政府的让步;(2)组织内部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结构性基础(如在代表一个单一利益集团的工会中)。然而,一份最近的工会问题研究报告表明,组织内部的民主和冲突,犹如更大社会中的民主和冲突,可以有助于增加凝聚力和团结³⁴,因为在一党制中,无论是在文明社会,还是在工会,对管理动机的厌恶往往导致拒斥整个制度,原因是这种制度难以对永久统治者和组织本身加以区别。相反,在有执政者更换的民主制中,组织成员和公民可以谴责在任当权者的任何具体罪恶,从而保持对组

织的完全忠诚。因此,在具有合法多党制的组织或国家中,将比在独裁的组织或国家中,看到更多的忠诚,较少的背叛。

一体化机构

倘若把民主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形式来研究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任务,那么显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推敲和调查。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许是第三章要讨论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公民对政治制度的公认程度。大多数社会学家同意,稳定的权威是权力加合法性。但是在政治制度的分析中,使用合法性的概念几乎没做过什么工作。

甚至像宗教与国家共识之间这样的基本关系,一般都是假设的,而不是经过查证的。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就说过,美国是一个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信宗教的国家;他还指出,在美国的宗教虔诚与它的民主机构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今天,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在长期信奉非宗教主义的尾声,正在重新发现宗教的力量。有些人现已准备接受宗教是稳定和民主的主要根源的假设。然而,这种不加批判的讴歌宗教社会功能的倾向,对于认识宗教的作用,可能会像以前宣传它的反社会性一样毫无收获。有证据(见本书第四章)表明,宗教,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宗教派别,已经起了功能上替代政治极端主义的作用。在大萧条时期,当有组织的激进主义在美国几乎毫无进展时,小的宗教派别却迅速发展。³⁵另一方面,最近的资料显示,那些高度笃信宗教的人往往是政治上最不宽容的人。³⁶显然,像把宗教作为公众争论中分歧的根源继续进行传统分析一样,宗教与民主机构的力量消长关系也有更深入研究的余地。

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机构是否可以根据其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特征加以分等和分析的问题。³⁷如果我们考察大型机构,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大型经济机构虽然因为“生产过程……要求各种不同部门的‘合作’或一体化”³⁸而使其成为社会一体化的首要根源,但这种机构也是最分裂的,最离心的。

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家庭制度占据相反的一极:它是一体化的典型形式。第二种最强大的一体化力量,如已指出,常常被认为是宗教,因为宗教多半可以通过转移人们对分层制度的注意和使人们适应他们生活中的命运,改善由这种制度引起

的扭曲。不过,在许多社会中,宗教也是造成相当程度紧张的根源。按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机构既可以加剧分歧,也有助于一体化。一般地说,分层制度在那些地位低的人当中产生不满情绪,因而是分歧的一个根源,但是这种制度也是使人们各得其所、激励他们恪尽职守的主要手段。例如,把工人阶级的团体组织成工会或工人政党,可以为冲突的表达方式创造一种机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它可以通过为工人提供一种获得他们需求的合法手段而把他们纳入主体政治。

研究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转变也是必要的,特别是研究他与其他精英分子和权力集团的关系,研究他作为问题定义者的作用。³⁹ 教师、专业人员和有创造才能的艺术家不满意他们在政治领域所扮角色由来已久,他们的判断往往要被各种议会的委员会和许多企业领导人侵吞。正如我在第十章力图指出的,一个国家教师和知识分子所持价值标准是这个国家的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源。

从根本上说,本书旨在指出,政治社会学应当回到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民主政治的社会必要性和社会后果。而且我认为,本书将证明,恰如其分地探讨这种问题的任何尝试都迫使我们选择他所成功地使用过的方法:比较分析法。

注 释

1. 关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有许多文献报道很有意义。关于政治学的最近几种文献是:R. Bendix and S. M. Lipset, "Political Sociology—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Current Sociology*, 6(1957), pp. 79—169; Joseph R. Gusfield, "The Sociology of Politics," in Joseph B. Gittler, ed., *Review of Sociology*(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pp. 520—530。重要研究的摘要有: Robert L. Lane, *Political Life*(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和 Heinz Eulau, Samuel J. Eldersveld, and Morris Janowitz, eds., *Political Behavior*(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2.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ology System*(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1), pp. 126—127.

3.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 2.

4. 引自《神圣家族》法文版,见 G. Gurvitch, "La Sociologie du jeune Marx,"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4(1948), p. 25.

5. Karl Marx, *op. cit.*, p. 44.

6. K. Marx, "Ideology—'Saint Max'", *Gesamtausgabe*, I, 5, p. 226, 引自 *The German Ideology*, p. 203.

7. 关于阶级凝聚力的生产以及为了阶级利益而超越个人利益问题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可见 Georg Luka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Malik, 1923)。

8. 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权力法案的攻击,他称它为骗子。据 V. Adoratsky, ed., *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Moscow: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 1935), pp. 328—329。

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pp. 9—11. 通过消除地方团体和个人与政府间的中间权力向大社会发展的趋势, Robert Nisbet 在 *The Quest for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一书进行过分析。

10. 关于这些思想的研究见 S. M. Lipset, M. Trow, and J. S. Coleman, *Union Demo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11. Tocqueville, *op. cit.*, p. 321.

12. 见 Max Weber, "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ssland,"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politik*, 22 (1906), pp. 234—353; "Der Sozialismus,"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politik* (Tübingen: Mohr, 1924), pp. 492—518;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 trans. By Hayden V. Whit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45—146。

13. 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37), p. 509. 另见 C. Wright Mills and Hans Gerth, "Introduction: The Man and His Work," in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49。

14.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60), p. 433。

15. 转引自 J. P. Mayer,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London: Faber & Faber, 1943), p. 128。

16.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该书首次在德国出版是 1911 年,在美国是 1915 年。

17. 重要的是使不同功能系统——社会、结构集团和人——的分析保持独立。一部分手工工人投保守党的票,对于工党或劳动阶级组织来说,可以认为是功能失调;对于个人来说,既可以认为是正常功能,也可以认为是功能失调;对于社会来说,可以认为是正常功能。

18. R. Michels, *Sozialismus und Fascismus in Italien* (München: Meyer &

Jessen, 1925), Vol. 1.

19. Bernard Berelso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 27; M. Benney, A. P. Gray and R. H. Pear, *How People Vo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6), p. 194.

20. 关于政治冷漠可以反映民主健康状况的论述见 Herbert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London: P. S. King & Son, 1937), pp. 225—226; 以及 W. H. Morris Jones, “In Defense of Political Apathy,” *Political Studies*, 2(1954), pp. 25—37.

来自美国不同的研究资料表明,没投票的公民数量可能比投票反对民主价值标准的,投票希望强有力领导的和投票反对给予激进分子及其他政治少数派以公民自由的加在一起都要多。见 Samuel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5), pp. 83—86; H. H. Field, “The Non-Voter—Who He Is, What He Think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1944), pp. 175—187;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1955), pp. 178—179; F. H. Sanford, *Authoritarianism and Leadership* (Philadelphia: Stephenson Brothers, 1950), p. 168.

21. 把选举研究与社会凝聚力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的主要尝试可见 Talcott Parsons, “Voting an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n E. Burdick and A.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pp. 80—120。这篇文章充满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提示性假说和解释。

22. 在 1929 年到 1933 年的德国,纳粹党从一个小党发展成拥有三分之一以上选票的党,大多数中产阶级温和派政党急剧衰落;这个时期,共产主义者的得票数也在增加,而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在下降。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选举研究,可以清楚地显示阶级支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大城市发生的变化。二月革命时还是个小团体的布尔什维克,随着军校学生脱离中产阶级,到十月革命时获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选票。见 Oliver Radkey, *The Election to the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of 191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 见 Louis Bean, *Ballot Behavior: A Study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40); *How to Predict Elec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考察 1936 年以来美国各次选举的调查研究资料显示,选票分布在各阶级中有类似形式。英国的选举研究也表明,保守党得票数增加意味着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中有较多的保守党支持者,而工党的得票数增加则是由于上层阶级和体力劳动者的支持。见 John Bonham, *The Middle Class Vote* (London: Faber & Faber, 1954)。

24. Manning Dauer, *The Adams Federalist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3).

25. Bernard Berelson, Paul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op. cit.*

26. 贾诺维茨(Janowitz)和马维克(Marvick)对公意和选举的一般问题的研究是分析1952年总统选举,研究重点在于“根据维护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评价选择过程……[并提出]选举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一种协议过程”的问题。如果说选举将产生一种“协议过程”的话,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满足的条件;为了检验1952年选举是否满足理论导出的条件,他们分析了可以得到的调查资料。他们发现,“1952年选举可以判定是一种协议过程”,但是这个结论并不比调查访问资料可以有效地用于研究某些最复杂的政治分析问题的实例更重要。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Democratic Consent*,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 No. 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p. 96.

关于民主选举制度的条件,罗伯特·A. 达尔(Robert A. Dahl)在理论层次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点。他的许多结论可以表述为经验上可以检验的命题。他的书对于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感觉强度与系统稳定性之间关系这个一般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少数派的感觉比多数派的感觉强烈得多的时候。见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特别见 Chap. 4, pp. 90—123。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文章也有社会学意义。David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1957), pp. 383—400.

27. S. M. Lipset, “Political Sociology, 1945—1955,” in H. Zetterberg, ed.,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aris: UNESCO, 1956), pp. 43—55。这篇评论不仅适用于我本人的工作,也适用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关于支撑强调冲突(激进的)或强调公意(保守的)的意识形态假设,可参见 Bendix and Lipset, *op. cit.*。值得注意的是,鲁道夫·黑贝勒(Rudolf Heberle)给他的论社会运动的书加了如下副标题:*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28. 见 Samuel A. Stouffer, *op. cit.*; Daniel Bell, ed., *The New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5);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nt: 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ican Agitator*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9); 和 Edward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29. 关于对超越这个传统的各种美国研究工作的分析和总结,见 Peter Balu, *Bureaucracy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30. 最近一本研究官僚机构在形成社会凝聚力中的作用的政治社会学著作是 Philip Selznick,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塞尔兹尼克(Selznick)没有忽视冲突——他说明了导致某些团体间合作的过程本身怎样又导致与其他团体的疏远和冲突。不过,他主要关心的是把具有不同目标的组织和团体聚拢在一起的机制,而且强调意识形态和合作者的

自补充在实现这个目标中的作用。在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Evanston: Row, Peterson and Co., 1957) 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他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并通过着力强调制度化的意义和过程,即组织生活的“竞赛规则”,为研究组织内冲突与一体化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社会学框架。他就建立价值和程序以提高给定组织能力而提出的命题,大概也可以用于更大系统的研究。

31. 工业社会的人类关系学派关心的是官僚机构内的凝聚力和公意。但是,这个学派认为冲突对于特定和整个社会来说总是异常的和功能失调的。关于这个学派的著作和有关批评讨论文章的目录可参见 Louis Kriesberg, “Industrial Sociology, 1945—1955,” in H. Zetterberg, ed., *op. cit.*, pp. 71—77.

32. 见本书第十二章,根据美国劳工运动的分析,试图发展寡头统治理论。

33. Harry H. Eck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6(1955), pp. 345—359; 另见 Oliver Garceau,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该书分析了美国医学联合会(AMA)中的寡头政治及其表现的问题。

34. S. M. Lipset, M. Trow, and J. S. Coleman, *op. cit.*

35. 见 Elmer T. Clark, *The Small Sects in America*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49)。

36. Samuel A. Stouffer, *op. cit.*, pp. 140—149.

37. 不过,从来没有一个机构只有一个特征。在任何机构的内部关系中,一体化因素和非一体化因素都是固有的。如涂尔干(Durkheim)所指出,甚至像犯罪这样的极端破坏形式,也间接有助于社会的一体化。

38. 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op. cit.*, p. 139.

39. 特别见 Theodore Geiger, *Aufgaben und Stellung der Intelligenz in d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 F. Enke, 1949);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36), 特别见 pp. 136—146; Joseph Schumpeter, *Carte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 pp. 145—155。

第一篇

民主秩序的条件

第二章

经济发展与民主

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者中作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

这个定义基本上是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抽象出来的¹，它隐含着如下几个特定条件：(1)有这样一种“政治信条”或政治信仰体系：认为通过政党、新闻自由等方式表达信仰是合法(公认正当)的；(2)有一组执政的政治领导人；(3)有一组或多组希图执政并得到承认的领导人。

这些条件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如果一种政治系统不以允许权力和平“竞赛”的价值体系为特征，民主就会变得混乱无序。这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其次，如果政治“博弈”的结果不是把实权定期授予某一集团，那么出现的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不稳定、不负责任的政体。这种事态曾出现在前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也贯穿了法兰西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尽管不是全部。它的特点是常常在互相有主要利益和价值冲突的政党间结成软弱的联合政府。第三，如果缺乏使有效的反对派继续存在的条件，执政者的权力将会不断增强，而公众对政策的影响将处于最低限度。这是所有一党制国家的情况，一般认为，至少在西方，这些国家是独裁国家。

本章和下一章将考察社会的两个严重影响稳定民主问题的特有因素：经济发展和合法性；所谓合法性，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机构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当的程度。因为大多数缺乏长期政治民主传统的

国家处在世界的不发达部分,所以当韦伯提出现代民主就其最明确的形式而言,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时,他或许是正确的。²但是,在任何一个既存的社会,一方面是收入、教育和宗教一类事情,另一方面是民主,两方面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在理论领域也不应提前考虑的原因在于:就社会的政治子系统的自动运行而论,一种政治形式可以在完全不利于它出现的条件下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一种政治形式之所以可以建立,是因为同时存在一系列独特的历史因素,即使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利于另一种政治形式。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但一系列不利的历史事件,使民主形式得不到合法性,因而削弱了这个国家对付危机的能力。

关键性历史事件既可以说明民主的持续存在,也可以说明民主的失落,因为这种事件可以启动某种过程,而这种过程可以在国家历史的下一代决定性时刻增加(或减少)民主复起的可能性。民主政治系统一旦建立,它就会“积聚力量”,创造社会基础(组织机构和制度)以保证它的继续存在。³因此,要想使幸存下来的“早熟的”民主存在下去,应当(格外)努力推进有助于民主的其他条件的成长,如普及文化或建立自治的民间组织。⁴在这一章,我主要探讨教育一类用来支持民主政治系统的社会条件,而不详细论述政治博弈之特定规则一类用以维护这种系统的内部机制。⁵

对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比较扼要地涉及任何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特点。⁶然而,只要所用定义可以覆盖大多数被认为是民主的或不民主的国家,那么一个所论国家,偏离民主的某一特定方面是不太重要的。在“比较民主的”与“比较不民主的”之间划一条截然的分界线也不是根本的,因为民主多半不是社会制度的单一性质,而是一些可以用多种不同方法分类的性质的复合。因为这个原因,我把所论国家分成一般类型,而不拟把它们从最高到最低加以分类,尽管在这里就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一些问题。

对所有国家进行分类的努力遇到了许多困难。为了减少世界各地政治实践的巨大差异而带来的一些复杂情况,我的注意力一直是放在处于相同政治文化区域内的国家的差异上。这种内部比较的两个最好区域,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欧洲和英语系的国家。在亚洲国家间和阿拉伯国家间也可以作比较有限的比较。

界定欧洲式民主所用的主要标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不间断的政治民主和过去 25 年没有反对民主“博弈规则”的大政治运动。⁷对于拉丁美洲,标准多少有些不太严格,那是看一个特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选举的历史。⁸如果说在欧洲我们要找固定的民主的话,那么在南美,我们要找没有经常进行独裁统治的国家(见表 2.1)。

表 2.1 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按民主稳定程度的分类

欧洲和英语系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	
稳固的民主	不稳固的民主和独裁	民主和不稳固的独裁	稳固的独裁
澳大利亚	阿尔巴尼亚	阿根廷	玻利维亚
比利时	奥地利	巴西	古巴
加拿大	保加利亚	智利	多米尼加
丹麦	捷克斯洛伐克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爱尔兰	芬兰	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
卢森堡	法国	墨西哥	危地马拉
荷兰	东德	乌拉圭	海地
新西兰	希腊		洪都拉斯
挪威	匈牙利		尼加拉瓜
瑞典	冰岛		巴拿马
瑞士	意大利		巴拉圭
英国	波兰		秘鲁
美国	葡萄牙		委内瑞拉
	罗马尼亚		
	西班牙		
	苏联		
	南斯拉夫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多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

表 2.2 欧洲国家、英语系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比较,比较分“比较民主的”和“比较不民主的”两组,比较项目是财富、工业化、教育和城市化的有关指数^①

A. 财富指数						
平 均	人均国民 收入 ^②	几千人 拥有一名 医生 ^③	多少人 拥有一部 汽车 ^④	每千人 拥有的 电话数 ^⑤	每千人 拥有的 收音机数 ^⑥	每千人 拥有的 报刊数 ^⑦
欧洲和英语系的稳固民主国家	695(美元)	0.86(千人)	17(人)	205(部)	350(部)	341(份)
欧洲和英语系的不稳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	308	1.4	143	58	160	167
拉美的民主国家和不稳固独裁国家	171	2.1	99	25	85	102
拉美的稳固独裁国家	119	4.4	274	10	43	43
变化范围						
欧洲的稳固民主国家	420—1453	0.7—1.2	3—62	43—400	160—995	242—570
欧洲的独裁国家	128—482	0.6—4	10—538	7—196	42—307	46—390
拉美的民主国家	112—346	0.8—3.3	31—174	12—58	38—148	51—233
拉美的稳固独裁国家	40—331	1.0—10.8	38—428	1—24	4—154	4—111
B. 工业化指数						
平 均	农业男性雇工的百分数 ^⑧		人均能源消耗 ^⑨			
欧洲稳固民主国家	21		3.6			
欧洲独裁国家	41		1.4			
拉美民主国家	52		0.6			
拉美稳固独裁国家	67		0.25			
变化范围						
欧洲稳固民主国家	6—46		1.4—7.8			
欧洲独裁国家	16—60		0.27—3.2			
拉美民主国家	30—63		0.30—0.9			
拉美稳固独裁国家	46—87		0.02—1.27			
C. 教育指数						
平 均	文化普及的 百分数 ^⑩	千人初等教育 入学人数 ^⑪	千人中等教育 入学人数 ^⑫	千人高等教育 入学人数 ^⑬		
欧洲稳固民主国家	96	134	44	4.2		
欧洲独裁国家	85	121	22	3.5		
拉美民主国家	74	101	13	2.0		
拉美独裁国家	46	72	8	1.3		
变化范围						
欧洲稳固民主国家	95—100	96—179	19—83	1.7—17.83		
欧洲独裁国家	55—98	61—165	8—37	1.6—6.1		
拉美民主国家	48—87	75—137	7—27	0.7—4.6		
拉美独裁国家	11—76	11—149	3—24	0.2—3.1		

(续表)

D. 城市化指数			
平 均	住在 2 万人以上城市 的人口的百分数 ^⑭	住在 10 万人以上城市 的人口的百分数 ^⑮	住在大城市区域 的人口的百分数 ^⑯
欧洲稳固民主国家	43	28	38
欧洲独裁国家	24	16	23
拉美民主国家	28	22	26
拉美稳固独裁国家	17	12	15
变化范围			
欧洲稳固民主国家	28—54	17—51	22—56
欧洲独裁国家	12—44	6—33	7—49
拉美民主国家	11—48	13—37	17—44
拉美稳固独裁国家	5—36	4—22	7—26

注：

① 这张表的大部分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城市研究中心(Berkeley, California)提供的资料编制的。每类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被用于每项计算,因为对于所有国家不能得到一致的资料。例如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它们可供使用的资料就是极少的。苏联不在考虑之内,因为它的大部分在亚洲。

②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Office, *National and Per Capita Income in Seventy Countries, 1949*, Statistical Papers, Series E, No. 1, New York, 1950, pp. 14—16.

③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1952*, Table 11, pp. 46—48.

④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56*, Table 139, pp. 333—338.

⑤ *Ibid.*, Table 149, p. 387.

⑥ *Ibid.*, Table 189, p. 641. 这些数字对应的人口基数与所报道的电话和收音机数的年份是不同的,但是对于分组比较的目标来说,这种出入是不重要的。

⑦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 *op. cit.*, Appendix B, pp. 86—89.

⑧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56*, Table 12, pp. 350—370.

⑨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1956*, *op. cit.*, Table 127, pp. 308—310. 数字指商业生产的能量,以煤的对应公吨数为计。

⑩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 *op. cit.*, Appendix A, pp. 79—86. 文化普及率大于 95% 的所有国家数。

⑪ United Nations, *A Preliminary Report ...*, *op. cit.*, pp. 86—100. 数字是指 1946 年到 1950 年这段时间,总人口每 1 000 人中中等教育初年级的入学人数。初等教育一年级的入学年龄,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变化范围是 5 岁到 8 岁。总人口中每 1 000 人中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不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多。这使给出的数字偏向于夸大不发达国家总人口接受初等教育人数的百分比,尽管它们这个年龄组的儿童入学人数较少。因此,考虑到由这个来源带来的夸大,给出的数字更说明了教育与民主的明确关系。

⑫ *Ibid.*, pp. 86—100.

⑬ UNESCO, *World Survey of Education*, Paris, 1955. 数字指总人口每 1 000 人中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数字对应的年份在 1949 年到 1952 年之间,各国对高等教育的定义有所不同。

⑭ 据 International Urb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lifornia.

⑮ *Ibid.*

⑯ *Ibid.*

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以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

为了具体验证这个假设,我使用了各种经济发展指数——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欧洲和拉丁美洲已被分类为有程度不同民主的国家,计算了各种指数的平均值。

总之,如表 2.2 中的数据所指出,民主较多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值要高得多。如果把拉丁美洲和欧洲放在一张表上,差别就更加突出。⁹

所用主要财富指数是人均国民收入、平均多少人拥有一辆汽车、几千人拥有一名医生,以及每千人拥有的收音机、电话和报刊数。每一项的差别都是引人注目的(见表 2.2)。在比较民主的欧洲国家,17 人拥有一辆汽车,而在比较不民主的欧洲国家,143 人拥有一辆汽车。在比较不独裁的拉丁美洲国家,99 人拥有一辆汽车,而在比较独裁的拉丁美洲国家,274 人拥有一辆汽车。¹⁰ 这些不同组国家的收入差别也是明显的:对欧洲来说,比较民主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是 695 美元,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是 308 美元;对拉丁美洲来说,相应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 171 美元和 119 美元。变化趋势同样是一致的,每组中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属于“比较不民主的”类型,最高的属于“比较民主的”类型。

工业化显然与财富指数有密切关系,它是以男性农业雇工的百分数和国内人均消耗的工业用“能源”(以每人每年吨煤计)来计量的。这两个指数同样显示了一致的结果。对于欧洲,“比较民主的”国家农业和有关职业受雇男工的平均百分数是 21,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是 41;对于拉丁美洲,“比较不独裁的”国家是 52,而“比较独裁的”国家是 67。人均能源消耗的差别同样很大。

城市化程度也与民主的状态有关。¹¹ 从国际城市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编辑的资料中可以得到三个不同的城市化指数:住在 2 万人以上社区的人口的百分数、住在 10 万人以上社区的人口的百分数、居住在大城市区域的人口的百分数。就所调查的两大区域来说,比较民主的国家在所有这三个指数上都比比较不民主的国家高。

有许多人指出,国家总人口的教育水平越高,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得到的比较资料证实了这个看法。在欧洲,“比较民主的”国家几乎人人都识字,最低的文化普及率是96%,而“比较不民主的”国家的文化普及率,平均为85%。在拉丁美洲,相应的普及率,“比较不独裁的”国家是74%;而“比较独裁的”国家是46%¹²。总人口每千人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个不同水平上的入学人数,都一致显示与民主程度有同样关系。海地和美国的极端情况表现了巨大差距:海地小学初年級的入学儿童数(总人口的11‰)比美国的大学入学人数(总人口的18‰)还要少。

既然行政管理的一贯宗旨已把更多的教育视为民主的基本条件¹³,那么,教育与民主的关系值得进行更广泛的探讨。正如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特别就南美写道的:“教育,如果说它不能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它至少使人成为好的公民变得比较容易。”¹⁴教育多半可以开阔人的视野,使他能理解宽容准则的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提高他在选举时作出合理选择的能力。

教育促进民主的这一证据,就个人行为水平在国家内部进行比较比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更直接、更明显。舆论研究机构向不同国家的民众提问,问他们对宽容反对派的看法、对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態度、对多党制与一党制的感受,所得到的回答表明,把作出民主性反应的人与其他人分开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教育。一个人教育水平越高,他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实践。¹⁵所有有关的研究都显示,教育既比收入重要,也比职业重要。

这些调查的结果可能使我们期望在国民教育水准和政治实践之间有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而不像我们实际上所见到的那样。德国和法国属于欧洲教育最好的国家之列,但仅仅靠国民教育水准本身,并没有使它们的民主得到稳定。¹⁶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水准或许有可能用以阻止其他反民主势力。

如果我们不能说明教育的“高”水平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么可供利用的证据表明,它近乎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在文盲依然广泛存在的拉丁美洲,在有半数以上人口是文盲的所有国家中,只有巴西一个国家可以归入“比较民主的”一类。

黎巴嫩是阿拉伯联盟的一个成员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保

持民主制度；这个国家在该联盟中也是教育最好的（文化普及率达 80% 以上）。阿拉伯世界以东，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和日本，自 1945 年以来一直保持民主政体，而没有出现大的反民主政党。这两个国家，虽然在人均收入上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但在教育成就上都名列世界的前茅。菲律宾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入学率实际上仅次于美国，而日本的教育水平也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¹⁷

虽然证据是分别提出的，但经济发展的所有各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的关系是如此之密切，以致构成一种与民主有政治关联的主要因素。¹⁸ 中东的近期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 1951 年至 1952 年，丹尼尔·勒纳 (Daniel Lerner) 和美国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作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城市化、文化普及、投票率、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和生产以及教育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¹⁹；还对有联合国统计资料可供利用的所有国家 (54 个国家)，计算了 4 个基本变量的单相关和多相关系数，结果是²⁰：

相关变量	多相关系数
城市化	0.61
文化普及	0.91
传媒参与	0.84
政治参与	0.82

在中东，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指数比另外 4 个被分析的国家高。丹尼尔·勒纳在报道这项研究时指出：“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战后的大量事件是为控制政权展开的激烈斗争，而在土耳其和黎巴嫩，（直到最近）明显缺少这种斗争，那里政权的控制是由选举决定的。”²¹

勒纳还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地区不均衡发展对全面稳定的影响，以及所有这些变量协调变化的必要性。在比较埃及和土耳其的城市化和文化普及率时，他得出结论：虽然埃及比土耳其城市化水平高得多，但它不是真正“现代化的”，甚至不具备现代化的适当基础，因为文化普及没有跟上。在土耳其，现代化的几个指数都是同步的，随着投票参与率的提高（1950 年为 36%），文化普及率、城市化水平等也跟着提高，持平衡状态。

在埃及，城市里充斥着“无家可归的文盲”，他们为支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提供了现成的拥护者。以勒纳的尺度看，埃及的文化普及率应当比土耳其高一倍，因为它的城市化水平高一倍。在勒纳看来，埃及只有它应有文化普及率一半的事实，可以解释为“失衡现象”；这种失衡“往往导致徘徊不前，加速社会瓦解”，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反映在经济上。²²

勒纳提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补充——大意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关键变量可以视为历史现象，而后来发展的民主部分，是“参与性社会（他的现代工业社会术语之一）的高层建筑”。他关于这些变量——被视为阶段性特征——之间关系的看法，值得在此用些篇幅加以引证：

参与性社会的长期进化，似乎涉及有一定顺序的三个阶段。首先到来的是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产生了具有现代工业经济特征的技能 and 资源的结合。在这种城市的发源地内部，孕育了两种区别下两个阶段的性质——识字能力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这两种性质之间有密切的互补关系，因为识字的人要开发传播媒介，而传媒又扩散识字能力。不过，识字能力在第二阶段起关键作用。首先是少数人有了阅读的能力，这就武装了他们，以完成社会走向现代化征途中所必需的各种任务。直到第三阶段，即工业发展的复杂技术已相当先进时，社会才开始大规模地发行报刊，建立广播网，摄制电影。这又加速了文化的普及。我们在所有现代先进社会所见到的那些参与制度（如选举投票），已超出了这种相互作用。²³

但勒纳的论点，即现代化的这些因素在功能上是相互依存的，根本没有为他的资料所证实。然而，本章所提出的材料，为沿着这些思路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如埃及，那里“滞后的”文化普及率与严重的危机和潜在的动荡有关，异常的例子也见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分析这些例子——不拟作为本书的任务——可以进一步阐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制度变革期间社会稳定性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

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收入、更大的经济保障和普遍的高等教育，通过允许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对政治进行长时间观察，以及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渐进主义政治观点，从而可以决定“阶级斗争”的形式。长期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信仰，可能只是比较富裕的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明这个论点的明显证据，可以在不同国家工人阶级政治行动方式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中找到；由于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其他的文化、历史和法律的因素，这种关系几乎是令人震惊的。

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最富的国家中，不仅共产主义政党几乎不存在，而且社会主义政党也从来没能使自己成为主要力量。在1949年（上一年联合国标准统计资料出版）人均年国民收入超过500美元的10个次最富国家——新西兰、瑞士、瑞典、英国、丹麦、澳大利亚、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对社会主义作为左派政治形式的优势地位起到了制约作用。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共产党人获得超过7%的选票，其中共产党平均得票实际上在4%左右。在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500美元的8个欧洲国家——法国、冰岛、捷克斯洛伐克、芬兰、西德、匈牙利、意大利和奥地利，战后都至少有一次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其中有6个国家，共产党得票高于16%，8个国家的得票总平均数高于20%。两个低收入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人力量薄弱，都有苏联占领的切身体验。²⁴

在另外两个人均国民收入低于500美元的欧洲国家——西班牙和希腊，左翼极端主义还控制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在佛朗哥之前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和左的社会主义远比温和的社会主义要强；而希腊，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28美元，共产党人大大强于社会主义者；近年，一些政治主张相似的政党获得了大量选票。²⁵

在西方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所反映的国民经济发展与共产主义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力量，这两者之间的逆相关，看上去强于其他全国性变量如民族因素或宗教因素之间的相关性。²⁶穷国中两个有强大共产主义

运动的国家——冰岛和芬兰，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马丁·路德的信徒。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中，除奥地利外，所有穷国都有强大的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运动。两个最富的天主教民主国家——比利时和卢森堡，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者。虽然瑞士的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居住区深受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生活的影 响，但在这些区的工人中，几乎没有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生活在欧洲的最富国家中。

最近对 9 国公民态度进行的一次比较民意测验调查证实了人均财富的低水平与足以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的不满情绪的积累之间的相关性。在这些国家中，个人的安全感与人均收入(0.45)相关，也与人均食物供给(0.55)相关。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可以通过让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来衡量：世界上哪个国家使你最有可能过你所喜欢过的生活？如果把这样得到的满意程度用作对国家不满情绪的指标，那么不满与经济财富的相关性会更高。这种研究报道，人均国民收入与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是明显相关的，其相关系数为 0.74。²⁷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困苦或贫穷本身是激进主义的主要原因。有大量证据可以证实这样的论点：如果人们处在一种看不到变革可能性的环境中，那么这种环境下的稳定的贫困甚至可能滋长保守主义。²⁸如果个人经历把自己与他人的重要交往和接触限制在与自己一样的水平上，假设其他条件都相同，那么这样的人会比那些经济境况较好，而又看到有可能得到更好生活方式的人更保守。²⁹这种情况下的动力似乎是看到了更好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不是贫困本身。正如卡尔·马克思用一段有洞察力的话所表达的：“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³⁰

随着国内和国家间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受到贫困折磨而不知道有更好生活方式或不知道改善自身状况可能的人群，似乎越来越少，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地区。只有在受传统支配的社会中，才可望找到这类稳定的贫穷。

由于分层体系中的地位总是相对的，而且满足或剥夺是按照与他人相比境遇好坏来体验的，所以不论国家穷富，各国的下层阶级都显示出各种怨恨现有报酬分配制度的信号，支持一些鼓吹某种再分配形式的政党

和组织,是不足为奇的。³¹这些政党在贫穷国家比在富裕国家采取的斗争形式更极端,更激进,这一事实可能与穷国的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关系,而不是与穷人实际上在不容置疑的条件方面较为贫困的事实相关。联合国机构对财富分配进行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总人口中最富的那部分(如世界第十巨富、第五巨富等),在不发达国家得到的总收入比例,大于在发达国家得到的。”³²专业和半专业人员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在穷国比在富国大得多。在体力劳动者当中,“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在不发达国家似乎更大。相反,至少在几个发达国家,拉平收入差距的过程已通过全面增加国民收入而得到促进……不是降低较富者的收入,而是加快提高较穷者的收入”。³³

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消费品的分配也倾向于变得比较平均。国家越富,它的总人口中拥有汽车、电话、浴缸、制冷设备等的比例就越大。在这些用品短缺的国家,对它们的分享必然比不上比较富裕的国家。例如,在许多欧洲国家,能买得起汽车、洗衣机、相当漂亮的住房、电话、高级服装,或能送自己孩子读完高中或上大学的人,仍然只是总人口中的少数。而美国或加拿大的巨额国民财富,甚或次一等的澳大利亚自治领或瑞典的国民财富,也意味着相邻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准之间,差距相对较小,甚至社会地位相差很大的阶级,也比南欧的可比较阶级,享有更近乎相同的消费方式。对于南欧人来说,更不用说对“不发达”国家居民,社会分层是以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为特征的,因为不同阶层拥有或买得起的用品很少有雷同之处。因此可以说,国家越富,作为贫困的主要根源而体验到的地位自卑感就越少。

财富的增加和教育的提高,通过使下层阶级日益面对要他们减少对某些意识形态的信仰和放弃极端主义思潮的交叉压力,也有助于民主。这个过程将在下一章作较详细的论述,不过它意味着把这些阶级纳入一种不同于它们低级的孤立文化的全国一体化文化。

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是革命力量,因为它一无所有,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是,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下层阶级为什么支持现存制度时,先于马克思,换一种方式说出了马克思的意思:“只有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才失去了他们曾经有的反抗。”³⁴

财富的增加会改变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态,从有强大下层阶级基础的

高大金字塔形向中产阶级日益强大的菱形的转变,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强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支持温和的和民主的政党以及遏制极端主义团体,可以缓解冲突。

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与国民收入有关。国家越穷,下层阶级生活的绝对水准越低,迫使上层阶级把下层阶级视为粗俗、天生低贱,甚至视为人类社会范围之外的低级种姓的压力就越大。上层与下层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使这种情况成为心理的必然。结果,上层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把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分享权力的权利,看作本质上是荒谬的和不道德的。上层阶级不仅本身反对民主,而且他们时常表现出的傲慢政治行为,还足以强化下层阶级方面的极端主义反应。

国家的总收入水平也影响它对民主规范的接受能力。倘若国家有足够的财富,以致使财富是否进行某种重新分配并不会造成很大的差异,那么就比较容易接受哪一方执政都没多大关系的观念。如果失去官职意味着主要权力集团的严重损失,那么他们就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寻求保住或得到官位。一定量的国家财富对于确保一支能干的文官队伍同样是必要的。国家越穷,越注重裙带关系——亲属和朋友的支持。而这又转而减少了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需的有效官僚制度的机会。³⁵

作为反对力量来源的民间组织,似乎同样与国家财富有关系。托克维尔和其他称之为“群体社会”³⁶理论的鼓吹者曾经认为,没有一大批与中央政权相对独立的组织的国家,不仅有革命的潜在可能性,而且有高度独裁的可能性。这样的组织具有多种功能:可以阻止国家或任何单一民间权力中心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可以成为新意见的来源;可以成为向大部分公民进行宣传、特别是宣传反对意见的工具;可以训练人们的政治技巧,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水平。虽然没有可靠的资料论及群众性组织的模式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关系,但来自个人行为研究的证据表明,撇开其他因素,加入社团的人比其他人更可能对诸如宽容和政党制度一类问题作出民主的回答,并参加投票或积极地参与政治。因为一个人越富裕,所受的教育越好,他越可能加入群众性组织,所以组建这类组织的倾向似乎是随特定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空闲时间的多少而变化的。³⁷

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的政治问题

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使许多西方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得出结论：我们时代的基本政治问题起因于迅速工业化的压力。有一种假设认为，只要不发达国家能够成功地在高生产率的道路上起步，我们就能挫败新建民主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本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观点被误认为标志着经济决定论或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民主政治思想中的胜利。就这个理论而言，它的不幸在于，基于下层阶级的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不仅见于低收入国家，也见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新现象。1884年，恩格斯就注意到，在欧洲，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在工业迅速成长时期出现的，而它们的急剧衰落是在后来的缓慢变化时期。

20世纪前半叶，北欧国家左翼政治活动的模式说明了这一点，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现在是比较温和的，比较保守的。无论什么地方出现迅速的工业化，都会在前工业状态与工业状态之间造成剧烈的突变性，出现程度不同的极端主义工人运动。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正如经济学家沃尔特·盖伦森(Walter Galenson)所指出³⁸，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工业化的不同时间和速度来解释。丹麦社会民主党运动和工会总是站在国际劳工运动改良主义的、温和的和相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边。丹麦的工业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城市发展速度也是适中的，这有利于城市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改善。工业的缓慢发展意味着，工业化时期所有丹麦工人的很大一部分，是长期受雇于工业企业的人，这使得从乡村地区涌来的、可能成为极端主义派别基础的新来的人总是少数。在丹麦得到某种支持的左翼组织，是以迅速膨胀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

可是在瑞典，从1900年到1914年，制造业发展极为迅猛。这引起非熟练工人——基本上是从乡村招募的——数量激增，同时造成工业工会而不是行会的大发展。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左翼运动开始在工会和社会

民主党内出现,反对工业大发展之前各自制定的温和政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强大的工团主义运动。同样,这些富于破坏性的左翼运动,在瑞典也是以迅速膨胀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³⁹

挪威,是3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业化起步最晚的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由于水力发电站的出现,电化学工业的发展和持续建设的需要,挪威的产业工人在1905年到1920年人数翻了一番。像在瑞典一样,劳动力的这种增长意味着,温和的传统行会运动为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所压倒,这些工人大部分是来自乡村的年轻移居者。左翼运动开始在劳工联盟和工党内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控制了这两个组织。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是第三国际成立时仍处于迅速工业化阶段的唯一一个西欧国家,它的工党是唯一一个几乎完好无损转变成共产主义政党的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发展迅速的产业中的工人,在社会民主党内也保有相当多的支持,而这个党的较温和部分是以比较稳定的已经建立的工业企业为基础的。⁴⁰

迅速工业化与工人阶级极端主义之间关系的最显著例证是俄国革命。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工业人口从1897年的160万猛增到1913年的260万。⁴¹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曾写到,罢工率和工会战斗性的增长,是与工业的发展同步的。在欧洲,俄国和挪威这两个1920年前革命左翼都控制了劳工运动主要部分的国家,也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过程仍在继续进行的国家,这大概不是一种巧合。⁴²

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是对迅速工业化所造成的畸变的响应,而这种运动的衰落,如恩格斯所说,是出现在“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完成……[和]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⁴³的场合。当然,这样的国家确切地说是工业化国家,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在那里目前只是作为宗派教条存在。不过,在那些工业化从未发生的欧洲国家,或者说,在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大规模工业经济,因而也没有高水平的生产率和持续增长的大众消费模式的场合,还存在极端主义劳工运动产生或延续的条件。

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极端主义,是以小企业主阶级(包括城市的和农村的)为基础;它出现在欠发达社会,也出现在有一定工业化程度而往往文化落后的社会。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似乎有一个范围,从部分

中产阶级,特别是小商人和农场主一度表现出的脆弱性,到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强大的劳工运动。第五章将详细分析这种现象,因为它出现在许多国家。

显然,这里所讨论的与稳定民主有关的条件,最容易在西北欧国家以及它们在美洲和澳洲的说英语的后代国家中见到。特别是韦伯,曾就此指出,多种因素历史地、独一无二地联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既产生了民主,又产生了资本主义。有一种基本论点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新教的社会有其最大的机会,这种发展造就了市民阶级,而市民阶级的存在,既是民主的催化剂,又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新教主义对个人责任的重视,促进这些国家出现民主的价值观,并导致市民与王权结盟,从而保留了君主政体,也扩大了保守阶层对民主的承认。或许人们会问,经济发展、新教主义、君主政体、渐进的政治变革、合法性和民主这一连串相关因素哪一个主要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们的的确确交织在一起。⁴⁴

我将在下一章开始考察有特定历史渊源的民主的某些必要条件,特别是那些与民主政治系统所要求的合法性和缓解政治冲突机制有关的条件。这些条件虽然都与经济发展有关,然而又不同于经济发展,因为它们都是政治系统内部的因素,不是全社会的属性。

方法论附录

与其他一些在社会总体层次上探讨社会现象的研究相比,本章的方法论有着内在的不同,因而阐明潜含在文字表述下的方法论前提或许是有益的。

人们在研究一种社会制度的复杂性特征时,如民主制、官僚化程度、分层制的类型,采用的方法通常要么是简化法,要么就是“理想型”方法。前一种方法并不认为上述这些特征就是制度特征本身,而主张个体行为的特征才是社会学范畴的要点。对这一学派而言,民主态度的程度、或官僚行为的程度、或者声望与权力序列的数目与类型,构成了民主制、官僚

制或阶级特征的要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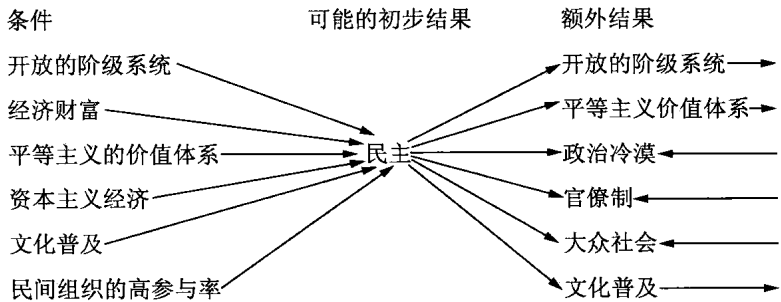
“理想型”方法的起点是一个相似的假设,但结论却相反。这一相似性的假设认为,社会是复杂的现象秩序,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内在矛盾,要把这些矛盾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概括的话,就必须建构一种对选择过的要素作有系统的表述,对于要素的选择是由科学家的特殊兴趣与视角决定的。相反的结论认为对“民主”或“官僚制”秩序的抽象,与实际存在的复杂社会系统的状态或特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包含了各种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特征,它们从整体上说是哪些现实中不存在的社会的特征。⁴⁵韦伯的“官僚制”概念就是一个例子,它包含了一系列担任公职者并不“只有”的职位,它总是强调档案记录,按功能划分职责等;政治科学中对民主的一般定义也是如此,它假设个人的政治决定是以人们对自己的目标与实际政治状况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

仅仅根据这些概念或理想型与现实不相对应而批评它们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它们的本意就不是要描述现实,而是想为比较现实的不同侧面提供一个具有逻辑连贯性的基础。通常这种方法是相当有效的,这里也无意要用另一种方法取代它,而只是想提出另一种可能的方法用以概括社会系统的复杂特征,这一方法是出自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在不同层次的分析中所首创的多变量分析。⁴⁶

这一方法的不同之处是可否认为抽象化的理论范畴与整个社会系统之间有一种正确的关系这一问题。本章有关民主,以及民主、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统计资料,其含义在于,现存社会整个系统的某些侧面可以用理论术语加以叙述,可以与其他系统的相似侧面相比较,同时还可以从经过其他研究者核实(或质疑)的经验资料中推导出来,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存在与一般的概括相矛盾的情况,或者在较低层次的社会组织中不能出现明显不同的特征。比如,就整个国家的情况而言,美国可以说是民主的,然而国内的大多数附属组织却可能是不民主的。在另一个层次上,与一家公司相比较,教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非官僚化”的组织,然而教会组织的一些重要部门可能与该公司的最官僚化的部门一样官僚化。在又一个层次上,出于对某个人整体人格作心理学评估的同时,把某个个体看作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很合情合理的,然而在某些时候,他的行为却一点不像得了精神分裂症。由此看来,关键在于在某一

特定概括的层次上就一个系统的整体功能(不论是在个人、团体、组织,还是在社会层次上)作比较时,适用于一个社会整体的概括与哪些适用于其他系统的概括是同类的和具有同等程度的正确性,而且还要经得起同样的经验检验。由于缺乏对几种社会作系统的比较研究,模糊了这一关键点。

这一方法还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在一个系统内,各种特征有某种程度的自主,那么一个系统整体的复杂特征就具有多变量的原因与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与城市化以及民主都有许多原因和结果。⁴⁷



从这个观点看,很难确定任何一种因素“引起”了或与任何的复杂社会特征有关键的联系。毋宁说,可以认为一切这类特征(这只是一个指导研究的方法论假设,并非一个实际观点)都有多变量的原因与结果。这一点用一个图式来说明,也许会更清楚些,这个图式指出了民主、与民主的出现相关的初始条件、一个现存的民主制度的结果三者之间的某些可能的关系。

出现在“民主”两边的某个因素,意味着它是民主的初始条件,而在民主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又维持了社会的这一特征——比如说一个开放的阶级系统这一特征。另一方面,民主的某些初始结果,如官僚制,又可能具有削弱民主的作用,如反方向的箭头所标示的。在“民主”右边出现的因素,并不意味着民主“引起”了它的出现,只是说民主作为一种初始条件有利于它的发展。同样,官僚制是民主的结果之一这一假设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唯一的原因,而毋宁说如果把官僚制作为研究问题的中心,在其必须阐明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具有促进某种类型的官僚制的发展的作用。这一图式并不是一个揭示了与民主的出现相关的一般性社会条件的完美模式,而只是一种说明方法论要点的方式,这种方法论涉及的是在一个社

会系统整体中各种关系所具有的多变量特征。

从而,在一个多变量系统中,研究重心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要素上,对于它的条件与结果的阐释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就它的出现的必要充分条件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理论。本章并不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而只是要对由传统的民主理论所蕴含的某些关系加以总结并进行经验检验。

注 释

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 pp. 232—302, 特别见 p. 269;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26; 另见约翰·普莱曼纳兹 (John Plamenatz) 关于民主含义的讨论, 转引自 Richard McKean, ed., *Democracy in a World of Tens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302—327。

2. 见 Max Weber, “Zur Lage der bürgerlichen Demokratie in Russland,”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2(1996), pp. 346 ff.

3. 见 S. M. Lipset, “A Sociologist Looks at History,”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1958), pp. 13—17。

4. 沃尔特·加伦森 (Walter Galenson) 指出, 民主也可能因为容忍公众要求把资源从投资转向消费而危及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向工业化的密集投入, 一方面是对直接社会服务的普遍要求, 这两方面的最终冲突转而对削弱民主状态。因此, 不发达国家即使实现了民主, 在其发展过程中, 也是处于来自固有冲突的不断压力之下。见 Walter Galenson, ed.,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9), pp. 16 ff.

5. 见 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Democratic Consent*,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 No. 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以及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特别见 Chap. 4, pp. 90—123, 其中谈到为了说明民主的某些内部机制, 以及所作的系统研究。另见 David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9(1957), pp. 383—400, 其中讨论了政治制度的内部分析问题。

6. 各国的政治历史将不作详细考察, 因为不同国家民主的相对程度或社会内容不是本章的真正问题。

7. 后一个条件是指, 在这段时间, 没有极权主义运动, 无论是法西斯的, 还是共产主义的, 得到 20% 的选票。实际上, 属于分类表民主一侧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得票不到 7% 的极端主义运动。

8. 历史学家阿瑟·P. 惠特克 (Arthur P. Whitaker) 总结拉丁美洲问题专家的

看法说：“最接近民主理想的国家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见“The Pathology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A Historian’s Point of 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1950), pp. 101—118。在这一类上,我再加上墨西哥。墨西哥允许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建立反对党的自由,尽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不允许反对党有赢得选举的机会,因为选票是由在任者计数的。反对组织的存在、竞争的选举和执政的革命组织党各派别间的调整,的确给这个国家引入了有相当普遍影响的因素。

卢塞尔·菲茨吉本(Russell Fitzgibbon)为获得基于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关于拉丁美洲民主的统计评估”作了有益的努力,不过他的工作不适用于本书的目的。不但需要根据纯政治标准把一些国家进行民主国家排序,而且还要考虑“生活标准”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生活标准和教育水平可以是民主的条件,但不是民主本身的一个方面。见 Russell H. Fitzgibbon, “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Latin American Democrac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9(1956), pp. 607—619。

9. 里尔·W. 香农(Lyle W. Shannon)曾把经济发展指数与国家是否自治相联系,他的结论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他没有给出定为自治国家和不自治国家的详细情况,所以没有直接办法确定“民主”国家与“自治”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本章所考察的所有国家都是基于如下假定选定的:对于不自治的国家,以“民主”说明它的特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里的所有国家,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政的,大概都属于香农的“自治”类型。香农证明不发达与缺乏自治有关,而我的资料表明,一旦实现自治,发展仍然与政治制度的性质有关系。见香农主编的 *Unstable Area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7), 以及他的文章, “Is Level of Development Related to Capacity for Self-Gover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sts and Sociology*, 17(1958), pp. 367—382。在这篇文章中,香农构造了一个复合发展参数;用的指数如多少人拥有一名医生,与本章表中的相同,资料来源也是联合国。香农的工作在本章第一次写成之后才引起我的注意,因此我和他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比较假说的两个独立检验。

10. 必须记住,这些数字是从各国统计数字搜集的平均值。数据的精度变化很大;对于经过多重计算的数字,如这里给出的数字,无法量度其准备程度。但所有这些数字之间差别的一致趋势和它们相差的大数值,是其准确性的主要表现。

11. 一些政治理论家常把地市化与民主相联系。哈罗德·J. 拉斯基(Harold J. Laski)断言,“有组织的民主是城市生活的产物”,而根据希腊城邦对“公民”定义的限定,民主自然应当首先有效地出现在希腊城邦中。见他的文章“Democrac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Vol. V, pp. 75—86。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认为,城市作为政治社区的一定类型,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而从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来看,它可以追溯到“公民身份”概念的出现。关于韦伯观点的一部分论述,见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0), Chapter on “Citizenship”, pp. 315—338。

12. 每组国家平均值比较所显示的差别得到了每个指数变化范围(极高值和

极低值)的支持。变化范围大部分是重叠的,亦即,就某一指数而言,某些“比较不民主”类国家的极高值高于某些“比较民主”国家的值。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拉丁美洲,表中所列的任何一个指数最低的国家,都同样属于“比较不民主”类。相反,几乎所有处于任何一项指数顶端的国家都属于“比较民主”类。

13. 见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14. James Bryce, *South America: Observations and Impress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p. 546. 布里斯(Bryce)考察了南美影响民主机会的几种条件,其中某些大体上与这里提出的相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地区间交流的难易,因而也决定了“共同舆论”形成的难易。布里斯提到“人种”条件,实际上是指不管种族共性是否存在,不同种族集团或语言集团的存在有碍于“共同体的共性和团结,而这几乎是民主政体得以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经济和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发展,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文化普及。除了这些“共同的”因素之外,布里斯还详述了在南美每个国家起作用的特殊历史因素。见 James Bryce, *op. cit.*, pp. 527—533 and 580 ff. 另见 Karl Mannheim, *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15. 见 G. H. Smith, “Liberalism and Level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9(1948), pp. 65—82; Martin A. Trow, *Right Wing Radicalism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 p. 17; Samuel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5); Kotaro Kido and Masataka Sugi, “A Report of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okyo” (III), *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1954), pp. 74—100. 这个问题在本书第四章还要讨论。

16. 杜威(Dewey)指出,教育制度的特征将影响它对民主的影响,这可以说明德国不稳定的某些原因。按照杜威写于1916年的看法,德国教育的目的之一,是“纪律训练,而不是个人的发展”。主要目的是使接受教育者“吸收现存制度的目的和意图”,对它们“绝对服从”。这一点引起的问题,虽然这里不能讨论,但说明了民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因素如教育的关系的复杂性质。见 John Dewey, *op. cit.*, pp. 108—110。

17. 斯里兰卡分享了菲律宾和日本的特殊地位,一是它是南亚和东南亚唯一的民主国家,共产主义者在国内选举中无足轻重;二是它是这个地区唯一一个大部分人口识字的国家。不过,应当指出,斯里兰卡有一个相当大的托派党,现在是正式的反对党;虽说它的教育水平在亚洲是高的,但远低于日本和菲律宾。

18. 这个论述是一个“统计的”论述,它尽然意味着有许多例外。例如,我们知道,在美国和英国,较穷的人更可能投民主党和工党的票。而在这两个国家,下层大量少数派却投较保守的党的票,这一事实并没有对层次化地位是党派选择的决定因素的论断构成挑战。

19. 这项研究在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中作了报道。据说相关关系来自调查统计资料。调查的主要方面涉及对大众媒介的反应和意见,以及有关适合于现代和传统社会的人格类型的推论。

20. *Ibid.*, p. 63. 政治参与指数是过去5年选举中投票的百分数。这些结果不能认为是对文中给出关系的独立证明,因为数据和变量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也见于 Lyle Shannon, *op. cit.*),不过,使用3种完全不同的方法—— \emptyset 系数、多相关系数、以及平均值与变化范围——而得出相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这些关系不能归因于计算的人为技巧。还应当指出,3种分析是在互相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21. *Ibid.*, pp. 84—85.

22. *Ibid.*, pp. 87—89. 关于不发达地区的其他理论,也强调了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循环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是把分析构筑“现代化”社会各种制度的复合系统推向政治领域的一次努力。罗·施诺(Leo Schnore)即将问世的专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n Ecological Approach*)是把技术、人口统计和组织(包括文化普及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方面的变量,作为一种相关的复合系统联系在一起。哈威·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近著(*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是把“准平衡”经济理论框架内的“不发达”,视为社会各个互相联系、互相支持方面的一种复合系统,把文化和政治特征——文盲状态、缺乏中产阶级、原始的交流系统——作为这种复合系统的组成部分。(pp. 39—41)

23. Lerner, *op. cit.*, p. 60. 勒纳(Lerner)还强调了“现代”社会的某些人格条件,这些条件也可以与民主的人格条件相联系。按照他的看法,现代社会物质的和社会的变动性,要求灵活的人格,即适应迅速变化的能力。“灵活的感觉是如此适应变化,以致自身系统的重新调整成了它的特有模式”,发扬这种灵活感是20世纪的任务。这种品格的主要特点是移情,意思是“站在其他同伴的立场审视自己的胸怀和素质,无论对自己是否有利”。(pp. 49 ff)

这种心理学特征是导致对民主的预适应(意即乐意接受他人的观点),还是导致与“大社会”型人格(意即缺乏根植于有回报参与的、坚实的个人价值观)的反民主趋势更紧密结盟,现在仍是个问题,移情(或多或少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人格特征,决定它带来什么社会后果,是宽容和民主态度,还是漫无目的和沉沦,在于另一些特殊条件。

24. 应当指出,在1933—1934年以前,德国共产党是欧洲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而奥地利的社会党是社会党国际中最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欧洲政党。

25. 希腊是欧洲经济上最穷的政治民主国家,“现在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社会党的国家。1945年,一些人与占领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合作,成立了社会党(ELD),后于1953年8月自行解散,成了其易变的亲共产主义政策的牺牲品。整个阵地之所以放弃交给共产主义者,理由是条件不成熟,不足以开展社会主义运动!”Mano-

lis Karakas, "Grecian Apathy," *Socialist Commentary*, May 1957, p. 21; 在 1958 年 5 月 11 日的选举中,“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民主左翼联盟在 300 个议会席位中,赢得了 78 席,现在它是希腊第二大政党。见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58, p. 3, col. 4。

26. 上述关系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有 7 个欧洲国家,1949 年的年人均国民收入是 330 美元,共产主义政党或政治上同路的党派在这些国家的三次自由选举中得了大量选票。有 10 个欧洲国家,年人均国民收入为 585 美元,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遭到失败。

27. William Buchanan and Hadley Cantril, *How Nations See Each Oth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3), p. 35.

28. 见 E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1), pp. 253—254; 另见 Daniel Bell, "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Commentary*, 22(1956), p. 80。

29. 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那些经济上易受打击的职业者和那些经历过失业的工人,往往他们的世界观更偏左。见本书第七章,第 242—249 页。

30. Karl Marx, "Wage-Labor and Capital," in *Selected Works*, Vol.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3), pp. 268—269. "社会紧张状态是未实现期望的表现",见 Daniel Bell, *op. cit.*, p. 80。

31. 纵观许多国家的选举研究结果,除了少数例外,在下层社会地位与“左翼”党派支持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与左翼得票有关,其中某些见于收入相对较好然而与社会隔绝的集团中。在总人口中,男人比女人更愿意投左翼的票,而少数派宗教团体和种族团体的成员,也显示出左派的倾向。(见第七章和第八章)

32. *United Nations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New York: 1952), pp. 123—133.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最近指出:“国家越穷,贫富差别越大确实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6), p. 133.

33. *United Nations Preliminary Report ...*, *ibid.* (另见表 2.2)最近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完成的一项收入分布比较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收入分布形式,“不存在任何较大差别”。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这种发现似乎与上述来自联合国统计署的结论相抵触,尽管后者主要涉及的是工业化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差别。总之,应当注意,索洛同意社会下层在穷国和富国的相对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如他所说:“在把欧洲和美国加以比较时,脱离收入的绝对水平,谈论相对收入的不平等,这是否有意义是可疑的。一种收入是另一种收入的 4 倍,有不同的内涵;从低收入一方看,这意味着一方面存在营养不良,而另一方面有某种过剩。”Robert M. Solow, *A Survey of Income Inequality Since the War* (Stanford: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 Science, 1958, mimeographed), pp. 41—44, 78.

34.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Vintage ed., 1945), p. 258.

35. 关于在一个新国家中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见 David Apter, *The Gold Coast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特别见 Chaps. 9 and 13. 阿普特(Apter)说明了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接受官僚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对民主秩序存在的重要性。

36. 见 Emil Lederer, *The State of The Masses* (New York: Norton, 1940); Hannah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 Co., 1951); Max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0); Philip Selznick,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52);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Norton, 1932); 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37. 见 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对极端贫困化何以使意大利南部社区组织衰落作了精彩描述。确实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瑞典的民间测验的资料证实,这些国家有些地方成人的 40%到 50%属于民间组织,而且比较不稳定民主国家——法国和德国——的成员比率,不比比较稳定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和瑞典——的成员比例少。这些结果对通常的看法提出了挑战,尽管不能作出确定的结论,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不可比的类别因素。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引起了进一步研究。关于这些国家的研究资料见下述论著。

关于法国,见 Arnold Rose,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4), p. 74; 以及 O. R. Gallagher,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France," *Social Forces*, 36(1957), pp. 154—156. 关于德国,见 Erich Reigrotzki, *Soziale Verfehl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Tübingen: J. D. B. Mohr, 1956), p. 164. 关于美国,见 Charles L. Wright and Herbert H. Hyma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of American Adults: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1958), p. 287; J. C. Scott, Jr.,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 (1957), pp. 315—326; 以及 Herbert Maccoby, "The Differential Political Activity of Participants in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958), pp. 524—533. 关于英国,见 Mass Observation, *Puzzled Peopl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7), p. 119; 以及 Thomas Bottomor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David Glass, e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 354. 关于瑞典,见 Gunnar Heckscher, "Pluralist Democracy: The Swedish Experience," *Social Research*, 15(1948), pp. 417—461.

38. 见 Walter Galenson, *The Danish System of Labor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另见 Galenson, "Scandinavia," in Glaenson, ed., *Comparative Labor Movements* (New York: Prentice-Hill, 1952), 特别见 pp. 105—120。

39. 见 Rudolf Heberl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Schweden*, 收入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 的 Vol. 39, (Jena: Gustav Fischer, 1925)。

40. 见 Ossip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am Main: Bollwerk-Verlag Karl Drott, 1948), pp. 213—214; 另见 Rose Laub Coser, *An Analysis of the Early German Socialist Movement* (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41. 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1951), p. 421。

42. 共产主义也控制了希腊工会和社会主义工党。希腊的情况,虽然符合这个模式,但完全不可比,因为那里没有前共产主义劳工运动,亲布尔什维克运动也是出自战时新工业部门工人的不满和俄国革命引起的热情。

43. Freidrich Engles, "The Letter to Karl Kautsky," Nov. 8, 1884, in Karl Marx and Freidrich Engels, *Correspondece 1846—189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6), p. 422; 另见 Val R. Lorwin, "Working-class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1958), pp. 338—351; 关于迅速工业化对政治之影响的精彩讨论,另见 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 pp. 112—118。

44. 作为政治体系外要素分析的一部分,在引入历史事件时,我将按照真正社会学,甚至是功能主义的传统行事。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就此明确指出的:“……社会系统的一种‘解释’就是它的历史,我们从那里可以知道这种系统——因为历史详细说明了这种系统何以呈现现在的样子和在它所在的地方出现。同一系统的另一种解释可以通过证明……它是社会心理学规律或社会功能规律的一个特例来得到。这两种解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A. R. Radcliffe-Brown, "On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37(1935), p. 401; 另见 Mar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pp. 164—188, 其中对历史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作了详细讨论。

45.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文章“‘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收录于他的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p. cit., pp. 72—93。

46. 在个别与各种社会特征多变量相关和相互作用的水平上,这种方法的方法论假设见 Paul F. Lazarsfeld, "Interpretation of Statistical relations as a Research Operation," in P. F. Lazarsfeld and M. Rosenberg, ed.,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5), pp. 115—125; 以及 H. Hyman,

Survey Design and Analysi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5), Chaps. 6 and 7。另见 Lipset, *et al.*, *Union Demo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pp. 419—432, 以及本书第十二章的方法论附录。

47. 这种方法与韦伯试图追溯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不同。韦伯寻求确定, 一种前提因素, 即某种宗教道德, 在逐渐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种共存条件中, 是决定性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关切不是确定任一因素的因果必然性, 而是找出那些最经常用以区分国家——经验上可分为“比较民主的”或“比较不民主的”——多种共存条件, 这不意味着定义有任何绝对性质。

第三章

社会冲突、合法性和民主

合法性和有效性

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的行动,即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当代民主政治系统的合法程度,主要取决于解决造成社会历史性分裂的关键问题的途径。

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组织是根据政治系统的价值标准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它是否合法。德国的军队、文职人员和贵族阶层,有相当一部分抵制魏玛共和国,不是因为这个共和国没效率,而是因为它的符号象征和基本价值观否定了这些人自身。合法性本身自然可以与多种形式的政治组织有关,包括压迫组织。在产业主义出现之前,封建社会无疑享有它的大多数成员的效忠。它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是一种晚近的历史现象,这是紧跟着一些团体间出现尖锐分歧而发生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团体可以围绕不同的价值标准组建,而以前认为,可接受的价值观是唯一的。

合法性的危机是变革的危机。因此,它的根源必须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求。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期间,合法性危机可以分别出

现在以下两种条件下：(1)主要的保守组织机构的处境在结构变革时期受到威胁；(2)社会上的主要团体在过渡时期或至少在它们一旦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在新的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的系统不能在时间长得足以在新的基础上确立合法性的时期内，满足主要团体（基于“有效性”的期望，则会出现新的危机。

托克维尔对失去合法性的第一种一般类型作了形象描述，主要是指从贵族君主政体向民主共和国过渡的国家：“……当一个民族的旧习惯被改变，公共道德被破坏，宗教信仰发生动摇，传统的魅力崩溃时，国家生活中有时会发生一些重大事件……”那时的公民“既没有君主政体的本能爱国主义，也没有共和国的理性爱国主义……他们徘徊在两种制度之间，陷入困惑和苦恼”。¹

然而，在这种过渡时期，凡主要的保守团体的符号和地位没有受到威胁，即使它们失去了大部分权力，民主反而更有把握的多。于是我们有这样奇怪的事实：欧洲和英语系的12个稳定民主国家，有10个是君主政体。²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是王国，或由一个君主统治；满足稳定民主程序条件的共和国，只有美国和瑞士，外加拉丁美洲的乌拉圭。

君主政体的保存，显然为这些国家保留了贵族阶层、传统主义者以及居民中不满日益民主化和平等主义那部分公职人员的效忠。由于承认下层阶级，而且在革命可能有必要的场合，不反对革命，保守的阶层赢得或保留了新“公民”的效忠。在君主政体被革命推翻，因而有次序的继承关系被打破的国家，与王权结盟的势力有时到第五代或更长时间一直拒绝承认共和国继承人的合法性。

在意大利，一个后来变成法西斯独裁的君主立宪政体，其合法性像法兰西共和国一样，没有得到社会上主要组织的承认。萨伏依王朝由于剥夺教皇的永久权力而疏远了天主教徒，因此在古老的两西西里(Two Sicilies)王国也不是合法的继承人。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徒一直被禁止通过教会参与意大利政治，而教会最终放弃它的地位，只是因为害怕社会主义者。这段时期，法国的天主教徒对第三共和国采取了同样态度。因此，法国和意大利的民主政体，不得不在它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在得不到各自社会左右两方重要组织效忠支持的情况下运行。由

此看来,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在于,在新的组织机构和制度逐渐产生的过渡时期,保持重要的传统一体化组织机构和制度的连续性。

丧失合法性的第二种一般类型,与不同社会处理“政治参与”时机——对新社会组织何时可以接近政治过程作出决定——的方式有关。在19世纪,加入新组织的主要是产业工人;而在20世纪,主要是殖民地的精英人物和农民。每当新组织在政治上变得活跃时(如当工人第一次寻求通过经济组织和选举权接近经济和政治权力时,当资产阶级要求接近和参加政府时,当殖民地精英分子坚持自己控制自己的国家时),使它们易于接近合法的政治机构往往能赢得它们对系统的忠诚,而这样又会使它们允许老的统治阶层保留自己的地位。在一些国家如德国,参与长期被否定,起初拒绝资产阶级参与,后来拒绝工人参与。于是,在武力用于限制参与的地方,下层阶级与系统疏远了,转而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而这又使更多新成立的团体不承认工人政治运动为合法运动。

除了使用革命手段以外,否认新阶层接近权力的政治系统,由于把太平盛世的愿望引进政治领域,也阻碍了其合法性的成长。而受到强迫、不得不进入国家的集团,往往容易过分夸大政治参与提供的可能性。因此,在压力下诞生的民主政体,不仅要面对忠于旧政权的团体不承认其合法的困难,而且会遭到那些认为变革没有满足其太平盛世愿望的人的抵制。过去的法国就是个例子:右翼教权主义者把共和国看作是非法的,而下层阶级部分人发现自己的愿望远没有得到满足。今天,许多新独立的亚非国家面临着争取人民大众忠于民主政府的棘手问题,因为它们几乎不能满足民族主义运动在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时期所提出的乌托邦目标。

一般地说,甚至在政治系统有正常的有效性的时候,如果主要保守团体时时受到威胁,或者在关键时期,不允许新出现的组织接近政治,这个系统的合法性仍然会受到怀疑。另一方面,有效性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则会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

对合法性的主要检验,是看特定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长期政治文化”的程度,主要是指全国性典礼和节日。³美国在对其国家的缔造者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他们的原则的一致崇敬声中已经建立了一种共同的均质文化。这些为所有美国政治家所认同的共同要素并不是所有民主社会都具备的。在一些欧洲国家,左右两派有不同的象征和历

史英雄。法国是这类国家的一个最突出例子。正如赫伯特·卢西(Herbert Luethy)所指出,那里自 1789 年开始的、就使用不同象征的竞赛“仍在进行,争论依然没有解决;这些(有主要政治分歧的)日子中的每一个仍然以它们历史所决定的全部纪念意义,分割着左的和右的,教权的和反教权的,进步的和反动的”⁴。

要想分析国家制度面临有效性危机时的稳定性,至关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制度的相对合法程度。对于特定政治系统来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四元图表示;图中各种可能的组合可以说明不同国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特征。

		有效 性	
		+	-
合 法 性	+	A	B
	-	C	D

落在 A 格中的社会,即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程度都很高的社会,具有稳定的政治系统,如美国、瑞典和英国。⁵无效且不合法的政权落在 D 格中,按定义,应是不稳定的和分裂的,除非它们以暴力来维护独裁政权,如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匈牙利政府和民主德国政府。

图中其他组合可以说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一些不同国家的政治经历。在 20 年代末期,无论是德国,还是奥地利,都不具有本国居民大部分及其强有力部分承认的合法性,但这两个国家仍保持着正常的有效性。⁶按照上图,这两个国家应落在 C 格中。当一些政府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失去了有效性,但因为它们有很高的合法性,所以仍是民主政府时,德国、奥地利、西班牙一类国家失去了它们的自由,法国侥幸逃脱了类似的命运。若用上图来说明这些变化,从 A 移到 B 的国家仍然是民主的,而从 C 移到 D 的国家则是衰落的。1940 年军事上的失败宣告法国民主的合法性程度降至低点。正是这个丧失全部合法性的民主为傀儡政府提供了大规模支持。⁷

类似上述的情况证实了这种分析的实用性。从短期观点看,一个高度有效然而不合法的系统,如一块统治有方的殖民地,比那些有效性相对较低、合法性很高的政权更不稳定。泰国等一类国家,不考虑周期性政

变,其社会稳定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与毗邻的前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几代人时间的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是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那些已经较成功地适应工业系统需要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动荡是最少的,因而不是保留了传统的合法性,就是树立了强大的新象征。

拉丁美洲从伊比利亚半岛继承下来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使其拒绝接受前英国殖民地的领导,那里的共和国从未建立合法性象征和合法性意识。亚洲和非洲新建立的政治民主国家,其生存将主要取决于它们满足其居民长期需求的能力,这多半是指它们处理工业化问题的能力。

合法性与冲突

经常性的凶兆是一切民主系统固有的,而作为民主生活血液的组织冲突,可以在它们威胁要使社会发生分裂时冻结。因此,足以用来节制党派斗争强度的条件,在民主政府所要求的关键条件之列。

因为冲突调和状态的存在其实是定义合法民主的另一种方式,所以确定这样一种最佳状态的主要因素,与那些产生合法性——从符号象征和身份地位连续性来看的合法性——的因素密切相关,是不足为奇的。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性的主要分歧的性质和内容,基本上是由一些历史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一直影响着造成社会分裂的主要问题如何解决,或为什么长期悬而未决。

西方国家在现代出现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教会抑或各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第二,承认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经由普遍的选举权和集体交涉权充分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公民身份”;第三,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持续不断的斗争。

这里的困扰在于:上述问题是一个一个地解决,还是在将来的问题出现之前,每个问题都或多或少解决一点?或者是任凭问题积累下来,以致传统的分歧源与新的分歧源搅在一起?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有利于稳定的政治系统吗?把问题拖下去,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对政治

环境又会怎样？是平添它的苦涩和挫伤，还是增加它的宽容和折中。各个人和各个党派显得迥然不同，这不仅在于解决现存问题的方式上，而且在于根本对立的见解上。这意味着，他们把自己对手的政治胜利视为主要道德威胁，因此，整个系统结果缺乏有效的价值整合。

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经过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斗争，在大多数新教国家已经解决。例如，在美国之类的国家，教会已与国家分离，并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在另一些国家，如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瑞士，宗教仍受国家支持，但国家的教会，像君主立宪的君主一样，已不再成为争论的主要根源。不过，欧洲的一些天主教国家也在为我们提供例证，说明教权势力与反教权势力的历史性争论，直到现在仍在继续造成人们政治上的分裂。在这样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地利，作为天主教徒意味着与政治上的右翼团体或保守团体结盟，而作为反宗教人士或作为少数派宗教的成员，意味着与左翼势力结盟。其中一些国家，这种宗教问题又叠加上了新问题。对于保守的天主教徒来说，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仅仅是经济斗争，也不是对于社会制度的争论，而是深深根植于上帝与撒旦之间的冲突。⁸在当代意大利的许多世俗知识分子看来，是反对教会给了与共产党人结盟的合法地位。由此看来，只要宗教的关系继续支持世俗的政治联盟，折中和民主交换意见的机会就是渺茫的。

“公民身份”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美国和英国在 19 世纪就给了工人投票权。在瑞典一类直至 20 世纪初一直在进行抵制的国家，争取公民身份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成了一种政治运动，进而产生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在否认工人有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场合，他们为争取收入和政治地位再分配的斗争可以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如果让经济和政治地位斗争在革命意识形态之外发展，则与这种斗争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渐进主义的改革思想。举例来说，1918 年革命以前，普鲁士工人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投票权，因而他们迷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德国南部，工人在 19 世纪末得到了充分的公民权，所以，那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民主的和非革命的。不过，该国的社会民主党继续信奉革命的教条。这些教条足以给极左分子的党的领导人以发言权，使共产党人在军事失败之后继续加强力量；或许在历史上更重要的是，这些教条吓住了大部分担心社会主义胜利

将结束他们特权和地位的德国中产阶级。

在法国，工人争得了选举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拒绝给予基本的经济权利。大量法国雇主拒绝承认法国的工会，每次工会胜利之后，都想方设法削弱和破坏它们。法国工会的不稳定性以及它们为了生存而经常需要保持好斗精神，使工人很容易受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号召的感染。共产党人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可以从法国工商阶级的策略中找到原因。

上述例子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处理本国的基本分歧的方式不同，不过，它们足以说明稳定的民主政府的条件，在什么方向上与多样性的基础有关系。在一些历史分歧错综交织构成思想政治基础的场合，民主将是不稳定的和脆弱的，因为根据定义，这种政治不包含宽容概念。

具有这种纷乱思想体系的政党，将试图建立一种德裔美国政治学家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称之为“大一统的”环境，而在这种环境中，党员的生活是限于有思想牵制的活动。唯其如此，是基于党认为，重要的是要使它的追随者与非信徒的“谎言”隔离。纽曼曾提出，必须对强化民主的代表制政党和削弱民主的一统制政党之间的基本区别进行分析。⁹前者以英语系民主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大多数政党为代表，除宗教性政党外，还有大多数中立党和保守党。这些党把选举期间获得选票视为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一。相反，一统制的政党所关心的是使世界符合它们的基本哲学。它们不把自己视为压力政治的平等竞赛中的竞争者，而是看作神圣真理或历史真理为一方与根本谬误为另一方之间大搏斗的卫道士。基于这种世界观，它们必然阻止它们的追随者面对来自与外界接触而产生的交叉压力，因为这种接触会损害他们的信心。

遵循这种做法的两个主要非极权主义组织是天主教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在1939年以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天主教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社会、经济组织网，使它们的追随者在其中过他们全部日子，来增进宗教内或阶级内的交流。奥地利在这方面或许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国内两个组织，天主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不仅在前述三个历史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且把它们的大部分社会活动扩大到与党或教会有关关系的组织中，遂使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¹⁰至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性质的极权组织，通过完全按斗争来解释万事万物，把它们政治生活的一

统特征扩展到尽可能大的范围。

即使是民主的政党,力图使其社会基础脱离交叉压力,显然也会破坏稳定的民主,而稳定的民主需要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的轮流换班,需要解决政党之间长期的争论。与世隔绝固然可以强化对党或教会的效忠,但也阻碍了党接触新的团体。奥地利的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大部分选民属于一统制政党时会阻碍选举过程。民主政治的必要规则认为,党内外的双向转化是可能的和正常的,因此,希望通过民主方式获得多数票的政党,最终必须放弃对一统制的强调。由于工人阶级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已取得完全的公民身份,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已放松了一统制。现在仍坚持这种做法的非极权主义政党只是一些宗教政党,如天主教的政党或荷兰的加尔文派反革命党。显然,天主教派和荷兰加尔文教派在宗教圈内是不“民主的”。它们在政治上像共产党人和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坚信只有一种真理。天主教徒可以承认政治民主的假设,但决不接受宗教宽容的前提。于是,在宗教与非宗教的政治冲突被天主教徒或其他信仰者视为突出问题的场合,民主进程将进退两难,面临一种真正的困境。许多很容易调解的政治争端,会由于宗教问题而加剧,不能得到解决。

如果社会结构的运行自然造成一种环境,使具有相同政治观点的个人或团体不能与其他不同观点的个人或团体相接触,那么这些离群的个人或团体往往要支持政治极端主义。例如,人们一再提到,在所谓“与世隔绝”的产业工作的工人,如矿工、海员、渔夫、伐木工、剪羊毛工和码头装卸工,因居住在同行业人为主的社区,一般会给较左翼的政见以压倒优势的支持。¹¹这种社区往往大多数人投共产党或社会主义者的票,有时甚至呈现“一党”制的色彩。以农民为基础的组织在危机时期所表现的政治偏执性,或许可以作为这种行为模式的另一种例证,像与世隔绝的产业中的工人一样,农民与那些受雇于大多数城市行业的人相比,有着更为相同的政治环境。¹²

这些结论进一步得到个人选举行为研究的证实。这种研究表明,处于交叉压力之下的个人不可能在政治上受到明显禁锢。¹³这里所说的处于交叉压力下的个人是指:从属于在各个方面影响他们的组织的人;有朋友支持不同政党的人;经常受到不同组织宣传的人。

多元的和政治上不一致的隶属关系、效忠和刺激因素，可以缓和政治选择中的情感和挑衅性。举例来说，在当代德国，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天主教徒，由于受到两个方向上的牵引，一方面最可能投基督教民主党的票，另一方面又比普通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天主教徒对社会民主党宽容得多。¹⁴如果一个人属于多种组织，而这些组织都使他容易接受同一种政治选择，那么他实际上与前述与世隔绝产业中的工人一般无异，极少可能对其他意见持容忍态度。

可供利用的证据表明，当组织和个人有几种政治上交叉相关的隶属关系时，稳定民主的机会就进一步增加；当社会总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受到相互冲突势力的牵引时，它的成员会关注紧张的政治冲突趋于缓和。¹⁵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塔尔科特·帕森斯所指出，这样的组织和个人也会关注保护政治少数派的权利。¹⁶

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参与竞争的各方政治势力之间保持相对适中的张力。在新的争端出现之前，系统若有解决重大分歧性问题的能力，有助于政治上的缓和。如果让宗教、公民身份和“集体交涉”三个问题积累起来，它们会互相促进，越演越烈，因此，分歧的根源越是互为补充、互为关联，政治宽容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样，与多种政治刺激因素距离越远，背景因素就越在一个方向上“聚积”，团体或个人持极端主义观点的机会也就越多。这两种关系，一种是表现在党派纷争方面，另一种是出现在党内支持方面，而当政党面对积累下来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寻求使其追随者远离冲突刺激时，它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出现。产生政治上的世界主义的最佳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那些条件，即城市化、教育、传播媒介的发展和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大多数显然与世隔绝的行业，如采矿业、伐木业、农业，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正是那些相对占有劳动力急剧下降的行业。¹⁷

因此，涉及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与确立合法性和宽容的那些因素相关的。不过，应该始终牢记，相关只是对于一致的相对程度的说法，而且政治行动的另一个条件是，人们不能等到相关性已很不清晰再采取行动来改变事态的方向。因此，这种缺乏高度相关也意味着，就分析的宗旨来说，应当把变量区别开来，即便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分析这里说的分歧，是指出不同的选举安排和宪法安排会影响民主机会的特定

方式。这些问题将在下节讨论。

政 体

如果分歧的交叉基础使民主更有生命力,那么由此可见,在所有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两党制优于多党制,以行政区域为基础选举公职人员比比例代表制更可取,联邦制比单一国优越。当然,多党制、比例代表制和单一国都有稳定的民主。事实上,我要论证的是,政体的这些变化远没有从前面几节所论述的基本社会结构区别引出的那些基本区别来得重要。尽管如此,它们仍可能造成总体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

主张两党制的立论是基于如下假设:在一个复杂社会中,政党必须是广泛的联盟,不应为一个主要集团的利益服务,不准搞一统制,而应寻求在偏向与反对党结盟的团体中赢得支持。例如,英国的保守党或美国的共和党,基本上不招惹体力劳动者的反感,因为其大部分选票必须来自他们。针对中产阶级,民主党和工党也面临类似问题,有一些政党从来不以得到多数票为目的,而是寻求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选举支持;如“工人”的党——注重工人阶级利益;又如主要对小企业主有感染力的党——也是强调其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些分裂出来的小派别来说,选举并不是通过使不同的团体确认它们的共同利益,从而寻求建立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基础的契机,而是要利用选举来强调分歧,把支持它们的人与社会其他部分分隔开来。

有人认为比例代表制与其说强化民主,毋宁说弱化民主,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多党情况与多数派党情况之间区别的分析。如前所述,倘若多党的存在真的加剧了分歧,削弱了共识,那么任何为较多的党而不是为较少的党增加机会的选举制度,都会有害于民主。

而且,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所指出,选举代表选区的议员,而不是(像比例代表制所鼓励的那样)选举代表团体的议员的选举制,会迫使各团体在选举系统内掩盖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涉及多种利益和妥协的必要性。¹⁸

联邦制会由于把地区性利益和价值标准加于联系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其他地区而增加产生多种分歧源的机会。这种一般性规律的一个主要例外出现在联邦制把国家沿基本分歧方向分开的场合,如在不同种族区、宗教区或语言区之间,像印度和加拿大所作的那样。民主需要语言集团或宗教集团内部的分歧,不需要集团间的分歧。然而,如果不存在这种自然分野,联邦制似乎有利于民主。除了产生一个较远的交叉分歧源外,联邦制还提供了托克维尔提到的另一些不同功能,如共享强大民间组织的支持,阻止权力集中、培训新的政治领导人,为在野党提供过问整个系统大事的途径,因为两个全国性政党通常仍继续控制系统的某些单位。

我也许要再次强调,我不认为政治结构的这些方面对于民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基本的社会条件有助于增进民主,比如说像瑞典那样,那么,纵使融多党制、比例代表制和单一国为一体,也不会严重削弱民主。民主最多不过允许不负责的少数派在议会得到个立脚点。然而,在过去的魏玛德国和法国之类国家,低水平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削弱了民主的根基,而鼓励多党发展的宪法因素又进一步减少了系统生存的机会。

当代的挑战: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20世纪中期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它们处于“后政治”阶段,亦即,民主的左右两翼之间相对没有多少分歧,社会主义者是温和的,保守派承认福利国家概念。这种情况主要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工人在这些国家已经赢得了他们为完全的公民权而进行的斗争。

现在,下层阶级的代表已进入统治集团,成了权力俱乐部的成员。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工人进入合法的政体——业已得到解决。¹⁹今天国内的关键问题是对凯恩斯福利国家框架内总产品的分配差别进行集体谈判,而这个问题在双方都不需要极端主义,或鼓励极端主义。不过,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整合入社会,但它仍然具有权力主义倾向,这在某些条件下表现为支持极端主义的政治和宗教运动。关于这种倾向的根源,将在第四章进行探讨。

在拉丁语系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工人阶级争取进入政体的斗争在共产主义者登上舞台之前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事实大大改变了政治竞赛的形势。共产主义者不能像社会主义者那样纳入社会系统。民主社会也不可能给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他们的政党和工会接近实际政权的权利。共产主义者的自我评估，尤其是他们与苏联的关系，导致他们相信这样一个自力完成的预言：他们不能通过民主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信念妨碍了他们得到接近政权的许可，转而又加剧了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对政府的疏远感。比较保守的阶层也因此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给工人或其代表日益增多的权利将威胁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可见，共产主义者的出现粉碎了这个不严谨的预言：经济发展将使这些欧洲国家的民主稳定化。

在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在欧洲，工人曾经面临从处在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工商业阶层手中争取公民身份的问题。而在亚洲和非洲，一方面殖民统治者的长期存在，已使保守的意识形态和比较富裕的阶级成了殖民主义的附庸，另一方面，左翼意识形态，通常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变种，已与民族主义融为一体。亚洲和非洲的工会和工人政党，从民主制度一开始，就是政治过程的合法部分。可以设想，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稳定的民主，所不同的只是，取得这些政治权利先于稳定经济、大中产阶级和工业社会的发展。

整个世界系统正在发生错位。稳定的欧洲民主国家的左翼在争取更多民主的过程中已逐渐发展壮大，表达了工业化早期产生的不满，而右翼仍然保有社会中因循守旧部分的支持，直至最终随着双方的缓和已进入一种自然而然的平衡。在亚洲，左翼现在是在人口膨胀和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执政，因此将不得不承担全部最终痛苦的责任。然而，像在欧洲的贫穷地区一样，共产主义者利用所有这一切不满，现已成为一个主要政党——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是第二大党。

由于存在大量的贫民、低水平的教育、拉长的金字塔形阶级结构以及民主左翼“早熟的”成就，亚洲和非洲政治民主的前景是暗淡的。最有希望的国家——以色列、日本、黎巴嫩、菲律宾和土耳其——趋于在一个或几个主要因素上类似于欧洲：教育水平高（除土耳其外的所有国家）、一个稳步成长的中产阶级、保守团体保有政治合法性。其他国家，无论处于何

种政治形态之下,将更深地受制于某种经济发展速度和国家独立,而不是诉诸我们的民主模式所例证的政党政治和自由选举的程式。在避免了军事独裁的国家,政治发展将仿效在加纳、几内亚、突尼斯和墨西哥一类国家所确立的程式: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利用群众运动和左派口号行使有效的控制,并把选举作为实现最终民主目标的一种姿态和评估舆论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视为权力合法更替的有效制度。²⁰由于迅速工业化的压力以及急需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贫穷和饥荒问题,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新政府将不可能支持一种从根本上反映不同阶级之地位和价值观的开放性政党制度。²¹

如同亚洲一般经济上不发达的拉丁美洲,政治上比较接近19世纪早期的欧洲。大多数拉美国家在产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之前已成为独立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有强大的传统保守主义势力存在。乡村居民往往不关心政治,或因循守旧,左派运动主要从工业无产阶级那里获得支持。举例来说,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择取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城市工人的路线,而没有选择毛泽东寻求农民支持的“延安道路”。²²倘若任凭拉丁美洲自行发展,并能提高其生产率,许多拉美国家很有可能沿着欧洲的方向前进。最近的发展,包括推翻一些独裁政府在内,是中产阶级成长、财富增加和教育提高的表现。不过,这些国家仍然存在沿法国和意大利方向而不是沿北欧方向发展的巨大危险。倘若沿前一种方向,共产主义者将掌握对工人的领导,中产阶级将疏远民主。可是,一旦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出现,区分“左”“右”政治倾向的关键性特征就不再足以作为划分民主的支持者和民主的反对者的标准。而到那时,要在具有各自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各自的民主倾向和极端主义倾向的左、中、右之间作进一步区分,如第五章所表明,需要先阐明“集权主义”问题及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下两章继续探讨民主秩序的条件。那将是通过对比引起工业社会各阶层支持极端主义运动和权力主义价值标准的因素作较为详细的考察,以进一步探讨这里提出的问题。

注 释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Vintage ed., 1945), pp. 251—252.

2. 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谈到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国看上去更能“保护有自由的秩序”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共和国,统治权由于已经完全世俗化而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威仪;倘若你更喜欢的话,可以剥去它固有威仪的全部光环”。见 *The Public Philosophy*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6), p.50。

3. 见 Gabriel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18(1956), pp.391—409。

4. Herbert Luethy, *The State of France*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95), p.29。

5. 美国南方的种族问题的确对它的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构成一种基本挑战,曾经一度打破了全国秩序。这种冲突直到现在还削弱许多南方白人对民主竞赛规则的信仰。只要天主教的爱尔兰仍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就有类似的问题。有效的政府不能使爱尔兰满意。双方在北爱尔兰的政治实践,还说明一个在其大部分居民看来不合法的政府的问题。

6. 奥地利共和国被天主教和保守派视为不合法政权,这构成了该共和国的持久危机。关于这个问题的卓越分析,见 Charles Gulick, *Austria From Hapsburg to Hit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7. 凯瑟林·芒罗(Katherine Munro)对法国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极好描述。“右翼党派从未完全忘记反革命的可能性,而左翼党派复活了它们富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战斗精神的革命。每方都疑心对方利用共和国达到自己的目的,都疑心对方一旦达到目的就成为唯一合法的。这种相互猜疑经常使共和国陷于瘫痪,因为它阻碍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发展,而政府的困难又削弱了民众对政权及其统治的信心。”转引自 Charles Micaud, “French Political Parties: Ideological Myth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Sigmund Neumann, e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108。

8. 民主不稳定性与天主教的关系,也可以用天主教作为一种宗教系统的固有因素加以解释。民主需要一种普遍的政治信仰系统,这是在它承认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合法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设想,在不强调自己是唯一正确教派意义上信仰比较普遍的宗教价值系统,将比那些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宗教价值系统,与民主更相容。与其他大多数宗教教派相比,天主教派坚持后一种信念要顽固得多,而这后一种信念,要使宗教价值系统帮助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要求把信仰通过对立信念的冲突达致最大的“善”作为其基本价值系统的一部分——取得合法性是困难的。

金斯雷·戴维斯(Kingsley Davis)论证说,天主教国家的教会倾向于与民主不相容,因为“天主教试图控制生活的方面之多,鼓励地位永恒和服从权威之强烈,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程度之高,使它永远用与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自由、灵活性与主权相冲突。”见“Political Ambivalent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1 (1943),转载于 A. N. Christensen, *The Evolution*

of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Henry Holt, 1951), p.240.

9. 见 Sigmund Neumann, *Die Deutschen Parteien: Wesen und Wandel nach dem Kriege* (Berlin: Junker und Dünhaupt Verlag, 1932)。文中给出了一统制政党与代表制政党的区别。纽曼(Newmann)还在他的近著中进一步区分了“民主统一制”党(天主教党和社会民主党)和“大一统”党(法西斯党和共产党)。见他的“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收入他主编的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op. cit.*, pp.403—405。

10. 见 Charles Gulick, *op. cit.*

11. 见本书第七章。

12. 这种趋势显然是随所讨论城市社区、乡村层次化类型等而变的。关于行业同一性和政治交流在农民中的作用的讨论,见 S. M.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Chap. 10,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Activity”。关于乡村居民不民主倾向的证据,见 Samuel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5), pp. 138—139。日本国家舆论研究所在 Report No. 26, *A Survey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Tokyo, 1951)中报道,农民是最不关心公民自由的行业集团。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在说明德国农民中的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势力时指出了与这里所讨论因素相类似的因素。他写道:“乡村居民是比较同一的,其中外来人和外国人很少,极少接触到外国和外国的人民,他们的流动性也是极其有限的。”Carl J. Friedrich, “The Agricultural Basis of Emotional 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937), pp.50—51。

13. 关于“交叉压力”对个人和团体行为之影响的一般性论述,可以在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50年前写的著作中找到,这或许是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见 *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pp.126—195。齐美尔早已使用了交叉压力的概念,而在选举中这个概念不得不再次被独立发现,这是社会研究不连续性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关于多组织隶属关系对一般政治过程的影响的详细讨论,见 David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14. 见 Juan Linz, *The Social Bases of German Politic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15. 见 Bernard Berelson, Paul F. Lazars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书中说明了交叉压力作为解释性概念的实用性。另见本书第六章,其中试图说明不同组织身份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并对有关文献作了评述。

16. 如达尔(Dahl)所述:“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止认同于一个组织,那么会出现某种积极的可能性,因为任何多数派中都有与受威胁的少数派相同目的认同的人。这些置身于多数派而又强烈偏爱自己原来选择的少数派成员,会使他们的感情为暂时的多数派、但在某种心理水平上也认同于少数派的那些成员所了

解。于是,这些同情者会有某些人收回对多数派选择的支持,多数派由此将走向瓦解。”见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p. 104—105。帕森斯(Parsons)指出:“把政治分歧的含义推得太远可以激活两党信徒在非政治基础上的团结感,使政治多数派的成员起而捍卫那些分享了他们的部分利益而又与他们有政治分歧的人。”见帕森斯的论文“Voting and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n E. Burdick and A.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p. 93。关于挪威环境中的这个问题,最近的讨论强调了“交叉冲突的一体化功能……当投票人所在团体之间的冲突方向与不同政治倾向报纸读者的分野不一致、形成相互交错局面时,处于交叉压力下的选民,会有相当大比例改变立场……在挪威的环境中,有一种有趣的双向互相约束的过程:一方面,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投票人常常接触来自反对党的报道,另一方面又看到非社会主义者的报纸,正因为它们在许多情况下控制了它们的社团和要向政治上各种不同意见的组织讲话,所以在表达冲突意见时作了许多约束。”Stein Rokkan and Per Torsvik, “The Voter, the Reader and the Party Press”(Mimeographed, Oslo: 1959)。

17. 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40)。

18. Georg Simmel, *op. cit.*, pp. 191—194。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最近提出类似观点:阻止“全体选民进一步加深分裂”的方法之一,是“用网状相关的社会结构——虽然存在相关性,但在政治极化与其他分歧基础之间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介入选举”。Talcott Parsons, *op. cit.*, pp. 92—93。

19.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分析了19世纪工人阶级进入国家政体的渐进过程,看到作为实现一种“基本人类平等”的过程,“是与实现完全的社员成员身份相联系的,也与突破经济不平等的上层建筑并行不悖”。见他的论著: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77。虽然普遍公民身份开辟了向社会不平等提出挑战的道路,但也为这样一种信仰提供了基础:走向平等的社会变革过程应保持在民主制度可允许的冲突范围内。

20. 见 David Apter, *The Gold Coast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其中讨论了加纳的政治模式。关于墨西哥“一党”制的有意义而简洁的分析,见 L. V. Padgett, “Mexico’s One-Party System, a Re-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1957), pp. 995—1008。

21. 当本章正在撰写时,几个贫穷而文化落后国家中的政治危机发生了,这再次削弱了不发达地区民主政府的不稳定性。巴基斯坦政府于1958年10月7日被和平推翻,自封的新总统宣布:“西方式的民主目前条件下在这里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只有16%的人识字。而在美国,你会看到有98%的人有文化。”(Associated Press release, October 9, 1958。)新政府解散了议会和所有政党。与此同时,在突尼斯、加纳,甚至在缅甸——在吴努总理领导下,据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比较稳定的政府之一——也发生了类似的危机。几内亚开始了作为一党制

国家的政治生命。

军事半专政体制在没有强大民主“阵线”的情况下公开出现,可能反映出这个地区在苏联意识形态冲击下民主象征的削弱,而这种意识形态是把“民主”等同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而不是通过特定的政治体制和方法,迅速有效地实现“人民意志”。

22. Robert J. Alexander,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¹

人们逐渐认识到,极端主义和偏执的运动,与其说是以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不如说更可能根植于下层阶级,这使左翼民主派知识分子处于一种痛苦的两难境地;他们一度相信,无产阶级必然是一种要求自由、种族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意大利社会主义小说家伊格内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是自由动力的神话已连同其他有关进步的神话一起破灭。最近纳粹工会的例子,如萨拉扎尔(Salazar)和庇隆(Peron)的那些组织,至少已使人确信这一点,虽然有些人是仅以共产主义向极权主义蜕变为理由勉强承认的。”²

最近,这种看法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美国南方工人支持白人公民理事会和种族隔离政策,而英国的许多工人积极参加了1958年的种族骚乱。刊登在左翼社会主义杂志《新政治家》上的一篇题为《与一个法西斯暴徒(一名参加殴打伦敦黑人的18岁的临时工)的对话》的文章,对这种有时发展到极顶的意识形态综合征作了形象描述。作为分析考察现代社会下层阶级环境中的权力主义因素的引子,这里详细提出这个叫莱恩的人的看法。

“那”就是为什么我“要跟着法西斯”,他说。“他们”反黑人。那个萨蒙那,他“是个共产党人。工党也是共产党。工会也是”。他说他的父母都是工党的支持者。问他反不反工党?他说:“不,我拥护工党。你知道,工党是为我们的。我也拥护工会。”问他要是共产党人控制工会呢?他回答说:“当然,我喜欢共产党。它强得很。”问他如果法西斯恨共产党,他会如何?

莱恩说：“这个，你知道，法西斯反黑人，我就拥护它。唉，其实法西斯是为有钱人的，对了，像保守党一样。大家都拥护统治者，人们喜欢它。不过，共产党非常强大。”我告诉他英国共产党很小。

“可是，”他说，“背后有俄国呀！”声音充满了惊异。“我羡慕俄国。你明白吧，是人民。他们是和平的。他们有力量。他们说干就干。不像我们。你想想，他们有武器，大手一挥，能把我们都消灭，那我们就全完了。真不得了，那些俄国人。他们说干就干，在匈牙利就干了。我真可怜那些匈牙利人。你看，俄国人一到，他们不就老实了吗！多少坦克呀。不像我们在塞浦路斯，当兵的后背挨枪，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³

这是工人阶级种族偏见和支持极权主义政治运动的突出表现，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舆论、宗教、家庭模式和人格结构的研究。这方面的许多研究表明，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对政治持刻板 and 偏执态度的个性。

初看起来，政治史的事实似乎与此相矛盾。工人的组织和政党，自从它们在19世纪开始出现以来，在推进政治民主和开展进步的政治经济斗争中，一直是主力。在1914年以前，工人阶级的左派政党与经济上有特权的右派政党之间的传统划分，不是仅以它们对收入、地位和教育机会再分配之类问题为基础，而且还以公民自由以及国际政策为基点。工人，从他们政党的政策来判断，往往是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国际和平而战的骨干，而欧洲大部分地区由保守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所支持的政党，则倾向于偏袒较极端的政治形态，抵制选举权的放宽，固守旧有的教派，支持侵略性的对外政策。

1914年以来的事件逐渐打破了这些模式。在一些国家，工人阶级团体已证明自己是居民中最富民族主义的部分。它们站在反对给少数民族团体平等权利斗争的前沿，并想方设法限制外来的移民，或在开放移民的国家，推行种族本位。反法西斯时代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表明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是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的简单变种。共产党在其拥有强大力量的所有国家，主要是得到了工人阶级的下层或乡村居民的支持。⁴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政党是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党。社会党从中产阶级中所得到的支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共产党要多得多。

某些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曾指出,就工人阶级中的权力主义倾向来说它并没有证明什么,因为共产党常常冒充是寻求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西方传统民主理想的党。他们说,大多数共产党的支持者,特别是受教育少的人,受骗相信共产党人只是战斗精神更强、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我要提出另一种假说: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不妥协性和偏执性,与其说是紧张状态的根源,不如说它们吸引着低收入、低地位职业、低教育水平的广大阶层的成员,而这个阶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基本上是指工人阶级,尽管不是专指这个阶级。

低阶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比较穷的低教育水平国家,使这个阶层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结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喜欢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并具有一贯不变的观点。

当然,任何社会阶层或阶级的“集权主义”都是相对的,而且常常由于组织对民主的信仰和个人所受的交叉压力而有所变化。就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来说,下层阶级可能比上层阶级更富权力主义,但在“绝对”水平上,这个国家各个阶级的集权主义又可能比另一国家的任何阶级的集权主义都少。像在英国这类国家,宽容准则已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确立,甚至最下层的阶级也比不发达国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阶层要少一些集权主义,多一些“理智老练”,因为在不发达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危机冲击着每个阶级,各个团体都想寻求短期解决办法。⁵

下层阶级个人所属主要组织对民主程序和民主理想的信奉,可能比支撑这些人的个人价值,无论多么富于集权主义色彩,更能影响他们的实际政治行为。⁶已经为社会和经济权利进行过成功斗争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出现之前)业已确立对民主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步忠诚,这样的工人阶级将不容易改变其业已确立的态度。

个人(处于交叉压力下)服膺其他价值或制度也可能超越已经十分确定的先入之见。例如,一位强烈反资本主义的法国、意大利或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仍可能投各自国家相对保守政党的票,因为他的天主教感情强于他对自己阶级地位的不满;而一个强烈倾向于集权主义的工人,面对法西斯的攻击,可能因为他与反法西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的联系而捍卫民主制度。相反,那些不热衷极端主义政治的人却可能因为极端主

义政党纲领和政治角色的某些方面而支持这种政党。许多人在 1936 年和 1943 年支持共产党就是因为把它作为一个反法西斯的国际主义政党。

由此看来,某些特定社会阶层支持极端主义政党或支持民主政党的具体倾向,不可能根据对它们心理前兆的认识,或根据从调查资料推断的态度作出预测。⁷不过,证据和理论都表明,下层阶级相对更富集权主义,极端主义运动比温和的民主运动对它们更有吸引力,而且,它们一旦被缺乏民主的组织吸收,就会亲近这种组织,相反,这种组织的比较有教育或比较明智练达的支持者将倾向于离去。⁸

民主与下层阶级

世界各地的较贫穷的阶层,在经济问题上是比较开明的,或者说是比较左的;他们拥护国家采取更多的福利措施,向往更高的工资,拥护收入累进税,支持工会,等等。但是,当开明思想用非经济标准——如支持公民自由、国际主义等——来定义时,这种关系颠倒了:较富裕的阶层比较开明,较贫穷的阶层比较偏执。⁹

来自一些国家的民意测验资料显示,下层阶级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信奉远不如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例如,195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隆研究所在德国进行了一项调查,向系统抽样的 3 000 名德国人提问:“如果存在一党、几党和无党三种情况,你认为哪一种情况更好?”按照职业地位对回答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人阶级和乡村居民的下层对多党制的支持(西方化国家中测度民主态度的合理指标)多半不如中层和上层(见表 4.1)。

1958 年,就类似问题在奥地利、日本、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发放了全国性或地区性样本进行提问,得到了可供比较的结果。虽然赞成多党制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但每个国家赞成比例最小的多半都是下层阶级。¹⁰

表 4.1 德国不同职业组优先选择何种政党制的百分比(仅男性)

职业组	几党	一党	无党	没回答	总人数
文职人员	88	6	3	3	111
上层白领	77	13	2	8	58
自由职业者	69	13	8	10	38
熟练工人	65	22	5	8	277
艺人	64	16	9	11	124
下层白领	62	19	7	12	221
工商业者(小)	60	15	12	13	156
农民	56	22	6	16	241
半熟练工人	49	28	7	16	301
非熟练工人	40	27	11	22	172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隆研究所(UNESCO)向作者提供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资料卡计算。

为了获得各阶层对公民自由或各种少数民族权利问题的一般性反应,在日本、英国和美国设计了调查,并得到了类似结果。在日本,工人和乡村居民比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较多集权主义,较少关心公民自由。¹¹

在英国,心理学家 H. J. 艾森克(H. J. Eysenck)发现,在一般社会观上“意志坚强的”人与“意志薄弱的”人之间,有可比较的差别。“意志坚强的”人往往不宽容对规范化道德或宗教准则的偏离,反黑人,反犹太人,憎恨外国人;而“意志薄弱的”人则宽容偏离,没有偏见,是国际主义者。¹²根据对英国不同政党支持者态度上的倾向性进行排队,艾森克总结了其研究成果后报道说:“中产阶级的保守党人比工人阶级的保守党人意志薄弱;中产阶级的开明人士比工人阶级的开明人士意志薄弱;中产阶级的社会党人比工人阶级的社会党人意志薄弱;甚至中产阶级的共产党人也比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人意志薄弱。”¹³

来自美国的各种调查的证据也是清楚的和一致的——下层阶级最不宽容。¹⁴其中最系统的研究是由塞缪尔·A. 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进行的,他在全国范围抽样调查了近 5 000 名美国人,用样本对共产党人、宗教批评家、工业国有化拥护者等对言论自由权之类公民自由问题的回答为尺度,把他的回答者分成了三类:“比较不宽容的、中等的和比较宽容的。”如表 4.2 所列数据所表明,宽容性随社会地位层次的上升而提高。体力行业只有 30%的人属于“最宽容”类,恰好与专业人员的 66%,企业主、管理人员和官方人员的 51%形成对照。像在德国和日本一样,农民的宽容性也是很低的。

表 4.2 男性回答者对公民自由问题持“比较宽容”态度的比例

专业人员和半专业人员	66%(159)
企业主、管理人员和官方人员	51%(223)
职员和销售人员	49%(200)
体力劳动者	30%(685)
农民或农场工人	20%(202)

资料来源: Samuel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1955), p. 139。体力工人和农场工人的数字是根据斯托夫(Stouffer)教授慷慨提供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资料卡计算的。

13 个不同国家舆论调查的结果, 下层阶级不如中产阶级信奉民主准则。这个结果得到了一些偏重于心理学的研究者在研究“集权主义人格”的社会相关性时的再次肯定。¹⁵ 最近, 综合这个领域的许多研究, 显示在集权主义与下层阶级地位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¹⁶ 一项涉及 460 名洛杉矶成人的调查报道说: “工人阶级中集权主义者的比例高于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 而且在工人中, 明确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的人, 更富集权主义。¹⁷

最近的研究进一步提出, 在下层阶级中, 集权主义与神经过敏呈负相关的可能性。一般说来, 偏离其所在组织标准的人, 多半比遵守其所在组织标准的人要神经过敏, 因此, 如果我们假设集权主义品质一定程度上是低地位人中的标准品质, 那么这组人中比较开明的成员应当也是比较神经过敏的。¹⁸ 正如两个心理学家安东尼·戴维茨(Anthony Davids)和查尔斯·埃里克森(Charles Erikson)所指出, 在“集权主义的参照标准很高”的场合, 人们很可能作出调整而成为集权主义的。¹⁹ 在下层阶级组中往往如此, 而这一事实符合如下假说: 集权主义态度在这组人中是“正常的”和可预期的。²⁰

极端主义宗教与下层阶级

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低社会地位与原教旨主义或千年至福说*

* 千年至福说意为世界末日来临前, 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作主统治。(据《圣经·启示录》)——译者注

(Chilistic)宗教之间的联系。这表明,极端主义宗教是持集权主义政治态度那部分社会势力的产物。不过,开明的新教教派以中产阶级成员为主。在美国,这使开明的新教牧师进退维谷,因为他们往往不仅在宗教上是开明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开明的,所以他们常常想在下层阶级中传播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信条。可是,他们发现,这些阶级希望牧师宣讲地狱之火和灵魂拯救,而不是现代新教神学。²¹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恩格斯就已看到,早期基督教与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显著的相似点”,特别是在它们的千年至福要求和下层阶级基础上。²²最近,埃尔默·克拉克(Elmer Clark)——当代美国小教派的一个研究者——注意到,这些小教派,像早期基督教一样,“主要出现在被宗教忽视的穷人中”。他写道:“穷人的反抗染上宗教色彩——直到近代几乎一直如此——时,千年至福的观念出现了……这些观念在大多数继承福音传统的小教派中很突出。基督再临论本质上是一种防止被剥夺的保护机制;由于对通过社会过程获得基本幸福感到绝望,这些小教派转向不给它们好处的世界,指望世界在一次宇宙大变动中自毁,同时使它们的地位得到提高,把富人和权势者推翻。”²³

研究宗教派系的主要历史学家厄恩斯特·特罗尔茨(Ernst Troeltsch)曾以一种可以适当应用于极端主义政治的方式刻画了原教旨主义教派的心理要求:“发挥真正创造性作用的是下层阶级,在纯宗教基础上组建社区。只有他们把感觉的想象力和天真与麻木的精神习性、原始力和紧迫的需要感混合在一起。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只可能建立一种绝对服从神启的信仰:要么投降,要么坚定不移,别无选择。这种伙伴关系有余地也只是留给那些有宗教需要感而没有获得理性推理习惯的人。他们总是从非此即彼的观点考虑一切事情。”²⁴

耶和华见证人*——其成员在美国达几十万——是小教派迅速发展、“像过去一样继续吸引贫困阶层”²⁵的一个极好例子。这个教派的主要教义是:天国在望,“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大决战迫在眉睫;到那时,邪恶将被摧毁,在地球上将建立起神权统治或上帝的统治”²⁶。而且,它的组

* 19世纪后期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译者注

织是“等级制的和集权主义的。在管理或整个运动的政策制定上，几乎没有民主参与”²⁷。

人们曾在许多国家观察到政治和宗教的极端主义在社会根源上的直接关系。在沙皇俄国，年轻的托洛茨基认识到这种关系，并成功地从一些小教派信徒中为南俄工人同盟（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招募了第一批工人阶级成员。²⁸在荷兰和瑞典，最近的研究表明，共产党人在曾经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复兴中心的地区是最强的。在芬兰，共产主义和复兴主义的基督教常常在相同地区最强。共产党人在这个国家贫穷的东部地区非常谨慎，以免触犯人民的宗教感情。据报道，许多共产党人的会议实际上以唱宗教赞美诗为开场白。²⁹

这并不是意味着下层阶级成员支持的宗教派别一定或一般就是政治歧见的中心。其实，这些教派往往可以疏通不满和挫折感，要不然就会汇入极端主义运动的渠道。这里的问题在于，僵硬的原教旨主义和教条主义联系着基础相同的特征、态度和倾向，而这些特征、态度和倾向找到了另一种发泄方式：忠诚于极端主义政治运动。

斯文·赖登菲尔特(Sven Rydenfelt)在他关于瑞典共产主义运动根源的出色研究中，分析了瑞典北方两个社会、经济情况可比较的省——西博滕(Västerbotten)和北博滕(Norrbotten)——的区别；他这样做是试图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在前一个省得票较低(2%)，而在后一个省得票高得多(21%)。在瑞典，自由党给予宗教极端主义的支持比其他任何党都多得多。这个党在西博滕力量很强(30%)，在北博滕较弱(9%)。由于这两个省极端主义者的总票数差不多一样——30%和32%，于是赖登菲尔特得出结论：在这两个包括瑞典某些最穷的人、最被社会孤立的人和流浪者的省中，存在一种一般的激进主义倾向，不过，这种倾向在两个省的表现不同：一个省呈宗教形式，另一个省呈共产党形式；“共产党人和宗教激进派如基督教圣灵降临派，似乎正在为争取同群体的忠诚而展开竞争。”³⁰

下层阶级的社会状况

许多因素可以助长下层阶级个人的集权主义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是：

低教育、对各种政治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经济上不安全感和集权主义家庭模式。这些因素是彼此相关的,但决不是等同的。

有相互一致的证据表明,本身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正规教育程度,也与不民主态度高度相关。美国社会学家塞缪尔·斯托弗(Samuel A. Stouffer)对美国人公民自由态度的研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所对德国人多党制意见的调查,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见表 4.3 和表 4.4。

表 4.3 职业、教育与政治宽容的关系——美国,1955 年*

两类职业“最宽容者”的百分比

教 育	职 业			
	低级体力劳动	高级体力劳动	低级白领	高级白领
小 学	13(228)	21(178)	23(47)	26(100)
中学肄业	32(99)	33(124)	29(56)	46(68)
中学毕业	40(64)	48(127)	47(102)	56(108)
大学肄业	—(14)	64(36)	64(80)	65(37)
大学毕业	—(3)	—(11)	74(147)	83(21)

* 根据塞缪尔·A. 斯托弗慷慨提供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资料卡计算,原始资料出自他的研究论文,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5)。

表 4.4 职业、教育与支持民主政党的关系——德国,1953 年*

支持多党存在的百分比

职 业	教育水平	
	小学	中学或中学以上
农业工人	29(59)	—
体力劳动者	43(1 439)	52(29)
农民	43(381)	67(9)
下层白领	50(273)	68(107)
个体工商业	53(365)	65(75)
上层白领	58(86)	69(58)
行政人员(政府)	59(158)	78(99)
专业人员	56(18)	68(38)

* 资料来源同表 4.1,第 80 页。

这两张表表明,虽然每种教育水平内的较高职业地位似乎对更大的

宽容有利,但是在其他因素固定不变时,宽容度的提高与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胜于与职业地位升高的关系。³¹低教育与低职业地位当然是密切相连的,它们都是构成低社会地位复杂因素的组合,而低社会地位又与缺乏宽容相关。³²

低地位群体还倾向于不参加正规组织、很少定期阅读书刊,不了解社会事务,不愿参加投票;总之,对政治不感兴趣。³³可供利用的证据表明,这些特点中的每个特点都与民主态度有关。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析德国的资料发现,在每个职业层次,属于民间组织的人支持多党制多半胜于—党制。³⁴美国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与非集权主义者相比,集权主义者“不参加多种社团组织”。³⁵而且还发现,不怎么了解社会问题的人,多半在经济问题上比较激进,而在非经济问题上比较保守。³⁶不参加选举的人和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的人,远比参加选举的人和有政治兴趣的人偏执和排外。³⁷

根据两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海曼(Herbert Hyman)和保罗·希茨利(Paul Sheatsley)的一项研究,“顽固无知者”的“硬核”不成比例地来自没文化、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这些人不仅愚昧无知,而且难以接受信息,无论信息的水平和性质如何。这里还有关于教育、宽容与地位之间关系复杂性的另一线索。非经济的宽容不单纯是个获得教育和信息的问题;考虑到低地位者的社会状况,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基本姿态:丧失信心、自暴自弃。³⁸正如美国精神病学家吉纳维夫·克努普费尔(Genevieve Knupfer)在其刻画“倒霉者形象”时所指出的:“经济上的被剥夺就是心理上的被剥夺:卑屈的习惯、几乎接触不到信息源、缺乏语言能力……似乎导致缺乏自信,而这又进一步使低地位者愈加不乐意参与我们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文化的许多方面……”³⁹

这些特征也反映出下层阶级与民主社会中的活动、矛盾和组织相脱离的程度——脱离社会使它们不能得到关于政治结构的新的复杂观点,而正是这种观点,使宽容准则成为可以理解和必不可少。

就此而论,作为特例,再次考察那些从各种意义上都最远离其群体以外世界的职业,是有启发的。“封闭性职业”要求其体力劳动者生活在一个工业城或工业区;在大多数国家,这类工人——矿工、海员、伐木工、渔民和剪羊毛工——对共产党人显示高比例的支持。⁴⁰

同样,正如所有民意测验所表明,乡村居民,无论是农民,还是农业工人,都往往比任何其他职业群体更反对公民自由和多党制。选举调查显示,农场主属法西斯政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列,而农业工人、贫苦农民和分成制佃农,在意大利、法国和印度一类国家,比其他劳动者更支持共产党。⁴¹

同样的社会条件也与中产阶级的权力主义有关。除了农场主和农民以外,最倾向于支持法西斯和其他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体是生活在边远小社区的小工商业主。这些人同样远离“世界性”文化,在教育水平上,远低于其他任何非体力劳动群体。⁴²

一个使下层阶级倾向于集权主义的次要的,然而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和心理安全感的缺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他感到经济上越不稳定。白领工人,甚至那些薪金不如熟练体力劳动者的白领工人,也不太可能经受住因担心失去收入而产生的紧张。婚姻不稳定性研究表明,这是与低收入和收入不安全感相关的。这种不安全感当然会影响个人的政见和态度。⁴³高度紧张状态需要立即缓和,这常常表现为对替罪羊发泄敌意,以及通过支持极端主义组织寻求短期解决办法。研究显示,对少数民族,失业者不如就业者能给予宽容,而且,倘若失业者是工人,他们更可能成为共产党人;如果失业者是中产阶级,他们则更可能成为法西斯分子。职工队伍中有高比例共产党人的产业,也有较高的经济不稳定性。

经济不稳定性给下层阶级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感,因他们的特殊家庭生活模式而加剧。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在下层阶级成员的日常生活中,既有大量的直接挫折,又有大量敌对行为。过去 25 年对美国的儿童抚养模式作了许多研究,一篇有关这些研究的全面评述报道,这些研究的“最一致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家长更常用体罚。相反,中产阶级则诉诸说理、疏远和……‘偏重爱’的训练方法……这样的家长更可能宽容过错,而且他们真的动用处罚,也不大可能采取嘲讽的方式,或处以皮肉受苦。”⁴⁴在波士顿和底特律进行的两项调查,其结果暗示在儿童的抚养做法与成人的敌意和权力主义之间有进一步的关系:工人阶级特有的敌对性体罚往往增加而不是减少儿童的敌对行为。⁴⁵

下层阶级的视野

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一些重点在工人阶级生活和文化不同方面的研究强调指出了形成一种简单化看法的各种要素。一个人易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越缺乏历史感(缺乏长期观点),遇事越不能取复杂观点,他就越难于从具体经验作出抽象,越缺乏想象力(经验的内部“再加工”)。这些精神素质每个都曾被许多研究极其不同问题的学者看作下层阶级的特征。所有这些品质都是权力主义复杂心理学基础的组成部分。

心理学家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认为,易受暗示性是参与极端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心理解释。⁴⁶易受暗示性的两个条件是低地位者的特征:不是缺乏适当的参考框架或总视野,就是虽有参考框架,然而却是固定不变的框架。拙劣参考框架的形成是教育水平有限的反映,即缺乏一般水平上的联想,不能为评价经验提供基础。一种框架的固定或不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面——表现为往往把所认识到的一般原则加以绝对化,甚至经验也不能对其加以限制和矫正。

英国新闻记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其《读写能力的价值》这一颇具启发意义的著作中,以另一种方式阐明了同样观点。不具丰富灵活观察力的低地位者多半缺乏发展的历史感。“他们的教育不可能使他们具有任何历史观念或绵亘不绝的传统思想……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虽然可能具有相当多不连贯的知识,但几乎不知道历史或意识形态的模式或过程。……由于缺乏智力或文化的内在素质,由于绝少受过用理性和现存判断来检验相反观点的训练,他们作判断,通常是凭着首先出现在脑子中的那些组织箴言的刺激……同样,也不可能对未来有真正

的辨别力……我认为,这样一种头脑特别容易接受永远保持生活现状的诱惑。”⁴⁷

这种对现状的关注导致集中注意日常活动,几乎没有内在反省,没有对个人未来富于想象力的设计,也没有与个人日常活动无关的抽象思考。利用心理投射技术对下层阶级子女作过少数几次研究,其中一次研究发现:“这些年轻人正在面对外部世界作某种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是基于通过想象和反省来认识和把握个人的冲动……他们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想象力确实是贫乏和有限的……面对新情况,被实验者倾向于迅速作出反应,但不离初始印象的窠臼;在他们看来,新情况是个模糊的整体,对其中组成部分没有理性的分辨。”⁴⁸

从整体上看,工人阶级的生活偏重于具体的和直接的方面。正如霍加特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想捕捉工人阶级生活的某些本质东西……我们必须说,它是‘浓而实’的生活,其主要特征在于,注重眼前,注重感觉,注重细节,注重个人。毋庸置疑,这对世界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群体是真实的写照。”⁴⁹霍加特把工人阶级认知能力的具体性视为其与中产阶级的主要区别,后者更容易接触抽象的和一般化问题。他注意到,英国工人阶级对“我们”和“他们”的严格区分,是“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世界观比较普遍的特征之一。如果各种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最后都涉及与‘他们’的世界达成妥协,这最终将导致超越政治学和社会哲学而变得形而上学。我们如何面对‘他们’(无论‘他们’是谁)的问题,至少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局部世界某个不明显、不熟悉的部分的问题。就此而论,工人阶级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是他们难于接触抽象的或一般化问题的表现。”⁵⁰霍加特谨慎地强调,虽然任何社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多半都对一般化概念不感兴趣,但“训练把握概念或训练分析”却是中产阶级的父母和职业最有特点的要求。⁵¹

英国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最近对不同阶级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社会流动的变化所作的分析,也强调了不同家庭模式对集权主义的影响方式。中产阶级的父母强调“认识手段和长期目标的双重重要性,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尊重……(而且也具有)沿着一条深谋远虑的方法—目标链,采取适当措施,实现长远目标的能力……中产阶级及有关阶层的孩子是在广泛而精心控制的环境中成长的:空间、时

间和社会关系在家庭内外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⁵²。工人阶级家庭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就子女的成长而论，工人阶级的家庭结构不像中产阶级家庭那样整齐有序。虽然家庭中的权威是明确的，但它所表现的价值并没有带来中产阶级孩子的那种时空上井然有序的世界。权威的行使不是诉诸一种稳定的奖惩制度，而是常常表现出任意性。具有具体特征的长期目标往往被对未来的比较平庸的看法所取代；在这当中，机会、朋友或亲戚比严格制订的计划起更大作用。于是，眼前的或近期的活动比当前活动与实现长远目标的关系更有价值。期望系统，或者说期望的时距，因此而缩短，这导致偏爱、目标和不满的不同组合。环境最终限制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认知能力。眼前的满足或眼前的剥夺成了绝对的满足或绝对的剥夺，因为没有建立一种时间连续观，现在的活动不能纳入时间的长河。与中产阶级相比，让工人阶级为了未来的满足延缓眼前的愉悦将被发现是困难的。言外之意，在工人阶级中，将发现一种感情上和外在表现上更变化无常的行为模式。⁵³

这种对直接可见事物的强调以及对个人和具体东西的关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工人阶级看问题目光短浅；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能领悟事情的复杂可能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他们的行动结果，并往往导致普遍愿意支持极端主义宗教和政治运动，在非经济问题上，开明思想的程度普遍低落。⁵⁴

甚至在极端主义运动内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在认知能力上的这些不同点也影响到他们的经验世界：他们更愿意共同献身于一个“目标”，更缺乏理性。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对4个国家221名前共产党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资料。他把共产党的理论原理分为“通俗的”(简单的，供大众了解)和“深奥的”(复杂的，供内部集团了解)两部分。与中产阶级的被调查者相比，“工人阶级的被调查者在入党之前，知道深奥原理的相对较少……在入党以后，也往往没有向他们灌输”⁵⁵。中产阶级新党员“往往把较复杂的、多半不能同化的价值模式和期望带给党……而工人阶级党员，相对不给党的宣传机关惹麻烦，他们很少接触宣传媒介，想象力和逻辑能力相对不发达”⁵⁶。

下层阶级缺乏复杂感和教育的一个方面是他们的反理智主义(恩格斯很早以前就指出,这是工人阶级运动面临的一个问题)。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复杂深奥可能是其吸引中产阶级人士加入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它与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所共同具有的反理智主义活动的这一基本特征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感到压抑的根源。因此,工人阶级的普通成员极少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的干扰,他们最不可能背叛。⁵⁷ 他们的信仰一旦确立,一般不会因为突然认识到党完全不奉行自由和人道主义的价值标准而动摇。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党有高比例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尽管其基本意识形态强调坚持工人阶级立场,而共产党人视知识分子领导人为异己,基本上由有工人阶级职业经历的人来领导。⁵⁸ 阿尔蒙德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虽然党向一切投奔者开放,但工人阶级党员在党内成功的前景比中产阶级党员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党的政策——永远对工人阶级党员的可靠性表现出更大的信任,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产阶级党员普遍感到难于完全与党认同。”⁵⁹

集权主义者的塑造

总之,下层阶级成员很可能从童年起就面对处罚,缺少爱;整个环境充满紧张和敌视——这一切体验往往使其产生根深蒂固的敌意,并借种族偏见、政治极端主义和基督教千年至福说的变价信仰加以宣泄。他的教育程度不如比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作为儿童与其他具有相似背景的人的交往,不仅不能激励他的求知欲,而且还造成一种环境,使他的教育经历不能提高他对社会的一般性了解,也不能增进他对不同的组织和观念的了解。他较早地离开学校,在工作岗位上,周围的人、家庭背景与他一样,文化和教育程度同样是有限的。外界的影响力几乎对他的狭窄天地没有什么冲击。从童年起,他就追求即时的满足,而不参与可能会收益于未来的活动。他成年后注定的职业和家庭状况,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种短期观点。正如社会学家 C. C. 诺思所指出,与异质环境相脱离,

是低地位者的特征，这“限制了他的信息来源，阻碍了他的判断推理能力的有效发挥，使他的注意力囿于比较琐屑的生活乐趣”⁶⁰。

所有这些人格特征导致一个人往往以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方式看待政治问题和人际关系，渴望直接行动，不耐烦对话和讨论，对有长远观点的组织缺乏兴趣，愿意追随给图谋反对他的恶势力（宗教的或政治的）给予性恶解释的领导人。⁶¹

令人感兴趣的是，列宁看到了下层阶级的特性和领导他们的人的任务，使用的语言与上述语言有几分相似。他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民众，而这些民众是“懈怠的、冷漠的、死板的、惰性的、游移的”。列宁说，为了“最后的决战”（使人联想到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古老说法），共产党必须把民众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不妥协的统一的世界观和导致大变革的即期纲领。与“有效的”共产党领导相比较，列宁指出民主政党及其领导是“犹豫的、动摇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个特征大概适合于任何其纲领缺乏最终肯定性并乐意承认敌对组织合法性的政治组织。⁶²

然而，这些倾向的政治后果并不取决于所涉及的多种因素。与社会脱离、童年受处罚、经济和职业的不安全感，以及缺少经验，可以导致退隐，甚或冷漠，也可以导致敌意的大动员。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基本因素往往使人支持极端主义运动，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可以使人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对政治失去兴趣。在“正常”时期，冷漠在这种人中是最常见的，但他们可以因危机而重新活跃，特别是在危机伴有基督教太平盛世再临的强烈感染力时。⁶³

集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假设的检验

就联系着低地位和极端主义倾向的变化因素而论，缺乏丰富而复杂的参考框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命题并不一定表明，下层阶级将是权力主义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下层阶级将选择复杂性最小的形态。因此，在极端主义与其说是不太复杂的政治形态，不如说是比较复杂的政治形态的场合，低地位应当与反对极端主义运动和极

端主义政党相联系。

无论共产党在哪里作为小党与改良主义大党相竞争,其实正是这样,如在英国、美国、瑞典、挪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共产党势单力薄的地方,它不能承诺即时改变大多数被剥夺者的境遇。正因为如此,这种小的极端主义政党通常提出了相当复杂的纲领:它们最终将靠社会经济系统固有的趋势来巩固自己。⁶⁴对于比较穷的工人来说,要想纠正不公平或改善社会条件,支持瑞典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或美国新政派,比支持选举上无足轻重的共产党,是一条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的道路。

来自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巴西和英国的可供利用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是小党,工党或社会党要大得多,共产党在收入较高的熟练工人中得到的支持大于在非熟练的比较穷的阶层中得到的支持。⁶⁵在意大利、法国和芬兰,共产党是左翼的最大党,工人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其共产党得票越高。⁶⁶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毗邻国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与支持共产党的工人相对收入的比较,清楚地显示了这两种交替模式(表 4.5)。在芬兰,共产党非常强大,它的支持突出地来自贫穷工人;在瑞典,共产党是个小党,它在收入较高的熟练工人中获得的成功,远远大于它在收入低的非熟练工人中获得的成功。⁶⁷

表 4.5 芬兰和瑞典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的收入构成*

芬兰——1956年		
收入分类(芬兰马克)	社会民主党	共产党
低于 100	8%	13%
100—400	49	50
400—600	22	29
600 以上	21	8
(调查人数)	(173)	(119)
瑞典——1946年		
收入分类(瑞典克朗)	社会民主党	共产党
低于 2 000	14%	9%
2 001—4 000	43	40
4 001—6 000	34	35
6 001 以上	9	15
(调查人数)	(4 832)	(819)

* 芬兰资料据芬兰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为这项研究作的一次专门调查。瑞典的数据是重新计算的,资料来源是 Elis Hastad et al., eds., "Gallup" och den Svenska Valjarkaren (Uppsala: Hugo Gebers Forlag, 1950) pp. 175—176。上述两国的资料都包括城乡工人在内。

这适用于所有有资料的国家。⁶⁸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印度，提供了更好的证据。在印度，共产党是主要政党，曾在两个邦——喀拉拉邦和安得拉邦——组织政府或构成主要反对党（获 25% 或更多的选票）。虽然共产党还在其他几个邦有相当力量，但在印度其他地区要弱得多。如果以下的命题是正确的：在共产党强大的地方，它主要对没受过教育的下层有号召力，而在共产党弱小的地方，它主要对受过较良好教育的、地位相对较高的人有号召力，那么，印度不同地区投共产党票的人应当显示极其不同的特征，表 4.6 所说明的实际上正是这样。⁶⁹

表 4.6 印度共产党和社会党支持者的阶级构成和教育构成*

	共产党		社会党
	喀拉拉邦和安得拉邦	印度其余地区	全印度
阶级			
中产阶级	7%	27%	23%
下中阶级	19	30	36
工人阶级	74	43	41
教育			
文盲	52%	43%	31%
大学以下	39	37	43
大学或大学以上	9	20	26
(调查人数)	(113)	(68)	(88)

* 表中数字是根据一些发表的表计算的，这些表见 *Indi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Monthly Public Opinion Surveys*, Vol. 2, Nos. 4, 5, 6, 7 (Combined Issue), New Delhi, January-April, 1957, pp. 9—14。这是一次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结果，实际选举结果没有报告。总样本 2 868 人。社会党和普拉亚社会党的数字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它们基本上具有同样温和的纲领。安得拉邦和喀拉拉邦支持它们的太少，以致在民意测验结果中没有具体给出。

在印度，共产党力量小的地方，像两个温和的小社会党一样，其支持者也是来自比较富裕的和受过较良好教育的阶层。在喀拉拉邦和安得拉邦，数字变化很大，共产党在那里力量强。在这两个邦，中产阶级只给了共产党 7% 的支持，而工人阶级给了 74%。⁷⁰支持者教育构成差异也显示了类似的模式。

历史模式和民主行动

尽管下层阶级群体中有强烈的反民主倾向,但在工业化和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工人的政治组织和运动既支持经济开明思想,也支持政治开明思想。⁷¹工人组织、工会和工人政党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为争取扩大政治民主起了重大作用。不过,工人的这些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像以前中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一样,也是发生在争取经济权利的背景下。⁷²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普选制,是争取更好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险、缩短工时等斗争的必要武器。上层阶级反对扩大政治自由,是因为这是他们捍卫自身经济和社会特权之行动的一部分。

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团体自愿拥护给予那些其所鼓吹的措施被它们认为是可鄙的或危险的人以公民自由。宗教自由之所以出现在西方世界,只是因为相互竞争的势力,每一方都发现不破坏整个社会就不能摧毁另一方,而且在斗争中,许多人失去了对宗教的信念和兴趣,最后还失去了镇压不信教者的要求。同样,许多国家出现普选制、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或者是作为对业已形成势力的下层阶级的让步,或者是作为控制下层阶级的手段——迪斯雷利* (Disraeli)和俾斯麦** (Bismarck)一类老谋深算的保守派人物就曾鼓吹和使用过这种策略。

然而,民主准则一旦出现,尽管是在利益冲突中产生的,就成了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西方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把这些价值纳入一般的意识形态。可是,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民主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支持者真正理解其含义。证据似乎表明,运动领导人对民主准则理解和信仰的程度最高,而在追随者中就最低。只要普通成员效忠于他们的组织,而组织坚持按民主行事,普通成员的一般意见和倾向就对于预

* 迪斯雷利:1804—1881年,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在1868年和1874—1880年任首相。——译者注

** 俾斯麦:1815—1898年,德国政治家,德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

测组织的行为是相对不重要的。不管工人的较强的集权主义倾向,他们的反共产主义的组织仍然比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更好起着维护和传递民主价值的作用。在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支持民主左翼政党的人比每个职业阶层中支持保守政党的人更支持公民自由和民主价值。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不仅捍卫公民自由,而且在同一方向上影响它的支持者。⁷³

保守主义在政治民主环境中特别容易受责难,因为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穷人总比富人多,重新分配财富的承诺很难加以反驳。这样就使保守主义者在传统上害怕彻底的政治民主,在大多数国家竭力阻止多数人管理政府,其手段或者是限制公民权,或者是通过下一级议院或额外增加乡村地区和小城市(保守力量的传统堡垒)的代表来控制政府机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常常是以精英价值为基础的,不承认选民呼声中有智慧。保守主义者往往要维护的另一些价值,如军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对于有集权主义倾向的人也有吸引力。⁷⁴

从这里提出的资料断言下层阶级的集权主义倾向必然对民主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或许是一种误解;同样,对于保守主义的反民主方面,也不应引出类似结论。一个特定阶级是否支持对自由加以限制取决于许许多多因素,这里探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我们已看到的,从大的方面说,民主过程的不稳定性,从具体方面说,共产党的力量,都是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国民教育水平密切相关的。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贫穷国家,共产党象征着一场大规模运动,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很高的地方,它的力量很微弱。不发达国家的下层阶级比富裕国家的下层阶级更穷,更不安全,更缺乏教育,在拥有的社会地位方面也更低下。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西亚*的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下层阶级不仅“在社会中”,而且“属于社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与文化的其余部分的脱离程度远低于其他国家的贫困群体;这里所说的贫困群体是根据收入极低、教育水平极低,甚至普遍不识字划分的。西方工业化世界工人进入国家政体大大降低了他们的集权主义倾

* 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指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译者注

向,尽管有例外;例如在美国,麦卡锡证实,不负责任的政客把民族主义和反精英治国论的宣传蛊惑集于一身,仍能从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得到相当大的支持。⁷⁵

虽然有证据证明提高国民生活和教育水平的作用,而这又允许我们对极端主义很弱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抱有希望,但考虑到经济不发达、民主不稳定的国家,确也暗示了悲观的结论。民主的工人阶级政党虽然能令人信服地证实自己有能力捍卫经济和阶级的利益,但这样的党能否在民主不稳定的国家建立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过,对民主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下层阶级。下一章我们将从工人阶级的权力主义转向考察法西斯主义的各种变种,通常认为这些变种是与中产阶级相关的。

注 释

1. 本章初稿是为一次会议写的,会议主题是“自由的前途”(The Future of Liberty),由设在意大利米兰的文化自由协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于1955年9月主办。

2. “The Choice of Comrades,” *Encounters*, 3(December 1954), p. 25. 阿诺尔德·A. 罗戈(Arnold A. Rogow)甚至在社会主义刊物《异见》上撰文说:“自由和激进的路线总是缺乏广泛的基础,因为从本质上说,自由传统已成为有限的少数人的传统,或许是精英分子的传统。”“The Revolt Against Social Equality,” *Dis-sent*, 4(1957), p. 370.

3. Clancy Sigal in the *New Statesman*, October 4, 1958, p. 440.

4. 共产党人力量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源泉已在第二章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方面作了讨论。

5. 见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57), pp. 78—79 and 146—148, 其中讨论了英国工人阶级对宽容准则的承认问题。E. T. 普罗思罗(E. T. Prothro)和 L. 梅利坎(Levon Melikian)在一项对黎巴嫩美国大学 130 名学生的研究中证实,他们在集权主义与经济激进主义之间显示的联系与见于美国工人中的联系相同。见他们的“*The California Public Opinion Scale in an Authoritarian Cult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7(1953), pp. 353—363. 1952—1953 年的一项对 1 800 名波多黎各成年人——全部乡村居民的样本——的调查中发现,有 84% 的人显示“某种程度的权力主义”,而在美国的可比居民中,这个比率是 46%。见 Henry Wells, “*Ideology and Leadership in Puerto 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1955), pp. 22—40.

6. 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人是麦卡锡及其政策的最坚定的反对者,这并不是因为

他们对反民主做法的深恶痛绝,而是因为对民主党的组织性忠诚。

7. 有人试图提出政治行为是政治态度或心理素质的必需的功能表现。关于这种企图的错误的详细讨论,见 Nathan Glazer and S. M. Lipset, "The Polls on Communism and Conformity," in Daniel Bell, ed., *The New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5), pp. 141—166。

8. 术语“极端主义”是用来指运动、政党和意识形态。“集权主义”是用来指个人的态度和倾向(在个人态度的统计总和——不是指组织特征本身——有意见的场合,也指组织的态度和倾向)。“集权主义”这个术语与态度研究的联系太多了,故而再不能可靠地用于指社会组织的类型。

9. 见 G. H. 史密斯(G. H. Smith)的两篇文章:“Liberalism and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9(1948), pp. 62—65; 以及“The Relation of ‘Enlightenment’ to Liberal-Conservative Option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8(1948), pp. 3—17。

10. 根据迄今尚未见诸世界民意测验(World Poll)汇编的资料,国际研究联合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es)建立了一个组织,在许多国家主办作比较调查。这种调查提问的问题:“假设存在一个符合你自己意见的政党,你会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它是‘你的’党么?你是愿意这个党是你的国家中唯一的党,不再有其他党,还是反对这种一党制?”调查发现,在低地位与信仰铁腕领导人价值之间存在一致关系。

11. 见 Kotaro Kido and Masataka Sugi, “A Report of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okyo”(Ⅲ), *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1954), pp. 74—100; 以及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Institute of Japan, Report No. 26, *A Survey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Tokyo, 1951)。

12. 见 H. J. Eysenck,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4), p. 127。

13. *Ibid.*, p. 137. 有人认为此研究在程序上有严重问题,关于其方法论的批评,见 Richard Christie, “Eysenck’s Treatment of the Personality of Communi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3(1956), pp. 411—430。

14. 见 Arnold W. Rose, *Studies in Reduction of Prejudice* (Chicago: American Council on Race Relations, 1948), 其中对 1948 年以前这方面的文献作了评述。几项研究显示了教育和经济自足——低地位的两个基本要素——的关键重要性。见 Daniel J. Levinson and Nevitt Sanford,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nti-Semitism,” *Journal of Psychology*, 17(1944), pp. 337—370; 以及 H. H. Harlan, “Some Factors Affecting Attitudes toward Jew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942), pp. 816—827, 其中对一个种族集团态度的资料。另见 James G. Martin and Frank R. Westie, “The Tolerant Person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1959), pp. 521—528。另见 Melvin M. Tumin, *Segregation and Desegregation* (New York: Anti-Defamation League of B’nai B’rith, 1957)。

■ 政治人

15. 见 Theodore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0)。这是一项开创性研究,与许多后续者相比,在所论问题上一致性较小。作者们(p.178)指出他们所用的样本并不完备。

16. Richard Christie and Peggy Cook, "A Guide to Published Literature Relating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 (1958), pp.171—199.

17. W.J. McKinnon and R. Centers, "Authoritarianism and Urban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1956), p.618.

18. 当代这个领域的心理学知识,太偏重于得自研究者最容易接近的人群——大学生。往往忘记这个经过高度选择的人群,其人格和态度的综合特征可能远不同于总人口中的其他部分。

19. 见 Anthony Davids and Charles W. Eriksen, "Som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Determining Relations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Measures of Neuroticism,"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1957), pp.155—159。这篇文章列出了许多有关参考文献。

20. 阿尔蒙德(Almond)发现,在他的涉及神经过敏问题的共产党员样本中,工人阶级的党员人数是中产阶级党员人数的两倍。由此显示的共产党员条件与工人阶级背景的较大互容性,再次暗示极端主义政治行为与工人阶级背景相联系是正常的、顺理成章的。Gabriel Almond,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45—246.

21. 见 Liston Pope, *Millhands and Preac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105—116。

22. 见 Friedrich Engel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K. Marx and F. Engels, *On Relig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pp.312—320。

23. Elmer T. Clark, *The Small Sects in America*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49), pp.218—219。根据 B. 威尔逊(Bryan Wilson)的意见:"不安全感、差别地位、焦虑、文化忽视,激起重新调整的要求,而一些教派可以为某些人提供这种调整。失调的可以是处于类似边际地位的社团、职业群或分散的个人。"见 "An Analysis of Sect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1959), p.8, 以及同一作者的 *Minority Religious Movement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Heinemann, 1960)。

24.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0), Vol.1, p.44.

25. 见 Charles S. Braden, *These Also Believe. A Study of Modern American Cults and Minority Religious Mov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p.384。

26. *Ibid.*, p.370.

27. *Ibid.*, p.363。可以假定,像在集权主义政治运动中一样,大多数教派的

偏执性对下层阶级成员是个有吸引力的特点,而非引起紧张的原因。尽管得不到系统证据,但这个假定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对教派内的派别活动缺乏宽容,为什么存在无休止的不和,以及为什么新组织像老组织一样偏执,因为分裂通常是在谁的偏执观点和做法应当占上风的问题上出现的。

28. 见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0—31。

29. 见 Sven Rydenfelt, *Kommunismen i Sverige. En Samhällsvetenskaplig Studie*. (Kund: Gleerupska Universitetsbokhandeln, 1954), pp. 296, 336—337; Wiardi Beckman Institute, *Verkiezingen in Nederland* (Amsterdam, 1951, mimeographed), pp. 15, 93—94; Jaako Novsiainen, *Kommunism Kuopion läänissä* (Helsinki: Joensuu, 1956)。

30. 见 W. 菲利普斯·戴维森 (W. Philips Davison) 对 Sven Rydenfelt, *op. cit.* 一书的广泛评述,这份评述收录于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8 (1954—1955), pp. 375—388。引文在第 382 页。

31. 一项基于全国抽样的美国人样本的研究报道,根据“权力主义人格”标尺,教育在工人的集权主义回应程度上无影响,但较高的教育水平降低了中产阶级的集权主义回应程度,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最少“集权主义”。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Authoritarianism and Political Behavi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7 (1953), pp. 195—196。

32. 甚至在其他社会因素不起作用时,教育的独立效应也有特别长远的提高居民教育水平的意义。科恩豪泽 (Kornhauser) 和及其同事发现,受过 8 年级教育的汽车工人,其集权主义倾向胜于受过更多教育的汽车工人。见 A. Kornhauser, A. L. Sheppard, and A. J. Mayer, *When Labor Votes*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56), 其中有关于工人阶级样本内部集权主义变化情况的进一步资料。

33. 本书第六章对与政治参与有关的社会因素如教育、地位和收入(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全面的阶级指标或地位指标的要素)作了总结。

34. 为这项研究作了计算。

35. F. M. Sanford, *Authoritarianism and Leadership* (Philadelphia: Stevenson Brothers, 1950), p. 168。另见 Mirra Komarovsky,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Urban Bwell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 (1946), p. 688。

36. G. H. Smith, *op. cit.*, p. 71。

37. G. M. Connelly and H. H. Field, “The Non-Voters, Who He Is, and What He Think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 (1944), p. 179; Samuel A. Stouffer, *op. cit.*, *passim*, 以及 F. H. Sanford, *op. cit.*, p. 168。M. Janowitz and D. Marvick, *op. cit.*, p. 200。

38. 见 Herbert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 (1947), p. 413。关于民间组织成员情况的最后一次调查见 Charles L. Wright and Herbert Hyman, “Volunta-

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of American Adults;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948), pp. 284—294。

39. Genevieve Knupfer, “Portrait of the Underdo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1947), p. 114。

40. 关于矿工,有最大量可供利用的比较资料。英国,见 Herbert G. Nicholas,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s of 1950* (London: Macmillan, 1951), pp. 318, 342, 361。美国,见 Paul Brissenden, *The IWW: 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0), p. 74; 以及 Harold F. Gosnell, *Grass Roots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2), pp. 31—32。法国,见 François Goguel, “Geographie des elections sociales de 1950—1951,”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3(1953), pp. 246—271。德国,见 Ossip K. Flechtheim,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am Main: Bollwerk-Verlag Karl Drott, 1948), p. 211。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西班牙、智利的资料也可以得到。

脱离社会也与不同产业所表现的差异罢工倾向有联系。发泄对全社会不满的猛烈罢工最常出现在孤独产业中,其起因也多半可以在产生极端主义社会条件中找到。见 Clark Kerr and Abraham Siegel,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ds., Kornhauser, R. Dubin, and A. M. Ros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s Co., 1954), pp. 189—212。

41. 根据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的意见,农业职业比城市居民在政治上更富于感情上的民族主义和潜在的集权主义,因为这个职业组的人比城市居民远离各种不同的人。见“The Agricultural Basis of Emotional 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937), pp. 50—51。另见 Rudolf Heberle, *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A Regional Case Study on Political Parties in Germany* (Baton Rouge,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32 ff., 其中讨论了纳粹主义对德国农村居民的号召力。日本的类似调查结果,见 K. Kido and M. Siho, *op. cit.*。

42. 统计资料表明,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法国的布热德运动(Poujadism)* 以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其最大量的乡村支持,都来自边远小社区的小工商主,特别是那些教育差的地区。见本书第五章。

43. 除了下层阶级生存固有的不安全性外,使他们丧失稳定社会生活和摧毁他们传统价值社会支柱的一些特殊条件,也使他们接受极端主义太平盛世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有助于重新定义他们的世界。我已在第二章中谈到不同国家工人的

* 布热德运动:即 1954 年法国布热德(Pierre Poujade)创立的所谓“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译者注

政治行为时,讨论过某些证据,这些证据是与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不连续性和无根性有关。赖登费尔德(Rydenfelt)在他关于瑞典共产主义的研究中指出,“无根性”是倾向于投共产党人票的个人和职业的典型特征。见 W. Philips Davison, *op. cit.*, p.378。恩格斯(Engels)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也注意到如下事实:鼓吹太平盛世的宗教和社会运动,包括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吸引了所有行为异常的人,或那些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的人;他说:“所有这些由于旧世界的崩溃而处于自由状态——即无所事事的状态——的因素,都一个跟一个地进入了(早期)基督教的轨道……(今天)又都涌向了各国工人阶级政党。”见 F. Engels, *op. cit.*, pp.319—320。另见 G. Almond, *op. cit.*, p.236;以及 Hadley Cantril,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41), Chaps.8 and 9。

44. 见 Urie Bronfenbrenner, “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Class Through Time and Space,” in E. E. Maccoby, T. M. Newcomb, and 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1958), p.419。社会学家艾利·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以类似笔调总结了有关不同阶级家庭内部关系的研究成果:“下层阶级用拳头和刀教育他们有过错的子女并不少见,先打是肯定的。青年子女可以当面咒骂他们的父亲,甚至在家庭中大声大闹时,用拳头或棍棒打他们的父亲。夫妻有时也在家中大搞投掷战;妻子把丈夫锁起,丈夫或想方设法闯进家去,或者被关在门外时把自家房子烧掉。在许多下层阶级家庭中,这种用拳头或武器的斗争和鞭打妻子的场面迟早要发生。也许今天不发生,明天不发生,只要观察者等足够长的时间,总会出现。”Allison Davis, “Socialization and Adolescent Personality,” in Guy E. Swanson, *et al.*,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1954), p.528。

45. 一项报道公开敌意与集权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构成下层阶级集权主义基础的复杂心理学因素的线索。见 Saul M. Siegel, “The Relationship of Hostility to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956), pp.368—372。

46. 见 Hadley Cantril, *op. cit.*, p.65。

47. Richard Hoggart, *op. cit.*, pp.158—159。

48. B. M. Spinley, *The Deprived and the Privileg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3), pp.115—116。这项研究是基于罗斯查奇(Rorschach)对 60 个贫民区儿童的测试。最后一点与另一位英国学者的研究有关:工人阶级成员不可能像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那样认识对象的结构,包括在较抽象水平上对关系加以思考,但对对象的内容可以作出偏重于行动的反应。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讨论,见 B. Bernstein, “Some Soc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Percep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9(1958), pp.160ff。

49. Richard Hoggart, *op. cit.*, p.88。像人的其他社会特征一样,这种生活对社会和社会存在的不同领域也有不同影响。有人或许争辩说,这种注重建立个

人关系即安于眼前生活的能力,可能比中产阶级关注地位高低,担心个人行为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以及对不定的未来忧心忡忡(在严格医学身体健康的意义上)要健康——尽管我个人对此有怀疑。不过,在政治影响的层面上,这里有意义的问题,即工人阶级生活偏重于行动,忽视智力,似乎使长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趋势不能进入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唯其如此,仅仅是因为这种客观存在只能通过抽象和普遍化的媒介才能进入意识。

50. *Ibid.*, p. 86.

51. *Loc. cit.*

52. B. Bernstein, *op. cit.*, pp. 161, 165.

53. *Ibid.*, p. 168.

54. 这个假说对理解工会民主的理论有提示意义,对理解工会内部组织生活的紧张状态也有提示意义。工人阶级的工会成员并不像中产阶级批评家所设想——如果没有上层领导强加的铁的纪律的约束,普通成员会积极组成派别,还会对工会的政治行动进行批评——的那样关心专政的工会领导。但是,那些受教育较多、有表达能力的工作人员(如工会报纸的编辑人员),可能想过问工会面临的、较多涉及文字的复杂争论,但又感觉受到必须为普通提出简单易懂的宣传口号的约束。“招揽”型*的工会报纸可能并不完全出于内部的政治需要。

55. G. Almond, *op. cit.*, p. 244.

56. *Ibid.*, pp. 177.

57. *Ibid.*, pp. 313ff., 392.

58. 关于1936年至1956年的法国资料见 Mattei Dogan, “Les Candidats et les élue,” in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Les Elections du 2 janvier*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6), 以及 Dogan, “L’origine sociale du personnel parlementaire français,” in *Parties politiques et classes sociales en France*, edited by Maurice Duverger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5), pp. 291—329. 关于希特勒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比较,见 Viktor Engelhardt, “Die Zusammensetzung des Reichstages nach Alter, Beruf, und Religionsbekenntnis,” *Die Arbeit*, 8(1931), p. 34.

59. G. Almond, *op. cit.*, p. 190. 这个诊断得到3个国家123名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传记研究以及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4个国家221名前共产党人(既有领导人,又有普通成员)的支持。

60. C. C. North,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26), p. 247.

61. 儿童心理学家一直把这些特征的大多数作为青少年典型的态度和看问题的方法来谈论。韦纳·科恩(Werner Cohn)在他关于耶和華见证派教派的一篇文章

* “house organ”:商号为增进营业而出版的刊物。——译者注

章中,把青少年运动看作是所有这样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型。“青少年的固恋和反常心态”是他们的组织得以产生的“原因条件”(p. 297),而所有这样的组织都有一种“疏远社会的先兆”(p. 282)。见 Werner Cohn, “Jehovah’s Witnesses as Proletarian Movement,” *The American Scholar*, 24(1955), pp. 281—299。

62. 列宁(Lenin)的话引自他的作品, *Left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0), pp. 74—75。列宁在另一处即他的题为“*What Is to be Done?*”的小册子中曾作出这样的诊断:工人凭其自身永远不能产生社会主义者或阶级的觉悟,如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组织的团体给他们以更广阔的视野,他们将停留在“过一天算一天”的经济意识的水平,这类似这里就下层阶级固有的短期观点所提出的概括。

63. 美国有许多研究表明,那些不参加投票、没什么政治兴趣的下层阶级成员,往往不接受民主的宽容准则。见 Samuel A. Stouffer, *op. cit.*, 以及 G. M. Connelly and H. H. Field, *op. cit.*, p. 182。美国和英国之类极端主义运动势单力薄国家的失业者行为研究显示,冷漠是他们特有的政治回应。见 E. W. Bakke, *Citizens Without W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 46—70。另一方面,德国的资料表明,工人阶级失业者和纳粹支持者之间有高度相关性。在当今法国、意大利和芬兰,失业者倾向于支持在这些国家有强大势力的共产党,见第七章,以及 Erik Allardt, *Social Struktur och Politisk Aktivitet* (Helsingfors: Söderstrom Förlagsaktiebolag, 1956), pp. 84—85。

64. 最近对纳粹党早期支持来源的研究对如下假说提出了挑战:1930年以前,当纳粹党还表现为一种大幅度左右摇摆形态时,冷漠者已开始支持它。然而,人们发现,在1928年到1930年间,纳粹党得票的百分比增长与德国各选区投票率的百分比增长呈现一种与阶级地位相反的相关性。只是在纳粹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党以后,它才得到以前的冷漠者的支持,这些人当时可能看到了它的直接潜力。关于这项研究的报道,见本书第五章。

65. 丹麦,见 E. Eøgh, *Vaelgeradfaerdi Danmark* (Ph. D. thesis, Sociolog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959), Tables 6 and 9。挪威,见 Allen Barton,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Planning in Norway*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以及挪威民意测验机构在挪威对选举行为作的几次调查,包括1949年的FAKTA调查,以及1954年2月和1956年4月进行的NGI调查;这些调查结果至今尚未出版。来自加拿大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Canadian Gallup Poll)1945年、1949年和1953年的档案资料表明,劳动进步党(Labor-Progressive Party, 共产党性质)得自熟练工人的支持多于非熟练工人。巴西,见 A. Simao, “O voto operation en São Paulo,” *Revista Brasileira estudos politicos*, 1(1956), pp. 130—141。

66. 关于意大利和法国的准确统计资料,有一张表,见第七章。另见 Hadley Cantril, *The Politics of Despai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pp. 3—10。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共产党是个大党,它从非熟练工人方面得到的选举支持也大

大多于来自熟练工人的支持。见 Samuel Pratt, *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ichigan State College, 1948), pp. 156ff.

赫尔辛基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帕蒂·佩索南(Pretti Pesonen)博士关于工业城市坦佩雷(Tampere)选举迄今尚未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在这座城市,投共产党票的比投社会民主党票的多。另一方面,有失业经历的,共产党人比社会民主党多得多;去年失过业的,共产党人占21%,社会民主党人占10%;在他们整个工作经历中失过业的,共产党人占46%,社会民主党人占23%。这项研究表明,家庭近期失业经历是坦佩雷投共产党票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67. 同样性质的资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在芬兰,月收入低于100马克的工人有41%投共产党的票,而月收入超过600马克的人只有12%投共产党的票;在瑞典,年收入低于2000克朗的工人有7%投共产党的票,而年收入超过8000克朗的工人有25%投共产党的票。

68. 附带提一下,社会党在力量小抑或新建立时,也可以表现出复杂的选择形态,这时,它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比它是一个组织完善、能提供即时调整的大党时的吸引力,在比例上要大。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变价的小团体不能提供智力上复杂的选择,它将从下层阶级得到超乎寻常的支持。一些偏执的宗教就是这样的团体,其基督教太平盛世再临的号召力并没有成熟的理论。关于这个事关政治竞争的论点,可以从挪威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提到某些极其不明显的证据;这次民意测验显示了各政党支持者的构成。挪威有一个基督教党,其对更信仰原教旨主义的路德教徒有吸引力,而这些教徒可以与前面瑞典例子中所讨论过的那些人相比较。这次民意测验表明,总样本中有12人支持这个政党,其中82%支持者来自低收入组(年收入低于10000克朗)。可是,264名工党支持者中有57%年收入低于10000克朗,21名共产党支持者有39%年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由此看来,呈最复杂变价形态的小共产党,其支持者来自相对高的阶层,而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其社会基础是这个国家所有政党中最穷的。见1954年2月NGI Survey, 1956年12月油印初稿。

69. 在这个假说提出后,这些资料才得到利用,因此可以认为是对假说的一次独立检验。

70. 这里引申的假说并不试图说明小政党的发展。对于“复杂的”小党来说,适应大的危机形式,特别是萧条和战争,可能是其支持力量最初开始增加的关键因素。关于社会党随其上升到主要正常地位所得选票之变化,见S. M.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特别见pp. 159—178。

71. 这一点有许多例外。澳大利亚工党是“白人澳大利亚”的最重要支持者。类似的,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意识形态上的新政派(New Deal)出现以前,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党一直是两个政党中比较反黑人的。美国劳工运动反对非白人移民,对黑人成员设置重重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美国社会党运动风起云涌,它的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如《米尔沃基社会民主先驱报》(the *Milwaukee Social Democratic Herald*)和《呼唤真理报》(the *Appeal to Reason*),都反对种族一体化。《呼唤理性报》公开说:“社会主义将实行种族隔离。”见 David A. Shannon,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1955), pp. 49—52。甚至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对排犹主义的病毒也没有免疫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排犹事件有社会党人参与;一些公认排犹的领导人与不同的社会党有联系,使社会主义组织表态反对排犹主义受到强大阻力。见 E. Silberner, “The Anti-Semitic Tradition in Modern Socialism,” *Scripta Hierosolymitana*, III (1956), pp. 378—396。在关于最近英国种族骚乱的一篇文章中,迈克尔·鲁姆尼(Michael Rumney)指出反黑人情绪的工人阶级基础。甚至还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党将成为黑人的敌人。”他报道说:“保守党可以支持警方采取任何它认为为了维持和平所必须采取的任何手段,但工党却奇怪地缄默不语。它若说话,要么会招致反西印度人骚乱者的怨恨,要么会丧失它要成为有平等权利之正常的机会。”见“Left Mythology and British Race Riots” *The New Leader* (September 22, 1958), pp. 10—11。

英国盖洛普民间测验机构(British Gallup Poll)的调查证实了这些判断。例如,在1959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中,调查人问犹太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比他们真正应当拥有的更有权力”这样一个问题时,当把回答按政治选择加以分类时发现,作出排犹反应、回答“更有权力”的,在工党支持者中占38%,在保守党支持者中占30%,在自由党支持者中占27%,而回答犹太人太没权利的,在上述三党支持者中分别占7%、8%和9%。同一调查机构还报道了1958年一次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少数工党人士和下层阶级成员说,如果他们的党比上导阶级和保守党投票人多提名一名候选人,他们将提名犹太人。不过,公平地说,也必须看到,下议院几乎每个犹太人都代表工党,而二十几位犹太人下议员也几乎全是来自非犹太人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72. 各种中产阶级阶层在主要由贵族统治的封建社会是下层阶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与新兴工业化社会尚未赢得社会地位的工人阶级的行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对宗教和经济“激进主义”表现出同样引人注目的亲近态度。正如托尼(Tawney)所指出,加尔文宿命论教义对18世纪资产阶级起的作用,犹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理论对19世纪工人阶级起的作用。两者都“在它们所建立的秩序中确立了它们的至善和与之尖锐对立的至恶,并教导它们的信徒认识到自己是被选定的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命运要在天助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加以实现。”像清教徒一样,共产党人也坚持“个人责任、纪律和禁欲主义”。虽然两者的历史内涵不同,但却可能有相同的社会学根源;在脱离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组中。见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47), pp. 9, 99。类似的论点见 Donald G. MacRae, “The Bolshevik Ideology,” *The Cambridge Journal*, 3(1950), pp. 164—177。

73. 这方面一个惊人例子出现在1950年的澳大利亚。在大肆宣传共产党威

胁的时期，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报道，80%的选民赞成宣布共产党非法。这次调查后不久，保守党政府把一项宣布共产党非法的议案交付公民投票裁定。在为此而进行的竞选运动中，工党和工会强烈反对这项议案。此后发生的相当大的变化显示，这项宣布共产党非法的议案实际上已被一个微弱多数派击败；信仰天主教的工人本来在盖洛普民意测验时以压倒优势支持宣布非法的措施，但最后听从了他们的党和工会的劝告，投了反对票。见 Leicester Webb, *Communism and Democracy in Australia: A Survey of the 1951 Referendu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5)。

74. 美国 1952 年选举研究表明，在每个教育水平上（小学、中学和大学），以“集权主义人格”标尺衡量得高分的人有大得多的可能投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票，而不投史蒂文森（Stevenson）的票。Robert Lane, “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9(1955), pp. 173—190. 在英国，工人阶级排犹主义研究发现，样本中的保守党人远比自由派人士和工党人士更排犹。见 James H. Robb, *Working-class Anti-Semitis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54), pp. 93—94。

75. “然而，民众的历史是社会中最一贯反对智力活动那部分力量的历史……这部分力量是美国的下层阶级，而不是上层阶级；近年，这些下层阶级给了攻击公民自由一方以压倒优势的支持。正是在工人中，你可以发现左右那些最敌视自由精神的派别和教派的主要人物。”Lewis S. Feuer, Introduction to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pp. xv—xvi. 另外，在另一个富裕国家——白人的南非，赫伯特·廷斯腾（Herbert Tingsten）指出：“工业化和商业化……造就了正在构筑布尔民族主义堡垒的那个社会阶级：工人、店员、下级公务员。这里，像美国的情况一样，那些‘贫穷的白人’——更正确地说，受到贫困威胁的白人——是偏见和白人至上论的最主要卫护者。”*The Problem of South Afric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55), p. 23.

第五章

“法西斯主义”——左、中、右

1958年法国继一次军事政变之后，戴高乐重新执政，随之出现了法西斯主义作为主要意识形态运动将复活的可怕断言，同时再次引起了关于不同极端主义运动性质的争论。1945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大量讨论是致力于分析执政的法西斯主义，重点是讨论纳粹党或其他法西斯政党到底是巩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还是创造一种新的、类似于苏联官僚集权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分析执政党的实际行为，虽然是理解其功能意义的关键，但如果这种意义确已被理解，那么还必须对任何运动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加以分析。各种现代民众运动之社会基础的研究表明，每个主要社会阶层都既有民主的又有极端主义的政治表现。左、中、右三种极端主义运动主要是分别以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虽然一直在不同的场合用于指上述极端主义的各个变种，但分析考察每个变种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揭示了它们的不同特征。

按左、中、右对现代社会进行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时代，当时代表们按他们的政治色彩在一个半圆形会议室就座，最激进的和平等主义的坐左边，最温和的和主张贵族统治的坐右边。左的主张社会改革和平等主义，右的拥护贵族统治和保守主义，这种区分随着政治被定义为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深化了。由于民主已经日渐制度化，而且保守主义者对普选制意味着私有财产终结的恐惧已经减少，所以许多人开始认为按左和右以及阶级冲突来分析政治问题过于简化了，歪曲了客观实在。但是，不仅政治实际，而且政治说教的传统，都迫使大

多数学者保留这些基本概念,尽管其他概念如宗教差异或地区冲突可以解释不循阶级路线的政治行为。¹

在1917年以前,一般把极端主义政治运动看作是一种右倾现象。那些拒斥民主的人通常寻求保留君主制度或贵族统治。在1917年以后,政治家和学者都开始论及左和右的极端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处在政治连续谱两端的极端主义者将成为独裁的提倡者,而位于中间的温和主义者仍然是民主的捍卫者。本章将试图说明,这是一个错误——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团体可以像民主团体一样按左、中、右加以分类和分析。这三种位态在其社会基础的构成和要求的內容上都类似于民主的平行位态。虽然把民主连续谱和极端主义连续谱的所有三种位态加以比较有内在价值,但本章将集中论述中间态和一种“左”的极端主义形态的政治学含义;前一种形态是最受忽视的极端主义类型,后一种出现在阿根廷和巴西,有时称之为“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庇隆主义。

中间态属于有民主倾向的,通常称之为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表现为法国激进党、荷兰和比利时的自由党之类政党的欧洲,这种自由位态意味着在经济上信奉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相信小工商业的活力,反对强大的工会;在政治上要求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和控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支持成功的机会均等,反对贵族统治,反对强制的收入平等;在文化上倡导反教权主义和反传统主义。

如果我们考察大多数民主国家这三种主要位态的支持者,我们会发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之间有清楚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左派其力量来自体力劳动者和较贫困的乡村阶层;保守的右派有两部分支持者:一部分是大企业主、大农场主、管理人员和自由职业阶层,另一部分是没有特权然而仍然挣不脱传统戒律的组织,特别是教会。民主的中间派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小工商业主、白领工人和反教权的专业人员。

不同的极端主义团体具有与其民主对应物之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传统的法西斯运动相当于中间态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意识,虽然在它歌颂国家时是反自由的,但在它反对大工商业、工会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却类似于自由主义。另外,从它厌恶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传统主义来

看,也类似于自由主义。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和奥地利,纳粹支持者在社会特征上与其说类似于保守主义支持者,不如说类似于自由主义支持者。

左翼极端主义的最大群体是共产党人,他们的要求已经作过相当详细的论述,在本章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共产党人显然是革命的,反对统治阶层,以下层阶级为其基础。不过,左翼极端主义还有另一种形式,像右翼极端主义一样,也常常被归在法西斯主义名下。这种形式叫庇隆主义,主要见于不发达的贫穷国家,呼吁下层阶级反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庇隆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是民族主义的。通常,这种主义由一批民族主义者军官创始;他们认为人民贫困、经济不发达、军队士气低落和欠饷的祸根是腐败的特权阶层,他们寻求通过摧毁这个阶层创造一种更有生气的社会。

保守的或右翼的极端主义运动出现在现代史的不同时期:从匈牙利的霍尔蒂派、奥地利陶尔富斯基督教社会党、希特勒以前德国的帝政派退伍军人团和其他民族主义者、葡萄牙的萨拉查,到当代法国1958年以前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当代意大利的君主主义者。右翼极端主义者是保守的、不革命的。他们寻求变革政治制度是为了保存或复辟他们喜欢的文化和经济制度,而中间派和左翼极端主义者则是寻求用政治手段进行文化和社会的革命。右翼极权主义者的理想并非要成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而是要一名君主,或者一名能独断专行的因循守旧者。在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许多右翼极端主义运动显然是拥护君主制度的,戴高乐则恢复了法国总统的君主权利和特权。这些运动的支持者不同于极端主义中间派的支持者是不奇怪的:他们往往较富有,而且更信仰宗教——从而得到大量支持者,这是更重要的。

“法西斯主义”与中产阶级

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个论点并不鲜为人知。自从法

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首次登台以来,许多分析家就已指出这一点。之前经济学家戴维·萨波斯(David Saposs)对此作了清楚阐述:

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他们的理想是成为独立的、拥有少量财产的阶级,如商人、机械师、农场主等。这种社会成分……现在叫做中产阶级,它提倡一种承认私有财产、利润和竞争的制度,但其基础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基础……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它反对“大企业”,或者说反对现在通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

战争以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丧钟一直在回荡,尽管有理由敲响。不过,由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起源于中产阶级,所以认为这个阶级也会失去作为有效社会力量的资格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民粹主义像它过去一样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而中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朝气蓬勃和自信……²

虽然有些人把下层中产阶级支持纳粹主义归咎于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经济困难,但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写到大萧条的深层原因时指出,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来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固有的趋势,即使中产阶级经济地位改善了,这种趋势仍将继续影响这个阶级。

就希特勒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的绝望反应来说,它是发轫于19世纪末的一场仍将继续下去的运动。从物质上说,设想小店主、教师、传道士、律师、医生、农场主和手艺人,在本世纪末比本世纪中期过得更糟是不必要的。但是,从心理上说,下层中产阶级由于工人和上层资产阶级的组织、政治联盟和政党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而日渐失去光彩。下层中产阶级的这种心理失落加剧了其成员人格中的情绪震荡,从而肥沃了中产阶级借以报仇雪恨的各种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土壤。³

随着中产阶级相对地位的跌落,以及它对前进中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继续仇视,它的“自由的”意识形态——支持反对大规模权力的个人权利——已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可是,自由的学说曾经激励资产阶级同封建君主秩序的残余作斗争,同重商主义统治者和教会设置的限制作斗争。自由的意识形态反对皇权和教权,支

持随之出现的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当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且满足了有效工业化的某些功能条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在他的分析中,这种发展与工业化是一致的),必须废除人为的内部界限,创造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确立法律、秩序和相对的国际和平。⁴

但是,构成18—19世纪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抱负和意识形态,在20世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含意,起过不同的作用。它们不赞成大规模的组织,不赞成国家权力的扩大,向我们今天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提出了挑战,因为大工业和强大的合法劳工运动对于一种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而政府控制和高税收似乎是其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因此,反对商业官僚组织、工会和国家控制,既是不现实的,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理的。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所指出的:“对成熟的现代社会秩序之某些主要方面持新的否定态度,特别集中在‘资本主义’的符号上……对社会‘合理化’意识形态的反动,至少是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⁵

虽然大规模产业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劳资之间的持续冲突,但小工商业者渴望保持自己及其社会价值的重要地位是“反动的”——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之阻碍革命车轮的意义上是如此,而且从现代工业社会固有趋势看也是如此。为了阻挡或逆转大规模产业过程,小工商业阶层有时发动民主自由运动,如英国的自由党、法国的激进党和美国的塔夫脱共和党。可是,这种运动并不能阻止其追随者所反对的趋势,正如另一位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最近所指出的:“小工商业者所害怕的趋势——生产集中和权力集中——在萧条时期、战争时期和繁荣时期并没有中断,而且与什么政党执政无关;因此,他们总是不会满意的……”⁶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小工商业者转向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或者是法西斯主义的,或者是反议会民粹主义的,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他们在以不同方式对议会民主表示轻蔑。再者,这样的运动适应了比较传统的自由政党的某些需要,而中产阶级正好借以发泄在成熟的工业秩序中所受到的分层压抑。但是,当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合法的社会变革和“改革”(这里的“改革”,确切地说,是逆转现代化过程)解决问题时,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打算用直接接管国家、管理国家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就将恢复早先中产阶级的经

济安全感和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可以削弱大资本集团和大劳工组织的势力和地位。

呼唤极端主义运动也可能是不同阶层的居民对工业化之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效应的一种响应。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作出极端主义响应的阶层也不同,比较社会民主过程所受到的有组织的威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工人阶级的极端主义,不管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还是庇隆主义,最常出现在迅速工业化的社会,或工业化过程并没有导致出现一个工业占优势社会的地方,如南欧的拉丁国家。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出现在兼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和强大劳工运动这两个特点的国家。右翼极端主义最常见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与皇权和教权结盟的传统保守势力在这种地区仍然是强有力的。由于有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或魏玛德国,曾经具有所有上述三种环境,所以这三种类型的极端主义政治行为有时出现在同一国家。只有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富裕国家似乎对这种病毒有免疫力,但是甚至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有证据表明,自谋生计者多少有些不满情绪。

比较某些拉美国家与西欧国家的政治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类似阶层在工业化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政治反应。较富裕的拉美国家类似于19世纪的欧洲;它们正处在工业发展时期,工人阶级相对来说尚未组织成工会和政党,传统保守主义在乡村居民中仍然大有市场。这些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正在成长中,类似于欧洲19世纪的相同阶级,他们试图通过削弱反资本主义传统势力和军事独裁权力来支持民主社会。⁷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支持极端主义政治行为的社会基础,不在于中产阶级,而在于正在崛起而又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正在遭受迅速工业化固有的张力。处于这种状态的工人为支持拉丁美洲特有的大规模“法西斯”运动——在阿根廷是庇隆领导的运动,在巴西是瓦尔加斯领导的运动——提供了主要基础。这些运动像它们有时与之结盟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也对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不满民众”有号召力。

这里,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在每个国家中,哪个阶层是最“不满的”?在有些国家,这个阶层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或从来没有在经济上或政治上进入全社会的工人阶级。在另一些国家,这个阶层是小商人和其他相对独立的创业者(小农场主、地方上的律师),他们感到受到两方面的压

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的团结起来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机构。还有一些国家的这个阶层是保守的因循守旧的社会成员，他们寻求维护不同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的旧社会。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是起源于一种机会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在不同时期曾试图要求所有上述三类人的支持，并保持某种不定型态，以致有可能呼唤广泛不同的阶层的支持；至于哪个阶层给予支持，取决于国内最“不满”阶层的变化。⁸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政客在他们努力争取支持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所以法西斯运动常常包容利益和价值相互冲突的群体，甚至在其主要表达一个阶层的要求时。希特勒作为一个中间态极端主义分子曾赢得希望利用纳粹党对付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保守主义者的支持。而保守的极端主义者如佛朗哥往往能在其追随者中容纳中间态极端主义分子，不过不让他们控制运动。

在前一章讨论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时，我曾试图说明使不同群体和个人较易于接受一种极端主义邪恶世界观的另几个条件。⁹那里提出的论点表明，低水平的经验和高度的不安全感容易使人倾向于极端主义政治观点。缺少经验基本上是由于没受过什么教育和与各种不同经验相隔绝造成的。因此，中产阶级的最富权力主义的部分应当见于生活在小社区或农场环境中的小企业家。这些人 with 中产阶级其他部分相比，受的正规教育较少；他们住在乡村或小城镇意味着接触不到多样性的价值和人群。由于同样原因，城乡自营职业者中的中产阶级极端主义，可以预期会多于白领工人、行政官员和专业人员中的极端主义。

下面几节将集中介绍得自不同国家的资料；它们显示，传统法西斯主义和民众主义的社会根源明显不同于右翼运动的社会根源。

德 国

当然，革命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典型例子是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家看来，这个党代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其赢得权力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没落制度。由于在纳粹

党执政以前还没有民意测验,所以我们要确定其社会基础不得不借助于大选记录。如果说传统的法西斯主义,其所吸引的主要社会成分与支持自由主义的相同,那么,以前支持自由主义的人应当支持纳粹党。看一下1928年至1933年间德意志帝国总的选举统计资料似乎验证了这一点,见表5.1。

表 5.1 1928—1933 年德国各政党得票数占总投票数的百分比,以及 1928 年得票数在 1932 年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保留的百分比*

政 党	占总投票数的百分比					1928 年得票数 与 1932 年得票 数之百分比 (以百分数表示)
	1928	1930	1931	1932	1933	
保守政党 DNVP(德国国家人民党)	14.2	7.0	5.9	8.5	8.0	60
中产阶级政党 DVP(德国人民党,属右翼自由政党)	8.7	4.85	1.2	1.8	1.1	21
DDP(德国民主党,属左翼自由政党)	4.8	3.45	1.0	0.95	0.8	20
经济党(小工商业者)	4.5	3.9	0.4	0.3	**	7
其他	9.5	10.1	2.6	2.8	0.6	29
上述中产阶级政党得票数保留的总百分比:21						
中间派(天主教)	15.4	17.6	16.7	16.2	15.0	105
工人政党 SPD(社会民主党)	29.8	24.5	21.6	20.4	18.3	69
KPD(共产党)	10.6	13.1	14.3	16.85	12.3	
上述工人阶级政党得票数保留的总百分比:92						
法西斯政党 NSDAP(国社党)	2.6	18.3	37.3	33.1	43.9	1 277
法西斯政党得票数增加的总百分比:1 277						

* 基础资料,载于 Samuel Pratt, *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 (M. A. thesis, Dept. of Soci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48), pp. 29, 30. 另见 Karl D.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und Düsseldorf: Ring Verlag, 1954), pp. 86—106. 其中载有同样资料,并作了分析。1933 年选举是在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个多月以后举行的。

** 经济党在 1933 年选举中没有提出候选人。

虽然像这样一类的表掩盖了个人与统计总趋势相悖的变化,但仍可以从中引出某些合理的推论。由于纳粹党的发展,以德国社会中非传统成分——主要是小企业家和白领工人——为基础的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完全崩溃了。在 1928 年到 1932 年间,这些党失去了 80% 左右的选

票,从占总投票数的 1/4 下降到低于 3%。保有相称支持力量的唯一中间派政党是天主教中央党,它是得助于对宗教的忠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失去了大约 1/10 的支持,尽管它们的总得票数只是稍有降低。保守派政党的应得支持减少了约 40%,大大低于中产阶级自由政党的降低比例。

分析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非天主教政党中的得票变化表明,纳粹党在魏玛共和国的前支持者中产阶级自由政党中得到的支持最多。在这些自由政党中,失去支持最多的是经济党,它主要代表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¹⁰魏玛共和国的右翼民族主义反对派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是唯一一个保留 1928 年总得票数一半以上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天主教的政党。

保守政党票数减少最多的地方主要在德国东部边界的一些选区。在德国 35 个选区的 10 个选区中,德国国家人民党这个保守政党在 1928 年到 1932 年间选票下降了 50% 或更多。这 10 个选区有 7 个在边境地区,包括与波兰相邻的各地区,以及面向北部边界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由于这个党是纳粹党以前凡尔赛条约的最保守、最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所以这些选举资料表明,在民族主义是这个党最强有力支持因素的地方,它受到了纳粹党最严重的打击,而在没有直接受过凡尔赛条约并吞之苦,以及可以证明党的基本纲领比民族主义更保守的地区,它保持了大多数选票。德裔美籍社会学家鲁道夫·赫伯尔(Rudolf Heberle)在详细研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选举模式时证实,保守主义政党失去了城乡两地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支持,而在非边界地区,类似的小财产所有者通常大多数是自由派,他们仍然支持上层保守派势力。¹¹

纳粹党的支持源不同于德国传统的右翼政党,这在男女投票人的资料中可以找到一些更进一步的间接证据。总之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一个政党越保守或越带宗教性,它的女性支持者越多。德国国家人民党比除天主教中央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有更多的女性支持者。纳粹党以及比较自由的中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总起来看,突出地得到男性的支持。¹²

这个论点在赫伯尔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纳粹党力量最强的州——的选举研究中有更直接的证据。在 1932 年,“保守政党在纳

粹党最强的地方最弱，而在保守政党强的地方，纳粹党较弱。可是，在18个以农村为主的选区，纳粹党(NSDAP)和保守政党(DNVP)得票百分数之间不是这种关系(两者相关系数是-0.89)……这似乎表明，纳粹党1932年实际上是取代了地方政党和民主党成了小农场主中占优势的党……而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投希特勒的票是比较勉强的。”¹³

德国政治学家冈瑟·弗朗兹(Günther Franz)最近在研究纳粹党力量极强的另一个州下萨克森的投票趋势时报道了类似的情况。他得出结论说：

国社党的大多数选民来自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德国国家人民党(保守政党)也失去了选票，但在1932年它仍然拥有它1930年得到的选票，并在下两次选举中总得票数增加了。这个党是(除天主党中央党以外)唯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国社党(纳粹党)得势以前并没有真的瓦解……¹⁴

在全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下萨克森州的这种投票趋势也存在。在全国35个选区，按比例看，纳粹党得票与自由政党失票的阶级地位相关性(0.48)大于与保守政党失票的这种相关性(0.25)。¹⁵

除了自由政党之外，还有另一类其基础是中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即所谓的“联邦主义者”的或区域自治的政党，它们的支持者几乎全转向了纳粹党。¹⁶这些政党或者反对德国的统一，或者反对黑森、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州特别依附于普鲁士。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表达了这些省区城乡中产阶级对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官僚化的反感，以及试图通过分散政府权力使官僚化过程逆转的要求。初看起来，区域自治政党的权力分散愿望和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固有的国家至上观念，似乎反映完全不同的要求和情绪。但是，区域主义者的“地方权利”思想和纳粹党反对工业社会“大”压力的思想，实际上都对那些感到失去家园或受到挑战的人有吸引力。在两者的经济思想方面，区域自治政党表达的观点也类似于纳粹党得势以前的观点。例如，要求“在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实行地区和文化自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方党在其早期纲领中写道：

手艺人[手工业者]一方面必须准备对付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用自己的工厂排挤他们；另一方面，要准备对付社会主义，因为社

会主义旨在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靠工资吃饭的人。而且，小商人也必须准备对付呈大商业形式的资本主义，整个零售业都面对着社会主义的威胁。¹⁷

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反对大和集中化的意识形态与小工商业者自身经济利益直接表现形式之间的联系，可以在两个最大的地方政党——下萨克森的德意志—汉诺威党和巴伐利亚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同盟与经济党——联合成一个议会派别的行动中看到；经济党明确申明自己代表小企业家利益。在1924年选举中，巴伐利亚的地区主义政党和小工商业者政党实际上提出了一份联合竞选纲领。¹⁸正如赫伯尔就这些政党的表现所指出的：“批评普鲁士的政策……要求任用本地官员，拒绝承认柏林是总的文化中心，这一切都是战前长期形成的一种倾向的发泄形式……究其根本原因，批评普鲁士仅仅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普遍表示反感的表现……”¹⁹

纳粹党对德国社会中那些仇恨大城市权力和文化的民众的吸引力，也反映在纳粹党在小社区的成功中。1932年对德国25 000居民以上城镇之选举情况所进行的一项详细环境研究显示，城市越大，纳粹党的得票率越小。在这样的城镇，纳粹党的总得票数少于其他5个主要政党中的任何一个，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保守的国家人民党。²⁰大都会柏林是抗议势力占优势的唯一选区，1932年7月纳粹党在那里的得票率低于25%。²¹这些事实向纳粹主义产生原因——现代城市工业社会反常状态的发展及其普遍的无根性——的各种解释提出了尖锐挑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研究1928年至1932年间德国非马克思主义、非天主教政党选举情况的变化表明，纳粹党从中间派和自由派政党得票大大多于从保守派政党的得票，这证实了论点的一部分：传统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吸引的是同一阶层。论点第二部分说，法西斯主义主要对中产阶级中自营职业者有吸引力；三项关于1928年至1932年德国选举环境的独立研究证实了这部分论点。两位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卢米斯(Charles Loomis)和J.艾伦·比格尔(J. Allen Beegle)曾把3个州1万居民以下社区1932年纳粹党得票百分比与特定社会经济阶层的劳动力就业百分比联系起来考虑，他们发现：“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降临德国，中产

阶级占优势(以居民中雇主的比例以及雇主与工人和拿薪金的雇员的比例表示)的地区,给纳粹党的支持越来越大。”

纳粹支持者与所有权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性,不仅适用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诺威的小工商业者,而且也适用于这两个地区的农场主,但不适用于巴伐利亚;巴伐利亚是一个天主教力量很强的地区,纳粹党势力相对较弱。²²赫伯尔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研究,分析了魏玛时期德国的所有选举,他得出结论说:“特别易于受纳粹主义影响的阶级,既不是乡村的贵族和大农场主,也不是乡村的无产阶级,而是小农场主;这个阶层是构成国社党城市支柱的下层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Kleinbuergertum)在农村的对应物。”²³

社会学家塞缪尔·普拉特(Samuel Pratt)对纳粹党胜利前城市选举的杰出研究,是把1932年7月投纳粹党票的人与“上层中产阶级”的人口成分和“下层中产阶级”的人口成分联系起来考虑的;这里的“上层中产阶级”是指“大小企业的拥有者和行政官员”;“下层中产阶级”是指“公务员和白领雇员”。在德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和不同地区,纳粹支持者与这两个中产阶级集团都有高度的相关性,但与“下层中产阶级”的相关性不像与“上层中产阶级”那样始终保持高相关和正相关。正如普拉特所说:“在中产阶级这两种成分中,上层中产阶级似乎更彻底地亲纳粹。”²⁴然而,他所谓的上层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小工商业者构成,因此这里所说的相关性基本上相当于自营经济地位与纳粹党得票的相关性。²⁵这种解释因普拉特的研究结果而得到强化:纳粹党支持者也与只有一名雇员的商业企业成分——换句话说,即自营职业者——相关(相关系数+0.6)。“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只有一名雇员的工厂是划分上层中产阶级时所使用过的另一种有产阶级尺度。”²⁶

1933年纳粹党党员的职业分布表明,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的各种中产阶级阶层,其中自营职业者又是党员超比例最多的,见表5.2。党员人数第二个超比例多的类型——家庭仆人和非农业家庭企业的帮工——也证明纳粹党对小工商业有吸引力,因为这个类型主要由家庭所有小工商业的帮工构成。

表 5.2 总人口中纳粹党员的比例与不同职业中
纳粹党员的比例之比——1933 年*

职业类型	1933
体力工人	68%
白领工人	169
独立职业者**	187
官员(公务员)	146
农民	60
家庭仆人和非农业家庭企业帮工	178

* 表中数据是经过计算的,资料来源: Hans Gerth,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in Robert K. Merton, *et al.*, eds., *Reader in Bureau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2), p. 106.

** 自营职业者、手艺人 and 自由职业者。

德国大企业 with 纳粹党的关系是个争论相当大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证明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金融家、大企业家鼓励、扶植、支持和资助的”²⁷。最近的研究表明,相反意见是正确的。除少数孤立的个人之外,德国大企业在纳粹党上升到主要政党地位以前,几乎没有给过纳粹主义财政支持或其他鼓励。纳粹党在 1932 年才开始得到财政支持,但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企业为了讨共产党以外所有主要政党的欢心而给这些政党钱的结果。某些德国企业家大概希望通过给予资助来驯服纳粹党。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群体仍然忠诚于保守政党,许多企业家直到纳粹党掌权后也没给过纳粹党钱。²⁸

1932 年理想型的纳粹支持者是中产阶级自营职业的抗议者,他们或者生活在农场,或者住在小社区,以前是投中间派政党和地区主义政党的票,而这些政党是强烈反对大企业和大劳工组织的权力和影响的。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纳粹支持者没有其他特征。像所有寻求成为选举多数的政党一样,纳粹党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个大选民群体有吸引力。²⁹ 它显然从其他中产阶级群体特别是失业的中产阶级得到大量支持。³⁰ 在影响德国比其他任何工业国家都厉害的大萧条的低点,对“制度”不满者遍布全社会。但是,作为一种运动,纳粹主义仍然是对具有上述特征的人最有吸引力。

对德国不投票者的解释

纳粹主义主要是一种自由小资产阶级运动，反对这一论点的最重要论据，或许是有人提出，纳粹党力量（在得票 2.6% 的 1928 年与得票 18.3% 的 1930 年之间）第一次大增的主要来源是过去的投票者。在 1928 年和 1930 年这两次选举之间，弃权票从占合格选民的 24.4% 锐减到 18%——这一事实导致如下结论：纳粹党得票大增来自传统的冷漠者和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年轻人。³¹ 对阶级分析作最全面批评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莱因哈德·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他提出纳粹党力量有一个成长过程，中产阶级在此过程中是跟着新投票者加入支持纳粹主义行列的：

新取得资格之选民和政治冷漠者的重要性向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运动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这并不是否认中产阶级群体的经济不安全感对于接下去赢得政权的重要意义，而是主张：选民激进化是源自以前不参与政党政治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社会群体，还认为中产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之成员对这种极权主义运动的显著支持是后来发生的，他们希望摆脱经济困境，渴望从支持这种得势的运动中得到好处。³²

这个论点向纳粹主义的阶级分析提出了挑战，也与上一章讨论工人阶级权力主义时，对新社会运动成长发展所作的概括相矛盾。上章的分析表明，极端主义和权力主义政党可以动员居民中大多数受排斥者和冷漠者参与政治行动，但这只是在这类政党已成为主要运动之后，而不是在它们成长的早期。要支持势单力薄的新运动，需要对政治过程有一种比较复杂的长期观点，而这是那些经济上无保障、受社会忽视、对政治冷漠的人所不具备的。这个规律也适用于纳粹党，弃权票减少与纳粹主义力量增加之间关系的统计分析表明，事实上正是如此。

断言纳粹党早期支持力量来自传统的投票者的盖格 (Gerger)、本迪克斯和其他研究者，是根据总的选举统计数字得出他们的看法的，因为这些数字显示：纳粹党得票的大增与 400 多万以前投票者的突然参加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当把弃权率和纳粹党得票率的变化用选区加以分类分析时，我们实际上发现，在纳粹党得票的百分增长与参加投票的合格选民的比例增长之间，在阶级地位的背景上呈一种低度的负相关关系，其

相关系数为 -0.2 。更具体地说,只在5个选区,1928年到1930年间纳粹党增加的选票超过了平均增加数,因为这期间全德国选民数的增加也特别高。全国35个选区有22个选区显示一种负关系:投票数增加得少的选区,纳粹党得票数反而增加得多,反之亦然。由此看来,1928年到1930年间弃权票减少这一证据并没有对纳粹主义的阶级分析构成挑战。³³

的确有不同于简单地检查选票变化的理由表明,纳粹党从居民的冷漠部分得到大量支持。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指出,居民中的那些对政治通常表现冷淡的人,往往倾向于权力主义的态度和价值。³⁴不过,他们的政治兴趣只有通过表达简单极端主义政治观点的大规模运动才能唤起。在1928年到1930年,纳粹党并不满足这类人的要求,但在1930年以后满足了。那些凝神设想1930年纳粹力量增长出现在冷漠者中的分析家,忽视了其实发生在以后的一种变化。德国弃权票数的最大一次下跌实际上出现在1933年3月最后一次选举中;这次选举是希特勒作为联合政府首脑就职以后举行的。弃权票数从1932年19%降至1933年11%,下跌了8个百分点,而纳粹党得票从33%增至43%。倘若我们再把纳粹党得票数的增加与选民的增加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发现,正像上述分析家的设想所要求的,两种增加趋势显示高度的正相关(0.6)。

如果按选区表达这个结果,在35个选区中的28个选区里可以看到,当投票选民的人数增长高于或低于全国平均值时,纳粹得票数的增长也相应地高于或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纳粹党作为一个集权主义大党,而且其领袖已成为国家总理,这使它从热衷政治的队伍中得到了额外的支持(使其得票率第一次超过40%的竞选目标)。因此,纳粹党在成长模式上是可以与左翼极端主义政党相比较的,后者在其达到政权竞争者地位时,也从最受社会排斥的阶层得到支持。

奥 地 利

第一共和国期间奥地利的选举方式与德国相似,尽管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阻碍了严格的比较。1930年以前,奥地利的选民分为三大类:支

持社会党的,约占40%;支持保守的主张扩大教权的基督教社会党的,约占45%;支持一些小得多的泛德意志自由派政党(主要是大德意志人民党)的,在10%到15%之间。这里我们主要感兴趣的一个政党是人民党,因为它代表了自由的反教权政策,这也正是德国自由主义中间派政党所实行的政策。除此之外,还加上它有强烈的亲德倾向,这是1918年以后与德国自由传统相联系的。这个党的支持力量在1930年以前包括1930年主要来自城市中产阶级中的一个相当大的反教权部分,再加上抗议者和犹太人的少数派。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人民党与基督教社会党共处在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联盟中。1930年联盟之瓦解,主要是因为它对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及其私人军队(Hermwehr)所推行的看上去反议会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为了捍卫民主程序不受主张教权的集权主义势力的攻击,人民党的领袖肖伯(Schober)博士与另一个泛德意志的反教权的乡村组织农民联盟结成了同盟,后者“拥护……法律和秩序,拥护议会政治”³⁵。新同盟在全国得到12%的选票。在1930年选举中,这个泛德意志同盟大概到达了它表达一种民主的反教权自由意识形态的顶峰。然而在随后两年内,它的大部分支持者转而支持了纳粹党。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西蒙(Walter Simon)在详细分析当年选举资料时简洁而生动地报道了那两年的事件:

极其重要的是,在1930年11月,肖伯博士提出的内容包括“自由的”德意志精神、与“奥地利经济联盟和农民联盟联合、以肖伯博士为领导的联合竞选纲领”,从主要由两部分选民——一部分选民在一年半内转向支持希特勒的运动,另一部分选民属于犹太中产阶级——构成的选区得到了选票。这样,肖伯博士就成功地把犹太自由派、反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亲德的反教权中产阶级最终集入一个阵营。这两类中产阶级仍然继续恪守1848年革命的传统,他们的伟大前辈曾在这次革命中并肩为反对独裁统治、争取宪法政治而斗争……到1932年,这个党的几乎所有非犹太人选民都转向投纳粹党的票。肖伯博士于1932年夏去世,其同盟的城市一翼作为“大德意志人民党”于1933年5月15日在所谓的“战斗联盟”的名义下加入了纳粹党。³⁶

大德意志人民党的支持者转向纳粹党不能解释成亲德的奥地利人对

德国内部主导趋势的调整。纳粹党在德国掌权以前一年已得到非犹太人反教权奥地利中产阶级的支持，在1931年和1932年奥地利全国各次地方选举中已取代人民党成为第三大党。³⁷

奥地利政治舞台也显示保守的或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的鲜明特征。基督教社会党从来不承认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该党的领导人和追随者想象不出为什么允许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在政府中存在，因而在1934年，奥地利主张教权的保守势力开始强行实施独裁制度。这是一种保守的独裁：对组织没有惩罚和伤害，除非它坚持对政权作有组织的对抗。社会主义者和工会受到压制，但可以进行强大的地下活动。1938年，当纳粹党接管奥地利时，两种独裁的区别变得明显了：极权的纳粹党积极寻求控制全社会，迫不及待地破坏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的地下活动，并开始对犹太人和所有纳粹思想的反对者加紧迫害，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是否积极。³⁸

法 国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起义以前，战后法国目睹了两个较大运动的发展。这两个运动都被其反对者贴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一个是戴高乐主义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F)，另一个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保障联盟(UDCA)——常称为布热德主义(Poujadist)运动。在1956年选举中，布热德主义者得了许多选票(约10%)，暂时取代戴高乐主义者成了共和国主要“右翼”反对派。在某些分析家看来，这表明布热德接过了支持戴高乐的力量，而这是戴高乐解散法兰西人民联盟、退隐到科龙贝双教堂等待法国人民对他再次召唤时所放弃的力量。

然而，这两名领导人及其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明显相悖的。戴高乐是一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笃信法国右翼的传统真理。他多方寻求通过一名强有力的总统给法国以稳定的保守统治。在鼓吹需要一名强有力的执政者这一点上，他所继承的传统在法国基本上是与君主制度和教会相一致的。在他重建法国的呼吁中，戴高乐从来没有使一个阶级的利益与

另一个阶级的利益相对立；他或他的运动都从不寻求用宣传中产阶级利益受到大企业家、大银行家或工会的威胁的方式，来赢得这个阶级的支持。相反，戴高乐认同于能使法国作为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一切：发展高效率的大工业、坚持 1946 年以前他执政时搞的国有化，以及强化国家权力。他还故作姿态维护他与天主教会的一致。总之，戴高乐明确矢志于保守右翼的强人传统；他寻求变革政治制度是为了保留传统主义的价值。

关于戴高乐主义支持力量的可供利用的资料证实了如下论点：法兰西人民联盟从保守阶级方面汲取力量。调查资料显示，法兰西人民联盟在 1948 年前的鼎盛时期，从以前支持自由共和党或法国的保守势力“中间派政党”的那些人处得到的选票，多于从其他任何政党支持者那里得到的选票。在 1947 年，说他们以前支持自由共和党的人，有 70% 说他们打算投戴高乐主义者的票。戴高乐主义信徒的另一大来源是天主教的人民共和运动；这个组织虽然在许多经济问题上 是左翼的，但在战后一段时间由于它明确的天主教性质，得到了许多传统保守人士的选票。前人民共和运动的支持者有 54% 在 1947 年是戴高乐主义者。戴高乐主义从与天主教和保守主义有联系的政党得到的支持，占它从以前支持激进政党——法国传统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反教权的政党——的那些人中得到支持的 26%。³⁹

戴高乐主义支持力量之根本保守性质的更直接证据，是来自法兰西人民联盟解散、戴高乐短暂退出政治舞台以后时期的调查结果。在 1955 年，报道 1951 年支持戴高乐主义者的那些人，有大约一半(52%)表示将投反对戴高乐主义政党(共和派社会行动联盟)的票，但每 5 个转而支持另一政党的人中，有 4 个打算投保守的温和政党的票。⁴⁰

“探测”(Sondages)——法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汇编的各种调查资料显示，法兰西人民联盟从那些在欧洲国家中通常支持比较保守的政党的人中得到最大的支持：那些人经济上比较宽裕，比较倾向于宗教，年龄较大，而且大多是妇女。投法兰西人民联盟票的人比法国其他任何政党的支持者所受的教育都高(有 38% 的人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他们的支持者中超过 65 岁的人较多；在工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工商业者中，其势力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强大；与其他天主教政党一样，大多数支持者是

妇女。据报道,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支持者只有12%没有宗教信仰,而激进政党的这个比例是40%。⁴¹“探测”在1952年报道:“法兰西人民联盟是所有政党中女性最多的。……其支持者中占优势和超人口比例的职业是白领工人、工商业者、工业管理人员和工程师。”

调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戴高乐支持者的保守性质,而且还表明,这些支持者比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主要政党的支持者都更可能怀疑议会制度和拥护强人政治。在认为党应当在某些条件下用武力夺取政权和赞成以革命手段取得进步的成员比例上,戴高乐主义者仅次于共产党人。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任何政党相比,戴高乐主义支持者中有更多的人认为:“应当取缔某个党或某些党”,“内阁部长中”只有少数人“是正直的人”,党的“领导成员”比主义或纲领更重要,对党的领袖“满怀信任”。⁴²

在1956年选举中,使许多政治观察家大感惊奇的是,布热德主义运动得到了相当多的选票。有些观察家把这看作是法国右翼比较具有权力主义的反共和政体成员对有机会投票反对民主和共和国所作出的一种最新反应。⁴³

事实上,布热德主义像奥地利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极端主义运动,其求助和依靠的社会阶层是那些支持“自由主义中间派”运动的阶层。虽然不可能知道它若掌权是否会像纳粹主义,但它的意识形态是与纳粹党和其他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民粹运动一样的。布热德主义求助于小资产阶级、手艺人、小商人和农民,猛烈抨击现代工业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反对大企业、托拉斯、马克思主义政党、工会、百货公司、银行,以及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诸如社会保险之类和其他提高老百姓税收的福利国家措施。不过,在布热德主义直接攻击左、右两翼势力时,它与革命的共和论传统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而在它需要民粹主义观点——控制政府的不是政党而应当是人民——时,它赞美毫不犹豫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法国革命者,并要求恢复各种革命制度,如三级会议制度——这是一种由地方公民团体以1789年方式上达所呈递的不满意意见的制度。⁴⁴如果它与攻击大企业、左翼政党和工会的势力联合,它就抨击犹太人和维护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⁴⁵

布热德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说与法国的右翼传统有关,不如说是与反教权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关,英国撰稿人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

对此作了极好的概括：

在布热德主义的各种不同形态中，传统的反民主政体的右翼认为，共和国背叛了法兰西；在布热德主义看来，应当警惕出卖共和国和正直人民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布热德主义者的任务是以1789—1793年的精神再造共和国。他们要求一种新的议会，新的陈述人民不满的渠道，以及新的手段……在极右翼的各种三位一体的箴言中〔如马歇尔·贝当(Marshal Pétain)的“工作、家庭、祖国”〕，他们更喜欢共和国的箴言，但他们强调自己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特殊解释。

布热德主义对共和国以及对革命原则和象征的依恋，使它置身于民主传统中……但是，它的心理特征非常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特征，更确切地说，是接近平民百姓的法西斯主义心理，而不同于社会上层人物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布热德主义同样担心被无产阶级并吞(这种担心与对地位低于受威胁的下层中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工人和高于这个阶级的社会阶层的仇视心理有关)，渴望找到(国内和国外的)替罪羊，仇视文化、知识分子和离经叛道者。⁴⁶

戴高乐主义和布热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一定说明这两个运动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研究者论证说：“布热德主义的基本核心是它‘反对民主制度’，因此它能吸收1951年的戴高乐主义。”⁴⁷但是，看一下1951年戴高乐主义支持者和1956年布热德主义支持者在法国的分布，马上可以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布热德主义的势力主要在戴高乐主义势单力薄的地区，特别是法国南部，而戴高乐主义势力强大的地区是阻止了布热德主义发展的地区。虽然布热德在法国全国的得票数少于戴高乐：250万票对340万票，但在南部许多选区，1956年布热德主义者的得票远远多于1951年戴高乐主义者的得票。⁴⁸戴高乐主义的力量集中在法国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布热德主义的地理中心是在比较贫穷、比较落后和经济停滞的地区。

除了社会生态证据以外，还有相当多的直接调查资料或选举资料证实，布热德主义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反教权的中产阶级——得到支持，而且，它是一种革命运动，不是保守运动。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1956年进行的一次选民全国抽样调查发现，布热德主义支持者有一半

左右是自营职业者。⁴⁹这个结果也重复出现在法国舆论研究所在巴黎第一区所做的调查中；该所发现，这个区的布热德主义支持者有67%来自小工商业者或手艺人。⁵⁰戴高乐主义支持者的抽样调查显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其他任何政党的支持者都高，而巴黎的布热德主义者的教育程度，比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的支持者都差。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分类来判断，布热德主义者的经济地位也大大低于戴高乐主义者的经济地位。⁵¹

这些资料与社会生态分析所提出的下述解释是一致的：布热德主义基本上是衰落地区自营职业的下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完全不同于1951年生活富裕或住在法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那部分中产阶级支持的戴高乐主义。⁵²

然而，这些资料仍然没有证明布热德主义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有基本的吸引力。⁵³为了找到这样的证据，我们必须借助于两个来源——运动支持者的宗教信仰和行为，以及他们对一些与是否承认传统法国家庭价值有关之问题的看法。正如第七章表7.7中的资料所指出，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获得超比例支持的党派，是天主教的人民共和运动、保守的独立派和戴高乐主义派，而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和布热德主义派，则在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和那些不信宗教者中有超比例的成员。⁵⁴1956年，保守的独立派和戴高乐主义派，（据已援引的那次调查）有2/3的选票是来自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而布热德主义派只有35%的选票，激进党只有29%的选票，是来自定期参加宗教活动者。

1956年的那次调查还涉及对家庭大小和生育控制的态度这些在法国与宗教和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这次调查所发表的资料也证实了如下论点：在对家庭大小和生育控制的态度上，布热德主义者更像反教权的左翼，而不像右翼保守派，见表5.3。例如，当按党派对问卷答案加以分类时，布热德主义支持者的态度类似于左翼政党的态度，而支持社会共和党（雅克·苏斯戴尔领导的戴高乐主义残余组织，在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忠诚于戴高乐）的选民，有接近人民共和运动和独立派支持者的社会态度。

表 5.3 法国各政党支持者的选票与他们对生育控制之态度的关系*

态 度	党 派						
	独立派	人民共和 运动	社会共和党 (苏斯戴尔)	UDCA (布热德)	激进党	社会党	共产党
法国的生育数量是：							
太多	27%	21%	26%	48%	42%	43%	42%
正合适	56	59	48	39	43	43	39
不够	10	14	19	11	8	6	8
赞成生育控制宣传	29	24	29	42	51	60	68
不赞成生育控制宣传	59	65	64	46	37	30	19

* Alain Girard and Raul Samuel, “Une enquête Sur l’opinion Publique à l’égard de la limitation des naissances”, in *Population*, 11(1956), p. 500. 总样本数是 2 432。

在军事政变使戴高乐重返法国总统位置之后的 1958 年，又建立了一个贬斥议会民主制传统的大党——保卫新共和联盟(UNR)。这个党参加了第五共和国的第一次竞选；它自称基本上是个戴高乐主义政党是有某种理由的，因为它的许多领导人如雅克·苏斯戴尔和米歇尔·德勃雷，参加过过去的戴高乐主义运动。在这次选举中，党得到的选票大致在 20% 左右，比 1947 年至 1951 年期间团结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周围的支持者数量少了，但大大多于苏斯戴尔在 1956 年以亲戴高乐的共和派社会行动联盟出面竞选时得到的选票。虽然关于 1958 年选举的研究资料未曾出版，但法国舆论研究所从 1959 年 2 月一次调查得到的可供利用的问卷结果显示，1958 年的戴高乐主义与以前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和共和派社会行动联盟有相同的社会基础，都是比较富裕和保守的阶层，而与民粹派极端主义者布热德的支持者几无相似之处。正如表 5.4 中的数据所表明，虽然有不到 1/4 的自营职业的工商业者支持保卫新共和联盟，但在两年半以前支持布热德的大大低于这个比例。与此相反，保卫新共和联盟从身处“上层阶级”职业的那些人和白领工人得到相当大的支持。而且像以前戴高乐主义组织的情况一样，投这个新政党票的大多数人是妇女，有 54% 的人受过小学以上教育。事实上，保卫新共和联盟的支持者的平均教育水平大大好于其他任何主要政党。相反，1956 年的布热德主义支持者的教育水平比其他任何非共产党人政党都低。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关于 1956 年支持布热德的那些人在 1958 年如何投票的可靠资料。波尔多大学的乔治·迪波(Georges Dupeux)作了一次典型对象调查，试图得

到竞选运动期间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次调查没能从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得到回答,不过有少数人承认过去是布热德的支持者,11个这种人中只有两个投了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票。

表 5.4 不同职业类选民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的政党选择*

党 派	职 业					领退休金 和有投资 收入的人
	企业家 行政官员 专业人员	自营职 业者	白领	工人	农民	
共产党	0%	2%	10%	26%	6%	6%
社会党	5	13	16	25	12	22
民主力量联盟(孟德斯)	7	5	9	6	6	4
激进党	2	12	6	5	9	9
RFD(左翼戴高乐主义者)	3	4	1	**	2	**
人民共和运动(自由主义天主教组织)	5	9	9	10	14	13
保卫新共和联盟	40	23	30	17	13	21
基督教民主党(右翼戴高乐主义者)	8	8	6	3	3	9
全国独立农民中心(保守组织)	28	18	11	7	35	15
布热德主义者	2	5	1	**	1	**
民族主义派(法西斯)	0	2	**	**	**	0
(调查人数)	(60)	(129)	(282)	(416)	(317)	(217)

* 这张表和正文中关于 1958 年选举的其他参考数据,均来自法国舆论研究所让·施特策尔(Jean Stoetzel)教授和洛阿·安热尔比(Loais Angelby)慷慨提供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是据 1959 年 2 月 17 日至 26 日进行的一次关于法国选民的全国调查。该所较早的一次调查提供了第五共和国诞生时期法国人民态度的大量资料,载于 *Sondages*, (1958, n. 4), pp. 3—62。

** 小于 1%。

戴高乐主义和布热德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它们支持者的社会态度表明,保守的(右翼)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中间派)集权主义之间的差别,不仅有助于说明纳粹主义的社会根源,而且在解释战后法国的政治时也是有用的。保守阶层和自由主义阶层都掀起过大规模社会运动,批评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度,而且这些运动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但是,一种运动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的,另一种运动在民粹主义意义上是革命的。

意大利

由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最初取得权力的特殊方式，很难用反民主政治的三种类型来分析意大利的政治史。作为一种运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是以新的社会主义党身份出现的；与其他政党相比，它或许更接近后来的庇隆主义传统。但是，在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领导下，这个党利用一切提供给它的机会以争取不同阶层的支持。长期以来，它的意识形态似乎主要是服务于反教权的中产阶级，但在1929年以后，它向罗马教廷作了让步，并在统一后的意大利历史上签订了第一个宗教事务协约。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其掌权的大部分时间，代表着反民主的传统主义与中产阶级民粹派权力主义之间的联盟，其反对目标是城乡居民中的左翼革命部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许多分析家在中产阶级居住区看到了它的社会根源和意识形态号召力。据《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波河流域，主要居住着“小财产所有者和佃农，他们在物质利益乃至智力和道德视野上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甚至连“墨索里尼本人也称”这个地区“是法西斯运动的摇篮”。许多法西斯法规是“为了增加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而制定的”。当墨索里尼“成功地向城乡中产阶级进行鼓动宣传，使他们逐渐靠拢其突击部队的初始内核”时，他丢掉了他开始时旨在吸引多种不同阶层的工团主义纲领。⁵⁵

在战争期间，这个法西斯联盟的两部分势力发生了分裂：比较保守的部分与西方国家媾和，而比较正宗的法西斯部分，在墨索里尼领导下成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党，作为纳粹党的同盟军继续参战。战争结束以来，有两种基本上是反民主、非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一直在意大利政治中起作用。君主主义者代表试图捍卫君权和教权的保守主义势力，而新法西斯派意大利社会运动(MSI)企图继续奉行革命的法西斯传统。虽然君主主义者与意大利社会运动在社会状况、意识形态和纲领上互不相同，但我们在此再次看到了右翼和中间派极端主义的一些变体。这两种极端主义呈现在

意大利公众面前的形象都明显带有墨索里尼经历的色彩,因此,选民也许反感它们的形象甚于反对运动那时的纲领。这一事实使预期可以在这些组织和我们在其他国家所讨论过的那些组织之间的严格类比难于进行。不过,可供利用的有限调查资料表明,意大利这些党派在某些方面的区别,是可以与戴高乐主义者与布热德主义者、德国右派与纳粹党之间的区别相比较的。君主主义者大多是生活比较富裕的,年龄大的,倾向宗教的,以女性占优势;而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支持者中,富裕的较少,比较年轻,以男性为主,不信宗教或反教权。

民意测验资料确定新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最集中的地方在小社区。⁵⁶而且社会生态研究表明,意大利社会运动也像法国的布热德主义一样,在意大利不发达、尚未城市化的地区最强大。⁵⁷意大利政治的美国研究者马维奥·罗西(Mavio Rossi)报道说:“新法西斯运动正在南部落后省份最迅速地蔓延,……[出席党的会议的]大多数新法西斯主义者是十年级学生和30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年老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大部分是上次战争中的退役军人。”⁵⁸然而,有关这个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支持者的阶级成分的证据,与如下综合假设并不一致:新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中间派运动应当主要是自营职业者的运动。第七章表7.2中来自国际舆论研究所1953年调查的资料显示,与这个党在总样本中的得票率(12%)相比,小农场主和手工业者是仅有的给予它超比例支持的职业类(15%)。意大利调查组织DOXA在1956年和1958年进行的另一些近期调查发现,在1956年,自营职业者给予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支持(8%)与体力工人给予的支持(9%)相差不大,而在1958年,这个新法西斯主义政党从自营职业的手工业者那里得到与体力工人相同比例的支持(6%)。⁵⁹

不过,应当指出,大多数意大利选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君主主义支持者比新法西斯主义支持者要富裕得多。例如,国际研究联合会195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君主主义支持者中生活富裕的占12%,而在新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中只占2%。这次调查和其他大多数研究都报道,法西斯的主要势力在中间阶层,基督教民主党、右翼社会党和共和党的主要势力也是如此,而南尼(Nenni)的左翼社会党和共产党则在较穷的阶级中拥有巨大的势力。⁶⁰

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与其他运动的不同,可能反映它作为一种已经掌权后的法西斯运动的特性。选民对墨索里尼执政留给他们记忆的反感可能多于对这个党现行纲领的反感。这个党在自营职业者中支持者较少,或许是因为法西斯统治没有帮助自营职业阶层,但却向大企业家、大地主和教会作出让步。此外,在它执政的最后一年,即1944年到1945年,作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党,它还企图通过工业国有化、建立工人理事会和提出普遍激进的社会主义要求,来赢得意大利北部工人阶级的支持。

美国:麦卡锡主义——人民党极端主义

在美国也存在旨在维护单独经营的小农场主或城市小商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传统,这在历史上曾是民主左翼的一部分。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民党和进步党运动都呈现这种典型形态。在这个工业资本主义上升和托拉斯发展的时期,大部分城乡小资产阶级响应了控制大企业、托拉斯、铁路和银行的呼吁。这些运动带有很强的排犹成分,并普遍化为反对任何移民势力和影响的排外情绪。⁶¹在政治面上,它们强烈怀疑议会制民主或宪法民主,特别敌视政党观念,主张打破党派势力的中心,通过引入公民创制权和复决权以及顺利罢免当选者来建立尽可能直接的民主制。政党、政客、大企业家、银行家和外国人都是坏的,只有代表他们自己的人好的。

随着大工业和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人民党运动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直接政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20年代的三K党是地方上人民党运动号召农场主和城乡小工商业者反对大城市控制的后期表现。30年代十足的法西斯运动,试图通过直接唤起农场主和小商人的经济要求,攻击民主制度,以及把社会经济困难归罪于国际金融家和犹太人来争取力量。⁶²

关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各种极端主义人民党运动,其实际力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有些研究者估计支持者可达几百万。无论这些运

动的力量如何,它们都没能使人民党赢得党派斗争的胜利或成为第三大党。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新人民党极端主义者、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和参议员休伊·朗(Huey Long),或许是说明人民党延续性的一个清楚例子。在南方,他短时间登上国家舞台,抨击“极端保守主义者”(Bourbons)*和“不到场而获利之公司的利益”,主张通过加重税收打击巨额财产拥有者,维护中产阶级利益,把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我们再也不能知道他如何成功地登上国家舞台,因为刺客的子弹在1935年夺去了他的生命。不过,他表现出的与30年代人民党运动的牢固联系,不仅可以从考察他的思想清楚看出,而且还出于如下事实:他在20年代和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选举中的得票与1896年人民党的得票有很高的相关性。⁶³虽然登上国家舞台的朗的意识形态是否意味着独裁不得而知,但这种意识形态在路易斯安那州掌权却意味着给予反对派的自由和出版自由严重的打击,意味着对司法和宪法程序的轻蔑。

美国人民党极端主义的一种新表现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没有党,甚至没有组织,但他驰骋美国政坛的几年,谴责左翼势力——新政派民主党——是卖国贼或卖国贼的帮凶,同时坚称大量的卖国贼是由人民党主义的传统敌人东部上层阶级豢养的。⁶⁴

民意测验资料可以证实,麦卡锡与“左翼”人民党主义诉诸的是相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A. Trow)的一项研究,试图通过把来自新英格兰一个小城市的调查答案分成4种政治类型来确定麦卡锡的社会基础:(1)工人自由主义者——拥护工会、敌视大企业的人;(2)19世纪自由主义者——反对工会、反对大企业的人;(3)温和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工会、拥护大企业的人;(4)右翼保守主义者——敌视工会、拥护大企业的人。按照这个划分,属于(2)类的人,即“19世纪自由主义者”,相当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正如特罗所证明,他们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小工商业者的意识形态。⁶⁵当我们考察这4种政治观各自的支持者怎样对麦卡锡作出反应时,我们发现,不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而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最可能支持麦卡锡,见表5.5。

* Bourbons: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尤指民主党中的极端保守者。——译者注

表 5.5 麦卡锡支持者的政治态度分类*

	支持麦卡锡政策的百分比	(调查人数)
工人自由主义者	37	(191)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	60	(142)
温和的保守主义者	35	(190)
右翼保守主义者	38	(140)

* 据马丁·A. 特罗的计算,见正文注释 65。

麦卡锡在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中得到的支持几乎是其他每种支持的 2 倍。正如特罗所指出,这是美国的一种目前“在政坛上没有制度化地位,在大政党中没有代表或领导权的政治传统,它寻求通过麦卡锡得到发言权和地位。而麦卡锡为这种传统的拥有者,表达了他们对大型化,对出自城市的狡猾和起破坏作用的观念,以及对侵蚀老方式和老信念的大组织机构的恐惧和怀疑”⁶⁶。像布热德主义一样,麦卡锡主义和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基本上都是小工商业者的意识形态表现。尽管小工商业者只占特罗抽样人数的 1/5,但“他们之中却有 1/3 的 19 世纪自由主义者”。19 世纪自由主义者中的小工商业者比其他职业的自由主义者更可能成为麦卡锡分子。正像在布热德主义的情况中所看到的,麦卡锡支持者的最高比例也“见于受教育少的、持 19 世纪自由主义态度的小工商业者:这种人每 4 个几乎有 3 个是麦卡锡支持者”。但是,当麦卡锡正在吸引他背后的美国人民党主义的传统支持者时,既存秩序的主要捍卫者最终联合起来击败了他。如我在别处曾试图说明的,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大企业阻止了麦卡锡。⁶⁷

把麦卡锡主义和布热德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放在同一节讨论,我并不打算指出,这些运动如果其领导人取得政权就会导致专制统治。我要指出的是,像其他运动一样,这些吸引城乡自营职业中产阶级的运动,也主要是起因于那些脱离现代社会主流的人的一种不可解脱的挫折感。这 5 个全国性的运动,不仅都得到小自营职业者超比例的支持,而且在每个国家,它们从住在农村或外地小城镇的那些人得到的支持远多于其他人。他们是住在没落地区的没落的“自由主义”阶级。这些地区的小资产阶级不仅因为他们的阶级的相对没落而受到剥夺,而且他们作为公民所生活的社区,其在更大社会中的地位和

影响也正在迅速走向没落。按照特定历史因素的不同,他们的不满常常导致他们接受各种非理性的反抗性的意识形态——地方主义、种族主义、超国家主义、反世界主义、麦卡锡主义、法西斯主义。

庇隆主义——下层阶级的“法西斯主义”

常常被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的第三种类型是庇隆主义,这个运动和意识形态是围绕 1946 年至 1955 年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on)形成的。与社会基础是比较富裕的和传统主义阶层的右翼反民主趋势不同,也与社会基础是自由中产阶级、主要是自营职业者,我宁愿称之为“纯”法西斯主义即中间派集权主义的那些趋势不同,庇隆主义其服务对象偏重于比较穷的阶级,主要是城市工人,也包括比较贫困的农村居民。庇隆主义是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很像墨索里尼所鼓吹的。⁶⁸它也有很强的反议会的人民党色彩,强调党和领导人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认为议会制度导致无能和腐败的政客当政。这种意识形态兼有右翼和中间派集权主义的特征,还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倾向,把国家面临的许多困难归罪于外部势力——国际金融机构等等因素。像其他两种极端主义形态一样,庇隆主义也给军队以崇高地位。

然而,庇隆主义对工人、工会和阶级斗争持积极态度,这是与其他极端主义运动不同的。庇隆是在 1946 年保守党政府被推翻之后一次得到军队和工人阶级支持的革命政变中掌权的。不过,他和他的党在后来公平合理的选举中赢得压倒多数的支持而继续执政。在 1946 年的选举中,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党人 40 年来甚至首次没能当选一名下院议员。据拉美问题专家罗伯特·亚历山大(Robert Alexander)说:“即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激进党和社会党占压倒优势的城市,庇隆主义者得票也占第一位,约得 25 万票,[中产阶级]激进党位居第二,得票 15 万张,社会党第三,不到 10 万张。”⁶⁹

在这些选举中,阶级界线比以前任何选举都明显。下层阶级支持庇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反对庇隆。⁷⁰阿根廷社会学家吉诺·格尔马尼

(Gino Germani)把阿根廷工人阶级接受庇隆的革命呼吁解释为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的一种典型现象,很像第二章所讨论的欧洲模式。⁷¹

在执政期间,庇隆颁布了许多提高工人生活标准、工资、奖金、业余时间和社会保险的法规,还批准了有利于农业工人和佃户与地主斗争的称之为“日工法”的法令。这些法律涉及休息日、住房供给、最低工资、医疗援助和不得无端解雇。他的政府还制订了给农业工人土地的计划。庇隆主义政权的主要组织基础或许是工会,工会完全由他的追随者控制,有很大的规模,起着受国家支持的真正的集体谈判机构的作用。

所有这些措施,听起来像一个十足的激进工人党的纲领。而且它们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特别强调“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合作主义的意识形态,人民党主义的宣传鼓动,以及缺乏对宪法精神和传统的尊重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切使庇隆赢得城乡下层阶级的情热支持和中产阶级、大企业家、地主的强烈反对是毫不奇怪的。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受到他原来所在军官团领导的部队的支持。⁷²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政府是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军官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叛国者”的下层阶级的联盟。这个政权最终是被那些对庇隆的极端主义、缺乏责任感和连续不断与之结盟的阶层进行对抗持有异议的军官和基督教徒推翻的。不过,即使在庇隆流亡期间,他作为一位腐败的政客和利用个人地位谋求不道德目的的人的面目已经暴露,他仍然是阿根廷工人的领袖,庇隆主义领导人仍然在工会中保持强有力地位。

当然,通称为庇隆主义——呼吁下层阶级与军队结盟,反对资本主义,信仰人民党主义,坚持民族主义——的这种现象,并不是阿根廷独有的。在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10年前成功地提出了同样思想,也被认为属于法西斯主义,在他离开政权以后,这种思潮仍然拥有工人的支持。⁷³“瓦加斯主义”像庇隆主义一样,也以旨在维护城市产业工人利益的实践性社会改革纲领为特征。主要反对派是来自“有土地的贵族,即一些依附于巴西旧社会结构的古老家族”⁷⁴。瓦加斯的工党是巴西政治中的主要力量,有时与共产党人结盟;正如已注意到的,共产党人在庇隆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也支持庇隆。⁷⁵如果认为庇隆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变体,那么它是一种左翼法西斯主义,因为其依靠的社会阶层不如此就会转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发泄他们的挫折感。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上述分析,体现了左、中、右的老概念。可是,政治家和学者过去总把这些运动看作代表政治尺度的两个极端,以致他们说共产主义是极左的,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的。然而,如果承认“左”、“中”、“右”适用于意识形态,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其温和主义的和极端主义的变体,即在其态度上,一方主张议会政治,另一方主张超议会政治,那么就可以对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反民主的组织作更有效的分类和分析。此外,还必须认识到,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左的极端主义运动,也可以是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⁷⁶

虽然各种反民主的民众运动都同样值得注意,但我在此试图通过考察不同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来确立三种有启发的不同点。来自许多国家的资料证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产中产阶级的运动,这个阶级很大程度上支持自由主义,而保守阶层反对法西斯主义,可是又在不同时期支持保守的反议会政体。与中间派政体相反,保守政体是不革命的和非极权的。在保守的独裁制度中,不能期望一个人对政权恪尽忠诚,不能指望他参加一个党或其他组织,他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尽管奥地利维护教权的保守主义者的独裁制度被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但它与它的纳粹继任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同样,虽然佛朗哥得到西班牙法西斯政党长枪党的支持,但他的政权是由保守的集权主义者控制的。长枪党从未得到控制社会的允许;大多数组织机构仍然独立于国家政权和长枪党,也不要求反对派与政府或党保持一致或实行联合,只是禁止有组织的反对。

虽然在分析上可以对这些运动加以区分,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中,比如就西班牙民族主义党来说,都有相当大的交叉。一些基本上属于革命性质的运动,如纳粹主义,确实也可以从赞成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保守主义者那里得到某种支持。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由纯粹的机会主义者领导的中间派极端主义和保守派极端主义的联盟。然而,如果根据缺乏运动的外在表现——这其实是运动的某种变种——就断定分

析上的划分只有思辨意义,就会造成误解。近期的政治运动,如布热德主义、麦卡锡主义、戴高乐主义,都显示与它们之社会基础的性质有关联的特定特征。如果我们想维护和扩大议会民主,我们必须了解威胁这种民主的根源,而来自保守派的威胁不同于来自以中产阶级为轴心的威胁,也不同于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

极端主义运动有许多共性。它们对社会各个层次的心怀不满者、无心理归宿者、遭受个人失败者、脱离社会者、经济上无保障者、缺乏教育者、缺乏复杂感者、集权主义信奉者,都有吸引力。正如黑贝勒所指出,支持这种运动的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在自己的事业或职业上不能取得成功的人,以及那些已经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有失去自己社会地位危险的人……因此,1933年以前,在组织的[纳粹]党员群众基本上是本阶级中的不受欢迎者、家庭中的浪子、壮志未酬者……”⁷⁷早在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就把“各国工人政党里都要钻进一些”被描述为“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一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物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获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⁷⁸。往往正是这些来源的人给这些运动以狂热的和极端主义的特征,并构成了信仰者的核心。⁷⁹不过,如同对应的民主运动,不同的极端主义运动的盛衰涨落,也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能赢得和保持它们试图代表和领导的阶层的的支持。如果我们对这些极端主义运动不能像对民主政党和民主运动那样加以区分,找出各自的特殊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要了解它们的作用和演变顺序是不可能的。⁸⁰

在下一节,我们将从反民主趋势支持者的社会特征回到实行有效民主制的条件。第二篇力图确定不同民主国家中持续存在的、与选举斗争不同参与率和参与形式有关的民主模式。

注 释

1. 不考虑法国政治的复杂性,这个国家第一流的选举研究者发现,他们必须按左、右来分类或组织。见 F. Goguel, *Géographie des élections françaises de 1870 à 1951*, *Cahier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No. 27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1)。

2. David J. Saposs,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Social Development: Fascism, Populism, Communism, Socialism,”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Wesley Clair Mit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395, 397, 400. A. 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根据法国部分地区 1871 年至 1912 年选举模式之详细环境所作的一次更早分析表明,被认为是法国民主思想阶级根源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成为极端主义运动恢复活力的主要基础。他指出,虽然小资产阶级“本性上是平等的、民主的和妒忌的……但他们尤其担心新经济条件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使他们受到大公司侵略性资本势力和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的攻击。他们寄厚望于共和国,不断成为共和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不过,他们处在不满的状态中,布朗热主义由此积聚了力量,反对的煽动者由此看到他们挑起事端的最好土壤,同时也在这种不满中出现了某些民主改革的情绪化阻力。” André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13)p. 413.

3. Harold 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4(1933), p. 374.

4. 另见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4)。

5. Talcott Parsons,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Fascist Movement,” in hi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p. 133—134. 马克思本人曾指出:“小制造商、小商人、手工业工人、农民,都反对大资本家,为了保护他们作为中产阶级的地位免遭破坏。不过,他们是不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寻求颠倒历史发展路线的道路。”引自 S. S. Nilson, “Wahlsoziologische Problem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10(1954), p. 295.

6. Martin A. Trow, “Small Businessmen, Political Tolerance, and Support for McCarth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1958), pp. 279—280.

7. 关于拉丁美洲迅速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政治作用的分析,见 John J. Johnson, *Political Change in Latin—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Sect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关于一个社会群体在工业化各个相继阶段上的不同政治倾向,詹姆斯·布里斯(James Bryce)在 1912 年的一篇评论中已经指出:“小土地所有者阶级是美国和瑞士最可靠、最稳定的社会成分,这个阶级如果没有经过政治上的锻炼,在德国部分地区和法国也同样是稳定的。缺少这个阶级是南美和中美最大不幸。”这在工业化早期大农业组织出现以前可能是事实,因为正如这里所讨论的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料所显示,这种农业组织意味着对小农场主的经济竞争,使他们加入法西斯主义潜在支持者的行列。见 James Bryce, *South America: Observations and Impress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p. 533。

8. 欧洲的中产阶级和阿根廷的工人阶级,是各自所处环境中最“不满”的阶级。关于两者的比较见 Gino Germani, *Integration politica de las mass y la totalitarismo* (Buenos Aires: Colegio Libre de Estudios Superiores, 1956)。另见 *Estructura social de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Raigal, 1955)。

9. 见 Chapter 4, pp. 108—114。

10. Karl D. Bracher,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und Düsseldorf: Ring Verlag, 1954), p. 94. 这个党的议会代表几乎全是在小工商业利益联合团体中活跃的工商业者。见 Sigmund Neumann, “Germany: Changing Patterns and Lasting Problems,” in S. Neumann, ed.,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364。

11. Rudolf Heberle, *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5)。

12. 关于按性别表达德国各次选举中各政党得票数的最全面资料可以见 Maurice Duverger, *La participation des femmes à la vie politique* (Paris: UNESCO, 1955), pp. 56—63; 以及 Gabriele Bremme, *Die politische Rolle der Frau i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56), pp. 74—77, 111, 243—252; 另见 Heinrich Striefler, *Deutsche Wahlen in Bildern und Zahlen* (Düsseldorf: Wilhelm Hagemann, 1946), pp. 20—22; Güther Franz, *Die politischen Wahlen in Niedersachsen 1847 bis 1949* (Bremen-Horn: Walter Dorn Verlag, 1957), pp. 28—32; Karl D. Bracher, *op. cit.*, p. 476; Herbert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London: P. S. King & Son, 1937), pp. 37—65。

13. Rudolf Heberle, *op. cit.*, pp. 113, 114, 119. (emphasis supplied)。

14. Günther Franz, *op. cit.*, p. 62。

15. 在 6 个东部边境选区,纳粹党得票数高,保守党失票数多,可以解释两者得票数之间存在微弱正相关关系。不考虑这 6 个选区,实际上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16.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区域主义的国家党 (*Landespartei*) 1919 年和 1921 年在自由民主党得票最多的选区同样是强大的。这些选区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党最有力量的地方。见 R. Heberle, *op. cit.*, pp. 98—100。在下萨克森,选举研究同样表明,1932 年以前这个州的主要政党韦尔芬 (*Welfen*)——汉诺威区域主义政党——的支持者转向了纳粹党。那些“韦尔芬得票最多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农村的选举区,后来成了纳粹主义最早、最强的中心。”见 G. Franz, *op. cit.*, pp. 53—54, 另见 p. 62。在巴伐利亚,一个多少可作比较的政党巴伐利亚州农民和中产阶级联盟 (*Bayerischer Bauern und Mittelstandsbund*), 其得票率从 1928 年占 11.1% 下降到 1932 年占 3.3%。巴伐利亚选举情况研究表明,像其他区域主义政党一样,巴伐利亚州农民和中产阶级联盟的选票也是转向了纳粹党。见 Meinrad Hagman, *Der Weng ins Verhängnis, Reichstagswahlergebnisse 1919*

bis 1933 besonders aus Bayern (München: Michael Beckstein Verlag, 1946), pp. 27—28. 要求促进农民利益的区域主义运动为纳粹党在黑森州取得选举胜利开辟了道路,对此作分析的是 Eugen Schmahl, *Entwicklung der Völkischen Bewegung* (Giessen: Emil Roth Verlag, 1933)。这本书中有一篇分析 1930 年至 1932 年选举情况变化的附录,作者是纳粹党人威廉·塞佩尔(Wilhelm Seipel),“Entwick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auernbewegung in Hessen,” pp. 135—167。在 1931 年地方议会选举中,黑森州的代表从 14% 下降到 3%,此后不久,这个组织推动了作为一个政党的资格,这与那位纳粹党人的分析是一致的。*Ibid.*, pp. 163—165。

17. 引自 R. Heberle, *op. cit.*, p. 47。黑森州社民团体表达了类似观点。*Ibid.*, p. 52。

18. F. A. Hermens, *Demokratie und Wahlrecht* (Paderborn: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1933), pp. 125—126; 以及 Günther Franz, *op. cit.*, p. 53。

19. R. Heberle, *op. cit.*, p. 49。

20. Samuel A. Pratt, *op. cit.*, pp. 63, 261—266。黑贝勒(Heberle)还报道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范围内,“分析社区选举统计表显示,在社区大小与国社党(NSDAP)得票百分数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负相关关系。”R. Heberle, *op. cit.*, p. 89。布拉赫尔(Bracher)把德国 35 个大选区分为纳粹党得票高的和低的两类,他发现,这个党得票高的选区比得票低的选区更多是乡村。这与普拉特(Pratt)的结论是一致的。见 Karl A. Bracher, *op. cit.*, pp. 647—648。

21. 所有研究都一致认为,宗教对纳粹党支持力量的影响大于其他任何因素。纳粹党在天主教地区和城市力量小,而在工业资本主义抗议势力大的许多小社区,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22. Charles P. Loomis and J. Allen Beegle, “The Spread of German Nazism in Rural Area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1946), p. 729, 730。实际上德国——无论是魏玛共和国,还是波恩共和国——的所有选举资料中,天主教因素始终是超越阶级或其他信仰作为控制政党支持者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巴伐利亚和其他天主教地区,纳粹的最大支持是来自抗议者的飞地。作环境分析这一事实并不认为宗教因素在这种地区不起作用。

23. R. Heberle, *op. cit.*, p. 112。弗兰兹(Franz)也写道:“支持国社党的是城市中有产的中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农场主。”Günther Franz, *op. cit.*, p. 62。

24. 见 Samuel A. Pratt, *op. cit.*, p. 148。

25. 1933 年德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普拉特(Pratt)所用“上层中产阶级”类的 90% 以上属于“有产者”,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受雇的群体。

26. Samuel A. Pratt, *op. cit.*, p. 171。

27. R. Palme Dutt, *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p. 80。

28. 见 F. Thyssen, *I Paid Hitler*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41), p. 102; Walter Gorlitz and Herbert Quint, *Hitl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Steingrubben Verlag, 1952), pp. 284, 286; Edward Norman Peterson, *Hjalmar Schacht for and against Hitler* (Boston: The Christopher Publishing House, 1954), pp. 112—117; 关于一般的讨论和文献资料, 另见 August Heinrichsbaur, *Schwerindustrie und Politik* (Essen: Verlag Glückauf, 1948); Arild Halland, *Nazismen i Tyskland* (Bergen: John Grieges Forlag, 1955); 以及 Louis P. Lochner, *Tycoons and Tyrants, German Industry from Hitler to Adenauer*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54)。

29. 对 1930 年社会民主党选票来源的一项分析估计, 该党支持者中有 40% 不是体力工人, 而那年实际投该党票的有 25% 的白领工人, 33% 的下层公务员, 25% 的手艺店和零售店自营职业者。不过, 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是受雇的熟练体力工人, 而支持纳粹党的核心是城乡的小企业主。见 Hans Neisser, “Sozialstatistischen Analyse des Wahlergebnisses,” *Die Arbeit*, 10(1930), pp. 657—658。

30. 普拉特认为, 城市中白领失业者与纳粹党支持者之间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见 S. Pratt, *op. cit.*, Chap. 8。

31. 关于这个观点的一种早期评述见 Theodore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Enke Verlag, 1932), p. 112; Heinrich Striefler, *op. cit.*, pp. 23—28; Reinhard Bendix,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p. 605; Günther Franz, *op. cit.*, pp. 61—62。

32. Reinhard Bendix, *op. cit.*, p. 605. 本迪克斯(Bendix)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见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Western Societies: Some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5(1959), pp. 1—15。

33. 这些结果得到卢米斯(Loomis)和比格尔(Beegle)的分析的支持。他们报道说, 1932 年在巴伐利亚农村地区的 59 个小选区, 不投票者的比例与纳粹党得票百分率之间有 0.43 的相关系数。这种相关性也对纳粹党主要对不投票者有吸引力的论点提出挑战。见 Charles P. Loomis and J. Allen Beegle, *op. cit.*, p. 733。这项研究和詹姆斯·K. 波洛克(James K. Pollock)的更早一项研究被这个领域大多数文献忽略了。波洛克曾指出: “在研究德国选举行为的另一方面时, 我们发现在这些选举(1930 年至 1933 年)的投票多少与政治决定的性质之间几乎毫无关系……在德国处于危机的这些年中, 许多城市工业区比农业区显示了更大的选举兴趣。当时, 大城市由此而多投的选票通常是反希特勒的, 相反农业区照例表现了对希特勒的强烈兴趣。” James K. Pollock, “An Areal Study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 1930—193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1944), pp. 93—94。

34. 见 pp. 102—114。

35. Walter B. Simon, *The Political Parties of Australia*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 Microfilm 52—2894 University Microfilm, Ann Arbor, Michigan), pp. 28, 71。

36. *Ibid.*, pp.322—323. 西蒙(Simon)对选票来源和向纳粹党转移的讨论,是以详尽细致地研究选举统计资料为依据的。

37. 虽然排犹主义是1918年以前泛德意志主义运动的部分特征,但支持者在1931年到1932年期间转向纳粹党,1933年与奥地利纳粹党联合的大德意志人民党,在宗教问题上仍是自由主义的。在20世纪20年代里,这个党充满了“对犹太人的过度的同情”,它的竞选纲领在1930年得到新自由出版社——“自由主义犹太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喉舌”——的强有力支持。Walter Simon, *op. cit.*, p.328.

38. 关于导致奥地利共和国崩溃的那些政治事件的精彩叙述,见 Charles A. Gulick, *Austria from Hapsburg to Hitl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39. *Sondages*, February 16, 1948, p.47.

40. Jean Stoetzel, “Voting Behavior in Fra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955), p.105.

41. 这些资料是英文报道,见 J. Stoetzel, *op. cit.*, pp.116—119;以及 Philip Williams, *Politics in Post-War Franc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4), p.446。

42. *Sondages*, 14(1952, No.3)。其中载有一份各主要政党支持的社会特征和意见的详细报告。正文中上两段有关资料取自这份报告。关于同次调查的最后一份报告,见 Philip Williams, *Politics in Post-War Franc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58, 2d ed.), p.452—454。

43. 见 Georges Lavau, “Les Classes Moyennes et la politique,” in Maurice Duverger, ed., *Partis politiques et classes sociales en Franc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5), pp.60, 76。

44. 见 Jean Meynaud, “Un essai d’interpretation du mouvement Poujade,” *Revue de l’institute de sociologie* (1956, No.1), p.27,其中讨论了布热德主义中共和论者的民粹派象征;关于布热德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证明资料可见这篇文章的其他章节,pp.5—38。S. Hoffman, *Le mouvement Poujad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6); M. Buvenger, *et. al.*, eds., *les elections du 2 janvier 1956*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7),特别见 pp.61—64。

45. 布热德(Poujade)甚至公开资助圣纳洋尔的大罢工。见 J. Meynaud, *op. cit.*, p.26。

46. Peter Campbell, “Le Mouvement Poujade,” *Parliamentary Affairs*, 10 (1957), pp.363—365。

47. 见 S. Hoffman, *op. cit.*, pp.190 ff.,其中讨论了解释布热德主义派发展而提出的各种假说。

48. *Ibid.*, p.193;关于布热德主义支持者社会生态根源的详细分析,见 François Goguel, “Géographie des elections du 2 janvier,” in M. Duverger, *et*

al., eds., *op. cit.*, 特别见 pp. 477—482。

49. 这与第七章表 7.1 中报道的是同一次调查。表中数据是根据该研究所艾兰·吉拉德(Alain Girard)慷慨提供的 IBM 资料卡计算的。

50. 吉恩·斯托佐尔(Jean Stoetzel)和皮尔·哈斯纳(Pierre Hassner)指出,布热德主义者的成功意味着“迄今很少代表的职业有一大群代表进入国民议会。在《世界报》刊登的 52 名布热德主义者当选为下院议员的名单中,有 26 名是代表商业职业的(10 名食品商、10 名各式各样的零售商和 6 名批发商);另 26 名包括手艺人、中小企业主,外加 1 名学校校长和 2 名“大学生”。由此看来,布热德主义的正式代表,像它的社会基础一样,也是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见 Stoetzel and Hassner, “Resultats d’un sondage dans le premier secteur de la Seine,” in M. Duverger, *rt al.*, eds., *op. cit.*, p. 190。

51. 这些资料是引自一些已经发表过的数据,见 Jean Stoetzel and Pierre Hassner, *op. cit.*, 特别见 pp. 236—242。收入该书的这篇文章介绍了巴黎的选举,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以及人数特别众多的中产阶级,包括自营职业的和拿薪金的。该书另一些文章分析了其他地区的选举结果,并指出,布热德得到商人、手艺人 and 某些选区农民的支持。特别见 pp. 316, 322—352, 369—395。

52. 当然,戴高乐主义也得到布热德难以涉足的阶层的重要支持,特别是大工业的官僚人员、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白领工人。“在布热德主义取得某种成功的、经济进步很小的地区[如伊泽尔省(Isere)],详细研究显示,这种成功主要是在大行政区中的一些落后的小行政区中取得的。”Maurice Duverger, *The French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97。

53. 马里斯·杜弗格(Maurice Duverger)指出,激进党的传统支持者“和今天布热德的支持者几乎出自同一社会群体,即小店主和手艺人”。*Ibid.*, p. 98。

54. 多种资料显示,与独立农民中心、人民共和运动和戴高乐主义派比起来,布热德主义派中的男性是超比例的。关于来自实际选举报告的资料见 Claude Lelau, “La géographie des parties dans l’Isere,” in M. Duverger, *et. al.*, eds., *op. cit.*, p. 394; 另见 Jean Stoetzel and Pierre Hassner, *op. cit.*, p. 236; 见 *Sondages*, December 1, 1948, p. 223, January 16, 1949, pp. 16—18 and August 1949, p. 126, and 1952, n. 3, p. 24, 其中刊有戴高乐主义支持者的性别构成资料。

55. 见 Erwin von Beckerath, “Fascism,”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VI (New York: Macmillan, 1937), p. 135。

56. 见世界民意测验(the World Poll)汇编中的资料。另见 P. L. Fegiz, *Il Volto Sconosciuto dell’Italia* (Malino: Dott. A. Giuffrè), pp. 501—526。

57. Francesco Sompagna and Vittorio de Caprariis, *Gografia dell’elezioni dal 1946 al 1953* (Bologna: Il Mulino, no date), pp. 25, 34。

58. Mavio Rossi, “Neo-Fascism in Ital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19 (1953), pp. 506—507。法国社会学家马蒂·多甘(Mattei Dogan)对 1946 年以来

的意大利选举作了详细的社会生态研究,遗憾的是,他把君主主义者和新法西斯主义者作为一类来处理。他认为他们在意大利南部最有力量,而且其力量随着社区的增大而增大,在南部城市如那不勒斯和巴里尤其强大,不过在罗马和的里雅斯特也很有力量。对于罗马的“右翼”势力,他是以“怀念法西斯统治”的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解释的,而对于里雅斯特的“右翼”势力,他的解释是,那里的“民族主义因与南斯拉夫的冲突而高涨”。“Le Comportement politique des Italiens,”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9(1959), pp. 398—402。

59. 这些统计数字是经二次分析得出的,DOXA 主任 P. 卢泽托·费吉兹(P. Luzzatto Fegiz)博士慷慨提供了有关研究的 IBM 数据卡。

60. 统计数字据 1957 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没有出版。3 个不同的研究机构总共在意大利作了 6 次不同的调查,这里已对这些调查作了考察或者再分析。鉴于我们感兴趣的是受到 5% 以下选民支持的政党,所以一次抽样调查与另一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有相当大变化是很自然的。正文援引的结论代表根据各次调查中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各种支持来源所能作出的最好估计。

61. 见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其中详细说明了这几个论点。

62. 见 Victor C. Ferkiss, “Populist Influence in American Fascism,”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0(1957), pp. 350—373。

63. Perry H. Howard, *Political Tendencies in Louisiana, 1812—195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28。

64. 关于麦卡锡思想体系中两个孪生成分的分析,见 Daniel Bell, ed., *The New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6)。

65. 见 Martin A. Trow, *op. cit.*, pp. 277—278。

66. *Ibid.*, p. 276。不过,有一项基于全国抽样的非综合性研究也报道,小工商业者比其他任何职业阶层更可能成为麦卡锡主义者。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MaCarthyism and the Conservative*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4)。

67. S. M. Lipset, “The Sources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Daniel Bell, ed., *op. cit.*, pp. 216—217, 232—233。

68. 应当指出,庇隆(Peron)有时承认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称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69. Robert J. Alexander, *The Peron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51。

70. 庇隆主义对工人阶级继续有吸引力有下述事实为证:在 1957 年选举中,有 1/4 选民投了所谓“白”票的空票以表示对庇隆主义政党的支持,而当时庇隆主义政党未被允许参加选举。吉诺·杰默尼(Gino Germani)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投“白”票的选民是工人。关于不同政党在各次选举中得到的支持与不同职业类之关系的详细分析,见 G. Germani, *Estructura social de la Argentina*, *op.*

cit., Chap. XVI.

71. 见 pp. 53—57.

72. 不过,甚至在军事部门也表明,庇隆政权依靠应征入伍者甚于依靠军官团。“在军官与应征入伍者之间存在裂缝,庇隆使这种裂缝进一步加宽,他更成功地使后者庇隆化,而对前者相对较差。1951年的流产政变可资证明,这次政变主要是由某些军官团成员策划的,而挫败这次政变部分是靠应征入伍者对庇隆的忠诚。”Arthur P. Whitaker, *Argentina Upheaval*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6), p. 67.

73. “在瓦加斯(Vargas)所作的所有决策中,可能没有一项比他决定把工人团体引进政治领域更具政治意义……到1938年……由于工人的支持,瓦加斯在新法西斯主义体制下巩固他的专政时,开始看到工人的政治潜力。通过精心设计的福利计划以及对企业管理施加限制和规定责任,他保持了工人的支持。”John J. Johnson, *op. cit.*, pp. 167—168.

74. Jacques Lambert, *Le Brésil: Structure sociale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3). pp. 146—147.

75. 莱斯利·李普森(Leslie Lipson)把瓦加斯战后创造的巴西工党描述为“民族主义的,支持产业主义的,同情城市工人的。”见他的“Governments in Contemporary Brazil,”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2 (1956), pp. 192—193;另见 Theodore Wyckoff, “Brazilian Political Parties,”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56(1957), pp. 281—298,其中讨论了巴西的主要政党及其社会基础。最近一篇分析工人阶级支持巴西工党和共产党的社会生态研究文章是 A. Simao, “O voto operario em São Paulo,” *Recista brasilieras estudos politicos*, 1(1956), pp. 130—141.

76. 有些人感到接受下述说法是困难的:一方面,运动的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和方法类似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另一方面,运动的领导人和运动本身又不可能属于右翼。例如,写于庇隆巩固其政权以前的一本书指出,庇隆代表控制保守党、在阿根廷历史大部分时间统治这个国家的大庄园主(*estancieros*)的利益。见 Felix J. Weil, *Argentine Riddle* (New York: John Day, 1944)。甚至《时代》杂志在1951年也写道:“尽管这对任何人都不是新闻,但‘庇隆本质上是效仿典型的纳粹—法西斯的模式治理一个国家’。”*Time*, May 21, 1951, p. 43,引自 George I. Blankstein, *Peron's Argent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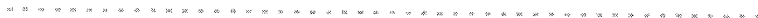
77. R. Heberle, *op. cit.*, p. 10.

78. Friedrich Engels,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K. Marx and F. Engels, *On Relig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p. 319.

79. 见 G. Almond, *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Chaps. 9 and 10, 特别见 pp. 258—261.

80. 在强调与不同社会组合有关的极端主义政治形态的一致性时,我并不打算断言这种发现可以作出高精度的政治预测。正如雷恩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所指出:“问题不在于工业相对发达国家的某些类型的农民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们在严重苦闷的条件下有某种激进化的倾向。至于这种激进化什么时候发生和向什么方向转化,社会层次化分析家并不处在作出预测的地位。他的知识确实使他有可能对这种发展的有关机会作出估计,然而仅仅是在某些农民比其他类型农民更可能受影响的意义上指出其可能性。显然,当地条件、历史前提、危机尖锐性和组织驱动强度都对极权主义运动起作用,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对这些因素作出判断。”R. Bendix, *op. cit.*, p. 602.

第二篇



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

第六章

选举：谁投票，谁不投票？

组织成员或社会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对于一般人员发挥对组织或政府政策的影响，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一方面，成员可以显示对组织或社会的低水平政治参与，但却因为他们能收回或给予对竞争权力的这个或那个不同的官僚机构的选举支持而影响政策。另一方面，成员或公民可以定期参加会议，大部分人加入各种政治组织，甚至参与投票的比率很高，但却对政策没有或几乎没有影响。

后者是极权国家和某些一党控制的工会中的情况。极权主义领袖希望他的追随者出席会议，阅读政治宣传品、收听广播以及参加其他类似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使他的观点能为他们所接受和向他们进行思想灌输的手段。如果成员或公民“在政治上”不积极，他们就会脱离统治势力圈的影响。某些极权国家开展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其明确目的是增强公民吸收指定的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同样，某些工会，特别是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也作了艰苦的努力，包括强迫参加会议，以增加其成员的参与。十分明显，共产党的劳工领导人并不急于鼓励和深化工会中的内部民主，但却明白通过增加使其成员参加严加控制的活动，就会增加他们自己影响其成员和进行思想灌输的机会。

作为一个一般性假说，我认为，一个统治集团企图引进的社会或组织的结构变革越大，领导层就越可能渴望、甚至需要其公民或成员的高水平参与。而伴随社会革命的激进变革（或在较小的规模上，工会转变成政治工具），却给群体忠诚带来了严重威胁，同时也造成普通成员强烈敌视领导人的潜在可能。在领导层意图明确的情况下，对一般成员的参与实行

高水平的控制和管理,或许是排除或转移因传统模式和传统关系出现剧变或突变而产生不满情绪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尽管如此,但就民主而言,即对于保持一个有效的反对派来说,导致一个组织之成员进行高度参与的条件,通常比很少有人对政治过程有兴趣或参与政治过程的条件有更大的潜力。这时,与当权者相比,反对派面临着同不感兴趣的消极公民进行沟通的问题,处于更不利的条件之下。¹换一种方式说,大部分居民置身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比大多数公民定期参加活动,在影响自己生活的决定中得到某种参与感的社会,更具有潜在的爆炸性。

政治参与包括国家事务的领导、地方领导、作为一个组织成员的活动以及在伙伴当中的非正式“意见领袖”。不过,本章主要涉及的是投票和弃权,尽管投票行为通常只是关注政治过程——阅读、交谈和思考——的最后阶段。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致力于讨论与左或右的(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投票行为有确定关系的群体成员和群体经验。²

在美国的全国性选举中,现在可能参加投票的百分比远低于1896年,那时合格选民中有80%参加了投票。1920年投票率下降到最低点,仅有49%,在最近的历次选举中,这个比率徘徊在60%上下。正如政治学家小V.O.基(V.O. Key, Jr)所指出,这个数字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如英国、荷兰和挪威的参与低相当多。³

这种缺乏参与的情况反映了什么呢?有些自由派夸夸其谈者认为,是出于病态的冷漠和民主的弱化。虽然冷漠和弃权的种类和原因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居民的不同部分有所不同,但弃权现象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制度稳定性的反映,主要社会冲突减少和交叉压力特别是影响工人阶级的交叉压力增加的反映。不过,弃权有不同原因,对民主国家有不同的后果,也是很显然的。

解释对政治的反应是个复杂问题。一位特别关心和熟谙政治问题的饱学练达之士在给一家报纸的信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最好是忘掉新闻,否则,理性品格所无法解脱的日常焦虑将驱迫我们更加神魂颠倒……在这个时代,保持某种程度的理性难道是比较忘掉我们的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所报道的现实事件更好的处世之道吗?”⁴显然,这位接近政治的写信人自觉退出了,疏远了,是基于无效感。这种无效感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客观现实,以致不能被政治责任感的召唤所驱除,必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

问题。不过，这种态度远不同于从来没有涉足政治生活领域的人的态度。

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就“逃避政治”的程度指出，如果“我们只把投票率和通过民意测验得到对政治问题的意见收集率之类的指数作为了解今天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的线索”，我们就会低估这种程度，“因为这些指数虽然反映政治行为，但这种行为可能比以前在更大程度上是无政治意义的行为”。⁵因此，我这里所谈论的政治兴趣的公开量度，即投票率，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兴趣和参与，可能是不精确的，可能完全不能反映政治行为的现状：至少在中产阶级中，政治日益反映的仅仅是群体的一致性。有人或许批评这种专注于投票行为的做法，说它忽略了不同群体政治意图上的某些实际的历史变迁。这可能是一种严肃的批评，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不同群体投票率的差别似乎仍可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政治特征提供有意义的线索，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投票行为的内在含义作任何全面评价。⁶

参与投票的模式在不同国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德国、瑞典、美国、挪威、芬兰和其他许多我们掌握资料的国家。在投票率上，男人比妇女多；受教育多的比受教育少的多；城里人比乡下人多；35岁到55岁年龄段的人比年轻的或年老的多；已婚的比未婚的多；地位高的比地位低的多；参加组织的比没参加组织的多。⁷不过，这些差别在许多国家正在缩小，比如瑞典，特别是在年龄和性别的投票差别上。⁸

作为说明这些差别的特征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当代的德国，那里的定期抽样调查和1953年德国统计局对全体选民进行的一次特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了一致的结果。男性的投票率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农场主和自营职业者中，初选举有90%的人投了票。体力劳动者中的低工资者，投票率为78%。在每个职业类中，工资高的投票较多。此外，如果考虑到工人的技术水平，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投票多。鉴于样本的不寻常规模，这些差别是显著的。⁹下面将根据一些主要社会因素对这些差别加以讨论；这些因素似乎可以对差别作出最好解释，不过此处可以注意到，对低地位组中低投票率的许多解释是与低地位职业所涉及的不同经历相一致的，这些经历前面曾用来解释过集权主义价值观。¹⁰此外，许多独特的因素，除了与其他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的因素一起出现外，很少在分组水平上单独出现，这使分离原因变量的工作难以进行。

德国国家级样本中农业工人小类是居民中最冷漠的部分。在这个小类中,许多因素是与农业工人的情况一起出现的。如果为分析目的单独挑出来,每一个都倾向于降低社会分类群的投票率。这些因素一般包括受教育少、经济上贫困、脱离社会和与雇主有密切的个人接触(特别是在德国,小农场主基本上是农民,没有不在场而获利的大地主)。农业工人几乎接触不到大众传播媒介,很少参加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在1953年,接受调查的农业工人中有48%的人对选举结果“漠不关心”,而城市体力工人不关心选举结果的是28%,小农场主是16%。¹¹因此,农业工人和在家劳动的工人是最可能显示极低投票率的社会群,这已为来自许多国家的可供利用的资料所证实。

表6.1列出了一些导致投票率不同的描述性差别,这是根据大量研究确定的。这些差别的具体解释可以用4个极一般的解释性前提加以概括。对于一个社会群体来说,如果(1)它的利益受政府政策的强烈影响,(2)可以接触到关系到其利益的政治决策的信息,(3)面对着要求它投票的社会压力,(4)不强迫它为不同政党投票,那么,这个群体将显示较高的投票率。上述4个解释性前提在具体社会群体中的进一步细分示于表6.2中。¹²

表 6.1 与投票率有关的社会特征

高投票率	低投票率
高收入	低收入
教育程度高	教育程度低
职业类:	职业类:
工商业者	非熟练工人
白领雇员	仆人
政府雇员	服务性行业工人
生产商业作物的小农场主	农民、仅能维持生存的小农场主
矿工	
白人	黑人
男人	妇女
中年人(35—55岁)	年轻人(35岁以下)
老年人(55岁以上)	
社区中的老居民	社区中的新居民
西欧的工人	美国的工人
危机环境	正常环境
已婚者	单身汉
参加组织者	孤立的个人

表 6.2 影响投票率的社会因素

-
1. 政府政策与个人的关系
 - a. 依赖于政府，因为政府是他的雇主
 - b. 面对需要政府采取行动的经济压力
 - c. 面对政府的经济限制
 - d. 持有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道德价值或宗教价值
 - e. 有关替代政策的有效性
 - f. 总危机环境
 2. 接近信息的可能性
 - a. 政府政策后果的直接可见性
 - b. 有助于一般洞察力的职业培训和经验
 - c. 接触与沟通
 - d. 空闲时间量
 3. 对投票的群体压力
 - a. 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受社会冷落
 - b. 阶级政治组织的力量
 - c. 社会接触范围
 - d. 反对投票的群体原则
 4. 交叉压力
 - a. 冲突的利益
 - b. 冲突的信息
 - c. 冲突的群体压力
-

政府政策对投票的影响

虽然可以说每个人都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某些群体会比另一些群体受的影响更多，而且可以预期这些受影响多的群体比一般公众显示更高的投票率。与政府政策关系最直接的自然是政府雇员，他们的整个经济地位和工作生涯都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来自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之全国性选举和地方性选举的资料显示，政府雇员在各职业类中投票率最高。¹³

群体受到个人所不能对付的经济压力时，如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垄断剥削或经济结构变化，作为一种解决办法，预期也会转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显示高的投票率。为国家和世界市场生产的农场主，如种小麦的农场主，无疑是如此。¹⁴ 这些农场主长期受到周期性产品价格暴跌以及银行、铁路、农产品加工者和商业人之垄断势力的威胁，几乎在每个先进国

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有高度政治性的“抵制势力”。由于组织活动的高出席率和选举的高投票率,他们现在享有政府的价格补贴、收成保险、铁路和金融等管制政策,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矿工是特别容易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经济结构变化打击的工人,与其他工人相比,他们也显示有高的投票率。¹⁵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伴随着低政治参与而出现极端经济要求的情况。例如,玛丽·拉扎斯菲尔德—雅赫达(Marie Lazarsfeld-Jahoda)和汉斯·蔡泽尔(Hans Zeisel)在研究萧条时期奥地利城市失业者时报道:“一种价格极低的工人政治出版物的订阅数下降了约60%,而另一种有相同政治倾向……但娱乐多于政治性的出版物,其订阅数只下降了约27%,尽管它的价格较高。”¹⁶美国社会学家E.怀特·巴基(E. Wight Bakke)在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失业问题时也发现了类似情况。¹⁷仅仅提出有这种极端要求似乎是不够的,关于失业者低投票率的某些原因将在本章后面讨论。

在大多数国家,工商业者都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强烈影响。19世纪是清除旧政府的限制和寻求政府的津贴。20世纪政府又成了对工商业严加限制的根源,以致税收和管制已列入工商业者必须认真对付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之列。几乎每个国家工商业者的投票记录都无疑反映了这些事实。¹⁸

然而,经济利益并不是促使投票的唯一利益。犹太人近年的高投票率被解释为对纳粹主义和政治排犹太主义的反抗。¹⁹而共产主义隐含的反宗教兆头,据说有动员天主教选民的作用。每当生育控制合法化或政府资助宗教学校之类特别关系到天主教价值的问题在选举中提出时,天主教徒的投票率也会增加。

禁酒和禁赌一类道德问题在美国和欧洲似乎都有增加妇女投票率的作用。²⁰消除腐败与共产主义威胁问题在1952年美国选举中占有突出地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前所未有数量的女性选民去投票——估计投票率为55%,而前一次高峰是1940年,为49%。²¹

建议政府采取新的行动计划似乎也可以提高受影响群体的投票率。虽然这方面未必有准确的统计资料,但搞清楚提出事关老年人利益或退伍军人利益的建议是否可以增加他们的投票率,是令人感兴趣的。20世纪30年代新政派提出联邦工人救济计划时,低收入的人的投票率同时出

现了相当大增加，他们可能第一次真正看到自己与国家政治休戚相关。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代表工人利益的新政党和新纲领，是与工人阶级投票率的增加一起出现的。美国工人的低投票率，特别是在1920年到1932年，据认为是因为这个时期缺乏使政党分野的公开阶级争端。甚至在新政派复活了这种争端以后，据报道仍有一半以上选民说两党之间“不存在分歧”，或者不能说出分歧是什么。²²虽然美国工人占压倒多数的是民主党员，但该党对意识形态和阶级组织很少强调并没有激发起工人当中的政治兴趣；这与欧洲的“工人”政党不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统制的政党。²³

当国家面临危机——社会、经济或政治系统的大变化，或国际地位的大变化——时，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会对政治表现出更大兴趣。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²⁴曾用大量资料论证“危机选举”对法国1876年到1906年期间投票率的影响。在这期间，那些以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为关键争论的选举中，投票率都很高，但从1881年到1898年，这个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中止，投票率随之降低。而天主教会地位的危机在1902年到1906年又导致新的投票高潮。美国的研究表明，1896年和1936年的经济危机情况，以及1916年、1940年和1952年的国际危机，都同样导致异常的高投票率。²⁵在德国和奥地利，平常已很高的投票率在1932年到1933年民主制度崩溃前的最后选举中达到了最高峰。²⁶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伯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指出，在政治危机与政治兴趣之间存在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关系。他从观察战争期间自杀率大为下降入手作出推论，危机期间，人们在社会群体中感到比较平等，所以法国的政治危机也应导致自杀率降低。哈尔伯瓦克斯在研究1827年至1927年100年间自杀率的变化时发现，自杀率的确在一些主要的政治冲突事件中下降了，如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1851年拿破仑三世的政变，1889年到1890年的布朗热危机，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从1899年到1905年在全国引起的激烈论争。²⁷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危机对自杀率的影响应当随法国不同地区(省)卷入政治的程度而变化。如所预期，政治危机期间巴黎的自杀率下降最多，其他大都市的中心下降稍少，边远省区下降最少。看一看革命传统不如法国人的其他国家人民，是否也以他们的群体凝聚力受到影响的强度对政治冲突作出反应将是令人感兴

趣的。我猜想,哈尔伯瓦克斯的调查结果仅仅是再次证实政治冲突给法国人带来的苦难;这在第三章作过简略讨论。不过,不考虑他的调查结果就法国的情况而言告诉了我们什么,也可以清楚地表明,危机提高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和参与。

接近信息对投票的影响

重大社会问题虽然能导致选举参与的增加,但决非总是如此。那些经济上有最严重困难的人,如贫穷的工人、失业者和农民,常常显示最低的投票率。这或许是因为穷困的群体不能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所致,但有许多通过投票大大改善一个群体利益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投票率仍然很低。

对社会感觉迟钝和缺乏沟通,可以为此提供部分解释。两个群体与政府政策可以有相同的利害关系,但一个群体却可以比另一群体较易于接近这种利害关系的信息。举例来说,政府政策对政府雇员的影响,不仅客观上大,而且颇为明显,这就像有利于农民而对工商业者加以控制和征税的农业政策一样。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如关税、控制、反垄断、税收、津贴等)总起来对工人或白领雇员的影响可能是极大的,但却是隐蔽的、间接的。有些政策需要专门的职业培训来跟踪它们的影响,这往往会影响立法者对政策的选择。例如,在营业地点征收营业税是一种常规,但在制造商方面收的税是消费者看不到的(这个原则是苏联的税收政策制定者所熟知的)。工人和其他低收入者的低投票率或许也反映关键性经济关系比较间接而又不可见。²⁸

在经济关系不容易为受影响的人看到的场合,一般的理解力和复杂感有重要意义。理解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可以得自教育,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受教育多的群体的投票率。²⁹但理解力似乎更依赖于从工作中得到的社会经验。上层职业群体不仅有较好的教育,而且他们的工作可以使他们的智力不断发展,至少是沿着某些实际方向。大多数行政官员和企业主,以及许多专业部门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与复杂的法律、经济和技术

问题打交道，从而增进了他们对复杂的社会政治机器运行的理解。而日常的办事员工作和体力劳动则很少有机会获得这种理解力。家庭主妇在这方面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一事实或许有助于解释普通妇女的较低投票率。

在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经历中，职业活动与政治技巧的关系向来表现得很明显。许多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运动从法律、新闻、教育、牧师等职业中得到领导人，因为这些职业必须进行公开演说、写作和组织管理。³⁰而来自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一般只会按工会办公室——这是可供一位工人学习政治技巧的一个位置——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务。有资料指出，英国工会和宪章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工人，他们都最初在新教教堂学习过作为非专业牧师和主日学校教师的“政治技巧”。³¹在许多国家，印刷工人——体力工人中第一批识字的——都出过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先驱组织者；这是职业活动对智力和组织能力影响的另一种表现。³²

正是诸如此类的考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主张，个人活动的更加多样化——其实是完全“废除”劳动分工——是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无政府社会的必要条件。美国的劳资合作鼓吹者、社会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以非乌托邦的形式提出过差不多一样的看法，他想把工人在工业企业中的作用范围扩大到包括“工厂社区”各种福利活动的管理，以致工人能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获得“政治”才干。³³

社会条件有助于增进政治意识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与其他或多或少有相同问题的人的接触。这是支持马克思如下论点的逻辑前提：因劳动性质而孤立生活在全国各地小块土地上或小村庄的农民，不可能形成阶级的政治意识，而集中在大工厂和大城市工人居住区的工人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在政治上是积极的。³⁴然而，马克思说的是铁路、电讯、传播媒介和汽车没有登上农村舞台以前的无知农民。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农民在阶级的网状系统中已经变得比较统一，越来越像生活在工人社区中的工人。农民其实在建立强有力政治组织上是很成功的。

总之，如果职业在其许多活动和作用上要求高度体现群体内的相互影响，并能培养领导才能和对重大问题的认识，那么这种职业的成员将较有政治意识，投票率较高，对工会一类有职业联系的组织有更大的忠诚。

例如，社会学家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考察过新泽西州造船厂工人的一项住房计划。该计划强迫工人住进一个只住工人的城镇。体力劳动者必须出任城镇的行政官、学校董事、图书馆管理员、政党负责人等职务。³⁵强迫工人作这些事的一个结果是，与生活在这些职务通常由中产阶级人士出任之杂居环境中的工人的“正常”情况相比，参与选举和其他社区活动的水平大大提高了。

同样，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地理环境和宪法条款的结合，使组织和管理许多官方和民间服务工作成了当地麦农——那里的农民几乎全是麦农——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形成的农民参与社区领导和组织的系统导致他们行业政治活动水平的提高，大大高于大多数其他地区所报道的水平，而这些地区是由城市中产阶级担任地方官员和学校董事一类领导职务的。³⁶再者，在环境可以造就职业社区的场合，工人必须为自己提供各种有组织的服务工作，而在一般场合，这些服务工作是由其他阶层和机构提供的。更重要的是，工人在这种环境中可以产生自己的领导人。这种环境有助于高水平的普遍参与。例如，矿工(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必须住在远离社会其余部分的社区，他们无论在教堂、宿舍区、学校，还是镇委员会，社会接触都是矿工伙伴。英国的矿区比国内其他任何选区都显示更高的投票率，尽管它们投工党票的比率变化在3:1与20:1之间。³⁷

这是有相同背景和相同需求的人高度相互影响的结果。与这种相互影响因素相联系的是，建立专门致力于提高对共同问题的认识和动员进行有组织政治参与的利益群体组织。在各个国家，工商业者都有组织完善的组织，大部分报刊代表他们的观点。工人永远不能组织得这样好。例如美国工人，即使在他是工会会员时，也很少像工商业者那样接触大量热心于政治的宣传和劝导，更不用说去投票。

此外，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也有助于加强上层阶级内部的沟通网络，而削弱更下层阶级群体内部的沟通。在我们有资料的每个国家，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成年居民不属于工会以外的任何正式组织。但是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地位高的人参加组织的可能性，远大于社会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在1955年被调查的美国人中，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5个阶层只有8%的人加入了组织，而最高阶层这个比例是82%。在高、低阶层的各种比较中，不管是职业阶层之间、不同教育水平之间、不同收入之间、所有者和租

赁人之间的比较，还是雇用仆人者与不雇用仆人者之间的比较，都发现越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参加组织活动越多。³⁸

非政治性民间组织的成员是有阶级联系的，这一事实有重要的政治后果。W. 劳埃德·沃纳(W. Lloyd Warner)用大量资料证实这些组织在使公民与其他社区机构发生联系时有决定性作用。³⁹最近一项芬兰的研究显示，参与任何种类的活动都有累积效应。那些参加了某一特定类型组织的人会在参加其他组织和出席政治会议上更积极，会阅读更多的东西，会有更多的朋友，等等。⁴⁰在德国，据1953年的一项调查，那些属于运动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等不同组织的人，对政治更感兴趣，听更多的政治广播节目，读更多的报纸，想在每个阶层内投更多次票。⁴¹例如在德国的男工人中，属于工会以外组织的人，有83%是出席投票的，而那些不在组织的人，这个比例是72%。

参与非政治组织激励政治参与有多种机制，但第一次专题调查型选举研究《人民的选择》的作者们所提出的机制，是值得详加探讨的。他们指出，居民中有少数人是“意见领袖”，他们的广博知识、兴趣和人格使他们在他们的朋友和熟人中有影响力。在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上，接触意见领袖比接触正式宣传更重要。意见领袖的人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和生活较富裕阶级当中是超比例的，他们在各种组织中往往也比较积极。因此可以预期，组织成员有可能接触到有政治见解的领袖，某种有广博知识和固定见解，而且与组织成员有相同社会背景的人。此外，由于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有更大比例的人热心于政治，所以非政治的中产阶级俱乐部比大多数工人组织应当有更多的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表明，参加组织对中产阶级政治活动比对工人政治活动有更积极的影响。⁴²在体力工人中，只有工会（由有政治兴趣的领导人担任专职干部）对参与有强大影响。⁴³

在许多欧洲国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有阶级意识的政治运动创造了一种使工人与社会其余部分隔离的有组织的亚文化。一统制的政党试图通过使工人参加党控制的工会，住进工人合作建设的住宅，参加与党有关的体育活动和社会俱乐部，出席党或工会发起的文化娱乐活动，读党报，看党刊，来全面安排工人的生活。儿童应当长大参加党的青年组织。在这样做取得某种成功的场合，投票率中通常的阶级差别完全消失

了,甚或完全颠倒了。例如,在1934年前的维也纳,工人在决定性选举中的投票率实际上不低于94%;在柏林的工人区,投票率超过90%,超过了工商业者、专业人员和白领工人的投票记录。类似的结果在法国也有报道,共产党在那里控制了许多工人的生活。⁴⁴

职业所决定的活动不仅影响个人进入社会的有组织的沟通网,因而影响他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而且影响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的能力。马克斯·韦伯指出,例如,律师的工作不仅给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技能,而且给他积极投身政治所必需的时间,相比之下,医生的工作需要的时间如此之多,以致要他积极参与是困难的。⁴⁵韦伯的论点谈到较积极的参与水平,不过必须记住,即使是有限的投票行为也不仅仅是花个把小时去投票站的事,而是花多得多的时间去阅读、去听、去思考政治问题的结果——至少对有兴趣的投票者是如此。空闲时间的活动(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培养政治意识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可是,某些职业既没有提供实际的空闲时间,甚至更重要的,也没有提供解除非个人问题焦虑的精神空闲时间。这样的职业总的来说在工作时间提供的精神刺激也是最小的。为谋生必须长时间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办事员或贫穷农民,在政治上不可能像经济上比较安定、工作时间富有弹性的人——如在英国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工会干部、新闻工作者或年金领取者——那样积极。穷困潦倒的农民或失业工人,其低参与可部分归因于为生存而斗争使他们没有能力在政治活动上“投资”,而且这种活动的结果毕竟是无把握的。⁴⁶吉纳维夫·克努普费尔(Genevieve Knupfer)在她总结下层阶级社会状况的重要发现时指出,他们对政治的低参与反映他们与家庭外事务和活动脱离得较远。下层阶级个人与高阶层个人相比,朋友较少,社交活动的地理范围较窄;他们读的书刊也少,几乎不读有助于加深政治参与的“严肃”读物。我在讨论工人阶级集权主义时已经指出,低地位似乎使人们远离更广阔的文化,把他们的注意力局限在比较琐碎的生活方面。⁴⁷

除低地位职业群体的状况外,已婚妇女的地位也可以说明难于得到可利用的时间或时间的时有时无是影响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或母亲的要求意味着她几乎没有机会或必要去获得政治上有关的经验。因此可以预期,妇女不关心政治,而且几乎在每个国家,妇女的投票率都低于男人。⁴⁸然而,那些摆脱了某些家庭主

妇负担的妇女会日益接近男人的政治作用。美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已婚妇女，孩子较少，常雇用佣人，并有减轻家务劳动的工具，因此有时间参加本阶层妇女的正式和非正式活动。在成千上万的妇女俱乐部，大部分成员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社会学家 W. 劳埃德·沃纳和保罗·S. 隆德(Paul S. Lund)在他们研究“美国式城市”时发现，在三个最高的社会阶级中，妇女比男人在组织中更积极，而在下层阶级中，情况刚好相反。瑞典政治学家赫伯特·廷斯滕(Herbert Tingsten)报道，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产阶级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一如同阶层的男人，而工人阶级妇女，比如在美国，显示了最低的投票率。⁴⁹在芬兰，说瑞典语的居民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与说芬兰语的大多数居民相比，生活比较富裕的是超比例的，说瑞典语的妇女比说芬兰语的男人有更高的投票率。⁵⁰

如果增加空闲时间或弹性工作时间可以增进政治参与，那么不断减少工作周的长度将导致更高水平的参与。许多 19 世纪的改革者曾对民众提高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和复杂感寄予厚望。然而，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海伦·林德(Helen Lynd)在 1929 年撰文指出，选举参与实际上正在下降，这表明政治作为一种招揽人的形式已不足以与新的商业冒险——电影、收音机、商业性体育——相竞争，因此，政治失去了它的主要功能之一。⁵¹政治学家罗伯特·E. 莱恩(Robert E. Lane)在 30 年后撰文指出，这种趋势没有继续发展，“从 1876 年内战后的选举到 1928 年，有资格利用自己公民权的选民的参与比例呈下降趋势，而 1928 年后这种趋势(因战争而打断)出现了逆转，参与比例呈上升趋势”。⁵²然而，关于投票率或其他参与水平的长期趋势的证据，因缺乏资料，是不很令人满意的。

群体压力对投票的影响

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选举结果与个人的利害关系，他们仍会由于受到社会压力和内在社会责任感的刺激而投票。投票行为的差异与社会经济等级有关，也与对不同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准则的不同认同程度有关。

几乎每一项社会行为研究都表明,认同于这些准则的程度是与社会地位相关的。金西已证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性行为上有很大不同,中产阶级要保守得多。⁵³对腐化和犯罪的态度也随阶级地位而变化。例如,下层阶级人士往往比中产阶级人士宽容得多。⁵⁴对辛勤工作和学习之内在价值的看法也随阶级地位而变化。一般说来,中产阶级人士往往更认同于社会的主导价值,接受这种认同将以实现自己个人目标为酬答的观念。⁵⁵

对政治的态度不可能与上述一般模式相差很大。可以预期,“好公民”和“履行投票义务”是与中产阶级的观点相联系的,而对政治冷言冷语或态度冷漠是与在其他领域的不认同有关的。不指望因工作好而得到回报的工人,也不会指望因做个好公民得到回报。中产阶级行为准则的力量,在中产阶级生活水准和社会承认已被剥夺的群体中,已声名狼藉,不起作用。美国收入极低群体的低投票率,或许属于这种一般模式。即使在美国北方,黑人的极低投票率可能也部分说明,在一个认同得不到正常回报的群体中,认同社会准则的力量是微弱的。⁵⁶

除了作为“好公民”要求参加投票这个一般社会准则之外,有许多利益集团还要求其成员为本集团利益投票。如此看来,欧洲工人阶级居住区的高投票率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这样的集团存在,而普遍见于美国工人的低投票率或许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阶级组织和形成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准则。人们已经注意到,属于工会的工人比非会员的工人有高得多的投票率⁵⁷,而在美国贫穷的城市地区,政治机器传统上是呼吁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的团结一致,以此对投票施加压力。⁵⁸

这种要求认同的压力显然取决于个人与起控制作用的社会群体的接触量。例如,社区中的新迁入者往往比老住户投票率低——美国、瑞士、芬兰、英国的许多社区都有这种情况的报道。⁵⁹同样的因素可能也影响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低投票率;前者尚未进入成人社会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后面将讨论),后者由于退休、体弱多病和进入死亡年龄正在失去他们的社交接触。

把投票作为认同的一种象征所受到的最大压力是见于投票失去客观意义的地方,即极权主义者所“表演”的选举。在纳粹德国和苏联,为了宣

传动员全体选民、要求他们去投票，作了巨大努力。在1946年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我们得知1亿多选民，有99.7%投了票，其中99.2%支持官方开列的唯一一份候选人名单。⁶⁰如果说美国社会的外部威胁感在增加的话，可以设想那就是日益强调投票是忠诚和满意现存政治制度的象征。但是，如果这种日益增加的强调不伴有人们对争论问题关注的相应增加，则强调归强调，几乎不会与自治的理性参与观念发生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群体压力的导向是抵制投票。妇女普遍的低投票率可能部分起因于“妇女地位”的传统观念。在美国，这似乎并没有阻止有兴趣的妇女去投票；不过，不同的是，没兴趣的妇女有不投票的自由，没压力要她们去投票，而同样没兴趣的男人，就会感到受到较大压力要他们去投票。⁶¹在目前美国南方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群体对黑人行为设置限制，其中包括禁止投票。⁶²

在某些极力主张以弃权抗议“资产阶级民主”的极端激进的群体中，有另一种反对投票的约束。“投票意味着承认奴隶身份”是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成员人数占有组织工人一半以上——这一强大运动是1933年选举中的主调。不投票作为一种抗议手段常常被反对派用于“半自由”选举中。同样，在没有一种选择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公民投票中，大量弃权有时表现为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

在有反对投票约束条件的群体内，一般的情况被颠倒了：认同约束条件的成了弃权者，违背约束条件的——“无阶级觉悟的工人”、“对自己地位没认识的黑人”——成了投票者。

交叉压力对投票的影响

一般地说，个人或群体受到相反方向作用的压力越大，越可能预期选民以“失去兴趣”和不作出选择的方式退出这种环境。美国对选民如何形成其见解所作的首次深入研究（采用“典型调查”法：隔一段时间对同一抽样对象重复提问）分析：“许多受到交叉压力的选民往往轻视整个事件。他们以对选举失去兴趣为由逃脱任何实际冲突……那些没受到交叉压力

的选民对选举显示了最大兴趣；即使只有一种交叉压力也意味着对选举表示不感兴趣的选民比例有大量增加。再者，随着交叉压力数量的增加，感兴趣的程度显示稳步的下降。”⁶³美国和英国的选举研究报道了类似的结果。⁶⁴对工会——共产党派和天主教派正在进行夺权斗争的工会——会员的访问研究也报道了同样结果。那些真正接触到双方宣传的会员，其反应是拒绝在双方之间作出选择。⁶⁵

迫使个人考虑不同政党的交叉压力使某些人在政治上软弱无力，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或许是来自德国的一项作废票研究。当选民在他的选票上画了两个党而不是一个党时，选票作废。倘若这种“错误”是偶然的或不知如何投票的结果，那么出现在废票上的两党应当是随机分布的。然而检查巴伐利亚的废票发现，投两党票的人几乎不变地是投两个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党的票。举例来说，一个选民投了一张标有社会民主党的废票，票上标的另一党通常不是接近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左翼小党，就是接近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同样，大多数标有基督教民主党的废票，其标的另一党要么是接近基督教民主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43%），要么是接近基督教民主党右翼的巴伐利亚农民党（31%）。标有比较保守的农民党的废票，其上标的另一党或者是在农民党左侧的基督教民主党（47%），或者是在农民党右侧的日尔曼党（13%）。由此看来，这些废票大多数都标有第二个党，这个党或者从左边接近第一个党，或者从右边接近第一个党。这表明这些废票不是误投的结果，而是反映有些选民不能在强烈吸引他们的两党之间作出抉择。⁶⁶

交叉压力假说或许有助于解释前述不同群体的某些行为差异。例如，我们知道，工人往往比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投票少，而且即使在英国之类投票率阶级差别不如美国大的国家，在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程度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如英国的一项典型调查研究发现，最下层阶级对选举感兴趣者的比例是 34%，而上层阶级的这个比例是 71%。⁶⁷这些差别可能部分起因于如下事实：每个社会的下层阶级都受他们的生活经验和阶级组织的影响，支持那些鼓吹社会经济改革的政党，但同时又受到上层阶级和保守派通过报刊、广播、学校、教会等的强大影响。虽然他们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不满现状，但现存制度又有许多传统权利使他们取得影响自身的合法性。因此，下层阶级所处环境，无

异于一种交织着冲突信息和对立群体压力的环境。

但是，较富裕阶级的成员很少遭受到同样意义上的交叉压力。他们生活在相对“均质的政治环境中”，所有影响都指向一个政治方向。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工人读的是同工会和工人政党对立的报纸，而各国的工商业者读的都是反复宣传他们基本政治见解的报纸。⁶⁸

就一个层次化然而开放的社会而论，其价值的全面运作可以通过增加对下层阶级的客观交叉压力削弱他们的政治有效性。虽然下层阶级个人是作为被剥夺政治地位群体的成员看待政治争端，但他们还可通过大众传媒接受到社会的主导价值，并有可能（至少在某些开放社会）期望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较高的地位。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必须使下层阶级的准则与一些冲突的价值相调和，而这些价值是对应主导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主导阶级仍然自信他们认同的是一种无冲突的政治环境。按照纳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对上层阶级状况的描述：“上层阶级个人之间存在更密切的关系和更畅通的理解……他们旅行较多……一起坐在普尔门式火车车厢上亲密相处。他们经常在开会时见面。”⁶⁹ 这些差别是投票率阶级差异的另一原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期，任何社会的阶级结构越开放，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越冷漠；相反，社会的层次越森严，其下层阶级越可能建立自己强大的政治活动组织。与中产阶级文化或个人距离最远的那些下层阶级成员可能在他们阶层的主要政治活动中表现最积极，而那些有最大量交叉接触的下层阶级成员，则最不积极、最不感兴趣和最不受约束。有大量证据（其中某些已在其他章节提到）符合这些设想，如涉及“孤独产业”、大工厂或大城市无产阶级居住区中工人的那些证据，以及与1934年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之类“一统制政党”党员和工会会员有关的证据。⁷⁰

正如1920年到1957年所作的不同研究所报道的，在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巴塞尔、柏林、英国部分地区和挪威，城市中或者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或者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居民区，其投票率比那些“混合”居民区高得多。⁷¹ 受雇于作私人和家庭服务工作的个人以及家庭农场的农业工人常报道有低投票率，这或许是符合这种模式的一种极端情况的例证。这样的工人，不仅地位低，工资低，而且阶级内部的统一性最少，但他们与地位高的人直接接触最多。⁷²

来自芬兰选举研究的几个例子支持交叉压力假说。芬兰是一个以说瑞典语的上层阶级为少数派的国家。埃里克·阿拉特(Eric Allardt)发现,说瑞典语居民占75%以上的选区,其投票率总比种族杂居区或芬兰族占优势的选区高。⁷³有鲜明政治传统的地区,即在1917年或1945年以后多数派要么是保守政党,要么是左翼政党的地区,其投票率一直比保守政党和左翼政党断续取得多数地位的地区高。⁷⁴此外,一个政党明显占优势的地区,其投票率高于有几个势均力敌政党竞争的地区。

交叉压力假说也有助于解释男女的不同投票率。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社会中的妇女比男人保守和倾向宗教,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性别价值的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不同的生活经验。男人在工作和业余活动中都可更多地接触到本阶级流行的或占优势的意见。妇女,尤其是家庭主妇,几乎进入不了阶级内的交流结构,看不到背景和兴趣与自己相似的、有政治见解的人,因而更可能持有大文化中占优势的保守价值。使工人阶级妇女比同阶级男人保守的第二个可能起作用的因素是,她们对家庭的强烈关注使她们有较多性别上的地位意识。正如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在他们的《中等城市》一书中所指出,妇女是主导的文化价值和地位价值的载体。对地位的关注基本上是指对直接在自己之上的阶级或群体之价值和习惯的关注,而这个阶级或群体可能有比自己更保守的价值。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妇女来说,一方面,她们的阶级地位和她们丈夫从工厂带回家的价值可以把她们推向左,另一方面,她们经验中的其他因素又会把她们推向右,所以,她们比她们的丈夫更处于交叉压力下,更可能完全退出政治抉择。

在法国和奥地利一类欧洲国家,大多数工人阶级男子支持反教权的左派政党,而他们的往往信教的妻子,则面临着投教会一方票,还是投本阶级和她们丈夫一方票的冲突。这种活生生的、决非少见的冲突处境,无疑大大有助于工人阶级妇女显示低投票率。⁷⁵

流动性,不管是居住的、社会的,还是工作的,也会导致政治参与减少,因为不同类型的流动性既可以减少个人从事不同形式活动的范围,也可以加大他们在政治上遭到有关交叉压力的可能性。新住户投票的可能性大大低于老住户,这方面的证据前面已经援引过。⁷⁶考察有关美国工会活动的研究发现,有资料证明新改变住处或工作的工人在工会中也不可

能像长期住在一个社区或干一种工作的工人那样积极。⁷⁷

不过，工作流动和居住流动对投票的负效应虽然可部分反映有关人所受到之交叉压力的增大，但向上和向下的社会流动，再加上许多人对将来改善自己地位的希冀，却会增添政治的交叉压力，降低对政治的兴趣。在职业阶梯上向上或向下移动的人，会进入政治倾向与原来所在群体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自美国、德国、瑞典、芬兰、挪威多次选举调查的资料显示：“与父亲处于同一[社会阶级]群体的子女，其投票率高于与父亲处于不同群体的子女。”⁷⁸

相信将来有升迁机会也可以导致减少政治活动的参与，因为那些一心向上的人比那些视自己目前地位为相对永久地位的人，更容易受他们渴望进入之阶级的价值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改变自己阶级地位的愿望在年轻人中最强烈，因此他们在各地都显示最低的选举投票率。不过，对于年轻人、特别是第一次取得选举资格的年轻人来说，还有另一些交叉压力源，这方面的讨论可进一步说明交叉压力假说的实用性，还可以说明试图把许多相互作用、相互冲突因素所决定的行为与社会分析家当时感兴趣的特殊变量相联系的问题。

进入选举年龄的年轻人与其他选民面临不同的情况，因为他必须作出他的第一次抉择；他可以像各国的大多数选民在以前选举中所作的那样不去投票。因此，如果我们假设第一次投票者处于一种冲突情况，那么就可以解释这类选民在各地显示的较低投票率。还可以推断，那些不具主要交叉压力源的第一次投票者最可能去投票。对于一个第一次投票者来说，如果选择已在某种意义上由他的环境作出，那么他将去投票；如果他面对冲突不可解脱，他就会推迟作出决定。有两项在极其不同环境所作的研究支持这一点。一项是研究在纽约州北部埃尔迈拉城进行的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该城共和党力量很强；另一项是研究西柏林1950年选举，该城除纳粹时代自1912年以来一直是社会党占优势。

在埃尔迈拉，中产阶级青年是在每件事都对他成为共和党人起作用的环境中长大的，而工人阶级青年一方面出于其阶级背景而接受民主党的刺激，另一方面由于他要接触社区内占优势的观点和组织机构而受到共和党的压力。在柏林，工人阶级的青年选民接触的是强大的、有组织的、有社会合法地位的社会党环境，而中产阶级青年是生活在中产阶级及

其政党相对弱小的环境中。表 6.3 列举了上述两城市年龄、阶级和投票率之间的关系。从表中我们首先看到,年龄小的人的投票率比年龄大的人的投票率低。其次,当考虑阶级地位时,年轻选民与中老年选民之间的投票率差随阶级地位增高而加大。不过,这种变化的性质在两个城市是截然不同的。在社会党的柏林,年龄组间的投票率差在中产阶级中大,而在工人阶级中小;在共和党的埃尔迈拉,关系刚好相反。在埃尔迈拉,中产阶级青年有为自己打算的念头,而在柏林,有这种念头的是工人阶级的青年选民。

表 6.3 埃尔迈拉和柏林的投票率*

埃尔迈拉——1948 年			
出生年份	年龄	工商业和白领	以工资为生的工人
1927—1924	21—24	74(%)	35(%)
1923—1914	25—34	75	65
1913—1894	35—54	85	79
1893 或更早	55+	80	82
柏林——1950 年**			
		工人阶级居住区 蒂厄加尔滕区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居住区策林多尔夫区
1930	20	88.9	67.0
1929	21	92.3	71.8
1928	22	90.9	74.3
1927	23	90.9	72.7
1926	24	92.9	76.7
1925—1921	25—29	92.7	77.5
1920—1916	30—34	94.3	81.7
1915—1911	35—39	94.7	84.9
1910—1906	40—44	95.1	88.4
1905—1901	45—49	94.9	89.0
	所有年龄	94.1	85.3

* S. Munke and A. R. L. Gurland, *Wahlkampf und Machtverschiebung: Geschichte und Analyse der Berliner Wahlen von 3 Dezember, 1950* (Berlin: 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Duncker und Humboldt, 1952), pp. 254—55; 来自未公布的研究资料, 参见 B. Berelson et al.,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 其他工人阶级居住区类似于蒂厄加尔滕区, 其他中产阶级居住区类似于策林多尔夫区。

虽然表 6.3 中的资料倾向于证实如下假说: 当均质环境有利于作出

选举决定时，年轻人将去投票，而当面对互相冲突的刺激时，他们可能推迟投票，但即使在工人阶级的柏林和中产阶级的埃尔迈拉，年轻人的投票率仍低于 30 岁以上的选民。对此的一种进一步解释是，刚到投票年龄的年轻人，同时也正是在组织新的家庭，摸索找到新工作、新邻居、新伙伴的途径，这一切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协调和冲突。年轻人的密切交往往往比中老年人的密切交往有更多的冲突意见，因为后者有机会建立一种均质环境，这既可通过选择意气相投的朋友和伙伴实现，也可通过向朋友中一种主要观点调整实现。埃尔迈拉城的研究报道，以一个人有三个最好朋友计，第一次投票者中只有一半人与三个最好朋友政治见解一致，有高达 30% 的人与其中两个或全部三个朋友政治见解不一致。在 35—45 岁年龄组中，有 75% 的人与三个好朋友意见一致，只有 10% 的人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朋友意见不一致。⁷⁹ 一项法国的研究显示，在年龄大于 50 岁的人中，丈夫和妻子投同样票的可能占 97%，而在 50 岁以下的人中，这个比例是 80%。⁸⁰

如同与投票率相关的年龄差别一样，在单身汉与已婚者之间也几乎普遍存在投票率差异：前者低于后者；这可能反映在已婚者当中交叉压力较少，他们有较稳定的生活方式，在社区中有较均质的交际关系，特别是在工人中，地理的和社会性的迁移还较少。⁸¹

根据以上论述和有关调查结果，就第一次投票者还可以导出另一个推论：他们比中老年选民有更大可能显示“继承的”投票模式，即像他们父亲那样投票；如果他们受到压力要求采取不同意见，他们将不去投票。有资料报道，父亲投票方式与第一次投票者投票方式之间的一致性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组⁸²，这支持上述推论。

这里对交叉压力的讨论，是试图说明这个概念可以用于解释不同经验观察中的广泛变化。正如我曾经指出的，对于任何特定的差别，常常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交叉压力”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解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几乎不需要什么假设。不过，对其实用性已经通过考察不同个人受到客观和主观压力的程度，作了比较直接的检验。美国学者莫里斯·贾诺威茨(Morris Janowitz)和德万·马威克(Dwaine Marvick)对 1952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资料作了再分析，并从两方面入手提出了交叉压力的量度：一方面是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和宗教(对民主党

或共和党态度的完全客观的量度)；另一方面是政党身份、对竞选争论的态度、对候选人的态度(主观量度)。然后对被调查人排了队,一端是有极强共和党倾向的,中间是受到不同程度交叉压力的,另一端是有极强民主党倾向的。利用这种量度,对处于两端的那些人的行为作了很高精度的预测。例如,处于艾森豪威尔持续压力下的选民,有95%在选举日投了艾氏的票,而处于史蒂文森类似压力下的选民,有80%投了史氏的票。在这两端之间,随着交叉压力增大,有关党得票有规律地减少。弃权率也随交叉压力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在处于最大冲突压力的选民当中,弃权率高达37%。⁸³

挪威斯塔万格城1957年选举的弃权资料为本章所讨论的各种不同因果因素的总合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在那里,有关全体选民可供利用的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以及已证明独立影响投票率的所有变化因素。正如这里提供的分析所期望的,极高的弃权率(54%)出现在30岁以下未婚的服务行业工人中。这些人恰恰是受到要求他们投票的社会压力最小的,受到人际交叉压力最多的,与具有上层阶级政治价值者交往最频繁的,对政府政策与他们地位的关系了解最少的,在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上(由经验提供的)训练最少的。相反,65岁以上已婚的男性专业人员和工商业管理人员,是最有自觉意识、最有知识和经验、受到社会压力最大的一类,他们之中只有2.5%不去投票。⁸⁴

这些资料本身并不能证实本章提出的概括化解释的正确性。但在在我看来,从无数投票统计资料中梳理出某种条理(解释)的方法,有力地证明社会学分析的力量,同时显示,对政治行为作比以往更细致、更系统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表6.4代表系统分析的一种尝试,其中的因素本章已讨论过,它们影响不同社会群体。

表 6.4 与投票率有关的社会因素

	引起相关意识的因素:							投票率
	与政府政策的 关系	后果的 直接 可见性	训练, 工作 经验	接触, 沟通	空闲 时间量	对投票 的社会 压力	缺乏 交叉 压力	
高收入	+	+	+	+	+	+	+	高
低收入	+	-	-	-	-	-	-	低

(续表)

	引起相关意识的因素：							投票率
	与政府政策的 关系	后果的 直接 可见性	训练， 工作 经验	接触， 沟通	空闲 时间量	对投票 的社会 压力	缺乏 交叉 压力	
矿工	+	+	-	-	-	+	+	高
仆役	-	-	-	-	-	-	-	低
欧洲工人	+	-	-	+	-	+	+	高
美国工人	+	-	-	-	-	-	-	低
政府雇员	+	+						高
私人雇员	-	-						低
麦农	+	+						高
非市场经营的农民	-							低
犹太人	+							高
非犹太人	-							低
危机时期	+							高
正常时期	-							低
白人						+		高
黑人						-		低
老住户						+		高
新住户						-		低
35—55岁者						+	+	高
55岁以上者						-	+	中等
35岁以下者						-	-	低
男人			+	+	+	+	+	高
妇女			-	-	-	-	-	低
极权主义“选举”						+		高

注：+号表示就所比较的群体而论相对比较有助于投票；-号则相反。

结 论

关注政治参与的社会根源，不应导致我们忽视不同程度的参与对民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在本章开头，我已指出，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社会中共产党派工会领导人都很注重确保其公民或会员的高参与率，因为这意味着参与者是可影响的。传统的、保守的寡头统治或独裁与极权统治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相对不关心参与，后者则要求参与。戴维·

里斯曼曾敏锐地注意到，在极权的社会中，政治冷漠可能是阻止这种制度完全成功的主要障碍。⁸⁵

民主社会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尽管由此显然引出了不同的后果。相信高度参与最能促进民主政治的人强调，与传统的寡头统治不同，民主国家必须依靠其公民的承诺。首先，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居民，态度冷漠，麻木不仁，孤陋寡闻，那么在这个国家，承诺就不能兑现，共识实际上是很弱的。其次，正如政治学家小 V. O. 基所指出，当投票率很低时，这几乎总是意味着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在政府中没有适当的代表。如果低投票率和相对缺乏组织在地位较低的群体中一起出现，则表明这些群体受到政治家——愿意接受较有势力、较爱参与、较有组织之阶层的要求的政治家——的忽视。⁸⁶ 缺乏参与和代表也反映缺乏有效的公民权，因而也缺乏对整个制度的忠诚。

不过，高度参与的好处虽然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我们对不投票者的特征和国家得到高投票率的条件有了更多了解时，有些人怀疑高度参与是否真是好事。有一个学派欢迎低投票率，认为它是选民对事情进展方式基本满意的证据。1936年，政治学家弗朗西斯·威尔逊(Francis Wilson)对此这样写道：“在一个只有50%选民参与的社会，政治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国内大部分人的要求。随着参与率上升，比如说升到90%，这时，政治斗争的紧张程度显然正在向维护宪法之意志的破裂点扩展。”⁸⁷ 没过多久，政治参与决定因素的著名分析家、瑞典人赫伯特·廷斯滕在总结他关于世界范围内选举统计资料的杰出研究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指出，在德国和奥地利之类国家，当它们的民主制开始崩溃时，投票率极高。他认为，高投票率是共识跌落的征兆。⁸⁸ 戴维·里斯曼也说，冷漠反映人们要用自己的时间去做比政治参与更感兴趣的事，同时还提出，尽管人们非常冷漠，但政府部门和大型组织仍在顺利地履行职责。⁸⁹

关于增加参与的后果，从研究不投票者的特征方面也可以得出悲观的结论。早在1928年，美国政治学家 W. B. 芒罗(W. B. Munro)就说过，增加参与会威胁到民主政治的运作，因为不投票基本上是出现在最无知的那部分选民中。⁹⁰ 后来的一些基于调查资料和问卷资料的研究——有些在第四章已提到或援引过——显示，不投票者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投票

者，他们往往有集权主义倾向，对民主和政党抱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异常见解和种族少数派有褊狭情绪，偏爱政府中的强硬领导人。”

诚然，投票者与不投票者的许多区别乃是由最穷、教育最差的社会群体中不投票者最多这一事实派生的。不过，即使在对已经发现影响投票率的那些主要社会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教育、收入——加以控制时，这些态度上的差异仍然存在。例如，在控制所有这些因素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菲利普·黑斯廷斯(Philip Hastings)报道，与习惯性投票者相比，习惯性不投票者不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即时的”问题甚于关心长远问题，就政治问题而论，甚至不乐意自己思考(表现为愿意接受他的“上司”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一般显示“一种个人的不满足和不安全感”。⁹²

有证据证明廷斯滕的论点：投票选民数量突然增加可能是紧张局势和政府功能严重失调的反映，也可能说明，从民主制度必要条件的观点看，有社会态度不健康的个人进入投票者行列。另一方面，高投票率未必就是坏事。许多稳定的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参与率比美国高得多。就下层阶级逐渐被带进选举过程(通过加强组织建设、改善教育制度和提高他们对政府行动对个人利益之关系的理解)而论，增加参与无疑对民主政治是一件好事。只是在重大危机或有影响的集权主义运动突然把平常心怀不满的习惯性不投票者拉进政治领域时，制度才受到威胁。因此，参与率和投票率的高低，本身对民主政治无所谓好坏；重要的是，参与的程度和性质反映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最深刻地制约着制度发展或生存的机会。不过，不同阶层居民的冷漠程度和不同程度的参与，也确实反映政治过程中起基础作用的共识和冲突。下一章，我们将对支撑持续选举冲突的分歧的根源——整个民主制度的生命线——作更直接的考察。

注 释

1. 成员通常对工会政治过程无任何兴趣，这大大助长了工会运动中存在的一党独裁。导致对工会持冷淡态度的因素将是第十二章要讨论的部分内容。

2. 这里，我不想考虑法律和技术的限制，如居住限制条件、人头税、财产资格、文化考查(常常用作种族歧视的掩护)以及其他不胜其烦的选举登记条件(常常得到想牵制投票的政治机器的支持)。这些因素可能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但这里分析的主要是自愿弃权。

3. 见 V. O. Key,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4th ed. (New York: Crowell, 1958), p. 625。与欧洲国家比较,美国的投票率特别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举制度的特殊性,选民常常必须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登记,另一个是投票,而第一个决定必须在政治争论和政治活动处于低潮时作出。这个因素本身就可以说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许多区别;在欧洲国家,选举是自动登记的,仅仅必须投票。

4.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23, 1959.

5. David Riesman and Nathan Glazer, "Criteria for Political Apathy," in Alvin W. Gouldner, ed., *Studies in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0), p. 519.

6. 里斯曼(Riesman)和格拉泽(Glazer)实际上关心的是政治的主观意义及其在构成个人精神状态中的作用,而本章关心的问题并不真正是作为个人问题的冷漠,而是投票,这关系到影响投票的群体差别的基本类型。当然,如果投票行为完全失去意义,这的确向民主制度提出了严肃挑战,但如按里斯曼那样处理,问题几乎成了哲学问题,这不仅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而且完全成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可争论的推论。

7. 对政治参与问题作了最好概述和研究的是 Herbert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London: P. S. King & Son, 1937)。对 14 种不同研究所报道的投票率作概括总结的是 Bernard Berelso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p. 336—337。对投票和政治参与与不同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关系提供了有用的文献概要的是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Lif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特别见 pp. 45—62。其他重要资料可见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4), pp. 40—51; Angus Campbell and R. L. Kahn, *The People Elect a President* (Ann Arbor: Survey Research Center, 1952), p. 29;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Kjetil Bruu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nish Non-Voter," *Transactions of the Westmarck Society*, 3 (1956), pp. 55—76。另见 Julian L. Woodward and Elmo Roper, "Political Activ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 (1950), pp. 874—877; Charles E. Merriam and Harold F. Gosnell, *Non-Voting: Causes and Methods of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Inge B. Powell, "The Non-Voter: Some Questions and Hypotheses," *Berkeley Publications in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1 (1955), pp. 25—36。关于女性参与资料,其中也包括大量男性参与资料,见 Maurice Duverger, *La participation des femmes à la vie politique* (Paris: UNESCO, 1955), 特别见 pp. 13—74; Gabriele Bremme, *Die Politische Rolle der Frau i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56), 特别见 pp. 28—67。

8. 见 Dankwart A. Rustow, *The Political of Compromise* (Princeton: Prin-

ceton Iniversity Press, 1955), pp. 137—139。由于瑞典的投票率自 1924 年以来一直稳步增加(从这一年较低的 53%增高到 1948 年的几近 83%)，分类群体间投票率差别的减小无疑是因为各群体的投票率都有增加，而不是因为制度率特别低的群体受到社会的特别影响。

9. 见 Erich Reigrotzki, *Soziale Verflecht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Tübingen: J. C. B. Mohr, 1956), pp. 63—68, 其中载有这方面的数据。另见 Juan Linz, *The Social Bases of German Politic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10. 低地位不仅带来退避和冷漠，而且带来权力主义倾向，后者已在本书第四章“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一节作了分析。

11. 见 Juan Linz, *op. cit.*, pp. 747 ff. 1949 年投票率的实际差别要小得多：农业工人是 75%，小农场主是 87%，非农业工人是 83%，不过，这很可能与德国普遍存在一种对选举的道德责任感有关，不能作为说明这些人对候选人和有关问题感兴趣、有认识的有力证据。根据另一些兴趣测度，农业工人对政治的兴趣始终比其他职业群体低。来自美国全国 5 次调查的 12 000 例抽样结果表明，与农业工人处境大体相同的职业工人显示了最低的投票率。见 G. M. Connelly and H. H. Field, “The Non-Voter, Who He Is, and What He Think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 (1944), pp. 175—187。

12. 不过，大多数官方统计资料和民间调查并没有为这些细分类提供直接信息。它们的分类都是为直接实用目的建立的，如年龄、性别、收入、职业、宗教、地区等，为了用这里给出的另一些标准“解释”这些分类资料，分析者必须动用自己其他的知识，建立这些分类与社会群体的关系。

13. H. Tingsten, *op. cit.*, pp. 120—181. 关于法国地方首府这个问题的证据见 G. Dupeaux, “Le Probleme des abstentions dans le department du Loir-et-Cher au début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2 (1952), pp. 71—95。另见 D. Anderson, P. E. Davidson, *Ballots and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Roscoe C. Martin, “The Municipal Electorate: A Case Study,”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4 (1933), pp. 213—214. 1957 年挪威的调查发现，在所有男性职业中，拿工资的政府雇员有最高的投票率和政治活动参与率。这次调查是由奥斯陆社会研究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没有发表，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博士慷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料。

14. 见 S. M.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0)。

15. 其中尤其是英国，见 D. E. Butler,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51* (London: Macmillan, 1951), p. 266。

16. Marie Lazasfeld-Jahoda and Hans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Leipzig: Hirzel, 1932), pp. 35—37。

17. E. Wight Bakke, *Citizens Without W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46.

18. H. Tingsten, *op. cit.*, Chap. III. L. Harris, *Is There a Republican Majorit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pp. 16—17; A. Campbell and R. L. Kahn, *op. cit.*, p. 109. 后一项研究发现,行政官员的投票率是75%,专业人员是74%,而1948年和1952年工人的投票率是47%。

19. H. Tingsten, *op. cit.*, p. 215; S. J. Korchin,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Behavior of Voter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46), Chap. IV.

20. H. Tingsten, *op. cit.*, pp. 12, 72. 正如廷斯滕(Tingsten)资料所显示(p. 16),在挪威就禁酒举行的调查性公民投票中(1919年和1926年),性别投票率差别最大的是在反禁酒占多数的地区,而差别相当小的是在支持禁酒者明显占多数的地区。关于美国妇女关注道德问题的详细总结,见 Robert E. Lane, *op. cit.*, pp. 214—216。

在意大利,凡是天主教组织说不投票是“背叛教会”,弃权意味着“间接支持共产党和无神论者”的地方,对宗教往往最虔诚的妇女并不比男人有更高的投票率。见 Mattei Dogan, “Le Comportement politique des Italiens,”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9 (1959), pp. 383—384。

21. L. Harris, *op. cit.*, Chap. VI.

22. H. Cantril and J. Harding, “The 1942 Election: A Case Study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1943), pp. 222—241.

23. 见 Chapter 3, pp. 74—76,那里对“一统制政党”作了讨论。

24. A.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13), pp. 499—506; *Géographie électorale de l'Ardeche sous le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49), pp. 101—103.

25. Harold F. Gosnell, *Why Europe V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pp. 196—197; V. O. Key, Jr., *op. cit.*, pp. 624—626; L. Harris, *op. cit.*, p. 177.

26. H. Tingsten, *op. cit.*, pp. 225—226. 见 Chapter 5, pp. 148—152.

27. 哈尔伯瓦克斯(Halbwachs)这方面研究的最完整报告收在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R. E. L. 法里斯(Robert E. L. Faris)的如下书中: *Social Disorganiza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48), pp. 213—217. 哈尔伯瓦克斯本人写的研究报告在他的如下著作中: *Les Causes de suicide* (Paris: F. Alcan, 1930)。

28. 据一项全国抽样的调查,1952年美国最低收入的职业群中有45%的人没投票。见 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Democratic Consent*,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 No. 3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p. 26. 英国1950年选举的一项研究发现,样本中属下

层阶级的人，有 66% 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有 29% 持这种态度。见 M. Benney, A. P. Gray, and R. H. Pear, *How People Vo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6), p. 127。

29. Paul F. Lazarsfeld, B.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op. cit.*, p. 47. G. M. 康奈利(G. M. Connelly)和 H. H. 菲尔德(H. H. Field)在对收入和教育这两个变化因素加以控制时发现，两者都分别有助于增加投票率，收入的贡献要大得多。见 Connelly and Field, *op. cit.*, pp. 179—180。类似的，S. J. 科钦(S. J. Korchin)在他关于 1944 年美国选举的研究——前面已经援引过——中发现，当社会经济地位保持一定时，教育几乎无独立影响。关于美国 1948 年选举，见 A. Campbell and R. Kahn, *op. cit.*, p. 109。复杂感基本上与教育无关，缺乏复杂感的另一方面，即它的集权主义后果，在第四章作了讨论。挪威 1957 年的资料显示了相同的模式(那次调查已援引过)。

30. 见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pp. 238—239, 其中论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另见 Willy Kremer, *Der Soziale Aufbau der Partei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 von 1871—1928*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Köln, 1934)。在 1945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党(M. P.)中有 48.5%，保守党中有 61% 是自由职业者、管理人员或官员。见 Jacques Cadert, “Régime électoral et régime parlementaire en Grand Bretagne,” *Cahier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 No. 5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48), p. 84。关于知识分子在巴尔干农民政党中的作用，见 David Mitrany, *Marx and the Peasa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1), pp. 131—133。

31. 见 Sidney Webb, *The Story of the Durham Miners 1662—1924* (London: Labour Publishing Co., 1929), p. 21; 以及 A. D. Belden, *George Whitefield, the Awakener* (London: S. Marston and Co., 1930), pp. 247 ff。

32. 关于不同国家的进一步讨论和详尽的参考文献，见 S. M. Lipset, M. Trow, and J. S. Coleman, *Union Demo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特别见 pp. 25—30。

33. Peter Drucker, *The New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9)。

34. 见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收入他的 *Selected Works Vol.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3), p. 109; 另见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pp. 26—35; Karl Marx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Karl Marx, *op. cit.*, pp. 21—61。

35. Robert K. Merton, Patricia S. West, and Marie Jahoda, *Patterns of Social Life: Exploration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ousing* (New York: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imeographed)。

36. S. M.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op. cit.*, pp. 199—219。

37. H. G. Nicholas,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50* (London: Macmillan, 1951), pp. 42, 61, 318.

38. 见 Herbert H. Hyman and Charles Wright,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of American Adults: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1958), pp. 288—289。许多国家和地方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模式,其中某些研究在海曼(Hyman)和赖特(Wright)的文章中被引用,另一些研究在本书第二章注 37 中提到。例如,哥伦比亚社会学家 M. 科马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收集了纽约市的资料,资料显示,职业身份属专业人员的男女,有 80% 以上参加了民间组织,而不熟练劳动阶层,这个比例男人是 32%,妇女是 9%。见 Mirra Komarovsky,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Urban Dwell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1946), p. 688。

39. W. L. Warner and Paul S. Lunt, *The Social Life of a Modern Commu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 301.

40. 见 Erik Allardt, P. Jartti, F. Jyrkila, and Y. Littunen, "On the Cumulative Nature of Leisure Activities," *Acta Sociologica*, 3, No. 4 (1958), pp. 165—172。遗憾的是,作者们在文章中没有给出他们抽样调查者的阶级背景资料。

41. Juan Linz, *op. cit.*, pp. 804—805.

42.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op. cit.*, p. 146; A. Campbell and R. L. Kahn, *op. cit.*, pp. 24—28。另见 S. M. Lipset, M. Trow, and J. S. Coleman, *op. cit.*, pp. 97—105,其中详细论述了这个论点。

43. 在基督教民主党试图成为天主教和新教的发言人的德国,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教徒,参加教会活动都对他们的政治参与有相当大的影响。在 1953 年的一项调查中,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的新教教徒,投票率达 92%;不定期参加都会活动的,投票率是 90%,很少是 81%,从来没有 80%的。类似差别也见于积极的和不积极的男女天主教徒之间,女天主教徒和女新教教徒之间。见 E. Reigrotzki, *op. cit.*, pp. 69—70。

44. 关于维也纳,见 H. Tingsten, *op. cit.*, p. 154;关于柏林,见 Stephanie Munke and A. R. Gurland, *Wahlkampf und Machtverschiebung: Geschichte und Analyse der Berliner Wahlen von 3 Dezember, 1950* (Berlin: Institut fü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Duncker und Humboldt, 1952), pp. 175—176。关于法国的类似结果,见 Jean Stotzel, "Voting Behavior in Fra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955), p. 115。另见 Maximilian Meyer, "Der Nichtwähler," *Allgemeines Statistisches Archiv*, 22 (1931), pp. 520—521。

45.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收入他的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83 ff。在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讨论时,韦伯指出,职业政治家必须在经济上也是“无所求的”,亦即,他的收入必须不主要取决于他获得公职的能力。

46. 关于极端贫困如何削弱参加任何类型团体或政治活动之动因的出色论

述，见 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有关失业的各种研究也说明经济不安全感如何严重削弱人们给予政治的支持。见本章中有关的讨论。W. Matters, *Die Bayerischen Bauernrate: Eline Soziologische und 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uber bauernratePolitik* (Munchener Volkswirtschaftliche Studien, No. 144) (Stuttgart: J. 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1921), 其中讨论了农民政治参与的限制。

47. Genevieve Knupfer, "Portrait of the Underdo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 (1947), pp. 103—104. 另见 Roger Girod, "Facteurs de l'abstentionnisme en Suiss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3 (1953), pp. 349—376。

48. 见 H. Tingsten, *op. cit.*, p. 229; 前面提到的挪威 1957 年选举调查; R. S. Milne and H. C. Mackenzie, *Marginal Seat: 1955* (London: The Hansard Society for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1958), p. 69; Gabriele Bremme, *op. cit.*, pp. 231—239; Mattei Dogan and Jacques Narbonne, "L'abstentionnisme electoral en Franc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4 (1954), pp. 6—11; 以及 Maurice Duverger, *op. cit.*, pp. 15—20 and 26—46。

49. W. L. Warner and P. S. Lunt, *op. cit.*, pp. 337—338; H. Tingsten, *op. cit.*, pp. 146—147. 另见 Gabriele Bremme, *op. cit.*, p. 53; 以及 Maurice Duverger, *op. cit.*, p. 40。

50. Erik Allardt, *Social Struktur och Politisk Aktivitet* (Helsingfors: Söderstrom and Co., 1955), p. 38. 这些资料也简略地见于 E. Allardt and K. Bruun, *op. cit.*, pp. 55—76。

51. R. S. Lynd and H. M. Lynd, *Middlet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9), pp. 416—420。

52. Robert E. Lane, *op. cit.*, p. 26。

53. A. C. Kinsey, W. B. Pomeroy, and C. E. Martin,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948)。

54. 见 Jerome S. Bruner and S. J. Korchin, "The Boss and the Vote: Case Study in City Politics," *Political Opinion Quarterly*, 10 (1946), pp. 8—9, 22。正如这项研究所说明的，波士顿的柯利(Curley)市长，一名认罪的犯人，曾得到下层阶级的有力支持。[柯利(1874—1958年)：波士顿民主党领袖之一，历任波士顿市长(1914—1918; 1922—1926; 1930—1934; 1946—1950)、马萨诸塞州州长(1935—1937)、众议员(1911—1914, 1943—1947)，1947年因邮件欺诈案被判刑半年，由杜鲁门总统予以赦免。——译者注]

55. 见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收录于他的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2d ed., 1956), pp. 131—161。

56. E. H. Litchfield, "A Case Study of Negro Political Behavior in Detroi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 (1941), pp.267—274;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4), pp.493—494. 另见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Voting Behavior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York: mimeographed, 1946)。

57. 美国 1954 年选举资料见 A. Campbell and H. C. Cooper, *Group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and Votes* (Ann Arbor: Survey Research Center, 1956), pp.31—32。他们发现,工会工人比不在工会的同职业者,投票率高得多。1948 年、1952 年和 1954 年的选举也是如此。在英国,在格林威治的研究发现,工会会员投票的可能性比不在工会的工人大得多。见 M. Benny, A. P. Gray, and R. H. Pear, *op. cit.*, pp.181—188。

58. V. O. Key, Jr., *op. cit.*, Chap.10; F. J. Brown and J. S. Roucek, eds., *One America*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45), Chaps.15—16。

59. H. Tingsten, *op. cit.*, p. 215; C. E. Merriam and H. F. Gosnell, *op. cit.*, pp. 31 ff.; B. C. Arneson, “Non-Voting in a Typical Ohio Community,”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19 (1925), pp. 816—825; A. H. Birch, “The Habit of Voting,”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8 (1950), pp.75—82; R. Girod, *op. cit.*, p. 368; E. Allardt and K. Bruun, *op. cit.*, p. 75; Charles H. Titus, *Voting Behavior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5), p. 68. 另见 Robert E. Lane, *op. cit.*, pp.267—269。

60. J. Towster,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 S. S. R.—1917—194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97。

61. P. F. Lazarsfeld, B.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op. cit.*, pp.48—49; Alice Kitt and D. B. Gleicher, “Determinants of Voting Behavi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4 (1955), pp.393—412。

62. J. Dollard, *Caste and Class in a Southern Tow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7); G. Myrdal, *op. cit.*, Chap. 22. 1959 年 9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公民权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进一步证实这项禁令继续生效。

63. P. F. Lazarsfeld, B.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op. cit.*, p. 62; 正如第三章已注意到的,交叉压力理论是 20 世纪初由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首先提出的。这个理论第一次详细用于选举研究可以在 H. 廷斯顿的著作中找到;他在“社会重心定律”中指出,群体的参与程度随该群体在一定地区的力量增加而增加。见 H. Tingsten, *op. cit.*, pp.230—231。关于利用这个理论对美国近期研究所用的总结,见 Robert E. Lane, *op. cit.*, pp.137—203。

64. B. Berelson, P. F. Lazarsfeld, and W. McPhee, *op. cit.*, pp. 27, 130—131; M. Benney, A. P. Gray, and R. H. Pear, *op. cit.*, pp. 178—182; S. J. Korchin, *op. cit.*, Chap. V。

65. Martin Kriesberg, “Cross-Pressure and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3(1949), pp.5—16。

66. R. Schachtner, “Wahlbereditigte, Wahlbeteiligung, Nichtwähler und Falschwähler,” *Bayern in Zahlen; Monatshefte des Bayerischen Statistischen Amtes*, January 1952, pp. 18—21.

67. M. Benney, A. P. Gray and R. H. Pear, *op. cit.*, p. 127.

68. 见 R. S. Milne and H. C. Mackenzie, *Straight Fight* (London: The Thansard Society, 1956)。作者写道,在英国的选民中,“保守党选民读左翼报纸的数量大大少于工党选民读右翼报纸的数量。”(p. 96.)

在挪威,全部社会党选民有 69% 定期读非社会党报纸,有 28% 不读任何社会党报纸。在非社会党支持者中,只有 17% 读社会党刊物,而有 80% 以上读非社会党报纸。见 Stein Rokkan and Per Torsvik, “The Voter, the Reader, and the Party Press,” paper given at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Stresa, September 1959. 瑞典也有类似的报道,见 Jörgen Wseterstahl and Carl-Gunnar Janson, *Politisk Press* (Gothenburg: Political Science Institute, 1958), pp. 65, 89, 98. 关于这个问题和统计资料的一般性讨论,见 Herbert Tingsten, “The Press,” in J. A. Lauwerys, ed., *Scandinavian Democracy* (Copenhagen: The Danish Institute, 1958), pp. 316—328.

69. G. Myrdal, *op. cit.*, p. 715. 鉴于火车旅行在目前的衰落,普尔门(Pullman)式火车卧车的当代对应物可以是头等洲际客机、头等旅馆和价格昂贵的豪华饭店。

70. 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在分析 1948 年美国选举调查资料时发现,最高社会经济阶层的成员最可能具有均质环境。在工人当中,工会会员所处环境比非工会会员所处环境要均质性;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成员的环境比美国劳工联合会(AFL)成员的环境更一体化。因为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相比,一般在较大工厂工作,住在较大城市,而且 CIO 成员比 AFL 成员更具这些特点,所以工会会员所处环境具有较大均质性不能仅仅甚或主要归因于工会对环境的构建。不过,所有这些差别都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见 David Truman, “Political Behavior and Voting,” in F. Mosteller, H. Hyman, P. McCarthy, E. Marksm, and D. Truman, *The Pre-Election Polls of 1948*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No. 60, 1949), pp. 229—230.

71. 关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巴塞尔,见 H. Tingsten, *op. cit.*, pp. 126—127, 155—157; 关于柏林,见 Stephanie Munke and A. R. L. Curland, *op. cit.*, pp. 175—176; 关于英国,见 D. E. Butler, *op. cit.*, p. 208; 关于赫尔辛基,见 Erik Allardt, *op. cit.*, p. 136. 来自挪威前面提到的那次 1957 年未公布调查的资料也支持这一点。

72. 见 M. Meter, *op. cit.*, pp. 520—521; H. Tingsten, *op. cit.*, pp. 62, 120—181, *passim*; R. Girod, *op. cit.*, 特别见 Table V.

73. Erik Allardt, *op. cit.*, p. 34; E. Allardt and K. Bruun, *op. cit.*

74. Erik Allardt, *op. cit.*, p. 52.

75. 可是,在法国,投票的工人阶级妇女比投票的中产阶级妇女,有更大的可能像她们丈夫那样投票。见 Maurice Duverger, *La participation des femmes à la vie politique*, *op. cit.*, pp. 47—48。

76. 参见注释 59。

77. 见 S. M. Lipset and Joan Gordon, “Mobility and Trade Union Membership,”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pp. 491—500。

78. 引自 Erik Allardt and K. Bruun, *op. cit.*, p. 76。荷兰选民流动的资料显示,多流动的人较少去投票,这与交叉压力假说吻合。与父亲处于同一职业群体的被调查者,有 80% 去投票,而与父亲处于不同阶层的被调查者,只有 65% 去投票。父亲是白领的工人,有 53% 去投票(而与父亲同是工人的则有 78% 去投票);父亲是工人、自己是白领的,有 72% 去投票(而父亲是白领、自己也是白领的人,则有 84% 去投票)。关于其他国家的进一步讨论和资料,见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66—70。

79. B. Berelson, P. F. Lazarsfeld, and W. McPhee, *op. cit.*, pp. 96—97。

80. Maurice Duverger, *op. cit.*, p. 48。

81. 这不是“虚构的”发现。不管其他因素如何都成立。1957 年在挪威的斯塔万格城(Stavanger),即使在投票率低的工人阶级范围内,已婚男女的投票率也比平均值高——80% 对 76%。最低投票率出现在夫妻分居和离婚者中,甚至低于单身汉(见上面提到的那次未公布的挪威调查)。廷斯滕用这样的话概括了他对此有关的选举统计资料所进行的综合调查:“已婚者比未婚者显示更积极的政治兴趣。”*Op. cit.*, p. 229。另见 G. Bremme, *op. cit.*, pp. 56—58。

82. B. Berelson, P. F. Lazarsfeld, and W. McPhee, *op. cit.*, pp. 88—93。

83. Morris Janowitz and Dwaine Marvick, *op. cit.*, p. 94。

84. 根据前面引用的关于挪威状况的未公布的调查。

85. Davi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imits of Totalitarian Power,” 收录于他的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p. 414—425。

86. V. O. Key, Jr., *Southern Politics*, *op. cit.*, pp. 526—528; 以及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op. cit.*, pp. 642—643。

87. Francis G. Wilson, “The Inactive Elector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6 (1936), p. 76。

88. 见 Herbert Tingsten, *op. cit.*, pp. 225—226; 关于类似观点的新表述,见 W. H. Morris Jones, “In Defense of Apathy,” *Political Studies*, 2(1954), p. 25; D. N. Hogan, *El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45), pp. 275 ff.; Harold F. Gosnell, *Why Europe Votes*, *op. cit.*, pp. 208 ff。

89. 见里斯曼(Riesman)的评论,见 Herman Finer, Granville Hicks, and Da-

vid Riesman, "Political Apathy 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ound Table*, No. 657 (Oct. 29, 1950), pp. 11.

90. W. B. Munro, "Is the Slacker Vote a Menace?,"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17 (1928), pp. 80—86. D. 里斯曼评论说：“仅仅为了增加投票率而把梦游者带到投票站，无助于民主。”David Riesman, "Private People and Public Polic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5 (1959), p. 205.

91. *Ibid.*, pp. 102—103.

92. 见 Philip K. Hastings, "The Voter and the Non-Vo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1956), p. 307; 在一项基于与中产阶级人士 70 次深度交谈的研究中，多少有些相似的发现，见 Morris Rosenberg, "Some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Apath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8 (1954—1955), pp. 349—366.

第七章

选举：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¹

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就世界而言，可以作出的最重要概括是，政党不是主要以下层阶级为基础，就是主要以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为基础。这个概括即便是对美国的政党也是成立的。美国的政党历来被认为是个例外，不同于欧洲的阶级冲突模式。可是，民主党从其有史以来，就从社会的下层得到了较多的支持，而信奉联邦制的辉格党和共和党，则拥有较有势力群体的忠诚。²

当然，这种概括也有重要的例外，因为阶级仅仅是与政党支持相联系的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划分。在有不止一个重要宗教的各个国家中，或在宗教信仰与非宗教主义者有明显差异的地方，宗教差异有助于支持这一政党或那一政党。在某些国家，宗教信仰构成了致力于满足特定教会需要的宗教性政党得以建立的基础。同样，国内种族或民族的差异也在群体对特定政党的认同上有所反映，或表现为建立种族或民族的政党。不过，宗教和种族的差异是与社会经济差异相关的，因此，政党拥有的支持乃是阶级的支持和种族的支持的混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保守政党的支持者是生活富裕的人、圣公会和公理会一类有传统特权之宗教的成员和拥有最高地位（和超比例富豪）的种族群体。

地区性忠诚是影响政党支持力量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许多国家，某些地区形成了对这一政党或那一政党的传统忠诚，这种忠诚甚至在导

致它形成的具体事件失去其影响以后仍长期保持。

几乎在我们有资料的每个国家(或许美国除外),妇女往往比男人更支持保守政党。但这种关系与前四点多少有些不同,因为不能认为妇女支持的政党代表妇女利益,不代表男人利益。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大概是妇女的不同社会作用,以及由此使她们接受认同于保守政党价值的方式。

影响政治见解和忠诚的第六个明显的因素是年龄,这将在第八章作较详细的考察。不过,与其他因素不同,在年龄与政党支持之间没有确定的相关性。在某些国家和某些历史时期,年轻选民(或年老选民)可能站在左翼一边,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另一些历史时期,他们可能比较保守。不同年龄组是按照各自世代的重要经验对各自的政治环境作出反应。分析政党支持必须把年龄作为政治分歧的一个影响源加以考虑,但政治冲突不能解释为年龄冲突。

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国家构成了产生分歧的另一个基础。在某些国家,乡村居民是独立的农民政党的骨干,而在另一些国家,农民认同于其他主要政党。把乡村独立划分出来,并认为它必然与社会其余部分对立,这种观念掩盖了如下事实,即大多数乡村社会与城市地区一样内部存在贫富差异,有种族集团、宗教集团和地方集团之分。农作物区之间的差别也曾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歧源,例如,在许多国家,麦农常常比种植多种作物的农民激进得多。

正如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acIver)所指出,多种利益和许多不是社会阶级的群体参与政党斗争,这一事实并没有损害“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取决于从左到右意见的联合”这一论点。“右翼政党总是与上层阶级或统治阶级利益相联系的政党,左翼是代表经济或社会地位上的下层阶级的政党,而中间派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政党。从历史角度看,这个判别标准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保守的右翼维护他们牢牢把持的特权和权力;左翼攻击这些特权和权力。右翼更赞成维护贵族地位、血统或财富的等级制;左翼则为争取利益均等或机会均等而斗争,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的要求而斗争。一方面是维护,一方面是攻击,这两方面在民主的条件下不是以阶级的名义而是以原则的名义进行斗争;不过,对立的原理大致对应不同阶级的利益。”³

“左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这样的修饰词与它们的反义词“右的”、“保守的”和“反动的”,是根据许多不同的争论问题定义的,如政治民主制

与君主制,自由市场制与传统的经济限制,世俗主义与教权主义,土地改革与地主所有制和城市对农村的剥削,社会改革与放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这些争论问题之一看属于“左的”政党和社会集团,从另一争论问题看决不总是“左的”。“中间派”的表现是既反对左翼政党,又反对右翼政党。不过,在某一特定时期或地点,确定政党在从左到右连续谱上的位置通常是可能的。⁴

在平等和社会变革上的争论是大多数国家过去两三代人时间里的主要争论,并与民主制与君主制、教权主义与世俗主义一类老的左—右争论交叠在一起。今天,贯穿左右两派的最重要争论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治民主与极权主义。⁵在某些国家,正如我用大量资料证明的,大多数传统的左翼选民支持极权的共产党,而在另一些国家,传统的中间派和右翼选民支持各种形态的“法西斯主义”。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选民心目中主要关心的仍是左右之间的经济争论和层次化争论。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的在于,政党斗争是阶级冲突。政党支持者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实是,几乎在每个经济发达国家,属于低收入群体的选民都主要投左翼政党的票,而高收入的选民主要支持右翼政党。

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异在许多国家有典型性,表 7.1 和表 7.2 以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支持资料对此作了说明。在这两个国家,工业和农业的工人强烈支持共产党,在意大利还支持左翼(南尼)的社会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支持中间派政党和右翼政党。

表 7.1 法国不同职业群体对各政党的支持

	1956年*						
	产业工人	农业工人	白领	公务员和教师	商人	农场主	专业人员
共产党	39%	37%	16%	14%	7%	5%	11%
社会党	31	19	33	48	21	17	23
激进党	11	13	7	21	12	13	20
人民共和运动(天主教)	8	9	21	9	17	14	13
独立党	3	17	11	3	21	45	20
共和派社会行动联盟 (戴高乐)	4	—	10	5	3	4	8
布热德	4	4	2	—	19	2	5
总计	100%	99%	100%	100%	100%	100%	100%
(调查人数)	(169)	(67)	(61)	(58)	(81)	(180)	(64)

(续表)

职业 经济水平	1955年**						
	产业工人			A	农民		
	B	C	D		B	C	D
高于平 均水平	平均	贫困	富裕	高于平 均水平	平均	贫困	
政治选择							
共产党	18%	40%	45%	4%	9%	27%	43%
社会党	41	27	22	12	28	14	10
激进党	4	7	5	9	12	24	10
人民共和运动	17	7	10	12	12	10	10
独立党	18	15	18	60	30	23	26
法兰西人民联盟(戴高乐)	2	5	—	3	8	1	—
总计	100%	101%	100%	100%	99%	99%	99%

* 由作者根据一次法国民意测验的数据卡计算,这次民意测验是由法国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所于1956年5月进行的。感谢阿兰·吉拉德(Alain Girard)慨然允我使用资料。

** 经再次计算,原始资料来源:J. Stoezel "Voting Behavior in Fra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1955), pp. 118—119.

表 7.2 意大利的职业与政党选择*

(1953年——仅男性)

	职 业									
	雇员	农 业			手艺人	白领	工人 (社会经济水平)			
		专业 人员	大农 场主	小农 场主			交租 的农民	农业 工人	中等	下等 偏上
共产党	—%	5%	4%	33%	58%	7%	5%	24%	31%	53%
南尼的左翼社会党	6	5	4	10	11	17	3	16	32	25
萨拉盖特的右翼社会党	11	5	15	3	2	15	26	12	13	3
共和党	2	5	—	—	—	4	—	4	1	—
基督教民主党	41	29	41	33	17	23	42	36	10	9
自由党	22	29	10	2	—	4	—	4	—	3
拥护君主制者	6	14	10	8	—	15	13	—	5	3
新法西斯主义者(M. SI)	11	9	15	11	12	15	11	4	8	3
总计	99%	101%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调查人数)	(46)	(21)	(71)	(61)	(64)	(53)	(38)	(25)	(78)	(32)

* 由作者根据一次意大利民意测验的数据卡计算,这次民意测验是由国际舆论研究所为 MIT 国际研究中心进行的。

虽然这种一般的模式可以成立,但在收入群体内部有很大的变异。就中等收入群体而论,白领工人和教师在法国强烈支持温和的社会党,而在意大利则强烈支持萨拉盖特(右翼)的社会党。在两国的低收入群体间也有相当大的变异,表 7.1 和表 7.2 显示了这种变异。工人的经济水平越低,越可能支持共产党。收入较高的工人更喜欢温和的社会党或中间派政党。

同样的模式在稳定的两党制国家也成立。如表 7.3 所示,在英国,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层次越高,对工党的支持越少,进入大工商业者和高级专业人员阶层,这个党得到的支持不到 10%。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力量也显示差不多一样的模式,第九章对此将作详细论证。

表 7.3 英国不同职业人员投工党或保守党票的估计百分比

1951 年*

工商业类	保守党(%)	工党(%)
大工商业	80	8
中等工商业	73	10
小工商业	64	15
管理人员	65	19
专业人员类		
高级专业人员	78	6
低级专业人员	52	24
白领类		
高级职员	63	13
低级职员	48	29
中间状态类	41	39
体力工人	28	51
全体成年居民	40	41

* John Bonham, *The Middle Class Vote* (London: Faber & Faber, 1954), pp. 129 and 173. 体力工人的数字是根据第 173 页上的图表推算的。所有数字都是根据英国民意研究所的调查资料估计。两大党得票百分数不到 100% 是因为有不投票的和投第三党票的。

阶级地位普遍影响政治态度的更引人注目的证据来自一个不存在真正政党竞争的国家——共产党的波兰。1957 年,年轻的波兰社会学家安德列伊·马列夫斯基(Andrzej Malewski)就人们对不同职业在收入上有相当程度差距的态度——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个明显区分左翼观点和保守观点的问题——作了一次民意测验。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他发现:“在人民的收入与他们对最大尺度收入差距的看法之间有明显关系……这次民意测验显示,工厂工人、技术人员和某些低薪金的知识分子

群体(教师、邮政工人、社会服务人员等)支持平均主义。但是,在有可能得到高收入的人中,相反的态度占优势。”在极端情况下,被调查的波兰工人有54%支持相对平等的收入,而行政官员的这个比例是20%。后者中有55%的人强烈反对急剧缩小收入差距,但体力工人中的这个比例只有8%。由此看来,在共产党国家,特权阶层与无特权阶层的斗争也反映在态度上,这些态度类似于西方相似地位阶层的态度。一个主要区别是,在共产党国家,“无论支持限制收入差距的,还是持反对态度的,都往往利用传统的左派口号”⁶。

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模式,最简单的解释是自身的直接经济利益。左翼政党声称自己是按平等方向搞社会变革的组织;低收入群体支持它们是为了改善经济境遇,高收入群体反对它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可以把上述统计事实作为阶级因素在政治行为中起重要作用的证据。

然而,阶级地位(通过教育、收入、社会地位、权力、职业或财产地位来衡量)与政治见解或政党选择之间的这种关系远不是固定不变的。许多穷人投保守党的票,有些富人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关于这种偏离,已经提出过部分解释:诸如宗教信仰之类其他特点和群体关系,在特殊情况下会比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起更大作用。不过这也是分层系统本身复杂性的一种后果。在现代社会中,因为人们在阶级结构中有全然不同的境遇,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经验,受到不同的压力,而这些不同的经验和压力可以造成相互冲突的政治后果。有些人可以拥有权力,如某些公务员,但他们的收入或地位却是低的;有些人可以享有很高的职业声望,如许多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却是低收入;还有些人享有相对高的收入,但社会地位却是低的,如某些种族少数派的成员,或工商业暴发户等。上述这些人的社会境遇的某些方面可以使他们成为保守派,而另一些方面则可以使他们支持比较左的政治观点。当面临两种冲突的社会压力时,某些人会有一种压力比对另一种压力作出更多的响应,于是显示出偏离阶级投票模式的情况。

这些相互冲突、相互交叠的社会境遇对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左翼政党的损害可能大于保守的右翼政党。人们总在力争被人赞许地看待自己,因此,他们地位归属的某些方面将产生讨人喜欢的自我评价,而另一

些方面则产生相反的自我评价。所以设想人们将按能最大限度实现他们对他人的优越感的方式,调整他们对自身所处环境和自己本身的看法,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例如,白领工人将强调白领的工作与中产阶级有一样的地位(这一点后面还要作进一步讨论);低收入的白人工人将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等等。在研究社会流动时所收集的各种证据表明,职业上向上升迁的人寻求摆脱仍然使他们与其过去地位相联系的特征。事业上成功的人,事实上常常会变换他的邻居,试图找到更高地位的新朋友,或许也会脱离他的教派加入其成员地位较高的教派,还会在投票时变得比较保守。比较保守的政党与居民中比较有威望的阶级有一致的利益,可见,财产有助于战胜左翼政党对要求经济利益的下层阶级的呼唤。

虽然根据具体的地位差别并不总能预测左或右的政治倾向,但地位差别这一概念本身凸显了来自不同社会地位之间张力的政治价值变化的根源。地位差别甚至可以使老的正在衰落的上层阶级,在政治态度上变得比较自由。例如,大多数英国政治观察家曾指出,托利党社会主义——英国19世纪保守主义自愿进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的出现,是英国老的地主贵族统治敌视上升的工商阶级的产物,后者当时威胁着前者的地位和权力。关于美国类似上层阶级自由主义的某些根源将在第九章作比较详细的讨论。

然而,尽管较有特权阶层在政治行为上的变异是比较令人关注的政治分析问题之一,但是允许我们说明为什么人们有不同政治忠诚的可供利用的可靠证据,主要限于居民中占比例最大的部分,特别是工人和农民。民意测验和不同农村地区投票模式的研究,可以根据统计资料谈论不同类型的工人和农民,而对于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迄今尚不能在国际比较水平上作类似研究。因此,关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政治归属变化的讨论只能限于美国的材料。本书下一部分(见第九章和第十章)将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本章主要讨论下层阶级和人数较多的阶层的政治学问题。

表7.4概括提出了与低收入群体政治行为变异有关的社会特点;这里的低收入群体是指其生活水平从贫穷者直到刚刚达到当地中产阶级水平的人,即大多数工人、农业工人、低级白领工人等。在进行国际政治行为比较时,要作出比较准确的分类是困难的。

表 7.4 与不同国家低收入群体给予左翼不同投票支持有关的社会特点*

左翼得票率高	左翼得票率低
大城市	小城镇、农村
大工厂	小工厂
失业率高的群体	失业率低的群体
少数派种族群体或宗教群体	多数派种族群体或宗教群体
男人	妇女
经济先进地区	经济落后地区
体力工人	白领工人
特殊职业： 矿工	特殊职业： 仆人，服务业工人
捕鱼人	农民，仅能维持生活的农民
商业性农民	
海员、码头装卸工人	
林业工人	
非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 背离其中某些模式的主要例外将在下面讨论。

表中的概括是基于来自许多国家、经过研究的民意资料或调查资料，这些国家包括美国、阿根廷、智利、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和匈牙利。⁷

投票支持左翼：对群体要求的响应

投票支持左翼一般被解释为不满的表现，即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显示。投票行为的研究者曾指出，下述要求是主要的：

(1) 要求收入有保障。就此而论，这与渴望得到较高收入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过这里本来是指周期性失业或产品价格暴跌之类似乎有重要意义的现象。

(2) 要求工作满意——工作作为自我控制和自我表现提供机会，不受专横武断的权势的影响。

(3) 要求地位，要求个人价值得到社会承认，要求在社会关系中不受地位低下的对待。

收入无保障

属于低收入类的某些职业群体，收入极端无保障——种植单一作物的农民、渔民、矿工和伐木者；这些群体有投票支持左翼的历史，而且显示高投票率。

“暴涨—暴跌”农业经济典型见于北美的小麦种植区。涝灾或旱灾，或者既涝又旱，一代代都在打击这个麦区，因为它是固定的。关于这个地区的政治行为，已经作过许多研究，而且所有研究都一致认为，在经济危机时期，麦农是各类农民中最左的。他们构成了大规模农民激进运动的核心，如美国的绿背党人、人民党、无党派联盟，加拿大的进步党、社会信用党、平民合作联盟。⁸在北美，唯一超越地方性的社会主义政府是萨斯喀彻温——一个单一麦区——平民合作联盟的省政府。

对世界其他地区单一作物商业性农民的研究显示，他们也倾向于支持性质上(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常常是集权主义的间发性抗议运动。⁹相反，种植多种作物的农民，与其说他们依靠世界市场，不如说依靠地方市场，这样的农民往往支持保守政党，甚至收入水平稳定、可靠、属于最贫困阶层的自给自足农民，也倾向于支持保守政党。

面向国内或国际市场的渔民，基本上与麦农的境况相同，在世界范围内，都投票支持左翼运动。在挪威，从渔业区选出了第一批工人议会代表。¹⁰在冰岛，渔民支持斯堪的纳维亚第二大党共产党。¹¹安德烈·西格弗雷德(André Siegfried)在他关于法国西部1913年投票统计资料的开拓性研究中发现，渔民是一个强大的左翼群体。¹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渔民强烈支持左翼工会。¹³美国西海岸的渔业工人素富斗争性，他们参加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尽管他们大多数有自己的船或拥有船的股份。五大湖区的渔民有超比例的民主党党员。英国的渔业区是工党的据点。¹⁴

矿工属于工人阶级中遭失业威胁最大的群体，前面已经提到，他们是全世界最左的群体之一。在英国1950年选举中，全国矿工工会提名的工党候选人，有37%以73%的中等得票率当选。¹⁵在加拿大，不同时候选举一名社会主义者的唯一一个东部地区是新斯科舍省的一个煤矿区；一度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进入省立法机关的唯一一个选区是魁北克省的一个金属矿区。美国的研究显示，煤矿工人是民主党最一贯的支持者。¹⁶

在法国，国有化企业的工人选举支持劳资协议会(Works Councils)的

代表；煤矿的井下工人有 80% 投票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法国总工会，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工人群体——铁路、高速交通、公用事业、造船业、飞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工人——都高。来自德国的资料表明，在 1933 年以前的选举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劳资协议会的选举中，矿区主要支持共产党。¹⁷ 1947 年智利选举的社会生态研究显示，共产党这个小党在矿区最有力量。煤矿区、铜矿区和其他矿区的选民，有 50% 到 80% 支持共产党，而全国范围共产党的得票率只占 10%。¹⁸

伐木工人也受严重周期性经济涨落的影响。在瑞典，共产党在伐木区的得票率高于大工业中心。¹⁹ 1952 年奥地利省级选举结果的研究显示，林业工人有 85% 投票支持社会党。²⁰ 加利福尼亚和密歇根的资料表明，伐木区比其他地区更支持左翼候选人²¹；伐木工人在老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 W. W.)中占有重要地位。

剪羊毛业是一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伐木业的职业，不仅经济上无保障，而且与社会隔绝，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极广阔的牧区，牧场通常远离居民中心。剪羊毛工住的营地颇似伐木工的驻地，剪羊毛时要在牧场住一段时间。工人是流动的，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据报道，他们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虽然所报道的投票资料没有就牧场工人的投票情况单独分出，但有关他们工会行为的报告指出，这类工人是有斗争性的和激进性的。²²

普遍的萧条广泛地造成经济上的不稳定。在 1932 年和 1936 年选举中，受到大萧条沉重打击的美国农村是最强烈亲罗斯福的。调查资料指出，在 1936 年和 1940 年，接受救济的低收入者最强烈支持民主党的，占全部低收入者的 80% 以上。²³ 1944 年对政治态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从来没有失过业的美国体力工人中，有 43% 是“保守的”，而在有一年以上失业经历的体力工人中，这个比例只有 14%。²⁴

类似的调查结果也来自英国的报道——一个地区的失业率越高，工党得到的选举支持越强。而且，20 世纪 30 年代的失业规模在 1950 年这个充分就业年仍然在影响投票行为——那些在 1945 年到 1950 年工党得票率下降最少的选区是萧条时期失业率最高的选区。²⁵ 芬兰同样是这样，萧条时期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在 1951 年到 1954 年最支持共产党。²⁶ 在德国，失业率直接与共产党在 1932 年选举中的得票率相关。1956 年法国一

项民意测验表明,共产党工会运动——法国总工会——的成员有62%在过去某段时间失过业,在社会党工人力量(Force Ouvrier)的成员中,这个比例是43%;在天主教成员中,这个比例是33%。²⁷

美国的白领工人比较保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工作有较大保障。1930年,白领工人大约只有4%失业,而同期城市不熟练工人的失业率是13%。1937年,前者有11%失业,后者有1/4失业。²⁸在德国,中产阶级群体受战后经济危机的影响比美国大得多。德国的白领工人往往转向法西斯运动,而不支持空谈重视无产阶级的左翼政党。²⁹

工作不满意

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者常常指出,除了工资和保障以外,工作状况本身的性质是导致满意或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小工厂工人在他人控制下过日子,时常受到随意的惩罚。大生产企业的工人有一环套一环的机械性的任务,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几乎不可能培养创造能力。³⁰

由此可见,管理当局越随意,工作越单调,工人会越不满意,越会支持旨在社会变革的政治运动。还有证据表明,工厂越大(因而工作一般分得越细),工人越左。对1933年以前德国大城市的一项选举研究发现,大工厂中工人比例越高,共产党得票率越高。³¹美国印刷业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左翼政治力量与车间大小有关。³²

一般地说,几乎在任何地方,体力工人中熟练工人越多,其中的保守力量就越强。不过,除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差别之外,工作称心如意和工作的创造性是否单独影响政治行为,仍有待证实。

地位

在工作属于低级职业的那些人方面,被剥夺感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激进主义,并不仅仅是起因于客观的经济状况。所有各种社会都由于地位(声望)以及经济报酬而分层。虽然地位和收入往往是相关的,但两者远不是一致的。地位涉及令人厌恶的级别——规定一些人和群体比另一些人和群体优越或低贱,根据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并不能导出人会泰然接受一种低下的社会评价。因此,只要有可能的话,人们就会设法要么通

过个人努力(社会流动)提高自己的声望,要么通过某种集体行动改善所在群体的地位。如果自身利益表现为渴望改善物质生存条件的动机,那么地位低的人对社会制度和声望高的人的态度就会表现为不满和怨恨。³³

公职人员、推销员、办事员、小官吏等对工人缺乏尊重,以及中产阶级社会普遍无视工人的经济贡献和个人能力,无疑加剧了工人对现状的不满,促使他们倾向左翼政治运动。

虽然声望低加收入低或声望高加收入高集于一身,可以强化人的左的或保守的政治动机,但单独一个因素使人的相对级别地位过高或过低的情况,正如已经注意到的,有助于解释表面看上去的异常行为模式。在我们有资料的所有各种社会,白领工人比体力工人得到的声望多,并在许多方面(服饰、言谈、家庭模式)认同于系统中地位更高的阶层,即使在他们的收入不高于熟练体力工人时也是如此。³⁴许多研究显示,不同国家的白领工人投票支持偏保守政党的可能性比体力工人大得多——通常,他们取中间立场,在左—右尺度上介乎工商业阶层与体力工人之间。³⁵白领工人的这种较强的保守倾向并不仅仅起因于较高的收入。1949年挪威选举的一项投票研究显示,在同一收入水平,左翼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在体力工人中的得票率几乎是在白领工人中的得票率的一倍,见表7.5。在德国,对政治上从属关系的一项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结果。³⁶

表 7.5 挪威工党和共产党在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收入层次的得票率——1949年*

年收入(克朗)	产业工人	白领工人
4 000 以下	56(%)	35(%)
4 000—7 000	70	28
7 000—12 000	69	24
12 000 以上	— **	13

* A. H. Barton, *Soc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Planning in Norway*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4), p. 327.

** 太少,微不足道。

美国的一项“阶级身份”研究为地位动机在白领政治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直接证据:白领工人中有61%自称是“中产阶级”,而体力工人的这个比例只有19%。这种自我标榜在白领工人的政治态度上显示有巨大差别——自称“中产阶级”的白领工人有65%显示保守的态度,而自

称“工人阶级”的白领工人，这个比例是 38%。自称阶级身份在体力工人政治态度上所显示的差别要小得多——自称“中产阶级”的体力工人有 37% 持保守态度，而自称“工人阶级”的体力工人，这个比例是 25%。³⁷

关于白领工人的政治作用，在德国有深入的研究，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在抽样调查时代到来之前。³⁸ 利用一些地区可以得到的投票统计资料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在 1929 年大萧条冲击下，白领工人投票支持的政党在中间派政党和纳粹党之中变化。³⁹ 城市白领工人失业率与纳粹党得票率存在明显的相关性。⁴⁰ 德国人对此所作的一般解释是，纳粹党显示了克服经济危机、同时又维护白领工人地位的希望，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以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向他们提供经济利益。⁴¹

不同国家工人投票方式的某些变化，有可能用等级地位制度森严性的差别加以解释。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工人支持不同政党的资料都表明，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可能投票支持左翼党。但是在德国和瑞典，最低阶层的工人最可能支持非工人性质的政党，而工人阶级中的较高阶层较倾向于支持左翼党。⁴² 一个德国工人的样本显示，就每个人技术熟练程度来说，月收入多于 250 马克的工人比收入少于 250 马克的工人，有更大可能支持左翼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各个组的工人都有差不多一半支持左翼党，但在非熟练、低收入组中，这些党得到的支持最少（45%），而在熟练的、收入较多的工人中，得到的支持最多（65%），见表 7.6。

表 7.6 德国男性工人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百分比——1953 年*

熟练程度和收入	人 数	百分比	调查总人数
熟练工人		61%	(230)
月收入 250 马克以上	65		(140)
月收入 250 马克以下	55		(94)
半熟练工人		58	(209)
月收入 250 马克以上	65		(113)
月收入 250 马克以下	50		(96)
非熟练工人		51	(97)
月收入 250 马克以上	59		(42)
月收入 250 马克以下	45		(55)

* 根据设在德国科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所 (UNESCO) 慷慨提供的 IBM 数据卡，专门为此项研究作了计算。原始资料来源：1953 年德国人口调查。

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两个国家工人的不同状况缺乏较详细的调查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这些引人注目的异常现象可能是鲁莽的。一些比我更熟悉欧洲不同部分生活的人所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在德国或许也包括瑞典，工人阶级上层存在较多的挫折和失败，这严格地说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西方世界地位分化最分明的国家。在它们那里，直到进入20世纪，贵族仍拥有权力和影响，人际关系仍然相当明显地反映对地位的强调。地位的优劣以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表现出来。相反，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法国，由于君主政体的衰落或不存在这种政体，地位差别的重要性已经减少。而且，强调地位差别，就受其影响的大小而论，比较熟练的、收入较多的工人可能较多，而比他们地位更低的阶级兄弟可能较少。虽然熟练工人比其他工人日子好过，但正是他们经济上的成功，使他们比其他工人受到中产阶级更明显的排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境况类似于成功的黑人或犹太人生活在社会性歧视他们种族的社会中。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更可能意识到并进而不满他们地位的低贱，而工人、黑人或犹太人的下层群体，则较少可能感受到地位的剥夺。

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尝试性假说：一个社会以地位维系的社会关系越开放，越可能使收入高的工人在政治上变保守。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相对的经济剥夺将在工人当中引起分化，就像美国和澳大利亚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工人的上层将感受到被剥夺，因此支持左翼政党。这些假说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是个未解决的问题。不过，政治行为上存在这些差别是个事实。为了解释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我们需要作更多的研究。

第二种涉及声望的等级制度是基于宗教或种族的差别。少数派宗教、民族和人种，通常受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因此，少数派群体中的低收入成员，要取得经济的和社会的成就面临额外的障碍。但是，贫穷的多数派群体之成员，可以在他的种族的或宗教的“优越”地位中得到满足来补偿。所以，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低地位种族群体或低地位宗教群体的高收入成员，就其境遇来说，类似于生活在“封闭”等级制度的那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上层。

在英语系的国家中，研究显示，在各种基督教派别中，教派成员平均社会经济地位越富裕，该教派的低地位成员越可能投票支持较保守的政

党。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属于英国圣公会(美国新教圣公会)一类富有教派的工人比属于较贫穷教派的工人,有更大可能支持保守政党。

同样,属于天主教派或浸礼教派一类相对不富裕教派的中产阶级选民比属于其他教派的同一阶级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工党或民主党。一项英国的研究报道,在1951年选举投票的产业工人中,天主教徒支持工党的百分比是73%,新教教徒的这个比例是64%,圣公会成员是43%。“投票支持保守党的圣公会成员的比例差不多正好是非圣公会成员支持保守党的比例的一倍;投票支持保守党的产业工人中,有3/5是圣公会成员。”⁴³

在澳大利亚,1951年和195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资料表明,干城市非体力工作的天主教徒,有近50%支持工党,而干类似工作的圣公会成员,这个比例不到30%。同样,在这个国家的体力工人中,天主教徒比其他任何教派的教徒都支持工党。⁴⁴

在上述所有国家,犹太人虽然比较富裕,但政治上属最不保守的派别;这个模式在西方许多非英语系国家也成立。奥地利的选举资料显示,维也纳的犹太人区,虽然住的是中产阶级,但在1933年以前的多次选举中,都超比例地支持社会党。⁴⁵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投票研究也表明,该城犹太人占优势的地区是社会民主党的强大中心。⁴⁶对于犹太人支持左翼政党的投票模式,与其解释为出于其宗教信条的固有因素,不如解释为他们低贱的地位处境(社会歧视)。⁴⁷

宗教隶属关系对政治忠诚的不同影响并不仅仅出于不同教派当前的地位处境。在一些国家,被确定为国教的教会受到国家的保护,并与拥有土地的贵族相结合。这些教会常常为寻求捍卫或保留宗教权利和影响、免受左翼和反教权政治运动的攻击的宗教性政党提供基础。例如,在天主教的欧洲,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超比例地投票支持保守的政党和天主教政党,而中产阶级的新教教徒、犹太人和思想自由的人则较左,甚至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⁴⁸

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欧洲国家,政治行为模式与宗教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在表7.7中看到。表中清楚地显示,参加教会的人与没参加教会的人,在政党选择上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在法国,参加宗教活动的天

主教徒有 68% 支持人民共和运动和独立党这两个政党——都是保守的——之一，但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有 56% 支持共产党或社会党，“态度冷淡的”天主教徒的这个比例是 63%。新教教徒样本中的人数不足以对参加宗教活动的程度作出区分，但是在这个以前受迫害的少数派中，有 39% 的成员支持左翼政党，另有 34% 的成员支持激进党——自由的反教权政党。在不信仰宗教的人中，有 79% 支持马克思主义政党。

表 7.7 宗教和参加教会活动者的政党选择

法国——1956 年*						
	天主教徒			新教教徒	非教徒	
	参加活动	不参加活动	冷淡			
共产党	2%	17%	18%	5%		49%
社会党	9	39	45	34		30
激进党	10	17	17	34		8
人民共和运动	34	4	2	7		1
独立党	34	14	12	10		4
法兰西人民联盟	6	3	2	2		1
布热德	5	6	4	7		6
总计	100%	100%	100%	99%		99%
(调查人数)	(609)	(507)	(168)	(41)		(144)

荷兰——1956 年**							
政党选择	天主教派		温和的新教教派		加尔文派		非教徒
	是否参加教会活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天主教人民党	94%	52%	—%	—%	—%	—%	1%
社会党	3	30	22	51	2	27	75
反革命党(加尔文教派)	—	6	17	6	90	63	—
基督教历史同盟(温和的新教教派)	—	—	45	19	3	—	—
自由党	—	9	7	18	—	—	11
共产党	—	—	—	—	—	—	7
从加尔文教派分裂出来的组织	—	—	5	3	1	5	—
其他	2	3	4	3	4	5	6
总计	9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调查人数)	(329)	(33)	(134)	(236)	(101)	(22)	(218)

* 作者根据法国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所 1956 年 5 月一次民意测验的 IBM 资料卡计算。

** 作者根据荷兰公众舆论研究所 1956 年 5 月一次研究的 IBM 资料卡计算。

在荷兰,可以得到3个主要宗教集团中教会活动参加者的资料。这3个教派在投票选择上同样清楚地显示了引人注目的差别。⁴⁹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有94%支持天主教政党;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这个比例只有52%,另有30%支持社会党。在加尔文派成员中,参加宗教活动的有90%支持加尔文派反革命党,而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这个比例是63%。温和的新教成员是否参加宗教活动,反映在投票选择上的差别,远不像上面那样显著;他们的宗教模式颇似美国新教的模式,因此几乎没有社会压力要求他们投票支持代表新教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宗教活动的新教成员,有45%支持温和的新教政党基督教历史联盟,而在不参加宗教活动的新教成员中,这个比例是19%。

在联邦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过一个宗教政党基督教民主党与直接政治行动发生联系。同样,参加教会活动越多的教徒,越可能支持宗教政党。⁵⁰

在报道这些国家的宗教影响时,我们虽然省略了其他因素,但重要的是注意到,在每个宗教派别内,阶级因素继续在起作用。像在荷兰和联邦德国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中一样,在法国的天主教徒中,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也主要是体力工人。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就所受到的来自宗教地位与阶级地位之间冲突的压力来说,这些国家的工人大大多于中产阶级成员。虽然大多数信仰宗教的工人,至少就投票选举而论,可以通过支持宗教政党挣脱这种压力,但仍然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派,特别是在不诚心参加教会活动的教徒当中,支持社会党。这种压力可以使某些工人跻身于思想自由的人的行列。

正像在许多欧洲国家中那样,如果宗教集团与反教权政党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因素,则在不同政党支持者的性别构成上也会显示重要差别,因为在西方世界,各地的妇女都比男人更笃信宗教。⁵¹在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其他国家,反教权政党,像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自由派政党一样,从男性选民得到的支持也远多于女性选民。在联邦德国,据1953年的调查,所有投票支持社会党的选民,有60%是男人,而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选民,有58%是妇女。⁵²可是,在美国,信不信宗教本身不存在冲突,所以男人和妇女给予两党的支持也没有区别。⁵³

在不同国家,受到社会或经济歧视的许多少数派种族和少数派宗教,都支持较左的政党,但这种模式最常见于犹太人中。在美国,黑人少数派

往往比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更支持民主党；诚然，在黑人群体内部，经济地位几乎与投票行为无关。⁵⁴另一些例子可以在亚洲找到。在印度，安德拉人，一个人数众多的语言少数派，属于共产党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列，而在主要说安德拉语的锡兰，共产党则在说印度语的少数派中超比例地强大。⁵⁵在日本，说朝鲜语的少数派相当支持共产党。⁵⁶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派和叙利亚的基督教少数派，都相对亲共产党。⁵⁷

影响投票支持左翼的社会条件

即使一群人在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下正受到某种剥夺，也不能自然而然得出如下结论：他们将支持旨在社会变革的政党。有3个条件可以促进作出支持这种政党的反应：有效的沟通渠道；对个人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没多大信心；缺乏与保守政党的传统渊源。

沟通渠道

最重要的条件，或许是在存在共同问题的人之间有充分的沟通。这种人之间密切的个人接触，可以提高他们对利益的一致性以及采取包括政治行动在内的集体行动来解决共同问题的可能性的认识。当非正式接触得到正式组织——有组织者、发言人、报纸等各种机构的工会、农民团体或阶级政治运动——的补充时，政治意识将进一步被强化。

例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曾证实，在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中，加入社会组织或其他性质组织的成员增强了投票支持美国共和党的趋势。同样，在下层社会经济群体中，“投共和党票的，在工会会员中只占31%，而在非工会会员中占53%”。⁵⁸工会会员有较大的政治兴趣，更愿意投票支持左翼政党，这已为许多国家中的研究所证实。⁵⁹

我们已经讨论过不同国家的几种收入严重无保障、强烈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职业群体——单一作物的农民、渔民、矿工、剪羊毛工和伐木工。在这些群体中，不仅个个都有对社会不满的充分理由，而且，正如前面已详细指出的，还个个都存在一种有利于群体内的沟通、不利于各阶级间沟通的社会结构，即一种“职业共同体”。

与这些群体相反,服务业一般是散布在他们为之服务的富裕居民中的小单位,它们的工人不仅往往在政治上不太积极,而且比较保守。众所周知,白领工人缺乏组织意识和阶级觉悟,这可能也部分是由于他们工作在小单位和出入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缘故。⁶⁰

与投票支持左翼相关的两个一般社会因素是工厂的规模和城市的大小。我们已经注意到,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选举中,工厂规模与左翼政党的得票率有相关性;这一结果在1953年德国的一次调查中再次出现,见表7.8。在工人中,投票支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比例,随工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10个工人以下的小厂中,有28%的工人投票支持左翼政党,而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这个比例是57%。相应地,在表中所列各类较大规模的工厂中,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保守政党的得票率都较低。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是,无政党选择的工人的百分比也随工厂规模的扩大而减小;这反映存在两种压力:一方面是要要求投票支持左翼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仅仅是要求参加投票的压力。较早的研究还发现,在整个城市规模与左翼得票率之间有某种关联。⁶¹

表 7.8 男性工人投票支持不同政党的百分比与城市和工厂规模大小的关系

(德国——1955年)*					
城市规模	投票支持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百分比				(调查人数)
2 000 人以下	43%				(453)
2 000—10 000 人	46				(587)
10 000—100 000 人	51				(526)
100 000 人以上	54				(862)
(德国——1953年)**					
政党选择	工厂规模(工人数)				
	10 人以下	10—49 人	50—299 人	300—999 人	1 000 人以上
社会党和共产党***	28%	40%	45%	45%	57%
基督教民主党	22	20	18	22	15
资产阶级政党	21	16	13	7	5
无政党选择	26	22	23	22	15
总计	97%	98%	99%	96%	92%
(调查人数)	(134)	(116)	(163)	(124)	(130)

* E. M. N. I. D., *Zur Resonanz der Parteien bei Männern und Frauen in den Soziologischen Gruppen* (Bielefeld), p. 4.

** 作者根据设在德国科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卡计算。

*** 共产党得票率少于2%。

德国的一项研究(1955)显示,除了有独立生活手段的群体以外,在属于各个职业群体的城里人中,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增加。不过增加最多的是在体力工人中(见表 7.8)。⁶²分析 1954 年和 1955 年意大利劳资协议会选举的统计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结果。在劳资协议会选举中,城市越大,工厂越大,共产党控制的意大利总工会得到的选票就越多。在居民少于 40 000 的城市中,这个共产党的总工会的得票率为 60%,而在居民多于 100 万的城市中,这个比例是 75%。就全国而言,以工厂规模来比较工会的力量,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即使在最专门的产业中。例如,以纺织工业来说,在雇用 50—100 人的工厂(这种工业见于报道的最小规模)中,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得到 29% 的选票,而在雇用 2 000 人以上的工厂中,这个比例是 79%。⁶³

社区规模与政党选择之间的同样关系,也见于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⁶⁴澳大利亚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对住在矿区者和住在其他小社区者的问卷回答作了区分,结果发现,如所预期,“与世隔绝的”矿工支持中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低于大城市中的体力工人,见表 7.9。这些澳大利亚资料还显示,虽然熟练工人投票支持工党的可能性不如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但这两类工人在大城市比在小城市更支持工党。

表 7.9 澳大利亚的社区规模与工人的政党选择——1955 年*

政党选择	社区规模					
	大城市		小城区		矿区**	
	熟练工人	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	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自由党	35%	19%	44%	29%	15%	17%
工党	64	81	56	71	77	83
总计	99%	100%	100%	100%	92%***	100%
(调查人数)	(333)	(241)	(96)	(107)	(13)	(6)

* 根据澳大利亚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 1955 年一次选举调查的 IBM 资料卡计算,该机构向作者慷慨提供了资料卡供进一步分析。

** 诚然,调查人数太少不足以证明来自样本的任何推论,但以前的调查显示了类似的结果。例如,1951 年的一次选民调查显示,在 13 个住在矿区城镇的体力工人中,有 12 人投票支持工党。

*** 有 1 名被调查者选择了某一小政党。

在上述所有情况中,可能都涉及沟通因素。大工厂有利于较高程

度的阶级内部沟通,不利于与高经济水平者的个人接触。在大城市,社会的相互影响也更可能是发生在各经济阶层内。在某些情况下,大城市工人阶级居住区被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组织得如此完善,以致工人实质上是生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世界中。正是在这些中心,工人是左翼候选人的最坚强后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给予的投票支持最多。

对个人流动可能性的信心

某些心怀不满者不采取政治行动,而是试图通过开拓攀登成功阶梯的道路在现存经济制度内改变自己的命运。倘若这种可能性有可能存在,则相应地会削弱致力于社会变革的集体努力,如对工会和左翼政党的支持将减少。

这是长期以来对如下事实提供的主要解释:美国工人往往投票支持温和的改良主义政党,而欧洲工人通常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这恐怕是因为美国工人生活在一个开放的阶级社会,发展着的经济不断创造高于体力劳动水平的新工作岗位,所以他们多半比较相信个人的机会。相反,欧洲工人,面对一种封闭的阶级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甚至不谗称给予工人升迁机会,所以迫使他们为社会变革采取集体行动。关于美国和欧洲的相对社会流动程度,虽然这些旧框框不符合现实情况,但过去的偏向仍然很可能在影响现在的投票行为。⁶⁵

不幸的是,对于这种解释难于提供精确的统计学证明,因为欧洲社会和美国社会在如此之多的其他方面有区别。在美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由于经过一段长时间实际收入已有很大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已上升到在其他国家应当称之为“中产阶级”的地位。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工人相信个人的机会;不同的调查也显示,有一半左右的工人说,他们拥有“个人未来发展的充分机会”⁶⁶。在大萧条时期的1937年,芝加哥的一项调查发现,各个经济群体都有不低于85%到90%的人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在经济上过好日子的充分机会。⁶⁷最近的资料表明,欧洲的实际社会流动程度已像美国一样高,但对流动所抱的信心不同。较高的实际社会流动率似乎是所有工业社会的特征。

对流动抱有不同的信心涉及两个因素：其一，美国和西欧在国民总收入及其分配上不同；其二，美国和欧洲的上层阶级有不同的价值体系。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在美国，各个阶级的收入是如此之多，而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方式的区别是如此之小，以致实际上使高社会流动鼓吹者所设想的平等社会在美国远比在欧洲趋近于实现。虽然欧洲人的职业晋升像我们[美国人]一样经常，但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却一直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在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成员都可以有汽车，而在欧洲，只有中产阶级才能拥有。”⁶⁸

不过，不同的价值体系在这里也起某种作用，因为美国和欧洲的上层阶级在平等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成功的美国企业家自豪地宣传自己由穷变富的神话。等级和权力的实际差别作为对业已证实的能力的报酬被认为是正当的。在欧洲，主张世袭特权和地位的贵族式价值观和模式，仍然得到上层阶级中许多人的支持，所以欧洲的保守派希望尽可能减少社会流动。

既然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消费方式上存在极大差异，于是可以预期，工人阶级出身而得到晋升的欧洲人与同样的美国人相比，要适应其高于以前的地位，多少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而且会感受到更多的歧视，其处境犹如在美国成功地获得晋升的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比之于当地出生而持异议的白人。关于流动对政党选择的影响，这方面的比较材料其实是与如下假设相吻合的：欧洲人不满情绪更强，或受他们过去地位的牵连更大。5个欧洲国家——瑞典、芬兰、联邦德国、挪威、英国——的调查发现，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欧洲人比他们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同事更可能投票支持左翼政党，而美国的3项不同调查研究报道，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人比出身中产阶级的人更保守（支持共和党）。⁶⁹一个人适应其所进入阶级之文化形态的倾向是与政治观点相联系的，瑞典的资料在这方面显示了某种迹象：从工人阶级上升到干非体力工作的人，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表7.10中以汽车为例），将继续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相反，对所属阶级与出身阶级一样的那些人来说，消费方式的变化似乎与投票选择无关。

表 7.10 瑞典人的社会出身、消费模式与投票行为的关系*

	出身于体力工人家庭的体力工人		出身于体力工人家庭的非体力工人		出身于非体力工人家庭的非体力工人	
	有 无 汽车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非社会党	15%	14%	38%	74%	79%	83%
社会党	85	86	63	26	21	17
(调查人数)	(221)	(72)	(78)	(55)	(170)	(145)

* H. L. Zetterberg, "Overages Erlander," *Vecko-Journalen*, 48(1957), pp. 18, 36. Reproduced in S. M. Lipset and Reinhard Bendix,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p. 68.

“消费方式”上的这种差别,在美国可以表现为向郊区迁移;几项研究已经显示,作这种迁移的下层阶级成员有不同的政治行为。按照郊区—城区差别的线索,重新分析密歇根调查研究中心 1952 年所进行(并在题为《投票人作决定》的报告中作了一般分析)的一次调查发现,郊区与城区确实存在政党忠诚上的转移,但这种转移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原先持保守态度的人向郊区迁移。这项研究的作者所提出的两个假设,与本书就社会流动对下层阶级成员的影响所提出的论点是相吻合的。在政党选择上,不管自己选择是决定因素(这意味着新迁到郊区的人是向上流动的,渴望通过社交活动进入一种更高层的环境,意思是说投票支持共和党),还是投票行为比较保守是出于受共和党气氛较浓之环境——朋友和邻居——的影响,资料都显示,这种类型的流动在以前的民主党选民方面引起共和党得票率增高。⁷⁰当职业保持不变时,在“中等”地位和“高级”地位的职业中,共和党在郊区得票明显多于城区。⁷¹

关于流动对政治系统和社会体系的影响,大多数讨论都强调假设不同程度向上流动的结果,但也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在每个现代工业社会,从一代到另一代,实际上都存在明显的向下流动现象——父亲的高地位不能保证他的孩子有相同的地位。美国最近的资料确实表明,专业人员、半专业人员、企业拥有者、管理人员和行政官员——待遇最优惠的职业——的孩子,有大约 1/3 从事体力劳动。⁷²同样,在大多数社会也存在从农村向城市的普遍迁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充实体力工人的队伍。

向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相当广泛的流动,是这个阶级内显示保守政治行为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有资料可供利用的每个国家——联邦德国、

芬兰、英国、瑞典、挪威和美国，出身中产阶级的工人投票支持保守政党的可能性，远大于出身工人阶级的工人。有农村背景的人也相对比较保守。把三代人的背景变化加以比较，更凸显了这种差别。在德国，195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祖父是工人的工人，有75%投票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而父亲是中产阶级的工人，这个比例只有24%。⁷³在芬兰，1948年的类似研究显示，父亲和父亲的祖父是工人的工人，有82%投票支持左翼政党，而有农村背景的工人，这个比例是67%；出身中产阶级的工人是42%。

既然事实上所有各种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着社会流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对政治行为的最重要影响或许是，不管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上的大多数流动者都投票支持比较保守的政党。在德国，1953年有3/4以上中产阶级出身的体力工人投票支持非社会党，而有工人阶级家庭背景、身处非体力劳动地位的人，有差不多70%也选择“中产阶级”政党。同样，在芬兰，中产阶级出身的工人有2/3忠于非左翼政党，而从工人阶级家庭背景升入中产阶级职业的人，只有不到1/4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⁷⁴这些调查结果说明，接触高地位对态度和行为有普遍影响。作为身份高低两种地位的结果，那些受到这两种地位对应政治价值间交叉压力的人，更可能赞同以高地位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传统主义

低收入群体内违背投票支持左翼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出现在某些定期投票支持保守派候选人的相对贫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类地区见于美国的南部各州、意大利南部⁷⁵、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高地和挪威西部。关于它们的政治模式，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南方。”所有这些地区，在政治行为上都有特殊的地方风格，这使它们脱离了国内政治分歧的主要界线，有时出现地方性或主张独立的政党。⁷⁶

对于这种现象，前面讨论过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贫困至极，以致阻碍了有效的组织，泯灭了过好日子的一切希望。极端的无知和无文化给沟通和理解任何政治计划带来了困难。人们日复一日地工作，疲于奔命，毫无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以政治行动谋求改善生活的长期事业。⁷⁷况且势单力薄，不足以抵御地方特权阶级对他们施加的经济压力或

暴力。例如，在美国，佃农和农业工人从来没能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即使在他们从政府部门如新政期间的农业保险署得到同情的帮助时。

然而，阻碍落后地区中穷极潦倒的工人和农民采取左翼政治行动的最强有力因素在于，他们的头脑受制于“传统主义的”价值——顺从传统的生活水准，效忠“现存权力”。在这些地区，社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时代之前的格局。贫富地位被视为事物的自然秩序，并受到个人、家庭和地方性忠诚的支持，而不是看作非人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产物，可以借政治行动加以改变。在这里，贫苦的农民或工人扮演着有明显意义和价值的角色，他们从稳定的个人关系和涉及全社区的正式活动中获得满足。宗教信仰往往很强烈，支持现存秩序。⁷⁸

相反，商业性农民或城市工人在合理化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没有提供这种稳定的关系结构。奖励忠诚和惩罚背离传统信仰的个人关系和地方习俗已被扫除，改善经济的抱负受到鼓舞。视大地主家族权力为神圣的古老正统性不再保护铁路公司或粮仓经营，商业性农民可以通过给予促进社会变革的政党富于战斗性的支持来自由地对挫折作出反应。

然而，落后的农业区有时会突然爆发反叛，一旦对传统价值的承认发生动摇，这些地区就会倒向最激进的极端。甚至在美国南方，19世纪90年代，激进的人民党主义也呈现爆炸性发展，动员起农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农民，既有白人，又有黑人。这次选举人的起义遭到了失败，消失得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在意大利贫穷的南方，共产党和新法西斯党异乎寻常的强大。⁷⁹我们时代两起最激烈的政治变革，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其所发生的国家，几乎完全呈现一种落后的、传统主义的乡村社会结构。

关于落后地区突然从政治连续谱一端转到另一端的条件，人们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对近东地区政治态度的研究表明，来自外界的信息可以对政治态度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可以制造不满情绪，可以提供普通工人或农民在美国或俄国乌托邦中生活过得好的例子。⁸⁰不过，落后地区政治行为的问题，从倡导政治的和社会的民主的观点来看，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正是这样的地区构成了“自由世界”的大部分，特别是邻接苏联集团的许多国家。

传统主义可能有助于解释妇女的保守偏向，尤其是在欧洲，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妇女通常受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传统宗教信仰的影响较多。⁸¹这方面的直接证据见于法国的民意调查——当决定如何投票时，有47%的妇女说她们对教会立场给予了“很大”注意或“少量”注意，而男人的这个比例只有33%。⁸²小城镇中工人偏于保守也可能是传统主义的态度和关系的残余表现。

用强调各种社会中阶级结构的不同方面来解释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差异，这种努力涉及讨论几种因素，而这些因素大多是同时起作用的。显然，解释任何一个群体的行为都要涉及探讨一个整体模式，而在分别讨论每个因素时，要看到对群体起作用的所有变量，这或许是困难的；比如矿工这个群体，为了说明不同因素的作用，就多次引述过他们的行为。要建立不同群体的行为模式，可以利用不同变量进行组合。表7.11表示的是这样做的某些方法。

表 7.11 与低收入群体中投票行为原始统计规律性有关的解释因素

	剥夺类型					促进条件	
	收入 无保 障	工作 不满 意	低地 位、低 威望	充分的 阶级内 沟通	流动 的低 期望	缺乏 传统 主义	左翼 得票
工人							
大工厂	+	+	+	+	+	+	高
小工厂	+	-	+	-		-	低
工人							
大城市				+		+	高
小城镇				-		-	低
工人							
欧洲				+	+		高
美国				-	-		低
体力工人			+	+			高
白领			-	-			低
少数派群体			+				高
多数派群体			-				低
商业性农民、渔民	+	-		+		+	高
当地市场交换的自给 农民	-	-				-	低
矿工，伐木工	+	+	+	+	+	+	高
仆人，服务业工人				-		-	低

(续表)

	剥夺类型					促进条件	
	收入 无保障	工作 不满意	低地位、 低威望	充分的 阶级 内沟通	流动的 低期望	缺乏 传统 主义	左翼 得票
经济先进地区	+					+	高
落后地区	-					-	低
男人				+		+	高
妇女				-		-	低

注：+号表示下层阶级中有利于投票支持左翼的因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决定政党选择的大多数结构因素看上去明显可以视为分层系统的一些方面,但显然还存在许多与阶级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其他社会变量。下一章将继续讨论民主秩序的条件;讨论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分析上述因素中决定选举行为的一个主要因素——不同世代人经验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探讨投票模式历史演变的有关问题。

注 释

1. 这个贴切的短语是取自:Dewey Anderson and Percy Davidson, *Ballots and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43)一书的书名。这本书和社会学家 S. A. 里斯(Stuart A. Rice)较早的著作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8), 堪称美国政治行为领域第一流的名著。里斯 1924 年作了首例典型对象(重复访问)研究,首次对影响立法机关成员投票行为的根源作了统计研究,并建立了政党得到支持的周期性变化与经济周期变化的关系。安德森(Anderson)和戴维森(Davidson)还分析过选民中哪些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改变了他们支持的政党。

2. 关于美国政治的更详细分析见第九章。

3. Robert M. MacIver, *The Web of Govern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pp. 216, 315. 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强调必须根据左右两翼——关心下层阶级和变革的人与关心稳定、关心生活富裕的人——之间的持续冲突来分析美国的政治史和竞选斗争,而他的社会学常常被批评反对研究冲突问题,过分强调社会的凝聚程度。见“Voting and Equilibrium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n E. Burdick and A.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p. 88.

4. M.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54), pp. 215—216; M. Duverger,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F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1952), pp. 1069—1078. 诚然, 这个连续谱是把对社会变革有极其不同态度、实践中相互敌视的政党放到了一起, 但忽略了“左”和“右”细微程度的问题, 忽略了另一些有时完全突破这里定义的左—右界线的问题, 如区域自治与中央集权制, 国家自决与帝国主义, 以及最近出现的政治民主与极权主义的问题。

5. 另见 Edward Shills, “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 in R. Christie and M. Jaho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pp. 24—49.

6. 引文和统计数字来自 A. 马列夫斯基 (Andrzej Malewski) 一份未发表的报告, 该报告的部分译文见 Leopold Lebedz, *Sociology and Communism 1957—1958* (London: Soviet Survey, 1959), p. 10. 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份更广泛的报告可见 Zeigniew Socha, “Postawy wobec egalitaryzmu,” (Attitude toward egalitarianism), *Przegląd Kulturalny*, No. 3(333), Warsaw, January 15, 1959. 在丹麦, “社会民主党受欢迎程度随社会地位的降低而单调增加, 而保守党则显示完全相反的规律性”。K. Svalastoga, *Prestige, Class and Mobility* (Copenhagen: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264—265.

7. 在本书不同部分已提到大多数出版的资料来源, 这里不再重复。本章中许多论述是基于一些学术性或商业性调查研究组织所作的迄今尚未出版的研究分析结果, 这些组织或者给了我它们 IBM 资料卡的复制件, 或者应我的请求作了新的计算。我希望能在今后的将来发表关于这些比较研究的更详尽的报道。各个国家都有许多这种简明扼要的资料。引用的文献包括 J. J. de Jong, *Over heid en Onderdaan* (Wageningen: N. V. Gebr. Zomer and Keunings Uitgeversmij, 1956), 特别见 pp. 352—376; Hadley Cantril, ed., *Public Opinion, 1935—194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特别见 p. 602, 623, 627, 630 关于美国的部分, p. 197 关于英国的部分。

8. S. M.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J. D. Hicks, *The Populist Revo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1); S. A. Rice, *Farmers and Worker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4), Chap. II; V. O. Key,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Crowell, 4th ed., 1952), Chap. II; C. B. MacPherson, *Democracy in Albert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3).

9. A.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la troisième republic*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13), Chap. 44; R. Heberle, *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43), Chap. III; Charles P. Loomis and J. Allen Beegle, “The Spread of German Nazism in Rural Area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1946), pp. 724—734; S. S. Nilson, *Historie et sciences politiques* (Bergen: Chr. Mechelsens Institut, 1950); S. S. Nilson, “Aspects de la vie politique en Norveg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3(1953), pp.556—579.

10. E. Bull, *Arbeiderklassen i Norsk Historie* (Oslo: Tilden Norsk Forlag, 1948).

11. S. S. Nilson, "Le Communisme dans les pays du nord—les election depuis 1945,"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1951), pp. 167—180. R. 黑贝勒 (Robert Heberle)报道了左翼政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渔民中所取得的成功,见 *From Democracy to Nazism*, *op. cit.*, p. 104.

12. 另见 B. Leger, *Les opinions politiques des provinces française*, 2d ed. (Paris: Security Sirey, 1936), pp. 49—50.

13. S. Jamieson and P. Gladstone, "Unionism in the Fishing Industry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6 (1950), pp. 1—11 and 146—171.

14. J. K. Pollock and S. J. Eldersveld, *Michig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 No. 10, 1945), p. 54. 关于英国渔民的行为见 *The Economist* (Aug. 15, 1959), p. 435.

15. H. G. Nicholas,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50* (London: Macmillan, 1951), pp. 42, 61. 另见 J. F. S. Ross,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58—77.

16. H. F. Gosnell, *Grass Roots Politics: National Voting Behavior of Typical States* (Washington: America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2), pp. 31—32; 另见 Malcolm Moos, *Politics, Presidents, and Coattail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52), pp. 47—48.

17. O. K. Flechtheim,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ffenbach am Main: Bollwerk-Verlag Karl Drott, 1948), p. 211, 其中有 1933 年以前的数据; 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劳资协议会 (Works Councils) 选举的统计资料见 Michael Fogarty, *op. cit.*, p. 213.

18. Richardo Cruz Coke, *Geografia electoral de Chile* (Santiago de Chile: Editorial del Pacifico, S. A., 1952), pp. 53, 81—82.

19. S. S. Nelson, "Le Communisme dans les pays du nord—les elections depuis 1945," *op. cit.*, pp. 167—180.

20. Walter B. Simon, *The Political Parties of Austria*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7, Microfilm 57—2894 University Microfilms, Ann Arbor, Michigan), p. 263.

21. H. F. Gosnell, *op. cit.*, p. 77, 以及 J. K. Pollock and S. J. Eldersveld, *op. cit.*, p. 54.

22. 见 T. C. Truman, *The Pressure Groups, Parties and Politics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Movement*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53), Chap. IV, pp. 70—72.

23. H. F. Gosnell, *op. cit.*, pp. 3, 32, 37, 90.
24. R. Centers,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77—179.
25. H. G. Nicholas, *op. cit.*, pp. 297—298; Wilma George,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Labor Vote in the Country Boroughs of England and Wal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1951), pp. 225—259.
26. Erik Allardt, *Social Struktur och Politisk Aktivitet* (Helsingfors: Söderstrom and Co., 1956), p. 84.
27. *Réalités*, No. 65, April 1956.
28. C. W. Mills,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281.
29. T.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32), pp. 109—122; Samuel Pratt, *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 (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48), Chap. 8.
30. 这类工作与那些允许更多创造性的工作,在工作满意程度上的区别有大量资料证实。这方面文献的评述,见 R. Blauner, “Attitudes Toward Work,” in W. Galenson and S. M. Lipset, eds.,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Trade Un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0)。
31. S. Pratt, *loc. cit.*
32. 根据国际印刷联合会(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的一项统计,资料未发表。关于这项研究的其他细节,见 S. M. Lipset, M. Trow, and J. Coleman, *Union Demo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特别见 pp. 150—197, 其中对大小工厂的环境区别作了讨论。
33. 关于人们对在地位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反应,更详细的讨论见 S. M. Lipset and Hans Zetterberg,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in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60—64.
34. 这一点来自许多国家的证据。这方面的详细综述,见 *Ibid.*, pp. 14—17.
35. G. Gallup, *The Gallup Political Almanac for 1948* (Princeton: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1948), p. 9; E. G. Benson and Evelyn Wicoff, “Voters Pick Their Par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1944), pp. 165—174; L. Harris, *Is There a Republican Majorit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H. Cantril, *op. cit.*
36. Institut für Marktforschung und Meinungsforschung, E. M. N. I. D., *Zur Resonanz der Parteien bei Männer und Frauen in den Soziologischen Gruppen* (Bielefeld: mimeographed, no date), pp. 5, 7, 9.
37. R. Centers, *op. cit.*, pp. 130—132.

38. T. Geiger, *op. cit.*, pp. 109—122.

39. W. Dittmann, *Das Politischen Deutschland vor Hitler* (Zurich: Europa Verlag, 1945); A. Dix, *und die Wandlungen der Volksgliederung* (Tübingen: J. B. C. Mohr, Paul Siebeck, 1930); W. Stephan, “Zur Soziologi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0 (1931), pp. 293—300. 另见第五章。

40. S. Pratt, *op. cit.*, Chap. 8.

41. T. Geiger, *op. cit.*, p. 144.

42. 德国的类似证据也有报道, 见 Institut für Marktforschung und Meinungsforschung, E. M. N. I. D., *op. cit.*, 以及 Divo Institut, *Umfragenn 1957* (Frankfurt: Europaische Verlaganstalt, 1958), p. 53. 例如, 有 3 个不同研究报道, 德国的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更激进。迪沃研究所 (Divo Institut) 在 1953 年和 1957 年选举的两次调查中都发现了这种结果。在 1957 年, 熟练工人有 62% 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 而在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中, 这个比例是 43%; 见 p. 5. 关于瑞典, 见 Elis Hastad, *et al.*, eds., “Gallup” och den Svenska Valjarkaren (Uppsala: Hugo Gebers Forlag, 1950), pp. 157—170.

43. A. H. Birch, *Small-Town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12; 关于英国选举的全国性资料, 见 H. J. Eysenck,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4), p. 21, 以及 M. Benney, A. P. Gray, and R. H. Pear, *How People Vote: A Study of Electoral Behavior in Greenwic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6), p. 111; 涉及英国和美国的资料, 见 Michael Argyle, *Religious Behavio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pp. 81—83; 关于美国宗教和政治的更详细讨论以及进一步的参考文献, 见本书第九章; 关于已发表的澳大利亚资料, 见 Louise Overacker, *The Australian Party Syst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66—170, 298, 305—306, 以及 Leicester Webb, *Communism and Democracy in Australia* (Melbourne: F. W. Cheshire, 1954), pp. 91—100. 澳大利亚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已有相当多的说明政治隶属与宗教间关系的资料可供利用。有关加拿大的参考文献是基于对加拿大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所收集之未发表资料的一项调查。

44. 从这里的研究出发, 澳大利亚所有的工党都被看作是一体的, 尽管持异议的右翼工党基本上是以天主教为基础。

45. Walter B. Simon, *op. cit.*, pp. 335, 338—341.

46. J. P. Kruijt, *De Onkerkelikheid in Nederland* (Groningen: P. Noordhoff, N. V., 1933), pp. 265, 267.

47. 见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pp. 261—262, 其中对威廉德国犹太激进主义的根源作了分析, 这种分析似乎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48. 见 Stuart R. Schram, *Protestantism and Politics in France* (Alençon,

France; Corbiere and Jugain, 1954), pp. 183—186. 例如, 1951年, 在新教徒为主的小行政区[加尔省(*Gard*)], 登记选民有 55.5% 投票支持共产党或社会党, 而在天主教占优势的小行政区, 这个比例只有 35.1%。总的来说, 新教区比天主教区富裕。关于欧洲天主教政党和其他宗教政党的特征, 最好的讨论见 Michael Fogarty, *op. cit.*, Chap. 22。

49. 荷兰宗教和政治分野的高度一致显然与不参加所在宗教活动的人数有关。在法国, 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几乎与参加的一样多, 而在荷兰, 不参加活动的天主教徒只占天主教徒总数的 1/6。至于温和的新教徒, 不参加活动的人数虽然几乎是参加的人数的一倍, 但投票行为的差别也同样分明。这些民意测验是基于总人口的随机抽样, 所以有理由推论, 不参加所在宗教活动的人数的比例有代表性。

50. 在德国, 去教堂的男性天主教徒有 60% 或者支持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C. D. U.), 或者支持中央党(*Zentrum*), 而不去教堂的天主教徒, 这个比例只有 33%。见 Juan Linz, *The Social Bases of German Politic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8), p. 700。见 J. J. de Jong, *op. cit.*, pp. 179—187, 其中有关于荷兰的更多资料。该书还提供有欧洲不同国家投票模式的调查资料, 调查项目涉及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组和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

51. 例如, 法国 1952 年和意大利曼图亚(Mantua)主教管区 1948 年的研究显示, 定期参加星期日弥撒的天主教女教徒几乎是男教徒的一倍。见 M. Fogarty, *op. cit.*, pp. 352—353。

52. Juan Linz, *op. cit.*, p. 234.

53. A. Campbell, G. Gurin, and W.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and Co., 1954), p. 70; B. Berelson, P. F. Lazarsfeld, and W. 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p. 73, 75.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当腐化或禁酒一类道德问题在美国选举中凸显出来时, 妇女超比例地支持比较“道德的”候选人, 见 Stuart A. Rice,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olitics*, *op. cit.*, pp. 177—179, 其中讨论了妇女的投票行为, 大约在 1917 年到 1920 年, 性别的作用很突出。

54. J. A. Morsell,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Negroes in New York City*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55. S. S. Harrison, “Caste and the Andhra Communis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0(1956), pp. 378—404。

56. R. Swearingen and P. Langer, *Red Flag in Japa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in Action, 1919—195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81—184。

57.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Syrian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mimeographed。

58. P. F. Lazarsfeld, B. Berelson, and H.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4), pp. 146—147.

59. 美国的另一些研究见 A. Campbell, G. Gurin, and W. E. Miller, *op. cit.*, p. 73. B·伯尔森(B. Berelson)、P. F. 拉扎斯菲尔德(P. F. Lazarsfeld)和 W. N. 麦克非(W. N. McPhee)证实,工会会员参加工会越多,投票支持民主的可能性越大,*op. cit.*, pp. 49—52。这项研究还证实,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组织隶属身份对共和党得票有增益效应。R. 科恩豪泽(Ruth Kornhauser)曾证明,民主党得票与工会会员身份的这种相关关系,在各种规模的社区中都成立,尽管在较大城市中比较明显,见他的“Some Determinants of Union Membership,”(mimeographed,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erkeley, 1959)。

在英国,1951年德罗伊尔斯丹(Droylsden)的工会会员,有66%投票支持工党,而其他雇员,这个比例是53%,见 P. Campbell, D. Donnison, and A. Protter, “Voting Behavior in Droylsden in October, 1951,” *Journal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20(1952), p. 63. R. S. 米伦(R. S. Milne)和 H. C. 麦肯齐(H. C. Mackenzie)发现在工会会员身份与工党得票之间甚至有更强的关系, *Straight Fight; A Study of Voting in the Constituency of Bristol North-East at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51* (London: The Hansard Society, 1954), pp. 62—64。另见 M. Benny, A. P. Gray, and R. H. Pear, *op. cit.*, p. 112。加拿大公共舆论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工会会员给予 C. C. F.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支持比非工会会员工人多。在德国,工会会员支持社会党的比例是没有参加任何民间组织的工人的这个比例的2倍。见 Juan Linz, *op. cit.*, pp. 215, 828—830。

60. C. Dreyfuss, “Prestige Grading: A Mechanism of Control,” in R. K. Merton, *et al.*, eds., *Reader in Bureau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2), pp. 258—264.

61. S. Pratt, *op. cit.*, Chap. 3.

62. 另见 Juan Linz, *op. cit.*, pp. 347。不论男女和各种熟练水平的男工人,在较大的城市都较多地投左翼政党的票。

63. 一些具体城市和工厂的详细统计分析见 *L'Avanzata della C. I. S. L. nelle commissioni interne* (Rome: Confederazione Italiana Sindacati Lavoratori, 1955), pp. 46—95。这份报告是由一个反共产主义劳工联盟起草的。其中资料按工业类型、工厂规模作了分类,以致不可能为得到一种全面统计增加资料。不过,差别是一致的,但无论如何创造没有提供全国的全面统计结果。行动交往联合会(Action Society Trust)对英国工厂的许多研究报道,“在工厂规模和病假天数之间,在工厂规模和事故次数之间”,以及在工人道德品质的许多其他指标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见 Action Society Trust, *Size and Morale* (London: 1953); *The Worker's Point of View* (London: 1953); 以及 *Size and Morale, II* (London: 1957)。多少有些类似的发现,在美国也有报道,见 Sherrill Cleland, *The Influence of Plant Size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64. R. Centers, *op. cit.*, pp. 58, 185—190; P. Ennis, “Contextual Factors in Voting Decisions,” in W. N. McPhee, ed., *Progress Report of the 1950 Congressional Voting Study* (New York: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 mimeographed. 莱思·爱泼思坦(Leon Epstein)证实,在威斯康星州州长选举中,民主党得票随城市的增大而稳定增加,见“Size of Place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Two-Party Vote in Wisconsi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9 (1956), p. 141. N. A. 马斯特斯(N. A. Masters)和 D. S. 赖特(D. S. Wright)证实,虽然小城市的工人比大城市的工人有明显不支持民主党的倾向,但是不考虑所住城市的规模,属于管理群体的人往往在同等程度上支持共和党,见“Trends and Variations in the Two-Party Vote: The Case of Michig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1958), p. 108。

65. 关于许多不同国家中的流动问题,最近就这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情况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总的垂直流动程度上(从较低级职业或劳工层级职业升到非体力职业或高威望职业),美国与大多数比较发达的国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例如,联邦德国的流动率是31%,瑞典是29%,日本是27%,法国是27%,丹麦是31%,英国是29%。瑞士的流动率稍低,是23%;西欧最低的国家是意大利,流动率是16%。关于这些研究的全面报道,见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op. cit.*, Chap. II。

66. E. Roper, “Fortune Survey: A Self-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ortune*, 35(1947), pp. 5—16。

67. A. W. Kornhauser,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in G. W. Hartmann and T. M. Newcomb, eds.,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Cordon Co., 1939), pp. 199—264。

68. S. M. Lipset and Natalie Rogoff, “Class and Opportunit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entary*, 18(1954), pp. 562—568。

69. 见 S. N. Lipset and Hans Zetterberg, *op. cit.*, pp. 64—72, 其中有关于社会流动政治后果的详细报道。有资料表明,就向上流动与投票选择的关系来说,英国类似于其他欧洲国家,而不同于美国。这方面的资料可见 R. S. Milne and H. C. Mackenzie, *op. cit.*, p. 58。

70. 见 Fred I. Greenstein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The Suburbs and Shifting Party Loyalt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2 (1958), pp. 473—483。另一项研究涉及一个城市,而不是全国。这项研究发现,在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城(Kalamazoo)郊区几乎没有政治行为的变化,因此作这项研究的作者们认为,郊区效应被过高估计了。不过,如他们的资料所显示,他们引出解释的郊区远不是典型的区域型的郊区,而是物价比较低的郊区,这种郊区吸引低收入的消费者;而这种消费者的抱负是改善自身和其家庭的未来。卡拉马祖郊区抬高了大多数家庭的身份;1956年,有83%的被调查者投票支持艾森豪威尔,新教教徒占85%。在

这类地区,以前几乎人人支持共和党,看不到流动对政治选择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关于这项研究的报告,见 Jerome G. Manis and Leo C. Stine, "Suburban Residenc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2(1958), pp. 483—490。

71. Samuel Lubell, *The Revolt of the Moderate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6), 以及 William H.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6)。这两部著作都讨论了郊区的政治影响。卢贝尔(Lubell)还注意到,共和党在城市中也有上升趋势,这是总社会趋势的一部分,不限于郊区。

72.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op. cit.*, pp. 87—91。

73. 数据是据设在联邦德国科隆的联合教科文组织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计算。

74. 数据是由赫尔辛基大学埃里克·阿拉特(Erik Allardt)博士提供,其基础是荷兰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进行的两项调查。关于联邦德国和芬兰研究的更详细报道,见 Lipset and Bendix, *op. cit.*, pp. 69—71。

75. G. Schepis, "Sociologia elettorale della Sicilia," *Revista italiana di economia demografia a statistica*, 4(1950), No. 3—4, pp. 491—498。

76. R. V. Burks, "Catholic Parties in Latin Europ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1952), pp. 269—286。甚至在不知道有地方政党存在的瑞典,地区性差别也持续了几十年:"北方……左翼政党势力强,南方右翼政党势力强"。见 Denkwart A. Rustow,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136—137。

77. 关于意大利南方的讨论见 Edward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78. A.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ouest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op. cit.*

79. Department of States, United States Division of Research for Europ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talian Election Results* (Washington, 1948)。见第五章关于意大利的讨论。

80.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81. H.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 Stockholm Economic Studies, No. 7(London: P. S. King), pp. 42—45。关于性别和宗教信仰方面证据的综述,见 Michael Argyle, *op. cit.*, pp. 71—79。

82. Frenc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La vérité sur la pratiques et les sentiments religieux des Français," *Réalités*, 3(1952), pp. 36—44。另见"La France est-elle encore Catholique?" *Sondages*, 14(1952), No. 4。

第八章

选举：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

——连续性和变化

世代与政治行为

所有关于投票选择的调查都报道，在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教育、宗教或种族群体内，不同的年龄组在政治忠诚上有巨大差异。不同的年龄意味着生活经验的不同，这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政治行为的左或右：其一是通过代际差别（青春期的重要经验有时可决定整个一个年龄组的政治观）；其二是通过社会经验典型模式上的差别，这是与青年、成年、老年这些不同年龄组相联系的。关于这两方面多少有些显著的差别，可以援引许多例子说明。例如，就中产阶级而论，年龄基本上是与成就相关的，亦即，人越老（在一定年龄之前），其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升得越高。年龄也反映其他地位上的变动，比如，一个人在一段年龄上是家庭生活的主要供给者，而在另一段年龄成了辅助供给者。年龄还可以与参加不同类型的组织有关，或与经济结构中某种比较无保障的地位相联系。¹

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许多社会学家指出，为了解释政治行为，必须给阶级群体或种族群体这样一些结构范畴补上一个“代”概念。²他们论证说，在分层等级制度中，作为处于不同位置的结果，人有态度的不同。同样地，由于不同出生年代，人也有态度的差异。这个概念的第一个阐释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强调，一定时刻——在他看来，基本上是

晚青春期——的共同经验创造了共同的参考框架，同年龄组的人往往在这个框架内考虑他们以后的政治经验。

这表明，一个人第一次据以严肃思考政治问题的政治参考框架对其终身一直起作用。因此，曼海姆和其他一些人坚持认为，要理解支撑中等年龄组在任何特定社会中控制政治生活之态度的基本价值，必须回过头来考察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政治气候和政治问题。

这种对晚青春期特殊政治环境的强调，实际上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心理学关注的社会学对应。心理学家爱德华·施普兰格尔(Edward Spranger)承认这个问题，他在一开始讨论青春期政治行为时就指出：“青年的政治立场是随具体的历史环境变化的。”³

不幸的是，一直没有人设法用现代调查研究技术去系统地研究这种世代经验的效应。希特勒时代以前的德国社会研究者阿瑟·迪克斯(Arthur Dix)，曾以表的形式对这种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划分了类型。他把1930年的德国选民分成年龄组，并对各个年龄组分别列出他们参加第一次选举时政治气候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作出了关于早期事件在30年代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假设。⁴那时就纳粹党和社会党成员所报道的年龄构成和生活经验，倾向于证实某些关于不同世代在德国社会中扮演角色的假设。⁵

一些美国的研究也证实世代概念的实用性。在1944年对纽约哈莱姆区黑人投票行为的一项研究中，社会学家约翰·莫塞尔(John Morsell)发现，44岁以下的黑人，有82%投票支持罗斯福，而44岁以上的黑人，这个比例是59%。许多年龄较大的黑人，可能仍然像对待林肯的政党那样对共和党的形象作出反应。⁶

1940年、1944年和1948年选举的典型调查研究显示，年轻的天主教徒比年老的天主教徒更支持共和党，而年轻的新教徒比年老的天主教徒更倾向于民主党。⁷这些差别也许体现为与传统的彻底对抗，但反映在不同世代经验上却可能是另一种结果。当宗教比阶级对引发政治倾向更重要时，年老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可能仍然按大萧条前的选举形势作出反应。可是，年轻的选民，在阶级变得更重要时，却形成了他们30岁以后和50岁以前这段年龄的政治信念。因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明显矛盾，似乎是中产阶级的年轻天主教徒变成共和党人，而工人阶级的年轻新教徒变成

民主党人的产物。这些转变表明，传统的家庭忠诚还要受到其他事态和经验的影响。

1948年和1952年选举的研究显示，政治上的新一代比前一代更支持共和党。1948年，在纽约的埃尔迈拉，21岁到24岁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只有38%支持杜鲁门，而25岁到34岁的同类工人，这个比例是54%；⁸民意调查者路易斯·哈里斯利用国家调查资料报道，1952年，21岁至24岁年龄组有44%支持艾森豪威尔，而25岁至34岁年龄组，这个比例是38%。

这些差别可能是形势使然。一些在大萧条或战争时期进入法定年龄的人，建立了与民主党的密切关系；而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件，只知道历史，在经济繁荣期第一次参加投票的人，则转而支持共和党。其实，如果各代人倾向于支持左翼或右翼取决于哪一翼在他们进入法定年龄时期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如下普遍存在的观念：保守主义是与年龄增大相关的。支持重新考虑这种观念的经验证据来自社会极不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时，年轻人转向左翼，而他们的上一代倾向于坚持其年轻时形成的比较保守的信念。如果一个社会从长期的不稳定走向稳定，则情况会完全相反：老年人坚持他们年轻时形成的左翼观念，而年轻一代则持保守态度。

年龄增大常常与收入或地位的升高相关联。结婚、迁居、变换工作和建立新的交往这样一些社会境况的变化，看来显然应当与意见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实施有关。不幸的是，民意调查很少收集个人过去经历变化的资料。工作流动的研究表明，许多人有极其不同的工作经历。一次这样的调查发现，31岁以上的体力工人有20%的工作史是在非体力工作岗位上，而非体力雇员有大约25%的工作史是做体力工作。⁹这些研究没涉及政治行为，但美国的研究的确考虑了工会会员身份和工会活动，这通常是与政治有关的。结果发现，对于一个在雇的体力工人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中做体力工作的时间比例越多，越可能是工会的积极分子，而且估计他越可能是一名民主党人。

与年龄增大有关的政治观的其他变化是起因于家庭生活的要求。有一种趋势是，无宗教信仰的父母感到有必要送他们的孩子去主日学校，借此使孩子重新进入通常比较保守的宗教社会。在中产阶级和高收入的工

人阶级父母当中,孩子是使他们迁居郊外的首要原因之一。关心孩子的福利也可能有较微妙心理学效应,这使父母意识到——常常是首次意识到——权力机制在社会中的实际功能。

孩子也有可能制止父母方面出现不正常行为的倾向。没有任何人比年幼的孩子更“保守”,更循规蹈矩。但是孩子迫使父母改变行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家庭研究者忽视了。

只是在讨论外来移民家长与他们的美国孩子关系的著述中,对这方面的模式有明确的认识。¹⁰这类研究使人们注意到孩子在使其父母“美国化”(改变父母的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迁往南方的北方自由派人士为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另一种例子。父母告诉他平等对待黑人的孩子会受到同一群体其他孩子的处罚。如果他接受他所在群体的标准,他在家又会受到处罚。无疑,这使许多父母发现,接受所在群体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价值比使自己的孩子继续受处罚更便当。当人们带孩子从一种政治环境迁往另一种政治环境时,类似的过程多半也会有曲折的表现。

社会地位改变作为年龄增大的一个相关结果可能成为影响态度的另一种表现,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本尼(Mark Benney)和菲莉斯·盖斯(Phyllis Geiss)提供的。他们证实,对社会地位的关注随年龄增长越来越强烈。¹¹随着人的逐渐变老,越来越愿意自称中产阶级,而不自称工人阶级。这种对地位的更强烈关注也可以反映在政治见解上。

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大增已使许多领域的专家去分析人口老化对社会的冲击。¹²向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的公共福利措施的增加,是体现老人政治实力的明显证据。

至少有两个平行的过程在继续,它们可以影响老年人的政治行为。一方面,正如我们早已指出的,人们可能保持他们青年时代的观点和忠诚。因此,当前的老年人有可能延缓政治变革。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老年人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像在农业社会一样,他们没有有用的角色可扮演,既得不到家庭的充分资助,也不能整合入家庭。所以,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特别依赖于国家。而且,由于来自退休金和存款的收入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也比有讨价还价能力的人更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萧条对老年人的影响可能是超比例的,因为可供他们得到

的全日性或非全日性工作的数量与总人口这方面的数量相比，减少的更多，而且来自亲友的资助也往往下降。

这样的条件实际上会导致部分老年人激进化。由于他们的孤独，沟通条件相对较差，这限制了他们的政治有效性。作为一个依赖国家资助的穷人群体，他们可能发现，只有左翼政党才倡导扩大福利国家措施的范围。汤森计划*之类老年人群众运动的发展，乃是他们热衷于收入再分配斗争的一种表现。¹³美国的退休金运动具有与激进运动结合或合作的趋势。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汤森计划的人曾与半法西斯性质的组织合作，而共产党则成功地控制了西海岸许多老年人团体。在加拿大，一些领退休金者的组织是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平民合作联盟合作。塞缪尔·普拉特指出，住在德国小社区的老人往往是纳粹分子。¹⁴在荷兰，民意测验数据显示，在争取退休工人支持方面，共产党比社会党要成功。¹⁵在英国和丹麦，所得到的数据稍有矛盾，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国家，年龄本身不是造成政治行为差别的主要因素。¹⁶另一方面，当代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和法国的数据都显示，这5国的老人超比例地保守。¹⁷

投票模式的历史背景

既然投票是个人和社会群体生活中的一种经常性、周期性的活动，我们就必须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对它加以考察，使我们的视野超越社会地位间的静态关系，超越当前的选举活动。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指出：

对于政治、宗教、技术、绘画、诗歌等等，10年的历史永远容纳不下它们的解释。为了解一些(有各种特定时限的)活动……你必须调查一段长得多的时期的历史。不如此就是浅尝辄止。¹⁸

当我们考察1896年至1932年美国70%以上的县在一次次总统选举中没有改变它们投票的总趋势时，可以看到把历史纳入考虑的必要性。

* 弗朗西斯·E. 汤森博士成立养老周转金有限公司，计划每月给国内每个退休者提供200美元的政府养老金，以此消灭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的贫困。——译者注

即使在 1932 年这样的选举中,改变前 4 年政党忠诚的也只占 58%。而且,在上述整个期间,只有 5 个县每隔一次选举站在不同方面。¹⁹显然,一定的地区或群体为什么专门支持特定的政党,通过调查与不同政治倾向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可能作出解释;这是对美国投票行为所作的两次大规模典型调查研究着重揭示的一个事实。这两次研究都是在个别城市进行的,而且都报道了在投票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相对可比较的关系。每次研究都发现,比较富裕的人大多支持共和党。在俄亥俄州桑达斯基进行的第一次研究表明,这是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社区,而在纽约州埃尔迈拉进行的第二次研究显示,那是一个共和党占优势的城市。²⁰要解释这两个城市为什么不同,唯一的方法是根据它们不同的历史。

政治学家小 V. O. 基和弗兰克·芒杰(Frank Munger)在印第安纳州“政治摇摆”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因为大多数调查式投票研究所讨论的影响选民的社会因素没有解释他们政治选择的许多变化,所以他们认为,在选举决定中过多强调社会的决定作用,会“从政治行为中除去政治”。基和芒杰发现,就印第安纳一些县的投票行为来说,在 1868 年到 1900 年和 1920 年到 1948 年这两段时间之间,尽管其间有大社会变动,但仍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他们指出:“县的政党隶属模式——不顾利益的变化和产生这种模式的问题的消失——的长期保持,以及不同政党隶属模式在情况基本类似县中的存在,是按照一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社会编组无关的‘政治’编组取向的结果。”²¹因此,传统的政党隶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像宗教或阶级的隶属关系一样,是作为投票的一种决定因素起作用的。

这两个政治学家的主要贡献或许在于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及时研究社会特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相关关系。他们指出,社会特征只有在分析具体政治选择的背景中才获得政治意义。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阶级和宗教对于新政以前和以后一代代人具有不同政治意义之类的现象:第一代的所得是以第二代的牺牲为代价的。²²

不管不同的政党在问题或作用上的变化,对政治群体的长期忠诚,要求我们研究一贯忠诚或改变忠诚赖以存在的条件。²³在一段时间,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或一个政党的作用,既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改变。当一个群体的地位与相应政党的地位呈现一致关

系时，对党的忠诚是无需解释的。但是，在一个政党改变了它的纲领或一个群体改变了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后，所论群体和政党继续保持支持关系，这种情况就需要加以分析。

在某些情况下，政党忠诚可以强化附于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感情，不然这些制度和感情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例如，下层阶级种族群体对民主党长期保持忠诚，这表面上似乎是与内战以来南方部分住在贫困山区的农民对共和党的支持一样。²⁴ 不过，前一种忠诚相当于下层阶级群体继续支持“竞争失败”之政党的情况，而南方共和党的情况似乎是一种过时的或“不合逻辑的”忠诚；这些贫困山区的农民，起初支持共和党的前身辉格党，因为该党鼓吹内部改革，如改善交通；后来支持共和党是把它当作统一党，但是在这些争端消失和经济差别又变成是分歧的主要基础以后很长时间，他们仍然继续支持共和党。²⁵ 这两种持续忠诚所反映的问题是大大不相同的。

不顾一个地区社会结构变化而继续保持忠诚，可能仅仅反映一种“政治滞后”，并且可能说明，没有传统的反对党来体现该地区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力量。例如，1948年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曾抱怨说，主要的民主党竞选者没有进入政府，他们几乎得不到钱用于组织的目标。但是新罕布什尔现在已是美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州之一，还有大量信天主教的人口。²⁶

有许多持续性表面上看是“不合逻辑的”；支持这些持续性的因素可以称之为“结构性”因素。一个地区起控制作用的政党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社会认可它是采取政治行动的工具，就属于这样的因素。在某些地区，共和党或民主党本来是敌军的政党，现在仍然带有非法的或对社区构成威胁的色彩。法国的天主教徒不会忘记，左翼政党原来是天主教的激烈反对者，支持反对党当时意味着认同于社区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拒斥另一种形式政治行动的最初基础可能会消失，但是如果只是在一个群体或地区已经有几代人支持一个政党以后才出现对这个政党的挑战，那么要改变政治忠诚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到那时，传统的政治忠诚已与其他体制——教会、家庭——搅在一起，以致要改变它，常常涉及改变其他体制结构。

一个政党与社会结构其他部分的这种铰合暗示，少数派政党的支持

者必须承认社会异常现象的作用。政治学家亚历山大·赫德(Alexander Heard)提出,在美国南方的小城镇,许多公开成为共和党员的工商业者曾被社会排斥在外,财政上也破了产。他还指出,在南方大多数县,有强烈政治抱负的人,只有当他在合法的一党政治结构中起作用时,通常才能指望实现他的抱负。²⁷这保证了居支配地位的政党对人才的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自我延续的政治循环,其中合法政治垄断的存在迫使人民在垄断的框架内工作,以实现改革;正因为人民是在这种框架内工作,所以框架的安全得到了巩固。

共同体规定政治行动的一定途径是唯一合法途径,也限制了政治可以在其中表达的参考框架。老参议员拉·福莱特(La Follette)在解释他为什么没与共和党断绝关系时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人民倾听我的意见,因为我是一名共和党员。”²⁸在北达科他州,超党派联盟的社会主义奠基人A. C. 汤利(A. C. Townley)之所以有意识作出决定,参加共和党,是因为他相信,这个州的农民只承认共和党标签下的政治。²⁹因此,在居支配地位政党内存在起作用的反对派领导力量可能有助于维护传统政党忠诚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忠诚有了新的内容。

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与种族制度、宗教制度、等级制度或区域经济制度相联系的。这些制度的长期存在似乎与某方面的要求如经济要求相抵触,但却与其他要求有密切关系。例如,一个党可以被视为外来天主教徒的党,而另一个党则被看作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党。在马萨诸塞州,爱尔兰或犹太血统的人,要在共和党内得到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在讨论当代英国选举议员候选人的做法时报道:“去年,没有考虑给工党全国执委会主席一个席位,因为他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即使不是迪斯雷利,如果你是犹太人,给保守党一个席位也仍然是困难的……”³⁰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法国传统的左右分野也与宗教隶属有关。这个国家持保守态度的、世俗的、反教权的和新教的工商业者,不支持拥护教权的保守政党,而激进的天主教徒,也不支持激进的反宗教政党。当以经济利益或按照自由—保守的线索看待政治时,这种似乎不合理性的情形,实际上可以使具有其他价值标准或纠葛的群体及其成员显示更强的特色。³¹

一个多少有些类似的因素是地理区之间或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

美国各州内部政治的许多问题涉及州内大城市与其余地区的分歧。这类利益分歧可以阻止全国性争论成为分歧的根源。³²

美国的基本制度有助于维护连续性，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详加讨论。它的制度容许社会结构变化所引进的新冲突，而这些冲突与其说是通过支持反对党表现出来，不如说是体现在居支配地位的政党内。奉行党内派别政治有助于在全国的候选人名单上的候选人获胜。不过，关于选民个人如何调整他们初选时支持激进派，全国大选时支持保守党的冲突，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北达科他州和其他一些州。

这些“结构性”因素赖以存在的基础多少有几分心理学性质，这更有助于说明投票模式的历史连续性。一个群体断然放弃传统的政治忠诚或政治连续性，只能发生在这个群体感到某些经验明显影响它的利益，需要采取新的政治态度之时。民主政治带些模糊性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两党制国家；这种模糊性可以阻止断然放弃忠诚，使对制度化投票模式提出尖锐挑战的事态，不致经常发生。试看一下美国的不同种类的选举，有些选举如 1896 年和 1936 年的选举，阵线分明，表现出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分野，大多数选民对此很容易理解，并深受影响。这样的选举与其说是规律，毋宁说是例外。在涉及两党的选举中，两党都设法得到几乎每个选民群体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对本党有某种传统忠诚的群体的支持。因为刺激因素模糊而复杂，没有截然的分野，许多选民会回到通常得到现存社会关系支持的老的忠诚和行为上去。

有助于强化模糊效应的另一个因素是，较大多数选民在最稳定的民主制中对正常条件下的政治相对比较冷淡，尽管模糊效应或许也部分来源于此。有大量研究报道，只有约 20% 到 40% 的选民说，他们对政治有认真考虑，或相信他们能影响政府，或积极参与政治讨论。这个“冷淡的多数”多半会以现存的群体模式作出反应。当投票情况发生变化时，这个大群体将倾向于阻止冲动，因为决定变化发生的政治刺激对他们影响最小。例如，美国的天主教徒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仍然按 20 年代的宗教分歧投票，而不是按当时的阶级分野投票，这些教徒对政治的兴趣或参与是最小的。³³

分析政治忠诚的变化类似于分析连续性。对群体态度变化的大多数解释认为，一个党不再反映某一群体的要求，因而这个群体改变了它的态

度；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处境和要求发生了改变，因而自行改变了它的政治忠诚。³⁴因为有许多场合，忠诚模式继续存在而不发生改变，所以这种分析显然必须考虑如下事实：政治忠诚不仅有“自己本身的生命”，可以在其合理基础消失很长时间以后持续存在，而且政治策略、新的主张、有吸引力的候选人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也可以争取群体的支持，使它们脱离它们传统上所属的政党；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既与社会结构无关，也与我们通常预期存在在政党纲领与群体支持间的对应关系无关。

不过，即使有这个限制条件，群体社会境遇的长期变迁通常仍可能与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左或右）有关。哪怕不是即时的或直接的。例如，或许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左翼或改革的政府引进一种自毁过程，把衰落的群体纳入国家结构，比如承认穷人的要求，那么改革运动就会使某些穷人加入保守行列。在别的场合为了解释农民激进运动的涨落，我曾论证过这个论点：

在1935年最萧条期，新西兰农民支持工党的价格保证政策，当时，低价威胁到农民的安全。但是，在萧条结束以后，农村地区转而反对工党的计划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既要求实行最低价，又要求实行最高价，使更贫困群体增加了收入。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应有组织的农民的要求，制定了平价担保政策和收成保险政策。可是在这样做时，他失去了农村地区包括一度激进的小麦区的支持。在俄国，在布尔什维克把土地所有权给予农民以后，失去了农民的支持。³⁵

最近已证明，美国的黑人和英国的贫苦工人，对繁荣期影响了大部分其他阶层的保守趋势有抵制力。这或许表明，美国黑人和英国的贫苦工人，境遇改变并不足以改变他们对原来境遇的体验，他们仍然不满意，而其他下层阶级得到好处就足以开始与传统决裂。³⁶执政的保守派，就获得支持而论，同样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他们抵制作必要的态度变化。

态度变化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政权在民主制中的调和性。这是自毁性的，因为执政的政治家在面对各种利益冲突作决定时，必然会疏远支持他们的力量。在一段时间以后，这种不满的积累可以见之于慢慢失去民众的支持，甚至在那些一贯最受益的群体中。

如果群体从支持一个政党变为支持另一政党主要是出于对某种理性矛盾——群体的利益或社会地位与它支持的传统政党的纲领发生抵

触——作出的反应，那么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明确，这时，群体很可能将按它的确定利益作出反应，并发生相应态度变化。例如，黑人在明白了新政派的政策比共和党的政策更有利于他们以后，就转而支持民主党。在黑人看来，种族关系问题既是突出的，又是明确的——与影响社会其他群体的大多数问题相比。

讨论 1955 年普选以来英国选民在各次补选中选举行为的变化，可以使研究参与和选举抉择等章节所提出的许多论点更有说服力。英国民意测验权威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在解释工党得票比例上升而实际支持力量从 77% 下降到 64% 时引用了这样一个关键因素：保守党的支持者在对该党的忠诚上一直在弱化。据多次民意测验，这些支持者主要是年老的工人阶级托利派，他们一生都投保守党的票。可是在他们年老时，他们欣赏和需要福利国家制度的好处，而不满托利派财政政策对这些好处的某些削减。传统的政党忠诚与所感受到的政治需要发生了矛盾，面对这种交叉压力，大部分老年工人阶级托利派分子，陷入犹豫不决状态，采取弃权行动，或者干脆转向工党。但是艾布拉姆斯注意到在熟练体力工人当中一直存在一个相反过程。这个群体的收入和经济地位自 1940 年以来有了明显改善，正在逐渐获得中产阶级的旨趣和抱负，而这种价值观的变化在他们当中又引起偏向保守党的态度转变。³⁷ 最后，始终得到较多支持的是保守党，而不是工党。

结 论

强调社会阶级作为政党选择和政党分野的主要决定因素，似乎证实了 19 世纪许多保守主义者的如下担心：如果给穷人选举权，他们就会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投票。因为有这种信念，几乎每个西方国家中的保守主义者都反对建立这样一种政治系统，即在这种系统中，代表成年人口大多数的政府可以制定它希望制定的任何法律。³⁸

虽然这些预言人们在民主社会中将按阶级分野投票的人，已大体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向普选权自然而然意味着下层阶级政党永远占据优

势这一观点——它的出现或许意味着民主政治的终结——提出挑战的人，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包括某些主要保守派人物在内的后一派认为，负有社会责任的上层阶级可以拥有足够多的下层阶级的忠诚，以维护其领导地位。例如，迪斯雷利就明确说过：“诚实、勇敢、温厚的英国人民”不会滥用男公民选举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迪斯雷利代表乡村的上层阶级政党，该党对其统治能力的信心是基于乡村地区成功的家长制统治。迪斯雷利认为，类似的关系可以引入整个国家。³⁹

在政治尺度的另一头，卡尔·马克思同样不认为穷人必然是一种有效的左翼政治力量。他认识到下层阶级的一些部分实际上支持现状。马克思是用如下前提条件来解释这种支持（他称之为“虚假的觉悟”）：（1）下层阶级进入主体政治，承认现存的分层排列的合法性；（2）社会的基础机构——宗教、教育、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支持现存秩序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理念和价值。对于下层阶级成功的掌权，马克思要悲观得多，相比之下，许多保守主义者却把他们关于合理个人利益的一些设想落实到穷人身上。

为什么阶级与投票行为之间不存在更密切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某些已经讨论过。最重要的理由（不能从研究投票人的情况中得出）或许是，民主政治竞赛中的主要参加者——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不断作出调整，必须使体系保持平衡。政党关心的是保持使它在下次选举中继续执政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因此，当历史事件使选民所感到的需要发生改变时，民主的政党就修改它们的纲领，以保持选票或赢得选票。保守政治家懂得如何在左的压力下保持体系平衡的典范是本杰明·迪斯雷利。他认识到保守的政党必须找到一个能吸引工人阶级的基础，因此，他建议成立保守的工人阶级社团。保守党在英国各地成立的这些社团，有意识努力吸引工人阶级。一些工会领导人和其他工人代表被邀请参加。迪斯雷利希望，对工人的各种让步——给成年人以选举权，制定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法律——会赢得他们对保守党的忠诚。他认为，保守党明确属于上层阶级的传统地位不能靠成人选举权来维护，并确信，通过代表工人，保守党能享有他们的忠诚。英国的政治史似乎部分证实了迪斯雷利的观点，因为保守党能得到和保持相当大比例的工人阶级选票。今天，每两个保守党支持者中，就有一个是体力工人。

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稳定的民主国家,存在一种左的固有趋势。有一段时期,左翼政党以它们增加下层阶级相对权利和安全感的措施赢得了支持。这些措施,在19世纪被视为明显的社会主义而遭斥责,而今天保守的演说家对此却津津乐道。例如,英国保守党就是通过搞“比较有效的管理社会主义”来维持其领导地位的。该党能够这样作,是它的成功,也是它的不幸。说其成功是因为它仍然居社会之首,说其不幸是因为它必须放弃它高度评价的许多东西。

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倾向而言,不断向反对者的纲领让步,并不是合适的解决办法。保守的政党拥有大量可以有效用于延缓左翼改革的资源。正像把阶级分野视为政治分野的主要基础时左翼得到好处一样,当非阶级的问题——对外政策、伦理道德、管理效率、候选人的人格——成为选民的中心问题时,右翼往往得到好处。因此,就保守的政党能使选举围绕非经济问题展开而论,它可以降低改革的压力,增加它选举取胜的机会。保守的政党更接近新闻界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这有助于它确定选举的争论点,特别是在经济要求不突出的繁荣时期。

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党,一个党与较富裕的阶层关系密切,另一个党与较穷的阶层有联系;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民主政党制,在美国的存在时间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长。对制度化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方式的考察,使稳定民主政治所需机制更加昭然了。本书下一部分将在美国社会的框架内,进一步考察这里讨论到的许多问题。

注 释

1. 关于年龄差别的一般性讨论,见 Robert E. Lane, *Political Lif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pp. 216—219; 以及 Herbert H. Hyma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assi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后一本书是美国关于政治世代形成问题的最好讨论。

2. K. Mannheim,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P. Kecskemeti,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276—322; R. Behrendt,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das Generationsproblem,” *Köln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11 (1932), pp. 290—309; Sigmund Neumann, “The Conflict of Genera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 *Vital Speeches*, 5 (1939), pp. 623—628; Sigmund Neumann,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2); Rudolf Heberle, *Social*

Movements(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1), Chap. 6.

3. Edward Spranger, *Psychologie des Jugendalters*(Leipzig: Quelle und Meyer, 1925), p. 212.

4. Arthur Dix, *Die Duetschen Reichstagswahlen, 1871—1930, und die Wandlungen der Volkgliderung*(Tübingen: J. B. C. Mohr, Paul Siebeck, 1930), pp. 34—35.

5. Hans Gerth, “The Nazi Party: Its Leadership and Compo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5(1940), pp. 530—541.

6. John Morsell,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Negroes in New York City*(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7.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4), p. 24; Bernard Berelso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 70; S. J. Korchin,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Behavior of Voters*(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46).

8. B. Berelsom, P. Lazarsfeld, and W. McPhee, *op. cit.*, p. 96; L. Harris, *Is There a Republican Majority?*(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p. 218.

9.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 166. 该书还对其他美国研究以及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调查作了报道。

10. O. Handlin, *The Uprooted—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Boston: Little, Brown, 1952); R. E. Park and H. A. Miller, *Old World Traits Transplanted*(New York: Harper & Bros., 1927).

11. Mark Benny and Phyllis Geiss,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s in Greenwi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50), pp. 310—327.

12. K. Davis and J. W. Combs, Jr., “The Sociology of an Aging Population,” in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The Social and Biological Challenges of Our Aging Popula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46—179; O. Pollak, “Conservatism in Later Maturity and Old 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943), pp. 175—179; L. H. Fisher, “The Politics of Age,” in M. Derber, ed., *The Aged and Society*(Champaign: 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Association, 1950), pp. 157—167.

13. H. Cantril,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41), p. 192;关于战后繁荣时期强大老龄运动的讨论,见 Frank A. Pinner, Paul Jacobs, and Philip Selznick, *Old Ag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 Case Stud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14. Samuel A. Pratt, *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48).

15. Wiardi Beckman Institute, *Verkiezingen in Nederland* (Amsterdam: 1951), mimeographed; J. J. de Jong, *Overheid en Onderdaan* (Wageningen: N. V. Geber. Zomer and Keunings Uitgeversmij, 1956), p. 105.

16. H. G. Nicholas,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50*, p. 303; De Jong, *op. cit.*, pp. 81, 92—93.

17. L. Harris, *op. cit.*, p. 173; F. I. P. O. (Frenc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La verité sur la pratiques et les sentiments religieux des Français,” *Réalités*, 82(1952), pp. 36—44; 另见“La France est-elle encore Catholique?” *Sondages*, 14(1952), No. 4; De Jong, *op. cit.*, pp. 98, 109, 114, 119.

18. Joseph Schumpeter, “The Decade of the Twen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upplement*, 36(1946), p. 1—10.

19. Ralph and Mildred Fletcher, “Consistency in Party Voting, 1896—1932,” *Social Forces*, 15(1936), pp. 281—282.

20. 关于桑达斯基城(Sandusky)的研究见 P. F. Lazarsfeld, B. Berelson, and H. Gaudet, *op. cit.*; 关于埃尔迈拉城(Elmira)的研究, 见 B. Berelson, P. F. Lazarsfeld, and W. McPhee, *op. cit.*。

21. V. O. Key, Jr., and Frank Munger, “Social Determinism and Electoral Decision: The Case of Indiana,” in E. Burdick and A. J. Brodbeck, *American Political Behavio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9), pp. 281—299. 沿这条线索对 1952 年至 1956 年间的政治态度变化作了分析, 这段时间选民的社会特征几乎无任何改变, 但在再次分析密歇根调查中心(the Survey Research Center)所收集的资料时, 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表现出向支持共和党方向的转变。见 Donald E. Stokes, Angus Campbell, and Warren E. Miller, “Components of Electoral Deci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958), pp. 367—388.

22. 见本书第九章关于这种现象的讨论。

23. 关于持续性的讨论见 V. O. Key, jr.,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R. and M. Fletcher, *op. cit.*, pp. 281—285; 以及 F. Goguel, *Géographie des elections française de 1870 à 1951*, *Cahier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no. 27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1)。

24. V. O. Key, Jr., *op. cit.*, pp. 280—285; Alexander Heard, *A Two-Party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2), pp. 40—45.

25. 关于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第十一章。

26. 尽管有比较高的投票率, 而且城市因素、工业因素和少数民族因素都是有利的, 为什么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民主党人未能赢得选举,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见 Duane Lockard, *New England State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59), pp. 62—65. 洛卡德(Lockard)把这种失败主要归因于种族集团间的派别斗争,以及民主党领导人在组织上的无能,因为他们更关心对他们的赞助。这两个因素都可以看成是该党少数党地位时期的残余——领导人不能改变全党观点的政治滞后部分。

27. A. Heard, *op. cit.*, pp. 74—75. 小 V. O. 基(V. O. Key, Jr.)曾指出:“候选人初选时两位或多位竞争者争夺党的提名的激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该党候选人在普选中取胜的预测。在党的目标看来没有希望获胜的那些选区,立法职位候选人提名不产生争议几乎是惯例,而在比较有把握的选区,竞争提名当候选人的人数比例则很大。”见他的 *American Stat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6), p. 172. W. H. 斯坦丁(W. H. Standing)和 J. A. 罗宾逊(J. A. Robinson)为“安全的”选区和“竞争的”选区提出了详细数据,并证实了小 V. O. 基的观察结果。他们发现,通常而言,主要政党参加初选的候选人人数(2.31)差不多比次要政党参加初选人数(1.39)多 1 个。见“Inter-Party Competition and Primary Contesting: The Case of India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1958), pp. 1066—1077。

28. E. N. Doan, *The La Follettes and the Wisconsin Idea* (New York: Reinhardt, 1947), p. 6.

29. H. G. Gaston, *The Non-Partisan League* (New York: Henry Holt, 1940); A. A. Bruce, *The Non-Partisan League* (New York: Macmillan, 1921).

30. “How to Get Chosen; A Elementary Guide of Becoming a Member of Parliament,” *The Economist*, 191(May 2, 1959), p. 405.

31. André Siegfried, *Géographie électorale de l'Ardeche sous le troisième républicain*, *Cahier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no. 9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49).

32. Harold F. Gosnell, *Grass Roots Politics: National Voting Behavior of Typical States*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2), *passim*.

33. B. Berelson, P. F. Lazarsfeld, and W. McPhee, *op. cit.*, pp. 69—70.

34. 在群体和个人选举行为变化的分析中,存在令人难以理解的差异。在研究群体时,政治学家把选举行为变化解释为对新形势或新因素作出的合理反应。而在个人水平上,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按群体对个人的压力来分析这种变化,或者分析为对个人需求——其中某些是合理的,但许多是潜在的或不自觉的——的回应。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明显不同的分析模式尚没有作理论上的统一。

35. S. M.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p. 229.

36. 关于黑人的投票模式。见 E. Litchfield, *Voting Behavior in a Metropolitan Area*, *Michigan Governmental Studies*, No. 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1), pp. 58—59; Louis Harris, *op. cit.*, pp. 152—160; 关于

英国，见 John Bonham, *The Middle Class Vote* (London: Faber & Faber, 1954), pp. 154—155。

37. 见 Mark Abrams, “Press, Polls and Votes in Britain since the 1955 General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1(1957—1958), pp. 543—547。

38. 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存在许多对直接民主的限制；有些限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些限制一直保留到今天。英国上议院对立法的否决权直到 1911 年一直没有修正，在 1948 年以前，仍然有相当大的拖延批准权。只是在 1945 年工党取胜以后，英国才取消了财产拥有者和大学毕业生的双重选票。在普鲁士，选举的三院制一直持续到 1918 年；在这种选举制下，以下层阶级多数为基础的政府是不可能产生的。美国参议员的直接选举直到 1916 年还没有出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限制仍然存在，或只是在最近才取消。

39. 在 1861 年，拿破仑三世劝告普鲁士政府引入普选制：“通过普选，保守的乡村人口可以用选票压倒城市中的自由党支持者。”见 F.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s* (München: G. R. Oldenbourg, 1922, 6th ed.), pp. 517—518, 以及 F. Naumann,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Berlin: Schonberg, Buchverlag der Hilfe, 1910), pp. 16—17。

第三篇

.....

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

第九章

美国政治中的阶级和政党

美国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建立了“劳工”或“工人”历史上第一批以他们的名义定名的政党，回想起这件事，往往使人感到震惊，特别是对欧洲人来说。在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强调“无阶级性”，使欧洲和美国的许多政治评论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政党分野较之其他西方国家与阶级分野的关系较小。然而选举研究表明并非如此，在 1936 年以来美国的每次选举中（此前没作过这方面的研究），每当人们的职业地位或收入下降时，支持民主党的比例就急剧增加。在 1948 年，几乎 80% 的工人投票支持民主党；这个比例高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左翼政党历来见诸报道的得票率。每年，低收入的非熟练工人都最支持民主党；即使在 1952 年，仍然有 2/3 的非熟练工人支持史蒂文森，虽然当年支持民主党的体力工人的比例下降到 55%——这种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得自艾森豪威尔“超越政党”的个人魅力，而不是下层阶级对民主党产生了实质性的疏远。¹

一般地说，大多数工人，甚至许多在 1952 年和 1956 年投票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工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且，1954 年和 1958 年国会选举显示，支持民主党的传统基础并没有向共和党转移。1958 年接受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人，有 2/3 支持民主党人进入国会。

阶级——现在认为是极一般的分化因素——与政党支持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在非体力阶层中，民主党的支持者少数。除知识职业阶层以外（见第十章），非体力职业选民支持民主党的比例，随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升高而无情地降低。据一项研究，在拥有 10 000

表 9.1 共和党在职业群体和工会会员中的得票百分比*

	1940 年	1948 年	1952 年	1954 年	1956 年
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员	64	77	64	61	68
白领工人	52	48	60	52	63
体力工人(熟练的和非熟练的)	35	22	45	35	50
农民	46	32	67	56	54
工会会员	28	13	39	27	43

* 1940 年的数字是选举前的投票趋势,据如下来源的资料重新计算:Hadley Cantril, *Public Opinion, 1935—1946*(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602. 由于资料来源中没有给出各种情况的人数,所以为了便于对几种职业加以比较,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对每种职业人数的相对比例作了估计。1948 年的数字是全国随机抽样报道的实际得票率,资料来源: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Row, Peterson and Co., 1954), pp. 72—73. 其余资料见美国民意研究所 1958 年 10 月 12 日的新闻稿,都是实际得票结果。

名雇员的公司领导人中,只有 6% 支持民主党。要说明地位差别作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因素的普遍性,最好的例证或许是美国大公司总经理的政治忠诚。1955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所作的这项研究,是基于访问系统取样得到的 1 000 名这种身份的人。研究发现,即使在这种上层经济团体内,一个人所领导的公司越大,他也越可能是一名共和党人(见表 9.2)。

表 9.2 公司规模与公司总经理政党忠诚的关系——1955 年*

公司规模(工人数)	共和党(%)	民主党(%)	无党派(%)
多于 10 000	84	6	10
1 000—9 999	80	8	12
100—999	69	12	19

* 这里的资料是经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同意向作者提供的。

与这些研究结果相一致的是公众对每个党的典型支持者的印象。1958 年国会选举前不久,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向全国范围抽样的被调查者提问了如下问题:典型的民主党人什么样? 最常见的回答是:“中产阶级……普通人……爱帮助人的人……平常人……为挣工资工作的人……处于一般水平的人……为大家着想的人。”相反,典型的共和党人是:“经济较富裕的阶级……富有的……大工商业者……有钱的选民……经济上处境良好的……富有财产的……地位较高的阶级。”²

总之,民意测验数据证实了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1917 年得出的结论:“财富的重心在共和党一边,贫困的重心在民

主党一边。”³ 比尔德的结论是基于对各种地理特征的考察,最近利用这种社会生态方法所作的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结果。例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阿瑟·霍尔库姆(Arthur Holcombe)发现,在城市众议员选区,“支持者的分布也是一样的。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支持共和党的选区,只是那些收取最高租金的选区……最一贯支持民主党的选区是那些收取租金最低的选区……收取租金中等的选区是对这两大党观点最持怀疑态度的选区”⁴。对后来强烈支持共和党的圣克拉拉县(旧金山市郊区)1934年政党登记的详细调查发现,在高职业地位与登记的共和党员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有大约75%的工厂负责人、银行家、经纪人、公司经理公开承认是共和党人,而在罐头食品厂的工人和其他非熟练工人中,这个比例是35%。在每个大职业群体中,拥有财产的人较之不拥有财产的人,登记为共和党员的可能性大得多。⁵

虽然对美国政党与阶级分野之关系的大多数概括是基于各政党选民背景的差别,但至今仍缺乏证据证明在领导层存在同样的差别,特别是在地方社区的领导层。对印第安纳州3个县初选时提名出任县级公职的候选人的背景研究显示,在领导人与选举人的特征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那些寻求共和党提名的人,有76%从事专业工作或工商业管理工作,而民主党候选人的竞争者,有42%是体力工人(见表9.3)。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民主党地方干事有54%是体力工人,或是售货员和办事员。这些群体的成员只有10%属于共和党,而共和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专业人员或经营工商业公司。⁶

表 9.3 印第安纳州 3 个县提名出任县级公职的候选人的职业背景——1954 年*

职 业	共和党		民主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专业人员	23	25.8	17	17.7
管理人员	45	50.6	25	26.0
办事员—售货员	8	9.0	10	10.4
体力工人	11	12.4	40	41.7
其 他	2	2.2	4	4.2
总 计	89	100.0	96	100.0

* Frank Munger, *Two-Party Politics in the State of Indiana* (un-published M. S. thesi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1955), p. 275; cited in V. O. Key,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Crowell, 1958), p. 240.

同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也受到宗教因素和种族因素的强化。调查表明,在各基督教派中,一个教派全体成员的平均收入越高,它的成员越可能投票支持共和党。如果把美国的基督教派按它们全体成员的平均收入来排队,从高到低的顺序是:公理会派、长老会派、圣公会派、卫理公会派、路德教派、浸礼会派和天主教派,这个顺序与把这些教派按支持共和党的倾向排队所得到的顺序一致。这表明,与其说是宗教观念,不如说是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不同教派政治价值的首要因素。犹太教是美国最富裕的宗教团体之一;调查资料显示,其成员最支持民主党。正如我早已指出的,这大概是起因于他们对种族歧视的敏感和缺乏与美国上层群体进行有效的社会交流。不过,宗教信仰或宗教忠诚,以及与之有关的政治价值,似乎对投票行为有某种独立的影响。属于公理会派或长老会派的工人比属于浸礼会派或天主教派的工人,更可能支持共和党。相反,富裕的浸礼会成员或天主教徒比同等富裕的公理会成员或圣公会成员,更倾向于民主党。⁷

粗略地说,同样的差别也表现在各种族群间。盎格鲁—撒克逊人比具有相同阶级地位和较晚移民背景的其他美国人,更可能是共和党人。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是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他极可能是共和党人,而如果他是工人阶级、天主教徒、有新移民血统,则他多半支持民主党。

甚至在两党制发展到目前的形式之前,使社会发生分野的政治争论也往往具有阶级特征。例如对免费公立学校,美国社会的结构和价值没有自发地、合乎逻辑地产生这类学校。更确切地说,正如美国教育史家埃尔伍德·P.卡伯利(Ellwood P. Cubberly)所指出:“除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外,以前或许从来没有什么问题,使美国人民像对设立这种学校那样如此动感情,或者引起如此严重的对抗。”⁸用现代术语说,这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一种斗争,尽管宗教争端也起明显作用。“免费学校的支持者最初普遍被认为是对美国有危险的狂热分子,而这种学校的反对者又被支持者看作是老一套的保守分子,或社会中的利己分子。”⁹在为免费教育辩护的论点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公立学校平等地对所有人开放,有可能阻止阶级分化在共和国内达到如此危险的程度”;而反对者抗辩说,这种学校“会使教育变得太普遍,会把人们教育得脱离他们在社会

中的固有地位……从而有可能破坏长期建立的、极其合乎需要的社会屏障”。¹⁰ 争论一方是较为贫困的阶级，另一方是“老的贵族阶级……社会中的保守分子……纳税人”¹¹。

关于美国政治的含义，或许从来没有什么比得上托克维尔的观察，他在1830年对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明显斗争有如下评论：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美国人的所有国内问题争论，初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或是幼稚的，他简直不知是应当可怜那些一本正经开这样傲慢玩笑的人，还是应当羡慕使一个社会参与这些争论的喜悦。但是，在他着手研究支配美国各派别的隐蔽倾向时，他很容易感到这些派别大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各独立社区始终存在的两个党之一有关。我们越深入探讨这两大党的最深沉的意向，我们越感到，一个党的目标是限制人民的权威，而另一党的目标是扩大人民的权威。我不敢断言美国政党的公开意图甚或隐蔽意图是在这个国家推行贵族政治，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的情感很容易在两党的底层察觉，虽然这些情感逃脱了表面观察，但它们是美国每个派别的根本所在和灵魂。¹²

可见，地位或阶级地位（由经济地位、宗教和种族背景这3个依据来判定）与政党忠诚间的关系，不是美国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研究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的联邦党——美国的第一个保守政党——和杰斐逊的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显示，这两党的基础分别与当代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基础严格对应。联邦党的支持者是富裕农民、城市商人、有英国血统的人、公理会和长老会一类高阶层教派的成员。¹³ 民主党的支持者是城市工人、贫苦农民、苏格兰—爱尔兰裔一类非英国血统的人、浸礼会和天主教一类（后来）较穷教派的成员。1836年到1852年与民主党抗衡的辉格党，是美国的第二个保守政党，支持它的群体同支持联邦党的群体一样，而这时民主党的支持者，也仍然是支持杰斐逊的那些群体，再加上蜂拥而来的欧洲移民的大部分。

虽然共和党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新成立的反奴隶制的政党，但研究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历史表明，它在支持者和领导成员方面都继承了北方的辉格党。对南北战争前纽约州投票行为的详细研究显示，民主党的支持者那时仍然是城市下层阶级、天主教徒和移民。¹⁴

社会科学家搜集的各种证据都表明,美国有经济实力的富人从来没有超过少数派给予民主党的支持。19世纪前半叶纽约政治问题的分析家狄克逊·瑞安·福克斯(Dixon Ryan Fox)曾收集相当多说明这个州各城市上层阶级居住区投票支持联邦党和辉格党的统计资料。¹⁵他援引一个纽约富商巨贾的传记作家19世纪60年代写的话说:

一个极平常的事实是,这34年(从1828年恢复两党政治起)极少有第一流的商人是民主党人。大批大小商人像羊群一样聚集在联邦党、辉格党、克莱党(Clay)或共和党的羊栏中。而纽约第八大街的一节有轨电车就可轻易装下支持民主党的商人。¹⁶

梅布尔·纽科默(Mabel Newcomer)最近对大企业经理在1900年、1925年、1950年的政治观点的研究表明,这个群体有大约3/4的人在上述3个时期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甚至在1925年——通常不认为这一年是美国政治上的阶级冲突年,支持民主党的经理也只有19%。这些资料无疑低估了共和党在企业经理中的多数,因为所依据的不是投票结果,而是党员身份的公开登记,其中包括许多在南方登记为民主党党员的经理,如果他们不住在一党地区,本来应是共和党人。¹⁷

作为民主党在上层阶级中缺乏支持的最后一点提示,看一下圣保罗学校——上层阶级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的孩子们模拟投票选举总统是有某种意义的。从1888年到1932年,共和党候选人一直得到占压倒多数的支持票(见表9.4)。即使是民主党的保守派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在这些上层阶级的少年后代中,也只得到35%的支持票。

表 9.4* 圣保罗学校学生支持民主党的百分比

1888年	35	1916年	23
1892年	37	1920年	13
1900年	19	1924年	16
1904年	—	1928年	24
1908年	17	1932年	18
1912年	37		

* 经重新计算,资料来源: Arthur S. Pier, *St. Paul's School, 1855—1934*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4), p. 181. 原始数据另参见 in E. Digby Baltzell, *Philadelphia Gentleme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p. 316.

党的支持者决定党的政策

美国的两党分立有历史的渊源：一党以穷人为基础，另一党以富人为基础。把美国人按支持这一党或那一党加以划分并不意味着两党总是在意识形态上按传统的“左—右”政治路线分开的。在杰斐逊和杰克逊的时代，还有从1896年到现在的大部分时期，这种争端确曾把两党分开，尽管有某些重要的例外，如1904年和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然而，甚至在两党对传统的左—右分歧不采取对立立场时，它们之间也几乎总有一些争端体现它们社会基础的差别。例如，从联邦党、辉格党到共和党，在19世纪一直较之民主党难于为移民所接受，因此，共和党的一届政府在20年代初颁布了限制移民法。一般地说，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各种排外运动和反天主教运动，都被认为出自地方上的保守政党，如果不是在全国范围的话。¹⁸

甚至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也反映出阶级上的差别。内战前，北方城市下层阶级群体往往反对黑人，对废除黑奴制的斗争漠不关心。在纽约州，保守主义者在1820年和1846年州制宪会议上支持自由黑人有投票权，而民主党的主要发言人要么反对给黑人投票权，要么对此无动于衷。因此，自由黑人是1850年以前联邦党和辉格党的支持者，而且在罗斯福第一次当选，组成对黑人问题表示关注的民主党政府以前，获得自由的黑奴及其子孙一直忠诚地支持共和党。¹⁹1913年到1921年的威尔逊政府，虽然对其他问题采取自由立场，但在其种族政策上反映南方的态度。一些反映新教中产阶级道德的运动，如旨在禁酒、禁赌的运动，或与消除政府腐败有关的运动，也主要是通过保守政党取得进展。在20世纪关于禁酒的争论中，北方的民主党是“湿”党，即不主张禁酒的党，相反，共和党是“干”党，主张禁酒。更有甚者，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作为下层阶级和天主教徒的政党——民主党，基本上是靠撤销禁酒的纲领参加1928年竞选的。²⁰

两党社会基础在种族成分上的差别，也反映在它们的外交政策立场

上。1861年至1913年间唯一一届民主党政府，即19世纪80年代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政府，在许多问题上反对大不列颠，同情爱尔兰自由事业。最近对美国英裔移民的一项研究显示，英裔移民虽然不像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那样被视为单独的或异己的种族群体，但他们在19世纪末组成不列颠俱乐部，作为对抗爱尔兰民主党政治势力的工具。这些英裔移民组织倾向于共和党。²¹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类种族差别也在影响美国的政策。虽然威尔逊本人同情英国和同盟国的事业，但大批非盎格鲁—撒克逊背景美国人，不是仇恨英国，就是仇恨沙皇俄国，因此，正是以中产阶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基础的共和党，支持给同盟国更大的帮助。不应忘记，威尔逊是以一个反战纲领参加1916年竞选的，并赢得或者说吸引了爱尔兰人、犹太人和德意志人对民主党的支持。

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不仅反映它们的种族基础，而且有时也使这种基础得到部分淡化。几百万爱尔兰和德意志血统的美国人，显然不满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²²特别是德意志人，战争期间和战后的社会和经济歧视使他们深受其苦。有些分析家曾指出（虽然证明此点的统计工作还没做），1920年共和党的伟大胜利——哈丁的得票率比共和党成立以来该党的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都高——至少部分是由于一些种族群体的成员脱离了民主党，因为威尔逊使美国参战，他们感到被“出卖了”。

现在多半已经忘记，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其执政的初期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且，民主党的领导在国会起着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用；它认为美国之参战，是受了英国宣传机构和华尔街银行家的哄骗。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由民主党占压倒多数的国会通过的中立法令，已反映孤立主义和反英的态度。在这方面，民主党又扮演了传统角色，代表着主要集团的利益。²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罗斯福置于威尔逊以前所面临的同样的两难境地。他知道，他必须帮助同盟国，但他也想重新作出选择。法国的陷落使他除了给予“战争以外的一切帮助”，已别无选择；不过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他依然允诺美国不会参战。然而，这时与1916年不同，共和党采取孤立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立场——主要是一种选举策略。温德尔·威尔基比罗斯福更赞成介入，但他和他的顾问们明显感到，他们夺取竞选胜

利的唯一希望在于诱使爱尔兰裔、德意志裔和意大利裔选民脱离民主党；这些选民因为他们的原国籍而反对介入。当年的民意测验资料显示，共和党稍占上风，因为民主党在这3个群体中的支持票大幅度减少。这部分损失大概是由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人”转而支持罗斯福抵消的，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此。

种族反应也影响过去20世纪中期对共产党问题的处理。不要忘记麦卡锡参议员是爱尔兰人，代表德裔美国人有很高影响的州。麦卡锡在他对美国国务院中的共产主义渗透的指控中强调，美国被上层阶级有盎格鲁—撒克逊背景的人“出卖”了，被哈佛大学和其他名牌学校的毕业生“出卖”了。他实际上是对在过去两次战争中受到“不忠”指控的孤立主义种族群体说，真正不忠的人是上层阶级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操纵美国与错误的敌人打仗，并把“和平丢给”了俄国人。²⁴在1952年，共和党制定了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吸引这些种族群体，特别是天主教徒和德意志人。艾森豪威尔像他以前的威尔基一样，允许出于选举的权宜考虑去修改他的公开声明。后来的选举结果显示，他在上层阶级的天主教徒、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中取得了重大进展。²⁵

上层阶级的自由主义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近期研究发现，美国政治的某些方面似乎不适合对美国历史作“阶级”解释，例如已经指出的如下事实：较富裕的阶级及其政党，辉格党和共和党，比下层阶级支持的民主党，更反对奴隶制。政治态度的当代研究表明，在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关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与非经济自由主义（有关公民自由、种族关系和对外事务）之间加以区分是必要的。²⁶非经济自由主义中的基本因素实际上不是阶级，而是教育、一般的复杂感，多半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心理安全感。不过因为这些因素明显与阶级有关，所以，非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人越富，态度越宽容），而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地位呈负相关关系（人越穷，对所涉争论越左）。

其实在保守阶层内,领导非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斗争的,一般不是较富裕的阶级,而是那些不同于暴发户的、有公认“老式家庭”背景的阶级。在南北战争以前,大多数废奴主义领导人,正如戴维·唐纳德(David Donald)在《再论林肯》中所指出的,是“来自东北部一些老的、在社会上起支配作用的家庭”²⁷。同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进步党运动,其领导人也来自与废奴主义者一样的阶层,有一样的家庭背景;²⁸这个运动出现在共和党内,反对民主党腐败的城市机构,反对对共和党政治家有影响的大商业托拉斯的发展。废奴主义者和进步党成员,实际上是美国的保守派激进分子;他们有上层阶级的背景和价值观,作为保守主义者,他们以他们反对庸俗的暴发户商人的部分斗争,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

保守派激进主义在美国总是处在困难之中,因为它很少控制它的固有出路共和党。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扩大了成人选举权以后,美国的政党开始受职业政治家控制,他们的主要兴趣是赢得选举,谋求和保持官职,为此而不择手段。这种态度完全与那些暴发户的社会因素相吻合;暴发户也只关心目的(财富和权力),不顾及手段(荣誉和地位)。在19世纪,许多有富裕背景美国人,既反对以下层阶级和移民为基础的政治(民主党),也反对从“追逐金钱的新阶级”得到支持的政治(共和党)。正如戴维·唐纳德就此所说:“他们不支持激进的经济改革,因为(他们)……与主张财产私有制和私人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重大分歧。他们疑虑和悔恨的是,领导权向社会中的劣等群体的转移,因此,他们呼吁改革的声音是刺耳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他们的阶级重新行使以前对社会的统治。”²⁹

这个群体的非经济自由主义,在废除奴隶制、文官制度改革、控制移民(以减少城市的腐化)和国际主义这样一些问题上找到了它的表达。在20世纪,国际主义成了主要问题。国际主义者地方组织的大部分领导成员也似乎来自老式家庭,通常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这些组织倡导集体安全。

这些上层阶级自由主义者,虽然与辉格党和共和党有联系,但每当他们的问题变得突出时,他们就准备帮助组织“第三”党。在南北战争以前,他们在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反奴隶制政党的要求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在创建一个新的自由主义的共和党,旨在消除政府腐

败和实行政官制度改革的努力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他们哺育了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党;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包括他们后来的领导人温德尔·威尔基,曾认真考虑过建立一个新党的问题。从南北战争前的反奴隶制运动,到1940—1941年间由于援助同盟国而成立的保卫美国委员会(威廉·艾伦白人委员会),贯穿着一条连续的线索:他们是为争取荣誉和自由这些“非经济”价值而斗争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是有时要放弃他们阶级的传统政党忠诚的保守主义者。

20世纪中叶,控制大公司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有钱人的子弟,而不是受教育较少的暴发户,这在经济实力和传统地位之间形成了一种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意味着共和党就真的成了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只是有相当多的共和党支部,依然继续发表代表地方小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反动观点。因为共和党的选举力量中心——特别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是在“地方”,而不是在大的中心城市,所以指责它是小城市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比说它是大公司的代理人似乎更合适。

有两种财富:一种是既存上层阶级的盘根错节的公司财富,一种是小企业自己创造的财富;对这两种财富评价的分歧使某些观察者提出,美国的保守派激进主义的真正政党是民主党。民主党实现了迪斯雷利主张的、政党应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而由负责的“治安官”——首先是来自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的罗斯福,接着是“来自乔特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来自索尔兹伯里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G. 门南·威廉斯,来自乔特学校和哈佛大学的约翰·肯尼迪……来自格罗顿学校和耶鲁大学的艾夫里尔·哈里曼”³⁰——来领导的目标。然而,自由派共和党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很可能最终证明,他是上层阶级人士重新直接参政——通过他们的传统政党共和党——模式的真正代表。在这方面,指出如下事实是有意义的:约瑟夫·西尔·克拉克的远亲、在费城作了社会登记的居民、费城的前任民主党市长、现任美国参议员纳尔逊·洛克菲勒夫人,不久前却公开作为第三党纽约自由党的成员登了记。³¹

保守派激进主义在美国历史关键时刻重复出现的这种强硬态度,足以缓解阶级和派别分歧中固有的紧张状态。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描述后来成为进步党运动领导人的那些公司法律顾问的话来说,保守派激进分子从来不希望“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而

宁愿构建一个负责的精英阶层,由这个阶层负责处理民众的改革冲动,使其变得温和些,正如他们说过的,纳入建设性的轨道,即实行领导负责;布兰迪斯(Brandeis)曾贴切地说,这是一种处于富人(自私自利的商人)与人民之间的独立位置,随时准备约束两方面的越轨”。³²从政治稳定的观点看,保守派激进主义足以维护两方面的忠诚:一方面是从必要的改革获益的、无特权的非自己人群体,另一方面是因同样的改革措施而受到伤害的保守阶层。上层阶级成员参与自由主义政治活动也可以看作是开明的自私自利,因为这种参与可以实现必要的改革,可以起约束作用,而且按照E·迪格比·巴尔茨尔(E. Digby Baltzell)在《费城的绅士》中的说法:“可以使上层阶级对整个起作用的阶级系统的影响绵亘不绝,因为真正的事实是:在通向权力的新的道路上,他们占据重要位置。”³³同时,还足以模糊使政党截然分开的阶级界线。

一党州的影响

区域主义——民主党控制南方,共和党传统上在北方许多州占优势——是对美国政治的阶级基础的一种重要偏离,然而也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偏离。³⁴除了南方以外,很难估计美国的选举行为,现在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反映对某一政党、独立于其他因素的传统区域感情。共和党在南方以外地区的力量,主要基于某些地区有多数人拥有“共和党”的社会特征:农村和小城镇的中产阶级新教徒。在传统上是共和党势力范围的新英格兰,共和党已不再控制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那里现在已高度城市化,民主党坚守阵地,自持有余。在缅因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农村和小城镇的选民起重要作用,天主教徒的比例有缓慢增长。20世纪50年代以前,共和党一党统治一直是州政治的特征,直到现在,这种统治在后面两个州仍然远没有失势,尽管1958年佛蒙特州在106年中第一次选出了一名国会议员。同样情况也见于中西部的一些农业州:缺少大城市中心意味着那里的许多州依然是共和党的天下。说明共和党力量在它占优势的州并不代表忠于一党的纯粹区域感情的最充分证

据是,在这些州,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基本上支持民主党,而且在主要城市中心,支持民主党的占多数。例如,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两个最大城市——伯灵顿和曼彻斯特,都是民主党的古老堡垒。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工业城威诺斯基,民主党得票率高达90%。

不过,尽管北方许多地区的一党性质可以用居民的社会特征加以解释,但一个党长期控制一个州会使少数党的选票进一步减少,甚至在预期会支持它的群体中。如果一个党没有可能赢得胜利,不可避免地会使它减少投入选举的努力。在共和党占优势的州中寻求进入州政府的民主党候选人,或者在南方的州中共和党谋求出任公职者,常常都是一些几乎没有政治号召力的人。于是,全国性政党或支持它的其他组织,如工会或商业集团,会感到在这样的州为选举花钱是浪费,因此也就很少花钱。³⁵此外,因为从政的唯一道路在许多北方州在于跻身共和党,而在南方,在于进入民主党,所以,北达科他州或佛蒙特州之类州的许多有雄心的自由主义者,成了活跃的共和党人,而南方的右翼保守主义者,为了从政,选择了民主党。³⁶在南方,领导共和党最好的人是民主党人,而在某些北方州,有能力的民主党政治家往往是共和党人,这大概就是一党统治得以长期为继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这种情况也常常使这个唯一的党离开它“正常”应处的某种居于两党之间的位置,进一步向左或向右,因为它必须适应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的要求。

政治的国家化

南方州的政治模式是对反映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和宗教差别之政治多样性的正常情景的重大偏离。除了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得势的一个短暂时期以外,南方从重建运动结束到1928年的历次总统选举中一直坚定地支持民主党。从1928年起,有某些南方州在四次选举——1928年、1948年、1952年和1956年——中,脱离了民主党,尽管它在这个地区所有州的州和地方层次上仍然占优势。³⁷1928年的脱离是因为南方农村和小城镇中一部分新教徒不满民主党提名天主教徒、反禁酒主义者阿尔·

史密斯作候选人。后来的三次脱离，则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执政时美国政治国家化的结果：南方部分比较保守的州反对全国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支持黑人平等权利，支持工会和敌视大企业。

美国的政治国家化是新政—公平施政革命以及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主要后果之一。不涉及左—右或外交政策分歧的小范围问题已降低了重要性。而且还发现，传统的宗教因素、种族因素和区域因素也在失去影响，尽管它们在有突出的外交政策争论时，仍然起某种作用。1952年，艾森豪威尔以多数票赢得了南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其得票率大致相当于他在北方城市中心的类似居住区。³⁸这一年，中产阶级天主教徒多数投票支持共和党（转变是由前面讨论过的外交政策争论促使的），而大量工人阶级天主教徒，特别是那些加入工会的天主教徒，仍然支持民主党。³⁹当时，职业地位、收入一类因素和选民所在地区的阶级性质，把两大党的支持力量分得如此分明，这是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所不曾有的。⁴⁰

然而，阶级因素的重要性不应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各个民主国家一样，有不少工人和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偏离了各自阶级的主流。两党制可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两党的支持力量旗鼓相当，徘徊在50%。因此，在每个工业化国家，保守政党必须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在美国和英国，正如前一章所指出，共和党和保守党必须接受各自对手提出的许多改革。⁴¹实际上，向左逐渐转变的保守主义者在全面统计数字上反映的，只是民主政治的地方性现象——穷人总是占多数。⁴²

“较穷的”人占多数也意味着保守主义者必须经常设法淡化政治问题的阶级色彩。因为人民按阶级观点有意识地投票，显然有利于左翼政党。因此，共和党总设法强调非阶级问题，如军事防卫、外交政策、贪污腐败等等。⁴³

阶级和非阶级因素影响选举行为的方式，可以在一项关于艾森豪威尔吸引力来源的调查中看到。政治社会学家奥斯卡·格兰茨(Oscar Glantz)发现，1952年支持艾森豪威尔的选民本身，在职业地位和传统政党忠诚上有很大差异。一个群体富裕程度越高，它的成员投票支持艾森豪威尔越可能用他们认同于共和党而不是认同于艾森豪威尔来解释；越可能强烈支持企业界；越可能对国内政治问题持保守态度。相反，脱离民主党

“转向”艾森豪威尔的人，比传统的共和党人要穷，对企业界较少好感，在国内问题上较为自由，并援引艾森豪威尔的领导才干和他们对民主党处理朝鲜战争之类非经济问题的方式的不满等因素，作为他们 1952 年支持共和党的理由。与这里的分析一致，格兰茨指出，政治行为的利益基础并没有因艾森豪威尔的胜利而削弱，而宁可说，这次胜利显示了与阶级问题有关的忠诚在非经济因素刺激突出时所可能被压抑的方式。⁴⁴

政治上“温和”的现行精神，乍看起来似乎与阶级因素在区分两党支持者中越来越重要的论点不符，其实并非如此。有两种潜在的基本过程可以解释现在两党向中间立场的转变。一种过程已为许多政治评论家所强调，其效应是使国家享有长期繁荣，并由此而使全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据论证，这会导致支持民主党的下层阶级基础在人数上下降，所以，民主党若想取胜，就不能倡导改革措施。另一种过程至少像经济条件变化一样重要，其效应是对两党在执政或在野时意识形态“面貌”的影响。“在野”党的政策基本上是由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代表提出的。因此，当民主党在野时，像现在一样，是由保守的或中间派的南方人领导，而当民主党占据总统职位时，共和党在国会的领导向右转得最厉害。

一个民主党的总统，总是永远倾向民主党国会领导层的左翼，因为他基本上是由大城市的工业州选出的——工会和一些少数派组织在那里构成了民主党的支柱，虽然南方人继续控制民主党国会代表团。同样，在目前情况下，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也必须保持倾向其国会支持者中的左翼，因为他也必须谋求获得或保持工业界和城市的支持，并因此求得全国更开明地区的支持，虽然大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是在“稳健的”保守地区选出的。因此，在共和党担任总统职务时，该党与其处于反对党地位相比，则趋向于左翼，而民主党当其由总统职位转变为国会反对党时，则趋向右翼。这种转变造成了一种使两党的政策往往显得几乎难以分辨局面。

20 世纪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当反对党提名总统候选人时往往面临意识形态危机。从 1940 年到 1952 年，每届共和党大会都目睹了右翼国会候选人——塔夫脱或布里克——与自由派州长候选人——威尔基、杜威和艾森豪威尔——间的斗争。自由派的候选人总是得到提名。民主党在 1952 年和 1956 年面临类似问题，但解决办法似乎有所不同：提名比较保守的候选人史蒂文森，而凯弗维尔和哈里曼一类比较直言不讳的自由主

义者受到拒斥,这差不多就像在 1944 年,该党选择了后来的温和派杜鲁门作副总统候选人,而拒斥了自由派人士华莱士。两党职业政治家反应上的这种差别,大部分反映他们对边缘选民——要成为某种多数,必须赢得这部分选民——性质的判断。共和党政治家可能确信其可以得到南方以外几乎所有选民、特别是“乡下人”的支持,所以,他们必须增加他们在城市较自由阶层中的得票。民主党政治家拥有工人阶级和自由派人士的全部选票,但他们很可能失去持中间立场的温和派。因此,两党职业政治家的选择是成为一个中间派人物。

两大党社会基础的这种差别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这表明,信仰两党在美国政治中半斤八两理论的那些人受了竞选的蛊惑,而没有看到分歧的根本基础。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以分清下层基础与意识形态而自豪,然而却把他们的意识形态误认为是下层基础的。⁴⁵ 美国政治家,特别是保守的政治家,总是设法压制对两党真正差别的任何公开强调,即两党各自基于和代表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群体和不同宗教的事实。公开承认和强调这些差别似乎会失去选票。每个党都想从属于与其他派别有关之群体的人那里得到选票。因此,保守政党的理论家从克莱到塔夫脱都没有获得总统提名,而被党的职业活动家所否决。辉格党在 1840 年和 1848 年只能击败“煽动分子”的党——这是描述民主党所用的语言,可是在这两次选举中,它却都提名一些政治观点几乎不为人知的战争英雄作候选人。1848 年,辉格党领导人开始提名墨西哥战争的英雄扎卡里·泰勒为总统候选人时,“人们还不知道他正式参加了什么党”。这种做法在以后 100 年一再为共和党后继者所重复。⁴⁶ 受下层阶级支持的民主党人几乎从不阻止提出明确的利益要求,但即使对他们来说,出于选举策略,也常常不谈论阶级觉悟。民主党人长期一直为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工人和少数民族群体所接受;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这些群体为基础新建党的各种努力都归于失败的原因:民主党是下层群体政治意识的代言人,这差不多就像共和党为较有权势的阶层实现类似功能一样。⁴⁷ 争取选举多数迫使两党制中的两党在它们的选举策略中要考虑吸引中间派,这个问题显然并没有否定托克维尔至今仍正确的观察:美国的两党是在各种群体中永远存在的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反映,亦即在较富的人与较穷的人之间永远存在冲突的反映。⁴⁸

对于这些关于美国阶级和政治的概括,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一个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教授和科学家;另一个是南方的富人。这两个群体都给民主党广泛支持。下面两章将通过研究美国知识分子政治行为的潜在根源和怎样从南北战争以前根深蒂固的政治阶级斗争产生当代南方一党政治,来解释这两种情况。

注 释

1. 见 Herbert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The Political Appeal of President Eisenhowe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7(1953), pp. 443—460。他们根据 1947 年至 1948 年的民意测验结果——已经显示艾森豪威尔可能赢得两党支持的总统职位——证明了这一点。

2. 美国民间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1958 年 11 月 2 日新闻稿。见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Evanston: Row, Peterson and Co., 1954), p. 211, 其中论到 1952 年选民对每个党支持者的印象。

3. 转引自 V. O.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4th ed. (New York: Crowell, 1958), p. 235。

4. Arthur Holcombe, *Our More Perfect Un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35。另见 Samuel Lubell,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6), pp. 51—55, 以及 Duncan MacRae, Jr., "Occupations and the Congressional Vote, 1940—195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955), pp. 332—340。

5. Deway Anderson and Percy E. Davidson, *Ballots and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 118—147。

6. Leon D. Epstein, *Politics in Wisconsin*(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8), pp. 186。

7. 关于犹太人态度的一般性研究,见 Lawrence H. Fuchs,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American Jews*(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另见 Werner Cohn, "The Politics of the Jews," in Marshall Sklare ed., *The Jews: Social Patterns of an American Group*(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pp. 614—626。见 Wesley and Beverly AllinSmith,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Political-Economic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2(1948), pp. 377—389;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2; W. F. Ogburn and N. S. Talbot, "A Measurement of the Factors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28," *Social Forces*, 8(1929), pp. 175—183; H. F. Gosnell, *Grass Roots Politics*(Washington: Ameri-

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2), pp. 17, 33—34, 55, 102; S. J. Korch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Behavior of Voter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46), Chap. V; Louis Harris, *Is There a Republican Majorit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p. 87; A Campbell, G. Gurin, and W. Miller, *op. cit.*, pp. 71, 79; Bernard Berelson, Paul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p. 64—71; 以及 Oscar Glantz,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Voting Behavi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959), pp. 73—82。

8. Ellwood P. Cubberley,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4), p. 164.

9. *Loc. cit.*

10. *Ibid.*, p. 166.

11. *Ibid.*, pp. 164—165。“靠牺牲州的利益实施普遍平等的教育计划,实际上是‘平均地权论’。这将强迫富裕阶级拿出财产直接供贫穷阶级使用,就此而论,也是在贫富之间专横地进行财产分配……当局——亦即州政府——打算迫使较有资格地位的公民贡献他们的部分财产,以养活其余的人,这无异于对他们的财产进行强制性分配”。见 *Philadelphia National Gazette* (August 19, 1830), 转引自 Cubberley, *op. cit.*, p. 182。这表明,争论在传统的经济意义上,被视为一种左—右性质的争论。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 pp. 185—186。类似的评论,见 Harriet Martineau, *Society in America*, Vol. I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937), pp. 10ff; 以及 Thomas Hamilton: *Men and Manners in America*, Vol. I (London: T. Cadell, 1833), p. 288。

13. Manning Dauer, *The Adams Federalist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53), pp. 24—27, 263。

14. 行为科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的李·本森 (Lee Benson)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15. Dixon Ryan Fox, *The Decline of Aristocracy in the Politics of New Y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19)。

16. W. Barrett, *Old Merchants of New York*, Vol. I, p. 81, 引自 Fox, *op. cit.*, p. 426。

17. Mabel Newcomer, *The Big Business Execu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49。1928年,对进入《世界名人录》(Who's Who)的那些经理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当中有 87% 支持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见 Jean-Louis Servin, *La structure interne des partis politiques Américains*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3), p. 58。

18. 见 Wilfred E. Binkley,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 A. Knopf, 1947), p. 163; 根据威斯康星州人口调查项目的准确记录, 对这个州 1860 年投票情况的详细研究表明, 所有德裔移民和几乎所有天主教徒的 5/6 支持道格拉斯(Douglas), 反对林肯(Lincoln), 因为他们把共和党视同无知的排外主义。见 Joseph Schafer, “Who Elected Lincol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7(1941), pp. 51—63。

19. 见 Dixon Ryan Fox, “The Negro Vote in Old New York,”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2(1917), pp. 252—275; 以及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89—190。

20. 对 1928 年时 173 个县的社会生态研究发现, 即使在外籍成员和天主教徒之类其他重要因素以及城市化程度相对一样的情况下, “湿”县也一贯支持民主党。这项研究的作者还注意到, “……对一个社区支持史密斯(Smith)力量的更好猜度是这个社区的湿度”。“湿度”是在就某种形式的干—湿争论举行州选举时, 由占多数的“湿”选票决定的。见 W. F. Ogburn and N. S. Talbot, *op. cit.*, p. 179。

21. 见 Rowland T. Berthoff, *British 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 179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98—205。

22. 在威斯康星州, 德裔和爱尔兰裔选民从 196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投票支持民主党。见 Leon Epstein, *op. cit.*, p. 36; 类似的, 在密苏里州, 一项调查显示, 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一些有大量德裔居民的县从国内战争时期到 1920 年选举一直占优势。在 1920 年选举中, 这些县以压倒性多数转而支持共和党。见 John H. Fenton, *Politics in the Border States* (New Orleans: The Hauser Press, 1957), pp. 162—163。另见 Samuel Lubell, *op. cit.*, Chap. VII, 其中试图根据种族背景和种族忠诚分析孤立主义的根源。

23. 西班牙共和党或许是美国外交政策反映政党社会基础这一事实的最初受害者。虽然罗斯福和他的许多最亲密顾问, 就个人来说, 是西班牙共和政府拥护者的有力支持者, 但他们感到通过帮助这些被教会认为是共产党的共和政府拥护者, 在政治上不可能对抗天主教民主党的选民。

24. 美国的“激进右翼”最近是以麦卡锡主义为中心的。根据繁荣时期的政治行为具有地位追求这一原则, 剖析“激进右翼”力量来源的一种尝试, 见 S. M. Lipset, “The Sources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Daniel Bell, ed., *The New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5), pp. 166—235。这种政治倾向的社会基础决不能单独指望共和党成为它的领导者, 正如文章所指出, 激进右翼对“现代共和党人”的抨击, 再加上共和党在 1952 年的胜利, 是导致它的麦卡锡分子表现式微的重要因素。

25. 关于来自 1952 年一次全国性典型民意测验、反映有地区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资料, 见 A. Campbell, G. Gurin, and W. Miller, *op. cit.*, pp. 69—83。1952 年的一次秘密调查发现, 高收入的爱尔兰裔选民有 85% 支持艾森豪威尔, 而在各种收入水平的德裔选民中, 也有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明显趋势。见 Louis Harris, *Is*

There a Republican Majorit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4), pp. 87—94.

26. 这种区分在本书论到下层阶级的政治行为时也讨论过,见第四章。

27. David Donald, *Lincoln Reconsider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6), p. 33.

28.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在这两个时期,老的家庭都面对着一个新的工商业精英的上升阶层,出身这种家庭的人“看不起这个追逐金钱的新阶级……是这个新的工业社会中的异己……而煽动为个人抱负和社会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唯一的机会”。D. Donald, *op. cit.*, p. 34.

29. *Ibid.*, p. 34; 见 H. Ludeke, *The “Democracy” of Henry Adams and Other Essays* (Bren: A. Francke Ag. Verlag, 1950), 其中讨论了理查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这样一些人及其朋友在南北战争以后的改革运动和第三党运动中的作用,特别见 pp. 31—41。

30. E. Digby Baltzell, *Philadelphia Gentleme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pp. 392—394.

31. 这个左翼新政派的政党主要由持这样一种政治观点的人控制,这种观点在欧洲术语的意义上,最好描述为社会民主党观点。

32. R. Hofstadter, *op. cit.*, p. 163.

33. E. D. Baltzell, *op. cit.*, p. 39.

34. 关于美国政治中地方主义的出色讨论,见 V. O. Key, Jr., *op. cit.*, pp. 250—279.

35. 关于少数党在一党统治州的弱点的讨论,见 Warren Miller, “One-Party Politics and the Vot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0(1956), pp. 707—724。对一个地区作了全面讨论的,见 Duane Lockard, *New England State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36. 小 V. O. 基(V. O. Key, Jr.)不仅指出,在一党州,确实有有政治抱负的人不顾他们的政治品格选择了当地唯一的党,而且指出,维护一党体制的必要条件是把所有潜在的有影响因素都纳入它的体制,还要有对付反抗或反抗组织的法令。见 V. O. Key, Jr., *Southern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0), p. 432。

37. 见 Samuel Lubell, *op. cit.*, Chap. VI, 其中论到南方的冲突和变化。基指出,南方的团结只是基于黑人问题,而且,哪里的黑人问题没有取代其他问题,哪里就出现正常的阶级政治;这种政治是以老的人民党支持者(贫穷的白人农民)为基础,反对大种植园区。V. O. Key, Jr., *op. cit.*, p. 302.

38. 见 L. Harris, *op. cit.*, pp. 68—73 and 134—136。

39. *Ibid.*, pp. 148—149. 信天主教的工会会员有 62% 支持民主党,而家中

没有工会会员的那些天主教家庭,有62%支持共和党。

40. 美国政治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与英国的模式相比较。如约翰·博纳姆(John Bonham)就此所说:“英国政治几乎对在其他大陆构成社会分野的那些争论——如种族、国籍、宗教、城市利益和乡村利益、区域利益或权力主义方法与议会方法的冲突——全然无涉。”见他的 *The Middle Class Vote* (London: Faber & Faber, 1954), pp. 194—195。

41. 联邦党的衰落可以用其拒绝正视人口统计事实来解释。该党汉密尔顿派通过的立法,主要关心城市商人和工业家的需求,而无论90%的选民是乡村农民。见 M. Dauer, *op. cit.*, Chaps 1 and 2, 以及 Appendix II, 特别是 pp. 6—7。

42. 博纳姆详述了英国保守党在法律颁布后认可的各项劳工和社会主义方面的法规,以及该党甚至倡导过的某些社会服务。见 John Bonham, *op. cit.*, pp. 185—188。正如讽刺作家摩特·萨尔(Mort Sahl)对共和党的评价,保守主义者并不想“率先”和“立刻”做任何事情。

43. 而且,在英国,保守党“明确拒绝政党应当寻求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观念”。博纳姆引证该党在《1950年竞选指导》(1950 Campaign Guide)中的话说:“……保守党的力量在于它的基本目的是促进人民各阶级和各部分的团结。”John Bonham, *op. cit.*, pp. 184—185。

44. O. Glantz, “Unitary Political Behavior and Differential Political Motivatio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0(1957), pp. 833—836。

45. 另一方面,保守阶层一再承认,政党间的差别是基本的,尽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共和党可以提名一个像它的民主党对手一样自由甚或更自由的候选人。例如在1904年总统选举中,进步的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遇上了保守的民主党人奥尔顿·帕克(Alton Parker)。与华尔街关系最密切的纽约《太阳报》(*Sun*)写道:“我们宁愿选择保守政党的易感情冲动的候选人,而不愿选择视商业复兴为永久和危险刺激的政党的保守候选人。”引自 Malcolm Moos, *The Republic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 247。

应当记住,是保守的民主党人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86年给劳工大会写了第一封贺信。他在信中极力主张成立劳工争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进行调查,甚至作出仲裁,如果有关政党或州政府有这种要求的话。1888年,克利夫兰在他再次参加竞选被击败后写给劳工大会的最后一封信中,痛斥“把财富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痛斥压倒一切的贪心的自私自利的滋长……其危险不亚于使被压迫者贫困和劳累的共产主义……”见 Samuel Reznick,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in American Depress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1(1956), pp. 284—307。重要的是指出,克利夫兰在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保守得多——在第二任期,他已不必抢先面对选民,后来,他的权威在1896年民主党大会上被否定。事实上,克利夫兰是唯一一个以他自身的力量当选,而在他仍然执政时被他的党所抛弃的总统。

46. Henry R. Muller, *The Whig Party in Pennsylvania*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1922), p. 143.

47. 现在人们常常忘记,南北战争时民主党绰号“铜头蛇”的领导人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Clement Vallandigham)是“南北战争后人民党运动和布赖恩(Bryan)改革运动”的先驱。他在1861年宣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裂痕。”见 Wilfred Binkley; *op. cit.*, pp. 264—265。他认为,“金融界”以地方主义和反奴隶制为策略,旨在削弱他们的对手。见 Charles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Vol. I (New York: Macmillan, 1934), pp. 677—678。

48. 正如拉尔夫·埃默森(Ralph Emerson)在使思想家发生混乱的奴隶争论出现以前对两党区别的描述:“当然,哲学家、诗人或信宗教的人,愿意把他的票投给主张自由贸易、广泛选举权、废除残酷刑法、以各种方式促进年轻人和穷人接近财富和权力来源的民主党……另一方面,由人口中最温和、最有能力、最有教养部分构成的保守政党,则是胆小的,他们只是为了守卫财产。”见他的 *The Works of Ralph Emerson*, Vol. I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1941), pp. 373—374。

第十章

美国的知识分子：政治态度与地位

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段时间曾是政治争端的根源。在战后的年代，他们常常是许多公开而又大肆反知识分子的人的现成目标。另一方面，许多商人和保守主义者则埋怨美国知识分子对他们批评得太过分。¹

某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与社会——任何社会——疏远，是他们工作的基本特征和他们生活所在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疏远是一种历史现象，起初是作为反对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和生活方式而存在的，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性质，这种现象也正在衰退。按照这些人的看法，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已在顺利进行。

在这一章，我们将设法看看对美国知识分子政治角色的这些印象是否准确，如果真的处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变革冲击之下的话，再看看知识分子政治价值在如何变化。

我认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知识分子群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文化的核心力量或创造者，包括学者、艺术家、哲学家、作家、某些编辑和某些新闻工作者；另一类是文化的传播者，包括各种技术人员，大多数教师、大多数记者。还有一种边缘类型是由把文化用作他们工作一部分的那些人构成，如医生、律师一类专业人员。

欧洲人谈到知识分子，他们是指所有这3种类型。可是在美国，大学教育极其普遍，大学毕业生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所以正如我在此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一般只包括前两种类型。

知识分子的一般定义,特别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发言人下的定义是,他们是社会的批评者,必然超然于社会。这避开了某些关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最棘手问题。如果按定义知识分子远离社会,那么当他们在组织中扮演其他角色或步入政治舞台时就可以对会发生什么问题简单地不予考虑。但是,成为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文化创造者和传播者”,可以保持他们与仍然主要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那些人的关系,可以继续亲自从事智力工作,而且在他们处于掌权位置时,可以为整个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认同于政治的新观念。例如,严格地按照定义,艾德莱·史蒂文森虽然不是一名知识分子,但他的身份本身使许多“正统的”知识分子感到,政治家并不全是精神空虚的操作者,政治本身并不是疏远的。

知识分子定义问题由于纳粹德国和苏联有些知识分子曾经或仍在使用与知识有关的工具和训练服务于反知识价值的活动而尖锐化。他们真的是知识分子吗?仅仅把他们作为理性目标、自由人言论和创造性活动的叛徒勾销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即使在民主社会,虽然这标志一种胜利——承认知识分子的贡献是有价值的,或承认某些知识分子群体及其理想在不断增长影响,但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对现存制度日益支持,标志着他们正在暗中变成现存制度的辩护士。

当然,甚至在极权主义国家仍然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多少起某种独立作用,这常常被引证为是苏联可能演变成类似于自由民主国家的希望之一。²帕斯特纳克*的出现,卡皮察**拒绝参加原子弹研究,格鲁吉亚学生抗议核爆炸的游行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职业环境总是闪烁着某种独立批评的神圣火光。³

不过必须指出,即使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灵魂完全出卖给反人道的价值,就像用人做实验的德国科学家和颂扬德国民族所作所为的德国历史学家那样,知识分子仍然是知识分子——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只有当出现要求完全效忠的可能性时,导致知识分子产生异见、批评、拒绝和

* 帕斯特纳克(Pasternak, 1890—1960)前苏联作家,著有《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 卡皮察(Kapitsa, 1894—1984)前苏联物理学家,1978年以其在磁学和低温物理方面的研究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

其他传统特征的条件才会受到重视。那些要求知识分子永远与世隔绝的人，没有看到强大的社会力量正在敦促知识分子承担责任。

我并不想把这种看法视作完全要否定的观点，而宁愿强调，效忠和支持现存制度，或置身现存制度之外采取独立不倚的批判态度，对于当代美国知识分子是同等可能和合法的立场。美国知识分子还没有面临完全投降或完全反对的选择。因此，分析美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地位，必须既考虑敦促他们效忠美国社会主要制度的力量，也要考虑使他们或他们的一些部分得以保持几分与世隔绝，因而处于超然地位的那些力量。

美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现已停刊的杂志《事实论坛》指控知识分子是最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群体，并把“律师、医生、银行家、教师、教授、宣传鼓动家、作家和出版商”⁴列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列出这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职业，固然是荒谬可笑的，但却为认识美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上反知识思潮的根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论坛》之所以攻击其从业人员受过大学教育的那些职业，严格地说是因为这些职业群体是麦卡锡主义最有力的反对者。⁵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受教育越好的人，越可能支持各种形式的“非经济自由主义”，包括给不受欢迎的政治少数派以公民权。从《事实论坛》和麦卡锡的观点看，他们攻击“当时美国有大学学位的受尊敬的人、有社会渊源的人、文化上得到公认的人、持有资格证明的有教养的人和学者……”⁶是完全合理的。

在一些极端情绪较少的圈子中，许多实业家和其他经济保守主义的追随者，曾寻求通过奚落美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缺乏实践知识，或者因为他们犯过错误，把他们当做替罪羊来贬低他们的政治有效性。反知识思潮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共和党——的有用的、甚至是当然的武器，原因很简单：在20世纪，直至最近，重要的知识分子极少是保守的。

在 20 世纪,大多数学会会员(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会会员)、有影响的文学人物和一流的舆论杂志,都反对宗教和政治领域中的保守思想和行动。心理学家詹姆斯·勒巴(James Leuba)曾在 1913—1914 年和 1933 年两次研究过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学会会员的宗教信仰,这些会员都是列名《科学美国人》的。据他报道,各类会员大多数都不信上帝或永生,1933 年不信宗教的更明显。关于非学术职业群体更早期的情况,我们虽然不掌握相应的资料,但美国宗教行为的研究表明,教授和科学家不信宗教的远比一般居民多。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4 岁以上的人已有大约 55% 隶属于教会。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回答问卷调查的会员中,非专业会员比专业会员有更大可能信仰宗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 1913 年和 1933 年的两次研究中,比较著名的教授远比他们不著名的同事更不信宗教。1935 年,勒巴继续进行他的宗教信仰调查,向列名《世界名人录》的银行家、实业家、律师和作家寄送了调查问卷。收到的回答证实,科学家和各种专业群体远比实业家、银行家和律师不信宗教,而且发现,名气足以进入《世界名人录》,大概不像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样受科学与宗教冲突影响的作家,有 62% 持反宗教观点,不信上帝,而在银行家中,持这种态度的比例是 29%,在实业家和律师中,这个比例是 40%。⁷

1937 年,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报告,持亲新政派观点的比例,在社会科学教授中占 84%,在自然科学专业人员中占 65%,而在体力工人中占 56%,在律师、医生、牙医中占 16%,在工程师中占 13%。这些人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态度,有大致相似结果。⁸ 差不多 20 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名社会学家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和瓦格纳·小蒂伦斯(Wagner Thielens, Jr.),在 1955 年对 2 000 多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社会科学家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系统抽样访问,他们发现,这些人有 3/4 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有 2/3 在 1952 年投票支持史蒂文森,而这一年有接近一半的体力工人和工会会员支持艾森豪威尔。而且,像上述 1913 年和 1933 年的两次宗教信仰研究一样,这次调查也发现,自由主义者在比较著名的教授中显示高得多的比例。⁹

表征学术共同体人生哲学的一个有意义的标志是消费者合作运动。除有明显民族色彩的那些消费合作社外,如许多芬兰人的合作社、城市的

消费合作社很少出现在学术共同体以外，合作社在学术共同体中享有的繁荣，可以证明学术界敌视私人商业。帕洛·阿尔托（桑福德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都有很大的合作社，但在旧金山其他地区保持这种商店的努力却一再归于失败。类似地，伊萨卡（康奈尔大学）、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市的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区和芝加哥大学所在地的海德公园区，都已建立了消费者合作社。

当然，搞学术研究的人并不是给中左政治势力以重要支持的唯一知识分子群体。1934年在后来强烈支持共和党的圣克拉拉县（旧金山郊区县）的一项政党登记研究发现，住在那里的作家，有1/4登记为少数派政党的党员，主要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只有1/3登记是共和党员。作家这种职业是这个县所报道的最显著的左翼非共和党势力。¹⁰1947年，《时代》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提问的问题是：1944年如何投票？据分析9000多名大学毕业生交回的问卷，在教师、科学家和搞技术的人当中，大多数投票支持民主党。¹¹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职业报为“科学家”的那些人当中，有60%支持民主党，而在职业自报为“工程师”的那些人当中，有80%投票支持共和党。¹²职业与知识界有密切关系的图书管理员，也显示明显的左翼倾向或自由倾向。1948年，对图书管理员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表明，这个群体有17%的人把支持第三党——进步党、社会党、共产党——总统候选人列为自己的第一选择，从而使该群体在支持这些政党的群体中名列首位。¹³

新闻业也自谓其从业人员有很高比例持中左的政治和经济观点。这个职业是少数几个组织起强大工会的职业之一，而且其工会也是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工会之一。事实上，美国报业公会还是共产党控制的派别在工会选举中得到相当多支持的少数几个工会之一，尽管这个派别后来失去了对该公会的控制。在报业公会最大的地方支部纽约分会，左翼候选人多年来都得到20%到25%的选票。新闻记者的这种政治倾向也为一些调查研究所证实。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项对104名驻华盛顿记者——一个高收入的精英分子群体——的研究报道，在1936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占30%，支持共产党或社会党候选人的占6%，较大多数支持罗斯福。虽然这个群体的平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但支持政府管理矿业、公用事业和铁路的仍占40%，支持组织

记者工会的占 56%。¹⁴ 这些政治态度大多是萧条形势的反映；不过最近几年对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结果所进行的模拟投票表明，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新闻记者一直同情民主党，同情自由事业。最近对另一个精英群体——驻西欧的外交记者——的研究显示，1953—1954 年冬天，在被调查者中，有 58% 支持史蒂文森，而支持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的，只占 36%。¹⁵

艺术业也大大有助于增加民主党力量和中左力量。前已提到大萧条时期住在圣克拉拉县的作家的激进倾向。在《时代》周刊对大学毕业生的那次调查中，虽然只有 16 人被分类为受雇于“艺术业”，但这个群体以压倒优势支持罗斯福。像新闻记者一样，受雇的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几乎全都参加了有强烈的自由派和左翼政治倾向的工会。演员协会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派，广播作家公会是受共产党控制的。从受雇于电影业的那些艺术家那里，民主党也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持¹⁶；好莱坞是共产党在美国的主要资助来源已经不是秘密。¹⁷

虽然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在美国知识分子（不管怎样界定他们）中仅仅是少数，但他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有时构成一种有影响的少数。¹⁸ 30 年代后期，在美国支持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知识分子中进行的那些关于莫斯科道路是否正确的辩论中，支持共产党一派能征集到的公开声明捍卫这条道路的签名者，要比反共产党一派能征集到的公开谴责的签名者多，而且签名的人更有名。为对抗共产主义影响而组织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团体，总是由社会党人和十足的左翼自由派领导，这或许更能说明知识分子的一般左翼倾向。最近这类团体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其领导就是社会党人西德尼·胡克和诺曼·托马斯，以及纽约自由党的活跃人物乔治·康茨和詹姆斯·T. 法雷尔。总之，有各种证据表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部分——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图书管理员、科学家、大学教授——按人口比例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支持民主党和左翼小党。

自由主义的根源

分析美国知识分子持左翼观点的根源，是比考证这种现象更为复杂

的一个问题。部分答案在于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应对大多数社会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有一般意义，而且还要能解释这个群体在另一些国家支持左翼的模式。法国政治理论家贝特朗·德·朱维纳尔(Bertrand de Jouvenal)曾指出，在商业阶级与艺术创作家的价值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制度上要求商业向其顾客提供他们所需——顾客总是正确的。相反，艺术创作家视其产品的价值独立于产品的直接市场价值。¹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文化产品的价值日益依赖于围绕商业原则建立起的市场，所以，艺术创作经纪人或雇主(如好莱坞的经理、报纸发行人等等)的相反价值观和艺术家的职业原则，必然导致艺术家不能或不会创作敌视商业或令商业感到自我作践的销售品；与此同时，那些成功地适应市场需要的艺术家又往往感到他们抛弃了个人的良知。²⁰

德国社会学家西奥多·盖格(Theodore Geiger)曾试图这样解释社会科学家支持左翼的普遍倾向：

在知识界的各种群体中，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权力方面最敏感，也最直接面对掌权者对思想自由的非难。丧失思想的自主和自由，还会危及他们的职业工作和职业冲动。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商业享有大量权力并已经或可能使用某种压力以对抗来自学术界批评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将会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科学家——可以作最广义的定义——为各种形式的左翼所吸引。²¹

某些分析思想活动的人如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甚至断定“在精确的科学和左翼思想倾向之间存在一种普遍联系”。他指出，科学家在其工作中所用概念本身影响他们向左：

对于那些搞精确科学的人来说，在概念主要以数学形式构筑的场合，以及在知识进步以受控实验、以理论结果在客观经验中的不同应用为基础的场合，有见识的实证主义学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这种类型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找到最清楚反映。一方面是精确科学和工业技术，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结构，马克思在这两方面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对在其中看到实现未来真正合理的世界共同体之关键的科学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²²

还有另一些因素可能影响各地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这些因素是不同知识职业固有的。不过，美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另有根源，这特别是

与这个国家及其历史有关。重要的是两个因素，它们都来自我们的平等主义观念。第一，美国的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是独立宣言的平等主义信条，这基本上是各地民主派左翼的价值观。第二，完全接受美国信条中的平等主义结论的真正知识分子感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地位低下，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欧洲伙伴所得到的那些高地位象征。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美国知识分子没得到他们热望的尊重标志的某些原因，居然是他们所信奉之平等标准的力量所使然。

从第一点看，美国不存在真正的保守传统，而这在许多前殖民地是一种普遍现象。²³美国的民主诞生于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革命，拒斥世袭特权的要求。不考虑政党、阶级或宗教信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革命信条；欧洲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有古老贵族阶级结构和钦定宗教的社会，保守势力从未真正承认平等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即使在革命强迫其接受时也是这样。

这意味着缅怀黄金时代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从未在美国取得支配地位（某种程度上除了在南方和在某些有“传统家族”渊源的 19 世纪新英格兰人中）。保守主义理想也从未曾与指导我们政治斗争的平等主义理想相对立。一个搞政治的知识分子，即一个怀抱理想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对维护矛盾差异不大感兴趣，但处处都充满不一致。只有到他支持的政治和社会的秩序的局限受到攻击时，他才能感到他在起某种富于成果的创造性作用。在欧洲，他起这种作用，既可以通过支持改良的乌托邦——一种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也可以通过拥护保守的乌托邦——通常是指一种拥有传统价值的理想社会：虽然需要迎合芸芸众生，但并不阻碍存在一个权势集团和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可以站在这些“美好”社会理想的高度来批评现实。²⁴而且，无论改良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厌恶现实中同一些东西。如通俗文化，左翼把它归罪于商业社会的制度，而保守主义则把它视为民主制度让民众尝试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²⁵

对于美国知识分子来说，限制可能的意识形态选择的意思是，即使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按照唯一可采用的学说——美国过去革命时代的学说，而这是被真正的欧洲保守主义者厌恶的学说，称之为最可恶的激进主义——来界定他们的政治理想（在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一本

不幸几乎不为人知的书中，社会主义作家利昂·萨姆森(Leon Samson)曾指出，在美国某些有权势的商人和共和党领导人描述美国社会的性质和目的用语与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各式各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声明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萨姆森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直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的象征性目标与美国习俗目标的同一性。²⁶

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缺乏意识形态，只是试图阻止变革，或者像今天的共和党人那样，与自由主义者相竞争，寻求他们所信奉的平等主义改革。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指出，美国的保守政党其实在非经济领域显示了其自由主义，他们比罗斯福以前民主党更经常开展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²⁷

美国知识分子支持政治左翼的第二个主要根源，是他们看上去几乎普遍觉得他们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群体；与商人和专业人员相比，他们在社会承认(威望)、收入和权力的阶梯上都低。²⁸在最近一项研究中，询问在大学任教的社会科学家，典型的商人、国会议员或大学理事会怎样排列他们这些教授与“银行分行经理、广告社账目主任和律师”的高低次序。大多数回答认为，商人和国会议员会把他们排在最后。这些教授很自信他们的地位与大学理事一样，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差不多一半教授回答，“普通的”理事会把他们排在第三位或第四位。这种低地位的自我印象，促使教授以及我认为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去追求如同世界各地其他“受剥夺”群体一样的政治途径，即支持那些攻击现有特权分配的政党。资料清楚地显示，低地位感与自由主义政治行为密切相关。“[这些社会科学家中的]民主党选民总是更倾向于认为，没有人喜欢教授。”²⁹

知识分子的 actual 地位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同胞对他的印象与他的自我印象迥然不同。虽然他自己感到受到忽视，遭到冷落，但在对各种职业的相

对地位进行民意测验时,社会把他放在相当高的位置。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对96种职业作过一次相对地位研究。大学教授的位置排在除医生外各种非政治职业之上,与艺术家、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和作家的位置,差不多同样高。³⁰实质上,这项研究表明,从事知识工作的人,在美国与有影响的商人、银行家和公司负责人享有同样的威望。³¹1950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民意调查报道了类似结果。当时提出的调查问题是,把各种工作按“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分类。教授在24种工作中排在第四位,有38%接受测验的人把这种工作置于上层阶级一类。³²

或许有人争辩说,全国性调查在这方面并不重要,因为算数的是上层意见——上面那项研究所问及的那些社会科学教授曾提到,大商人和政府高级官员看不起知识分子。但是,比较不同阶级的看法表明,社会和经济地位高的人实际上认为,知识职业远比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职业好。³³

看来自相矛盾的是,证明知识职业、特别是在大学任教在美国享有高地位的最好证据,或许是来自拉扎斯菲尔德所调查的那些社会科学教授;前已提及,这些教授认为他们的职业会被商人和政治家排在较低的位置。如表10.1所示,作为大学社会科学家的一个很好的样本,这些教授实际上具有“家庭地位较高的……背景”。

虽然教授们偏向于认为他们受到知识界以外的人的轻视,但事实却是他们可以把较有权势背景的人吸引到他们行列中来。这表明他们的职业实际上受到很高评价。在那些社会科学教授中,有差不多一半人的父亲是担任经理或从事非教育脑力劳动职业,只有15%是体力工人的子女。把这些资料与在美国商界名流如大公司老板中所得到的不同样本的资料相比较表明,这两个群体的出身是大致相似的。³⁴事实上,这种比较对于知识职业是不公平的,因为大学教授样本取自美国所有高等院校,而较好学校(一般是最大的学校)中的教授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背景:大学校(学生9000名以上)中的教授有62%来自经理家庭或知识职业家庭,而小学校(700名和不到700名学生)中的教授只有49%来自这类家庭;私立非教会学校中的社会科学家,有2/3出身高地位背景;而教会学校或师范学院中的教授,这种出身者只占44%。³⁵由于社会科学在大学中不享有最高威望,所以人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社会出身可能更高。

表 10.1 大学社会科学家的社会出身*

父亲的职业	百分比
教师(大型大学教授)	8
其他脑力职业	23
经理	25
白领或小商业	15
农民	13
体力工人	15
不详	总计 $\frac{1}{100\%}$ (抽样人数 2 451)

* P. F. Lazarsfeld and W. Umelens, Jr., *The Academic Mind*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p. 7.

当然,研究人员和经理人员的社会出身相似,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别,主要是他们职业环境和地位差别的产物。研究追求不同职业目标的大学生的价值观表明,价值观,包括政治信仰,不仅可以决定职业地位,而且可以来自职业地位。例如,一项有关大学生的研究(先是研究新生或二年级学生,两年以后研究三年级或四年级学生)报道,在起初计划主修商业的学生中,政治上自由的学生往往后来改变他们的专业,而保守的学生则不改变初衷。同样,对比追求不同职业学生的价值观也发现,打算从事推销、医务或商业工作的学生,不大关心个人创造性,而对“金钱、地位和安全”表现出浓厚兴趣,相反,有志于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学生则完全不同。看来,与不同职业有关的某些态度和行为特征,可能是起因于这些职业招聘了不同类型的人。³⁶

知识分子与知识界

既然美国知识分子自认为是低地位者可能是他左翼思想的一个主要根源,既然事实与这种自我评价相矛盾,于是自然产生了如下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觉得他被轻视了?

我猜想,他的自卑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他美化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把欧洲的情况作为一个参照比较点。³⁷参加过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生活

的任何人都知道,在英国、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迟早总有人会说,作家、画家、作曲家或教授是真正重要的。在那里,知识分子可以得到公众以及政治和经济上层两方面的承认。³⁸

欧洲和美国对待知识分子有差别是肯定无疑的。这种差别或多或少不同于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与强调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在欧洲,对所有拥有较高地位的人给予公开的尊重,无论是工程师、工厂主,还是教授,而在美国,任何人也得不到国外那种程度的尊重。³⁹

英国作家 A. G. 尼古拉斯(A. G. Nicholas)在比较美英两国知识分子状况时曾指出,英国知识分子“身处白哲特(Bagehot)所称的‘礼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在这种社会真正地位的庇护。对他或许不是非常尊重,不如对地主、行政官员、军人、牧师或律师那样尊重,但‘绅士’这具保护伞很大,罩在所有这些人头上,尽管有少数自由端突出伞外。不过〔英国〕知识分子也在伞下,无论他表现为造反者,还是表现为受雇的辩护士”⁴⁰。

在大多数欧洲工厂,职业间存在严格的地位界限。我曾听到暂时受雇在欧洲工作的美国工人和工程师抱怨这些工厂在社会关系上不同于我们工厂的那些“无聊”之处。在比利时工作的一位炼油厂的工头曾告诉我,他享有公司配给的一辆大众牌汽车,后来才知道参加这项城外工程的大多数工人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他邀请过他们当中一些人与他一起乘汽车旅行。一天,他同时邀请一些体力工人和白领工人去旅行。次日,白领工人到他那里说,他们不能与体力工人同乘一辆车,而他应当知道,这不是比利时的习惯。

同样,一个德国社会党的教授告诉我,有时会因为德国使用“您”和你(亲称)这两种称呼形式而遇到困难。后一种称呼应该只用于熟人和平级之间,但社会民主党几十年前规定在党内同志间称“你”。互不相识的工人在党的会议上直接用这种称呼,而当他们面对一个有教授、博士头衔的先生时,他们感到为难,试图避免使用任何第二人称形式。

在欧洲的许多地区,知识分子显然享有满意的社会尊重——不过,所有高地位职务都如此。羡慕他的欧洲伙伴的美国知识分子没有看到的是,他实际上在反对美国的平等主义,而不是在反对美国公民对他的职业的较低评价。在美国,一个工人可以更正工程师的判断,而工人的儿子可

以“责备”大学教授，如果前者不同意后者意见的话。美国的雇主和工程师觉得这种行为准则是自然的，而知识分子却反对。他们无意识地按欧洲方式思考，颇似各式各样逃离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欧洲中产阶级；这些人觉得自己在美国地位下降了，即使在他们拥有类似于他们在欧洲的职位时：

对于移居美国的人来说，他的深刻的阶级感和地位感使他很难进入美国社会。有些熟练的工程师或医生是经过多年实习培训最终确立自己的职业的。在此期间，他们有过资格考试不及格的经历，洗过盘子，给实验室扫过地。可是在他们有了职业后，仍然觉得没有享有在原来国家应享有的高贵地位。我见过几个在洛杉矶工作的、来自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年轻医生，他们年收入 25 000 到 35 000 美元，但仍感到失去了社会地位。⁴¹

与欧洲相比，“低级的”大众文化似乎在美国有巨大优势。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看到真正创造性努力在这个国家得不到高威望的进一步证据。不过，最近一些年，随着欧洲在经济和阶级结构上越来越像美国，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他们自己国家迅速崛起的类似文化感到绝望。欧洲大众文化的出现或许首先是出于如下事实：下层阶级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使他们对文化市场的要求被感知。“美国化”多半仅仅是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阶级差别的缩小。问题不在于大众不喜欢知识分子的“高级”活动，而在于民主程度与普通人文化水平间的关系。

少数几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在当代变化更大、更不定型的美国，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即使没有权力，也已成了有魅力的人物。戴维·里斯曼是这几位美国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为了解释这些人为什么对批评如此敏感，他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理论。⁴²他指出，重视知识的学生在美国公立高等学校通常占一小部分。大多数人强调非知识兴趣。作为这种校风的背离者，那些注重知识的、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到嘲弄和孤立。这种早期学校经验伴随他们进入以后的生活，因此，在后来他们的智力活动受到批评时，就使他们想起在高等学校时的经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那些出身名牌学校的知识分子，就应当对反智力活动无所谓得多。

人数问题

美国知识分子左翼倾向还有另外两个来源，它们与美国的平等主义价值观无直接关系。一个是知识分子似乎与其他精英部分相脱离——与欧洲知识分子相比，特别缺乏与政治权力的接触；另一个是他的收入明显不同于商业经理和专业人员。

与欧洲普通知识分子相比，为什么美国普通知识分子与其他精英部分，特别是掌握政权的人直接接触较少呢？原因很简单，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知识分子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都比较多，而且地理分布更广泛。1929年，澳大利亚当时所有的10名经济学教授聚会，并告之政府当局，他们认为国家放弃金本位制将是灾难性的。那时的工党政府对此颇为不快，但觉得政府不应违背这些“专家”的意见。美国有几千名经济学教授，怎么可能发挥这种总体影响呢？美国有1800多所学院和大学，而英国只有大约15所，联邦德国不到20所，挪威1所，丹麦2所，瑞典4所，等等。仅仅在纽约，就有20000多人在约40所高等院校任教。波士顿地区有大约9000名大学教师，其中3000名在哈佛任教。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以旧金山为中心，有14000名大学教师。美国还有1100个社区办的交响乐团。正如《时代》杂志文学增刊就美国文学作品所指出，美国有100多种文学期刊，而英国只有几种。

在民主世界，没有一个城市中心在受雇于大学、杂志、出版社和其他“智力”产业的知识分子数量上赶得上纽约。而纽约虽然可以说是美国的知识首都，但散布在美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也构成一个重要群体，加起来的人数远大于纽约及其附近地区。（纽约只有一所主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按师资质量排队，位居第三，在哈佛大学和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之后。）⁴³培养画家和作家的重要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从西海岸的西雅图和洛杉矶，到新墨西哥、新奥尔良、芝加哥、波士顿等等地区，都有这样的学校。正如尼古拉斯所说：“百老汇决不会一刻放松与好莱坞的抱负争雄。……波士顿不会放弃夺回它的文学宝座的希望；旧金山深信，建立

文化帝国的事业在于采取西进路线。”⁴⁴

美国大城市中知识分子的实际人数和全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庞大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结识的程度,更不用说与其他领域如政治界或商业界的人接触了。大城市中的研究人员往往只认识本学科范围内的人。我可以用我的切身经验证明,在同一社区中、不同大学的同一专业的人中间,社会交往是很少的。受雇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专职历史学家在60个以上。伯克利的教员中有30多个社会学家——比受雇于所有英国大学或所有加拿大大学的人数都多。许多城市都有艺术家、先锋派作家和受雇于出版业的撰稿人的团体,其成员人数常常很多,以至于不允许与其他团体有很多接触。⁴⁵

美国的大学教授相对脱离所有团体,知识分子团体或其他团体,这已为拉扎斯菲尔德和蒂伦斯对社会科学家的调查所证实。回答调查的人有3/5以上(62%)说,“他们的主要社会接触限于大学”;这个比例在比较有名的学院和大学任教的社会科学家中,上升到70%以上。⁴⁶在精英人数较少的国家,接触机会必然多得多。在纽约和伦敦两地编辑杂志的欧文·克里斯图尔(Irving Kristol)曾说:“使我惊讶的,使任何美国人都会惊讶的是,几乎所有英国知识分子都像有亲戚关系一样……说得委婉些,在美国则不是这样……《纽约人》的资深编辑若从未见过《时代》周刊的资深编辑,决不是难以理解的。”⁴⁷同样在上述两城市有写作经历的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评论道:“作为这两种杂志的老朋友,我可以证明这是真的;纽约的知识界既没有同心的连锁来往,也缺乏非业务的世俗往来;一个人只能‘亲自’接触和了解……他所读到的书和文章的作者的一小部分。伦敦知识界要广泛得多,包括商人、律师,甚至还有出版发行人,连议员也出入其间。”⁴⁸

在加拿大任教的美国教授也报道了类似经历。在那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一些领域的第一流人物,因为每个领域都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群体。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雇员中,加拿大知识分子占有很大比例。政府部门和政治家遇事向本国相当比例的社会科学专家征询意见。各政党也起用任何有同感的、愿意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

美国政府即使在共和党执政时也雇用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并向他们征询意见。根据《哈波斯周刊》杂志编辑约翰·费希尔(John Fischer)

的看法：“艾森豪威尔政府雇用教授比新政派执政时雇用的多。”⁴⁹（共和党需要知识分子可以在如下事实中看到：两位为共和党写过同情评价文章的教授——阿瑟·拉森和马尔科姆·穆斯，后来都受雇在白宫担任总统的助手。）当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90%以上）一定沾不上边，但我猜想，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在高层，受雇和接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咨询的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数量，可能像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多。⁵⁰美国雇用和接受咨询的知识分子较少，只是在按比例比较时，因为他们的人数多得多。⁵¹

使美国知识分子消极看待自己的另一点，也是深感痛心的一点，是他的收入。与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相比，他是衣着褴褛的。⁵²知识分子这样论证自己的观点：人们按照他们所具有的价值得到报酬；所以，低收入意味着他的价值低。这个推理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现代西方国家，实际上存在两种收入结构——私人系统和公职系统。高地位的官方职务总比相应的私人职务收入少得多。一个处于事业巅峰的律师，即使出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比许多私人开业的公司法律顾问收入少得多。艾森豪威尔的内阁成员，当他们离开私人职业时，不得不承受薪金的锐减。试看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可比较群体，美国重点大学中一流教授的薪金完全与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机构中高级职务的薪金相类似，最高职务除外。现在，某些好大学中的正式教授，每学年的最低薪金是11 000美元，有些人享有正常自动升薪的机会。许多教授还可以另外挣相当多的钱，如从公司和政府收取咨询费、稿费、讲演费。在上面援引的那项关于社会科学教授的调查中，资料显示，这个领域有62%的人享有额外收入，而且，推测挣最高标准薪金的那些比较能干的教员，最可能挣额外收入。⁵³当然，真实情况确实是，许多教授可以在私人企业挣较多的钱，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反证他们的才能受到轻视的论点。问题的真相是，如同律师宁愿当法官或选举出来的官员而不愿当公司顾问一样，教授实际上认为，工作的非经济报酬优于金钱利益。⁵⁴

政坛上的知识分子

艾德莱·史蒂文森的两次竞选失败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美国知识分

子不能在政坛上起有效作用的证据。⁵⁵ 不过，史蒂文森败北于艾森豪威尔的个人魅力，是否比他 1948 年竞选伊利诺伊州州长以领先 40 万票战胜“人民的人”哈里·杜鲁门，更能说明以“知识分子”方式参加竞选的利弊得失，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在政党政治和竞选公职方面，知识分子干得惊人的出色。在美国参议院，有 14 个前参议员是大学教员（11 个民主党人和 3 个共和党人），“现任参议员有一半以上获得过高级学位”⁵⁶。俄勒冈州 40 多年首次入选参议院的民主党人理查德·纽伯格是一名职业作家，而欧内斯特·格里宁是在 49 个州第一次选举时从阿拉斯加州入选参议院的。约翰·肯尼迪 1958 年以得票占总选票 75% 以上的空前纪录从马萨诸塞州再次当选为参议员，他出版过两本书，一本写于他参政前，是有关学术问题的；他是哈佛的优等毕业生，荣获过普利策奖。

美国知识分子获取公职的能力是特别惊人的，这是就如下事实而言的：美国的选举一政党制缺乏党对候选人的集中控制，这使一些人要得到党的提名很困难，除非他们走派别政治道路和享有地方党的官员的支持。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中央集权的党的官员可以提名党的知识分子。少数美国知识分子打算像保罗·道格拉斯、欧内斯特·格里宁、理查德·纽伯格和休伯特·汉弗莱那样走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途径。

反知识主义与美国的价值

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用自我贬低的形象来为他疏远社会的情绪辩护已大部分证明是不正确的，但这个国家确实存在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而这些倾向则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个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大批政治上保守的知识分子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反知识分子倾向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美国是或一直是一个低地位群体，而是说这种倾向的产生原因，一部分在于这个国家缺乏确立上层阶级基本行为准则的传统贵族式统治，一部分在于它的成人选举权的早期历史。

美国缺少贵族阶级的意思是说，这个国家在一段长时期缺乏对文化活动的尊重，而这些文化活动是传统贵族阶级作为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

分确立下来的,以后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成员在他们寻求仿效他们所取代阶级之生活方式时又接了过来。19世纪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后半叶,美国差不多出现了几百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们声名大噪,成了城市中的实力人物,但这些人缺乏以往上层阶级的社会魅力和文化兴趣。白手起家者往往重视物质成就的价值和炫耀消费,看不起似乎是非生产的活动。他们以经济和技术成就而自豪,因此美国首先繁荣发展的艺术之一是建筑,并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后期,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如亨利·亚当斯,感到自己在这种人控制的世界成了流浪者。然而,作为附带说明,应当指出,现代上层阶级从来没有为学术文化活动提供如此之多的资金。卡内基、洛克菲勒、斯坦福、古根海姆、福特等人,通过向大学捐款或建立基金会,确立了新的标准。维布伦(Veblen)和其他一些人曾认为,这种大量捐赠是他们炫耀消费的例证。撇开这种分析,剩下的是支持学术文化活动博得对有钱美国人大加赞扬这一事实的言外之意。安德鲁·卡内基晚年身边都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亲自过问他们的经济问题。在他捐款成立卡内基基金会的信中,他说,基金会的目的在于“为鼓励、支持教师职业和高等教育事业以及授予他们荣誉作一切必要的事”⁵⁷。这种大量资助学术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除极少数例外,有钱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不认为有大规模支持学术文化努力的必要。

20世纪,由所谓“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带来的粗俗气氛开始低落。他们的后代建立了社会显贵花名册,试图创造一个美国贵族阶级。在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费城上层阶级的研究中,E.迪格比·巴尔茨埃尔(E. Digby Baltzell)对20世纪格罗顿学校一类贵族私立学校——其作用类似于英国的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出现、上层阶级教育逐渐向少数大学集中、编入社会显贵花名册的上层阶级成员,以及高地位家庭向圣公会教派转化,作了出色描述。⁵⁸所有这些趋势都足以削弱——如果不是消除的话——困扰亨利·亚当斯的实利主义反知识分子倾向的示范性。

不过,随着起因于暴发户社会处境的公开反知识分子活动的低落,又出现了新的反知识源泉。对美国商业文化的反感导致许多19世纪知识分子完全收回了他们对政治或政治事务的关注,在20世纪,转而支持自

由派政治和左翼政治——首先是进步党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派；后来，如我们已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新政。⁵⁹ 研究美国历史的英国学者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连同俄国革命……最终向美国的先驱证明，他们很明白他们的社会。这样说是不太轻率的：1917年是革命和造反的一年，也标志着美国文化的革命——一场采用马克思语言和弗洛伊德语言的运动”⁶⁰。

知识分子作为积极坚定分子参与政治斗争，随着这种事态的出现导致政治上和宗教上受到骚扰的保守分子结成反击阵线反对知识分子。麦卡锡主义只是政治家攻击知识分子的最新事例。正如历史学家默尔·柯蒂(Merle Curti)用文献证明的，类似的攻击在美国有特别悠久的历史。⁶¹ 不过，这段历史之所以很长，基本上是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成人选举权在世界上有持续时间最长的历史。对于试图摧毁反对派观点力量的参政者来说，这显然是必要的。而知识分子总是声称他们的优越教育和聪明才智，使他们的观点具有重要性，而这一事实本身则促使欧洲和美国两地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诉诸反对他们的运动。⁶² 没有一个地方的民众真正理解或同情知识分子的生活问题。他们之所以被激起反对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对有权有势者的利益普遍不满。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初期，恩格斯已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马克思的反对者，可以在共产主义工人当中煽动“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⁶³。戴维·里斯曼曾正确指出，可以把政治上的反知识分子行为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如下事实：许多群体“觉得受到……智力活动发展的威胁”，因此，强大的敌人“不再只是银行家、律师、行商……[而且还有]教授、教师、作家和艺术家”。⁶⁴

这是美国知识分子左翼政治态度不是来源于低地位的另一证据。如果政治上反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低地位的证据，那么美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对银行家、华尔街经纪人和铁路大王的攻击也应当是他们低地位群体的证据，这显然不是事实。对任何群体的攻击，常常表明他们可以视为高地位群体，反映人民党对任何显贵阶层的一种对立情绪。⁶⁵

向 右 转

关于当代反知识分子倾向和美国知识分子主要政治态度的根源，上述分析产生了某些令人费解的悖论。我认为，反知识分子情绪之所以在保守分子中特别广泛，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不同政党和不同政治倾向中的分布或多或少是不均匀的。美国知识分子承认美国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这既使保守主义不能成为他们的现实选择，也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因为得不到阶级界线比较分明的欧洲社会给予他们大陆同事的那种公开尊重，而自认为地位低下。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真正作用是助长了他们的被剥夺感，从而成了他们改良主义热情的补充来源，而这种热情又刺激知识分子受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攻击，并为知识分子的中左政治倾向提供了进一步支持。⁶⁶

然而，这种使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地受到左、右翼群体夹击的自支撑循环，最近几年已显示某些解体迹象。作为一个群体，美国知识分子似乎已转向中间立场，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可能仍然站在那条虚设分界线的左边；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少数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中逐渐变得保守起来。导致这种转变涉及许多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显然是战后长期繁荣的社会后果。另一点，像别的地方一样，是美国自由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对作为自由主要威胁而崛起的共产主义的反应。面对一个远比西方现存社会更糟，而又自称在实现美国和法国革命价值的社会，这类知识分子，包括其中许多社会主义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允许他们捍卫现存或过去社会、反对为未来乌托邦辩护的那些人的保守意识形态。像伯克一样，他们开始寻求稳定的根源，而不是变革的根源。正是被知识分子改革家视为美好社会载体的那个社会阶级——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支持新的专制主义；不仅是支持左的专制主义，而且如麦卡锡主义和庇隆主义所显示，也常常支持“激进的右翼”专制主义。⁶⁷此外，温和派左翼——美国的新政派、英联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本身，也使经济改革纲领摆脱了乌托邦形态，走向有不足、有矛盾的现实形态。

再者，各地的政治风云变幻已粉碎了民主派左翼的乌托邦，与此同时，长期繁荣和随之而来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也弱化了强烈关心经济改革的实际理由。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争端发生在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在这场斗争中，许多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与既存制度是一致的。这种认同对于那些感到被要求放弃传统愚蠢行为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困难的，使他们觉得不舒服，于是抱怨每个人都成了现制度的信奉者，包括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许多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明白，他们应当热爱和维护他们的社会，但仍然有不安心理，感到自己是在背叛作为知识分子应负的攻击和批判社会的责任。他们对这种进退维谷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继续感到应与左翼结盟，而投票支持民主党；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常常是社会主义者，而收回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或兴趣，把精力集中于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写诗，还是写学术论文。

重要的是要强调，许多知识分子改变态度的这种证据并不证实少数仍然坚持极左立场的人所提出的如下假设：麦卡锡主义或其他恐吓方式压制了激进分子，创造了一个受惊吓的或被收买的效忠者群体。一次有关美国社会科学家态度的民意调查提供了有力证据，说明那些认为学术界的精神已被麦卡锡主义摧毁的人是错误的。一般地说，这些社会科学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支持不受欢迎的少数派的权利，继续行使他们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即使他们对思想活动受到的威胁感到忧虑。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和小蒂伦斯就他们调查的社会科学教授的行为所评论的：“在这些社会科学教员中，的确存在广泛的忧虑，但这种忧虑通常几乎没有无能为力的性质；这些男女的头头，是‘有血性的，不屈不挠的’。”⁶⁸

大学教授的勇气和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由于他与同事的关系而得到加强。“虽然立法委员会一类外部力量可以有苛刻明确的手段使他受到损害，但他不会低估他的职业环境使他可能蒙受的微小剥夺。”⁶⁹住在小社区中的人，不仅有一个大社会，而且这个小社区，既增强自身对于群体准则的态度，又惩罚对群体准则的背离。因此，曾经用以威吓保守主义者的知识界内部的自由舆论，已经远比外部窥探和批评更有力地约束了那些持中左立场的人。⁷⁰今天，有更大社会压力迫使整个知识界采取保守态度，这也会弱化知识界内部对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达成共识，从而可使比已

经外现的、更深层的保守主义得到释放。

说明美国知识分子左翼情绪低落主要不是来自压制的更明显证据是,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后来也在不完善的民主社会与左翼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类似和解;在那些国家,与国内安全计划和反对共产主义有联系的压力要小得多。在英国,一度被视为工党堡垒的伦敦经济学院,据许多报道,现在在它的教员中已有了一个支持保守党的多数。⁷¹在加拿大,一份有3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作家和学者的喉舌——《加拿大论坛》,已不再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杂志。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们也可指出类似的变化。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知识分子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是否美国知识分子与其社会的关系在发生一种永久性变化。尽管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现状的固有趋势仍将继续存在。正如芝加哥的一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写的:“在所有社会,甚至在那些知识分子以其保守主义而著称的社会,多种多样的创造性路线,以及指向怀疑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也会激励对占优势的文化价值系统采取部分拒斥的态度。一种文化价值‘系统’……的提炼和发展,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某种程度的拒斥。”⁷²任何现状都蕴含着刻板僵化和教条主义,对其发动攻击是知识分子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管是从留恋传统价值的立场,还是出于追求实现平等梦想的愿望。而且在这样做时,知识分子帮助维护了民主制度的生命线——冲突。

注 释

1. 保守主义者常常能鉴别与知识分子事业相对抗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刊上可以读到:“我们被告知的‘自由主义者’已变得软弱无力。……但迄今我们还没有在艺术家、作家、讲演家或教授中找到一个人会承认他已经‘衰老’,或承认他的言论自由受到最轻微的损害。”见 *Economic Intelligence*, June 1954, p. 4(我重点强调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讨论1928年竞选时评论说:“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不断成长的左翼运动汇成了史密斯(Smith)州长的支持力量。”见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1920—1933*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p. 202。

2. 例见 Lewis Feuer, “The Politics of the Death Wish,” *New Leader*, 41 (1958), pp. 17—19。

3. 见 Kathryn Feuer, “Russia’s Young Intellectuals,” *Encounter*, 8 (February, 1957), pp. 10—25; Leopold H. Harrison,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Soviet

Intelligentsia,” *Foreign Affairs*, 37(1959), pp. 235—246。

4. *Facts Forum Radio Program*, No. 57.

5.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讨论见 S. M. Lipset, “The Sources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Daniel Bell, ed., *The New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56), pp. 210—212。

6. *Facts Forum Radio Program*, *op. cit.*

7. James H. Leuba, *The Belief in God and Immortality*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21), pp. 219—287, 以及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es*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0), pp. 50—54。关于总人口中宗教信仰趋势的分析见 S. M. Lipset, “Religion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Forum*, 2(1958—1959), pp. 17—21。

8. Arthur Kornhauser, “Attitudes of Economic Group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1938), p. 264。

9. Paul F. Lazarsfeld and Wagner Thielens, Jr., *The Academic Mind*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pp. 14—17。

10. H. D. Anderson and P. E. Davidson, *Ballots and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p. 119。

11. 关于这项研究见 Ernest Havemann and Patricia West, *The Went to Colle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52)。书中没有出现的对政治行为分析的内容来自对原始材料的进一步解读。承蒙《时代》杂志研究部允许对资料进行利用,我愿在此表示谢意。

12. 关于保守派和共和党成员的比较研究见 A. Kornhauser, *op. cit.*, p. 264, 以及 Arthur Kornhauser,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in George W. Hartman and Theodore Newcomb, eds.,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Cordon Company, 1939), p. 255。

13. 这项研究见 Alice I. Bryan, *The Public Librarian: A Report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14. Leo Rosten, *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37), pp. 342—353。当然,1936年选举大大有利于民主党,但民意测验显示,其他像新闻记者收入一样多的中产阶级群体,大多支持共和党。

15. Theodore E. Kruglak.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 Study of the Men and Women Reporting for 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Media in Western Europe* (Geneva: Librairie E. Droz, 1955), pp. 87—89。

16. Louis Overacker, “Presidential Campaign Funds in 193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1937), p. 485; 以及 Vol. II, *Radio and Television*, pp. 142—162。

17. John Cogley, *Report on Blacklisting*, Vol. I, *Movies* (New York: Fund for the Republic, 1956), pp. 24—46; 以及 Vol. II, *Radio and Television*,

pp. 142—162。

18. 关于共产主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的详细讨论见 Irving Howe and Lewis Coser, “The Intellectuals Turn Left,”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p. 273—318; 另见 Daniel Bell,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nald Egbert, *et al.*, eds., *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351—365。

19. Bertrand de Jouvenal, “The Treatment of Capitalism by Continental Historians,” in F. A. Hayek, ed., *Capit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p. 118—120.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力主如下观点:在商业价值与诸如法律、建筑、医学等等各种职业价值之间存在基本的冲突。“现代经济制度的主旋律几乎普遍认为是自由追求个人利益。……而在这种解释中,与商业相反,职业的标志是‘无私’,职业不应被认为是在追求个人利益,而是为他的顾客服务,或为科学进步之类非人的价值服务。”Talcott Parson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p. 186. 应当指出,帕森斯并没有把这种与任何特殊的政治影响相联系。

20. 前面提到的两项关于新闻记者的研究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被访问的记者不同意他们报纸的方针,感到要反映他们上司的意愿,不得不歪曲他们的新闻报道。L. Rosten, *op. cit.*, p. 351. T. E. Kriglak, *op. cit.*, pp. 100, 102. 英国的一项研究报道,1945年后对皇家出版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的压力是“来自一种保护新闻记者的智力自由和诚实不受其雇主威胁的要求。”Roy Lewis and Angus Maude,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London: Phoenix House, 1949), p. 179.

“在当代美国,商业的巨大成功,特别是在好莱坞、广告和宣传一类边缘领域的成功,往往会改变成功的作家道德心,驱使他们改变方向。”Crane Brinton, *Ideas and Men: The 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50), p. 449.

21. Theodore Geiger, *Aufgabe und der Intelligenz in d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49), p. 124.

22. Helmut Plessner, “Ideological Tendencies among Academic Thinkers,” Congress for Culture Freedom, *Science and Freedom*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Ltd., 1955), p. 178. 应当指出,普勒斯纳(Plessner)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使他们保守,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根植于他们祖国的土壤和传统”。这种认为历史学家保守而科学家左的观点,米歇尔斯(Michels)在1911年已有概括,见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1915), pp. 256—257;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谈到历史学家时也有这种看法,见 *Ideological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36), pp. 119—122. 米歇尔斯概括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使“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神学、法学一类思辨科

学……与实验和归纳科学的研究成了对照……前者是如此深刻地富于过去的精神……后者很容易使人相信前进的原因。”

23. 见 Louis Hartz, *Liberal Politic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55)。“美国自由主义的所谓‘缺陷’在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保守传统。”*Ibid.*, p.57。“尽管高级[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已为[美国]历史所排除,但我们留下的是实践中的保守主义。”Arthur Schlesinger, Jr., “Burke in America,” *Encounter*, 5 (1955), p. 79. 另见 Herbert McCloskey, “Conservatism and Person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 (1958), p.39; 以及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p.68.

24. “我们现在研究的几乎所有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曾指责过当时形式下存在的事物……即使到了19世纪,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仍在对抗传统。不过有些已在思想上转向右,转向古老的宗教,转向老人,转向复活了的贵族式统治。……有些转向左,转向现在普通有钱人听起来害怕的社会主义的某种形式。”Crane Brinton, *op. cit.*, pp. 449—452.

25. 见 Gertrude Himmelfarb, “America Democracy and European Critics,” *The Twentieth Century*, 151 (1952), pp. 320—327, 其中批评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通俗文化的看法。

26. Leon Samson, *Towards a United Front* (New York: Farrar and Reinhart, 1933).

27. 见本书第九章。

28. 麦尔文·西曼(Melvin Seeman)曾对40名进行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的副教授作过一次深入细致的访问研究。他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用少数派式的语言和方式描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处境”。“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Language of Minor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1958), p. 27. 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常指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选择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加大了他们自身的压力。压力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强;认为压力强就会使得压力变的如此。”Davi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American Scholars*, 23 (1953—1954), p. 14.

29. P. F. Lazarsfeld and W. Thielens, Jr., *op. cit.*, pp. 11—17.

30.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Jobs and Occupations,”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3), pp. 412—414.

31. 指出如下事实是有意义的: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的研究表明,不同职业的相对威望在各地是相似的。两位社会学家阿莱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彼得·罗西(Peter Rossi)对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俄国“背叛者”中得到的调查结果作了比较,他们得出结论:各种职业在各个国家有大致相同的排列次序。Inkeles and Rossi, “National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1(1956), p. 339。后来在巴西、菲律宾、丹麦和荷兰进行的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在美国,研究人员对 25 种不同职业的威望作过两次比较研究:一次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另一次在 1947 年。这两次研究得到的排列次序几乎一致。实质上,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要求受过高水平教育的职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或要求有相当大权力的职业(商业上层和政治上层),在各地都排在高位。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参考文献见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pp. 14, 111。

32. Richard Centers, “Social Class, Occupation, and Imputed Belief,”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1953), p. 546。

33. 见 John D. Campbell, *Subjective Aspect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52)。

34. 见 S. M. Lipset and R. Bendix, *op. cit.*, pp. 128—137, 其中概述了许多有关商业精英的研究。

35. P. F. Lazarsfeld and W. Thielens, Jr., *op. cit.*, pp. 23, 26。

36. 在这方面,把如下事实的原因和后果研究更清楚或许是令人感兴趣的:(正如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所显示)医务工作和高竞争、高操作的商业工作似乎吸引同类型的人,这类人的最高目标似乎是挣钱和晋升。见 Morris Rosenberg, *Occupations and Values*(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 16—19, 82。

37. “在埃默森(Emerson)时代,教授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伙伴不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那时没有、也从来不会指望得到在欧洲的报酬和尊重。”Merle Curti,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0(1955), p. 260。

草可能总是在别处看起来显得更绿,这个比喻特别适合那些想证明在别处处境更好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作为重要的外国旅行者,在国外常常接触到当地各方面的精英,而在国内很少有这种正式会见的机会。因此,詹姆斯·布里斯(James Bryce)在 19 世纪 80 年代写文章时告诉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我认为得到的尊重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多,意大利可能是个例外,那里对学者、诗人、艺术家的兴趣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高。一位著名的作家或神学家,在美国的知名度比在欧洲任何国家都高。他是美国的光荣之一。”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Vol. II (Toronto: The Copp Clark Pub. Co., Ltd., 1891), p. 621。

最近,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综合了各方面的分析后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在英国优于法国,不过他写道:“英国先锋派作家……来到巴黎,欣喜若狂……他们对政治的狂热油然而生……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场政治事件,或者说,至少在那些思想狭窄、相信这篇文章自身重要性的那些人看来,表现为一场政治事件。”根据阿隆的看法,英国知识分子,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具有他们法国伙伴那样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印象是表面的和错误的。

Raymond Aron,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7), p. 218.

38. 一个研究美国知识分子的法国分析家最近写道：“在我看来，与他的欧洲伙伴相比，美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建立在挫折和自卑基础之上的。我连续会见的一些人告诉我，欧洲知识分子享有一种地位，即使不是欢乐的话，至少也比美国知识分子享有的地位更有尊严。”R. L. Bruckberger, “An Assignment for Intellectuals,” *Harper's*, 212 (February 1956), p. 69.

39. “有一件事，或许只有这一件事，可以有把握地断定。美国没有等级，也就是说，没有公认的外在等级标志，使一个人可以因此享有任何社会特权，或从他们那里得到尊敬和重视。没有人有权认为他比他的伙伴更好，或期望别人对他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关照。”James Bryce, *op. cit.*, p. 618. 要说明上层美国人努力确立家庭等级差别如何导致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详细研究美国人的这些观念。这方面的阐述，见 S. M. Lipset, “Social Trends in America,” in Lyman Bryson, ed., *A Guide to Knowledg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s Co., 1960).

40. A. G. Nicholas,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U. S. A.,” *Occidente*, 10 (1954), p. 47. 导致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地位不同的另一个根源在于人数。在美国，拥有“教授”头衔的人接近 20 万，而在较大的欧洲国家，这样的人最多只有几千名。唯其如此，部分是因为欧洲大学较少——后面将讨论，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欧洲人对授予教授头衔有限制，只把它给予每所大学每个领域中的几个人，常常只是一个人。正如约翰·D. 希克斯(John D. Hicks)所指出：“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各级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他们都是教授……而欧洲则不同，那里的教授不分级。一个人要么是教授，要么不是教授。倘若他是教授，那你就处于某种显赫位置。欧洲大学的大多数教员并不是教授，他们可能从未希望成为教授。”John D. Hicks, “The American Professor in Europe,” *Public Spectator*, 6 (1952), p. 432.

41. Bogdan Radista, “Clash of Two Immigrant Generations,” *Commentary*, 25 (January 1958), p. 12.

42. David Riesman, *op. cit.*, p. 15; 里奥奈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索尔·帕多弗(Saul Padover)也注意到美国知识分子的高地位。见 Lionel Trilling, “Mind and Market in Academic Life,” *The New Leader* (February 9, 1959), pp. 19—23; 以及 Saul Padover, “Kissinger and the Egghead,” *The Reporter* (April 30, 1959), pp. 7—8. 关于学校经验影响的讨论见 David Riesman, “Comments,” *Daedalus* 88 (1959), pp. 491—493.

43.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The Educational Futur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13. 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虽然位于纽约州，但在社会科学方面它的地位已下降，1925 年排在第一位，1957 年已降至第三位，*loc. cit.*

44. A. G. Nicholas, *op. cit.*, p. 45. “在美国，搞政治的人在华盛顿，搞出版、

开剧院的人在纽约,拍电影的人在洛杉矶,而教授和新闻工作者遍布全国各地。(我遇到的大多数英国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国没有国立通讯社,大多数的大学教授住在小城镇。)一位编辑某种有50万读者杂志的人,很可能从未见过任何政治名人,从未看过戏,或者听过音乐会。”Irving Kristol, “Table Talk,” *Encounter*, 5 (October 1955), p. 60.

45. 加利福尼亚州有40万人口的奥克兰市,基本上是一个产业工人阶级的城市。1958年,该市声称:“奥克兰市从业艺术家的人数是惊人的。可以看到有大约1000名男女画家受雇作画。出席布鲁塞尔博览会的17名美国画家当中,就有两名来自奥克兰。”Ed Schoenfeld, “Oakland and the Arts,” *Oakland Tribune* (December 28, 1958), p. M-3.

46. P. F. Lazarsfeld and W. Thielens, Jr., *op. cit.*, pp. 31—32.

47. I. Kristol, *op. cit.*, pp. 60—61. 克里斯托尔(Kristol)在伦敦编辑《文汇》(*Encounter*), 在纽约编辑《评论》(*Commentary*)和《记者》(*The Reporter*)。

48. Dwight MacDonald, “Amateur Journalism,” *Encounter*, 7 (November 1956), p. 19; 麦克唐纳(MacDonald)后来就同一问题的评论,见他的“Politics and Partisans”, *Columbia University Forum*, 2(1958), p. 3.

49. John Fischer, “The Editor’s Essay Chair,” *Harper’s*, 216(March 1958), p. 18.

50. 有人曾指出,政治首都华盛顿与智力首都纽约的分离也助长了许多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分离感。“喜欢集中到华盛顿的知识分子的唯一类型是……那些决定使政治成为自己毕生事业的知识分子。”A. G. Nicholas, *op. cit.*, p. 44. 华盛顿不仅与纽约的智力活动相脱离,而且奇怪的是,它还是美国少数几个没有重要世俗大学的城市之一。在这方面,有许多州府可与华盛顿相比较,如纽约州州府奥尔巴尼、加利福尼亚州州府萨克拉门托、宾夕法尼亚州州府哈里斯堡、伊利诺伊州州府斯普林菲尔德。一种情况是有社会科学家力量的大学位于州府所在地,另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大学不在州府,而这两种情况的政治作用和对它们的主观感觉加以比较,或许是有意义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指出,在一个州,威斯康星州,州府与大学“甚至在本世纪开始以前就在一起。当时,拉福莱特(La Follette)体制与设在麦迪逊的州立大学结成了亲密联盟,这预示着看来所有智囊团的出现”。*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p. 149. 明尼苏达是另一个州,大学和州府位于同一城市区;社会科学家与政治家有密切的合作和社会交往。

51. 在这方面,指出如下事实是有意义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解释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不顾他们的高地位而忠于共产主义时坚持认为,他们远离权力,所以当然会这样。“对政治感兴趣的[法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因为他们感到他们应得权益受到诈取而怨恨。不管是驯服的,还是反叛的,他们似乎是在荒野中说教……在美国、英国,甚至在德国,思想和人员从未停止循环,无论是在经济学家与金融界和工业管理界之间,还是在这些人与高级文职官员之间,以及在严肃

的出版社、大学与政府之间。大多数法国商人从不会见经济学家，直到不久以前，他们仍然倾向于——在心腹圈子中——鄙薄这种人。法国文职官员对学者的建议满不在乎。新闻记者很少接触双方任何一方……就此而论，没有任何统治阶级像法国组织得那样差。”R. Aron, *op. cit.*, pp. 220—231.

52. “作家在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占据一种特殊位置：他们构成了社会学家可能会称之的‘外人’群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种群体的集合……平均说来，他们的收入少于医生和律师，多于牧师，略等于大学教授。”“Prophets Without Honor? The Public Status of American Writer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7, 1954), p. liv. 但是，雷蒙·阿隆告诉我们，在法国，有些知识分子“把眼光投向大西洋彼岸，那里，称之为知识分子可能使人感到犹豫的一些写作专家，有相当多的收入。”R. Aron, *op. cit.*, p. 219.

53. P. F. Lazarsfeld and W. Thielens, Jr., *op. cit.*, p. 241. 作者把他们的样本按“生产能力”分为5类。在属于最低类、可能最不著名、收入最小的那些人中，只有47%有外来收入，而在属于“最能干”类的那些人中，76%除大学薪金外还有其他收入。

54. 大学教员平均工资低，许多专职教授薪金不足。但年轻的大学学者和公务员的工资在各地都极低，而且很多普通大学，资金不足，也拉低了平均工资。

55. “作家作为一个阶层没有或几乎没有政治权力。有些人所写的或许能影响10年或20年间的选民，但很少能在某次具体选举中帮助他们的候选人。1952年他们几乎一致支持史蒂文森(Stevenson)先生，这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史蒂文森的总得票，还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其他群体可能决定投票反对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如此之高热情的任何人。”*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7, 1954), p. liv.

56. 引自 John Fischer, *op. cit.*, p. 18, 他还指出：“林登·约翰逊……美国第二号最强有力的政治家，曾经教过书。他的助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是一位前大学教师。”现在参议院组成的统计数字据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1958), p. 65, “Cap and Gown Win Favor of Voters—3 Newly Elected College Professors to Join Faculty of 11 Current Senators.”这篇文章还指出，另有7名参议员(其中6名是民主党人)是PBK联谊会——全国性学者荣誉组织——的成员。

57. Claude C. Bowman, *The College Professo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privately printed, 1938), p. 57. 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步卡内基(Carnegie)的后尘向一个“要求发给大学教师充足工资的全国性运动捐款5000万美元。”*Ibid.*, p. 43. 1955年，福特(Ford)家族保持相当大影响的福特基金会为提高大学薪金捐助了5亿美元。

58. E. Digby Baltzell, *Philadelphia Gentleme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59. R. 霍夫施塔特(R. Hofstadter)有洞察力地分析了使美国知识界向左转的某些原因；这种态度转变在“19世纪90年代已慢慢开始，自后20年日益发展。这

些职业的成员放弃了南北战争时代的固执保守主义，加入了自由异议的主流，并对其给了道德上和智力上的领导。”见 *Age of Reform, op. cit.*, p. 149; 另见 William E. Leuchtenburg, “Anti-Intellectualis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9(1955), pp. 8—17。

60. Marcus Cunliffe, “The Intellectuals II. The United States,” *Encounter*, 6(May 1955), p. 29.

61. Merle Curti, *American Paradox*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6).

62. 英国社会主义因为信奉不切实际的费边社知识分子的理论而受到攻击。德国右翼总是敌视经院社会主义。不过，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美国没有大批的保守知识分子。因此，反知识分子一直是保守主义的当然武器。

然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正确地提醒我们，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像马克思的激进反对者一样，也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反对。“我们的历史书告诉我们……在人民党—布赖恩时期不接受富裕阶级金本位经济学的教授，常常是粗暴干涉的受害者；这些书通常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人民党夺取堪萨斯时，他们大肆攻击堪萨斯大学，其情景与位置完全颠倒时，他们的痛苦抱怨如出一辙。”Richard Hofstadter, “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 *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 59(1953), p. 288.

63. Friedrich Engels, “On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On Relig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p. 319. 关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反知识分子插曲的更详细分析见 John Spargo, “Anti-Intellectualism in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 Historical Survey,” in *Sideligh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ism*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1), pp. 67—106.

64. 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op. cit.*, p. 15.

65. 当然，攻击并不总是暗指高地位，如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的情况所显示的。

66. 法国作家 R. L. 布鲁克伯格 (R. L. Bruckberger) 认为：“美国知识分子常常爱说他的国家使他失望，没有给他应得的荣誉，他感到像一个精神流浪汉。我想知道相反命题是否就不正确。或许是美国知识分子使他的国家失望，或许他比初看起来更深刻地被忽视……如果认为一个国家没有知识分子也能进步，这将是滑稽的。是的，美国知识分子应当停止抱怨美国，反过来，美国对他们的抱怨也许更有理由。经常的现象是，他们对他们的国家没有兴趣。”R. L. Bruckberger, *op. cit.*, p. 70.

67. 知识分子与下层阶级以民主党为基础的较早联盟之所以在 19 世纪 40 年代解体，是因为一个非经济的问题，即废除奴隶制问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

目标，而民众和民主党人站在错误一边。许多从政的知识分子曾经与“上层阶级”或前一章讨论的共和党保守主义自由思想结过盟，还曾与左翼小党联合过。威尔逊新自由派当政，他们开始复归民主党；新政派当政，完成了这种复归。

68. P. F. Lazarsfeld and W. Thielens, Jr., *op. cit.*, p. 95.

69. *Ibid.*, p. 104.

70. Morris Freedman, “The Dangers of Nonconformism,” *American Scholar*, 28(1958—1959), pp. 25—32.

71. 见 William C. Harvard,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Revisited,”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58(1959), pp. 108—123.

72.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1958), p. 8.

第十一章

一党南方的出现

——1860 年选举

南方长期持续忠于民主党是最大偏离美国政党斗争阶级冲突观的一个突出事例。虽然有些人指出,南方的民主党忠诚是因为它作为美国经济相对萧条部分的处境而得到加强,但把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小城镇商人视为不景气阶层似乎多少有些荒谬。不过,不能否认,美国国家生活中最保守——如果不是反动的——部分的某些人是南方民主党人。造成这个事实的一些基本因素已在前几章讨论过,这里不拟作全面分析。¹然而,分析南北战争后认同于民主党与战前南方阶级分野的关系,可以说明奴隶制和黑人权利这样一些引起混乱和动感情的争论,是怎样影响不同阶层的多样性利益和价值,怎样为长期持续一种表面上不合逻辑的模式提供某些根据的。本章将通过考察两党在南方最后一次真正选举——1860年选举,对这些问题作简要论述。

1860年选举作为最影响美国生活的一次总统选举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美国的保守势力在南北战争中发展到了顶点。正式的政党制度此后没有大的改变,当时形成的区域性忠诚和对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影响政党的效忠者。这次选举是作为一场全国性大辩论的尾声发生的。辩论涉及奴隶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在整个19世纪前半叶,辩论愈演愈烈。当你通读这个时期的历史时,很难避免这样的感觉:如果过去有过一次选举,涉及突出的争论,选民要在选举中作出基本抉择,那就是这次选举。

然而,考察在这次选举中支持4名总统候选人的力量来源显示,与奴

隶制或共和党崛起有关的争论并不是影响大多数美国人投票的决定性争论,尽管它们也许改变了一个重要少数的投票选择。4名候选人分别代表不同方面:林肯代表共和党;道格拉斯代表北方民主党;布雷肯里奇代表南方民主党;贝尔代表宪法联盟党。林肯和贝尔表面上看是新党提名的候选人,其实他们分别代表北方和南方的辉格党;该党比民主党更早发生了地域上的分裂。尽管有4名候选人参与竞争,但在全国各个地区内的竞争基本上是两个党的事。在南方州,竞争是在支持布雷肯里奇脱离联邦的民主党人与主张留在联邦内的老辉格派宪法联盟党人间展开。在北方,是民主党人道格拉斯反对奴隶制,但赞成通过给南方州各种维护它们“特殊制度”的保证以拯救联邦。而北方,在林肯领导下的辉格—共和党人,虽然也希望拯救联邦,但强烈反对在一些地区或新州引进奴隶制,在他们队伍中有许多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可见,北方辉格—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代表两个极端,而北方民主党人和南方辉格—宪法联盟党人分别代表各自地区寻求调和冲突的群体。

1860年4名候选人的竞争是继1856年一次三党斗争后发生的,当时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夺选举的,还有一个美国人党或一无所知党。要理解1860年选举结果必须从考察一无所知党的社会成分及其最终政治目的开始。这个党的领导成员和支持力量都表明,他们的选民大多数来自前辉格党。在南方尤其是这样,他们的总统候选人米勒德·菲尔莫尔1856年在那里获得了45%的选票,基本上是辉格党的力量。在北方,大多数前辉格党人投票支持共和党,共和党在那里赢得了45%的选票,而菲尔莫尔只得了13%的选票。

1860年,分裂了的民主党在北方和南方得票都有增加,而吸引了菲尔莫尔北方大部分选票的共和党,在那个地区大致得了54%的选票,并在选举人团中赢得了多数。1860年共和党的胜利不能归因于有大批人脱离民主党,而应归因于如下事实:自1848年辉格党胜利以来,北方所有反民主党选民第一次聚积在一党之下。事实上,1860年民主党人在北方实际得了5个议会席位。在南方,宪法联盟党党员和前辉格党人贝尔得了41%的选票,只比一无所知党候选人、前辉格党人菲尔莫尔1856年得票少4%。

粗略分析南、北方县级选举结果表明,1860年大部分人保持了他们

以前的投票选择,尽管南方继续在转向民主党人,北方也继续在转向辉格—共和党人。如果比较从1840年到1860年的历次选举结果,可以发现,在每次选举中,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民主党都超比例地得到下层阶级——较穷的农民、生于异国他乡的人、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天主教徒——和南方的非奴隶主的支持;而辉格党的基础是比较有权势的阶级:商人、较富裕的农民、土生土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新教徒、拥有大量奴隶的种植园主。²这些关系在整个这段时间都存在,虽然如前所述,南方民主党在辉格党区获有相当多的支持,而共和党吸收了一群自由土壤派(范布伦)民主党人和某些支持美国人党的反天主教团体。

这些结果,特别是南方的结果,向研究选举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很清楚,贝尔,这个反对脱离联邦、寻求即使在共和党控制之下也要使南方留在联邦内的南方候选人,得到了奴隶主超比例的支持,而布雷肯里奇这个几乎看不到南方及其联邦制度前途的、“爱动感情的”候选人,其大部分支持者是不拥有奴隶的人,和在州内政治争端中常常反对富裕的保守种植园主的那些人。

只有当假设1860年中大多数选民按他们的传统态度投票时,才可能理解当年政党得票数与各种社会特征间的关系。受剥夺较多的社会群体坚持效忠他们地区的民主党候选人布雷肯里奇和道格拉斯,而比较有权势的群体投票支持老辉格党地区候选人贝尔和林肯。举例来说,在圣保罗学校曾就1860年总统选举举行过一次模拟投票,结果几乎完全在两名辉格党候选人间分开:贝尔得票占46%,林肯得票占37%。³像1828年以来每次选举一样,1860年选举也是在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间一决雌雄。表11.1按南方县拥有奴隶的程度表示了这些县投票行为的差别,该表清楚地证实,民主党脱离联邦主义者布雷肯里奇的支持者是住在几乎没有奴隶的地区的白人。这张表似乎还暗示,一个县奴隶越少,支持脱离联邦的就越多,因为从表中可以看出,支持布雷肯里奇的县,有2/3是奴隶少的县,而奴隶多的县有近一半投票反对他。

表 11.1 南方 7 个州——弗吉尼亚、亚拉巴马、佐治亚、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田纳西、路易斯安那——投票支持布雷肯里奇的县的比例*

按奴隶比例,县在所在州内的相对位置	总县数	支持布雷肯里奇的县数	支持布雷肯里奇的百分比
高	181	94	52%
中	153	87	56
低	203	130	64

* 道格拉斯,代表北方民主党,得到南方选票的 13%。因为他像贝尔一样支持联邦,所以可以把他的选民和贝尔的选民看作是反布雷肯里奇的。在按奴隶比例把县分为高、中、低时,在每个州必须使用不同的比例标准。唯其如此,部分是因为为获得这些资料使用了不同的来源,而这些来源报道的是奴隶占人口的百分比。比这个理由更重要的在于,各州奴隶比例变化很大,以致种植园州大多数县有许多奴隶,而某些边境州几乎没有奴隶占多数的县。可是在所有南方州,奴隶占人口比例足以用来区分富县和穷县,而且一般说来,一个县在州内的奴隶比例,不管是高或低,都与其投票模式高度相关。

本表和后面表中的数据是据如下著作中报道的资料计算的: Joseph Carlyle Sitterson,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 Henry T. Shanks,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Virginia, 1847—1861* (Richmond: Garrett and Massie, 1934); Lewy Dorman, *Party Politics in Alabama from 1850—1860* (Augusta: Alabama State Department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1935); Percy Lee Rainwater, *Mississippi Storm Center of Secession, 1856—1861* (Baton Rouge, La.: Otto Claitor, 1938); Thomas P. Abernethy, *From Frontier to Plantation in Tennesse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2); and Ulrich B. Phillips, *Georgia and State Right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然而,布雷肯里奇得票是否真的意味着支持脱离联邦,在总统选举后 3 个月到 6 个月受到了直接检验;当时同一些州举行了公民投票(或选举出席一些会议的代表),要求选民对是否脱离联邦直接表态。当然,因为林肯当选总统,情况发生了变化,显然,南方有大批人决定脱离联邦。南方大多数州拼命争夺那些会议代表的选举,结果超出了许多人的看法,维护联邦的力量在许多州得到 40% 以上选票。虽然没一个人对参与这些选举的脱离联邦和维护联邦的领导人作过详细研究,但关于各州对这场斗争态度的历史著作表明,大多数反对脱离联邦的领导人,是辉格党和宪法联盟党的领导人;而支持脱离联邦的领导人,基本上在民主党一边,尽管远不是没有例外。这个事实,连同表 11.1 所示总统选举结果,可以使我们设想,在总统选举中支持贝尔的辉格党奴隶拥有者,是维护联邦力量的主要来源,而奴隶少的县支持脱离联邦,一直投票支持布雷肯里奇。

不过,总统选举中所显示的奴隶拥有者与投票支持维护联邦的关系,实际上在后来的公民投票中完全颠倒了。在那些公民投票中,奴隶多的

县支持脱离联邦，奴隶少的县支持维护联邦。

比较表 11.1 和表 11.2 发现，与是否脱离联邦相对应的态度变化，像 3 到 6 个月内举行公民投票所可能设想的变化一样剧烈。1860 年秋季，有 64% 奴隶少或没有奴隶的县，大多数选民支持主张脱离联邦的民主党人布雷肯里奇，接着在 1860—1861 年冬季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同样的县有 63% 大多数选民支持维护联邦。相反，有种植园农业和大量奴隶的县，其中几乎一半在这次选举中反对布雷肯里奇，而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有 72% 持脱离联邦的立场。导致这种急剧变化的原因，可以通过考察县的投票行为得到部分说明，其方法类似于研究个人选举行为变化的典型对象调查法：过一段时间，再次访问被调查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两次投票的变化对这些县加以区别，从而看到变化发生在哪里。

表 11.2 从拥有奴隶的相对多少，看南方 7 个州投票支持脱离联邦的县的比例

按奴隶比例， 县在所在州内的相对位置	支持脱离联邦县的 百分比	支持维护联邦县 的百分比	(县数)
高	72	28	(181)
中	60	40	(153)
低	37	63	(203)

表 11.3 中的资料清楚地说明 1860—1861 年发生了什么。在总统选举中，人们继续按传统政党分野投票。然而当政党符号消失，问题变成了脱离联邦与维护联邦的争论时，以前受到政党忠诚抑制的阶级或经济因素突出了。奴隶拥有者在后来的公民投票中支持脱离联邦，而住在奴隶少的地区的那些人支持维护联邦。⁴ 不过，政党忠诚和与政党有关的争论对后来投票表决是否脱离联邦仍继续产生某种影响。这可以从如下事实清楚地看出：在总统选举中主要投辉格党票的、奴隶多的县，有 2/5 继续奉行辉格党的政策，并听从该党许多领导人的劝告，投票支持继续留在联邦内。在奴隶少的县中，支持布雷肯里奇的县有一半转而支持维护联邦；而反对布雷肯里奇的县，有 4/5 以上持同样态度。传统的政党忠诚在奴隶占人口比例中等的县最具决定性。总的来说，这样的县在后来公民表决中像它们在总统选举中一样投票。如果它们支持民主党，它们就拥护脱离联邦；如果它们支持辉格党，它们就拥护留在联邦。

表 11.3 从拥有奴隶的相对多少,看南方 7 个州各县在 1860 年
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与后来就是否脱离联邦进行公民投票的关系

就脱离联邦投票	县拥有奴隶的相对比例					
	高		中		低	
	1860 年总统选举					
	布雷肯里奇	贝尔一道格拉斯	布雷肯里奇	贝尔一道格拉斯	布雷肯里奇	贝尔一道格拉斯
支持脱离联邦	82%	61%	82%	30%	50%	14%
支持维护联邦	18	39	18	70	50	86
(县数)	(94)	(87)	(87)	(66)	(130)	(73)

可见,拥有大批奴隶而强烈支持民主党的县,有极大可能支持脱离联邦,而传统上支持辉格党以及很少或没有奴隶,是有助于增强维护联邦力量的因素。然而,民主党还从最倾向于维护联邦的群体——无奴隶地区的选民——中得到支持,而亲联邦的辉格党也从住在有大批奴隶的种植园区的白人那里得到支持。

当然,必须切记,这里提出的结论容易陷入各种社会生态分析的圈套,特别是一定不要把地区投票行为归因于区内个人的投票行为。⁵尽管不大可能,但 1860 年奴隶多的地区支持联邦主义候选人的选票有可能来自种植园区非奴隶拥有者,而奴隶拥有者实际上有可能支持布雷肯里奇。除了传统的政党忠诚和所论地区的奴隶比例以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投票情况。

不过,以选民态度改变的县的特征来考察 1860—1861 年的总统选举和随之进行的公民投票,明显说明南方选民在这关键一年发生了什么。老的富裕的辉格党奴隶拥有者及其追随着在 1860 年继续反对来自下层白人非奴隶拥有阶层的南方煽动者,而后者坚持效忠杰克逊的党,即使在该党成了维护奴隶制和主张脱离联邦的党以后。然而,一旦木已成舟,选票反映一种争论态度,而不是代表某一党,就有足够多的布雷肯里奇的支持者反对脱离联邦,并有足够多的宪法联盟党人贝尔的支持者拥护脱离联邦,以致可以准确地说:从比例上看,奴隶拥有者支持脱离联邦,而没有奴隶的白人则反对脱离联邦。

虽然资料不够系统、不够完全,但逐县考察南方的选举结果表明,两大党,辉格党和民主党,自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多少已按经济界线和地位

界线把选民分开。⁶对这种趋势的主要背离出现在山区,那里没有奴隶的贫穷白人农民支持辉格党,据说这是因为该党支持政府拨款改进公路一类国内设施。民主党历来反对这样做,其根据是这有利于城市商人阶级,而他们本应为此付款。

随着奴隶制问题的出现,辉格党失去了一些种植园地区的支持,但仍然是那里居支配地位的政党。北方辉格党主要由中产阶级新教徒构成,是两大党中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奴隶制集团,这一事实使辉格党再作为全国性政党存在成为不可能,于是当其北方同志成立共和党时,南方辉格党则举棋不定,阵脚紊乱。

南北战争和重建运动结束以后,民主党保住了杰克逊主义的一些传统核心——没有种植园经济和黑人人口不多的地区,还从支持老辉格党的种植园主和城市商人那里得到支持——事实上是被这些人所俘获。共和党通过南方辉格党保持了某种连续性,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因为向往公路而支持辉格党的山区贫穷白人仍然支持共和党。正是这个群体,在1860年投票支持宪法联盟党,在1860—1861年公民投票时支持维护联邦,参加了联邦军队与南方邦联的战斗,在重建时期、白人至上时期以及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始终效忠共和党。

如果在南方白人中进行一项社会生态典型调查分析,把重点放在那些一般长时间有态度转变的县和地区,则有可能显示,1860—1861年不稳定的两个群体是重建运动以来出现一党南方变化的潜在根源。支持老辉格党的阶级由于南北战争成了民主党的支持者,而在辉格党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共和党——之外扮演不相称的角色。在1860年总统选举和以后就是否脱离联邦进行公民表决时最忠于宪法联盟主义者的富裕的阶层和地区,似乎是同一些阶层和地区,而今天有转向共和党的倾向。另一方面,历来支持民主党,没有种植园,而在1860—1861年公民投票中转向支持维护联邦的那些县,似乎也是同一些县,在南北战争后却支持鼓吹农民利益的第三党或民主党内的“人民党”派。现在,这一派仍留在民主党内,而民主党内的老辉格党阶层,面对民主党的全国统一和恢复了自由主义,又涌向了共和党。⁷

注 释

1. 关于一党的南方的详细分析,见 V. O. Key, Jr., *Southern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Alexander Heard, *A Two-Party South*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2); 以及 J. B. Shannon, *Towards a New Politics in the South*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49)。

2. 关于在辉格—民主党框架内投票选择的连续性,尚未作为充分的基础研究给予证实,但有许多局部性研究显示,辉格党、美国人民党和共和党从相同来源得到选票,而民主党,不管在统一时期,还是在分裂时期,都保有 1829 年到 1840 年期间支持杰克逊(Jackson)和范布伦(Van Buren)的那些阶层和地区的忠诚。

3. Arthur Stanwood Pier, *St. Paul's Schoo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4); 另据 E. Digby Baltzell, *Philadelphia Gentlemen*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8), p. 316。

4. 研究得克萨斯德裔移民区表明,在白人非盎格鲁—萨克逊少数民族群体中,有些群体的投票行为类似于贫穷白人农民群体。分析 1860 年以前德裔城镇的投票行为显示,大多数城镇以压倒性多数支持民主党,尽管他们的组织和出版物反对奴隶制。这种效忠民主党的情形在 1860 年选举中继续存在,其时,他们支持布雷肯里奇(Breckenridge)。在 1861 年表决是否脱离联邦时,他们反对脱离联邦。见 Rudolph L. Biesele, *The History of German Settlements in Texas* (Austin: Von Boehmann-Jones Co., 1930)。

5. 关于把生态关系用于分析个人行为的局限性的讨论,见 W. S. Robinson,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1956), pp. 351—357; Leo A. Goodman, "Ecological Regressions and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1953), pp. 663—664; 以及 O. D. Duncan, "An Alternative to Ecological Corre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1953), pp. 665—666。

6. “把辉格党种植园主从辛苦然而繁荣的山区农民以及懒惰而‘贫穷的哲人’分离出来的这条社会分界线是一条严格分明的界限,足以引起政治对抗。这些种植园主受过本阶级良好的教育,住宅富丽堂皇,生活舒适而奢侈,他们把在其他人看来象征娇气、时髦或至少是愚蠢浪费的东西,看作是社会的需要……”

“这条社会分界线的源头近乎与政党界限的源头一致,其起源至少在南方大西洋沿岸州完全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不过,这与杰克逊式民主发展到极致有关,因为到那时,这些界线才开始真正绷紧……杰克逊的党遇到南方种植园主在其中起了显著作用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于是,住在黑人聚居地带的人民与住在边远地区的人民间的社会界线有可能重新突出,每个阶级的社会团结不可避免地有促进和巩固其政治团结的作用。”

“可见,南方辉格党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它主要从没有奴隶的白人中间得到支持,‘普通白人’不是它的力量来源;这一直贯穿它的整个历史,它是种植园主和奴

隶拥有者的党——富饶黑人聚居区的贵族。而民主党依靠社会分野的相反一侧，特别是依靠边远山区的小农；民主党呼吁促进农民利益总会影响这些人。”A. C. Cole, *The Whig Party in the South*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 1913), pp. 69—72。对此的一个重要补充，一般认为是由历史学家查尔斯·勒塞斯(Charles G. Sellers)提出的。他指出，南方辉格党是由“城镇商人和职业人建立和领导的”，该党议会代表有74%是律师，几乎所有南方银行家都是辉格党成员。“南方辉格党受城市和金融势力控制，多数种植园主支持这个党，而这些种植园主在经济上要依靠金融和商业机构。”Charles G. Sellers, “Who Were the Southern Whig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1954), pp. 335—346。

7. 最近发表了一项关于路易斯安那州从建州开始到现在的历次选举的研究，这为研究选举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提供了一些潜在的尚未发掘的资料来源。这项研究清楚地显示，路易斯安那州从南北战争前直到现在，政治活动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见 Perry H. Howard, *Political Tendencies in Louisiana, 1812—195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另见 Allan P. Sindler, *Huey Long's Louisiana*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56)。

第四篇

民间机构中的政治：个案研究

第十二章

工会中的政治过程

在各种不同国家实行民主的条件,是本书的基本问题。但政治问题不独涉及单一民族国家,因为国内每个群体必然也要寻找机制,为本群体作出决定和在本群体内分配权力。各种组织,如体育俱乐部、全国棒球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或卡车司机联盟,都有用以规定组织内政治过程的正式章程。研究这些民间机构可以使我们对全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它们当中荟萃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从半无政府状态的公社,直至一党专制独裁。

当然,民间机构没有主权,不能控制合法力量的使用,而这些权力乃是官方机构独有的特征,但许多民间组织有权对特定领域的事务施加影响,或被赋予实际上的垄断权。这类组织——控制进入职业的组织、有主要代表权的工会、实际控制获得国家援助的退伍军人组织和农业组织——的真正权力表明,很难把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一律分开。

在这最后一部分,我想通过考察控制民间组织之主要类型——工会——内部政治生活的某些条件,来说明这种机构对于民主政治研究者的重要性。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民间机构相比,人们对工会研究得更仔细,这就有条件允许在使之系统化方面作某种努力。

观察者已经注意到如下事实:大多数工会在它们的组织和运作中,比它们扮演民主组织——其中有合法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可以轮流掌权——更类似于一党制国家。这种情况在劳工运动中是如此普遍,以致一个苏联的辩护人把它指称为那个国家实行一党统治的正当理由。在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联盟 1947 年大会上,哈里·布里奇斯(Harry Bridges)说:

什么是极权主义？一个有极权政府的国家，其运作就像我们工会的运作。国内没有政党。被选为管理国家的人是基于他们的经历……那就是极权主义……如果我们开始把属于共和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干事以及其他事情分开加以管理，我们的日子就会一塌糊涂……¹

然而，论及工会官僚政治和寡头政治集团问题的文献，大多要么仅仅援引证据证明在某些工会存在这种情况，要么重复米歇尔提出的政党和工会有滋生寡头政治集团独裁之条件的传统分析。²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旨在建立一套可供研究检验命题性质的著作。

本章旨在尝试详细说明在分析工会一个方面行为，即内部政治组织行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至少是某些因素。每一节都包括一些关于功能关系的假设；这些关系是指出现在社会结构不同方面与工会实行民主或独裁的条件之间的那些关系。任何工会运动研究者都会清楚，这里所列举的，并不是详尽无遗的。

与工会有可能形成寡头政治集团有关的假设，可以从对如下问题的分析中引出：(1)大型组织结构的特有因素；(2)工会会员的品质特征；(3)对工会为了实现组织稳定而必须构建的其他结构和团体的必要的功能适应。

官僚政治的必要性

像其他大型组织一样，工会必然会形成官僚结构，即一种合理的（可预测的）管理制度。工会实行官僚体制的必要性，既出于内部因素，又出于外部因素。工会面对其会员或地方支部，必须建立有一定责任和权威模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级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定规章内行事，以处理常见情况。地方工会或全国工会的规模越大，越需要建立一个官僚统治集团。工会要管的事很多，例如一个大的地方工会，除了要搞集体谈判、处理工人不满、保存所有会员的基础档案这些工会日常工作外，还要管工人的赔偿、学徒训练学校、退休金计划、医疗保健、保险和分配工

人工作等。

从全国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常常由于增加了工作规模和复杂性而放大,要求培养一种由工会干部委派和领导的专业人员负责处理。因此,工会工作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变得只有上层管理成员才能获得。

除了纯粹的行政管理问题——这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基本上与组织的规模有关——内在要求官僚体制以外,工会官僚中央集权的程度也受其必须打交道的外部组织中央集权程度的影响。作为一个研究假设,我认为,一种产业越中央集权,越需要工会形成官僚体制。像钢铁工人工会这样的工会,它的谈判对象是少数庞大的公司,就必须建立一种其权力结构与公司权力结构平行的工会。处理不满的方法或工资标准必须在这种产业的各个部门中可以比较。工会不能允许一个工厂的支部领导人得到他们处理国内其他方面不满时可以援作先例的承诺。³

资方的管理人员通常需要“负责的工会领导”作为他们认识工会地位的代价。发动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以发泄不满,工会内部发生管辖范围或派别的斗争,会员提出超出工会干部允许的好斗要求,以及采取各种其他在工会干部控制以外的行动,都会打破生产或创造利润的常规。此刻,资方会要求工会领导出面予以排除。这种对工会“责任”的一再呼唤,常常导致不民主的工会制度,因为它有时成了工会强迫其会员执行的命令。

在民主的工会制度与“负责的”工会制度之间存在基本的冲突,许多保守分子和商业领导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至少是在他们的公开声明中。有许多工会中的独裁机构是对资方一再要求的顺应,因为资方依赖于工会担保必然随之带来工会的责任。

至少有一个大产业工会已公开承认这个问题。在《产业民主的动力》一书中,当时担任美国钢铁工人工会干部的克林顿·戈尔登(Clinton Golden)和哈罗德·鲁腾伯格(Harold Ruttenberg)指出,这个工会自觉建立了一些机构,一部分是教育机构和意识形态机构,一部分是正式控制机构,以防止支部行动的出轨。他们介绍了一个例子,其中一个好斗而忠诚的工会支部干部被开除,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样的要求,即他不能制定有悖于全国协议的支部政策。这个被开除的工会干部对工会支部干部在一个全国性官僚机构控制下的处境作了出色描述:“做一个好工会会员就是进行鼓动——鼓动就是我一直称之为工会会员的品格,我因鼓动而被激

起……从1933年以来,公司就伺机害我,我成了公司的眼中钉。现在,工会站在公司一边,我被开除了。”⁴

向官僚体制产业看齐是必要的,工会适应这种要求可以维护组织的稳定,而且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工会领导人失去他们永久任职的危险,而有利于他们个人的利益。为了削弱有组织的反对源,工会高级干部的办法是扩大对支部的管理权。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就授权其全国执行委员会,当支部干部违反总工会政策时,工会有权撤销他的职务。该工会章程中的这项规定,曾作为合同谈判的必要条件受到捍卫,但也使总工会干部有可能借此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工会领导人会操两种腔调:当呼吁工会内部纪律和责任时,他们操调和的调子;而当他们号召团结一致与资方斗争时,他们又是一副好斗的调子。正是用这两手,他们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为他们垄断工会内部权力辩护,说这在从组织的需要走向组织的目标的过程中是正当的。

小工会或不与集中化大产业打交道的工会,可以允许支部有许多自主权。例如国际印刷工人工会就给其支部相当大的谈判自由,不过它所在的产业没有全国性大公司,而且在全国各地区间没有多少竞争。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工会,也限制支部罢工的自由,不允许它在有关工会担保或各种加工工序管理权问题上随便向资方让步。像许多其他工会一样,国际印刷工人工会也面临着全国各地一系列长期罢工会用光工会罢工基金的问题。

在竞争高度激烈的产业,有一种稍许不同的情况导致官僚化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化的压力可以来自工会;大工会往往不能稳定自己的地位,除非所在产业的竞争变得不太激烈,因而前途变得比较可预测。一些工会如服装工会已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结构,以致能迫使雇主在他们之间采取类似的集体谈判做法。有时,工会能通过迫使雇主参加产业联合会和制定商业行为准则对雇主方面的官僚结构施加压力。在这样的产业中,工会可以像高度官僚化产业中的工会一样,成为一种约束力量,防止下属支部违背统一的政策。

一些官方委员会参与集体谈判也会使工会进一步官僚化。当决策重心从地方级政府转移到中央级政府时,支部要把它们一度拥有的权力也让与它们的全国性机构。这种现象是社会组织形式间功能上的相关性的

例证。一个机构领域——这个例子中是指官方机构——的日益官僚化，必然导致其他机构如工会的日益官僚化：它们是相互作用的。

当决策控制权远离地方支部时，会员参与支部事务的机会和兴趣就会下降。同样，政策上的分歧也日益限于有关全国性的政策冲突，因为只有官僚机构本身的成员了解这些政策。于是，冲突越来越表现为工会总部的管理斗争，而以地方组织间政治斗争形式出现的越来越少。一个炼钢工人有一次曾向我的一位朋友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变化的含义，他在解释他对工会支部缺乏兴趣时说：“我们已不再有工会，我们只有合同。经济学家和统计人员议定合同，而我们所能作的一切，只是对这些合同说‘是’，或说‘否’。”

当然，工会内部的日益官僚化不仅有助于巩固工会领导的地位，而且也有助于保护工人的权利。就工会在雇用和晋升问题上保护会员免遭资方的专横处理和突然袭击来说，工会强调资历和“同工同酬”一类合理的和客观性的准则和标准。这些准则和标准已经系统化、标准化并付诸实施，是工人安全和自由的保障。

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官僚管理体制可以有效地满足工会组织、工会领导和工会会员的多种不同需要，它深深植根于工会运动。然而，作为一个一般命题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组织越官僚化，它的成员影响政策的可能性越小。

工会内部的沟通

在任的官僚管理集团可以独占行政管理权，这种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对组织内正式沟通手段的控制。如果工会领导人控制了行政管理人員或基层干部发表的所有公开声明，控制了工会的报纸，控制了上层干部到全国各地访问地方工会会员和干部的旅行开支，会员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就意味着几乎不对管理权实行有效的监督。垄断沟通渠道是用宣传来统一态度和行为的基本条件之一。⁵这个条件是极权主义国家结构固有的，也是大多数工会一党制结构的特征。

这种特殊控制形式对工会的权力结构有许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会员对工会事务能广泛听到的唯一看法是工会管理层的看法。管理层的政策被说成是合理的；反对意见或反对纲领若真的提出，也会被怀疑；普通会员所能获得的有关工会事务的唯一信息是上层领导希望他们听到的。此外，这种控制阻碍了反对派的形成和组织。即使工会会员不完全相信管理层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并存在广泛的不满，组织有效的反对派也是要以“聚会”、沟通的手段为先决条件的。没有广泛的接触和信息来源，要转变“集体的无知”是不可能的。

诚然，管理集团并不能对其组织内的众多沟通实施全面控制。况且，不同的组织，其管理层实现垄断的程度，有所不同。要想分析区别民主组织与非民主组织的因素，必须考虑造成这种不同的决定性原因。下面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从组织外的来源传递给其成员的信息沟通，可以弱化管理层的控制。例如美国的政党至少不控制其党员阅读报纸。由于这类报纸批评党的领导人的行为，这就有助于形成内部反对派的活动基础。在欧洲的工党和社会党方面，党通常拥有或控制支持它的报纸，这有利于党的领导人长期保持其支配地位。

工会的内部结构或政治过程通常不见诸报端，不过有许多外部媒介试图影响工会会员的例子。在纽约，犹太人的报刊，特别是《前进》，一份社会主义报纸，长期在服装工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移居美国的犹太服装工人广泛阅读这份报纸，它批评工会政策，常常起工会内部派别喉舌的作用。不难设想，工会领导人不满这份报纸的独立性。目前，在许多工会中，天主教会的报刊通过报道工会内部问题影响天主教工人，在工会内部派别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激进政治团体在向工会会员提供有关他们工会的信息和宣传方面，也起了类似作用。

某些职业团体支持报纸或杂志致力于报道不受工会控制的工会新闻。在娱乐业和出版界就是如此；这两个领域的工会，其内部民主显然多于大多数工会。

在小的工会支部，个人接触或讲演宣传可以有效地影响会员，而控制有组织的宣传机器并不是重要的沟通优势。但是在较大的一党制组织中，有效地垄断沟通工具，是与本组织成员接触源于组织外沟通媒介

的程度成反比而变化的。这类组织外的独立喉舌,可以以与某种职业相交叉的种族群体或宗教群体为基础,也可以以关心工会内部政策的政治团体为基础,在少数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以对职业事务的兴趣为基础。

政治技巧的垄断

在大多数工会中,长期掌权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管理层几乎完全垄断了学习政治技巧的机会。对体力工人开放学习这种技巧的少数角色之一,是工会领导人的角色。就整个国家政治生活而论,正如第六章所讨论的,领导人主要从本身需要政治技巧——主要是组织技巧和沟通技巧——的职业中招聘。当然,法律工作就是这样一种职业,其从业人员可以受到最好的政治技巧训练。不过,许多商业经理岗位也不相上下,因为成功的经理必须能说会道,能取得一致意见,能调和冲突等。任何职业凡涉及公共关系工作的人都必须学习这些技巧,因此,民众组织——工会、农民团体、专业协会等——的领导人也必须如此。在社会中,多种多样的“政治”领导角色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几乎每个群体都可找到受过政治训练的人,去表达和组织对该群体观点的支持。

普通工人几乎没有学习政治技巧的机会或必要。这样的工人被要求当众发表演说,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或组织一个团体的活动,即使有过此类事,也是很少见的。因此,工会干部垄断工会内部政治技巧可以认为是防止在劳工组织中有效组织反对情绪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能使在任的领导层利用其居高临下的沟通交流技巧来缓和或转移不满。

一党制工会组织可以为谋求当干部的会员提供学习组织技巧的机会,其方式是通过正式教育计划,或让他们参加没有收入的自愿工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有抱负的会员要接受领导层经济、政治和工会组织观点的灌输。工会内部的升迁要求有抱负者认同组织内起支配作用的准则和态度,亦即领导人所持的准则和态度。还有一种可能是,活跃分子,即未来的领导人,要善于跟着领导层大的方面或小的方面的观点转,

效忠领导层,使之成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更有利可图的生命活动方式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工会组织为受职业限制的有抱负工人,提供了社会其他部门所不能提供的机会。

除了教育或灌输以外,胸怀大志的领导人如果打算去什么地方的话,那就是进入领导层。倘若没有反对派存在,他的政治活动必须限于现任上级领导设定的界限内。工会高级干部往往感到缺乏有训练、有前途的下级干部,也感到缺乏训练这种人的手段,他们通常乐意,甚至急于把有能力的工会积极分子吸收进领导层。

然而,如果工会会员有其他组织外增长政治技巧的机会,那么工会干部仅凭自己拥有这种才干作为自然升任工会领导的主要优势就会被削弱,甚至消失。例如,演员必须学会能发表打动人心的讲演,因此,观察演员协会会员会议的人发现,这种演说才干并不成为升迁的有利条件,而是导致会员对讨论的高度参与,以及导致长期的内部派别政治活动。

不过大多数加入工会的工人并没有通过他们的工作获得这些能力。研究表明,除工会以外,他们不加入任何正式组织。然而,至少有两种组织有助于锻炼工人政治技巧,那就是教会和激进的政党。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工人所属的教会,其成员主要是工人阶级,其领袖或牧师由工人担任。正如前面所指出,英国工会和劳工政治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数以前当过卫理公会或其他非正统教会的干事或主日学校的教师。⁶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拥有大量来自南方的会员,其许多早期干部是南方一些派别中的活跃分子。今天,天主教会正寻求通过天主教工会联合会与天主教劳工学校训练天主教工人在口才、议事程序、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技巧。在天主教徒作为一个群体想与现任工会领导作斗争的场合,在教会中受过训练的天主教徒常常形成反对派的活跃核心。

另一方面,左翼政党如共产党和社会党也贡献了许多美国劳工领袖。参加这些党的工人,可以在组织技巧和沟通技巧上受到正规或非正规训练,有希望成为工会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本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守的,但不得不雇用许多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出任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组织者,因为只有这些党才具有支持劳工运动的才能和技巧。共产党人在劳工运动中之所以能得到非共产党人支持的原因在于,在许多工会中,共产党人虽然只占极少数,

但他们是唯一一些不在工会领导层面又懂得如何组织一个有效反对派的人。

工会领导人的社会地位

常常有人提到,工会干部在生活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两方面,与普通会员大相径庭。这种差别最明显见于工会的上层领导集团。在上层,工会干部与工人会员的收入差别相当大,而且大多数总工会干部的职位或多或少是永久的,这使他们的较高收入比许多工人通常指望的要更有保障、更加固定。较高和较有保障的收入,再加上作为工会领导干部有范围广泛不同的经历——如坐办公室,出差,与工商界、政府和其他工会领导人的交往,为他们明显不同于工厂中工人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和物质条件。在工会支部层次上,干部的收入与工人的工资差别一般不大,但干部仍有优越之处:收入有保障,在工会结构内升迁的机会较多,而且(决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工会工作使他脱离工厂,进入一种更舒适、更多样、更有收益的工作。

工会干部在工作之中和工作之外对其活动所体验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性质,禁锢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倾向和看法。这虽然加剧了他们与普通会员间的裂痕,但却可在领导集团内部起重要凝聚剂的作用。工会领导成员之间的共同之处远比他们与普通会员的共同之处多。这使他们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形成一种自觉,其表现在于:利用组织机构维护个人地位和集团权力。

如果把工会结构进一步视为整个社会分层系统的一部分,助长代表工会干部的寡头政治集团倾向和不民主行为的其他因素就变得清楚了。地位,即一些人给予另一些人的荣誉和尊重,其意义在于,在同一个参照系内,确定个人、团体或阶层相对于其他个人、团体或阶层的位置,除此之外,别无意义。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曾指出,一个人由他要求给予他一定地位的那些人给予他职位,对于他是极端重要的。在美国社会,个人地位与其职业有最密切关系,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也受亲属关系、权力、

居住时间一类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比考察工会工人会员与工会干部的地位,可以说明这两个群体的相对地位如何影响他们参与工会事务的程度和性质。

一般说来,工会支部和总工会的干部似乎并没有凭借他们与他们所在行业或产业的关系获得地位。要说他们的地位,只有考虑他们在其“工会干部”这种职业中所起的极其不同的作用。几乎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与工会相联系的地位在普通公众和一般工会会员眼中比几乎所有工人阶级职业的地位都要高得多。研究(由全国抽样人口排出的)不同职业的相对声望表明,“总工会干部”的排列位置大致相当于“企业主、经理和行政官员”。⁷通常,工人给予工会干部的地位也比给予自己工人伙伴的地位高,研究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欧文·豪(Irving Howe)和B. J. 威迪克(B. J. Widick)的下述评论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

工会干部的地位可能非常高;……他通常会因被认为很有知识、很有表达能力而受到工人们的高度尊重;他挣的钱比工人多,而且稳定;他不必遵守工厂的纪律,有比较灵活的时间;他享有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一种极大特权和社会权力标志的是:他可以穿“白领”服装,而不穿工人服装。⁸

这种受尊敬地位赖以得到的基础,如知识、才干、收入、就业控制、脑力工作而不是体力工作,每一项都使工会干部在生活方式、观点看法等方面有别于普通会员。综合起来看,他们都维护一种地位差别,而这种差别往往是为工会领导人垄断工会功能和重要活动进行辩护:只有他在工会等级结构中拥有垄断地位,才能使这些功能和重要活动成为可能。工会领导人不仅行使他的权力和凭借他的职位作出决定,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会员给予他的高位,足以使他的权威通过权力与地位加强这一众所周知的机制合法化。工会职务连带着权力,可以发展才干,可以维持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这种职务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职业。所有这一切,连同地位本身,都由普通会员赋予了较高地位——这是一种使地位拥有者的全部作用和活动合法化的地位。

在工会运动的民主价值与它的等级地位制度之间存在基本的扭曲。几乎没有重要例外,每个工会干部都可以通过他个人的成就在这种等级制度中得到升迁。这种职业是少数几种其高地位几乎完全由成就而不是

由继承保障的职业之一。大多数高地位职务一旦得到,必然连带有某种任期保障。然而,民主意味着对那些身居领导岗位的人永无保障——管理制度越是真正的民主,不安全感越大。职位变动是要求权力位置对系统中所有成员机会均等的民主价值的题中之意。因此,如果承认民主价值,那么每个在民主制度中身居高位的人都必须而且有必要事先想到失去地位。

指望身居这些职务的人平静地接受这种不安全感,是与心理学上所谓个人的需要不一致的。一旦获得高地位,通常有一种想保持和维护这个地位的紧迫要求。当地位与职务的差别很大时,特别是如此,因为一个人当其失去地位时往往被降职。换句话说,当工会领导作为干部与作为普通会员的社会差距很大时,他想保住前者的心理要求将相应较强。

确实,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公职人员都面临这种不安全感,但程度有很大差别。较大社会中的政治家大多可能来自韦伯敏锐地称之为“非必需”职业的领域,如法律界和新闻界。⁹说这些职业是非必需的,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从业者可以长期离职从政,而在他离职期间不会有任何才干的损失(在当律师的情况下,或许正相反),重操旧业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损失或太大的隔膜。实际上,以前出任过公职的人,不管是否是律师,通常都能利用他们在任时增长的才干和建立的信息关系。一个被击败的政治家离职后往往比在任时有更好的经济状况和身份。而且对于民主进程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可以继续扮演在野政治领导人的角色,为他的在野党所利用。

但是,工会领导人,如果他是被击败者,尽管这样的领导人为数较少,在他失去工会高级职务后,则不能找到既能使他保持高地位,又能继续参与工会政治系统的职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许多因为某种原因失去职务的领导人,没有回工厂去干本行,而是完全离开了职业,或者是在某个其他工会中得到任用。因为垮台的干部不能继续在工会中起作用,造成工会队伍缺乏有经验、有训练的干部,这使得要维持一个能在工会选举中提出另一套领导班子和另一套政策的积极反对派变得极其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当所有熟悉工会事务的人不是在领导层,就是在工会以外时,工会中就没有围绕其形成反对派的才干、思想和声望的核心。国际

汽车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前任主席、一个前任总司库、多个前任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前任高级干部，在离开这个工会后，不是到私人企业工作，就是到别的工会谋职。

垮台领导人离开工会的另一种选择是回到生产装配线或矿井。设想约翰·L.刘易斯被矿工大会罢免后去挖几十年煤是不可思议的。¹⁰回去干本行，即使是工会支部干部，除了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外，还常常会被垮台者自己和他的工人伙伴看作是羞辱和失败。

许多工会领导人狂热地从工会中排除民主（使他们垮台的可能条件），对于他们来说，是非为之不可的合适办法。领导地位的不安全感（在民主制度中普遍存在）、领导人想保住高地位的压力、他们对组织结构的控制，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不同于其他会员的才干，这一切都是造成独裁寡头统治的强有力因素。

工会领导人的地位与他在工会中竭力抵制民主是有直接联系的。把持工会干部任免机构，并不仅仅在于中下级工会干部可以在上层领导干部满意时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主要在于这些职务与干本行相比的吸引力和地位，给予工会干部巨大的在职利益，而且随着级别的不同，或者使他们实行独裁（如果他们拥有高级职务的话），或者使他们依附其上级（如果他们拥有中下级职务的话）。

如果我们考察工会职业结构给予工人等于或优于工会干部之地位的后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得到高而不安全地位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会不可能成为有强大凝聚力的组织，或者说，不可能要求和得到来自下级干部的完全忠诚和服从。干部与普通会员之间在待遇上（和生活方式）缺乏明显的和重大的差别，意味着在位干部感受不到排除民主程序、排除垮台可能性的强大压力。

美国演员协会和美国报业公会是两个其会员可以指望得到比干部更高收入和更高地位的工会。这两个工会没有稳固的寡头政治，因而很难招聘会员出任专职工会干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们设置了一些无收入的决策岗位，使会员既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又可以当工会干部。在演员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几乎没有连选连任的。在报业公会，许多干部来自自由工会组织的下层非新闻工作部门。最近，以前没当过记者的报业工会的专职第一把手，登记成为一份劳工报纸的编辑。这个例

子符合该工会的价值观:新闻工作的地位高于工会干部。国际印刷工人工会是另一个有不断反对领导、使领导层频繁更迭历史的工会。这个工会的会员是美国工人中收入最好的、地位最高的。正因为如此,该工会的干部下台后会重返印刷车间。访问这个工会的会员和干部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行业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把这一行视为一种有重要意义的高地位工作。¹¹

会员参与

虽然其他社会阶级成员也如此,但美国工人尤其没有非工业社会个人所经历的那种总体参与。在我们的社会,工作、闲暇、家庭关系、政治和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都被组织或封闭在社会结构内。我们社会视为最突出、最重要的两种角色是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所有其他角色,例如个人扮演某个民间团体成员的角色,都或多或少是次要的和边缘的。¹²在美国,民间组织虽然在大量增加,但居民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并没有加入这些组织,积极参与活动的人就更少。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些组织大多数基本上是一党制,有一个积极发挥控制作用的领导层和大批消极的会员。而且,与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相脱离,大多数组织服务于一些社会需要,即社会上认为不大重要的那些需要。这类政治的、联谊的、慈善的或其他性质的业余组织,当其全体成员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或控制缺乏兴趣时,即出现通常所说的“冷漠”情绪,在举行组织活动时使人感到凄凉。即使在对个人职业角色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工会和职业协会中,这种会员的冷漠也是常见的事情。

组织危机,其后果可直接影响组织的成员,如果这种危机也不能驱使成员积极参与组织活动,那是有多种原因的。一般来说,真实情况似乎是,不可能仅仅围绕争取组织权力的政治斗争问题把工会中的大批会员长时间地组织在一起。工会中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显然对个人关系太具腐蚀性,太违背会员最根本、最长久的利益,而且对于那些不参与有可能维护大众利益的工作的人来说,要得到最终报偿,简直毫无希望。当然,

派别斗争很少表现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但几乎总是集中围绕合同或其他工会问题展开的。有时,例如在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早期,那些为争取统一的报酬和保障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是够激动人心的,以致在几年时间里使人们对派别斗争保持了虽说是时断时续,然而却是广泛的兴趣。不过,随着外部条件趋于稳定,工作、家庭、娱乐和朋友这些带根本性的长久利益,迟早会把普通会员拖出争吵不休和耗费时间的派别斗争舞台,使他们回到正常的日常生活节律中。只有极少数人从参与工会事务和政治中得到相当多的利益,以致能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参与活动。

当然,不同类型的团体和组织,其成员的参与程度是有相当大差别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在民间组织中实行民主的可能条件,所以重要的是探讨造成这些差别的某些根源。

在任何组织中,参与似乎是与组织为其成员发挥多少功能和发挥什么功能有关,也与这些功能所需要的个人参与的程度有关。在大多数场合,工会为其会员只发挥一项主要功能,即集体谈判,这可由工会的一个多少能胜任其事的领导层处理,而无需全体会员的参与,除非在发生重大冲突期间。在这样的工会中,除少数参与领导的成员之外,不能期望更多的会员有连续不断的参与。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有许多重要例外。在某些职业和工会中,参与工会事务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如较高的地位、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有价值的社会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工会不仅有保护集体谈判和使其取得的功能,而且如第六章所讨论的,还是“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会员的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参与职业共同体事务不仅仅是着眼于工会的经济功能或内部政治,相反,恰恰是与普通工会会员身份无涉的多种动机和兴趣支持了这种参与。

导致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根源在于偏僻地区的特殊工作。在美国的一些小矿业城镇,工人们在各种社会角色中,在宗教活动、闲暇时间,以及在非正式组织和工会中,经常要相互接触。海员和码头装卸工也存在类似情况。工会会员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经常性交往,似乎有助于他们对工会事务的高度兴趣,而这种兴趣本身又可转变成对地方组织事务的高度参与,以及一种要求民主、要求全体成员发挥影响的更大潜势。诚然,这种类型的工会,大多数在全国性层次上是实行寡头政治和独裁的,

但地方会员的高度参与却可以成为这些工会中寡头政治集团得以实行好斗策略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类工会比起其他低地位、实行寡头政治的工会,普通会员更经常引起动乱,似乎也是个事实。

职业共同体也可以出现在大社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虽然没有有形的接触障碍,但有“不同的”工作时间表,如上夜班、上周末班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特殊工作时间切断了工人与邻居、朋友或亲属的正常社会接触,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工人伙伴一起度过。这种业余时间的消磨方式常常导致成立一些正式组织,如运动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宗教性团体或其他组织,其成员仅限于干同一职业的人。

以类似方式单独起作用的一个相关因素是从业人员参与其工作的程度。在某些领域,如新闻业或演员业,从业者把同事的判断视为职业威望的主要量度。当然,这些职业对于工会运动不是典型的,但它们可以说明当职业群体表现为一种地位参照群体时,在参与与参与功能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在大多数体力劳动职业中,工人们几乎无例外地相互领悟自己的职业角色。不过在有职业共同体存在的地方,工会在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会员之间建立了关系,这对工会政治有直接影响。职业共同体构成的群体,特别是如果它们独立于工会领导的控制,则足以使工会的争端一直存在。在为工会会员经常在工作时间外提供频繁接触的机会的同时,这些群体还为非正式讨论当前工会争端和候选人的相对功过提供机会;因此,它们起着不受在任工会领导控制的信息和意见之辅助来源的作用。而且,正是在职业共同体中,未来的反对派领导人能学到政治技巧,能找到他们向在任领导提出挑战所依赖的地位与权力的独立来源,同时,普通会员的影响力也可以得到增加。

一些“进步的”工会,试图利用它们的教育部门为其会员创办业余组织,以此促进会员的参与。然而人为强加职业外活动的尝试往往不成功。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汽车工人联合会,都在这些方面作过勇敢的努力,但成效甚少。这些产业部门的工人,似乎有其他业余活动方式,利用工会机构的方便并不影响他们的行为。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研究这类工会组织中的参与显示,她们大多数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去找正式业余组织的妇女。这些妇女通常是寡妇、离了婚的,或到了结婚年龄

而没结婚的，她们的朋友又大多数已经结了婚，还有一部分孩子已经长大的已婚妇女。

一些看起来与某种职业地位层次相关的因素，也影响工会的参与水平。一般说来，工人认同于某种职业及其工会的程度是与这种职业的地位相关的。职业的地位越高，工会参与的水平也越高。

参与政治和其他民间组织的研究显示，所论群体的地位越高，会员在这类事情中就可能越积极参与。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群体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越接近中产阶级，越可能显示高水平的工会参与。正如前面所指出，这也许部分得自如下事实：在高地位职业中，普通会员与工会领导层间较小的地位差距，减轻了后者对工会事务实行严密的寡头控制的紧迫感。不过，除此之外，在新闻、文艺、出版一类“中产阶级”职业中，工作人员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地位的追求，也明显导致他们更自由地利用工会，服务于更多的目的，而且比低地位职业的工人有更广泛的参与。在社会阶级与参与工会以外民间组织的关系方面，已作了某些研究。¹³类似的调查研究也可以在某些工会之间及其内部进行。¹⁴

时 限 因 素

前面几节讨论了工会结构的不同方面和会员素质（得自他们在更大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那些素质）对工会实行民主管理可能性的影响。还有一些因素也可以影响组织的民主程度。我们可以称这些因素为“时限因素”，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只出现在组织历史某一特定时期的条件相关的。

组织模式

创立组织有两种一般过程。一种是自上而下进行组织，这是指最先创立这一组织的团体把其他个人或小组纳入一个更大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正式的官僚结构从一开始就存在，新的下属干部从组织上层得到他们的权力。

全国性的大型组织也可以以联合会的形式出现。这种大型组织可以由一个个相继自行成立的组织发展而成,也可以由大致同时成立的许多不相干的组织后来联合起来构成。在这两种情况下,组织内都有现成的反对派。这种组织要建立“一党制”官僚等级统治,必须削弱原先独立的组织或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这样做往往遇到来自联合前各组织有自主权的领导人的强烈抵制。结果,领导层不能形成明确的等级,而是在那些实现真正联合之前曾处于比较独立的组织上层的人士当中,出现相当激烈的争夺领导地位的竞争。当前在新近联合的美国劳联—产联中所出现的斗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好例子。

不同工会的不同政治历史,都可以从其最初创立的不同方式中找到说明。举例来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最初是由菲利普·默里(Philip Murray)领导的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创建的。这个工会的各个地方分会的成立,几乎无一例外是晚于其初始权力结构的建立。从开始直到1950年首次出现领导权继承问题,这个工会内部一直不存在严重的派别争端,因为默里早已消除了任何地方干扰中心。相反,汽车工人联合会则不同,这个联合会与钢铁工人联合会在成立时间、规模和产业集中化程度上大致相同,但它是许多原先的汽车工会联合而成,而且后来成立的一些地方分会,有许多是自行组织的,没有得到全国组织多少帮助。这个工会后来发生的激烈的派别斗争,至少部分是因为它的各个全国性管理部门都想建立各自的一套官僚等级统治。这个工会的大多数派别领导人是工会初建时期的领导人,不同派别主要是不同领导人手下组织的联盟,目的都是联合起来抵制使他们从属于全国性组织。尽管汽车工人联合会一类大产业工会的结构条件,不利于在工会内部实行民主,不利于普通会员的大量参与,但它们为了达到一种一党制结构已用了多年,而且这个过程至今还没有结束。

继承问题

在任何组织中,如果没有更替领导人的民主制度,或者没有正式规定的晋升或选拔制度,继承问题常常会引起危机。在一党制结构中,领导人的死亡必然打破权力平衡。权力结构越靠对“领袖”的个人忠诚来维系,他的死亡或退休越可能导致组织内出现重大冲突。¹⁵

在一个由原先独立存在的组织合并而成的工会中，一位独裁工会领导人的去世，大多会造成或重复造成这种冲突局面。随着处在金字塔顶端的这个人的消失，每个紧居其下的领导人都会声称自己有某种继承权。这时，像在合并初期一样，工会可能面临在领导人平起平坐之外建立一个等级权力集团的问题。每个提出权力要求者都具有声望、从事工会政治的才干，以及控制一部分组织的资源。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最近的事态可以说明这种情况。1950年，菲利普·默里得了重病，预期不会活下去。在他长期住院时，该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几个干部开始准备争夺继承权。这个工会看上去坚如磐石的局面打破了。默里在康复期间听说了这场斗争，据报道，他曾设法重组内部权力结构，以防止发生继承冲突。显然，默里没能完成他的内部权力重组就死了。当工会总司库戴维·麦克唐纳在反对他的人没来得及成功地组织起来之前就任主席时，公开的冲突没有立即出现。但是，许多上层领导人不满麦克唐纳的继任，一些接近这个工会的观察者预言将发生公开冲突——现在，这个预言已得到证实。¹⁶

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继承问题与苏联1923—1924年围绕列宁生病和随之去世所发生的事情之间，有某种令人感兴趣的相似性。像默里一样，列宁病倒了，中央委员会几名成员立即开始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列宁意识到这一点，曾试图取消斯大林的候选人资格，但正如历史所记载的，他没能成功。列宁的去世，引起了激烈的内部斗争，至少有5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试图继承他的衣钵。

在工会运动中，也有一些铁腕领导人的去世并未导致继承危机的情况。例如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其主席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的去世就没有引起任何公开的内部分裂。然而，这个表面上没有继承危机的例外，并不是因为在希尔曼的副手中不存在冲突。这个工会内部有两大派：一派以海曼·布卢姆伯格(Hyman Blumberg)为首，另一派由弗兰克·罗森布拉姆(Frank Rosenblum)领导。这两人在美国不同地区都拥有极大的势力。布卢姆伯格的势力在东部，罗森布拉姆的势力在中西部和其他地区。是工会前总司库雅各布·波托夫斯基(Jacob Potofsky)出任主席，避免了争夺整个工会控制权的公开冲突，尽管波托夫斯基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支持力量。在这个有势力的副手没有继承主席职位的工会

中,重要的是,老领导人希尔曼受到人们的崇拜。工会一直在为他树立各种纪念碑,用他的名字赋予各种现实活动以正统性。这里,地区性集团的存在可以导致权力的固定分割,犹如在一些国家不时所出现的。这样一种权力分配在工会内包含了继承行动的种子。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一种特殊情况中的继承问题时曾指出,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他的追随者认为他有非凡的个人品质)的去世,可以使他的那些其权力没有任何传统基础或正统基础的幕僚和追随者,感受到继承结果蕴含着极大的不安全。¹⁷他认为,一种解决办法是结构的官僚化,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并没有清楚说明继承会促成更加官僚化的方式。最近有一些研究者扩展了韦伯的分析,他们指出,老领导人留下的幕僚对新领导人权威的抵制,可以使新领导人忠于合理化的规章制度,即更加官僚化。据此可以假设,当一个有魅力的工会领导人未经冲突被继承时,就像继承希尔曼那样,工会将变得更加官僚化。有证据表明,在服装工人联合会中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将减少而不是增加。不过至今还没有证实这个假设的明确证据。

似乎有一些工会,其中官僚化过程已使继承问题转变为沿公认阶梯晋升的问题。这时可以就组织结构的一些方面与领导权继承过程的关系,提出许多甚至根据现有证据也不能回答的问题。例如,继承危机将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至于可以使普通会员在选择新领导人时表达某种意见? 工会统治集团的领导人在什么条件下会感到不得不把斗争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 继承危机在什么时候可为新的独立派别争夺工会领导权敞开大门? 这种取得领导权的过程在什么条件下会变成统治集团内一种晋升过程?

继承危机实际上可为工会组织研究者提供检验本章许多假设的机会。决定不同继承方式的条件,应当是本章认为决定不同工会政治结构的那些条件。大量继承案例的研究不仅应使我们洞悉继承过程本身,而且可以成为检验假设的最好途径;这里所说的假设是指导致领导集团实行不同程度控制和寡头政治的那些因素的假设。

危机局面

像人类大多数组织一样,工会也偶尔经受变革或遇到威胁,从而干扰

现存结构的稳定。这类危机局面常常可以摧毁某些控制中心,为形成政治歧见开辟道路。在此要罗列所有可能破坏工会稳定的危机根源是不可能的,但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是:前已谈到的继承危机;经济循环中导致许多会员失业、工资下降、组织削弱的萧条期;罢工或资方为了对付罢工关闭工厂,特别是旷日持久的不成功的罢工;引进可减少对会员技术需要的新技术设备;通过不利于工会谈判地位的立法;与其他工会争夺势力范围。

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也许都要求工会领导层作出重大政策决定,改变传统的做法。其结果会使工会的某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在地位或权益上蒙受更大的损失,或许还会使整个工会在经济地位上蒙受损失。政策的重大改变还会瓦解普通会员或工会领导层中对某个领导人的支持。

稳定的内部关系和会员支持基础的瓦解,可以给下级领导人接管组织和用新办法解决危机带来希望。这种派别斗争是工会内部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最常见形式。危机时期会涌现出一些新权力中心。当从这些权力中心崛起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向在任领导集团提出挑战,或他们之间发生竞争时,这种最常见的斗争形式反映冲突的方式。新涌现的权力和地位中心,是与特定的危机形势相联系的,虽然是自发的、短暂的,但却是强大的,其基础不是组织机构,而是普通会员。如果想成为领导的人,不能通过使他的权力和地位与工会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权力和地位中心——现任领导集团本身——挂起钩,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在工会中的势力不能度过其赖以产生的危机而存在。

不过,危机对工会或其他组织的具体影响,不能单凭对某种平衡已被打破的认识来预测。危机可以导致组织上层领导发生重大分裂,也有可能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给领导人加强控制提供机会。而面对重大问题、急于想使事情“尽快了结”的会员,这时会给看上去有准备、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或集团以相当大的权力。作为危机时期强化工会、对抗雇主的手段,工会领导层常常一致保证严守决策或资金分配的秘密。而这些措施反过来又可成为强化现任领导内部权力的手段。

工会对组织危机作出不同反应的具体决定因素,只有通过分析组织结构和危机类型的差异,才能加以确定。这里,我虽然不能作这种分析,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外部因素都可改变根据内部分

析预期的行为模式。

领导人的品格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领导人本身的品格和价值观。虽然领导和统治工会的人的个人品质,不像有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工会活动和结构的主要因素,但是即使不赞成历史的“伟人”决定论,人们对领导人作一探讨仍可能会有所得益。探讨大体处于相同结构地位的不同工会领导人的行为发现,他们对个人忠诚和献身民主的价值方面,表现在行为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熟悉许多工会领导人个人品质的人认为,菲利普·默里、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等领导人,曾为消除他们工会中的官僚化和寡头政治的较明显的消极影响作过特别的努力。要明确指出这些领导人与其他领导人的区别是困难的,但最适宜的做法似乎是把那些受到某种“感召”从事工会领导工作的干部,与那些主要为了谋生和以从事工会领导工作作为实现个人目标之手段的干部加以区别。前一种干部能在工会事务中表现出献身精神。他在这方面的动机通常是来自某种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未必有特别突出的政治内容;他主要关注的可能是工会本身和工人的福利,而不是更长远的政治目标。对于这类干部来说,理想主义胜于地位的物质报酬,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他们的特点是有强烈的信念和责任感。

把工会职务视为个人晋升机会的领导人是另一个极端。这种人或者是没有其他晋升的路可走,或者有明确的目的,打算通过进入工会统治集团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水平。被一个工会运动观察家称之为“附属”领导人的那种人,可能属于这种“职业”领导人或官僚领导人之列。这种人往往相当圆通,风度翩翩,会上侃侃而谈,或者还推选他的同事在工厂担任某种小职务。工会领导层认为这种人是潜力的人才,并给予提拔任用。对于这种人来说,在工会统治集团下层接受训练好像是无利可图的,但他们发现这可以很快爬上高位。这种人是具有自觉动机的工会“野心家”。工会内的地位、职务和报酬,以及为了保持和增加这些既得利益,成了这种人的持续动机。

当然,像所有概念化一样,这里的领导人分类也是一种抽象概括,实

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虽然没有一个领导人完全符合任何一类,但不难设想,对于任何一个特定领导人,都可以在“献身型—野心家型”领导人的连续谱上找到其位置。¹⁸

于是提出了如下问题:这两种领导人分别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当出现这两种不同领导人时,对工会行为有什么影响?正像前面讨论的那些条件一样,这里的条件似乎也与时限因素有关。服膺感召的领导人通常有各种情况:或者从一开始曾出力组织工会,或者因为参加反对固守独裁的寡头政治集团的内部“革命”而掌权,还有可能是因为信仰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认为劳工运动是实现所想往社会目标的手段,而投身这个运动。从历史上看,成立新工会,或造顽固工会领导层的反,新领导人都曾面临很大困难。新工会的组织者常常有失去工作和被所在企业列入黑名单的风险,有时还会坐牢和受到体罚。开始时,金钱报酬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起初根本没有。新领导人虽然可以由他的工人伙伴给予地位,但当他组织新组织时,却会在个人品质上受到攻击,还会受到企业和大组织中有地位者的怨恨。乐于冒这些风险的人必然有更多的追求,决不只是为了得到高薪或白领地位。在组织初建时,大多对将来的利益没有什么把握,即使组织上获得成功也不例外。参加造顽固寡头统治的反,往往也像创建组织一样,有同样的可能性。

因此,新工会或工会内部政治团体的领导人,往往是有献身精神的人。没有这样的人,革命运动(工会组织类似于革命活动)不可能发动。只有强烈的信仰才能挣脱加于这种有组织活动的限制。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美国许多工会——即使不是大多数工会——的创建中起了超比例的作用。如前所述,约翰·L.刘易斯,当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初创时,不得不雇用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担任组织者,因为只有这些共产党人才既有必要的才干,又乐于拿低薪、冒风险。在老的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中,有2/3的大工会,如汽车工人联合会和电气工人联合会,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或左翼民主人士组织的;大多数小工会也是如此。一个主要例外是钢铁工人联合会,它是由来自矿工工会的职业组织者组织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刘易斯也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美国矿业工人联合会中曾经是与他对立的反对派。反对约瑟夫·瑞安对码头工人工会的控制,最终导致独立的西海岸工会的成立;这件事主要

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西德尼·希尔曼、戴维·杜宾斯基、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等许多工会领导人,在他们从他们的工会得到支持时,都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某种关系。

许多工会领导人在初当领导时可能有强烈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已由于职务的压力受到很大的损害。那些曾经矢忠工会的领导人,后来的行动似乎证明他们不再按他们原来的价值目标行事,但这可能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就领导人本人来说,信仰和使命也许依然存在。不是领导人个人的弱点,或者他们有意识地抛弃与之有关联的过去的信仰,而是他们行事所在之结构的约束,使他们的行动看起来只是为了保住职务,或者可能不民主,与客观上描述为工会目标的行动相违背。正如米歇尔所指出,在许多时候,尽管领导人起初有信仰或使命感,但有压力——某些是我们一直试图考察的——导致他们把个人地位的稳固与实现工会目标的最好手段等同起来。

“职业”工会领导人更可能见于有长期历史的工会中。进入稳定的工会官僚统治集团,有许多好处,而较少不利。在这种工会中求职,有思想信仰的人很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而不是有利地位。他们对乌托邦或意识形态上所规定目标的执著,将使它们与工会——甚至是由仍然认为他们坚持那些价值观的人领导的工会——与日俱变的实际政策发生冲突。有使命感的人很可能被官僚集团的头头视为不负责任,后者更喜欢选用在他们规定的组织目标框架内工作的人。韦伯对迷信领导人能力导致官僚化的论述,就是指有使命感的人被“官僚政客”所取代而在工会运动中所造成的局面。

从有“使命感”到“做官当老爷”的转变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间关系。在所有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时,可以预期,工会越老,它的领导人越可能走官僚化道路掌权。不过,这个过程可以因发生在任领导被推翻的危机而逆转或延缓。如果工会领导人在组织上保持与共产党或社会党一类外部组织的交往,从外部组织招聘继任者,也会影响这个过程。然而,就美国劳工运动而论,一直与这种组织来往意味着不断产生紧张因素。这些外部组织和政党的政策与根据工会情况所制定的政策,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当政党要求工会领导人执行可能破坏工会内部的平衡或稳定,或者危及他们再次当选的政策时,他们不得不与政党分手。共产党或多或少

还可能阻止这种情况在某些工会中发生,因为共产党在这些工会中,支持忠于党而不是忠于个别工会领导人的派别。

影响原来“有信仰的”领导人与“官僚式”领导人行为差别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们所看重其态度的“另一些重要分子”的组织可能有所不同。¹⁹虽然当了工会领导的人地位改变了,抛弃了许多老朋友、老同事,但几乎没有人能完全忘记过去。把工会运动作为一种事业而投身其中的人,要比爬上官僚统治集团的人,更可能把其他相信这种事业的人的判断作为衡量他们自己成就的参考框架。因此,现在成了工会领导人的许多前社会党人,一直试图为他们的许多行动符合社会党目标或左翼民主目标进行解释和辩护,这种态度影响他们的行为;对此,不能仅仅依据他们工会的现实情况来理解。

一些实行官僚寡头统治的大工会表面上看没什么不同,其实它们的差别在于:有些工会是由始终视他们的地位为一种使命的人领导,而另一些工会是由野心家领导。前一种工会可能在行动上较不民主,但往往更接近普通会员,策略上更富进取性,更重视工会服务于会员的道德准则,也有更多的个人忠诚。社会党或其他激进政党的历史,显然比共产党的历史,更可能与这样的行为相联系。另外,相信民主价值的、有“使命感”的领导人也比“官僚式”领导人,更可能重视民主的形式。

再者,要对影响领导取向的“使命感”与有助于在工会内部实行显著民主的条件这两者存在什么关系作出论断也是困难的。不同的“使命感”有可能使投身劳工运动的人支持显著不同的行为。例如,一个前共产党人,在他脱离共产党后,可以继续操纵一部有效的独裁机器。虽然与走“官僚”路线的领导人相比,他的行为更有战斗性、更执著,但他在利用组织机构维护权力时,会表现得无情得多。同样,“民主的”劳工领导人也会用“使命”无情地维护权力。通常与政治使命或宗教使命相关的正义感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常常导致在观察者看来与行为者服膺的价值和目标大相径庭的行动。“知道”自己在为“正义”事业服务的、“有信仰的”领导人,把反对者视为敌人的有意或无意的代理人,无论这个敌人是指雇主、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指共产党。

另一方面,“有信仰的”领导人,尽管常常无情地对待反对派,但似乎有来自他们信仰的要求,要他们相信会员认可他们的行动,而且他们还试

图使尽可能多的人认同他们的做法。有“使命感”领导人领导的工会比“野心家”领导的工会,更可能重视对普通会员的教育。建立工会机构的较典型基础是互利和责任,除此之外,还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不过以这两个基础建立工会的努力常常威胁官僚集团的稳定。要求制定新政策的新形势,可以使坚持各自意识形态的人产生严重分歧。在左翼政治组织中,派别的歧见和冲突相当普遍,这似乎反映这类组织比保守的组织要求从其领导人和成员那里得到更多的为正义事业服务的意识。在美国,左翼分子掌权的工会比奉行冈珀斯的无党派政策的工会,更常见内部分歧。

价值体系

迄今为止,这方面的分析大都忽视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参加工会的不同层次工人的价值体系以及不同工会的明确目标,对工会组织的影响。

可以预期(如果结构因素和时限因素保持不变),工会会员,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都将在体现不同社会结构的不同价值体系内显示不同的行为。在美国社会结构内运作的美国工会,其行为不同于德国工会。前者强调个人成就、人人平等的权利和民主的准则;后者是在一种较为严格的等级制环境中运作,更重视荣誉而不是成就,更看重领导作用,关注群体权利胜于关注个人权利,或许也不太重视民主控制的准则。同样,两个美国工会的行为也会随其组成成员的不同而不同,因为组成成员的不同体现了对权威和民主这两个关键性准则估量和区分的不同。

一个组织越坚持民主的、反精英人物统治的价值体系,要使寡头政治集团制度化就越困难。基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德国工会领导人可能比美国工会领导人更容易维持一种寡头政治集团结构。德国工人可能更容易接受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缺乏对政策的讨论,没有反对派存在。而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美国工人大概更可能会抵制等级集团的控制。假设这两个国家的工会领导人都想要确保自己的职务,美国劳工领导人

想使独裁机器制度化,以防止他们被推翻的可能性,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换句话说,因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价值观使美国工会干部比德国工会干部更易受到攻击,所以为了稳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行为必须更积极,更果断,更专横。

在美国劳工运动本身中,多少存在一些相似的因素。有些美国工会有鼓励普通会员参与和控制的总体价值;另一些工会则几乎不拥有这样的价值。人们常常看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多少是随社会地位高低而定的;同样,在工会活动中也可以看到,工人地位越高,越可能要求有决策权。这样的价值观与热衷于政治参与的高地位工人人数较多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假设在经验上是正确的话,将会给工会实行民主增添新的可能性。对这种情况有两种组织上的反应。一种是见于国际印刷工人工会、演员公会和其他类似工会的制度化民主模式;另一种是由地位脆弱的领导人比较严格地操纵独裁机器。显示这两种倾向的一个工会是音乐家联合会:它的一些地方组织像演员公会一样民主,而另一些地方组织和总部却实行独裁的寡头政治。

另一种能促使寡头政治与美国民主价值相协调的适应机制是一种强调工会特殊功能的思想。一个组织越能狭隘地把其功能定义为满足有限的特定需要,它的成员越不可能感到参与和影响其政策的必要性。每个人都可以属于许多组织,如美国汽车联合会、地方消费者合作社、医疗计划、滚木球团体、全国集邮俱乐部等,而并不感到有任何责任积极参与组织的内部活动,也不感到因为决策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而受到压制。很大程度上,每个人对他所属的各个民间组织的判断都是根据它们满足有限需要的能力。相反,组织或团体的功能越松散,它的成员越可能找到与之意见相左的理由,越渴望积极参与它的运作。

单纯起“事务工会”作用的工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单功能组织。除了一般有最大量的工人参加的行业组织之外,这种“事务工会”唯一一项主要任务是集体谈判,而这种谈判每年不多于一次,许多工会甚至每隔两三年才有一次。在这种工会中,日常事务的管理无需涉及普通会员,犹如参加一项医疗计划的日常锻炼。当然,工会对待个人要看他的职业角色是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比其他民间组织更能唤起个人兴趣和重视的组织是关心非重要角色的组织。不过这个概括在可比较的基

基础上仍然成立。国际印刷工人工会和演员公会一类组织,不仅发挥了与其成员地位和空间时间有关的许多功能,也有很高比例的成员参与和介入。

因此,工会寻求限制其功能的最合适的意识形态是工联主义*,美国工会中最普遍的意识形态。信奉工联主义的工会领导人不仅说,工会不应关心除集体谈判、工人保障、会员福利这些传统活动以外的事情,还宣称他们不希望有来自工会外各种利益的价值影响他们。

作为一套为工会作用——社会作用和为会员服务的作用——所下最狭窄定义作辩护的思想,“工联主义”不鼓励会员的广泛参与,而维护寡头统治的合法性。然而,工联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寡头统治作为一种权力结构,这两者的结合决不能充分说明工联主义为什么被广泛接受。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不管承认这种意识形态可能还与什么因素有关,其结果之一都是缓和寡头政治集团在拥有民主价值的组织中长期存在所造成的紧张。

关于松散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只涉及特定方面的“事务工会”意识形态与工会中是否存在内部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人尝试作过定性或定量的分析。不过可以提出这样一个一般性命题:工会的意识形态越是松散,内部派别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欧洲工会比美国工会政治气氛强得多,产生内部分歧也容易得多。不过,研究欧洲工会运动的美国观察家注意到,欧洲存在沿工联主义方向发展的长期趋势。这个事实已被用来证明如下假设:工会的正常功能是工联主义的,而且,劳工组织一旦成立,往往抛弃不必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威斯康星州劳工经济学家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在其《劳工运动理论》中为这个论点最出色地提供了实例。

这样的分析是把工会当作集合体,而没有对官僚集团和普通会员的需要加以区别,因此往往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限制工会功能和目标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寻求稳定的工会领导层的适应机制在起作用,而不是(如珀尔曼所指出的)工人社会境遇的结果。例如,要让人们支持社会党或一

* 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不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译者注

般的社会党目标,必须承认不同政见有辩论的自由。过去英国许多工会会议就曾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讨论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工党领导层与工会代表大会的分裂上。

说限制工会功能有助于官僚集团稳定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或任何工会的会员,都有支持工会应有广泛目标的倾向。事实上,正如前面分析所表明的,大多数人态度冷漠,可能比工会干部更保守。然而,这个事实并不排斥如下概括:用以削弱内部分歧可能性的任何因素,如工联主义意识形态,也有助于降低普通会员对组织政策所可能发挥的潜在影响。

结 论

本章提出的分析显然暗示,对工会实行民主的长远可能性有某些悲观的结论。下面扼要重述一下主要论点。

(1) 大型组织的结构有产生官僚行为模式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官僚统治制度化的条件与有助于职位民主更替的条件基本上是不相容的。不相容的程度是随官僚化程度而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官僚化是由于要求与工会环境中其他官僚化机构和制度实现稳定相处而增置的。

(2) 大型组织的结构赋予在任领导层高于普通会员、甚或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极大权力和优势。这种权力和优势以这样一些形式出现:控制财政来源和内部沟通,把持庞大的常设政治机构,声称拥有正统性,垄断政治技艺。

(3) 寡头集团控制大组织的难易是随着组织成员的参与程度不同而变化的。组织成员被看得越重要,他们参与得越多,寡头政治集团实施与成员价值或要求相冲突的政策和行动的困难越大。“工联主义”主张工会只执行一种使会员尽可能有契约保障的功能,这种观念有助于防止工会内部政治活动和冲突,而只鼓励会员的有限参与。认为工会功能若是鼓励会员参与的任何思想,将会增加民主冲突的潜势。

(4) 工会作为一种等级机构的内涵表明,民主在工会中具有固有的不稳定性。

a. 担当领导角色的功能条件是赋予这个角色高于追随者角色的地位,亦即一种更高的成就感。

b. 成就感追求的主要价值在于,晋升是一种文化目标。

c. 民主政治结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领导层有轮换的可能性。这表明,只要存在一种能使领导人退离的机制,就可避免寡头统治。

d. 在一般社会中,政治领导人离职后可以就任同等的或高于原地位的职务。而在工会运动中,失败的领导人将从高位职务降至低位职务,如果他继续留在工会中的话。

e. 从高位降至低位的制度化,在领导人看来,或许意味着工会中的民主,但这将是对成就感所追求之主要价值的一大背离。

f. 贯彻这些相互矛盾的准则将导致领导人无所适从,心理上陷入无法忍受的状态。

本章分析得出的明显结论是,民主要求的基本条件,大多数工会在大多数时间不能满足。例如,民主准则与成就准则的冲突表明,只有在领导人与追随者的地位差别极小时,民主才能在工会中作为一种稳定制度存在。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高地位者的工会和地方工会中大多有民主。这里的分析不认为权力在各种情况下都有腐蚀作用,而认为这种“腐蚀作用”是特定社会结构的后果,因为奉行一种准则必然违背另一种准则。

然而,下述普遍看法仍然成立:像其他许多内部实行寡头统治的组织一样,工会也有助于在国家中维护政治民主。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兹·纽曼(Franz Neumann)所阐明的,许多内部独裁的组织,通过制止其他群体的侵犯,起着保护其成员利益的作用。²⁰甚至最独裁的工会,只要它不是国家或雇主的工具,也比没有工会更能在较大的社会中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民主。现在许多国家正在兴建的集体主义社会,要成为民主的,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工会——尽管它们是社会党目标的支持者——保持独立于国家的可能性。英联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会的行为,为这种模式有可能存在提供了真实的证据。

还必须记住,即使最独裁的工会领导人也一定对其会员的经济利益多少有所关心。工会寡头集团若不保护普通会员的经济利益,会员就会纷纷离去,就像约翰·L.刘易斯在20世纪20年代所目睹的那样。刘易

斯这个工会领导人兼政治保守主义者，当时差不多失去了矿工联合会。只是在他采取了现在使他因此而著名的好斗策略以后，他才能重建这个工会。工会不是一个经济保障组织等于没有作用，将不能长期留在舞台上。不过一定不要把大多数工会代表会员利益的事实与内部民主问题混为一谈，因为正如豪(Howe)和威迪克(Widick)所指出：

工会(或任何其他机构)实行民主的一个决定性标志是：持不同意见者有权自由结“党”，建立派别机构，向报界发布消息，在会员中进行宣传……反对派的存在……是确保工会民主结构得以存在的最好途径……。为了捍卫派别存在的权利，决不能厚这一派，薄那一派。不过，这样，民主要付出代价(完全值得的代价!)：被认为有害于工会利益的组织将成立。不然，就是独裁。²¹

最后应注意，民间机构内制度化的民主并不是一般社会实行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事实上还会弱化文明社会的民主过程。被托克维尔视为民主国家必要条件的各种独立于国家而听命于一党制寡头统治的大型组织，在他的时代和我们时代都存在。尽管如此，这些组织仍可通过训练新领导人、组织和沟通意见、对外——其他组织和国家——代表其成员，促进政治教育和反对派的成长。许多这样的组织有训练有素的领导人，他们即使不是专职干部，也比受教育较少、觉悟较低的普通会员更了解组织的问题和为组织成员服务的方式。

受普通成员直接控制的组织可能成为不负责任的组织，要么缺乏自身利益的观点，要么没有社会利益的观点。成员只想他们“个人的”目标，甚至为此将损害他人或危及整个组织也在所不计。雇主很清楚，工会越民主，亦即内部反对在任领导的意见越多，派别越多，职务更替越频繁，工会就越不负责任。美国人对公民自由权态度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即使是《美国独立战争女儿》或《美国军团》* 这样的组织的领导人，对共产党和其他不得人心的政治异端组织的公民自由权，也可能会比其组织的普通成员要相信得多。²²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最可能关系到成员参与、因而也关系到本书第十二章讨论的工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之内部民主的那些条件，正是有可能

* 美国的退伍军人组织。——译者注

弱化一般社会内民主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些条件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组织成员与组织的多方面的关系、他们大部分生活在组织影响范围内、成员之间互相影响,这些因素增加了高度关注和参与的机会。然而,同样的因素也使组织成员脱离交叉压力,接触不到多样的价值和影响,以致像我们在矿业或码头搬运业一类“孤独”企业中所看到的那样,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信念。这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把成员统一在一个工会、一个政党、一个农业组织、一个专业社团内,固然可以使这些组织的成员在组织中更加积极,对组织政策有更多的控制。但是,把组织功能扩大,用以统一其成员,却会对更大政治系统构成威胁,因为这削弱了在冲突组织间达成妥协和理解的力量。有些工会有高度的成员参与,其忠诚主要来自“职业”共同体的存在,矿工或印刷工人的工会就是这样。还有一些工会,其会员与社会接触较多,因而对工会的忠诚相对较少。这两类工会相比较,前一类工会较不关心社会其他部分的价值。

显然应当声明,我不拥护在民间组织中实行独裁。但是必须认识到,许多组织可能从不具备内部实行稳定民主的条件,可是却以重要方式投身于全社会的民主过程;它们为派别活动和实际利益集团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同时却限制了组织内的个人自由,而又允许领导人和组织有削弱其他社会价值的某种程度的行动自主权。这是价值不相容性——亦即价值有矛盾结果——的另一个例子。可见,关于现代社会的这些民主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方法论附录

劳工运动的研究者将有可能对本章提出的每个命题指出重大例外。显然,在特定组织或个人的情况下,要抽象出任何一个变量,使之成为某种特定行为模式的唯一甚或主要决定因素是不可能的。如何处理特定行为模式的多边决定因素,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当研究个人时,分析家可以部分避开这个困难:通过收集大量案例的资料,以致能利用定量

技术把特定因素的影响孤立出来。但是要分析组织这样做却行不通，因为类似资料很难收集到，充其量只能收集到少数几个案例的资料。而且，即使集中力量研究一个大组织的花费，也会像对个人作一次大型抽样调查一样多。

大多数分析家寻找某一特定行为模式——如某一工会中的寡头统治或普通会员的好斗性——之决定因素所遵循的程序，是列举组织中可能与所论行为有关的那些因素。如果反映特定行为模式之重要变量的事件在观察中是一次性的，那么这种程序本质上是事后的。这种分析很少有机会确定任何控制因素或对比因素。分析家常常试图通过从其他似乎可证实假设的事件中提取说明性材料避开这个两难问题。然而，这种说明性材料并没有解决证实的方法论问题，通常只会给读者一种解释一般正确的假象。

因此，组织行为的研究者向自己提出证实假设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分析家可以花大量时间考察单个工会或其他大型组织的许多研究报告，但不能证实关于组织行为的简单命题。因为研究者很少按照任何一套明确假设来聚焦他们的观察，所以这种个案研究中所收集的资料并无助于检验假设的再分析。

这个领域要取得较大进展或许可以初步试验性地提出3种方法：从许多组织收集定量资料、作临床个案研究、作异常个案分析。下述例子可以说明第一种方法，即使所论问题定量化。想要检验这样一个命题：工会干部与工会会员地位差越大，这种组织越可能具有专制政治结构，可以从许多全国工会和地方工会收集资料。这种研究或许有困难，但可以通过设计一些大致的地位指标，使观察者能对不同组织之成员与干部的地位高低作出某种量度来进行。同样，对于产品市场与工会结构关系的假设，也可以这样来检验。

可以使用的另一种方法类似于生物科学中采用的临床程序；这里，预测是根据理论分析作出的。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者有可能对组织在未来非出现变化不可的关键形势下的行为作出预测。这种研究的一种最佳情况是继承危机。因为继承危机是一种重复性事件，所以尤其有利于研究。不夸张地说，在劳工运动中，当领导人去世或退休时，有成千上万的继承案例出现。研究继承结果的差异，有可能对会激化或压抑组织内部冲突

的许多因素的假设加以检验。

解决这个方法论难题的第三种可能办法是特例分析——在劳工运动中,特别是指那些或者有高水平的民主程序,或者有广泛的成员参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组织。倘若知道一种特定行为模式,如寡头统治,是几乎所有大工会所共有的,那么重复研究这种受寡头政治集团控制的组织,就不大可能会对影响内部政治结构的可能变素有什么新认识。²³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曾指出:“特例分析可能而且应当在经验性研究中起积极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给违背经验规则的例外以某种似乎有理的说明,因而予以排除的‘梳理’过程。”特例的存在(例如国际印刷工人工会中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总是意味着理论结构——在国际印刷工人工会的例子是指纳入米歇尔“寡头政治集团法则”的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因而“有必要把进一步的变量纳入……预测框架”。²⁴

注 释

1. 引自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Biennial Convention, I. L. W. U., April 7—11, 1947* (San Francisco, 1947), p. 178。

布里奇斯(Bridges)的坦率言论可与约翰·L. 刘易斯(John L. Lewis)较早的一项发言媲美,后者在1933年劳联—产联大会上回答了当时在任卡车司机联盟主席的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指责他是独裁者时说:“美国联合矿工工会不会为他们章程的条款道歉……我们赋予托宾以权利,由他解释他在卡车司机联盟实行的章程,由他以所想使用的方式管理他的组织,而我们理解他对组织的管理。坦率地说,我们也在这样做。”引自 Eric Hass, *John L. Lewis Exposed* (New York Labor News Company, 1937), p. 50。

菲利普·塔夫特(Philip Taft)在一项关于工会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指出:“工会选举中出现反对与其说是规则,不如说是例外。”“Opposition to Union Officials in Ele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8(1944), p. 247。

2.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根据美国劳工运动对米歇尔斯分析进行总结和例证的两本书是 Sylvia Kopald, *Rebellion in Labor Unions*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4), 以及 James Burnham, *The Machiavellians* (New York: John Day, 1943)。关于工会机构一般问题的出色讨论,见 A. J. Muste, “Factional Fights in Trade Unions,” in J. B. S. Hardman, ed., *American Labor Dynam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8), pp. 332—348。

3. 见 Joseph Shister, “The Locus of Union Control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0(1946), pp. 513—545。

4. 见 Clinton S. Golden and Harold J. Ruttenberg,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2), pp. 60—61。最近,在一个大产业部门,资方管理人员向工会领导人报怨工会发起反垄断、反高利润宣传。这些产业负责人指出,工会不断批评资方缺乏良好的信用、缺乏合理的功能,这激起了工会会员对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煽动而响应的情绪,鼓励他们拒绝与资方的生产目标合作。本身同情社会主义目标的工会官员被迫同意,长期契约与不断刺激的与大规模资本主义相对抗的情绪是不相容的。

5. 见 R. K. Merton and P. F. Lazarsfeld, “Mass Communications,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 Action,” in Lyma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8), pp. 95—118。

6. “这些[卫理公会]协会为大批从业人员在自我表现、任职和管理公共事务方面所提供的训练,以及其作为参加工业联合和未来工会工作的一种准备,其价值是弥足珍贵的,非正统教派和卫理公会协会是后来的自治劳工组织的先驱形式,也是培养民众追求在城市和国家管理中地位和权力的土壤。”A. D. Beldon, *George Whitefield, the Awakener* (London: S. Low, Marston and Co., Ltd., 1930), pp. 247 ff.

7. Cecil C. North and Paul K. Hatt, “Jobs and Occupations: A Popular Evaluation,” in Logan Wilson and William A. Kolb, eds.,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9), pp. 464—473。

8. Irving Howe and B. J. Widick, *The U. A. W. and Walter Reuth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9), p. 257。

9.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 Wright Mills and Hans Ger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85。

10. 见 Bernard Barber, “Participation and Mass Apathy in Associations,” in A. W. Gouldner, ed., *Studies in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0), pp. 493—494, 以及 A. J. Muste, *op. cit.*, p. 341。

11. 关于与美国印刷工人工会高度民主有关因素的分析,见 S. M. Lipset, M. Trow, and J. S. Coleman, *Union Demo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6)。

12. 见 Bernard Barber, *op. cit.*, pp. 477—504。

13. 见 Herbert Goldhamer, “Some Factors Affecting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3); Mirra Komarovsky,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Urban Dwell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9 (1946), pp. 686—698; Bernard Barber, “Mass Apathy and Voluntary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h. 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49)。另见 pp. 52—53, 101—102, 200—207。

14. A. W. Gouldner, “The Attitudes of ‘Progressive’ Trade Union Lea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1947), p. 389。Ely Chinoy, “Local Union

Leadership,” in A. W. Gouldner, *Studies in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0). Herbert A. Shepard, “Democratic Control in a Labor Un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4(1949), pp. 311—316.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有某些职业,工人纯收入增加,实际上可能对他们参与工会事务有相反效应。如果职业使工人有接近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收入,而职业本身仍然是低地位的,那么他们会设法离开这种职业。例如,对旧金山码头工人工会会员的一项研究表明,许多加入了工会的码头工人,在他们工资有很大增加后,离开了滨水区的工作。只有在职业连同着高地位时,才能期望找到更多的参与。上述研究是约瑟夫·艾梅斯(Joseph Aymes)未发表的成果,艾梅斯以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生。

15. 见 A. W. Gouldner, *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4), 其中对一个工厂连续危机的后果,作了出色的经验式的研究。

16. 见 Daniel Bell, “The Next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Fortune*, April 1953, pp. 120—123, 201—206; 以及“Labor’s New Men of Power,” *Fortune*, June 1953, pp. 148—152, 155—162, 其中分析了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工会的一系列问题。

17.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363—373.

18. “承诺”在所有工会领导人的动机中都起了作用。为了有效地发挥他们作为工人领导者的作用,他们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在为工人的利益服务。见 Ely Shinoy *op. cit.*。

19. 关于工会行为与工会会员以及领导人群体之间关系的更充分讨论,见 S. M. Lipset and Martin Trow, “Reference Groups Analysis and Trade Union Wage Policy,” in Mirra Komarovsky, ed., *Common Fronti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 391—411.

20. Franz L. Neuman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5(1950), pp. 161—180.

21. Irving Howe and B. J. Widick, *op. cit.* m pp. 262—263.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新研究和详细目录,见《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专门讨论“工会民主与官僚统治”的专刊(“Democracy and Bureaucracy in Labor Union,” 61, May 1956)。

22. Samuel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5), pp. 26—46.

23. 见 Joseph Goldstein, *The Governments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2), 其中对英国工会中的寡头控制作了出色描述,不过这项研究只是给米歇尔斯经典分析增添了一些事实而已。

24. 见 Patricia Kendall and Katherine M. Wolf, “The Analysis of Deviant

■ 政治人

Cases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Paul F. Lazarsfeld and Frank Stanton, ed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1948—1949*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9), pp. 153—154。其中谈到把全国印刷行业工会作为特例来研究,是研究工会民主的中心。

第五篇

.....

结 束 语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终结了吗？¹

本书的基本前提是，民主政治不是不同群体达到它们目标或寻求建立完美社会的唯一手段，甚至也不是主要手段；民主政治是运作着的完美社会本身。只有自由社会内部斗争的相互让步，才能为社会产品不至于集中在少数掌权者手中，以及为人们可以在不担心受迫害的情况下发展和培养他们的子女提供某种保障。同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民主政治需要有支持冲突和歧见的组织机构，也需要有维护合法性和共识的组织机构。然而近年西方世界由于代表不同价值的群体之间，严重的思想冲突日趋尖锐，民主政治正在经历某些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的结果也许可以通过介绍 1955 年 9 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关于“自由的未来”的世界知识分子代表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给予最好的说明。出席这次会议²有来自许多民主国家的 150 名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包括不同意见的人，从社会主义者到右翼保守主义者。例如，在英国的代表中，有社会主义者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和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也有保守主义者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和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当时任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副主席的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民主行动美国人组织的成员阿瑟·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主要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来自美国。法国代表包括左翼社会主义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一度积极参加戴高乐运动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保守主义哲学家贝特朗·德·儒弗纳尔(Bertrand de Jouvenal)。类似的政治观点分歧也明显见诸来自斯堪的纳

维亚、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中。

有人或许认为，一次有如此之多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重要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领导人出席的会议，一定会发生激烈的政治辩论。事实上，没有这类事情发生。唯一一次引起激烈争论的事情，是发生在某人因为说了几句可能被认为过分偏袒苏联的话而被说成是“共产党代言人”时。

在这次为时一周会议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起有趣的事件。哈耶克教授在闭幕发言中攻击与会代表准备埋葬自由，而不是拯救自由。唯独他一个人会议的总倾向所困扰。令他困扰的是，不论政治信仰，与会代表普遍同意，划分左、右的传统争论问题已退居比较不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大家一致认为，发生在不同国家中的国家控制的加强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减少。社会主义者不再拥护社会主义；他们像保守主义者一样担心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政府的危险。划分左、右的意识形态问题已转变为主张多一些或少一些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问题。似乎没有一个人认为，在各个国家由哪一个政党控制国内政策，真的有很大差别。哈耶克坦率地认为国家干预不好，它生来就是极权主义的，结果发现自己是极少数，代表仍然严重看待民主阵营内部分歧的那些人。

英国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理查德·克罗斯曼说，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现在已自觉地把社会主义视为“乌托邦神话……常常脱离日常的政治现实”³。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党还想把更多的企业国有化。这个目标基本上已为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联邦德国等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社会党所放弃。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工党领袖在该党1950年大会上为坚持社会化作为一个目标进行辩护时，显然已经承认这个目标的意义基本上是形式上的，当时他说：

我要指出，以任何方式改变我们的纲领和目标都有严重后果。首先，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开始制订新纲领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围着墙角躲躲闪闪，自称我们不想使工业社会化。工业社会化是劳工运动的一个长期目标，正像基督教运动也有一个长期目标一样。信奉基督教的人已经斗争了两千多年，还没有达到其目标。⁴

坚持长期目标，甚至是那些两千多年也可能实现不了的目标，理查

德·克罗斯曼对这种观点作了很好的表述：

要说服一个民主政党放弃其主要原则之一可能是罕有的，而且这个党也从来不会尝试抛弃它的主要神话。保守主义者一定要为自由企业辩护，即使在他们实际正在采用国家计划之时。工党政府必须把与社会主义绝少相关的政策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为之辩护。党的领导人的工作，常常是说服其追随者相信，传统的政策仍在执行，哪怕是在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的时候。⁵

西方民主社会左、右两派的分歧不再有深远意义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党派争论的余地。不过正如瑞典一家重要报纸的一个编辑一次对我说的：“政治现在是令人厌烦的。问题只在于金属工人每小时是否能得到更多的工资，牛奶的价格是否应上涨，还有老年退休金是否会扩大发放范围。”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是稳定民主社会内部斗争的真正关键，但却几乎不能唤起知识分子，或刺激在政治中寻找表达其梦想的青年人。

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这种变化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带来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工人已在产业和政治上实现公民身份；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福利国家的思想；民主左翼已经认识到，整个国家权力的增加给自由带来威胁，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西方民主社会革命的这个成就本身，对于那些必然有意识形态或乌托邦思想推动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国内政治的终结。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严重的政治争端根源的萎缩甚至也导致某些人对冲突——对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冲突——是否会继续存在提出怀疑。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随着经济不平等和特权的减少，我们也可以消除差别和不满——正是这两者使动力变为实际政治选择——的根源。在今天的美国，除黑人以外，要察觉任何一部分代表自由之既得物质利益的居民的存在是困难的……我认为，断言自由要求被压迫群体的存在以便蓬勃成长的想法，有多于辩证宣传的内容。或许这既是自由的悲剧，又是自由的荣耀。一旦理想实现，甚或接近实现，不满蕴含的驱动力将消失，社会将有一段时间陷入麻木地认可现存事物的状态。这样的事情似乎已在美国出现。⁶

而且,戴维·里斯曼也指出:“财富的普遍增加以及随之出现的严格差别的消失,很难再保持支撑政治多样性的麦迪逊式[经济的]基础,也很难再找到政治家为剩下的被压迫阶层说话。”⁷基于阶级差别和左、右争端的党派冲突正在结束的论点,是以如下假设为基础的:“经济的阶级系统正在消失……因为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已结束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政治上的重要性。”⁸

但是人们或许要问,这些知识分子是否把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国内政治中的衰落误认为支撑国内争论的阶级冲突的终结。正如美国和其他国家投票模式方面的大量证据所显示的,选民从整体上看并不反映这么多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国内阶级斗争的终结。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对美国居民所进行的大量调查表明,大多数人认为,共和党多为富人、商人和专业人员考虑,而民主党多为穷人、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着想。⁹类似的调查结果在英国也有报道。

这些看法并不只代表党派的观点,因为左右两派的支持者也都一致认为每个党基本上是代表阶级的——这并不意味着接受残酷的阶级斗争,而是对政党的代表功能有一致意见,类似于公认工会代表工人,商会代表商人。阶级分野继续存在不意味对系统有任何破坏性后果;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指出的,稳定的民主政治要求对政治斗争的性质达成共识,这包括假设每个政党都全心全意为其所代表的群体服务。

预言“富裕社会”中阶级政治终结忽视了任何阶级系统的相对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客观剥夺——低收入、不安全感、营养不良——的减少确实降低了社会潜在的紧张度。但是,只要一些人通过社会的声望结构或地位结构得到的利益比另一些人多些,人们就会感到相对受剥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其工人阶级生活在令世界其余地区大多数中产阶级羡慕的水平上;可是一份研究美国各种民意调查结果的详细报告说:“二次大战前、战中和战后民意测验的主要意见是,公司经理的薪金太高,应当由政府加以限制。”而且这种甚至在富人中也很流行的情绪,随着有人经济地位的下降,还找到日益增多的支持。¹⁰

民主式的阶级斗争将继续下去,但这只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没有红旗、没有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的斗争。许多只能以思想家或现实批评家身份参与的知识分子自然为此感到心烦意乱。英国一份社会主义周

刊《新政治家》在 1958—1959 年曾在“我们应当帮助盖茨克尔吗？”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正如标题所暗示的，写这些评论的人是形形色色为工党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激进的党派，而只是代表工人和工会的利益组织这一事实，感到忧虑的英国知识分子。

政治意识在美国的衰落影响到许多知识分子；正如我在第十章所指出的，他们是为了实现自我形象必须扮演社会批判角色的知识分子。再者，由于国内政治，甚至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已不能作为来自左的方面的严肃批评舞台，所以许多知识分子已从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关注，转向批评美国社会基本文化的另一些方面，特别是从政治上不能研究的要素。他们的矛头是指向表面上对地位的日益关注（“跟上琼斯们”），指向登广告者和大众媒介作为民众情趣仲裁者的影响的相关增加，指向美国人过分循规蹈矩——跟上琼斯们的另一面——的证据。因此，过去几十年关于美国社会批判的著作，引起最大注意的是社会学著作，而不是政治学著作，如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群体》(*The Lonely Crowd*)、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的《作为一种文明的美国》(*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范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地位寻觅者》(*The Status Seekers*)。

然而，美国社会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现在认为这是一个富裕的官僚化社会的产物——可能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社会本身固有的重现因素。而那些在美国总是得到最彻底表达的、既是美国人的又是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则使对地位和循规蹈矩的关注成为这个社会的共同特征。

劳埃德·沃纳、范斯·帕卡德以及其他用文献证实的地位差别模式，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历史，许多 19 世纪外国旅行者的报告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这些旅行者普遍认为，美国人比欧洲人有更强的地位意识。譬如，一个暴发户，在 19 世纪的英国比在 19 世纪的美国更容易得到承认。他们对美国人较势利眼的解释是，美国缺乏明确的尊重结构，对社会等级地位不存在怀疑，而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对民主和平等的强调使富裕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在地位背景和符号意义上处于更受重视的地位。

看到一个百万富翁在英国比在美国有一条更好、更便当的社会

道路为他敞开,似乎是一件怪事……在美国,如果他的个人品质不好:卑鄙或公开的不道德,人格粗俗或不诚实,这个最佳社会会将他拒之门外。而在英国,善于雇工的巨富较容易推开社会的大门。因为在英国通过适当的方法,巨富实际上可以从授予地位的人那里买到地位……买卖地位制度的存在使得授予真正共和政体国家所不能授予的地位徽记在欧洲变成不值钱的金属。¹¹

许多观察家,从哈里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生活过的最老练的英国评论家之一)到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劳埃德·沃纳都指出,对家庭背景(哪一代人挣下的钱?)的巨大关注是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特征,而这种关注可能是人们对一个基本价值是否认任何人天生有权要求比他人更高地位的社会所出现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感的反动。正如社会学家霍华德·布罗茨(Howard Brotz)在对比英国和美国的地位制度时所指出的:

势利在民主社会可能远比在贵族社会邪恶。由于人们对只能由政治权力给予的优越地位缺乏自然而然的确认,所以富人,特别是新贵,仅仅与其下属接触一下就感到受到威胁。这种心理或许在19世纪末期达到了顶点。例如,在纽约的图塞多帕克,一个富商大贾的上等居住区,住户不满足仅仅用金属栅栏保护自己,还在大门口加了岗,不让外人入内。对于住在这个国家的一个不是与其他同地位者在一起,而是生活在其承租人当中的英国大亨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古怪的了。因为他的地位并不妨碍他在下层阶级成员面前自由行动,和他们一起娱乐,比如与农民[即佃户]一起骑马纵狗打猎。正是这种“民主的”态度最初促进了社会对犹太人的开放。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娱乐活动而失去其阶级地位。¹²

从19世纪30年代的托克维尔到20世纪50年代的里斯曼,如此困扰许多美国人的循规蹈矩问题,今天已被视为美国文化的主要方面。分析家一再强调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相比较)对于他人的评价十分敏感。由于自身地位无从保障,所以他们关心“舆论”,其方式是生活在贵族统治较强的、地位有保障之社会中的那些显贵们所不必为的。早在19世纪,外国观察家已被美国人的“他人定向性”所触动,并用这个国家阶级系统的性质加以解释。正如里斯曼所注意到的,美国人给人留下的这种“他人定

向性”的印象可以在“托克维尔以及其他来自欧洲的好奇和吃惊的访问者”¹³的笔下找到。哈里特·马蒂诺在她描述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时，几乎就像是在转述里斯曼本人就今天的“他人定向”者所说的话：

美国人也许遍游世界，可除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以外找不到一个像他们那样的社会：永远受小心谨慎的约束，以他人的意见为参照。他们也许游遍全世界，可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外找不到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国家：孩子会提防自己陷入困境，会谈论行为对他人思想的影响；社会中的年轻人默默地决定自己什么意见应当对外发表，什么心里话只是在家庭的圈子中才能抒发；妇女几乎普遍写索然无味的文字，因为在纸上授人以柄永远是不安全的；老年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几乎普遍对鼓励他们自由表达的原则缺乏信心。¹⁴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人们受到鼓励去奋斗向上，可是却没有明确的参照点标志他们的所至，他们得以达到的地位是由他人的好评决定的，因此，马蒂诺所描述的谨小慎微和认真对待他人意见是自然的。像今天的里斯曼一样，她也注意到，这种“他人定向”型的人，最常见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聚集的城市中心，那里的人们“永远小心谨慎”地生活。“像美国北方州城镇居民那样，如此呕心沥血地关注他人评价，如此神经焦虑”¹⁵，是绝无仅有的。同样，马克斯·韦伯在他20世纪初访问美国时，也注意到“在美国高度听命于上流社会，其程度在德国从所未闻”，并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没有世袭阶级地位的民主社会的自然属性。¹⁶

强调成就的社会，否认基于世系、甚或基于过去个人成就的地位，因而必然是一种人们敏于依他人意见取向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用里斯曼的比喻来说，人们要用一种雷达保持他们的社会平衡。而且恰恰是在我们变得比较平等时，下层阶级取得公民身份时，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地位竞赛时，我们，其他人也一样，才变得更关心他人的意见，因此也就在托克维尔的意义上，变得更民主、更美国化。

对于社会精英来说，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循规蹈矩的政治。只要民众可以接近社会精英，只要精英分子在决定他们自身行动时必须考虑民众的反应，这些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艺术精英）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可能对民主共和国提出的最严厉指

责,是说它们推行讨好多数人的做法,同时还把这种做法引入各个阶级。”他认为,是“政治生活中的少数杰出人物正在不断增加对美国大多数人的专制”¹⁷。

同样论点在本书第十章论及有关大众文化消极影响的大量讨论时也曾提出过。相对于文化仅限于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享用的时代或国家来说,大量居民接触文化市场机会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文化情趣的限制。

目前关于教育的辩论反映同一个两难问题——许多相信民主和平等的人也希望保留精英社会的某些属性。在英国,兼收白人和黑人的“综合性”学校被视为一项进步的改革,其理由是基于如下假设:最适合绝大多数人的事情是社会健全的最佳保障。这个论点已在美国付诸实行;其时,自由派教育家坚持认为,对有天赋的孩子进行特殊教育足以使不平等永久存在,而且这是以牺牲家境寒微的孩子为代价施惠于家境较好的孩子。今天,英国的教育家有力地论证说,为较有才华的孩子开设专门学校(所谓的“文法学校”)是造成天资较差孩子心理创伤的根源。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忘记,美国的自由派人士也有类似观点;例如,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在当纽约市长时就撤销了汤森·哈里斯高级中学,一所专门为有天赋的孩子开设的、四年功课三年学完的学校,其理由是:这种学校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它给少数人以特权。

我要说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们不能有蛋糕,也就不能吃蛋糕。我们不可能兼有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的优点;在强调平等的社会,我们不能有专门的精英学校;在强调民众价值判断的社会,我们不能有不考虑大众情趣的文化精英层。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可能有低离婚率,也不可能结束性别角色的差异。因此,在没有为青春期走向成年提供明确道路的文化中,我们不能预期有安稳的青少年。

我的意思不是说,民主社会可能对减少循规蹈矩或增加创造性无所作为。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大的经济安全感和较高的生活水准,可以增强文化和民主自由的效果。现在,好书、好画和好音乐的市场处于美国历史上的高点。¹⁸有证据显示,对少数民族也比过去宽容。在今天的美国,有更多的人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良好教育;不考虑这种教育的许多缺点,从关心自由和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观点看,一个人受的

教育越多，他的价值和消费模式越好，仍然是个事实。

循规蹈矩可能在发展，意识形态可能在衰落；关于这种事态，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观点，这是由许多正当地对人民党的民主固有的循规蹈矩方面感到担心的分析家提出的。他们认为，大型官僚组织的发展——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正在侵蚀个人自由的范围，因为“组织人”要继续留下来，必须循规蹈矩。这个观点有时与政治冲突强度降低有联系，因为随着管理人员和专家不仅在接办企业，而且也在接管政府，政治已被看作是向管理的转化。从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到最近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个论题的重申，这种趋势有时受到欢迎，但近些年更经常的是令人感到悲哀。

然而，大型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可能有更重要的影响，如为持续自由提供新保障，为创新提供更多机会。官僚化(尤其)意味着掌权者随意性权力的减少。通过确立公正平等处理问题的准则，通过削减许多非官僚组织领导人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官僚管理体制可能意味着不是更多、而是较少听命于上级领导。尽管出现了职业忠诚的考核制度，但我认为，今天人们无疑不大可能像他们 20 世纪上叶那样，因为他们的意见和行为而失业。把福特汽车公司开创之初那样的家办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或今天福特汽车公司中的工人和经理的地位相比较，任何人都几乎不会说，官僚管理意味着在产业各个水平上存在要求从业者循规蹈矩的更大压力。工会是准确反映其会员愿望的，它们正在顺应更加官僚化的趋势，例如争取资方实行受雇、解雇和晋升的规定，或与资方签订有 3 年保障的合同，其中载有申诉不满的细则。体力工人和白领工人的联合是在大型组织的条件下实现和发展的，这足以使工人或雇员免受相对无控制的权力的压制。担心工人会受工会制度有组织权力压制的那些人，大多忽视了来自随意性管理权的另一种压制。在许多情况下，大公司的雇员是两大组织——公司和工会——发生争论的主要问题，他们比不在大组织的人有高得多的自由度。

民主的官僚体制社会存在着要求循规蹈矩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是西方知识分子严重关切的一个合理方面，但我所读到的历史证据表明，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分析限制在对制度的国内威胁上，今天这个问题的尖锐

程度和威胁不如过去。因此,有理由预期,个人拥有很大、甚至还在增加的政治自由(例如在英国或瑞典就是如此)的稳定民主制度,将继续是成熟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特征。

关于文化的创造性和顺从性的争论,也反映本章开始时所讨论的那种总趋势——从意识形态向社会学的转移。社会学作为许多西方国家学术界以外的一种知识力量,其真正发展主要不是对社会分析力的肯定,而是对失去政治研究兴趣的补偿。因此,一个社会学家仅仅满足于记录对这种趋势的关注,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倘若不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分析、意识形态和争论仍有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先进民主国家之中的国内争论已变得可与美国政党之中最初的竞选斗争相比较。像所有提名竞争一样,使双方发生争端的是决定谁来领导党。而从具有边缘区——不发达国家——的整个世界来看,更大的政治斗争是决定谁来领导民主阵营。因此,知识分子政治兴趣的视野必将从地方选举——决定谁来管理国家的那些选举——的新形式转向这种更大的竞争。

这种更大的斗争使政治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比在西方民主国家复杂得多。在这些不发达国家,强烈的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仍有其必要性。工业化的问题、宗教地位的问题、政治制度性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且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又与国际斗争交织在一起。前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国家、有色人种与白人之间过去的政治关系,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此,亚洲和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在它们信奉民主政治时(不幸,并非全如此,甚至想如此,也不可能办到),必然常常对西方经济、政治和宗教制度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敌意。

在激进党派执政的地方,如印度、加纳、斯里兰卡、缅甸以及另一些国家,它们必须担负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责任,因而必然受到工业化、迅速城市化、恶劣的居住条件和极端贫困所引发的不满的压力。这时,民主左翼领导人必须寻找为这些弊端受过的替罪羊——国内资本家、外国投资者,或过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倘不如此,他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而群众需要隐含在革命教义中的那种千年盛世的希望,一种共产党人打算提供的希望。因此,不发达国家执政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继续领导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日益反对作为外国主要遗

留机构的基督教。如果他接受西方社会党人的论点：西方已发生变化；全盘社会主义是危险的，那他在自己的社会中就会成为保守分子，一个不能起作用的角色，但仍有一批普通追随者。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导人和社会党政治家在这种政治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他们仍然代表各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传统，所以能在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不被认为是保守的、甚至是渐进主义的那些国家的非共产党左翼领导人当中找到知音。要求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行为符合主张责任行为的西方观念，是忘记了许多西方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和知识分子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同样是“不负责的和有煽动性的”。今天，西方领导人必须与东方和非洲的非共产党，而又承认严峻的意识形态争端在各自国内已经结束的革命党人，进行交流与合作。

本书关心的是使民主秩序得以存在的条件明确起来，这或许反映我的一种过于理性主义的信念：更充分地理解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可能有助于人们在现在尚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地方建立和发展它。虽然我们断定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假说——民主与一种向中产阶级伸展的阶级结构有关（第二章作了初步讨论）——仍然是成立的，但这并不鼓励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因为它意味着政治活动主要应按保障经济发展来取向。不过我们也不必过分悲观。民主已经存在于不同的环境中，即便它最常见的是由有限的几个条件支持的。唯意志的行动不能达到民主，但人的见诸行动的意志，可以按减少或增加民主发展机会和生存机会的方向来规范制度和事件。在稳定和富裕的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和热情已不再为支撑那里的阶级斗争所必需，但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和发展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国际努力中，显然仍是必要的。在西方，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正在终结。而西方不同国家中，与经济发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处水平和存在问题有关的意识形态冲突，仍将继续存在，其持续时间远不是我们的寿命可企及；信奉民主的人可以避免这些冲突，要参与，只能自己负责。托克维尔研究 1830 年美国社会运作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人们采取行动在当时专制主义的欧洲推进民主；而阐明 20 世纪中期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则可能有助于亚洲和非洲的政治斗争。

注 释

1. 我给本章加的标题是取自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一篇出色报告的题目,这篇报告是于1955年9月于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自由的未来”讨论会提交的。见“The End of Ideology?” *Encounter*, 5(November 1955), pp. 52—58。关于意识形态衰落性质和原因的一些有洞察力的分析,见 Herbert Tingsten, “Stability and Vitality in Swedish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2(1955), pp. 140—151; 以及 Otto Brunner, “Der Zeitalter der Ideologien,” in *Neue Wege der Sozial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 Den Hoeck and Ruprecht, 1956), pp. 194—219。关于“意识形态时代”将终结的预言,见 Lewis S. Feuner, “Beyond Ide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Ethics*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1955), pp. 126—130。本章涉及的许多问题的详细讨论见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0), 以及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2. 我出席这次会议提交的原报告题为“The St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anadian Forum*, 35(November 1955), pp. 170—171。有意义的是,我的观察与爱德华·希尔斯的报告有相似之处。

3. Richard Crossman, “On Political Neurosis,” *Encounter*, 3(May 1954), p. 66。

4. 引自 T. C. Truman, *The Pressure Groups, Parties and Politics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Movement* (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53), Chap. II, p. 82。

5. Richard Crossman, *op. cit.*, p. 67。在瑞典,赫伯特·廷斯腾(Herbert Tingsten)说道:“因在所有情况下删除了重要的论点。结果,象征性的语言和旧的框框改变了,或者消失了……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死了,不仅在保守主义者当中,而且也在自由党内……具体计划或具体改革上的社会主义标签,除了所讨论或改革被认为有吸引力外,简直不再有其他含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本身成了单纯的敬语,只在选举和政治节日方面有用途。”Tingsten, *op. cit.*, p. 145。

6. Barrington Moore, Jr.,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83。

7. David Riesman, “Introduction,” to Stimson Bullitt, *To Be a Politician*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nc., 1959), p. 20。

8. S. Bullitt, *ibid.*, p. 177。

9. 见 Harold Orlans, *Opinion Polls on National Leaders*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 Relations, 1953), pp. 70—73。这本专著是关于美国不同民意测验机构在1935年至1953年所进行的各种调查的一份详细研究报告。

10. *Ibid.*, p. 149。一个例外出现在贫穷的人群中,对经理人员的高薪,他们相比境况比他们好的人要稍许宽容些。

11.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Vol. II (New York: Mac-

millan, 1910), p. 815. Cf. D. W. Brogan, *U. S. 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116 ff. 见 Robert W. Smuts, *European Impression of the American Worker*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3), 其中综述了许多 20 世纪最初 10 年和 20 世纪 50 年代访问者的评论;这些访问者认为:“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的民主,远不是缓和社会地位的竞争,而是强化了这种竞争”(p. 13)。

12. Howard Brotz, “The Position of the Jews in English Society,” *The Jew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59), p. 97.

13. David Riesman, et al.,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9—20.

14. Harriet Martineau, *Society in America*, Vol. II (New York: Saunders and Otley, 1837), pp. 158—159.

15. *Ibid.*, pp. 160—161.

16.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46), p. 188.

17.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p. 276. 当然,柏拉图早在 2500 年前就提出过同样观点;当时,他认为,在民主社会中,父亲“会使自己习惯于变得像他的儿子,但又害怕他的儿子,而儿子在他追求自由中变得像他的父亲,但却不怕或不尊重他的父亲。……老师害怕并奉承他的学生,而老年人俯就年轻人,成了多面性的杰作。……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主要结果则使公民的灵魂……变的敏感。”*The Republic of Plato*, ed. by Ernest Rhys (London: J. M. Dent and Co., 1935), pp. 200—226.

18. 见 Daniel Bell, “The Theory of Mass Society,” *Commentary*, 22(1956), p. 82; 以及 Clyde Kluckhohn, “Shifts in American Values,” *World Politics*, 11 (1959), pp. 250—256, 其中述及“真正的个性”在美国不是在萎缩,而是在成长的证据。

第六篇

《政治人》1981 年增订

第十四章

反思和最近的发现

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政治人》分析框架的核心；这里说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16世纪由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复活的,后来又根据对工业社会进行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作了修正。所谓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的意思是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假设,而不承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正如罗伯特·米歇尔斯多年前——当时,他的分析使他相信,资本主义特有的阶级冲突不能导致社会主义社会——所指出,他的方法论“与不是视为……教条,而是视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并不冲突”¹。

塔尔科特·帕森斯在评论《政治人》时指出,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一个非教条的马克思的参照系”,他把“社会分层与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与权力分配和权力行使条件的关系”²,描述为该书的中心论题。在作了上述评论后不久写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个领域近年来的总趋势是在非教条的、非‘马克思的’立场与最广泛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某种行动理论的立场之间日趋两极化”——后一种立场,正是他本人的方法。³

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

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和马克思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政治制度的不

同及其内部冲突必须根据制度的社会阶级结构加以分析。他们的分歧是在标准上。虽然这三个理论家都强调民主的价值,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对自由社会有不同的观念,每个人强调的是这种社会的不同方面。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弗利更关注政治形式,而马克思则强调对生产关系的控制。不过,他们在价值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他们所提出命题从实践观察中得来的确实性。

本书第二章关于民主政治之社会必要条件的分析断言,稳定的民主最可能出现在最发达的富裕国家,富足是使民主政治的公平交换制度化的一个条件。正如本书开头引文中所强调的,亚里士多德论证说,完善运行的政体是出现在有大量中产阶级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公民有适度而充足的财产……在一些人拥有很多,而另一些一无所有的地方,……可能出现暴政……民主制度比寡头统治更安全、更长久;因为这种制度使中产阶级得以有较多的人数,得以更多地参与管理;在没有中产阶级的场合,麻烦出现了,国家很快会灭亡。

亚里士多德还强调,不同社会的政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许多因素……而且在大批公民中,有的富,有的穷,有的中等……除了财富的不同以外,还存在地位和荣誉的差别。因此,政体是按照不同阶级所拥有的实力……分配……职位的一种组织。

他在公元前4世纪写道:革命感情的……普遍主因……或者是渴望平等,这出现在人们认为自己与其他比他们多拥有的人平等之时;或者是追求不平等和优越,这出现在人们一方面自认为优越,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拥有的不是多于其下属,而是等于或少于其下属之时。

马基雅弗利在分析他《讲演录》中所提到的不同的政体类型时,也说明“平民政体优于”专制政体。⁴在描述民主政体的条件时,他强调了阶级结构:社会越平等,建立自由政体的机会越多。他断言:“要在存在或可能存在显著平等的地方,建立共和国,而在存在显著不平等的地方,建立相反类型的政体,即君主国(principality)。不然的话,所做的将失去均衡,维持不了很长时间。”⁵

卡尔·马克思,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儿,伴随工业化出现的社会扭曲现象和19世纪新阶级——无产阶级——成长的观察者,也强调不同阶级结构对政体的影响。技术结构的变化产生不同的职业分类,而与

职业相联系的社会环境导致不同阶级的文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他的社会变革理论的核心。该理论假设：经济和工业技术力量是基本的——“基础”，而政治和价值功能上是派生的——“上层建筑”。基于这个假设，他认为，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将出现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经济上受剥削的共同经历使工人产生了阶级意识，并认识到他们必须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基于这样一个进一步的假设：工人将在工业社会中成为大多数，而且，一旦这个大多数有了阶级意识，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依据的这个论点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将随着它把社会带上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水平而崩溃。

按照这个逻辑，马克思断言：最发达的社会应当有最先进的阶级和政治关系的组合。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工业较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⁶

如果我们以一种非政治意义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考虑隐含在最先进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显示其未来景象这一命题中的逻辑，就应当得出如下结论：现已见于最工业化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也许显示其他国家将如何发展。

在 19 世纪末期和现在的 20 世纪，这个命题意味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以及最终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必然会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并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美国从 19 世纪末起已是这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尽管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有明显的弱点，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仍一再指望美国能成为向其他国家展示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正如霍华德·奎因特(Howard Quint)所指出，他们“发现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最为成熟，这不仅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是这样，而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有这种明确看法”⁷。被认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卡尔·考茨基在 1902 年宣称：“就一个国家可能向另一个国家所显现的景象而言，美国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未来。”他在 1910 年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并预言美国的“阶级冲突尖锐化程度强于”任何其他地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 H. M. 海因德曼(H. M. Hyndman)在 1904 年指出：“正如北美就经济和社会地位而

论是当今最先进国家一样,它也将是社会主义在其中可找到公开和合法表现形式的第一个国家。”⁸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写于1906年的关于美国社会主义的有名著作中就此强调说:“现代社会主义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反应而出现;这个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国家,即美国,将同时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提供典型例证的国家,其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运动最激进的支持者。”⁹

从1903年起开始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在1906年自信地写道:“美国将在世界其他国家之前实现社会主义。”¹⁰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1907年接受美国社会主义报纸《理性呼吁》(*Appeal to Reason*)采访时,毫不含糊地说:“你们美国人将是迎接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批人。”当时,他的党已是一个大规模运动,有许多人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而美国社会党的选举得票率还不到2%。他说这番话的信心是基于美国的“工业发展遥遥领先于德国”。在1912年第二次接受采访时,两国社会主义运动力量的差距更大,倍倍尔重申了原来的看法,说美国将“是第一个宣告成立合作民主国的国家”¹¹。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他关于美国的一本书的扉页上转述马克思的话,宣称:“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将向工业发展追随其后的国家展示它们未来的景象。”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可能比他们的欧洲同志更了解他们的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但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要求美国走在前面。例如,在社会主义者国际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被列宁视为有开拓精神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社会劳工党领袖丹尼尔·德·利昂(Daniel De Leon),当着强得多的欧洲社会党与会代表说:“在只考虑某些基本原理时,不可避免的结论是,美国将是社会主义利剑首先斩断资本主义首级的战场。”¹²此后不久,德·利昂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1906年大会上宣告:“如果我读的历史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的预言将会实现,美国将敲响世界资本主义衰亡的丧钟。”¹³

渴望看到他们的理论预言得到证实,使马克思主义者得出充满热情然而不免言过其实的结论:美国工人最终将觉醒,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已在发展中。然而,这些预言落空了。有50年国际社会主义经历、参加过

奥地利、德国和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马克斯·比尔(Max Beer),谈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弱点而产生的忧虑和窘困。他说:“美国劳工运动的状况似乎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活生生的反例;马克思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以及随之出现的民众无产阶级化,必将导致阶级斗争,导致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独立劳工运动的形成……是这个概括不完善吗?还是存在起抵消作用的力量?”¹⁴

比尔总结的问题仍然存在,虽然自从1917年和俄国革命以来几乎不再讨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缺陷的马克思主义含义。事实上,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选择了无视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含义的态度。一个例外是列昂·托洛茨基。他在1939年专为美国读者写的一篇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大胆面对这个争论。他在引述了马克思的最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段话之后,接着写道:“这个思想确实决不能再用。”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在用它。¹⁵

从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美国的政治远非落后于欧洲的政治,实际上应当认为美国的政治更进步。另一些国家随着日趋工业化和日趋富裕应当着手仿效美国,而不是美国去接受工业不发达之不富裕国家的政治形式。

这里不是深入分析为什么美国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场合;作为一个问题,我已在其他地方讨论过。¹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所提出的证据和论点表明,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当其在欧洲出现时,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如说是前工业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社会显然是按不变的、几乎是世袭的社会阶级构筑关系的。因此,新涌现的工人阶级对这样的政治社会作出了反应。沃尔特·迪安·伯纳姆(Walter Dean Burnham)对这个总论点作了贴切的提炼:“不是封建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用这两句话,可以概括支撑工业时代美国选举政治的基本社会—文化现实。”¹⁷

早期迅速工业化带给社会的严重扭曲使阶级成为理所当然的,而这又导致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正如列宁、考茨基和其他一些人所评述的,欧洲许多工人阶级政党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出现的——这是美国缺少的一个因素,美国的工人已从“自由投票”¹⁸中获得利益。

随着工业国家经济上的繁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工业社会严格的阶级界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逐渐瓦解。这种发展不仅弱化了阶级地位与政党忠诚间的关系,而且导致政治紧张局面的缓和,其证据是极端主义政治运动在力量或意识形态信仰上的消失或衰落。右翼运动几乎已经消失,而左翼运动或者像意大利共产党那样变得几乎不再认同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政治民主,正如本书所认定和分析的,在战后时代已变得比较普遍。随着日益工业化和日益富裕,我们不仅在战前法西斯国家确实看到了持久的民主政体,而且南欧的一些独裁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现在也已变成选举的民主国家。

这些发展是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和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由于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一个比较富裕、比较安全的工人阶级,所以本书视为有助于民主政治的条件,即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那些条件,已经有了它们的预期效应。

德裔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著文强调,历史记载表明,富裕的资本主义几乎消除了工人阶级发动激进抗议的最微小可能。他评述道:“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基本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但是,维护和改善工业现状的压倒一切的利益已使当代社会最先进地区以前的对手联合起来。”¹⁹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和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批评马尔库塞说,他的解释“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不正确的;但是……他的分析也许极适合于美国是可能的”。马尔库塞从经典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答辩说:“由于美国在经济上比欧洲国家先进,所以这种现象……扩展到西欧不会很久。”²⁰

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成为运动的旗帜时,“革命并没有列入先进西方工业国家的议事日程,而必要的‘主观因素’(政治意识)和‘客观因素’(以生产为基础的阶级支持和参与)的结合不料却重合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²¹。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制度已经在经济贫穷而不发达的农民的支持下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但是,这种革命不是马克思的革命。

当然,应当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人)设想职业地

位是政治态度和阶级冲突的决定因素是正确的。在所有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正如本书第八章到第十章所指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信念和投票行为之间存在一种相关性。没有特权的人支持主张更加平等和反对政府干预威胁自由企业经济的政党。工会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赢得了支持。政府已变得更加有力,并利用其权力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然而,这样的政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中,代表没有特权者利益的政党和工会的存在,足以稳定社会,并有助于赢得无产阶级对国家制度的忠诚。用迪斯雷利的角度来说,工人是“冷酷无情的天使”,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不如说是未来的支持者。

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

本书第二章探讨了民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其中包括这样一个明确论点:

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少数上层分子的独裁统治),要么导致暴政(有民众为基础的独裁统治)。而以传统主义独裁形式出现的寡头统治则见于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泰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20世纪50年代末收集的证据已在前面提出,这些证据表明,在稳定的民主政治与国民财富、沟通、工业化、教育和城市化的指标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最近,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就100多个国家报道了类似关系。根据人均财富把这些国家分为5类,他发现,民主国家在各类国家中的比例显示如下上升趋势:最穷国家为0,次穷国家占7%,次富国家占36%,最富国家占100%。29个民主国家只有2个不在最富和次富两类国家中。像我前面的分析一样,民主国家也在文化普及、教育和工业化

的平均水平方面有别于非民主国家。²²

有许多社会科学家继续在这个领域作了工作,其中特别是菲利普斯·卡特赖特(Phillips Cutright)、马文·奥尔森(Mavin Olsen)、唐纳德·麦克龙(Donald McCrone)、查尔斯·克努德(Charles Cnudde)、吉尔伯特·温海姆(Gilbert Winham)和拉里·戴蒙德;他们利用更先进的统计方法,也发现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尽管应当指出,他们使用的经济指标和民主政治定义有所不同。²³卡特赖特和奥尔森分别报道各种发展指标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多变量总相关系数为 0.84 和 0.82。²⁴麦克龙和克努德以及温海姆曾试图把这些变量纳入一些因果模型,并得出结论:提高教育水平刺激沟通交流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民主化有最大影响。

表 14.1 民主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财富分类	国家数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变化范围(美元)	民主国家数	总计
最富	25	7 870—2 380	19	76%
次富	25	2 320—740	8	32
第三富	24	730—410	2	8
次穷	25	390—160	0	0
最穷	24	150—70	2	8
	123		31	100%
	民主国家占的总百分比:			25%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字据 1976 年世界银行图表集,数据是 1974 年的。民主国家是指按雷蒙德·加斯蒂尔(Raymond Gastil)判据分类属于自由的那些国家。

资料来源:Larry J. Diamond,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The Case of Nigeria,"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1980), P.91.

戴蒙德的研究是遵循达尔按人均财富把国家分为 5 类的方法,利用目前资料所进行的最新研究。他的结果(见表 14.1)证实了以前进行的调查结果。“25 个最富裕国家有 2/3 是民主的,其他国家是产油国或共产主义专政的。次富裕国家有 1/3 是民主的,其他是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除这 50 个国家外,在其余 73 个国家中只有 4 个是民主国家(约占 5%)。”²⁵

当然,这当中有例外,即有某些贫穷的民主国家和富裕的独裁国家。

不过,正如戴蒙德所指出的,某些例外近年来已消失。

在连续15年人均财富平均年增长7.5%之后,葡萄牙的独裁于1974年崩溃,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还不稳定。按达尔分类可能属于民主国家的菲律宾,1969年以后发生倒退,这反映该国比较贫穷。达尔在拉丁美洲看到的例外几乎都已消失:自1969年以来,智利和乌拉圭加入了阿根廷和古巴的行列,站到了非民主一边(实际上,阿根廷已向回转,它后退为非民主国家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²⁶

在一份题为《西班牙向民主政治过渡》的报告中,拉斐尔·洛佩斯-平托把西班牙有较大可能使民主制度化和各主要阶层接受民主政治归因于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显著成长。这个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人均收入“从大约5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以上”。从事农业的人数从1950年约占总就业人数的50%下降到70年代末不到20%。²⁷

由于“经济中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发展,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已成为多数”,西班牙“已比其当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平等”。与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弗利的结论相一致,洛佩斯-平托也注意到,“民主政治更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功地确立”²⁸。

当然仍然有一些异常情况。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些情况大多是产油的富裕国家,不然就是高度不平等的不发达的中东国家,或工业比较发达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应当指出,在拉丁美洲,“我们发现委内瑞拉是民主国家,而有类似发展水平的阿根廷却不是;哥伦比亚是民主国家,而同样贫穷的巴拉圭和厄瓜多尔却是独裁国家。”²⁹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已把现代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一项关于6个国家人的态度和品格的研究中,他们确定了一组与教育、工厂工作经历和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的品格属性。³⁰这些属性似乎也与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条件有功能上的关联。

最近,英克尔斯和戴蒙德在一篇评论态度和价值的许多跨国研究成果的文章中,提出相当多证据证实如下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有助于增进公民民主意识的方面有独立影响。他们发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个人满足感、个人效率、反集权主义倾向和信心之类品格之间

存在一致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这些品格之间的平均等级一次序(在各社会经济群体内)相关系数分别是:反集权主义倾向是 0.76;信心是 0.85;效率是 0.55;满足感是 0.60。³¹因此,他们说:“在涉及各种样本和用各种方式组合代表性国家组的范围广泛的研究中,有一种明显而一致的趋势显示集权主义及其类似表现与国家发展水平负相关。”³²

国家发展水平在塑造公民态度和价值中起着基本的独立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国内标准社会经济等级——如基于教育或职业的那些等级——的各个水平上一般是一致的。

影响的方向一般是大多数观察者认为是“正态”的那种方向。在较发达国家生活似乎在于自我提高——这使个人对自身之价值、满足和能力的领悟超出仅仅根据其教育和职业所作的预测。而且,国家经济越发达,就会有越多的地位不同的个人,在他们身上出现有助于稳定政治和有效经济行为的品格,因为这些人会对另一些仍然过于自信自己能力的人比较信任,比较宽容。”³³

本书第三章讨论了合法性和有效性对维护政治系统的贡献;戴蒙德最近对我的论述作了补充,他强调指出:

除了民主价值与国家财富两者存在有力的明显联系以外,现时代还有一种越来越不可回避的联系出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对政权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信心之间。每过 10 年,较富裕国家的国际示范作用就会变得比较引人注目,比较普遍,民众对政府行为的期望也跟着进一步加码。甚至在原则上也只有最具绝对主权的国家,才能在持续贫穷的基础上建设民主政治,然而在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几乎已经消失。因此,在当今世界,要说民主制度能在没有朝向现代化的进步——至少是某种可见的进步——的情况下存在,是难以想象的。³⁴

经济发展是民主政治之决定条件的论点已经受到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的挑战;他指出,有历史证据表明民主政治可以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存在,如 1820 年的美国、1870 年的法国、1890 年的瑞典。³⁵不过,这些国家和其他早期民主国家有建立其政治制度的历史有利条件,因为当时世界性通讯系统还没有出现,而这种系统可以使它们清楚地看到,有比它们富得多的国家存在。再者,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财

产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当时也没有出现。可见,作为国家稳定的一个条件是:民众期望水平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这是说明这些早期民主国家特征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是参照较发达国家引出其期望水平,而且文化上也依赖于后者。³⁶19世纪没有一个民主政体面临当代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层出不穷的政治危机;因此,不发达国家必须“在民众同时要求参与和平等分配的环境中获得合法性,而这种要求已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制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崩溃,并使这些国家的政治上层越来越确信,如果要想解决其面临的多重危机,必须把国家所拥有的权力紧紧加以集中。这样就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许多欧洲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些危机姗姗来迟,现在却有意一幕幕展现在它们面前,而急于克服这些危机的奢望是对它们的否定”³⁷。

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

本书第四章对影响工人阶级集权主义之因素所提出的讨论,已经引起相当多的争论,还有许多研究旨在检验文中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否成立。有些学者感到对工人阶级集权主义倾向的强调,是对他们相信工业无产阶级进步作用或潜力的唐突。

某些批评部分是出于我对这个命题的强调而把这种现象归于“工人阶级”。事实上,第四章所断言的在于,有多种消极的和惩罚性的社会条件与低社会经济地位或阶级地位有关,而这些社会条件对于那些呈这种地位的人,有削弱其潜力的作用,不利于他们建立一种复杂的、世界主义的社会—政治观。正如本书前页所指出的:“低教育、对各种政治组织或民间组织的低参与、绝少阅读、封闭性职业、经济不安全感 and 集权主义家庭模式”,是加剧集权主义倾向的某些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教育,是与这种倾向以及种族和宗教偏执态度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独立因素。

在原来的讨论中,我还论证说:“一个使下层阶级倾向于集权主义的次要的,然而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和心理安全感的缺乏。”我引述了吉纳维夫·克努普费尔(Genevive Knupfer)的结论:“经济上的被剥夺就

是心理上的被剥夺：卑屈的习惯、几乎接触不到信息源、缺乏语言能力”。正如我所强调的：

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稳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越可能感到难以领会或容忍政治变革的渐进主义思想……

总之，下层阶级成员很可能从童年起就面对处罚，缺少爱；整个环境充满紧张和敌视——这一切体验往往使其产生根深蒂固的敌意，并借种族偏见、政治极端主义和基督教千年至福说的变价信仰加以宣泄……

所有这些人格特征导致一个人往往以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方式看待政治问题和人际关系，渴望直接行动，不耐烦对话和讨论，对有长远观点的组织缺乏兴趣，愿意追随给图谋反对他的恶势力（宗教的或政治的）给予性恶解释的领导人。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些结论，但他们大都忽视了我的如下意见：“列宁看到了下层阶级的特性和领导他们的人的任务，使用的语言与上述语言有几分相似。他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民众，而这些民众是‘懈怠的、冷漠的、死板的、惰性的、游移的。’列宁说，为了‘最后的决战’（使人联想到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古老说法），共产党必须把民众联合起来。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不妥协的统一的 worldview 和导致大变革的即期纲领。”

虽然第四章的分析间接提到多种历史的、宗教的和组织的背景，但这方面大多数研究文献涉及的是民意资料。后来的某些研究与之有矛盾，不过有持续不断的研究资料证实，在低教育水平、种族和宗教偏见、反对给予妇女平等权利以及支持和参与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之间存在相关性。³⁸H. J. 艾森克(H. J. Eysenck)在分析英国广播公司在英国作的一次研究的资料时发现，工人阶级成员“比中产阶级成员更具民族主义……甚至更具侵略性，更排外，更反犹，更富种族主义……在性道德观上更狭隘。³⁹英国、联邦德国、奥地利、芬兰、荷兰、瑞士、意大利和美国的全国性成人调查表明，在教育水平与反对实行“禁止一切公众抗议示威法”之间存在一致的相关性。每个国家都是受教育少的人比受教育多的人更喜欢

这样的法律。⁴⁰

从心理学角度,伦纳德·皮尔林(Leonard Pearlin)和梅尔文·科恩(Melvin Kohn)发现:“在意大利和美国,中产阶级父母较重视孩子的自我定向性,工人阶级父母较重视孩子对外界规定的服从性。”⁴¹科恩和卡米·斯库勒(Carmi Schooler)在一项关于美国人的研究中发现:“人的阶级地位越高,他们越看重自我定向性……人的社会阶级地位越低,他们越看重服从性……对于认为社会本质上是仁慈的,而视自己为这个社会之胜任成员的人,自我定向性是其核心价值。对于认为社会本质上是冷漠的或有威胁的、而视自己为这个社会之不胜任成员的人,服从是其核心价值。”⁴²布鲁斯·P.多伦温德(Bruce P. Dohrehwend)和埃德温·钦尚(Edwin Chinshong)报道,与高地位群体相比,“低地位群体较不能宽容”心理异常行为。他们强调说:“低地位群体对于他们自认为严重精神失调之现象的态度,与关于他们对公民权利、政治不服从和外部群体之态度的大多数研究所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不宽容与他们准则相背离的行为、习惯或现象。”⁴³

某些批评文章因为有调查证明与集权主义有基本关系的是教育,不是阶级或职业,而声称对工人阶级集权主义的论点提出了挑战。⁴⁴不过,如前所指出,我原来的讨论已强调,教育是助长无地位者集权主义反应的最重要变量。最近,霍华德·加本内施(Howard Gabennesch)注意到:“集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非经济保守主义研究得出的最一致结果,或许是这些现象与象征智力成长的变量呈负相关关系。”⁴⁵而这些变量又与社会经济地位正相关。

还有一些批评与其说与我的分析相矛盾,不如说相吻合。例如,B. G. 斯特西(B. G. Stacey)和 R. T. 格林(R. T. Green)在一篇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保守主义”研究的文章中,以简洁的评述性口吻断言,他们提供的“某些证据”似乎与我的分析相悖。然而就在这项研究的一个未作详细讨论的部分,他们与我的分析关系最密切的调查结论是,“自私自利,再加上信念的某种坚定性和顽强不屈”,是与下层职业地位相关的。⁴⁶

另一些基于研究的批评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例如,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指出,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产阶级成员比工人阶级成员更支持干涉政策。他认为这一事实与我的结论相悖。⁴⁷

(顺便提一下,作为工人阶级集权主义的例证,我并没有论述过不同阶级在对外政策态度上的差别。)然而马丁·帕钦(Martin Patchin)对汉密尔顿的看法提出了异议;他发现,工人阶级反对这些战争并不反映他们的和平主义感情,而是反映他们保守的孤立主义情绪。下层阶级成员比地位高于他们的人更反对与共产党国家改善关系,也更反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帕钦指出,这些政策共同包含一个“要求下层阶级成员……不参与外交事务”的因素。他说:“这样一种解释是与说明下层阶级成员较不喜欢美国插手外界‘纠纷’的其他许多证据相一致的。”⁴⁸

不与外部群体来往的愿望是与称之为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综合征一脉相承的。集权主义的早期研究已经证明,这种意识形态……与种族中心主义有密切关系,实际上还可以用于预测种族中心主义。当然,种族中心主义的可能表现之一是试图避开外人,或者说是孤立主义。与这个观点相一致,有些研究发现,通常测度集权主义的标准(FR度)是与孤立主义相关的……因此,如果下层阶级成员对对外政策的这种典型态度是其集权主义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就不应为看到他们(比其他人更)支持从朝鲜或越南抽身……以及支持不参与世界事务而感到惊奇。⁴⁹

帕钦的结论是,受教育少而无地位的人反对越南战争并不与《政治人》提出的基本论点相抵触。在美国的三次全国性调查和许多地方性调查以及瑞典的一次调查中,可以找到支持帕钦结论的进一步证据;这些调查都是旨在研究人们对越南战争期间发生的好斗抗议示威——主要是由学生发起,有时也由黑人发起——的态度。⁵⁰ 每项研究都表明,教育与对示威的态度有明显相关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种行动较宽容。而且还发现,虽然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但低社会经济地位和低收入也与反对示威的态度有相关性。在美国的两个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加里,以及在瑞典的高尔(Gaule),人们对社会抗议的态度明显与职业相关。⁵¹ 1969年末期和1970年初在洛杉矶城区就白人对“学生和黑人抗议活动”的态度作了一次抽样研究,H.爱德华·兰斯福德(H. Edward Ransford)就此报道说:“不管教育水平,蓝领工人对学生和黑人的抗议表现了比较一致的反对态度,而非体力职业成员的态度,按教育水平显示较大的差异。”⁵²

最近出版的评价工人阶级集权主义论点的著作，即爱德华·格雷博(Edward Grabb)对美国全国舆论研究中心1976年一次社会普查资料的分析，也证实了我原来的表述。根据统计分析——格雷博把这种分析描述为“用李普塞特假设的、同时在一个多变数模型中运作的许多变量来检验李普塞特论点的第一次尝试”，他断言：

我们已经发现有证据证实李普塞特关于宽容外部群体的论点。工人比中产阶级成员更乐意限制外部群体成员的权利。而且，正如李普塞特所强调的，这种差别是起因于这样一些因素，如工人阶级的低教育、低收入或经济上无保障感，以及对生活和他人较不信任或采取玩世不恭态度……显然，教育是先于玩世不恭态度和收入的一个最影响宽容的因素。正如所预期的，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甚至也与所考虑的其他因素呈正相关性。而且，较高的教育、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职业地位全都有助于较少表现出犬儒主义和不信任。

总之，这些分析结果证实了李普塞特提出和我们因而得以谈论的所有3项解释。也就是说，低教育、低经济上的保障感(以家庭收入衡量)和玩世不恭或对生活持怀疑态度，似乎可以用来说明工人阶级成员与其对外部群体持偏执态度间的相关性。⁵³

应当承认，沃尔特·科尔皮(Walter Korpi)主要基于他对北欧国家共产党支持者的态度和阶级背景的研究批评我的分析是有益的。科尔皮反对我的如下结论：小共产党比大共产党从有地位阶层得到更多支持反映参与支持小运动的政治观有更多的复杂性。他坚持认为：“有小共产党的国家与有大共产党的国家的差别——李普塞特认为这证实他的理论——可能是假的，其反映的是人口统计上的差别。这样说的理由是：共产党得票数与基层部门(农业、林业和渔业)人口比例有内在关系，大共产党比小共产党更倾向于从乡村地区得到支持，再加上乡村人口普遍收入较低。”⁵⁴

然而，科尔皮提到的少数几项声称证明共产党的集权主义倾向少于、至少是不多于其他政党的研究，并没有令人信服地驳倒集权主义与共产主义号召力间的可能联系。西方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集权主义的，有信仰的支持者很可能按党的信条回答访问者的提问。瑞典和挪威的民意测验虽然显示共产党比其他政党更反对限制共产党人的政治

权利,但这几乎不证明共产党人对自由的信奉。⁵⁵

某些对我原来论述的批评试图援引许多国家工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领导人比中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在民主制度化、反对政治压制和支持旨在增进少数派权利之政策等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来反驳得自民意调查资料的结论。例如,西德尼·佩克(Sidney Peck)引述证据证明美国下层工会领导人和工厂工会代表支持民主的准则和实践。⁵⁶但是正如本书第四章所指出,由于教育或复杂的政治经历,复杂感越多的人,“集权主义”倾向越少。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曾指出:“精英层成员比普通公民在意识形态上更具复杂感,因此他们更可能明白‘言论自由’一类广泛赞同的原则与这类原则的具体应用——如‘允许共产党在这里讲话’——之间的联系。”⁵⁷所以可以预期,工会和工党领导人,包括工厂工会代表在内,会比普通工人的偏见少得多。

我在第四章中指出,总的看来,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比反对它们的保守力量要支持种族宽容和民主实践。我坚决反对心理决定论,也试图证明信奉一种价值或忠诚某一组织,可以导致人们以不可能根据他们所持特定信念来预测的方式行事。例如,我曾提到澳大利亚的天主教徒,他们大多数是工会会员和工党的支持者,按照工会和党的意见,他们投票反对就不给共产党公民权的议案付诸公民表决。可是,当问他们若不考虑工会或工党所持立场是否支持不给共产党公民权时,压倒多数的天主教徒拥护这样一项法律。同样,美国南方,据民意测验是这个国家最偏执、最集权主义的地区,但也是最反对库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和约瑟夫·麦卡锡的地区;这种态度可能是美国南方反天主教倾向或当时支持民主党的反映。

我在第四章中主张,工人之所以支持工会和左翼政党,是因为这类组织要么出于价值变态,要么出于阶级意识,支持穷人反对富人,而且,在有基于阶级或经济基础的信仰时,工人还可以接受这类组织就少数派民主权利问题所表达的非自由经济思想。看来某些批评大概是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如果一个组织既反对精英层,又持集权主义态度,或者说这个组织是抱偏见的,那么其具有的意识形态则较适合工人阶级的处境,而与反精英、反偏见对应的阶级地位相去较远。实际上,我坚持的在于,左翼的阶级意识是下层阶级的处境固有的,而宽容是来自安全感较大、教育水平较

好的条件。由于许多左翼运动受民主派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所以它们在非经济问题上反映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领导人的价值。因此,工人支持左翼政党或工会的主要理由是这些组织在经济问题上的纲领,而不是它们在对外政策、公民自由或公民权上的立场。

对工人阶级集权主义论点的另一批评是由 S. M. 米勒(S. M. Miller)和弗兰克·里斯曼(Frank Riessman)提出的,他们承认“工人有许多品质具有产生集权主义的可能”,但他们却指责我没有在第四章中提到工人阶级的许多应当给予较积极评价的品质,还指责我的论述看上去有反工人、袒护中产阶级的偏见。

为了突出他们与我在假设上的分歧,米勒和里斯曼强调说:“我们认为,无论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不是集权主义的,但这两个阶级都具有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按集权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⁵⁸他们指出,“工人的某些品质可以促使他们成为集权主义的和反民主的,但这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而不是永恒的肯定的。”我必须声明,我在本书第四章是这样说的:“从这里提出的资料断言下层阶级的集权主义倾向必然对民主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或许是一种误解;同样,对于保守主义的反民主方面,也不应引出类似结论。一个特定阶级是否支持对自由加以限制取决于许许多多因素,这里探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在许多国家,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如社会党和美国的民主党,恰恰是一些比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更好起着捍卫和传播民主价值的功能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这一章毕竟只是本书长达 400 页的第一版中的一部分。接下去一章转向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源,在这一章的第一页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所有阶级,“工人阶级、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都既有民主的政治表现,也有极端主义的政治表现”。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是讨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对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运动的支持。然而,奇怪的是,在试图证实反民主政治行为不限于工人阶级时,米勒和里斯曼以及其他大多数批评者竟没有提到这部分涉及许多国家大量材料的讨论。

在试图理解使工人阶级某些成员支持极权主义运动的基本因素时,我提出了心理学家收集的材料,而这些材料表明,工人阶级的某些人格特

征是与极端主义政治行为相通的。然而,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及第四章本身的大部分内容,正如米勒和里斯曼附带承认的,都是致力于说明与民主和其他各种政治选择有关的社会学条件。作为社会学家,我试图证实“某些社会阶层支持极端主义政党或支持民主政党的具体倾向,不可能根据对它们心理学前兆的认识,或根据从调查资料推断的态度作出预测”。

第四章主要关心的不是根据任何正式定义或来自各种心理学研究的推论,来说明或分析有民主态度的人或有集权主义倾向的人的品格,而是研究为什么工人阶级超比例地支持共产党。许多有关态度、信念或品格方面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不是引作基本证据,以证明集权主义,而是作为补充资料提出的,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作为努力解释集权主义倾向而提出的。从政治上看,工人阶级的集权主义是共产主义,偶尔表现为庇隆主义,犹如中产阶级的集权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第四章的着眼点在于描述处于工人阶级地位有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使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发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与他们的社会和心理需求相容的。正如米勒和里斯曼所指出,我在写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这两个问题已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密切相关时,我基本上是在谈论一种新发展,即共产主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第四章是致力于研究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而第五章差不多是讨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法西斯主义和对现代性的反叛

本书第五章主要关心的是说明不同社会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成员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集权主义支持源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⁵⁹中产阶级极端主义的最清楚表现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政党从因为集中化大工业的出现,以及有组织劳工权力和地位的日渐提高而受到排挤或威胁的部分中产阶级那里,找到了超比例的支持。由于受到基础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压力,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和中间阶层中其他感到不安全的成员很容易为反对大劳工组织和大资本集团的法西斯运动所动员。这些运动部分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如前所指出,它们“不赞成大规模

的组织,不赞成国家权力的扩大,向我们今天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提出了挑战,因为大工业和强大的合法劳工运动对于一种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而政府控制和高税收似乎是其不可避免的伴随物”。讨论接着援引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其论法西斯主义文章提出的论点说:“对社会‘合理化’意识形态的反动……是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最近的研究是强调欧洲右翼运动采取反变革形态的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里说的变革是认同于法国革命、理性主义、平等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变革,而右翼运动是怀旧的,留恋稳定而有高度凝聚力的前工业社会的理想化世界。前工业社会是以君权和教权——国家和教会——的结盟为特征的。在这种社会,地位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复杂角色规定的,国家、教会和贵族集团服膺“位高则任重”的价值观,对普通人的福利负有责任。

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在他关于法西斯主义文化根源的研究中指出,给法西斯主义反叛火上加油的是:“对现代性、对我们的文明——自由的、世俗的和工业的文明——所特有之一系列复杂思想和制度的意识形态攻击。”⁶⁰彼得·盖伊(Peter Gay)以类似口吻把对魏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巨大恐惧”描述为“对现代性的恐惧”。他坚持认为,反对的矛头是指向“丧失人性的机器、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不信神的理性主义、无所寄托的社会、遍布全世界的犹太人和吞噬一切的巨兽——城市”⁶¹。亨利·阿什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把纳粹精神描述为“对现代世界的逃避”。乔治·莫斯(George Mosse)在分析了德国人强调“人民”的方式以后指出,“人民”的先验的传统本质成了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⁶²

《政治人》一书问世以来的大多数经验研究是侧重于欧洲法西斯政党、特别是德国纳粹党是否在中产阶级找到超比例支持的问题。例如,沃尔夫冈·索尔(Wolfgang Sauer)强调说:“法西斯主义可以定义为因工业化而受损失——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暂时损失或永久损失——的那些人的一种反叛。法西斯主义是失去社会地位者的反抗。工人和实业家不属于这个定义;此定义主要适用于大多数下层中产阶级……反对工业化之城市化方面的农民、小商人、与机械化或集中化相对立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从业人员、白领工人(至少是在他们感到丧失经济独立时)、反对改

变社会价值观的一些下层职业人员，特别是教师，等等。”⁶³

胡安·林茨(Juan Linz)对6个国家法西斯领导层的社会背景及其支持力量的选举基础的现存资料作了一次综合考察，他提供的证据证实了第五章的结论。虽然白领雇员在法西斯领导的最高层没有过多的代表，但较下一级领导人中几乎有1/4来自白领阶层；用纳粹党人的话说，这进一步证实“党是下层中产阶级拒绝与无产阶级为伍的不满情绪的外在表现”。⁶⁴根据对西奥多·艾贝尔(Theodore Abel)1934年收集的纳粹党成员自传文献的再分析，彼得·默克尔(Peter Merkl)对《政治人》的分析提出了异议：“现在的样本，大概也可以说当时整个纳粹党，并不如此严重地为明显可辨的下层中产阶级利益所控制，以致认为该党部分反映‘下层中产阶级的反叛情绪’。在‘下层阶级反叛’论拥护者提出的论证中，存在着令人费解的循环逻辑。他常常满足于把纳粹党的统计资料与社会民主党的统计资料相对比，至多不过是与那些自由政党(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或地方政党的统计资料相对比，而这些政党的选票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似乎已为纳粹党所继承。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天主教中心党和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NVP)；这两个党在1933年中期以前或多或少是完整存在的。只要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仍然存在，纳粹党中有较高比例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就证明不了什么。”⁶⁵事实上，当时拥有大量支持的唯一的工人阶级运动是天主教中心党，而小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如我在第五章所指出，已失去其选票的2/5。正如林茨所指出，在宗教政党“作为对现代社会在自由民主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扭曲，以及对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世俗化政策的一种回应而发展”，并把“大部分人口、特别是前工业化部门的人口”纳入其追随者行列的场合，法西斯主义者“遇到了严峻的竞争者，后者已预先占领了……他们的大部分政治空间”。⁶⁶

艾贝尔对他的调查样本按阶级进行分析，证实纳粹党在下层中产阶级中得到超比例支持的论点。他发现，纳粹支持者中有51%的人有下层中产阶级背景。默克尔根据另一个稍有不同的样本发现，中产阶级占32.2%，好斗的公务员占21.3%。⁶⁷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在几个问题上对我提出了异议。首先，他论证说：“如果接受政治行为主要由经济利益所

决定这一前提，[李普塞特的论点]就失去了对其他基本因素的敏感性，而且严重简化了纳粹党党员的革命性动机。”第二，他问道：“如果纳粹党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其成员为什么会有1/3是工人？”第三，他指出：“如果阶级冲突和小资产阶级地位的变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常不断的，这两个因素并不能说明中产阶级从民主政治向极端主义的突变。要解释这种突变，必须假设另一些迄今尚未提出的变量。”⁶⁸

关于罗兹批评的最后一点，他想围绕解释证实法西斯运动的准确时机的立论是完全成立的。不过，这不是我的目的。我希望解释中产阶级有支持某种类型极端主义政治运动即典型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实际支持中表现的程度取决于我在第五章论述的某些因素，如工业发展水平和中产阶级地位变动程度，也取决于我在那里没有论述的另一些因素，如一些危机在民主制度映衬下的严重性和性质。关于罗兹的第二点批评，我从来没说过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基本上是经济利益的产物。当然，正如许多研究所显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似乎在使部分中产阶级、小企业家，特别是农民转向极端主义政治解决时是个重要因素。不过，我还提到另一些因素，如在部分中产阶级中缺乏政治复杂感，他们的地位下降，他们的价值观受到日益加剧的威胁，以及他们认同民主政治制度的程度。最后，罗兹认为工人支持纳粹党有损于《政治人》中提出的论点，这是不对的。公平地说，几乎没有工人支持纳粹党，而且正如彼得·默克尔和其他一些人所指出，支持纳粹党的所谓工人主要是来自小手工艺作坊的那些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传统上具有小资产阶级反现代主义的价值观。⁶⁹再者，如我在许多问题上所指出，“由于法西斯主义政客在他们努力争取支持时是极端机会主义的，所以法西斯主义运动常常包容利益和价值相互冲突的群体，甚至在其主要表达一个阶层的要求时。”

法西斯主义运动，如我早先强调的：“对社会各个层次的心怀不满者、无心理归宿者、遭受个人失败者、脱离社会者、经济上无保障者、缺乏教育者、缺乏复杂感者和集权主义信奉者，都有吸引力。”所以，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认识到的，我们不能顺当地为法西斯政党确定一个单一的支持基础。掌权意志驱使法西斯主义运动接纳各种各样的追随者。与后来共产党的文献截然不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uin)早在

1923年的分析已经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吸引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变动者:“它是无法生活者和失望者的庇护所。”⁷⁰正如吉诺·杰默尼(Gino Germani)就意大利的情况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者被视为 *spostati*,照字面意义讲,是地位变动者。”⁷¹

关于法西斯主义根源的分析,最近最有意义的贡献或许是这样一些研究,它们强调法西斯主义是非工业阶层对欧洲工业化扭曲的反动,这个论点与我对纳粹党几乎全部接管反对德国统一的地方自治政党所证实的讨论相一致。正如我在第五章所指出:

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表达了这些省区城乡中产阶级对现代工业社会日趋官僚化的反感,以及试图通过分散政府权力使官僚化过程逆转的要求。初看起来,区域自治政党的权力分散愿望和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固有的国家至上观念,似乎反映完全不同的要求和情绪。但是,区域主义者的“地方权利”思想和纳粹党反对工业社会“大”压力的思想,实际上都对那些感到失去家园或受到挑战的人有吸引力。在两者的经济思想方面,区域自治政党表达的观点也类似于纳粹党得势以前的观点。

最近,沃尔夫冈·索尔(Wolfgang Sauer)在对比分析欧洲环境中的这种现象时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在“工业化过程比较顺利”的国家最弱,“如在西欧国家,那里的政治崛起是与中世纪末期以来现代文明的崛起同时发生的。”法西斯主义“在地中海国家和中欧国家最强,那里存留着古罗马的前现代传统,以及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是出现在前工业化传统最强而又与产业主义最不相容的地方,因而也就是出现在产业主义崛起引起与过去传统的重大决裂,并把大量痛苦带给非工业阶级的地方。”⁷²弗朗西斯·卡斯坦(Francis Carsten)提请人们注意厄恩斯特·诺尔蒂(Ernst Nolte)提出的类似论点:“经历从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迅速社会经济转变的社会,已证明是有利于法西斯运动滋长的土壤……,因为迅速转变期是最困难的时期:当工业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已完成时,新的平衡已经建立。”卡斯坦引述了诺尔蒂证明在工业化程度与法西斯运动强度间存在曲线关系的证据:“1930年前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而英国的农业人口还不到10%。因此显然可以认为,在前一类国家中,产生法西

斯主义的社会先决条件尚不具备,而在后一类国家中,这些先决条件已不再存在,只有在中欧的中部,法西斯主义找到了其充分发展的先决条件。”⁷³

或者,如汉斯·罗格尔(Hans Rogger)就人们研究 11 个国家激进右翼所得成果总结的:

正是在那些工业化、社会抗议、政治斗争的新奇花样或战争失败所引起的危机尚未在实践上或心理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右翼找到了其特有的表达……。在新、老议会政治和家长式社会结构、现代工业和封建或近似封建式的农业艰难并存的地方,右翼起而为新制度、新方法尚不能有效处理,而老制度、老方法已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总之,……不管当代世界的某些敏感评价,右翼代表……对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敌视,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对(通过国家、种族、无限的权力或无目的行为主义)反黑暗的幼稚思慕,只是一些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仅可意会的力量。⁷⁴

法西斯和纳粹运动反现代化的论点是与它们掌权时设法加速社会工业化,以加强其军事潜力的证据相悖的。⁷⁵不过,纳粹党作为执政者的实际行为未必说明其要求的性质,也无助于解释它们得到大量追随者。正如前面所指出,分析意大利和德国纳粹党的社会基础都表明,它们的支持者是超比例地来自前工业阶层、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要想对法西斯运动的支持力量,甚至其意识形态作出一般性概括,必须承认这些方面在不同国家是稍有不同的。但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是国家主义。凡法西斯运动都部分是因为人们有感于所在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应有地位,有感于国家力量受到资产阶级实利主义、随意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阶级冲突的腐蚀而发起的。因此,正如林茨所指出:“战败国或意大利一类国家,虽然它们自认为受了战胜国的骗,其实它们恰恰是那些法西斯主义最得势和出现最早的国家,即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奥地利”⁷⁶,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在当代,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社会作为一种可生存的政治力量似乎已销声匿迹。探讨这种发展的原因有助于阐明法西斯力量的早期根源。

右翼极端主义和有影响的反现代主义的保守知识分子与声名狼藉的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结合,无疑对削弱激进右翼势力的复活起了主要作用。新法西斯政党无论在哪里试图参与竞选都干得很拙劣,只是意大利稍有例外,因为那里的新法西斯组织和君主主义组织在1950年初还能得1/10左右的选票。在法国,皮埃尔·布热德领导的反体制右翼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选举中取得了某种成功,虽然后来证明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党,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正如第五章中所指出,布热德主义者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公开批评者,对前工业阶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有吸引力,还猛烈抨击现代工业社会的灾难性影响。他们强烈认同宗教价值,攻击大企业、左翼政党和工会,还非难犹太人,从民族主义出发维护殖民主义。布热德主义者看重民粹派的观点——认为应当由人民而不是政党控制政府。

当代有一些社会发展会深深触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支持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人,在这种情况下,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民粹运动力微势颓似乎是令人惊奇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对传统的宗教和爱国主义提出了道德挑战。少数派、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权利已经扩大,道德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些观念影响性行为、婚姻、堕胎、代际关系、罪犯处理、麻醉药品的使用、服装的习俗和式样,以及一般的非常规行为。

当然,这些趋势并不是新的。它们与现代主义相一致,类似于几十年前触怒传统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者的那些变化。不过,这些发展比以前普遍得多,占优势得多。

因此政治上出现更加支持保守政党的反应是毫不奇怪的。抵制社会变革在其他方面也是明显的,如一些反对加入欧洲共同体组织的成立,芬兰乡村党、丹麦布热德主义抗税进步党一类“民粹派”组织的出现,以及各国发生的反对外籍工人大量涌入的抗议活动。这种抗议在瑞士最活跃:在排外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四次公民投票中,有46%到29%的选民投票反对外籍劳工,并成立了两个反移民政党,国民行动党和共和党。⁷⁷不过,这些组织没有一个在其所在国家的政治中显示任何起重要作用的迹象。

一篇综合分析近期“民粹派”抗议运动性质的文章,在讨论芬兰乡村党和法国布热德主义运动时注意到,它们反对“现代化的产物,即城市化和工业化……,坚决强调宗教信仰……,崇尚原始主义……孤立主义,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在国内政治上,实行地方主义”。它们的支

持力量“基本上是在住在小社区的小农和小商,以及在城市只生活过一段短时间的那些人”⁷⁸。其中最大的丹麦进步党,在1973年、1975年和1977年选举中得票率徘徊在15%左右,在1979年下降到11%。这个党也得到住在乡村和省城的人、受教育较少者、自营职业者和农民的超比例支持。⁷⁹

对瑞士反移民政党支持者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戴维·施韦策(David Schweitzer)强调这些支持者与其他地方支持战后小规模极右运动的人有相似之处。“瑞士国民行动运动和共和运动与其他国家中的对应运动极其相像,特别对人口中的边际不安全群体有吸引力;正是这些群体在对大企业、大管理机构、大组织的现代道路以及社会秩序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如果真要充分了解这种复杂性,也只能是模糊的——作出反应。”⁸⁰

研究1970年公民投票行为显示,从农场到农村,到大城市,到郊区,选民生长所在社区大小与他们投票方式有明显相关性。反移民者在分类表上往往被列在“传统主义”和“道德僵化”项目下,他们倾向于反对社会变革。⁸¹正如珍妮特·马丁(Janet Martin)所断言:“外籍工人显然成了这些保守瑞士人的一种符号;代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趋势,也是后者所担心并希望通过阻止移民加以逆转的一种趋势。”⁸²

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在欧洲唯一有选民支持的国家是意大利,意大利社会运动(MSI)在那里的得票率约为5%。不过这个得票率已较意大利社会运动和1972年被其吸收的君主党在战后前10年的得票率(1953年得票12.7%)大为减少。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领导人拒绝“美国和俄国样式的实利主义,崇尚‘精神价值’”⁸³。

一篇根据20世纪60年代中期资料评述意大利和法国有关政治势力的文章注意到,至少在选举水平上,新法西斯主义、布热德主义和极右翼“行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有如30年代德国的纳粹主义、比利时的君主主义(Rexism)、法国的铁十字军(Crois de Feu)、罗马尼亚的铁卫军(Iron Guard)*。马太·多甘(Mattei Dogan)继续强调说:“对形形色

* 铁卫军:罗马尼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反犹太的法西斯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消灭。——译者注

色问题——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宗教的和道德的问题——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所谓的无党派资产阶级比中层资产阶级在观点上更偏执、更守旧（反对新事物），而后者似乎又不如上层资产阶级开明和宽容。”这不仅在法国和意大利是事实，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⁸⁴

德国就是这样。那里的新纳粹主义表现为国家民主党。该党在1969年议会选举中得票达到高峰，接近5%，而在1980年下降到1%。分析这个党在60年代末期州选举和全国选举中的支持力量表明：“右翼国家民主党的号召力主要在小城镇，在低教育水平的、有传统中产阶级职业的上了年纪的人中。”⁸⁵

关于最近10年欧洲和美国的右翼反进步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软弱无力，特别是与类似组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拥有的选举支持和成员数量相比。刺激这些运动的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传统因素的地位、权力和文化影响一直面对着巨大挑战。城市化和工业化仍在飞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左翼政治家已在许多国家执政。大多数国家制定了通过国有化和政府控制来威胁私人企业权利的立法。共产主义继续在国际范围蔓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性关系和代际关系方面，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一些被战争年代右翼人士视为“放纵”的行为，现在已比以前任何时候普遍得多。

但是，意欲反对这些发展的极端主义运动所得到的支持是比较少的。因此，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不是解释反进步右翼政治势力为什么复活，而是说明其为什么衰落。有一种解释认为，导致这种势力政治上明显软弱无力的原因似乎在于，支持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留在农业上的人口比例已大大减少，同样，住在小城镇的人口比例也大为减少。相反，与后工业社会崛起相一致的职业和教育趋势则显示，从事需要受过高级教育之职业的人数有了迅速增加。这些发展同时导致参与宗教活动——特别是正统宗教活动或原教旨主义宗教活动——的人口比例的下降；作为一种现象，这既刺激传统主义者发起反进步的卫道运动，又阻止他们起重要作用。⁸⁶从现象上看，复兴右翼极端主义的努力之所以徒劳无功，是因为支持其存在的传统社会基础的倾颓。

好斗抗议活动的衰落也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普遍繁荣相联系。战后几十年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严重萧条的最长时期。这是大

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英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的一个持续发展期,人均国民收入有了很大增长,社会地位晋升的机会也有所增加。当然,这期间也出现过不景气和通货膨胀,但较战前来得缓和,持续时间较短。虽然许多人遭受了经济倒退之害,但没有以前那样严重,那样广泛。因此,经济不满情绪不足以为好斗政治煽动火上加油。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瑞士发生了针对外籍工人的大规模排外运动,当时正是一个经济严重衰退期。

在没有严重经济危机或国家安全没有受到重大国际挑战的情况下,右翼极端主义政党要重新作为对发达国家民主进程的主要威胁而出现,似乎已没有什么可能性。换言之,看一下20世纪60年代以来复活极端主义的努力,最堪注意的是这些努力已不能动员有影响的追随者。这种运动很少能得到多于5%的选票。而且,无论怎样评价各种新右翼的政治行为,它们的支持者都很少被指责参与极端主义活动,尽管存在一些新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小组织。大体上说,反进步的卫道势力已融入教会和保守政党或宗教政党。

投票行为和后工业社会中的民主式阶级斗争

前面对投票行为的分析强调指出,在“各个现代民主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是通过政党体现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本书第七、八、九三章讨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资料。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在政党构成及其赢得支持中起重要作用,如宗教因素、地域因素、种族因素和代际因素。⁸⁷

然而这种综合在本书出版以来的岁月里已经变得有些过时。一份研究瑞典——在这个国家,投票行为与阶级地位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密切——选民行为的报告揭示了一种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共有的发展趋势。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指出:“有些关于瑞典民众政治行为的研究发现,自1964年以来出现一种社会阶级地位对政治行为的影响逐渐减弱的长期趋势,而且……一个研究者还看到选民中有一种不稳定性

日渐增加的长期趋势。”⁸⁸

欧洲过去存在的那些阶级意识比较明确的表现形式似乎在没落，阶级在先进工业社会作为政治斗争之源已远不像以前那样重要。图 14.1 表示 1952 年到 1980 年瑞典、联邦德国、英国、美国阶级投票行为的变化。图中纵坐标所用奥尔福德(Alford)指数是表示投票支持左翼政党的体力工人和非体力雇员的比例之差。⁸⁹ 因此，指数越高，阶级与政党偏爱之间的相关性越大。正如图 14.1 所证实，在一些先进工业国家，与阶级相联系的投票行为已明显失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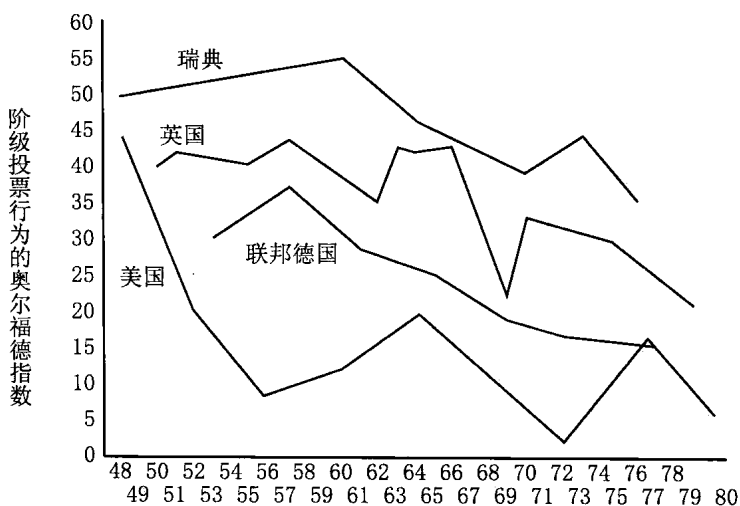


图 14.1 1948—1980 年西方 4 个民主国家阶级投票行为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英国资料：1950—70；John W. Books and J. B. Reynolds, “A Note on Class Voting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8(October 1975), pp. 360—75.

1974 年和 1979 年的英国资料是经过计算的，原始数据来自 Samuel E. Finer, *The Changing British Party System, 1945—1979*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0)。

瑞典资料：John D. Stephens, “The Changing Swedish Electorate: Class Voting, Contextual Effects, and Voter Volat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3(July 1981)。

德国资料：Kai Hildebrandt and Russel J. Dalton, “The New Politics: Political Change or Sunshine Politics?” in Max Kaese and Klaus von Beyme, eds., *Elections and Parties: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of 1976*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78), pp. 69—96.

美国资料：1948—72；Paul R. Abramson, “Class Voting in the 1976 El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40(January 1978), pp. 1066—72. 1976 年至 1980 年资料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时报》的事后民意测验结果计算的。

对发达社会中阶级和政治关系的变化,可以在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即假设技术水平决定社会形态——内加以分析。当代某些分析家认为,与阶级相联系的政治之所以在没落,是因为这些系统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他们称这种步入新阶段的系统为后工业社会。

这种社会之所以是后工业的,在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趋势——进入工业生产机构的劳动力日益增加,大工厂、大农场的发展,等等——已告终结。迅速发展的不是生产性工作,而是服务性的第三产业。体力工人的比例(有些国家是绝对数量)正在减少。大发展的职业是白领工作、技术工作、专业工作、科学工作和重在服务的工作。因此,现在的阶级结构已变得类似于菱形,中间远比金字塔形膨大得多。高水平的教育为这种经济所必需,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许多倍。教育、科学和智力活动已变得更加重要。

西方学者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阿兰·图雷恩(Alain Touraine)和东方学者如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雷多范·里奇塔(Radovan Richta)及其同事,以及苏联的分析家,如P. N. 费多谢耶夫(P. N. Fedoseev)、V. 科索拉波夫(V. Kosolapov)、V. G. 阿法纳西耶夫(V. G. Afanasyev)都强调理论科学知识在改变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道德态度的同时,已成为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这是赋予科学技术精英以相当大声望和权力的一种发展。苏联学者和政治领导人谈论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概念非常接近后工业社会的概念。⁹⁰用苏联社会学家皮奥特尔·费多谢耶夫的话来说,科学技术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场根本性的质变,其原因在于科学已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⁹¹。里奇塔等在1968年指出:“科学正在表现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变量……有迹象表明存在新的成长形式,生产力结构的不断变化带来了新的动力,生产资料和人力的资源已变得不如提高它们的利用质量和利用程度来得重要。”⁹²他们接着谈到“工业和有关活动所吸收劳动力的数量已相对下降”,并展望“在未来几十年,第三产业部门将容纳工业国家全国劳动力的40%到60%,而美国现在已经是这样”。⁹³图雷恩,尽管他是法国左翼运动的支持者,也认为,由于这些发展,西方权力的基础已经改变。“如果说财

富是以前统治阶级成员的标志,那么今天的统治阶级是用知识和一定的教育水平来衡量的。”⁹⁴

对后工业社会的大部分分析可以视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相一致(或由其所导出),它们毕竟都是基于同一方法论前提:社会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结构的变化,而文化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是随技术的基础水平变化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这种方法的一些关键性倡导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丹尼尔·贝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阿兰·图雷恩和雷多范·里奇塔。正在涌现的后工业主义阶层——其根源在大学,在科学界和知识界,主要代表公共部门和专业领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价值。按照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看法,这些价值——他称之为“后实利主义”价值(或“后资产阶级”价值)——与特定的“自我实现”需求有关,表现为追求一种更少非人格化的、更纯洁、更有教养的社会,追求比较自由的个人生活,渴望政治行为和社区生活的民主化。这些追求和向往是与主宰工业社会传统阶级的那些需求——更迷恋满足物质需要,亦即生计和安全——背道而驰的。对于具有这些价值目标的人来说,突出关心的是高标准的生活、稳定的经济、经济的增长、持久的家庭生活、打击犯罪和维护秩序。⁹⁵

另一个谈论到价值变化的学者斯科特·弗拉纳根(Scott Flanagan),对这些价值差别作了新表述和扩展。他指出,先进的技术已导致传统意识向崇尚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意识转化,转化“沿着四个方向:从克己向纵欲,从笃信主义向世俗主义,从顺从向独立,从膜拜权力向坚持自主”⁹⁶。英格尔哈特也注意到这些价值变化与普遍富裕的环境和没有大战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达成年的几代人,与在经济匮乏中成长、经历过严重萧条和国际冲突的前辈人,有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尽管存在代际效应,但后资产阶级价值,显然在受过较好教育和比较富裕的人当中流行得多。

这些表述是重要的,虽然可以对其中有关实利兴趣下降的假设提出质疑。艾伦·马什(Alan Marsh)在分析英国资料时发现,“后实利主义者”就个人而言并不是反实利的。他的研究显示,实利主义者和后资产阶级在事关“没有足够的钱,或经济欠债,或需要额外收入”这样一些问题的

态度上,没有区别。构成这两类人区别的不是他们对实利主义的态度,而仅仅在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马什注意到,“后资产阶级群体是以他们比较年轻、比较富有、比较有教养和关心意识形态问题区别于实利主义者的。”⁹⁷

不管我们称这种价值取向变化为什么,它已深刻影响到政治领域。正如英格尔哈特所说:“这些假设的政治含义是显著的。首先,它们意味着日渐增长的繁荣不会带来政治冲突的终结,而‘意识形态终结’的论点似乎指望会这样。尽管这个论点有部分正确性:日渐增长的繁荣显然已使社会阶级冲突的传统形式衰落,但它没有料到,当新目标浮现时,冲突的新基础会出现。”⁹⁸工业社会的基本政治冲突是实利主义的,涉及围绕财富和收入分配进行的斗争,同时还交织着前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和区域冲突。不过,后工业政治则越来越涉足非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清洁的环境、良好的文化、妇女和少数派的平等地位、教育质量、国际关系、更大程度的民主化、更宽容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在触及家庭问题和性问题时。

这些问题为政治分歧提供了新的基础,它们不同于工业社会的那些基础,引发了多种“单一问题”抗议运动。由于现存政党发觉自己难以使它们对这些新问题的立场与支持它们的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相协调,所以政党忠诚和平均投票率在许多国家已不如以前。实际上,来自不同经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交叉压力已削弱了政党忠诚的重要性;以前,这种忠诚是与工业社会冲突的结构根源相联系的。

关注后实利主义问题或社会问题的改革因素,主要不是从工人和无特权者亦即工业社会左翼社会基础吸取力量,而是从受过良好教育者、大学生、研究人员、新闻记者、专业人员和文职人员的富裕部分吸取力量。“新左派”、“新政治派”、“绿党”,统统从这些阶层得到支持。而大多数工人仍然只关心物质问题。他们受教育较少,缺乏世界性视野,不富裕,无安全感,也更加崇尚传统,在社会观点上明显较为保守。

因此,现在有两种左派:“实利主义”左派和“后实利主义”左派,它们分别根植于不同的阶级。围绕影响经济成长之政策的后果问题,两者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实利主义左派希望不加区别地不断成长,以至于可使无特权者得到较多,而后实利主义者更关心生活的质量。正如黑人政

治学家威拉德·约翰逊(Willard Johnson)所说,后实利主义左派“以忽视穷人事务的价值观讨论问题是有罪的,尽管他们是仁慈的。……无疑,他们的关注有助于认真考虑生活质量,但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对物质产品能对生活质量作出贡献有所误解。”⁹⁹ 或者像英国多届工党政府的阁员、已故的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所认为,那些寻求限制增长以保护环境的人,是“仁慈的,有献身精神的。但是,他们是富裕的,从根本上说,他们想过河拆桥,当然不是有意识的”¹⁰⁰。

这两种左派常常在同一党内(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如在意大利),但是它们有不同的观点和利益。一位评论家发现这两派之间有共同点,也发现马克思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有冲突,其根据是:两者都赞成平等,但却对经济发展在实现平等中的作用有不同看法。¹⁰¹ 新政治派知识分子不喜欢工会。工会像商业一样,考虑的是“实利”,而不是“公众利益”。结果,某些工人向右转,转向比较保守的组织,拥护成长,支持一种竞争的流动社会,依然相信传统的社会价值。然而,这种左派却从日渐壮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得到支持,因而削弱了阶级与政党在投票得票上的相关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逻辑,作为最发达国家,美国应当首先显示后工业主义特色的政治。资料似乎证实了这个假设。正如让-弗朗科伊斯·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1971年所指出:“过去10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动人事件发源于美国。……我的意思是说,出现了一系列称之为‘不同政见’运动的新对抗现象。”¹⁰²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批判的知识界已经形成,在民主党内引起了“改革”运动,后来被贴上“新政治派”标签的活动即自此始。“纽约、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的政治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在城市和郊区的改革俱乐部中,有数量可观的选民受过大学教育,有社会活动能力,关心社会问题。”¹⁰³

20世纪60年代目睹了“新政治派”的充分发展,其形式表现为反对越南战争、争取公民权、要求妇女解放和同性恋解放、鼓吹环境主义,以及新生活方式的涌现。琼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强调:“基本文化符号登上政治舞台已成为我们时代政治的一个固定特征。随着先锋派文化的传播——通过增加大学入学人数、电子媒介和大量发行刊物,反资产阶级态度……已成为20世纪60年代反体制政治的基础。……现在

清楚地看到,来自相对有地位阶级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代表,发动了对传统文化的攻击,而不富裕的、少教育的、低地位的公民却在捍卫社会的基本制度。”¹⁰⁴

“新政治派”(New Politics)左派和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传统左派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民主党内。民主党在1968年和1972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可以部分归因于老左派与新左派的分裂。正如图14.1所显示,美国阶级投票行为在1952年和1956年低落,1960年和1964年上升,1968年和1972年下跌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1976年上升,1980年复低落。自1952年以来,凡民主党取胜的选举都是处于阶级投票行为上升期。1952年和1956年,民主党失败的总统候选人是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他常常被称为美国新政治派现象的始作俑者。他有意地回避新政(New Deal)的那些与经济 and 阶级冲突有关的争端,强调文化和社会问题。

阶级投票行为在1960年稍有回升,这主要反映约翰·F.肯尼迪对没有地位的天主教少数民族选民的特殊吸引力。1964年出现大幅度回升,当时,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主张取消许多福利国家和亲工会的政策,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则强调新政的改革措施。1968年,新政拥护者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他之所以失去左右两派的支持,是因为非经济问题的突出。许多蓝领选民支持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是对汉弗莱坚持公民权立场的反应,而初选中支持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或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的新政治派左派之所以不支持汉弗莱,是因为他对结束越南战争缺乏信心,以及他与老政治关系密切。

这些因素继续影响以后10年的选举行为。1972年,新政治派左派为它的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赢得了民主党总统提名,但在大选中遭到了惨败。麦戈文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个没有得到劳工运动(劳联—产联)支持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与之相对应,许多蓝领选民抛弃了民主党,支持理查德·尼克松,而尼克松是捍卫传统价值、法律和秩序的。民主党内两个左派的分裂可以在流行称呼中看到,如说汉弗莱代表党内得到工会支持的一翼,把麦戈文说成“大赦、流产和麻醉

品”的候选人。可是,4年以后,民主党有条件入主白宫了;当时,两大党提名的候选人都被视为社会保守派。于是,许多以前支持尼克松或华莱士的工人回到民主党一边,支持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198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涉及吉米·卡特与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直接对抗;前者被视为社会保守派,后者属新政治派,主张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问题上,也寻求得到工人和少数派的支持。然而民意调查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候选人偏爱有明显相关关系:没有地位的选民和上了年纪的选民支持在任者卡特,而比较富裕的、受过较好教育的、较年轻选民支持他的对手肯尼迪。

可是,后实利主义者发现两大党提名的候选人里根和卡特都不能令人满意。1980年竞选的大部分时间,持这种意见的人支持一种独立的选择——强调开明社会自由主义的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1980年6月27日《纽约时报》的一整版广告中,安德森的竞选班子以它的候选人在如下5个问题上的记录呼吁选民支持:主张保护环境,要求扩大公民权,拥护平等权修正案,主张对穷人流产给予联邦资助,要求减少过多的政府管制。民意测验表明,安德森的力量(7月达到高峰,支持者约占22%)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人、大学毕业生、专业人员、犹太人和自我认同的自由主义者。安德森8月发表的长达300页的“纲领”声明,在经济问题上是比较保守的,而在社会问题和外交问题上极为自由的。民意测验还显示,安德森的支持者比卡特的支持者,主张社会自由的、富裕的和受过较好教育的要多得多。工会强烈反对安德森,支持民主党提名人。

在1980年选举中,阶级因素再次降居次要地位。安德森的支持者迅速减少,一如美国第三党候选人的典型命运。党在社会问题上的态度差别比1976年重要。共和党明确拒绝新政治派的许多社会计划,反对平等权修正案,反对政府给穷人流产以资助,反对旨在加速种族融合的有关措施,如用校车接送少数种族学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把他的竞选运动与宗教团体的努力相联系;这些团体主张合于福音的高道德标准,反对支持新社会宽容的政治家。

虽然吉米·卡特试图避免与他党内的新政治派所拥护的社会政策有瓜葛,但他不能与他们公开决裂,希望保持他们的支持。因此,社会问题在1980年选举结果中起的作用比4年前多少大一些。

正如让-弗朗科伊斯·雷维尔所强调，“美国新式样”的行动主义、单一问题抗议运动和激进的文化政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扩展到发达世界的其他地区，发达世界已在步入后工业主义阶段。欧洲所有国家都发生过起源于校园的抗议。根植于新中产阶级群体的一些有相当可观力量的左翼倾向，已对社会党以温和工会为基础的领导层提出挑战。不过，这些发展是“美国原型的重复，或是其扩展和后继……欧洲的不同政见者是美国运动的追随者，代表着能把左右翼、东西方从学究式麻木中唤醒的唯一力量”。¹⁰⁵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由于核电站的争论而受到削弱；这个党积极实行超发展措施，以此作为达到一种“较好、较公平世界”的最佳手段。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党内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学生是反核能的，而工会坚决支持建立更多的核电站。这种分歧严重损害了党的选举努力，因而促成了该党 44 年中第一次失败。从选举结果看，主要胜利者是中央党——一个反发展、反核能最积极的政党。一个分析家总结核能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问题说：“瑞典选民难以使核能争论适应他们习惯的政治思维模式。年轻的左翼认为，中央党核能政策是对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打击。在对待核能问题的态度上，政党之间通常存在的左右分野崩溃了：中央党持左翼观点，社会民主党持较右的观点。”¹⁰⁶

这种分歧还需澄清。在 1980 年 3 月核电站公民投票期间，社会民主党继续分化。党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公开支持最反核的意见，站在中央党一边。左翼内部的这种分裂影响了劳工运动的总力量。1980 年 5 月，瑞典总工会(LO)发起一次总罢工。对于这次罢工，一次全国民意测验表明，只有 25% 的被测对象表示支持，虽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选举得票率保持正常，接近 50%。一些政治观察家发现，对这次罢工的态度受到劳工运动在公民表决中扮演亲核角色的影响。在罢工高潮，一个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兼环境保护主义者在瑞典一家大报上著文批评工会运动，指责它搞愚不可及的实利主义，“无非想得到更高的生活水准，而这是在已经自称拥有世界最高生活水准的国家”¹⁰⁷。

在法国，两种左派之间的分歧在许多方面对 20 世纪 70 年代左翼联盟(Union de la Gauche)及其共同纲领的崩溃负有责任。起初，围绕后实利主义问题的冲突很难在左翼政党之间结成联盟。社会党和法国工人民

主联合会联盟都对共产党和共同纲领持极端批评态度，两者在新中产阶级中都拥有很多支持者，但对发展问题有分歧。“在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看来，共同纲领所依据的逻辑与资本主义理论家建议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同：以生产和利润的高水平为唯一标准。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以支持重质量胜于重数量的‘新成长模式’的姿态出现。”¹⁰⁸

虽然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78年选举以前一直维持不稳定的联盟，但这些分歧证明对左翼联盟是致命性的。让-路易·穆伊内特(Jean-Louis Moynet)(共产党控制的法国总工会的书记)把共产党的选举失败解释为：“共产党和总工会(CGT)在最低工资、国有化，甚至妇女权利、生态、核威胁、教育之类它们缺乏兴趣的问题上，采取固执和不妥协立场的结果。”¹⁰⁹法国共产党历史学家让·埃伦斯坦(Jean Ellenstein)在1978年也认为，他的党之所以失去支持，是因为没有重视社会问题。他注意到，未来的支持者“已不一定对共产党在竞选运动中采取的‘无产阶级’方式感到舒服。……他们日渐关心质量问题，即使某些数量问题继续存在”¹¹⁰。

联邦德国的选举行为说明这个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在魏玛共和国和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传统阶级分野决定左右翼政党的力量，而那时“划分集团的问题基本上是同经济问题和保障问题有关”。从60年代开始，包括文职人员和拿薪金者在内的新中产阶级“对新政治性社会问题”采取“自由主义立场”，而老中产阶级、自营职业者对“新政治像对老[实利主义]政治一样”持保守态度。不过，工人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变，脱离新中产阶级，从老政治冲突中的左翼姿态转向对新政治问题持较保守的态度”。某些观察家预期：“随着后实利主义问题和价值在政治中变得越来越占优势，随着它们对德国选民的日益富裕部分变得越来越突出，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将继续减少其重要性和清晰性。”¹¹¹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日本，而且那里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比其他国家都迅速。许多日本人，虽然尝到了迅速发展的甜头，但对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日益感到不安。据1971年资料：“在日本，认为环境污染是国家头等大事的人数是把进一步经济发展视为国家头等大事的人数的7倍。消费者抗议的次数……在1962年到1970年间增加27倍，而事关污染的抗议和请愿在最近3年翻了一番。”¹¹²

日本选举舆论资料的一个分析家断言：“价值问题重要性的日渐增加，似乎部分要对职业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相关性的削弱负责。由于经济冲突和价值冲突是交叉的，所以为了更充分地预测投票行为，有一个能测度价值问题相对重要性的第三维是必要的。我曾指出，那些由于价值偏爱和所在职业阶层而受到交叉压力的选民，如果他们较重视非物质的优先考虑和价值问题，他们往往按他们的价值偏爱投票，而如果他们赋予物质优先考虑和经济问题以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则倾向于按他们所在职业阶层投票。”¹¹³

奇怪的是，阶级政治最先解体的国家是丹麦。那里，“工人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例，从1957年占80%，下降到1973年占39%。……而保守党1957年得到全体雇主中39%的支持，197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9%”¹¹⁴。支持两个新左派小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今天不是以与工人阶级有密切接触为特征。它们的选民比较年轻，比普通选民受的教育好，其中还有少数人为了得到学术性或半学术性职位仍在受教育”¹¹⁵。正如莫根斯·彼德森(Mogens Pedersen)所强调：“从比较的观点可以认为，这种发展——其基本特征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政党制的解体——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发展没什么两样，至少就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而论。社会阶级在各地都倾向于失去重要性。”¹¹⁶

这些发展对工人阶级未来几十年的影响预示什么？答案部分取决于后实利主义政治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如果经济繁荣是这些新价值得以出现的最重要变素，那么当经济出现严重混乱时，我们可以预期它们将低落。但来自联邦德国的证据表明，即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经济不景气，新政治仍有坚实的基础。马克斯·卡斯(Max Kaase)和塞缪尔·巴恩斯(Samuel Barnes)认为，后实利主义“显示大量结构成分，因而具有永久性，不能仅仅认为是年轻人的时尚。……将来的政治将逐渐变成后实利主义政治。……这不意味着物质价值无关紧要，它们仍将继续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后实利主义价值变得相对比较重要，这里是指在我们看到后工业社会扭曲的潜在根源的场合”。¹¹⁷ 如果后实利主义政治是一种与职业结构转变相关的结构性现象，那么新政治的支持力量应当增加，因为工业部门以外的的工作数量在日益增多，而这些工作的持有者多半更倾向反对成长。

使阶级与政党的相关性削弱的因素,不限于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者行列中产生数量可观的后工业新左派的那些因素。如所指出,这种变化也涉及无特权者的数量日趋增多,其中包括许多工人,他们支持较保守的政党。一些研究这种现象的学者指出,这反映工人阶级社会封闭地位的崩溃。许多工人现在以中产阶级为邻,采取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接受高教育机会的增多和职业结构的普遍升级,如前指出,已改变了阶级结构的形态。结果,许多出身低微的人得到了晋升。这样一些因素多半使许多工人在政治观点上变得更加保守。

不过还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后工业主义推动的文化变革在改变低教育、无特权者的政党忠诚方面也起了一种成因作用。正如第四章所指出,低教育者在社会问题或非经济问题上往往比较保守。他们更相信家庭、性、爱国主义、法律和秩序方面的传统价值,对待少数民族群体的地位,有更多的偏见。因此,后工业知识界提倡的价值和行为深深触怒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因为这些变化在许多国家与左翼政治相一致,而较保守的政党一般又支持传统价值,所以后工业问题进入政治助长了无特权者向右转化。于是看到,一方面,后工业主义趋势为左翼提供了来自较富裕、受过较好教育阶层的新支持源,而反其道而行的社会保守主义则有助于中右政党从无特权、低教育阶层获得支持。

虽然阶级与政党的相关性已大为削弱,但重要的是要看到,工业社会的阶级政治分野仍然在决定党派支持中起主导作用。左翼选民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受剥夺较多的阶层,而保守政党依然超比例地依靠较富裕的阶层。除此之外,在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工会通过日益参与经济计划过程获得了新的影响源。而这些国家的许多精英分子通常也把经济成长视为必不可少的,要求有组织的劳工予以支持。总之,工人阶级将继续通过他们被称之为“瓦解力”的那种作用,保持其社会经济影响。

结 论

最后,我想重申我在《政治人》1963年平装版引言中的结论。在那里,

我回答了左翼的批评，他们反对我对民主政治秩序条件的强调；作为一种朴素的关注，我强调的与其说是比较重要的基础经济结构，不如说是政体。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竟对社会主义历史不甚了了，以致认为关心政治民主必然反映对经济力量和社会变革现实的天真，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种问题感兴趣。精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从19世纪60年代到俄国革命的欧洲所有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表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继续或扩大政治民主。例如，马克思的伟大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1年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能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¹¹⁸如果谁说这是断章取义，或是恩格斯老年昏聩所言，那么还可以用一本权威不亚于斯大林本人的著作作证：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作出重大修正以前，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一度著名的《联共党史》——在斯大林严格监督下写成，后来直接归功于他——这样写道：

在第二次俄国革命[1917年2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恩格斯在1891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么党、我国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¹¹⁹

许多极权国家的近期历史表明，各种国家干预政策是与自由的目标不相容的。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拒绝接受这些干预措施，实际上是在维护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在其中起过关键作用的民主左翼的传统。而那些寻求扩大民主、减少层次弊端的个人和政党，则是19世纪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的正

统继承者。

注 释

1. 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p. 354.
2. Talcott Parsons,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World Politics* 13(October 1960); 113—114.
3. Talcott Parsons,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in Max Black, ed., *The Social Theories of Talcott Parsons*(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1), p. 362.
4.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o Machiavelli*, trans. W. Stark(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0), pp. 338—345.
5. *Ibid.*, p. 337.
6. Karl Marx, *Capital*, Vol. I(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3), pp. 8—9.
7. Howard Quint, *The Forging of American Socialism: Origins of the Modern Movement*(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3), p. 380.
8. R. L. Moore, *European Socialists and the American Promised Lan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8, 77, 102.
9. 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White Plains, N. J.: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p. 15.
10. Jane Elizabeth Good, "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Five Russian Radicals Visits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08"(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merican University, 1979), p. 231.
11. Moore, *European Socialists*, pp. 78—79.
12. Daniel De Leon, *Flashlights of the Amsterdam Congress*(New York: New Labor News Co., 1904), p. 133.
13. James D. Young, "Daniel De Leon and Anglo-American Socialism," *Labor History* 17(Summer 1976), p. 344.
14. Max Beer, *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sm*(London: Allen & Unwin, 1935), pp. 109—110.
15. Leon Trotsky, *The Living Thoughts of Karl Marx*(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39), pp. 38—39.
16. Seymour Martin Lipset, "Radicalism in North America: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Party System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series 4, 14 (1976): 19—55; Lipset,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weryn Bialer and Sophia Sluzar, eds.,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pp. 31—149,

346—363; Lipset, *Why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forthcoming).

17. Walter Dean Burnham,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tics of Heterogeneity," in Richard Rose, ed., *Electoral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4), p. 718.

18. V. I. Lenin, *On Britai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n. d.), p. 51; John R. Commons, "American Labour History. Introduction," in 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p. 5; Selig Perlman,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28), pp. 167—168; Moore, *European Socialists*, p. 110; Lipset, "Why No Socialism?" pp. 58—59.

1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p. xii—xiii.

20. Serge Mallet, *Essays 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5), p. 48.

21.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 56.

22. Robert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apter 5. 我也对民主的条件作过详细说明, 见 S. M.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expanded paperback edition), 特别见 pt. 3,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205—348.

23. Phillips Cur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April 1963): 253—264; Marvin E. Olse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October 1968): 699—712; Donald J. McCrone and Charles F. Cnudde, "Toward a Communications Theor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asual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March 1967): 72—79; Gilbert R. Winham,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asual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September 1970): 810—818; Larry J. Diamond,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The Case of Nigeria"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1980).

24. Cu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260; Ols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p. 706.

25. Diamond, "Social Foundations," pp. 90—91.

26. *Ibid.*, p. 90.

27. Rafael Lopez-Pintor, "Transition toward Democracy in Spain: Opinion, Mood, and Elite Behavior" (unpublished paper,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

logicas, Mad Reid, October, 1980), pp.11—12.

28. Lopez-Pintor, "Transition toward Democracy," p.11.

29. Diamond, "Social Foundations," p.90.

30. Alex Inkeles and David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31. Alex Inkeles and Larry J. Diamo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Alexander Szalai and Frank M. Andrews,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Comparative Studies*(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0). pp.73—109.

32. Inkeles and Diamond, "Personal Development," p.83.

33. *Ibid.*, pp.103—104.

34. Diamond, "Social Foundations," p.106.

35. Dankward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352.

36.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46.

37. Diamond, "Social Foundations," p.122. 引自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LaPalombara and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4—18. 另见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p.46.

38. Mildred Schwartz, *Trends in White Attitudes toward Negroes*(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967); Angus Campbell, *White Attitudes toward Black People*(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71); James M. Jones, *Prejudice and Racism*(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2); Thomas Pettigrew, *Radic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Harold E. Quinley and Charles Y. Glock, *Anti-Semi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Nancy Henley and Fred Pincus, "Interrelationship of Sexist, Racist, and Anti-Homosexu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2 (1978): 83—90; John Harding, Harold Proshansky, Bernard Kutner, and Isidor Chein, "Prejudi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5(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pp.27—29.

39. H. J. Eysenck, "Social Attitudes and Social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September 1971): 205.

40. Edward N. Muller, Pertti Pesonen, and Thomas O. Jukam, "Support for Freedom of Assembl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8(September, 1980): 265—288.

41. Leonard I. Pearlin and Melvin L. Kohn, "Social Class, Occupation, and Parental Values: A Cross-National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August 1966): 478.

42. Melvin L. Kohn and Carmi Skooler, "Class, Occupation, and Orien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October 1969): 676.

43. Bruce P. Dohrenwend and Edwin Chin-Shong, "Social Status and Attitude toward Psychological Disorder: The Problem of Tolerance of Devi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April 1967): 433.

44. Lewis Lipsitz, "Working-class Authoritarianism: A Re-evalu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February 1965): 103—109; Gary B. Rush, "Status Consistency and Right-Wing Extrem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February 1967): 86—92; Maurice Zeitlin, "Revolutionary Workers and Individual Libe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March 1967): 619—632.

45. Howard Gabennesch, "Authoritarianism as World 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March, 1972): 857. 其中说明了教育与一种更具世界性的权力主义观之间的关系,指出这种权力主义观在缺乏复杂感的人当中有“具体化”为干预机制的趋势,见 pp. 857—875。

46. B. G. Stacey and R. T. Green, "Working-Class Conservatism: A Review and an Empirical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0 (February 1971): 21, 24.

47. Richard Hamilton, "A Research Note on the Mass Support for 'Tough' Military Initiativ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June 1968): 439—445.

48. Martin Patchen, "Social Class and Dimensions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1(December 1970): 662.

49. *Ibid.*, p. 663.

50. Marvin Olsen,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Social Protest Actions," *Social Problems* 15(Winter 1968): 297—310; Joe Spaeth, "Public Reactions to College Student Protes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2(Spring 1969): 199—206; John Robinson, "Public Reaction to Political Protest: Chicago 1968,"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Spring 1979): 1—9; William Gamson and James McEvoy, "Public Violence and Its Public Support," in James Short and Marvin Wolfgang, eds,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Aldine, Atherton, 1972), pp. 329—342; H. Edward Ransford, "Blue Collar Anger: Reactions to Student and Black Prot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June 1972): 333—346; Marvin Olsen and Mary Baden, "Legitimacy of Social Protest 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2 (Fall 1974): 173—189; Robert Hall and Saul Rosenthal, "Education and Antagonism to Protest"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ircle, August

1980).

51. Olsen and Baden, "Legitimacy of Social Protest Actions," p.184.

52. Ransford, "Blue Collar Anger," p.345.

53. Edward G. Grabb, "Work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Tolerance of Out-groups: A Reassess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3(Spring 1979): 45, 44.

54. Walter Korpi, "Working-class Communism in Western Europe: Rational or Nonration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December 1971): 978.

55. *Ibid.*, p.976.

56. Sidney M. Peck,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The Conservative Bias of Lipset's 'Political Man,'"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23(Summer 1962): 128—155.

57. Robert D. Putnam,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6), p.116.

58. S. M. Miller and Franc Riessman, "Working-class Authoritarianism, A Critique of Lipse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2(September 1961): 272.

59. 关于美国右翼极端主义运动支持来源的综合分析可见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60.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p. xviii—xix.

61. 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s as Insider*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8), p.96.

62. Henry Ashby Turner, Jr., "Fascism and Modernization," *World Politics* 24(July 1972): 550;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64), p.4.

63. Wolfgang Sauer, "National Socialism: Totalitarianism or Fasc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3(December 1967): 417.

64. Juan Linz, "Some Notes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sc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56.

65. Peter H.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Swastika: 581 Early Naz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6.

66. Linz, "Some Notes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pp.26—27.

67. Theodore Abel, *The Nazi Movement* (New York: Atherton, 1965), p.5,引自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p.63.

68. James M.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p.9—10.

69. Merkl, *Political Violence*, p. 63.

70. Clara Zetkin, "Der Kampf gegen den Faschismus," protocol of the Enlarged Executiv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转引自 Francis L. Carsten,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in Laqueur, ed., *Fascism*, p. 418.

71. Gino Germani, *Authoritarianism, Fascism, and National Populism*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8), p. 47.

72. Sauer, "National Socialism," p. 420.

73. Ernst Nolte, *Die faschistischen Bewegungen*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6), pp. 189—190. 转引自 Carsten,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pp. 426—427.

74. Hans Rogger, "Afterthoughts," in Hans Rogger and Eugene Weber, eds., *The European Right: A Historical Profi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p. 577, 578—588.

75. A. J. Gregor, "Fascism and Modernization: Some Addenda," *World Politics* 26(April 1974): 370—385.

76. Linz, "Some Notes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scism," p. 15.

77. J. L. R. Martin, "Swiss Policy on Immigrant Workers and the *überfremdung* Initiatives: A Study in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and Direct Democracy"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1979).

78. Risto Sankiahho, "A Model of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Support for the Finnish Rural Party,"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6(1971): 41.

79. Mogens N. Pedersen, "Denmark: The Breakdown of a Working Multi-party System" (unpublished paper, Odense University, Odense, Denmark, 1979), p. 51.

80. David R. Schweitzer, "Status Politics and Conservative Ideology: A French-Swiss Case in 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September 1977): 398.

81. Marin, "Swiss Policy," pp. 338—344.

82. Martin, "Swiss Policy," Abstract, third page.

83. "Gollum and Friends," *Economist*, October 11, 1980, p. 56.

84. Mattei Dogan, "political Cleavage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France and Italy," in S. M.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 159.

85. Gerhard Loewenber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rman Party System," in Karl Cerny, ed., *Germany at the Polls: The Bundestag Election of 1976*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8), p. 23.

86. 见我即将发表的论文,“The Revolt against Modernity,”in Irving Louis Horowitz, ed., *Modernization versus Traditional Values*. 该书详细讨论了宗教运动和其他反进步运动的问题。另见 S. M. Lipset and Earl Rabb, “The Election and the Evangelicals,” *Commentary* 71 (March 1981): 25—31。

87. 关于影响选民分野的因素,见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in Lipset and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64。

88. John D. Stephens, “The Changing Swedish Electorate: Class Voting, Contextual Effects, and Voter Volat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4 (July 1981)。

89. Robert Alford, *Party and Society: The Anglo-American Democracies* (Chicago: Rand-McNally, 1963)。

90.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Alain Touraine,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es, Conflicts,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J. Gu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978); Piotr N. Fedoseev,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7 (June 1975): 175; Ferkiss, “Daniel Bell's Concept,” p. 97. 另见 V. G. Afanasyev,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91. Fedoseev, “Social Significance,” p. 152。

92. Radovan Richta et al.,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and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te Plain, N. Y. L International Arts and Humanities Press, 1969), p. 39。

93. Richta et al., *Civilization at the Crossroads*, pp. 120—124; David R. Cameron, “Postindustrial Change and Secular Realignment”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pp. 17—47; Todd La Porte and C. J. Abrams, “Alternative Patterns of Postindustrialism: The California Experience,” in Leon N. Lindberg, ed.,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David McKay, 1976), pp. 28—36;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pp. 92—136; Alvin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1979), p. 15; Sidney Pollard, “The Rise of the Service Industrial and White-Collar Employment,” in Bo Gustafsson, ed.,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1979), pp. 17—47。

94. Tourain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p. 51; Gouldner, *Future of Intellec-*

tuals, p. 83.

95.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December 1971): 991—1017; iden,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iden, "Value Prioritie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Samuel H. Barnes et al., eds.,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p. 305—343.

96. Scott C. Flanagan, "Value Change and Partisan Change in Japan: The Silent Revolution Revisited," *Comparative Politics* 11 (April 1979): 274.

97. Alan Marsh, "The Silent Revolution, Value Prioritie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Brita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March 1975): 28.

98. Inglehart, "Value Priorities," pp. 210—211.

99. Willard R. Johnson, "Should the Poor Buy No Growth?" *Daedalus* 102 (Fall 1973): 174.

100.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4), pp. 77—78.

101. N. S. J. Watts, "post-Material Values and Political Change: Hypothese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Washington, D. C., 1979).

102. Jean-François Revel, *Without Marx or Jesu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1), p. 6.

103. Jeane Kirkpatrick, "Politics and the New Class," in Barry Bruce-Briggs, ed., *The New Class?*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9), p. 43.

104. Kirkpatrick, "Politics and the New Class," pp. 44—45.

105. Revel, *Without Marx*, pp. 6—7.

106. Hans Zetterberg, "The Swedish Election of 1976"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in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in Uppsala, Sweden, August 1978), p. 76.

107. D. Noble, "Sweden Struggles to End Crippling Strike," *Guardian* (London), May 9, 1980, p. 1.

108. G. Lavau,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Trade Unions and Working-class Parties in Franc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3 (Autumn 1978): 453.

109. Lavau, "Changing Relations," p. 451.

110. "Editorial,"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3 (Autumn 1978): 264.

111. Kai Hildebrandt and Russell J. Dalton, "The New Politics: Political Change or Sunshine Politics?" in Max Kaase and Klaus von Beyme, eds., *Elec-*

tions and Parties: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West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of 1976 (Beverly Hill,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8), pp. 87—89.

112. Taketsugu Tsurutani, “Japan as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 Lindberg, ed.,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p. 105.

113. Flanagan, “Value Cleavages,” pp. 201—202.

114. Pedersen, “Denmark.”另见 Ole Borre, “The Social Bases of Danish Electoral Behavior,” in Richard Rose, e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verly Hill,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0), pp. 256—260.

115. Pedersen, “Denmark,” p. 49.

116. *Ibid.*, p. 44.

117. Max Kaase and Samuel H. Barnes, “In Conclusion: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Protes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n Barnes, ed., *Political Action*, pp. 524—525.

118. Karl Marx and Fridrich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 486.

119. A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 P. S. U. (B),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p. 356—357.

第十五章

意识形态的终结：概念及其历史

先进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将以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许多研究者所断言的意识形态“衰落”甚或“终结”为特征，这个命题在 60 年代末期和 70 年代初期曾受到尖锐批评。表面上看，左翼政治以名副其实的“新左派”的形式重现，和基于受排斥因素（种族少数派、女学生）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是证明“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不正确的确凿证据。为了推翻“多元论”政治分析，整个左翼知识分子群都强调这个“错误”。他们论证说，这个命题的基本缺陷已为下述事实所证实：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发言人，特别是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爱德华·希尔思和李普塞特，错误地预言了“意识形态的终结”。¹这种攻击的典型例子是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载的一篇关于一部意识形态著作的评论文章中所作的评论。

在不太久以前，一些人中，特别是雷蒙·阿隆、丹尼尔·贝尔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满怀信心地预言意识形态热情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衰落……当然，事实上，这种预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不言而喻然而却无疑是支持并使现存制度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其实，支持意识形态衰落观点的人要说的，用曼海姆(Mannheim)的话来说，是乌托邦死了……这是错误的……；过去 20 年是以完整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增殖为特征的。²

肯尼思·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行动主义在美国教育界的一名支持者，也批评“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爱德华·希尔思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说法有明显错误。他认为，这些人“缺乏历史视野的”自由主义思路妨碍他们“预期在 60 年代日

渐壮大的青年少数派中不断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理解了”³。

苏联学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哲学教授委员会副会长 L. N. 莫斯克维乔夫(L. N. Moskvichov)，在摘引了雷蒙·阿隆、爱德华·希尔思、丹尼尔·贝尔和李普塞特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之后指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在右翼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中特别流行，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印证他们的‘自由’社会主义、‘富有人类尊严的社会主义’，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思想”。⁴

虽然本章主要是针对左翼批评家的，但应当认识到，正如莫斯克维乔夫所指出的：“有许多持右翼意识形态立场的研究者，对他们来说，理论只不过是导致西方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解除意识形态武装的、不负责任的‘空谈’。”⁵

左翼批评暗含的一个假设是，激进思想家提出了另一种更准确的估计，他们预言了革命政治在西方的复活。一般地说，大多数写批驳文章的人，都是通过嘲弄任何受攻击者从未说过的一些“意识形态终结”的不同说法，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⁶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批评的方式：他们恰恰无视别人讨论新左派出现以前年代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低落的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作为一种现象，这是值得那些对探索社会学知识——或有争论的伦理道德，或干脆说，有意识形态选择特征的记忆——感兴趣的人研究的。因此，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某些历史记载，或许是必要的。

出 处

像其他许多“政治相关”概念一样，“意识形态终结”这一著名说法也首先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一篇文章。恩格斯说，除非支撑各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利益仍然“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⁷ 这里的意思是，就纯意识的存在而论，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意识形态，即对假认识的阐述，将逐渐消失。正如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所指出的：“伦理意识形态的逐渐过时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于社会主

义社会上层建筑时的必然结果。”⁸

政治社会学思想的另一个源头马克斯·韦伯，把各种意识形态随时间的衰落视为社会随时间流逝发生内在转变——从强调“本质合理性”（*Wertrationalität*）向强调“功能合理性”（*Zweckrationalität*）的转变——的结果；这里，本质合理性是指对终极价值的态度，而功能合理性是强调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⁹从根本上说，对绝对目标的狂热信奉必然破灭。正如威廉·德拉尼（William Delany）所指出的：“不断的合理化、去神秘化以及有关的幻灭感是西方宗教制度、资本主义、音乐、官僚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当然，这也是‘海登堡’哲人毕生事业的主题。”¹⁰

在具体谈到当代政治时，韦伯在引述俄国学者莫伊塞·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的著作的同时，坚持认为，意识形态差别的模糊不清，乃是政党在有普选权条件下运作所固有的现象。在1906年就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致罗伯特·米歇尔斯的一封信中，韦伯预言，虽然这个党仍然“有些喜欢绝对的教条”，但它接受政治民主逻辑这一事实，将导致其意识形态信仰的衰落，有利于采取一种较为实用的立场。¹¹

意识形态终结或衰落论点的第一个明确表述也是出自德国。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他20世纪20年代末离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任职务撰写《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以意识形态研究为主题——这本书时，讨论了当时正在导致“意识形态衰落”和“乌托邦破灭”的条件，因为绝对的教条（*Weltanschauungen*）正在转变为不完全然而重实效的学说。¹²曼海姆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重申韦伯假设的主要论点，即韦伯关于从本质合理性向功能合理性的转变为官僚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曼海姆还强调了政治逻辑削弱意识形态信仰的方式，并注意到，当与乌托邦教条有关的运动取得政权或国家权力时，“它越发会放弃原来的乌托邦冲动，以及运动所连带的广阔视野……”¹³

在追溯恩格斯假设——意识形态将随群众压迫的解除而衰落——的非政治含义时，曼海姆指出，这种变化在社会主义没有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因为在他看来，“下层阶级的抱负尚未实现，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奋斗”，而当社会能够“达到工业主义的一种较高级形式——社会有足够的灵活性，并将带给下层阶级某种程度的相对富裕——时，这种奋斗冲动将低落……”（根据这种观点，工业主义社会组织

的这种高级形式——通过下层阶级达至权力位置体现,是否导致有足够灵活性,以致可以使下层阶级得到相对富裕的资本主义,或者,这种资本主义是否首先过渡到共产主义,是无关紧要的。)曼海姆认为,政治领域的这些发展必然在多种形式的精神生活中有其平行表现:

这种全部精神因素——乌托邦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面自毁的过程,在现代生活的最新倾向以及这些倾向在艺术领域的对应发展中,也有其平行表现。我们难道没看到人道主义正在从艺术中消失,“实用性”正在性生活、艺术和建筑中涌现,自然冲动正在体育运动中宣泄?这一切应作何解释?难道不是表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因素正在不断从精神世界——行将主宰当前局势的阶层的的精神世界——退出?政治向经济的逐渐转化——至少有这方面的明显趋势:有意识地拒斥历史和历史时期的概念、有意识地冷落各种“文化观念”,这一切又应作何解释?难道不是表明各种形式的乌托邦也在从政治舞台消失?¹⁴

曼海姆在1929年指出的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20年,似乎已变成现实。那时,对宗教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中多种形式先验本质合理性的信仰之所以崩溃,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已证明行不通,或者已变成用于摆布现实的套话。新教、天主教、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这一切都已失去作为激励西方人民努力工作、道德生活或改造世界的力量。社会或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日渐借助世俗的功能合理性语言——如有效运作的社会秩序或利益集团的代表制——来表达。

最近的表述

这些发展导致许多政治分析家得出意识形态衰落的论断,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运动或工人阶级运动的行为时。例如,艾伯特·加缪(Albert Camus)1946年在巴黎左翼《战斗报》上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者,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绝对宗旨,而约束自己坚持它的批

判性……,将证明这个时代标志意识形态的终结”¹⁵。英国社会学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1949年撰文对完整的意识形态的涨落作了提纲挈领的解释。他指出,完整的意识形态起初是随新阶层的兴起而出现的,例如,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他们寻求公民权,即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权利。只要他们没有这种权利,这些阶层就有相当多的人支持革命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而旧的阶层和制度,寻求维护其对权力和地位的传统垄断,也扶植保守的极端主义教条。根据这种观点,这些意识形态在民主国家衰落的原因,在于有关群体最终整合入社会和国家。¹⁶

另一个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50年在评述20世纪政治思想发展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虽然他是根据一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析观点,一个保守政治理论家的观点。伯林认为,战后世界普遍接受通过集体主义国家行动“消除冲突和痛苦的政策”,已导致这样一种秩序:它的“总趋势……是把各种争端转化为多少具有复杂性的技术性问题”。“在西欧,这种趋势呈现……的形式,是从强调对政治原则的不同意见(和出自道德和精神观真正分歧的党派斗争)向强调对方法的不同意见、最终是技术性的不同意见的转化……因此,与当前日常经济或社会问题相比,对长期政治问题的兴趣在显著地日益减少。”¹⁷

美国人对“政治意识形态终结”的第一篇广博的学术性分析文章,是历史学家H. 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1951年春发表的。虽然休斯的分析包括后来评论家所罗列的所有基本要素,但他的文章被这个论点的批评者故意忽视了。这种好意的冷落或许出于两个原因:他,作为社会主义者,支持过左翼事业(如1948年亨利·华莱士的总统竞选运动、SANE、TOCSIN和其他和平团体);作为美国资深人士第三党左翼和平候选人,在1962年反对爱德华·肯尼迪。他的这些经历往往使人们误以为他试图把这个论点与意识形态相联系。休斯写于20世纪50年代头一年的话很像10年以后出现的另一些话:

意识形态消亡的过程,开始于30年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首次得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幻灭感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似乎已到达它的逻辑终点……

完全可以预言,左翼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对于这种慢性腐蚀,

张扬意识形态和教条的左翼比右翼更脆弱。右翼已从19世纪的失败中学会了怀疑和适应。事实上,左翼神秘气氛的终结是已经发生什么的最明显征迹……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念刚刚被放弃……在目前条件下,一个选择参政道路的政党,很少能避免保守主义的影响,即否认通常与政权有关的意识形态。

借助同种再分类方法,“法西斯主义”一词已失去其大部分恐怖含义。在保守的圈子中,许多人完全回避这个词……

甚至“民主”一词也在失去其神圣的色彩……至于民主政治的当代最一般化定义的两大要素:个人自由和普选政府,则只有前一要素仍然保有其激励热情和献身的力量……

真正闪烁微光的是渴望社会平等。在1950年,大多数有教养的欧洲人面前可以看到的唯一一种平等是把生活拉平到体面而寒酸的下层中产阶级水平;关于这种日常生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1984年》中作了令人沮丧的描述,而工党政府领导下的英国,提供了高贵的预演。这不是曾经激励革命党人死在街垒前、为之献出生命的平等观念……常人失去了他的圣徒的情感。10年前谈论常人世纪的那些人,或许把100年搞颠倒了: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纪与其说正在开启,毋宁说正在结束。¹⁸

1955年,法兰克福研究所再次为这个论点的另一种重要表述提供了“场所”;正是这一年,雷蒙·阿隆在这个所的一份出版物上发表了《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了吗?》。¹⁹虽然所内持“批评观点”的著名发言人不同意他们的“客人”——曼海姆和阿隆——的意见,但他们在许多文章中提出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终结”的不同理解。正如该所历史学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所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解是出自他们相信,自由社会正在为一个几乎全面‘受控的世界’所取代,而在这种受控世界,意识形态辩护已不再必要。”²⁰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195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在假设可信的意义上,不再有意识形态。”²¹在1956年出版的一部由法兰克福研究所集体署名的著作中,作者们提示人们注意,意识形态“弱化”是“从1910年前后”它所达到的一个高点开始的:

只有当某些精神的东西从社会过程——表现为某些独立的实在，并有自己特有的要求的社会过程——中显现时，才可以有意义地谈论意识形态……今天，意识形态的特点，不是它们的要求缺乏幻想，而是太缺乏这种独立……

所以，只要意识形态本身——服从于现存条件压倒一切力量的行为模式——存在就行了……意识形态与现实正在以这种方式走到一起，因为现实本身成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没有任何其他人信服的意识形态。²²

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衰退的更详细解释是出自法兰克福学派两位前成员奥托·柯克奇海姆(Otto Kirch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这两人在战后学派主体返回德国后留在美国。柯克奇海姆在三篇分析精辟的文章中指出，党派意识形态之所以衰退，是因为意识形态“大一统政党，作为时代的产物：主张强硬阶级路线，拥有突起的宗教性结构，本身正在转变成包罗一切的‘人民的政党’……在目前条件下，世俗的大众消费品遍布四方，阶级阵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因而，以前依靠阶级群众的政党和依靠宗教群众的政党，都在压力下成了无所不包的人民的政党”²³。

此外，在柯克奇海姆看来：“现代福利国家可以为许多社会群体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弱化了过去直接利益的冲突，使之转变成谁先得到满足的冲突……这种局面可以使……(党的)政策由眼前的策略需要来决定，而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长远目标远远抛开了。”²⁴

赫伯特·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衰落的反复强调，使他遭到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吕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的批评；后者认为阿隆、马尔库塞、贝尔、雷斯曼是使人们“相信西方社会如此稳定，以致在其中不能找到重要反对派”这一观点的精神来源。²⁵正如前一章所指出，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和公开讲演中一再重申他的如下信念：先进的工业社会，由于它能支持经济富足和大众文化，所以已不再为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政治提供基础。²⁶

当然，马尔库塞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绝望是众所周知的。而远未披露的事实是，他对黑人和学生的作用是如此之悲观，以致他公开反对黑人参与政治过程，反对学生参与大学管理——因为制度能够诱使这两类

人基本上适应现状。1965年，在拉特格斯大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马尔库塞说，黑人已被美国社会同化，因此，他们在政治行为上遵循中产阶级准则：“当有人问他，面对下述两种情况：一种是剥夺黑人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另一种是黑人自由行使选择‘中产阶级价值’的公民权，他喜欢哪种情况时，马尔库塞回答说：‘这个，既然我已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我要选择的是，他们没有作出错误选择的权利。’”²⁷

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前不到一个月，马尔库塞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无论何时何地，学生中的压倒多数是保守的，甚或是反动的。因此，即使学生力量是民主的，也将变成保守的，甚或反动的。”²⁸

对学生造反的态度

到1969年，像其他许多人一样，马尔库塞也认识到他是错误的。在他的一篇《论解放》的文章中，他把美国“贫民区居民”和学生反对派视为主要破坏性力量。但正如第十四章所指出，他仍然断言，寻求解放的“革命尚未提到”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议事日程”；革命所要求的“主观因素”（政治意识）和“客观因素”（“以生产为基础的阶级支持和参与”）仅“同时出现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²⁹

类似思想也由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 Jr.）提出过；这位学者在美国社会学领域比其他任何主要人物都更接近于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提倡者，后来与马尔库塞和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f）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合著了一本激进的小册子《纯宽容批判》（*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著文指出：

当我们取消经济不平等和特权时，我们也可以消除导致作出其他实际政治选择的冲突和不满之源……我认为，自由的蓬勃发展要求有反对派组织存在这一论断不只是一种辩证的托词……一旦理想实现，甚或接近实现，不满的驱动力就会消失，社会就会平静地接受现存事物。这种情况似乎已在美国出现。³⁰

差不多同时，英国社会学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资深倡导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竞选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职位的有成就的左翼力量候选人T. B. 博托莫尔(T. B. Bottomore)，就西方社会的总变化方向，也作出了类似判断。他把战后世界意识形态冲突的低落视为阶级关系发生基本变化的反映。正如1955年他在《现代社会的阶级》(*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中所指出：

尽管民主国家仍然有阶级性质，但这已不再像在19世纪所常见的那样，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还应当看到，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主要政党在社会政策上有一致意见的领域很宽，而且在不断扩大。这种对整个社会利益达成一致意见的程度，是尖锐阶级对抗低落的量度，特别是特权群体放弃其特权，放弃纯个人利益追求的量度，因而也是阶级差别真正减少的量度。³¹

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博托莫尔面对尖锐意识形态论战在西方知识界再度兴起，指名道姓提出另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说法的拥护者，嘲笑他们不理解激进要求的基本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³²在这个修订版中，没有迹象表明博托莫尔是这个论点极端说法——一种在社会乐观主义方面远远超出阿隆、贝尔、希尔思和我之类研究者分析的说法——的提倡者。他只是收回了他1955年的论点；当时他认为，意识形态冲突之所以低落，是因为：

发达工业民主国家中的有产者，在他们可以维护或改善其特有社会地位，或可以对抗争取平等日益增大压力的意义上，已不再是统治阶级……生产工具已不能在不考虑工人利益的情况下使用；它们受到民主管理机构所强置的限制。财产已不再自动保证其拥有者优先参与社会的政治事务。权力，在当代民主社会，已分散到许多社会群体、雇员、工会和多种民间组织当中，每个群体或组织都可以对管理政策发挥其影响。³³

1967年，博托莫尔在论到“意识形态终结”是“一个听起来有点怪的短语”时，可能意识到他在这两版中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不过，他继续认为：“如果[意识形态终结]所指的是，对社会进行内部分类的伟大的19世纪意识形态已经出现裂痕，或者看来似乎正在瓦解，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社会批判精神起任何支配作用，那么可以承认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³⁴

3年以后,即1970年,博托莫尔在那时持新左派立场的《纽约书评》杂志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又改变了态度,严厉批评“宣扬‘意识形态终结’和西方工业国家已实现‘稳定的民主政治’的臭名昭著的学说”,称其是明显“丧失可信性的观点”。³⁵这篇文章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治冲突的加剧是对受攻击观点不言自明的反驳,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它的作者提出许多证据,使他在当时突出于其他人的著作之上。可是,在此以前,博托莫尔在对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比较时却指出,“所有共产党国家特有的……上层集团的统一”,已导致“一个新统治阶层的形成”,并导致“其特权和对社会其余部分巩固的控制权”,而西方国家“则不同……在那里,一个群体的权力受另一些独立群体、政党、雇员、工会和其他各种压力集团的制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差别,因为单独一个统一的上层集团的出现,意味着自由和平等的终结”。³⁶

博托莫尔把稳定的民主政治概念与“意识形态终结”联系在一起,一并归于“臭名昭著的学说”,他似乎忘记他曾强调:“成人普选权可以通过和平手段约束有产者的权力,改变统治的性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只有通过政治手段,通过最低限度地排除一党制,用保护少数派团体的办法鼓励不同意见的制度,才能得到保证。”³⁷

像其他批评社会学家中“意识形态终结学派”的左翼人士一样,博托莫尔也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出现的激进行动主义充满热情,他在1970年得意洋洋地说:“这次[学生运动]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本身的非历史性质……,因为它鼓励了把转瞬即逝的现在看作永恒秩序的倾向。”³⁸奇怪的是,在考虑70年代的后继事件时,博托莫尔却引述我1967年的看法说明这次失败。我当时认为,这次复活的运动很可能是“在一种根本不利的环境中发动激进运动的……多次不成功尝试之一”,因为“美国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相当长期的政治安定传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任何种类的激进社会运动都难以站住脚”。³⁹如果博托莫尔坚持他1967年对学生政治行为的悲观主义评论,他也许会更好地维护他作为预言家的形象。那时,他曾指出,“新激进主义……比以前那些短命风波持续时间长”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能在社会中找到某种不像学生运动那样短命的基础”。⁴⁰

到1971年,博托莫尔在一篇评价到那时已明显低落的学生运动的文

章中写道,在美国“要预见一场广泛激进运动的发展是困难的”。他几乎看不到工人阶级“在日益繁荣和工会运动日益衰退的条件下”有激化的希望。⁴¹

教育界参与和支持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行动主义风波的人士只能发觉对我和戴维·雷斯曼等人的一片嘲笑声,因为我们提请人们注意学生运动显示经常发生而又迅速低落的历史形态。⁴²不过,几年以后,这种概括却给了因抗议运动明显衰落而感到沮丧的激进分子以精神营养。1964—1965 年伯克利学生反抗运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贝蒂纳·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1973 年重新振作起来,是出于看到这样的论述:“所有社会运动都是时起时伏的。你不能使它在无限长的时间内保持同一强度水平……;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运动还将复发。”⁴³

西方社会基本结构的发展趋势可能对强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因素起明显削弱作用,这个假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被肯尼思·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特别用来分析学生行动主义的前途。凯尼斯顿是一名倾向左翼的学者,在 60 年代后 5 年美国学生运动达到高潮时,曾是一名最重要的同情者。他第一个指出学生当中“乌托邦思想的衰落”和激进情绪的“沉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评论“现时代是‘乌托邦衰落’和‘意识形态终结’时代的观点”时,约瑟夫·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强调凯尼斯顿的文章是这种看法的主要表述。⁴⁴凯尼斯顿确信美国青年的固有特征是“不关心政治占优势”,这导致他 1963 年在一篇论到许多大学校园政治活动日益高涨征兆的文章的题目中,给“政治复活”一语加了引号,并把文章大部分篇幅用于分析保持长期“冷漠”的结构根源。⁴⁵他指出:“差不多可以说,富裕和教育对政治参与有负效应,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几年后,他推翻了这个结论。

可是,同一个肯尼思·凯尼斯顿却指责嘲讽丹尼尔·贝尔、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爱德华·希尔思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述。根据他认为实际发生的与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家所预测的正相反的假设,凯尼斯顿断言:“仅仅这个事实就迫使我们怀疑和重新审查构成自由主义出发点的基本假设。”⁴⁶读到这些话使人为之瞠目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们出自一个研究青年行为的专家之口,而这个专家甚至在 20 世纪 60 年代青年造反开始以后,仍然坚持认为,学生中促进不关心政治和冷漠的基本力量

不可能因此而转向,还因为这些话是指向一些学者的,而这些学者在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到,意识形态政治或乌托邦政治的再次出现,是以“造反的年轻一代”(希尔思)、“年轻知识分子”(贝尔)和“知识界”(李普塞特)⁴⁷为基础的。

我这里提到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著作,或他们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冲突终结”这种极端说法的拥护者所写的支持各种形式左翼行动主义的学术性文章,意思不是说,他们的著作和文章给了这个论点特定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而是说,在这场论战中,重要的是要注意,持各种政治见解的人,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这个论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中包括:两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雷斯曼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瑞典著名自由主义报纸《每日新闻报》的资深编辑赫伯特·廷斯滕;著名经济学家和瑞典社会主义领导人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当代德国社会学家中可能最知名的、从20世纪50年中期开始写作而现在仍是一个积极社会主义者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一度担任过国际政治学会主席的斯坦·罗坎(Stein Rokkan);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兼理论家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社会精神分析法的现代倡导者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明显持不同立场的两个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Michel Crozier)和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英国民意调查专家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耶鲁大学政治行为学家、前学生领袖、现在的社会主义行动主义者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按政治理论观点写作的哈佛大学教授朱迪思·施克拉(Judith Shklar),以及保守的政治理论家托马斯·莫尔纳(Thomas Molnar)⁴⁸。

肯尼迪的表述

虽然约翰·F.肯尼迪由于表达了对国家平等目标的新的意识形态信仰,因而鼓励学生政治行动主义,结束了美国“沉默的50年代”的政治休眠,使他受到某些人的称赞,但他本人在公开讲演中支持“意识形态终

结”论的一种不同说法，尽管这些讲演的初稿出自阿瑟·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之手。例如，在1962年5月，他宣告意识形态分歧在基本问题上已经结束：“过去如此经常轰动这个国家的那些大规模‘动感情的运动’”已不再有必要。一个月以后，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讲话中，这位年轻的总统断言：“我们时代国内的中心问题是比较微妙的，不那么简单的。它们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无关，而与达至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有关。”⁴⁹

证实肯尼迪这些声明的假设——工作、安全感、不平等一类基本经济问题已大体解决——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已为两个自由主义者阿瑟·小施莱辛格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预示；这两人后来成了肯尼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发言人，当时都是哈佛大学的教授。1957年，小施莱辛格写道：“在经济方面和管理领域虽然有事情要作，但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似乎已解决；今天，几乎没有自由主义者认真地希望改变我们目前混合经济的混合态……而且，很大程度上，现在的保守政府至少在名义上已在偷运新政派的口头目标……正如阿瑟·拉森所指出，我们现在都是新政派。”⁵⁰

5年以后，小施莱辛格向全球范围阐发了这些观点，他指出，福利国家或“混合社会”的出现“展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和典型的社会主义，犹如19世纪教义……例如，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在私有形式和公有形式之间作出选择……已不是一个宗教原则的问题……它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哪种能最佳实现理想目标的实践问题……的确，我要说，我们完全可以从理性的谈话中剔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字眼”。⁵¹

他的大学同事，后来一起在肯尼迪政府供职、20世纪70年代新政治派的热情追随者和现在自称的社会主义者加尔布雷思，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指出：

不平等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其紧迫性已经降低……生产消除了与不平等相联系的比较尖锐的紧张情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同样清楚地看到，日益提高生产总量是解决财富再分配问题，甚或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另一种选择。那些最陈旧、最富煽动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解决，至少也基本上处于搁置状态，争论者已把注意力转向提高生产率的目标……

过去经济生活关心平等、安全感和生产率，现在已窄化为关心生产率和生产。生产成了解决一度与不平等相联系的紧张态势的手段，成了解除与经济不安全感相联系的不安、焦虑和冷漠的不可缺少的疗药。⁵²

对新政治的预测

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大多数左翼批评是集中于社会学家中的所谓多元论学派——阿隆、贝尔、希尔思和我本人——的著作。当20世纪60年代主要以学生、受排斥的少数民族和知识界为基础的新左派开始造反时，这些批评强调我们的假设不符合他们认为的实际。其实，我们每人都说过，政治抗议将继续，而且将主要得到上述那些人的支持。例如，正如前面所指出，希尔思在1955年发表在《冲突》(*Encounter*)上的一篇开创性文章中说，如果西方社会不承担社会的“伟大使命”，极端或革命教条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将“通过非法途径、特别是通过造反的年青一代悄悄地蠕动”⁵³。再如，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最广泛论述意识形态终结论观点的文章中，希尔思强调：“现代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有倾向意识形态政治的趋势，近来亚非国家也是如此……[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传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观点。唯其如此，似乎完全在于他们对一些超越日常生活及其责任的信条的钟情。”⁵⁴

雷蒙·阿隆1955年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了吗?》这篇文章结尾——也是他论述知识分子问题一书的结尾——明确否认人们对社会改革和变化的信仰在衰落，他说：“当一个人不相信异教徒或犹太教徒，不再念叨‘教堂之外无拯救’时，他并没有停止爱上帝。同样，当一个人拒绝认同单一个阶级、单一一种行动程式和单一一种意识形态体系时，他难道会停止对公正社会和人类美好命运的追求吗?”⁵⁵

10年以后，当阿隆在“意识形态终结与思想复兴”——题目本身道出了文章重点——一文回到这个论题时，他重申他从未预期改革社会的政治前景或努力会终结，而是说绝对的或一统制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的吸引

力在衰退。正如他所指出：“意识形态综合的失势并没有使实用主义得势，或理性论辩贬值。”⁵⁶阿隆在概述温和左翼“反意识形态”态度根源时解释他的立场说：

在目前条件下，温和的左翼实际上是在极细微有限的意义上反意识形态的：在每种具体环境中，他们都试图以最可能或最满意的方式，使个人自由、民主的合法性、经济的进步和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协调一致。温和的左翼自称“反意识形态”，而强调政治环境的多样性和广泛综合的脆弱性，严格地说是因为，要想[在一种一统的意识形态内使所有这些目标]完全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除非协调一致是个模糊的概念。再者是因为，发达社会至少正在达至这样一种协调，以致它们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提出一种意识形态综合。⁵⁷

我在本书第十三章对意识形态衰落的分析，首次发表是在1960年，当时是为了反驳巴林顿·穆尔和其他左翼人士的论点，他们强调社会变化对缓和阶级斗争的冲击。正如我在当时的论述——被莫斯克维乔夫描述为使“意识形态没落”论点得到最充分、最精辟分析的论述——中所指出，我怀疑“这些知识分子是否把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内政治中的衰落，误认成了支撑国内争论的阶级冲突的终结。正如美国和其他国家投票模式方面的大量证据所显示的，选民从整体上看并不反映如此之多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国内阶级斗争的终结……预言‘富裕社会’中阶级政治终结忽视了任何阶级系统的相对性质”。

我在说明导致左翼政党内绝对意识形态衰落的因素时，曾对这个首先由T. H. 马歇尔提出的论题作过详细论述，当时说，因为革命的民众政治在早期工业社会中基本上表现为工人阶级争取公民身份的斗争，所以，当“工人……获得了产业上和政治上的公民身份，保守派……接受福利国家”时，这种政治的意识形态信仰受到了腐蚀。不过，说加引号这段话所提出的条件削弱了以前受排斥群体对绝对意识形态的需求，这其中暗含着承认，“诸如美国黑人或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一类、现在仍然被剥夺公民身份的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群体，将继续利用极端的策略和随机应变的意识形态”⁵⁸。

在本书第一版论述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中左翼观点低落时，我对“美国知识分子与其社会的[敌对]关系正在发生一种永久性变

化”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当时，我写道：“尽管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对现状的固有趋势仍将继续存在……任何现状都蕴含着刻板僵化和教条主义，对其发动攻击是知识分子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管是从留恋传统价值的立场，还是出于追求实现平等梦想的愿望。”

关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继续关注批判性意识形态的问题，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终结》一书的分析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新一代[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拒斥——理智地说——基督千年盛世古老梦想的政治社会框架内寻找新的目标。在寻找“目标”时，表现出一种深深绝望的、几乎是悲壮的愤怒……在美国，对新理性激进主义的追求从未停止过……使那些寻找“目标”的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其不满一度是社会变革驱动力的工人，比知识分子更满足于美国社会。工人没有实现他们的乌托邦梦想，但他们的期望少于知识分子，因此收获相应较多。

年轻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中间道路”是属中年人的，不是属他们的；而且这条道路没有激情，正在失去光华。意识形态，就其本性来说，既包罗一切，又一无所有……从情趣上看，这正是年轻知识分子想要的东西。⁵⁹

对韦伯和曼海姆著作深有研究的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虽然他的调子和意识形态着重点完全不同，但也得出了几乎与贝尔和我一样的结论。例如，在著名的《致新左派》(1960年发表)一文中，他说：“一般说来，似乎只是在工业化一定[早期]阶段和独裁的政治背景下，拿工资的工人才确实倾向于成为为自己的阶级。”他把某些激进主义者相信工人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作用，描述为“不顾现在与这种期望相悖的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历史证据……背负从维多利亚时代马克思主义继承下来的、现已完全不现实的遗产”奔跑。⁶⁰米尔斯还指出，在所论社会结构环境中，最可能成为不断发起反体制斗争之根源的社会群体是知识分子。他说：“最近几年，在考虑[变革]媒介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一直在研究文化的工具，即知识分子——变革的一种可能起直接作用的激进媒介……到1960年春天，情况清楚了，这样考虑确实是极恰当的。”⁶¹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67年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在他重申

10年前发表的看法时说,现代工业体制以它缓解阶级冲突和明显弱化有关“社会本身目标”分歧的能力,连同随之出现的经济富足,挫败了马克思的预言。不过,同米尔斯一样,他也注意到,“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对普遍承认和支持的社会思想模式阵线不分明的不满”。⁶²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来自“教育和科学阶层,以及更广泛知识界”成员方面的这种对主要经济阶层的不满和抵触势力,隐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两种价值取向是这两大政府权限之外精英集团所固有的。

在强调知识分子作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抗议运动复活之潜在中心的作用时,贝尔、米尔斯和我都不同意马尔库塞和博托莫尔的假设。例如,博托莫尔迟至1964年还在说:“现在……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右翼,大概是个事实。”⁶³

丹尼尔·贝尔也论述过“千年盛世希望、千年至福说、天启观念终结”的含义,即在他使用引号中这一著名格言时,所谓意识形态的所指。与坚持这一概念自我理解的一些比较悲观的左翼人士不同,贝尔把政治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视为第一次有可能对乌托邦进行现实的讨论。他说:“意识形态终结不是、也不应是乌托邦的终结。因为如果需要的话,只要意识到意识形态是牢笼,就可以重新讨论乌托邦。”⁶⁴

近些时候,贝尔在分析过去10年他所关注的后工业社会出现时还强调,知识分子有一种助长反道德态度的特殊倾向;反道德态度反复出现在文化创造者中,反映他们“为了得到某种形式的忘形情境”,渴望减少或消除约束。这种态度是与日常世界、“经济、技术和职业系统……”的取向尖锐对立的,“后一些事物的取向是根植于功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推论原理、工作和时间的合理化,以及直线进步观所陶铸”。⁶⁵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不同文章中也强调知识分子的“对立文化”,他们对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政治拥有者和控制者的基本价值和制度的不断反抗,是他们工作性质所固有的,因为他们工作的重点在于创造性、新颖和“突破”。⁶⁶

马克斯·韦伯对这些观点早有先见之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著文已注意到,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在一个“以合理化……特别是以‘看破红尘’”为特征的时期,找到某种形式的忘形情境。面对“幻想的破灭”,

面对有魅力的绝对意识形态的匮乏,一些人将把他们的价值重点“转向超凡脱俗的神秘世界,或转向直系亲属和个人人际关系的感情世界”。他们也许试图“理智地构筑一些没有新的真正先知的宗教”,而这只能导致“可悲的怪物。可是,科学的先知最终则只能产生狂热的派别,从来不会创建一个真诚的共同体”。对于韦伯来说,“不能忍受时代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最道德的反应,是向传统宗教复归。他说:“在我看来,这种向宗教的复归比科学的先知站得高,但这并不是说,在大学课堂中没有其他美德,只有赤裸裸的理性诚实。”⁶⁷

几年以后,卡尔·曼海姆在他预言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没落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若完全没有任何超越因素,无论乌托邦形式,还是意识形态形式”,知识分子要“与现实……世界协调相处”是困难的。他预言:“古老的观念”将被重新强调“纯正”和“坦诚”所取代。⁶⁸而且同他以前的韦伯一样,曼海姆预期:“知识分子……将来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比例会更多,尽管现在他们也在从社会各阶层,而不是仅从一些较有地位的阶层吸收成员”,再者,不能适应无意识形态冲突环境的知识分子,将寻求“超越这种不紧张的环境”。⁶⁹

在回到这个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的论题时,曼海姆几乎像在描述 60 年代新左派知识界;他注意到,先进自由民主社会的知识分子批评家,“拒绝为未来提供解答,哪怕是一点点”。他写道:

不谈具体的东西,在试图规划未来时轻视理性的运用,仅仅要求盲目的信念,这一切被认为是更高的智慧。一个人只是在批评他的对手,以致有可能为了自己利益,无约束地动员一切消极的敌视和怨恨情感时,才会从必须运用理性中享受到加倍的好处。因为按照“集体行为负效应”的齐美尔原理,这种消极情感比任何建设性纲领更容易团结起大多数人民。⁷⁰

令人感兴趣的是,詹姆斯·C·戴维斯(James C. Davies)在评论丹尼尔·贝尔和我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著述时指出,凡有不适感的人基本上都支持我们的看法,这是因为他们“感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足以……为超越物质财富水平谋求个人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准则或充分的手段”⁷¹。

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

某些激进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出了一种特殊批评。对于意识形态论争在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政党拥护者中的腐蚀作用，他们承认经验判断与他们自己的评价相一致，但仍然认为主张“意识形态终结”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观点是个保守的意识形态观点，有助于削弱激进变革的努力。例如，斯蒂芬·鲁西斯(Stephen Rousseas)和詹姆斯·法加尼斯(James Farganis)曾评论说：“几乎没有什么疑问……〔贝尔〕的论证，和李普塞特就意识形态没落甚至终结所说的，作为西方世界的一种作用力，基本上是基于事实。”但他们接着说：“C. 赖特·米尔斯认为，意识形态终结造成对经验主义的迷信，需要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上满足为现存事物辩护的意识形态。”⁷²其实，这种论证显然只是重复他们所批评分析中的内容。1963年，我试图对“意识形态衰落”的根源和后果给予综合论述：

不仅在与总经济领域划分有关的问题上的阶级冲突，而且在各种制度、象征性地位和机会上的阶级影响，将在没有绝对意识形态(Weltan schauungen)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但是，……这种绝对意识形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显然，信奉实用主义政治；遵守集体谈判的游戏规则；接受渐进变革方式——无论按左翼支持的方向，还是按右翼支持的方向；既反对无所不管的中央集权，又反对自由放任；这一切构成了意识形态的组分。现在，“在基本原则上一致意见”，即西方社会的政治共识，已日渐成为对待那些过去使左、右两翼截然分开的问题的立场。而且，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意见也已成为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最好把它称之为“保守的社会主义。”⁷³

在阐述这些论点时，我只重申了H. 斯图尔特·休斯在其《政治意识形态终结》一文结论中提出的论据。他注意到：“‘进步’——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已使它们(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言归于

好……。既然如此,1950年的新保守主义没有在一项明确载有自由名字的未决协议中融进各种意识形态,岂不令人奇怪?”⁷⁴

公平地说,应当指出,共产党批评家 L. N. 莫斯科维乔夫确实认识到,论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大多数著作,“并不是说所有意识形态的死亡,或者不再有任何政治分歧或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终结’这个短语,按照它的提出者和支持者的看法,只是意味着:第一,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已不足以指导民众政治行动,这特别适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⁷⁵

对阿隆、希尔思、贝尔和我的某些著作的引述,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在讨论意识形态“终结”或“衰落”时,无论我们,还是我们提到的其他大多数论到这个问题的人,从来没有说过一统制政治概念体系的终结,乌托邦思想的终结,阶级冲突的终结,以及它们与不同阶段或其他政治利益集团之代表所拥护的政治立场的相互关系的终结。相反,我们当时指的是这样一种判断:一统制革命信条与工人阶级反体制斗争运动的狂热感情联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运动反对者与反革命信条的联系——正在衰落;这里所说的工人阶级反体制斗争,用 C. 赖特·米尔斯的话说,是指“来自维多利亚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在先进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不会再出现,但在不发达国家将继续存在,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变革进程,类似于欧洲产业革命时的情况。意识形态不是一个一望而知其含义的术语,我们的某些激进主义批评家似乎认为它是指任何种类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激进社会学家,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甚至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革命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无意义的。“意识形态是个微妙的字眼。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虚假认识。”舒尔曼接着问道(在回顾贝尔较早时候论述后工业社会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时):“在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观点中,有新道德—政治秩序的种子吗?”⁷⁶

(顺便提一下,苏联学者 L. N. 莫斯科维乔夫不同意像舒尔曼这样理解马克思。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论述,指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政治的和法律的观点、哲学和宗教构成,这个词决没有贬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在分化为敌对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本质。”他接着指出,列宁论述了“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⁷⁷

奇怪的是，从“多元论”观点写作的“学究式社会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却由另一个激进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之笔给了最高赞誉。他在1970年指出，这些学者——在他看来，与塔尔科特·帕森斯走的路子一致——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现代世界社会变革的一些新根源和新位置上”：

例如，早已看到“青年文化”崛起的重要性，至少是把它提出作为一个注意目标，并对其感到强烈不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其他功能主义者。在美国，帮助许多人第一次得到黑人和其他受歧视群体如何生活的景观，对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取消种族隔离裁决一类实际政治进展作出贡献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学究式社会学家。正是普通的学究式社会学家的人类学研究，使我们清楚认识到，麻醉品和毒品文化的出现，正在加深代际的裂痕和冲突。⁷⁸

大体上说，关于意识形态终结分析是否正确的激烈论战，是围绕“意识形态”一词的不同含义展开的。持批评意见的人能够证明意识形态继续存在，使他们自己心满意足——因为随着冷战的低落，知识分子、知识界和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对反体制观点的信仰强化了。爱德华·希尔斯在1968年为《国际社会科学博览》写的一篇论“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有力地指出，他和其他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支持者从未说过：“理想、道德标准、一般的或综合的社会观点和政策，在人类社会已无关紧要，或者已不再讲得通。”而且，正如他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所强调的：

显然，没有一个社会能在没有认识的、道德的和表现的文化的条件下存在。真、善、美的标准是人类行为结构固有的。产生于认识的、道德的和表现的需要，并由传统传递和支持的文化，是社会本身组成的一部分。因此，每个有文化的社会，都向人、社会，以及道德和先验的主张、审美判断和科学知识所在的世界，展示一系列复杂的取向。这些取向来自对社会的看法和准看法，而看法或准看法决不可能终结。争论之产生，是由于按这里理解的意义不能把看法或准看法与意识形态分开……

而且，“意识形态终结”论倡导者并不主张，也没有暗示，人类已经到达和超过意识形态不再可能存在的发展条件或发展阶段。意识

形态的潜势似乎是人类素质的一个永恒部分。在危机条件下,即当迄今占优势的精英层失势和受到怀疑,而中央集权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看来不能找到正确行动方向时,意识形态倾向将加强。直接接触具有创造性和合法性的权力源的需要,以及对体现这些权力的综合性组织的需要,在大多数人是一种间断的、非经常性的需要,而在少数人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经常不断的需要。前者的要求一旦出现,与后者持续存在的需要相汇合,将产生并加剧按意识形态取向的倾向。只要人类社会受危机的困扰,只要人有直接接触神圣事物的要求,蕴含在现代西方观点中的传统意识形态因素,就几乎总是说明存在坚持按意识形态取向的潜在可能性。⁷⁹

经验分析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大部分争论显然涉及意识形态分歧。不过,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个观点提出的现代表述,是把它作为一个经验假设,即设想社会发展将对与阶级相关的党派争论的性质有影响。大体上说,激进主义批评家忽视了这个假设的正确性问题,他们通常认为它的虚假性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政治激情和激进主义抗议运动一直存在。可是,在一些人参与争论时,也有少数人确实想评价这个主张的正确性。有相当多的文献——其中某些在方法论上是定量的——试图比较不同社会中意识形态分歧的强度,或考察一些国家内意识形态随时间的变化。有三个政治学家(雷贾(Rejai)、梅森(Mason)、贝勒(Belcer),他们以前没有参与争论)在考察了这些不同研究之后断言,这个假设成立。他们说:“过去10年,意识形态终结假设引出了大量学术成果。一般地说,这个假设是试图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意识形态政治强度之间,建立一种负相关性。在一些先进工业国家进行的经验调查表明,这个假设完全成立。”⁸⁰

另一个政治学家约翰·克莱顿·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按十个方面系统研究了12个工业化国家54个政党从19世纪70年代到20

世纪60年代的立场变化。他报道：“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到60年代，和30年代到60年代表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即平均偏差下降）。”⁸¹非左翼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稳步向左转，有时急剧向左转。”⁸²同样，“考察英联邦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拥护者数量的平均变化……也显示它们在对待几乎所有问题的激进主义态度上有一致的明显减弱。在许多情况下，去激进化程度可与非工党所经历的高度去极化相比较”。⁸³

最近，托马斯把他的分析扩展到1971年到1976年。他发现，10个工业化国家中有9个国家（美国是唯一例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政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立场的一般差异呈下降趋势。正如他所指出：“无论比较是限于两大政党集团，还是把比较扩大到得票率占5%的其他党，所有政党制国家（美国除外）在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党派见解差异都呈下降趋势。”⁸⁴美国的例外是令人费解的，这特别是因为美国的整体意识形态差异似乎比其他有社会党和保守党的国家小。托马斯指出，美国的例外，即两党在政策立场上的差异较明显，可能反映“美国两党在贯彻它们政策立场时的软弱性”。也就是说，恰恰因为美国的两党，在结构和纪律上不如欧洲和日本的政党，所以它们比其他国家拥有政策解释权的政党组织，在竞选声明中可以给两党分歧更多的强调。⁸⁵

虽然托马斯的研究一般地为意识形态终结文献中的基本假设提供了最综合的检验和最明显的证明，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个重大修正。他发现，非左翼政党的政策立场的转变比工人性质政党的转变更剧烈，尽管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强调左翼政党的转变，对其他组织的转变一带而过。托马斯指出，造成强调失当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工业化社会现状已经向左转，即向福利—计划社会转变。因此，“党的立场虽然变了，但如果现状向同样方向变，党的立场变化可能察觉不出来。这种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没注意非工党的大规模消匿。另一方面，党的立场可能没变，然而如果现状变了，则仍然可以感到党的立场的变化。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工党的消匿度被夸大。”⁸⁶

寻求认真检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人与持激烈批评意见的人对这个论点的不同评价，导致雷贾及其同事希望解释何以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大多数批评者“明显不愿考虑这个假设经验上成立的显著性，

而依赖于语义学的辩护”。这些批评者之可能提出挑战,是“采用有严重缺陷的意识形态定义……这些定义是如此模糊、如此一般、如此广泛,以致使它们与经验调查的相符程度降至最低”。⁸⁷

正如博托莫尔所指出,借助民主选举制的运作,制度化调节现代社会冲突,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变温和的政党制度,现在仍然在起主要作用。斯特拉斯克莱德的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和德里克·厄温(Derek Urwin),对“西方政党制国家 1915 年以来”选举模式的定量研究表明,各政党的相对力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们的行为符合韦伯的预测。他们说:“不管采用什么变化指标——量度变化趋势或量度一些涨落范围——都得到相同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大多数政党的选举力量,从这次选举到下次选举,从这个 10 年到下个 10 年,或者说在一代人的时限内,极少发生变化……简言之,关心 1945 年以来政党和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首先应当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历史的一个远非平静的时期,选举力量缺乏变化。”⁸⁸

结 论

新政治派的主要发言人之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1981 年在《纽约书评》杂志上撰文重申他以前提出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有关思想和政策的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已经在工业化国家中……形成一致意见。”如他指出:“美国存在扩及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大多数民主党人的广泛共识。类似情况也见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加拿大的自由党与进步保守党。法国、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治情况一般也符合”这个模式。⁸⁹

形成共识涉及右翼向左翼支持的政策调整比左翼向右翼支持的政策调整多。与托马斯经验调查结果相一致,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主要政党间达成一致意见,涉及承认“广泛的宏观经济有发展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责任”,也就是在计划、福利和管理政策上形成一种“对最低收入者有最重要意义的……共识”。因此,在他看来,对这种共识的最严重挑战不

是来自左翼，而是来自右翼，如最近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罗纳·德·里根对计划—福利国家的攻击。不过，加尔布雷思否认这两人选举胜利代表“真正的舆论移动”，他说，他们执政时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达成基本共识的政策。虽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加尔布雷思为听取他的意见的人提供了相当温和的政策目标，但即使这些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也很难推翻共识。他说：“因此，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诚然，共识必须站在现有力量立场上加以捍卫，但有大量支持来自环境。真正的任务是在现在出现毛病的地方修补、重建和重新设计共识。”⁹⁰

应当重申，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体意识形态在西方许多国家部分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复活，这件事本身并不自行对主张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群众性社会运动中衰落的人所提出的论点构成挑战。正如前面所指出，这些人的著作常常明确把知识分子和学生放在他们的一般性概括之外。

新左派组织拒斥现存的、把一切希望寄托于选举制度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民主党，它们在知识界富裕的少数人寻找民众基础的努力，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北欧和美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都遭到了惨重失败。大多数美国新左派，包括某些最杰出的辩护士，都参加了民主党；他们在与乔治·麦戈文和爱德华·肯尼迪一致的、自由主义和人民主义立场中，发现有充分的意识形态养分。

“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包含的经验内容已被政治主张明显不同的学者所接受。但是，有些阐明这个论点的学者，当他们推测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那种尖锐意识形态争论不会再发生时，有选择地受到了点名攻击。这种攻击可以说明对潜在动机的意识形态评价与理论本身的合法性已被混淆的程度。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Simpson)在看到这类社会学批评的发展时告诫说：“中心思想……是，如果我们要给一种理论贴意识形态标签……我们就会对这种理论的合法性说某些话。这种做法是令人惊恐的，因为它会使社会学变成准标准的道德哲学，以感情共鸣代替理性和观察，作为构筑和判断理论的基础。”⁹¹

注 释

1. 这方面的有关著作包括：Raymond Aron, “Fin de l'âge idéologique?” in Theodore W. Adorno and Walter Dirks, eds., *Sociologica* (Frankfurt: Europäisch

Verlagsanstalt, 1955), pp. 219—233; 另见阿隆著作的英译本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trans. Terence Kilmartin (New Yprk: W. W. Norton, 1962), pp. 305—324; “Nations and Ideology and the Renaissance of Ideas,”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67), pp. 92—183。Daniel Bell, *Marxism-Leninism: A Doctrine on the Defensive: The “End of Ide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n Communist Affairs, 1955); *The End of Ideology*, rev. ed.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Bell and Henry D. Aiken, “Ideology-A Debate,” *Commentary* 37 (October 1964): 69—76; “Ideology and Soviet Politics,” *Slavic Review* 24 (December 1965): 591—60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S. M. Lipset, “The Stat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anadian Forum* 35 (November 1955): 170—171; “Socialism-Left and Right-East and West,” *Confluence* 7 (Summer 1958): 173—192; “The End of Ideology?” in the first, 1960 edition of *Political Man*, pp. 403—417; “The Changing Class Structures and Contemporary European Politics,” *Daedalus* 93 (Winter 1964): 271—303, Reprinted in revised form in Lipse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rev. ed.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Anchor Books, 1970), pp. 267—304; “Some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End of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 (1966): 17—19。Edward Shills, “The End of Ideology?” *Encounter* 5 (November 1955): 52—58; “Ideology and Civility: On the Politics of the Intellectuals,” *Sewanee Review* 66 (July-September 1958): 450—480;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Ide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L. Shills, 17 Vol.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7: 66—76。后两篇文章稍经修改收入 Shil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2. “We’re All Totalitarians,”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5 May 1972, p. 507。

3. Kenneth Keniston, “Revolution or Counterrevolution?” in R. J. Lifton and E. Olson, eds., *Exploration in Psycho-history: The Wellfleet Paper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4), pp. 293—294。

4. L. N. Moskvichov, *The End of Ideology Theory: Illusions and Reali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pp. 8, 11—12。

5. *Ibid.*, pp. 181—182。

6. 批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著作有: Henry D. Aiken, “The Revolt against Ideology,” *Commentary* 37 (April 1964): 2939; Norman Birnbaum,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Ideology (1940—1960),” *Current Sociology* 9 (1960), 特别见 pp. 115—117; William Connolly, *Political Science and Ideology*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7), 特别见 pp. 51—53; R. Alan Haber, “The End of Ideology

as Ideology,” *Our Generation*, November, 1966, pp. 51—68; Nigel Harris, *Beliefs in Society: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London: C. A. Watts, 1968), pp. 10—12; Joseph LaPalombara, “Decline of Ideology: A Dissent and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 (March 1966): 5—16; Ralph Miliband, “Mills and Politics,” in I. L. Horowitz, ed., *The New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86—87; Stephen W. Rousseas and James Farganis,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in Harowitz, ed., *The New Sociology*, pp. 268—289; Dusky Lee Smith, “The Sunshine Boys: Toward a Sociology of Happiness,” in Larry T. Reynolds and Janice M. Eeynolds, eds.,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David McKay), pp. 371—387; C. H. Anderson, *Toward a New Sociology*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71), p. 38; Giuseppe Di Palma, *The Study of Conflict in Western Society: A Critique of the End of Ideology*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3); Daniel H. Wrong,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Ideology,” *Dissent* 7 (Summer 1960): 286—291; Michael Harrington, “The Anti-Ideology Ideologues,” in C. I. Maxman, ed.,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68), pp. 342—351; Donald Clark Hodges, “The End of ‘The End of Ide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6 (April 1967): 135—146; Peter Clecak, *Radical Paradox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p. 238—239.

7. Friedrich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1886), in *Karl Marx and F. Engels, On Religion*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p. 263.

8. Lewis Feuer, “Ethical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6 (Summer 1942): 269.

9. 见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155—156。基本概念见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trans. Ephraim Fischhoff et al. (Totowa, N. J.: Bedminster Press, 1968) pp. 24—26, 以及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115—118。关于这些思想用于当代社会变化的详细讨论, 见 S. M. Lipset,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Peter Blau,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p. 172—209。

10. William Delany, “The Role of Ideology: A Summation,” in Waxman, ed.,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 p. 304.

11. 见 Guenther Roth,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Totowa, N. J.: Bedminster Press, 1963), p. 252。

12.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trans.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1929)(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9), pp.222—236.

13. *Ibid.*, p.235.

14. *Ibid.*, p.230.

15. 转引自 Roy Pierce, “Anti-Ideological Thought in France,” in M. Rejai, ed., *Decline of Ideology?*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p.287; 另见 Albert Camus,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69), pp.197—198.

16. 这个论点是由 T. H. 马歇尔(T. H. Marshall)在一篇现在已成为经典著作的文章中提出的,见“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1—85; in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4), pp.65—122.

17. Isaiah Berli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8(April 1950): 376—377.

18. H. Stuart Hughes, “The End of Political Ideology,” *Measure* 2(Spring 1951): 150, 151, 154—155.

19. Aron, “Fin de l’âge idéologique?” in Adorno and Dirks, eds., *Sociologica*.

20. Martin Jay,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Karl Mannheim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elos*, no. 20(Summer 1974), p.84.

21. Theodore W. Adorno, *Prismen*(Berlin: Suhrkamp, 1955), p.30.

22. 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spects of Sociolog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199, 202—203.

23. Otto Kirchheim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Party Systems,” 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84, 190.

24. Otto Kirchheimer, “Germany: The Vanishing Opposition,” in Robert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47. 另见 Otto Kirchheimer, “The Warning of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ary Regimes,” *Social Research* 24(Summer 1957): 128—156. 在达尔(Dahl)编的论文集中,柯克奇海姆(Kirchheimer)在他文章的一条注释中提到,这个论点已由另一些人讨论过,包括赫伯特·廷斯腾(Herbert Tingsten)、曼弗雷德·弗里德里希(Manfred Friedrich)、卡尔·布莱奇(Karl Bracher)和李普塞特(Lipset)。参见“Germany: The Vanishing Opposition,” p.247.

25. Lucien Goldmann, “Understanding Marcuse,” *Partisan Review* 38(1971): 258.

2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p. xii—xiii.

27. Leo Rosten, *A Trumpet for Reason*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0), pp. 64—65.

28. 关于这次采访的报道发表在1968年4月11日《世界报》(*Le Monde*)上,转引自“Upsurge of the Youth Movement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World Marxist Review* 11(July 1968): 8。

29.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s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 56.

30. Barrington Moore, Jr.,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83.

31. T. B. Bottomore,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Ampersand, 1955), pp. 52—53.

32. T. B. Bottomore, *Classes in Modern Society*, 2d rev. e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6), pp. 95—96.

33. Bottomore, *Class in Modern Society*, 1st ed., p. 52.

34. T. B. Bottomore, *Critics of Society: Radical Thought in North America* (London: Allen & Unwin, 1967), p. 19.

35. T. B. Bottomore, “Conservative M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70, p. 20.

36. Bottomore, *Class in Modern Society*, 1st ed., pp. 46—48.

37. *Ibid.*, pp. 53—55.

38. Bottomore, “Conservative Man,” p. 21.

39. *Ibid.*, p. 22. 引自 S. M. Lipset and Philip Altbach, “Student Politic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 M. Lipset, ed., *Student Polit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p. 244。

40. Bottomore, *Critics of Society*, p. 133.

41. T. B. Bottomore, “The Prospect for Radicalism,” in Bernard Landis and Edward S. Tauber, eds., *In the Name of Life: Essays in Honor of Eric Fromm* (New York: Rinehart & Winston, 1971), p. 319.

42. S. M. Lipset, *Rebellion in the Universit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 195.

43. 引自 Beverly Stephen, “Veterans of the Student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31 October 1973.

44. Joseph R. Gusfield, *Utopian Myths and Movements in Modern Societies*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3), p. 1.

45. 特别见 *The Uncommitt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5), 以及“Alien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Utopia,” *American Scholar* 29(Spring 1960): 1—10;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olitical Revival,’” *American Scholar* 32(Winter 1963): 40—64。这两篇文章收入他的选集 *Youth and Diss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在这本选集中,凯尼斯顿(Keniston)可以让读者分享随着岁月流逝他在评论上的变化。

46. Kenneth Keniston, "Revolution or Counter Revolution?" pp. 293—294.

47. 见本书第 547—551 页的讨论和引文。

48.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不同说法的代表文献,除本书已提到的外,另见 Herbert Tingsten, "Stability and Vitality in Swedish Democracy," *Political Quarterly* 26(April-June 1955): 140—151; Lewis Feuer, *Psychoanalysis and Ethics*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55), pp. 126—130; Stein Rokkan, *Sammenlignende Poliiskisosiologi* (Bergen: Chr. Michelsens Institutt, 1958); R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特别见 pp. 241—318; Gunnar Myrdal,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George Lichtheim,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1963), 特别见 pp. 175—215; Robert E. Lane, "The Politics of Consensus in an Age of Afflu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1965): 874—895; Robert E. Lane, "The Decline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Knowledgeable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1 (1966): 649—662; Robert Tucker,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Marxist Move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1967): 343—358; Mark Abrams, "Social Trends and Electoral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3 (1962): 228—241; Manfred Friedrich, *Opposition ohne Alternative* (Cologne: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62); Judith Shklar, *After Utopia: The Decline of Political Fai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Talcott Parsons, "An Approach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actions of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ouva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59), 4: 25—29; Thomas Molnar, *The Decline of the Intellectual*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61), 特别见 pp. 199—222; Stephen R. Graubard, ed., *A New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特别见 Ernst B. Haas, Karl Dietrich Bracher, Ralf Dahrendorf, S. M. Lipset, Alain Touraine, Eric Well 和 Michel Crozier 的文章; David Riesman, Introduction to Stimson Bullitt, *To Be a Politician*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特别见 p. 20。

49. 引自 Rousseas and Farganis,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p. 284.

50. Arthur Schlesinger, Jr., "Where Does the Liberal Go from Her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4 August 1957, pp. 7, 36.

51. Arthur Schlesinger, Jr., "Epilogue: The One against the Many," in A. M. Schlesinger, Jr., and Morton White, eds., *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p. 536.

52.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in, 1958), pp.97, 119.

53. Shils, "The End of Ideology?" p.57.

54.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p.55.

55. Aron,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p.323.

56. Aron, *The Industrial Society*, p.169.

57. *Ibid.*, p.161.

58. Lipse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pp.268—270. 塔尔科特·帕森斯还特别就美国黑人的情况根据马歇尔(Marshall)的分析作了扩展,见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 252, 257—259, 261, 277。

59.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p.404.

60. C. Wright Mill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3), p.256.

61. *Ibid.*, pp.256—257.

62. John Kennet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8), pp.330—331.

63. T. B. Bottomore, *Elites and Society*(London: C. A. Watts, 1964), p.70.

64.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p.405.

65.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pp.477—478.

66. S. M. Lipset and Richard Dobson, "The Intellectual as Critic and Rebel: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Daedalus* 101(Summer 1972): 137—198; S. M. Lipset, "Academia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in T. J. Nossiter et al., eds., *Imagination and Precis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Faber, 1972), pp.211 —289; E. C. Ladd, Jr., and S. M.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1976), 特别见 pp.125—148; S. M. lipset and Asoke Basu, "Intellectual Types and Political Roles," in Lewis Coser, ed., *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5), pp.433—470。

67.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155.

68.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pp.230—231.

69. *Ibid.*, pp.232—233.

70. 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trans. Edward Shil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p.110.

71. James C. Davies, *Ideology: Its Causes and a Partial Cure*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4), p.3.

72. Rousseas and Farganis,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p.274.

73. Lipse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p.303.

74. Hughes, "The End of Political Ideology," p.158.
75. Moskvichov, *The End of Ideology Theory*, p.28.
76. Franz Schurmann, "Systems, Contradictions, and Revolutions in America," in Roderick Ayn and Norman Miller, eds., *The New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6.
77. Moskvichov, *The End of Ideology Theory*, pp.62—66.
78. Alvin W. Gouldner, "Toward a Radic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Social Policy* 1(May-June 1970): 21.
79.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pp.40—41.
80. M. Rejai, W. L. Mason, and D. C. Beller, "Empirical Relevance of the Hypothesis of Decline," in Rejai, ed., *Decline of Ideology*, pp.274—275. 另见 Paul R. Abramson,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 (July 1971), 特别见 pp. 146—147, 以及 David R. Schweitzer, *Status Frustration and Conservat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wiss Case*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4), pp.17—21。
81. John Clayton Thomas,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in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A Study of Changing Policy Orientation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4), p.13.
82. *Ibid.*, p.26.
83. *Ibid.*, p.44.
84. John Clayton Thoma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artisan Divisions in the West: Trends in Domestic Policy Orientations in Ten 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7(December 1979): 403—405.
85. *Ibid.*, p.406.
86. Thomas,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pp.45—46.
87. Rejai, Mason, and Beller, "Empirical Relevance of the Hypothesis of Decline," in Rejai, ed., *Decline of Ideology*, p.275.
88. Richard Rose and Derek W. Unwin,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Western Party Systems since 1945," *Political Studies* 18(September 1970): 295.
89. John Kenneth Balbraith, "The Conservative Onslaugh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22 January 1981): 30.
90. *Ibid.*, p.36.
91. Richard Simpson, "System and Humanism in Social Science," *Science* 173(May 1971): 664.

196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麦基弗奖获奖图书

在本书中，李普塞特分析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特征之一的民主。通过对全球范围内选举状况以及民意测验的仔细研究，李普塞特探索了一个国家以及组织内部民主形成所需要的条件，政治参与和选举行为的相互关系，以及支持和反对民主运动与价值的原始性和持续性力量。本书探讨了阶级斗争、左翼政治、政治不稳定以及工会内部微观政治等多种政治现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份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经验资料、历史视角以及认真的思考。任何对于民主进程内部活力以及人类政治行为的因果关系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李普塞特的思考具有无穷的价值。

本书是目前为止政治社会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一本书，李普塞特教授的广泛比较，以及完全摆脱狭隘的民族范畴的视野，都将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政治学季刊》

本书的出版，再次显示了李普塞特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他人无可企及的地位。

——《评论》

上架建议：政治理论

ISBN 978-7-208-10031-2



9 787208 100312 >

定价：5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